



#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Floo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以赛亚·伯林 / 著 陈小慰 叶长缨 / 译

出版社

#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下册）

【英国】以赛亚·伯林 / 著 陈小慰 叶长缨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 1928—1946 / (英)伯林(Berlin, I.)著, 哈代编; 陈小慰, 叶长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47-2596-5

I. ①以… II. ①伯… ②哈… ③陈… ④叶… III. ①伯林, I (1909—1997)—书信集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955号

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by Isaiah Berlin,  
Letters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4  
'Freedom' copyright Isaiah Berlin 1928  
Introduction to *Washington Despatches* © Isaiah Berlin 1981  
'Zionist Politics in Wartime Washington' © Isaiah Berlin 1972  
Quotations from diaries, incoming letters etc. © their several authors 2004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2004  
Article from *Evening Standard* copyright *Evening Standard* 1942  
Lyric excerpt of 'My British Buddy' by Irving Berlin  
© copyright Irving Berlin Inc., 1943, © copyright renewed by Irving Berlin  
'Third and Last' from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 translated by Judith Hemschemey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oberta Reeder, copyright © 1989, 1992, 1997 by Judith Hemschemeyer,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92 by Canongate Books, Edinburgh,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anongate Books and Zephyr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021号

书 名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 1928—1946

作 者 [英国] 以赛亚·伯林

编 者 [英国] 亨利·哈代

译 者 陈小慰 叶长缨

责任编辑 李瑞华

特约编辑 许 昆

原文出版 Pimlico,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62.7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96-5

定 价 89.00元(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华盛顿

我的英国伙伴，  
咱俩立场全然不一样；  
他认为这场战争胜利属于他，  
我则坚信属于我才理所应当。  
为此两人争得不相上下，  
却有一个憧憬两人一样：  
等到活儿干完，  
等到赢了这一战，  
我们将隔海握手欢庆。

——欧文·伯林<sup>1</sup>

我希望能够为赢得这场战争尽一份力。

——以赛亚·伯林致莫伊拉·加斯特<sup>2</sup> 397

---

1 选自《我的英国伙伴》，为《从军歌》的英文版。欧文·伯林，原名伊斯雷尔·巴林（1888—1989），作曲家，生于俄罗斯，1893年移民美国。共写了900多首歌曲，包括《上帝保佑美利坚》和《银色圣诞节》。还写了19部音乐剧，其中爱国歌曲《从军歌》（1942）专门为鼓舞美国士气而作，由一家各族士兵组成（欧文·伯林坚持这么做）的演出公司搬上舞台与银幕。该公司是二战期间美国军队里唯一一家演出公司。公司所获的可观收入捐献给了军队紧急援助基金。

2 见1941年1月3日致莫伊拉·加斯特的信。



美国参战后，伯林向美国人宣传英国人的工作变得不重要了。反倒是帮助英国人了解美国人成了目前的急迫任务。伯林由于就他负责的特殊群体所写的相关调查报告十分得力，被派到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负责使馆下属一个规模扩大的政治舆论调查室。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为负责起草《每周政治报告》，这是白厅（英国政府）有关美国政治局势的一份主要官方简讯。这份文件原来只是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常规性概要总结，而伯林则在其中注入了他通过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获得的大量内部消息。

## 致门德尔·伯林

1942年6月18日 [明信片]

华盛顿特区，

马萨诸塞大道2500号

我的生活（千万别听麦吉奇小姐<sup>1</sup>的话）在过去一年中从未因为生病躺在床上中断过哪怕一天，如今却不得已要分成两半：四天在纽约，三天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我只乘火车（飞机旅客太多），在两个城市里会见了众多各界人士，身心都在茁壮成长。我维持了查尔斯和菲利克斯之间的和平，真有趣。

爱你的

沙耶

1942年7月6日，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从华盛顿给伦敦的内维尔·巴特

1（玛丽·阿格尼斯·）克雷格·麦吉奇（1901—1991），经济作战部，1942—1944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一秘，1944—1946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福利部主任；1944年与银行家欧文·舒勒（1909—1967，理查德·舒勒的堂兄弟）结婚，之后使用夫姓舒勒和舒勒—麦吉奇。她是第一位担任英国外交官的女性，并因此成为卡罗琳·贝尔一篇文章的主人公。这篇文章名为“穿裙子的外交官”，刊于1942年10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在一封致赫伯特·尼古拉斯的信中（1943年11月9—11日），伯林谈到她的骄人业绩，并称她为“了不起的女性！”她与伯林父母关系很好，想必是同他们口头或写信说了有关伯林健康状况的话。

勒<sup>1</sup>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一篇由这里的一两位使馆人员写的文章，他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指出美国人有排斥英国人的倾向”。<sup>2</sup>但是他恳求巴特勒不要以为作者相信那些观点理由充足。那个月晚些时候截获的一封信表明，作者实际上是赛亚·伯林，在信中他被形容为“一个非常精明的犹太人，在驻美英国使馆宣传部门工作。[那篇文章]虽然流露出犹太人发现还有其他种族[原文如此]遭人反对而幸灾乐祸的心理，但目光敏锐，并且约有60%的内容准确无误，反映了事实”。

9月份，这篇文章被稍加整理，收入使馆编辑的一份针对美国的《邮政电报审查报告》。编者按是这样开头的：

过去两个月里从美利坚合众国发出的信件表明，尽管许多美国人对英国和英国人民表现出明显的钦佩友好之情，也尽管他们反复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击败轴心国，但目前在美国，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对英国的敌意，具体什么来由又似乎说不上来。针对英国的批评五花八门，有时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主要集中在种族问题、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偏见和普遍存在的无知。

接下来提到以赛亚·伯林列举的问题，但未提作者名字。“一位作者为此专门列举了种种表现，希望有助于大家对此提高认识……”之所以将其收入报告，是因为被截获的信件约有60%的内容准确无误。以下是文章原文的打字稿：

### 美国人反对英国人的种种方面

以下列举的条目均选自普遍持有的观点，大多没有充足的理由支持。

列举顺序并不表明重要性大小。

- 
- 1 内维尔·蒙塔古·巴特勒（1893—1973），1940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参赞，1940—1941年任公使，1941—1944年任外交部北美（后为美国）司负责人，1944—1947年任外交部助理副国务大臣。
  - 2 外交部文件371/30656, A6681/60/45, 该前言中的另一引言也出于此。

1. 英国人拥护帝国主义。他们不信奉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英国殖民主义政策暴虐、愚蠢，效率低下，对土著人是一种侮辱，结果造成马来人和缅甸人明确表示不愿对其效忠，不像菲律宾人那样忠心耿耿。还造成印度对英国的虚假效忠，等等。

2. 英国等级制度刻板守旧。英国贵族为世袭制，而不是通过功绩或选举产生。英国人长期由封建地主统治，这些人要么剥削穷人、面目狰狞，要么就是腐朽没落的寄生虫，专门靠别人的辛勤劳动为生。

3. 英国人正在搞赤化。如今英国已经从一个封建反动派压迫未来社会  
400 主义产业工人的社会，转向土著赤色分子压迫封建反动派的专制政权。两种方式都令人厌恶，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4. 英国身居高位的尽是些无能低效的人。这些人办事过于小心翼翼，对所有新思想、新理念均采取鄙视态度；还有那些充满戒备心理，有气无力，厌倦自己工作的老家伙们。

5. 350万的人处于战争状态中，而英国人却在自己的小岛上安坐不动。

6. 英国人向来让人觉得不堪一击，喜欢逃避退缩。他们时刻准备着英勇就义，却一点麻烦都不愿碰。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他们还在新加坡悠闲自在地喝茶。英国官员不是极端保守分子就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懒散样。

7. 租赁计划将美国搜刮一空，就为了给英国提供武器装备，但英国尚未付清他们的战争债务。英国人利用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在拉丁美洲与美国竞争，可以说他们在养肥自己，而不是在努力赢得战争。他们更多地是在考虑战后面对美国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不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

8. 比起单纯、老实的美国人，英国人过于精明机敏。他们相信“权力均衡”，相信“分而治之”。实质上他们是在鼓励发动战争，只要这些战争能够保住他们裁决其他国家命运的地位。《凡尔赛条约》就是狡猾的英国外交手腕的典型例证。正是因为它，才导致了希特勒和所有其他恶魔的出现。英国的外交目的是要让世界分裂。

9. 美国外来民族倾向于认为英国人属于可恶的地主阶级国家，深受其害者只好跑到美国来寻找自由。这一观点自然出于爱尔兰人，但波兰人或

斯洛伐克人也认为英国人类似于他们中欧地区的暴君。在原先的几个“统治”国当中，唯有英国幸存下来，而且相对来说毫发无损，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不再可能成为轴心国的目标。

10. 反英情绪是美国主流爱国传统的组成部分。虽然反犹太教或反天主教也一样绝对是不光彩的事，是一种歧视的表现，但仇英心理却和其他一些特有的情绪十分搭调。例如人们公认，主张干涉国际事务者舒了一口气，因为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可以再一次宣泄反英情绪，而不用站在敌人一边。仇英心理是美国精神强盛高涨的证明。

11. 在美的英国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还有他们那种无言的、通过一意孤行表达出来的唯我正确的态度，那种“入乡不随俗，一切照搬英国方式”的独尊作风。

12. 英国人说话不够直截了当。在美英国人往往喜欢用谨慎和寡言代替机巧，对美国发言者的观点不会热情地表示同意与否，而只是用模棱两可的“很有意思”搪塞过去。对每个问题，他们都是双方（或多方）观点的职业预言家，这一点令各方均大感恼火，也因此给人一种印象：英国人对任何问题都缺乏坚定、坦率、属于自己的信念。因此，他们总是显得轻浮和遮掩躲藏，一点都不正大光明。 401

13. 过分小心，唯恐踩到美国人的痛处而激怒他们，以及面对美国人的充沛精力所感到的不自在心理，使英国人陷入一种神经质的沉默寡言，这么做反过来也让美国人感到尴尬和不自在，使他们对英国人失去信任。因此，热诚开朗、性格外向的英国人比起性格细腻内向的那些更受欢迎。

14. 相比苏格兰、威尔士或任何其他粗野和乡气的口音，过于高雅的英格兰口音令人生厌。任何一个英国北部地区呼呼发出的颤舌音，也比字正腔圆、富有教养却透着虚伪做作的英格兰口音，来得悦耳动听。这一点极其重要，千万不可忽略。拿英国讲师来说，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浓重的约克郡或兰开夏郡口音比任何别的素质都来得重要。这方面的偏好还包括浓重的伦敦东区土音。

15. 华盛顿

由于过来的英国人相互求助举荐，造成目前众多英国人集中在华盛顿地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排斥心理。相对各技术性外交使团，英国使馆的名声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普遍认为它势利傲慢，喜欢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模样。不仅如此，它还愚蠢迟钝、麻木不仁，是各种反动下流言论的滋生之地。在人们心目中，它聚积着为数众多、年迈衰老的外交官员，这批人根本无心与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事情发生任何联系，也不想了解。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各外交使团人员自己的肯定。一方面看到使馆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又实在看不出它究竟在起什么作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得到使馆持续不断的照顾。一旦他们与使馆的联系减少，自然就会怨声载道，批评使馆人员作风懒散势利。

16. 缺乏对英国工业成就和军事成就的深刻印象。这其中至少一部分是因为驻英美国新闻机构，尤其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质量低劣、做表面文章。

17. 抨击英国人对美国人缺乏了解（伦敦根本就没有美国外交官）。维南特是人气很高的艺人，他就很不满美国在英国所做的宣传。

402 18. 美国亲英人士不受欢迎的个性。在人们心目中，他们是一群无所事事的有钱人，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地区。他们对英国人的喜爱被认为是巴结势利、缺乏美国精神的表现。

19. 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相对较小，这使他们在面对英国人时感到不太自在。这是处在备战状态的所谓“假战”或“静坐战”氛围的作用，这种氛围在美国仍然十分普遍。1940年5月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面对波兰人和挪威人时也有类似尴尬的感觉。

20. 英国官员在与中国人、犹太人等受侵害民族打交道时，表现出根本无法沟通的“石墙”态度。几乎没有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对提交给他们解决的问题表现出或哪怕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努力加以理解。相反，他们脸上流露的是厌倦、是不耐烦，它所引起的抵触心理超过所提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失望。即便申诉得到了解决，怨愤情绪仍在心头。

21. 某些英国书籍和电影（尤其是电影《乘风破浪》<sup>1</sup>）表现了一种虚幻情绪，以及强烈的阶级意识，影响很坏。

22. 虽然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占比重不大，却吸引了众多猎奇的目光，也使英国人在亚洲的形象暗淡无光。

23. 所有讨厌罗斯福总统的人也都讨厌英国人，因为觉得他们是总统喜欢的人。

外交部文件371/30656, A6681/60/45

8月初，以赛亚·伯林返回英国休假，同时向外交部和情报部作简要汇报。

致克里西达·里德利

1942年9月7日 [明信片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克里西达：

在莫贝加<sup>2</sup>度过的夜晚和清晨感觉真是好极了，其中乐趣超过任何居有定所和没有流浪经历的人所能想象的。我靠个人清醒的意识，感觉有必要回到我的底比斯<sup>3</sup>，加强各类防御措施，但更主要的是在一些地方与人们交谈。请转达我对里德利夫人的感谢，还有我认为整个过程未免太戒备森严了。再次重复对你的慎重邀请，请你给情报部打个电话好吗？

以赛亚·伯林

1 一部带有逃避现实倾向的战争片，由谢尔盖·诺本多夫执导，1941年11月首映。

2 指莫贝加公寓，坐落于伊普斯威奇镇，是克里西达的丈夫杰斯帕的父母杰斯帕和娜塔丽·里德利的家。

3 可能是将华盛顿与古希腊底比斯城相比，斯塔提乌斯在其叙事诗《底比斯》中描写了该城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残杀，后被索福克勒斯改编为剧本《安提戈涅》。

那晚和你分手后，我遇见了福尔弗德。看起来是位非常好的牧师。提到英女王陛下时，他的声调都会改变，绝对真诚。

9月下旬以赛亚·伯林返回美国。途中在爱尔兰停留了一个星期，等待下一个航班。这期间，他患上了肺炎，但还是设法乘上了飞机。他患病的消息很快传到父母耳中。

那段时间里，你几次回英国，给我们带来了莫大喜悦，同时也让我们忧心忡忡，因为战争时期旅途奔波实在太危险了，1942年的情形更是如此。我想，是在接到你和往常一样语气欢快、告诉我们你已安抵纽约的电报之后吧，拉什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买一份《标准晚报》，上面有一些关于你的消息。他的语调悲伤凝重，我立马就去买了一份。上面有消息说，你病倒了，直接从机场送到医院（此说后来证实与事实不太相符）。你的妈妈此时已经在帕丁顿车站准备乘车去牛津，我本来也要到那里与她会合一起去的，她被我紧急叫回伦敦住所，两人开始近乎疯狂地给你的上司——当时的情报部大臣——打电话探听情况。大约到了晚上10点，那边总算传来消息，说是一个叫托马斯<sup>2</sup>的先生到医院探望了你，你目前的状况好得不能再好。这条神圣无比的英语短语意味无穷，可以作任何解释。从中我们只获知了一条信息：你还活着，这就足够了。当时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何不给魏茨曼博士发封电报问问？他那时正好在纽约。感谢他回了封那么贴心的电报安慰我们，令我们终身难忘。我们开始真的相信你已脱离危险。你本人也不断给我们发电报或写信宽慰我们，将自己的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是连续有十天半个月，我们还是时刻处在极度焦虑和担心之中。你之所以染上肺炎，是因为住在香农酒店时夜里忘了关窗，住在那里是为了赶第二天飞往纽约的飞机。在我们为你担心忧虑之时，我们也多次深感万幸，还好

404

1 罗杰·托马斯·鲍德温·福尔弗德（1902—1983），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英国王室丛书作者，1937—1948年任伦敦国王学院兼职英语讲师，1940—1942年任战争部非军事助理，1942—1945年任空军大臣助理私人秘书。

2 见下文第486页注4。

大轰炸时你不在伦敦，这是我们唯一的莫大安慰。特别是知道你在伦敦遭遇空袭时，从不躲到防空洞里，而是无畏地（或许也是愚蠢地）将自己暴露在一切危险之下。我们有时会在报上读到有关你的文章和评论，每次都让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与自豪。这一点无可非议，为人父母的人都能理解。<sup>1</sup>

致门德尔·伯林

1942年10月1日 [电报]

纽约，哥顿酒店

健壮成长的以赛亚·伯林。于纽约，哥顿酒店。

10月2日，下面这篇报道出现在伦敦《标准晚报》的报道中：

### 高空病

我听说以赛亚·伯林博士在纽约得了重病。在从英国乘飞机飞越大西洋返回后，他被送进了医院。据猜测可能是由于高空飞行引发了肺炎。

原籍俄国的伯林博士是牛津大学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不久前他还曾担任克莱丽莎·丘吉尔小姐<sup>2</sup>的哲学课导师。他是目前三位在美的全灵学院研究员之一，另外两位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和约翰·福斯特先生。福斯特先生是一位律师，目前在驻华盛顿英国使馆担任一秘。

### 情报部的会谈

伯林博士是驻华盛顿英国公使哈罗德·巴特勒先生的主要顾问之一。他曾多次到伦敦参加情报部召开的磋商会议。作为驻美英国情报处调查报告室的

1 门德尔·伯林，《家庭回忆录》。

2 （安妮·）克莱丽莎·丘吉尔（1920年生），温斯顿·丘吉尔弟弟约翰·斯特兰吉·斯宾塞·丘吉尔（1880—1947）的女儿，后（1952年）与安东尼·艾登（下文第510页注5）结婚。她并未正式修读哲学课，授课的也不是伯林，而只是在1939—1940年间由A.J.艾耶尔非正式地指导过，并通过他的关系，认识了伯林。



405 负责人，伯林博士负责定期撰写美国政治舆论分析报告并发往伦敦。

在后来的版本中，这篇报道有了一些改动。它是这样开头的：“我听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博士乘飞机由英国抵达纽约。可能由于途中不适，飞机着陆后他去了医院。”似乎为了弥补先前报道的轻描淡写，改后的版本将以赛亚·伯林形容为“矮胖粗壮”，“是牛津大学的知名人物之一”，以及“他长了一颗知识分子的大脑袋，戴着厚厚的眼镜”。接下来这段是新增加的：

### 误会

尽管他是一位出色的交谈者，要理解伯林博士却不太容易。

昨晚抵达纽约的迪克西·泰格<sup>1</sup>小姐是一位美国记者，今天见面时她告诉我与伯林博士在华盛顿的一次会面。伯林博士滔滔不绝讲了几分钟，趁他停顿的当儿，迪克西·泰格小姐俯身向前道：

“对不起，我不会说法语。”<sup>2</sup>

###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 [明信片手稿]

纽约东68街525号，纽约市立医院

必须承认，像昨天那样给你们发电报，说自己“健壮成长”，也许不够明智，也没说真话。我确实是夸大其词了。在爱尔兰逗留等待飞机的那个星期，脑袋着了凉，等到达纽约，过去那个熟悉的、习以为常、不再可怕的鼻窦炎症状就复发了。根据你们一贯的教导，我决定还是上医院为妙。这里的医院好比私人疗养院，有单独的病房和护士，当然价钱也绝不便宜。我想，惠

1 迪克西·泰格(1905—1946)，时任《纽约邮报》的驻外记者。

2 《标准晚报》1942年10月2日第2版，《伦敦人日记》(未署名)。10月5日，他父亲给他寄了两份剪报，并在信上写道：“早些的那篇报道说你得了‘重病’，可以想象我们多么难过，接下来那篇报道程度就缓和多了。”

勒一班纳特既然家财万贯又身体欠佳<sup>1</sup>，一定会有位好医生。于是第二天我就到这儿来了。在他主治医生豪泽的关照下，十分舒适地住进一间摆满鲜花的单人病房。没有疼痛，体温约38℃（今天早晨37.7℃，如同我在电报里所说的；下午37.4℃）。那些花全是朋友送来的，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犹太老“客户”们蜂拥而至，不得不谢绝来访。菲利克斯夫妇派了他们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科恩过来，让他写一份报告（鲍拉先生会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查尔斯目前在山区疗养，我从这里出院后打算也去那里休养一段。《标准晚报》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一定把剪报寄给我。从本质上来说，我还是健壮有力的。 406

以赛亚·伯林

F劳在我这儿，向你们问好。还有惠勒一班纳特。

我能想象出你们现在的心情。为了减轻你们的担心，我会设法给你们打个电话，不过肯定实现不了。明天会继续给你们写信。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一—1942年10月5日 [明信片手稿]

纽约市立医院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我想从离家后星期一那天在爱尔兰等飞机开始（我是星期天离开的，你们应该记得），我就感觉不舒服了。鼻窦炎开始发作，不过我睡得很香，胃口也好得惊人，消化顺畅，没有疼痛。但由于多次乘坐四处透风的公交车前往机场，每次都失望而归，炎症便老不见好。到我一星期前抵达纽约时，老毛病便又重犯了。我了解所有的症状，于是近乎习惯性地行动起来——找医生，体温下降——酒店里住了一夜，体温再次升高，简单咨询了非常和气非常善良的医生之后，便让弗雷德·劳（他很快要

1 他有血压不稳、疲乏无力和其他毛病。

返回英国，我想是出于荣誉感<sup>1</sup>吧)陪着住进了这家医院宽敞、通风的病房，配备了特别护理。惠勒—班纳特、查尔斯和西德尼·伯恩斯坦<sup>2</sup>送了好多花来(伯恩斯坦是我们的电影导演。长得十分帅气，为人谦和，彬彬有礼。他在伦敦拥有好几家剧院，对我特别关切，送我到医院，又带来很多鲜花和书籍，有求必应)。他不久后将返回英国，希望会与你们联系。这期间，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我的同事，还有巴特勒等不断前来问候，最后医生不得不中断我的一切对外交往。他认为我需要绝对休息。薇拉·魏茨曼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我去他们目前所在的山间疗养院，说那里才能享受到绝对的安静。我准备下周去。周四我给你们发电报说我健壮有力，一点不假：体温已经恢复正常，正悠闲地躺在床上读钢琴家李斯特的生平传记。《标准晚报》一定是缺新闻了，居然拿我来凑数当题材。不管怎么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A.库克<sup>3</sup>被同事骂得够呛，怪他让你们担心紧张。没事干就喝点小酒(新鲜芳醇至极)，我觉得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每个人都对我关爱有加，生活充满乐趣。一定要写信给我，洛克菲勒中心30号英国情报处转我收即可。说说你们在伦敦的情况，以及怎么与情报部取得联系(他们给我发了一封充满同情的慰问电报)。得胜! 光荣! 我现在是外交部一等秘书啦!

爱你们的

沙耶

-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pour l'honneur。“出于荣誉感”之说或许是表明他并非因为胆小才来到美国。
  - 2 西德尼·刘易斯·伯恩斯坦(1899—1993)，反纳粹社会活动家，电影商人，与好莱坞和美国媒体均有联系；1940—1945年任英国情报部电影顾问；1942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联络官；1942—1943年任北非盟军指挥部电影制作室主任；1943—1945年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电影制作室主任。
  - 3 不是阿利斯泰尔·库克，据他回忆，《标准晚报》的艾里森经常利用两人名字上的相似，浑水摸鱼，从中得利。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0月7日 [明信片手稿]

纽约市立医院

我注意到，你们两人的电报在语气上存在微妙差别：门德尔·伯林焦虑不安并带有一丝怀疑（诸如“请告实情”，“是外科手术吗？”等等），而玛丽则平静安详得多。实际上，医生并未对我的鼻窦炎进行什么特殊的治疗，使用的基本上就是阿克兰德—霍布森<sup>1</sup>式的技术。等我离开这里（费用高得吓人，但除非被赶出去，我不会离开，因为实在太舒服了。另外我要尽量从情报部讨一些英镑来，作为新的人事任命下达前最后的请求），那时面临的问题是：我是去魏茨曼在纽约山里的疗养院，还是大胆说服惠勒—班纳特，让他到亚利桑那州去（那里地势高，僻静，气候温暖干爽），或者两个地方都去？无论如何，这次我会照这位出色医生的嘱咐去做。你们现在应该已经见到弗雷泽夫人<sup>2</sup>了。下一次最新消息会由西德尼·伯恩斯坦提供。告诉米利亚姆 [·罗斯柴尔德]，让他往这儿给我写信。

爱你们

沙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0月16日1942年 [明信片手稿]

纽约东68街525号，纽约市立医院

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首先让我回答以下问题：任何手术都无法根治鼻窦炎，作用只是减轻严重炎症，但我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我是用红外线治疗，不能根治，但可以保证短期内不出问题。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知道自己在爱尔兰就病了，因为偶尔有发烧现象，但胃口依然极佳。如果在当时就把我的病情张扬出去，我就得躺在利默里克的医院里了。不知道你们

408

1 指阿克兰德私人疗养院（上文第154页注3）和伯林的医生（上文第166页注2）。

2 所指不明。

对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医院了解多少。可以让考克斯（在我们那次出名的车祸后）告诉你们。总之，我宁愿继续旅程，并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私人疗养院，医院里全是像我这样的单人病房。我这里宽敞明亮，墙壁刷得雪白，满屋子的阳光和鲜花。（花是查尔斯、[惠勒—]班纳特、罗斯柴尔德夫妇，以及别的你们不认识的人送来的。还有我的前任秘书们送来的书籍。）今天我情况很好，体温 $36^{\circ}\text{C}$ — $36.6^{\circ}\text{C}$ ，X光片没有再发现什么阴影，消化系统和胃口保持正常。医生强调的唯一一点是每次接完两个电话，我的脉搏就会加快十下，也就是说，人有点虚。他建议说，我在走之前这三四天内杜绝所有的访客和电话，但口气并不坚决。查尔斯打电话让我快点过去，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谢谢寄来的剪报，我完全能够体会你们当时的心情。劳特帕齐特夫人很快会回国，走之前会来看我。

爱你们

沙耶

我曾几次突发奇想，考虑把妈妈弄到这里来——我不需要人看护，只是觉得很想这么做——可是冬天太冷了，过来不太合适。我会考虑在夏天做点什么，连续八个星期坐在里斯本未免太无聊了。

爱你们

沙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0月17日 [手稿]

纽约市立医院

我亲爱的父母亲：

尽管所有的前任秘书都主动提出过来记录我的口授，但我认为亲笔信会让你们觉得更为真实。你们在信中说得很对，我确实是在一点一点地透露我的“病情”。至于主要原因，伯林夫人以她瓦德汉姆学院院长称之为“令

人惊叹的洞察力”，猜得完全正确。虽然《标准晚报》因为不了解而称我的病为肺炎，但的确不是。真正的病因是周身疲劳。这不是在英国待多久就能治愈的。牛津充满了乐趣，各类人等形形色色，各种书籍目不暇接，还有 409 每天接连不断的电话，离开它确实感觉无聊乏味。至于在爱尔兰的经历，当然非常奇特。如同我在上一张明信片里所说（希望你们全都收到了），当时除了原因不明的低烧，我的健康状况总体而言很好。只要能够避免，我可不想自投罗网，让自己和爱尔兰医院打什么交道。我想，此时乘跨洋飞机到纽约，比起要求获批回伦敦（因为一点点低烧就道回府，未免显得太愚蠢可笑），乘同样的飞机+火车+无数的复杂情况+等待，并不会多一分危险。于是我就飞回来了。一到纽约，我便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首先得上医院。肖勒姆酒店没有空房（居然如此对我这位老顾客。我大发了一通牢骚，把他们吓坏了），却引来了弗雷德·劳。当时我感到莫大的宽慰，因为我清楚，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还能依靠他的帮助。然后我心想，既然惠勒一班纳特(a)体弱多病，(b)家里又那么有钱，那么他一定有位好医生。果然如此。豪泽医生亲自到肖勒姆酒店对面的哥顿酒店(55街和第五大道交会处)来看我。哥顿酒店比肖勒姆酒店高级，房价也更高，但因为我的外交官的身份，给我打了折。第二天上午，我的体温达到38.4℃左右，于是我住进医院。美国没有私人疗养院，取而代之的都是医院里整齐划一的单人病房和护士，至少费用一样昂贵。西德尼·伯恩斯坦送我到了医院，他是我们的电影导演，不久后将回英国，希望到时他会去拜访你们。他非常机灵搞笑，举止高贵，有点花花公子的派头，但对我非常体贴关心。顺便我想到，得给情报部的速记员送件礼物，感谢她对我的悉心照顾。同时，在考虑送什么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你们，让伯恩斯坦的秘书给你们买一些小化妆品什么的，再给我们的朋友切斯特<sup>1</sup>买一包雪茄。当然，到时候你们得给这些东西付税金。继续刚才的话题：医生给我开了磺胺嘧啶片剂，这是一种新药，大家对

---

1 可能指(丹尼尔·)诺曼·切斯特(1907—1986)，1936—1945年任曼彻斯特大学公共管理学讲师，1940—1945年任职于战争内阁秘书处经济科；1945—1954年任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之后(1954—1978年)任院长。

它的效力深信不疑。<sup>1</sup>它真的让体温降了下来。于是当时我发电报给你们，说我“健壮有力”，事实确实如此。或许是有点诡辩，可我能说什么？难道要我写“送进医院卧床不起，持续发烧原因不明”吗？但是，饶舌的《标准晚报》破坏了这一切。所有人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我身上，不光是查尔斯和薇拉[·魏茨曼]，他们正在位于纽约芬代尔大街（一个犹太人密集居住区。当财政大臣亨利·摩根陶<sup>2</sup>听说这是查尔斯的地址时，非常吃惊）的格罗辛格酒店<sup>3</sup>等候我回去，还有无数其他人：包括我的同事[惠勒—]班纳特和托马斯<sup>4</sup>；摩根夫妇<sup>5</sup>一回到家就来看我；四位打字员捐出四美元给我买书（约有25本已经到达）；还有我的朋友盖伊·罗斯柴尔德<sup>6</sup>；伊林斯卡伯爵夫人<sup>7</sup>（弗劳拉·所罗门的设计师姐姐，嫁给波兰官员希科尔斯基<sup>8</sup>）做了特制的汤给我喝；菲利克斯寄了一本书；玛丽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并答应说会多写信，也让我多给她写；劳特帕齐特夫人送来了鲜花，她很快就要回到剑桥乏味的丈夫身边，还有A.兰博德爵士——这两人都准备回国，到

- 
- 1 抗菌的磺胺类药物由格哈德·多马克在德国伍珀塔尔的I.G.法本化学实验室研发成功。磺胺类药物能够有效抑制链球菌感染，于1935年投入市场。在盘尼西林出现（到1940年代末才开始在普通大众中使用）之前，磺胺类药物一直被视为首选特效药。多马克为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医学奖。
  - 2 小亨利·摩根陶（1891—1967），1934—1945年任财政大臣，持保守经济观点；经常与罗斯福起冲突，但两人始终保持朋友关系。
  - 3 格罗辛格酒店1919年由奥地利移民詹尼·格罗辛格创办，以高质量的餐饮、娱乐健身设施以及地处乡村而著名。
  - 4 本（杰明）·克鲁森·托马斯（1902—1975），律师；1939—1941年任新闻检查官；1941—1946年任职于纽约英国情报处金融地产部门；身高6英尺7英寸。
  - 5 奥博雷·摩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康（丝坦斯），两人在纽约的英国情报处调查科和英国新闻处工作。
  - 6 盖伊·德·\*罗斯柴尔德（1909年生），法国银行家，因为不想当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贝当统治下的犹太人”，1941年10月与其妻阿力克斯来到纽约，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当时正等待命令到伦敦总部（下文第496页注2）。见他撰写的《命运弄人》（伦敦，1985），第272页。
  - 7 伊林斯卡伯爵夫人即菲拉·贝纳森（1898—1977），纽约时装商店邦威·泰勒的时装设计师，与贾努兹·伊林斯基伯爵结婚。
  - 8 乌拉迪斯拉夫·希科尔斯基（1881—1943），波兰政治家、将军，1939年离开波兰在国外建立军队，成为国外所有波兰军事力量的总司令，以及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总部设在伦敦。在直布罗陀因飞机失事身亡。

时都会给你们打电话；我的记者朋友艾尔索普从日本人的拘留所<sup>1</sup>释放回国后，也过来看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虽然他们的来访让我很开心，而且我的热度两周以前已经恢复正常，但过多的访客和电话对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还是不太合适。大约一周前，我的脉搏开始一分钟跳九十下，太快了。因此，我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克己行动，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不见访客，不打电话，这样坚持了五天。一切立刻全面改观。起床前后测脉搏，体温已经不需要再量，吃也完全正常，排骨、牛肉、鸡肉，每天喝大约两加仑果汁。采用的是一种所谓的沐浴休息疗法。我不需要夜间护理——妈妈的意思我完全清楚——但我睡得非常正常。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一整天我都有一位专门护士照顾。而且不用说走廊上还到处是护士，只要轻轻按铃，她们就会飞奔进来。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男护理员，他是灌肠专家，总是怂恿我来上一次，似乎它是一种违禁的快乐。他说他喜欢为病人灌肠，病人一点不觉痛苦，之后便一身轻松。我通常靠李子干与无花果，它们更起作用。

让我说一下每天的生活：病房是米黄色的，从十二楼看去，视野很远，411  
 整个纽约尽收眼底。屋内有两张粉色的扶手椅，还有摆满鲜花的桌子和一些小摆设。睡觉时我都戴着眼罩，清晨四周也静谧无声，但我通常在8:30左右醒来。醒来后拉铃。护士华莱士小姐会应声走进病房。（她模样长得有点土气，但干事麻利，体贴病人，为人朴素，是这里公认的最佳护士。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心地善良，工作起来像钟表一样准时可靠。）(a) 她帮我洗脸、洗手、刷牙，(b) 让我吞下两粒维生素，可可味，说是对身体好。(c) 接着给我一杯热橙汁和(d) 一份《纽约时报》，(e) 最后给我端来早餐。我通常吃一种叫沙麻里纳[原文如此]的东西，一两个鸡蛋，咖啡，一个烤苹果或几颗无花果，外加面包。这一番苦行修炼之后，我会休息20到25分钟，这期间护士给我读一些内容粗俗的小报。然后煞有介事地递给我电子剃须刀，开始刮胡子。一切都做完后，我才起床，披一件衣服，靠在扶手椅上，一边休息，一边读书。如果有人来看我，我就接见他们。快中午的时候，医生会

1 乔·艾尔索普从海军又转而参加了美国飞虎队，在香港遭日军逮捕，1942年8月作为交换战俘释放。



来查房，检查一番后告诉我身体恢复得很好。每隔一星期量一次血压，偶尔也拍鼻窦X光片。我的血成分和血压情况极佳。12:15洗澡。前一段都用酒精洗，效果特好。1点钟吃午饭。午餐我吃得很多，有牛肉汤、薄鱼片、无数的青菜、脱脂乳，还有大量炖煮好的水果。2点钟午睡。4点钟醒来，一身大汗，感觉极爽。用科隆香水全身擦过后，再次起床，喝咖啡，吞维生素片。然后给华盛顿打电话，收集各种舆论情报。6点钟吃晚饭。喝很多汤，吃鱼或鸡肉、沙拉、水果。橙子和菠萝汁轮着喝。6:30，通常读书或与人下盘棋。7:30，再次洗脸，洗手，刷牙。7:45我已经上床，床头堆满了书、收音机、橙汁、鼻炎喷雾，一盏电灯，防止鼻窦炎万一发作时使用（好在它几乎没发作过）。病房内收音机天线、拉铃绳，再加上电话线，纵横交错，给所有进来的人造成重重阻碍。此刻（大约9点），我正在听莫扎特的巴松管协奏曲，准备读贝蒙<sup>1</sup>写的一本关于侍者生活的滑稽小说入睡。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生活更加惬意？约翰·福斯特来看过我，很感谢他。兰博德也千里迢迢从华盛顿赶来。约翰建议我限制访客，或者不要回答他们，只需充满智慧地点头即可，以保存体力。他总是这么搞笑。我可能会在这里再待一星期左右。就看自己感觉是否足够强壮。至少一个月内我不会回使馆。就此，很快会再写信。

爱你们

412 以塞亚·伯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五10月23日 [1942年，手稿]

纽约市东68街525号，单人病房

我亲爱的爸、妈：

听说你们（爸爸）10月15日的来信是由尼古拉斯<sup>2</sup>转交，通过外交公文

- 
- 1 路德维希·贝蒙（1898—1962），奥地利出生的美国作家。书名可能是《斯普兰德酒店》（伦敦，1942）。
  - 2 赫伯特·乔治·\*尼古拉斯（1911—1998），1931—1935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5—1937年任耶鲁大学现代历史联邦基金研究员；1938年任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讲师；1946—1951年

袋<sup>1</sup>寄给我的。这封信我打算也采用这个路径，即通过外交公文袋由尼古拉斯转交给你们，看看结果如何。我总以为直达的航空信和明信片会到得很快，但在你们15日的来信中只字未提我自9月底以来给你们寄去的好几张明信片，全部都是用普通航空信寄去的。下封信中一定要记得告诉我这封信（星期六才能到华盛顿，也就是明天，10月24号）是在一张标着“24日星期六”的明信片之前还是之后到的。我会在英国政府邮件投递员将此信送达华盛顿的那一刻寄出明信片，也就是明天上午11点。这些邮递员十分可靠，是众所周知的“安全助手”，但生活贫寒。不错，你们批评得很对，我确实没有告诉你们实话。不过，如果我能将肺炎发作的病情瞒着你们，我一定会这么做，这是不用说的。就像爸爸将消化系统的毛病瞒着我一样。当然到最后我还是会告诉你们一些情况，因为实在拖得太久了。我以为肺炎不外是三天发烧，加三天注意饮食就好<sup>2</sup>了。麻烦的是，除了轻微的气管炎（持续了一周左右），引起疾病的真正原因并非肺炎（不是很严重，和前几次差不多），而是周身疲劳。所以，等病好后四五天，我被查出来整个人处于虚弱状态，不适于工作，需要休息和静养。这种时候，假如我们家在美国有房子——不是住酒店——而是自己家，我想我会直接回家。或者在护理的陪同下到海边休假。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觉得，那位好医生也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好医生——只要护士知道如何挡住访客，没有哪里比这里的病房更加安静。开始时我希望有人来看我。想到有那么多人准备为远在异乡的我伸出援手，就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温暖：盖伊·罗斯柴尔德主动提出为我找一间绝对安静的房间；艾尔索普也是；查尔斯就更不用说了。惠勒一班[纳特]到目前还在打算和我一道去亚利桑那。但很显然，访客对我没有好处。

413

任研究员。他在伦敦英国情报部美国司工作期间，是柏林的主要联系人，也是柏林向父母传递真假信息的渠道。据他说，掩盖柏林真实健康状况需要“无节制的一连串伪证”（致柏林的信，1943年5月14日）。

- 1 根据国际条约，通过往来于使馆与其政府之间外交公文袋寄送的物品可免于所在国的检查或干涉。虽然外交公文袋的作用是寄送官方文件，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从美国寄出的外交公文袋还用来为丘吉尔运送古巴雪茄。
- 2 柏林此处原文为：basta。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语中，该词意为“足够了”。

正如我之前实话对你们说的，目前我的体温、消化等都已完全恢复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每次用力之后，比如洗澡或在阳光下散步，脉搏速度就会从每分钟72下加快到86甚至90下。确实有许多人脉搏每分钟跳85下照常工作，自己也逐渐会慢下来，不过巴特勒让我别着急。（要是在牛津的时候他也对我这么说就好了！）我的日间护理更是一位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他让我实行严格的起居制度，谢绝所有访客，切断一切电话，一旦有急事，三言两语说完。这么做的结果是，目前脉搏在80下左右，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到72下。医生告诉我出院的话随时都可以，但这么做不太可取。当然也有人出院后病情并未加重。以上是我的近况，全是真话，绝无半点虚假。我不需要夜间护理，因为我睡得很香，没有必要。白天我有一个特护，早上8点到下午4点，最基本的护理时间，因为我需要有人帮我谢绝朋友来访，给我维生素片，清洗鼻窦，在我午睡时不让护士等人进来打扰。4点以后，这些事由普通护士们干，我想她们谁都可以做，但医生希望由专人向他汇报，所以我只好留下她。要让你们真正信服，我想唯有靠亲眼见到我的人跟你们说了。你们还记得盖伊·奇尔弗吗？个子很高，棕色拳发，也是大学老师的那位？记得他来过49号一次，并且肯定也来过牛津。他近期要回英国，隔上一段时间<sup>1</sup>都会来看望我。我会让他给你们打电话。在他返回科尔温湾的粮食部前，请他在伦敦喝个茶。我之所以夸医生好，是因为他什么事都不着急，希望我暂停工作一段时间，不要急于回去。他十分坚持这一点，准备亲自给巴特勒写信说明，对我就像朋友。收到尼古拉斯的信，说他去看了你们。这个人有点无足轻重——不能这么说，毕竟我这封信得通过他寄出去——只是他属于被侮辱<sup>2</sup>的那类人，有点心胸狭窄<sup>3</sup>。但我想可以在这里给他留个位置<sup>4</sup>，因此他目前非常肯干<sup>5</sup>。此刻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歌剧《鲍里斯·戈都诺

1 伯林此处原文为：often。

2 伯林此处原文为：оскорбленные。托尔斯泰的小说题目《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也使用了同一个词。

3 伯林此处原文为：мелочный。

4 伯林此处原文为：у меня есть место для него тут。

5 伯林此处原文为：временно очень преданн。

夫》。我刚吃完晚饭（现在是6:30），晚餐有奶油鸡白汤、维也纳炸肉排加芦笋尖、胡萝卜丝、酸卷心菜丝，最后这道是一种味道比较清淡的泡菜。然后是脱脂乳、一杯巧克力（喝咖啡怕睡不着。我在这里吃得很痛快，但极其小心）、炖煮过的洋李干（不敢冒险）、一大团蔬菜沙拉。有时候我甚至敢冒大不韪，吞下一大堆菠菜泥——groz，如果我没记错这个词。我想下个星期，不管什么医生不医生，我都得离开了。我觉得身体太好了，不能再待下去。非常感谢H.艾伦爵士给我的祝福，但我从来没有病得严重到要“挺过来”。希望《标准晚报》不再对我感兴趣。我不喜欢被人说成肥胖，有关迪克西·泰格的故事也完全是无中生有。但如果他们又说了什么，一定要把剪报寄给我。再有那种事的话，你们一定不会再相信我了。 414

爱你们

沙耶

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这封娓娓道来、想排除你们担心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力，不可能出自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之手。难道你们不相信塔木德的逻辑推理方法<sup>1</sup>吗？说到这点，替我向拉什问好。

（昨天收到的明信片上日期有点怪，好像写着26日什么的。）

10月底柏林离开医院后，去了哈伊姆·魏茨曼那里。当时他也在养病，和夫人薇拉一起住在纽约州卡茨基尔山的格罗辛格酒店。柏林在此度过短暂康复期后回到纽约。

---

1 使用隐晦或诡辩的对比方法研究和解释《塔木德经》。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1月9日〔手稿〕

纽约，哥顿酒店

我亲爱的爸、妈：

从这张精致的便条纸看，你们会以为，与在肖勒姆酒店的日子相比，我已经飞黄腾达。其实这家酒店和肖勒姆距离400码左右（肖勒姆酒店是弗雷德·劳的最爱，这会儿他一定已经抵达英国，这里谁也不相信他真的会回去——我想他会听到一些不怀好意的话），对面是查尔斯住的圣瑞吉斯酒店，正好在两者之间，便于串门。圣瑞吉斯酒店和哥顿酒店都对外交官员打折（！）因此，仔细考虑之后，我想还是住在这里，条件好，又能负担得起。和查尔斯共度假期真是太棒了。他们住在山里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式酒店里。酒店（老板是加利西亚移民）不肯收他任何费用，作为回报，查尔斯被迫与当地宗教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短暂会见。但是，当两名哈大沙组织的妇女径自走进花园，唐突地走近查尔斯和他搭讪时，薇拉用她最最傲慢高贵的口气责问道：“你们不识字吗？”（外面的围栏和大门上写着“私人住宅”。）并像赶猫一样将她们赶出门。她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有点走极端，但对下人则很好。她认为罗曼娜·古德曼<sup>1</sup>是个傻瓜，选择过这么普通的生活，品位如此平庸。（“想想看，罗曼娜住在乡下的家庭旅馆里，居然还说‘多么可爱的人，这些退休的印第安政府公务员’。想想她那副样子！”）她讨厌丽贝卡·西弗<sup>2</sup>，嫌恶艾德太太<sup>3</sup>，说她总让自己感觉说错或做错了什么事。她妹妹也来这里了，典型的俄罗斯人，同她姐姐与查尔斯结婚前一模一样：高雅、好交际，但不容易让人记住。查尔斯身体状况极佳，对非洲运动十

- 1 罗曼娜·古德曼，婚前姓曼茨克，英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保罗·古德曼（1875—1949）的妻子，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创始人之一及主要成员。
- 2 丽贝卡·西弗（1890—1966），迈克尔·马科斯的女儿，创办玛莎百货连锁店，伊斯雷尔·西弗的妻子。他形容自己的太太和薇拉·魏茨曼是“不断相互攻击的终身朋友”，见伊斯雷尔·西弗，《回忆录》（伦敦，[1970]），第123页。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于1920年由两人共同创立，她们的分歧部分也与该组织的运作有关。
- 3 伊迪斯·艾德，婚前姓洛（1872—1944），第一任丈夫为莱斯利·哈登—盖斯特，后与心理分析学家、英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蒙塔古·）大卫·艾德（1865—1936）结婚；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创立时期成员之一。

分满意，显然已经从痛失爱子的悲伤中解脱出来。而薇拉则完全崩溃。心脏也好像受到影响，我在那里期间，大部分时间她都躺在床上，吃饭时也会黯然神伤，忍不住流泪。不抽烟，不打扑克，对我非常温柔体贴，无微不至。偶尔也会有朋友们前来探望，然后离开。你们一定想知道我究竟是怎么得的病，什么原因引起，还有我为什么想去亚利桑那州。我想，离开英国那会儿，虽然人有点累，身体状况还很好，之后就在爱尔兰受了寒。英国海外航空公司<sup>1</sup>不是一个称职的东道主，对自己的尊贵旅客漠不关心（旅客被三三两两安排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过夜，而本来是很容易安排得更好一些的）。我知道情况不妙，因为第二天中午体温开始上升，等到第三天，就成了规律性的发烧。我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普通感冒，抵达纽约后，发现全身提不起劲来，于是去拍了X光片，服用了磺胺类药（药效确实惊人，干净彻底地消除了感染）。这些药使人感到乏力，但所有的链球菌、肺炎球菌，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引发肺炎或胸膜炎或其他疾病的细菌，全都在瞬间一举歼灭。于是我在9月28日星期一到9月31日<sup>2</sup>星期四这几天度过了危险期。到了星期四，体温完全恢复正常，我当时充满喜悦的电报中至少这点是事实。医生说一周后，也就是10月7日我就能出院了。可到了那天，我的双腿感觉就像胶冻，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脉搏加快到95下，体温不正常。于是我又继续住院，继续服药，在那里又过了三个星期。每天清洗鼻窦，喝大量的牛奶和果汁。这期间，又因为发现每次打完电话，我的脉搏总会加快，于是那三个星期我过上了修士般的隐居生活，自觉自愿，没什么见人的欲望，反倒是非常享受疗养院的生活。目前我和查尔斯都已回到纽约。我去见了医生，他认为我没有必要再到亚利桑那州去（那里地势高，空气干燥，充满阳光。因为远离江河湖海，多山空旷，一年四季阳光普照，也没有风，非常舒服，是治疗各类鼻窦的理想之地），不过至少在七到十天内不许回华盛顿，于是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查尔斯希望我到他的酒店住（好监督我），但他夫人身体那么虚弱，随时需要人照顾，在那里我会感到压抑疲倦。兰博德

416

---

1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成立于1939年，为英国国有航空公司，后被英国航空公司兼并。

2 应为10月1日。

今天恰好在纽约，很快要走，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回去后他会在伦敦给你们打电话。我感觉身体棒极了，但为了让医生高兴，我会待到中午起床，晚上10点睡觉，每天出去散两次步，每次半小时，多喝水，多睡觉。明天我的朋友乔·艾尔索普会来这里吃饭，他也很快要作为美国官员出访英国。一旦这里的工作过于乏味，我自己很快也会回去。

爱你们

沙耶

这个星期最棘手的事是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写信，对他儿子<sup>1</sup>的死表示悼念。我认识他儿子。薇拉遭受的打击也一样难以承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1月14日 [手稿]

纽约，哥顿酒店

我亲爱的爸、妈：

我依然住在这家酒店的豪华套房里。早上睡到很迟起来，晚上10点上床。谁见了我都说我脸色比8月份离开纽约时好看多了。我仍在蠢蠢欲动，想去亚利桑那州过上两个礼拜（也许去那里过圣诞），而不去意大利的阿马尔菲以及地中海地区。说实话，我的健康状况好极了，电子疗法效果已经显现，我的鼻窦目前暂时不会找任何麻烦。不过这里可以向你们解释一下X  
417 光显示的整个病情状况：

（1）炎症产生的原因是窦与窦，即鼻腔周围面颅骨的含气空腔（如眼睛上方的额窦和上颌窦）之间的孔道太窄，排水不畅，造成阻塞（即鼻腔黏膜炎）和分泌物堆积。（2）我的咽喉是链球菌的滋生地。任何人的咽喉都有链球菌，但我的数量太多了。

---

1（弗朗西斯·休·）彼特·科迪内·伍德（1916—1942），哈利法克斯三个儿子中的老二，女王的约克郡龙骑兵的少校，10月26日在埃及作战中牺牲。

因此，为了消灭链球菌，我必须注射抗链球菌疫苗，可以保证至少七年内彻底歼灭链球菌。它不像磺胺类药物，只是消除感染和炎症，现在我已没有这些症状。而且防疫针不是大剂量地打一次，而是分三次，每隔一星期注射一次，每次很少剂量。纽约的医生名叫帕尔默（隶属纽约医院），非常通情达理，对我很和蔼。而且他在华盛顿有个朋友，也是当医生的，因此，必要时，如果我不想每一针都跑到纽约去打，他也可以告诉朋友具体步骤让他代劳。照例，医生问我想不想在鼻孔旁动一个手术，使孔道变宽，我拒绝了。这件事不急，我又没病，暂且等上一两年，看看还发不发作，到时再采取行动。另外我不太相信这个手术，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谁动了这种手术而真正根治的。我的主治医生——他名叫埃德温·T·豪泽，说我总体状况非常之好，谁也看不出我曾经住过医院。今天我和摩根夫妇一起吃了晚饭，他们一定要我到惠勒一班纳特那里去，住到他回来，差不多要到25号或26号。（他在纽约时和他们夫妇俩一起住过，眼下正在南方。查尔斯总是把“南”这个音读成“年”，觉得很滑稽。比克先生过去也老这么读，却并不觉得可笑。）我准备就这么做。那里和这里一样舒适，更便宜，况且摩根太太一定会让我过上不受干扰的安静生活。你们不认识她，因此没必要表示什么。为了感谢查尔斯夫人〔薇拉·魏茨曼〕邀请我去他们疗养院住，你们给她发了电报，但由于美国方面的信件审查，这封电报被延误了，审查员想知道谁是“以赛亚”。被告知此人是英国使馆一秘后，他们表达了歉意。因为爱子迈克尔失踪，查尔斯夫人目前几乎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今天恰逢儿子生日，她泪流不止，身边围满了医生护士，查尔斯看上去倒精神抖擞，心情很好的样子。刚刚收到你们的电报，说弗雷德·西德尼<sup>1</sup>详细诉说了我的情况。如果你们见到弗雷德，告诉他我现在正把他那些无聊的书装在马口铁的盒子里，走到哪儿提到哪儿。托尼·兰博德应该已经向你们问过好。还有我的朋友乔·艾尔索普，就是本·科恩跟你们提过的罗斯福的堂兄弟、当新闻记者的那位，他很快要去伦敦。告诉我万灵节茶会的盛况。哈利法克斯勋爵在收到我吊唁他痛失爱子彼特的信后，回信向我表示感谢。我一丝不苟地

418

1 即弗雷德·劳和西德尼·伯恩斯坦，这里应为笔误或是考虑节省费用在电报里省去了“和”。



认真照顾自己，成效显著。喝低因<sup>1</sup>咖啡，晚上睡得很好。

爱你们的

沙耶

我刚刚见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sup>2</sup>他奉英女王政府之命来纽约出差两周。我没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是因为我肯定他不会打，教养不够。但他很友好。

正如“序言”中所阐明，以赛亚·伯林大多数的“公务”信件在筛选时均被删去了。尽管如此，下面两封信（根据保存下来的形态判断，并未寄出）可以作为例证，说明盛行于使馆部门内部的勾心斗角，同时也展示一下要把伯林充满专业术语的书信传达给普通读者，需要做多么繁重的注释工作。

第一封信也可以作为以赛亚·伯林与他的牛津同事、在伦敦英国情报部工作的赫伯特·尼古拉斯之间大量“违禁”信件往来的例证。由伯林起草、签上哈利法克斯勋爵名字送出的官方快讯，集中了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和经过整理的摘要报告，带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和可信度，其中许多不得不删去的内容便进入了伯林和尼古拉斯之间语气辛辣同时又晦涩费解的往来信件中。

这两封信写于英美盟军突袭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火炬行动”（11月8—11日）之后。

---

1 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来自法语sans caffeine）。

2 这是艾琳·斯特劳斯第二次与伯林见面。伯林当时同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一起在他的纽约寓所里，正好她来拜访。她全神贯注倾听罗斯柴尔德说各种新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伯林的存在。

## 致赫伯特·尼古拉斯

1942年11月26日 [手稿, 未寄出]

纽约东70街158号

亲爱的赫伯特:

我仍处于半丧失战斗力的状态,因而无法就当地政要们对戴高乐<sup>1</sup>的态度等展开调查。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当地的戴高乐主义者处于愤怒和沮丧这两种情绪的轮番袭击当中。在我看来,美国国务院针对他们的政策,是由厌恶他们(以及任何除了奥地利的自由运动)的A.A.伯尔<sup>2</sup>掌控,似乎不是要加强对吉罗<sup>3</sup>将军或达尔朗海军上将<sup>4</sup>的支持,倒更像是要把整个法国完整的组织结构打散,让它们各自为政,陷入混乱,然后把打碎的各个部分重新组合,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结构形式,进行全新打造。换句话说,法国人目前统治着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和太平洋群岛,在理论上还包括叙利亚。这种格局会得到允许继续存在下去。达尔朗或者其他什么人,吉罗、赫里欧<sup>5</sup>、任何人,都将在美国掌控下治理北非和西非。罗伯特海军上将<sup>6</sup>会专门留下来负责管理马提尼克岛,可能还包括圭亚那,并直接与华盛

- 1 夏尔·戴高乐将军(1890—1970),1940—1943年为流亡英国的自由法国运动领袖,被美国视为难以驾驭的麻烦制造者;1943—1944年任国民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统,后任总理(1958—1959)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1959—1969)。
- 2 小阿道夫·奥古斯塔斯·伯尔(1895—1971),律师、经济学家、外交家,罗斯福“智囊团”成员。1938—1944年任美国副国务卿,1945—1946年出任美驻巴西大使,后成为肯尼迪总统顾问。以对他国,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厌恶而著名,1942年初曾企图压制英国的整个宣传计划。
- 3 亨利·奥诺雷·吉罗将军(1879—1949),法国第七军司令,法国投降后被德国作为战犯一直到1942年;“火炬行动”开始前被艾森豪威尔推选为未来法国军事将领,希望他能够说服北非的维希法国部队在盟军攻击时保持中立,但未成功。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去世后,成为法属西非与北非的政府及军事领袖。后与戴高乐共同担任法国国民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为时很短,在智谋上很快不敌戴高乐。
- 4 让·路易·萨维尔·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1881—1942),1936—1940年任法国海军将领,之后任维希政府高级成员;1942年任北非法国部队总司令及最高专员。11月11日他向进攻法属西北非的英美盟军投降。尽管他以强烈反英著称,艾森豪威尔还是认为他是唯一能够保证法属西非对盟军攻击持中立或友好态度的人,遂任命其为法属北非政府和军事领袖。12月24日他遭年轻的反抗组织战士费尔南德·邦尼尔·德拉·夏贝尔暗杀。
- 5 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前总理,最早支持贝当政府,后遭维希当权者逮捕并交给德国人。
- 6 乔治·罗伯特海军上将(1875—1965),1939—1943年任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瓜地洛普和法属圭亚那高级专员。

顿打交道。没有中央集权，也没有一个反纳粹的效忠对象。戴高乐是否与吉罗达成共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美国国务院认为，只要有诺格斯先生<sup>1</sup>、埃斯特瓦先生<sup>2</sup>、布瓦松先生<sup>3</sup>等戴高乐的死硬反对派存在，冲突摩擦、勾心斗角以及公开背叛便将继续下去。也就没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共识，哪怕只是一种不加约束的共识。赫尔先生<sup>4</sup>和韦尔斯先生<sup>5</sup>用来支持他们这一显然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论调的理由是，戴高乐或其他任何法国领导人都无法代表将来的法国（此话不错），如果现在就把一切固定下来作为对将来的担保，很可能到时无法收拾。要想既避免这点同时又能支持盟军（尤其是支持美国。马提尼克岛和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仍在继续散布反英宣传内容，并未受到盟国的阻止），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相互对立。你问为什么吉罗将军会获得扶持以反对戴高乐，此话也对也不对。实际上，对他欢呼叫好了一两天之后，美国国务院如今已经差不多将他遗弃了。当然，总统是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他起的作用比国务院大得多，国务院对欧洲问题很少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总统也只是运用了处理国内政治斗争的常用方法——让双方同时存在，偶尔煽动他们相互斗斗，通过仲裁维持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如：韦尔斯与华莱士<sup>6</sup>，内尔森<sup>7</sup>与萨默维尔<sup>8</sup>，麦克纳特<sup>9</sup>与赫西<sup>10</sup>和帕

1 奥古斯特·保罗·查尔斯·艾伯特·诺格斯将军（1871—1971），北非地区法国部队司令；1936—1942年任摩洛哥总督。

2 让·皮埃尔·埃斯特瓦海军上将（1880—1951），1940—1943年任突尼斯总督。

3 皮埃尔·弗朗索瓦·布瓦松（1893—1948），分别于1938—1939年、1940—1943年任法属西非总督，支持维希政府。

4 科德尔·赫尔（1871—1955），律师，民主党国会议员、参议员，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在外交事务上提倡采取国际主义态度；二战后期致力于为战后时期建立一个新型国际组织。（经罗斯福提名）获194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创立联合国方面做出的贡献。

5 萨姆纳·韦尔斯（1892—1961），外交家，1933—1937年任助理国务卿，1937—1943年任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副手）。

6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888—1965），曾任美国农业部长，1940—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

7 唐纳德·马尔·内尔森（1888—1959），1942—1944年任战时生产局主席（该机构成立于1942年1月，目的为调控国内经济）。

8 布雷恩·伯克·萨默维尔上将（1892—1955），1941年任战争部参谋长助理（代理）；1942年任后勤补给部队和陆军勤务部队总指挥。

9 保罗·沃利斯·麦克纳特（1891—1955），1941—1943年任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主任，1942—1945任战争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

10 刘易斯·布赖恩·赫西少将（1893—1977），1941—1946年任征兵署主任。

金斯<sup>1</sup>，埃尔默·戴维斯<sup>2</sup>与多诺万<sup>3</sup>，杰西·琼斯<sup>4</sup>与摩根陶，等等。)奥地利军团(在妻子是奥地利人的赫尔、伯尔以及传闻还有法兰克福特三人的共同影响下创立)的领导人是极端反民主的大公们，主要组织者为温迪施—格雷茨<sup>5</sup>，他正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谈论贝奈斯<sup>6</sup>的未来。其目的显然是想在奥地利周边创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据说，有人问罗斯福，一旦捷克人发起抵抗，《大西洋宪章》<sup>7</sup>开始实施，里面对自决权有明确规定，到时会怎么样。他的回答是，如果那样的话，入捷的美国军队将在那里驻守五年甚至十年，直到捷克人民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并同意采取某种解决办法。把这一点应用到法国问题上，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不可能不同意，即他们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分裂法国组织，目的是把仲裁权交到胜利者手上，最好是美国人。让奥地利与捷克人作对(他们正在蓄意制造矛盾——贝奈斯在罗斯福那里已经完全失宠)，是他们在中欧地区玩的把戏。至于我们可爱的老爷外交部，从来不会预先考虑任何反对势力，特别是只要能够继续保住戴高乐和叙利亚便心满意足，任由北非和西非笼罩在暂时的美国影响之下。偶尔的冷落轻慢(比如麦克先生<sup>8</sup>有意推迟在直布罗陀露面，这事你一定知道)有助于加强合作的紧迫感。我承认自己带着一种与“国家”周刊<sup>9</sup>类似的讽刺笔调，但我真的忍不住生气，既为贝尔先生这样毫无防备地接受阻止法国团结在某个人或某件事周围的政策，也为我们表现出了极度软弱无能。在这方面，伦敦最好的消息来源渠道是我的老房东和老朋友A.兰

1 弗朗西丝·帕金斯(1882—1965)，1933—1945年任劳工部部长。

2 埃尔默·霍姆斯·戴维斯(1890—1958)，新闻记者，1939—1942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42—1945年担任战时新闻局局长。

3 威廉(“野牛”)·约瑟夫·多诺万少将(1883—1959)，律师，1942—1945年任战略服务处主任。

4 杰西·霍尔曼·琼斯(1874—1956)，1940—1945年任商务部长。

5 温迪施—格雷茨贵族世家与前奥匈帝国的皇族有姻亲关系。

6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于1935—1938和1945—1948年任捷克总统，当时正流亡伦敦。

7 1941年7月由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制订了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目的和原则，成为战后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所有民族享有自决权。

8 (威廉·)亨利·布拉德肖·麦克(1894—1974)，爱尔兰出生的外交官，1942—1943年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北非盟军总司令)手下的民政事务联络官。

9 《纽约时事周刊》。

博德爵士（克鲁克香克<sup>1</sup>认识他），但前提是他愿意谈。他最近被增补调派到外交部法国司，因此这一有关美法政策的消息绝对真实。就个人而言，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当属在阿尔及尔的墨菲先生<sup>2</sup>。我见过他，他的观点是，要  
422 有计划有步骤地让魏刚<sup>3</sup>（或其他人）一方面与戴高乐作对，另一方面与赖伐尔<sup>4</sup>结仇，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实现战后的可塑性，同时保证战争期间法国各个派别组织对美国的忠诚。下星期回到华盛顿后，我会设法收集详细情报。非常感谢转交附信。

你的

以赛亚·伯林

- 
- 1 罗伯特（罗宾）·詹姆斯·克鲁克香克（1898—1956），记者，1928—1936年任《新闻纪事》美国通讯记者；1936年任助理编辑（1948—1954年任编辑）；1941—1945年任英国情报部美国司司长，1941—1942年任英国驻美情报处副主任；“在他手下工作很愉快；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根据尼古拉斯·卡尔对以赛亚·伯林的访谈，见上文第365页注1）。
  - 2 罗伯特·丹尼尔·墨菲（1894—1978），美国自由情报官员，争端调停人、外交家及解决麻烦的能手。1941—1943年任罗斯福在北非的政治代表，为艾森豪威尔登陆北非专门建立了情报网络。
  - 3 马克希姆·魏刚将军（1867—1965），1940年5月被任命为同盟国法军总司令；法国投降后，成为法属北非总代表和非洲法军司令。他公开表示反对轴心国，1941年11月在德国坚持下被免职。1942年被捕，关押在德国。1945年回到法国，因叛国罪遭逮捕及审判，后无罪释放。
  - 4 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1931—1932和1935—1936年任法国总理（因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向意大利妥协而下台）；1940和1942—1944年任维希政府总理；大力鼓吹与纳粹德国合作，与其合谋迫害和驱赶犹太人，1945年因叛国罪被处死。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sup>1</sup>

1942年11月26日 [手稿, 未完成, 未寄出]

纽约东70街158号

亲爱的达夫妮:

你的回信<sup>2</sup>让我深感沮丧。我们这里需要人手这点绝对真实, 没有半点虚假捏造。考恩被铺天盖地的工作完全淹没, 奥博雷则满口怨言, 也在情理之中; 贾德森是个很难共事的人, 目前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很欣赏你的来信, 请一定向克里普斯、克兰伯恩<sup>3</sup>等解释, 请他们尽快再派一个人来。克里普斯真的害怕一旦辞职会成为霍尔—别利沙<sup>4</sup>吗? 他是否认为飞机制造部<sup>5</sup>会派他去美国, 和华莱士共事, 实现他的夙愿? 克兰伯恩准备去印度吗? 奥利弗·斯坦利<sup>6</sup>又是为什么? 我想, 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sup>7</sup>对你给他的信一定赞不绝口。这么看你作为政治评论员前途一片光明。罗尼<sup>8</sup>给 [哈罗德·] 巴特勒的信如果寄出去的话, 也不会拿给什么人看。不过这并不奇怪, 华盛顿这边目前正陷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况。约翰 [·福斯特] 在使馆

1 达夫妮·(玛格丽塔·)·斯特雷特夫人(1913—2003), 美国出生的英国皇家空军成员惠特尼·威拉德·斯特雷特的妻子, 与以赛亚·伯林在纽约的英国情报处共过事, 此时她在伦敦英国情报部美国司任秘书。以赛亚·伯林非常喜欢她(她也喜欢伯林), 对她的能力欣赏有加。遗憾的是, 以赛亚·伯林给达夫妮·斯特雷特的大多数私人信件都没有保存下来(还好这封例外, 根据外观来看, 并未寄出)。

2 对以赛亚·伯林写信请求达夫妮·斯特雷特加入他在华盛顿的小组的回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在给伦敦的赫伯特·尼古拉斯的许多信件中提到她有可能调动。其中一封信一再重复“达夫妮怎么样?” 此话作为以赛亚·伯林战争期间公务书信专辑的一个题目可谓恰如其分。

3 罗伯特·阿瑟·詹姆斯·加斯科涅—塞西尔, 克兰伯恩子爵(1893—1972), 1929—1941年任南多塞特郡工联主义下议院议员, 1940年任财政部主计大臣; 分别于1940—1942和1943—1945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2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1942—1943年任掌玺大臣; 1942—1945年任上议院领袖; 后(1947年)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五世。

4 霍尔—别利沙因为在法国的军事政策于1940年1月辞职。

5 The 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

6 奥利弗·弗雷德里克·乔治·斯坦利阁下(1896—1950), 十七世德比伯爵之子, 曾任多个政府职务, 包括1940年任战争大臣, 1942—1945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7 汉密尔顿(汉姆)·费希·阿姆斯特朗(1893—1973), 曾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928—1972年任该委员会刊物《外交事务》编辑。

8 指罗纳德·特利(1897—1976), 1933—1945年任莱斯特郡哈伯勒区的保守党议员, 1940—1943年任约翰·雷斯爵士(情报部)、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和布兰登·布莱肯的议会私人秘书。

的日子很不好过，[戴维·]韦尔斯<sup>1</sup>开始与格拉伯先生<sup>2</sup>作对（“这个年轻人妄自尊大，我得找机会报告给伦敦”等等）。我们再一次回到柴尔斯时代的旧日噩梦中。温诺克尔<sup>3</sup>投资选错了时机，目前面临破产。韦尔斯给他找了份工作，担任对外联络员，实际上就是被抬高地位的密探。每天坐在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里，见人就问“我说，你听说过……吗？”调查活动本身倒似乎没受什么影响：我采用了孤立主义政策，摆出一副装傻的态度。格兰特·麦肯兹<sup>4</sup>什么都不干，就让他负责提供咨询。总之，我制订了一套能够包治百病的计划，做好总体部署，让大家的注意力重新转向战争。我感觉像一个孤立的罗森曼<sup>5</sup>，注定要失败。巴特勒就像耶夫根耶维奇·利沃夫亲王<sup>6</sup>（俄国革命的第一任总理，开明、受人尊敬，但同时又茫然，年迈、无能，没什么价值）。我对罗宾拒绝成为他的克伦斯基<sup>7</sup>不感到奇怪。纽约这里运作得特别好：奥博雷再一次人气飙升，兴高采烈地期待着与韦尔斯较量一番，韦尔斯虽不如他重要，但值得干上一战。本[·托马斯]一切照旧。埃德蒙森太太<sup>8</sup>情绪忧郁，埃先生<sup>9</sup>则继续工作。如今的周日夜晚和过去已完全不同。下面说说大家关心的事项。

在说之前，我得补充一句，这封信的第一页<sup>10</sup>写好后在我大衣口袋的不知哪个角落躺了好些天，这期间发生了好些事。我去了华盛顿，并且如列宁先生<sup>11</sup>所说，“行动胜于写信”。并不是说这两件事情我做了多少，而是一想

1 驻华盛顿英国使馆官员。

2 肯尼斯·格拉伯，伦敦英国情报部。

3 杰克·温诺克尔（1913—1978），纽约英国情报处新闻部门的美国记者，写信期间在华盛顿工作。

4 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官员。

5 萨缪尔·欧文·罗森曼（1896—1973），律师，1932—1943年任纽约最高法院法官；1943—1946年任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顾问及演讲稿撰写人。罗斯福称他为“玫瑰萨米”（其名字与“玫瑰”发音相近——译者注）。

6 格奥尔基·耶夫根耶维奇·利沃夫（1861—1925），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主席。

7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1881—1970），1917年7月至10月继利沃夫任临时政府主席。

8 达西·埃德蒙森的夫人（见下注）。

9（乔治·）达西·埃德蒙森（1904—1976），纽约英国情报处情报科的负责人，1946年起任整个情报处负责人。

10 到上句结束。

11 原文为：M[onsieur]，以戏谑口吻用了法文外交用语“先生”一词。

到一件事就耽误了另一件事，结果一件都做不好。摩根—韦尔斯的第一轮较量已经在群情沸腾中结束——奥博雷在几乎无处不在的欢呼声中获得胜利。温诺克尔（此事最后会落入谁的手掌？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小心！）在背后四处说华莱士坏话，人们对他极其反感，甚至包括麦吉奇小姐，这是大家完全料想不到的。我们那位无足轻重的首席长官R.坎贝尔爵士<sup>1</sup>嚷嚷着支持罗宾，罗杰斯（希望你对此人闻所未闻<sup>2</sup>）正在为颠覆分子提供援助。奥博雷计划派一个小规模的远征部队去将乔利·杰克暂时解救出来，并继续开放第二战线。我的前线依然未受侵犯，虽然克劳福德上校的自杀消息使保罗<sup>3</sup>陷入持续性的歇斯底里。哦天哪。可别让这些破事败了你回国的兴致，还是让我赶紧安慰你一下，调查科可是个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湛蓝的海水平静无波，风暴中心至少在三海里之外。我太累了，没办法再写下去。下一页信得稍等片刻。哦天哪。在法案通过前的那段时期<sup>4</sup>，我像狂热的信徒一样义愤填膺，你一定知道（虽然我想不通为什么你一定知道）。我们似乎招进来一位可疑人物，他名叫大卫·科恩<sup>5</sup>，是J.福斯特和安格斯·麦克唐奈尔<sup>6</sup>的朋友，看着吧，此人一定会带来大麻烦。工资问题揭开了无数伤口，巴瑟斯特<sup>7</sup>四处游荡，发泄不满，说自己的法律建议最终会证明有用，说周围的气氛连他都觉得可怕，说最近的巴特勒计划是绥靖行为，说华莱士3月前会到布拉格，说他希望去加拿大，知道那里有一份工作可干。伦尼<sup>8</sup>断言，现

424

1 罗纳德·伊恩·坎贝尔爵士（1890—1983），外交官，1939—1941年任驻贝尔格莱德英国公使，1941—1945年任驻美公使，1945—1946年任英国外交部助理政务次长，1946—1950年出任埃及大使。

2 我反正是闻所未闻。

3 保罗·斯各特·兰基内（1908—1983），此时在华盛顿为以赛亚·伯林工作（之前为纽约英国情报处调查科负责人），1944年离开加入路透社。

4 指1942年4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获得通过前的那段时期。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副国务卿阿道夫·伯尔（上文第497页注2）曾提出议案，交立法通过，限制英国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并予以披露，但最终被罗斯福否决。获得通过的法案对英国利益予以了充分考虑。

5 或许指美国作家大卫·刘易斯·科恩（1896—1960）？

6 安格斯·麦克唐奈尔（1881—1966），安特里姆伯爵七世之子，1941—1945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专员。

7 莫里斯·爱德华·巴瑟斯特（1913年生），国际律师，分别于1941—1943和1943—1946年任英国情报处及驻华盛顿英国使馆法律顾问；1946—1948年任联合国英国代表团法律成员。

8 约翰（“杰克”）·奥吉尔维·伦尼（1914—1981），1941年任职于纽约英国新闻处；1942—1946



在的情况不是瓷器店里来了一头驯服的母牛——他指的是杰[拉德·坎贝尔]爵士，而是来了头公牛，还可能没阉过，一动就会闯祸。只有里太太<sup>1</sup>看上去容光焕发，幸福地过着新生活，原先的你曾经让我对这种新生活心驰神往。笔从我无力的手上掉下去了，就此。

以赛亚·伯林回到华盛顿后，开始了持续两年半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工作。

425 以下信件突出体现了他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与之相反的是，他的朋友们证实，以赛亚·伯林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只要他一出现，就能使他周围原本沉闷的气氛活跃起来。以下是盖伊·德·罗斯柴尔德回忆在美国见到以赛亚·伯林的情景：

也许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人就是以赛亚·伯林[……]他与众不同的外表让人一见便难以忘怀：他独特的气场似乎弥漫在他的衣着上，奇妙的脸孔几乎就是一幅漫画像，集中体现了他的两个显著特点：睿智与俄籍犹太血统。[……]以赛亚当时是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人员中地位举足轻重的一位。他对美国政治的秘密无所不知，在英美关系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协助作用。他不仅杰出卓越，见解独到，而且富于机智，胆略过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之士。对他的为人和他所做的一切，大家交口称赞，无不佩服，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令人倾倒和着迷。<sup>2</sup>

---

年任职于英国情报处；1946—1949年任职于外交部。后（1968年）负责英国军情六局（海外秘密情报机构）。

1 （玛格丽特·）赫曼妮·里（1911年生），英国情报处职员，与勒内·迈克尔（1905—1971）开始新生活并于1946年结婚。勒内·迈克尔于1941—1945年任英国情报处新闻广播科主任。

2 盖伊·德·罗斯柴尔德，见前引书《命运弄人》（上文第486页注6），第115—116页。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天1943年2月21日 [手稿]

华盛顿, 英国使馆

发信人: 以赛亚·伯林<sup>1</sup> (用英语行文, 尽管听起来难以置信)

我亲爱的父母亲:

真想不通为什么会觉得给你们写信特别难, 也许是因为实在太忙了, 相比之下, 写信就显得困难重重。加上我新来的秘书, 一个人挺好效率又高的加拿大姑娘, 不像在纽约时我那位美国遗孀<sup>2</sup>那样天天催着我给你们写信。再加上使馆气派威严, 让人觉得不好把政府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个人私事上(希望信件审查官会把此话抄下来提供给我亲爱的情报部)。以下是我每天的生活: 我在华盛顿仍住肖勒姆酒店, 它与纽约的肖勒姆酒店不同, 规模更大不说, 而且富丽堂皇, 非常舒适, 只是房价有点昂贵, 每天要六美元。使馆坐落在一个树木葱郁的地方, 每天早晨我穿过公园到使馆上班, 在那里工作到晚上7:30左右。关于个人生活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很想念兰博德夫妇(有空给外交部法国司的A.兰博德打个电话, 11月份他在我住院时和出院后来看过我)。准备找个人合租房子或大间的公寓安顿下来。目前我暂时选择的对象叫爱德华·普里查德, 胖墩墩的, 是菲利克斯从前的美国学生。他大约二十八岁, 肯塔基人, 目前在白宫工作, 是一个说话俏皮刻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我会给你们寄一份《时代》周刊, 里面有他和上司本·科恩的照片)<sup>3</sup>, 在性格脾气上与我很投缘。他喜欢交际, 并且恐怕和我一样不爱整洁。因此, 也许等盖伊·奇尔弗抵达这里参加食品外交使团(他很快就会离开英国。如果你们想通过尼古拉斯向他问好——我求之不得, 万分感激, 请告诉他顺便去趟食品外交使团, 我想盖伊现在若不是仍在科尔温湾, 一定就在食品外交使团), 我会怂恿他和我一起合租,

426

1 战争时期的许多信件都像这样在信封外写上姓名, 以便信件审查官检查(这也是以赛亚·伯林在这段时期内签名时常常会将姓包括进去的原因)。由于后面括弧内插入的内容, 我特意在这封信里加入了信封外的姓名。

2 指艾丽丝·欧文。

3 见《时代》周刊, 1943年1月11号, 第19页上刊有普里查德的照片, 照得很好。

因为他非常整洁干净，井井有条，做事细致缜密。这里很难找到房子，而且房费高昂，上一次找的要350美元，连一半我都付不起。此外，我通过情报部兑现了一张250英镑的支票，支付生病费用。请帮我确认银行已经支付。至于新学院的膳宿费，我人在这里，根本无从知道哪笔收费合理，哪笔不合理，因此就付了吧，好像已经过了期限。我身体棒极了，针剂注射持续时间很短，似乎没觉得有什么副作用，倒是鼻窦炎很长时间没再找麻烦，不知是针剂起了作用，还是应该归功于这里规律有序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比在充满干扰的纽约轻松得多）。杰克·史蒂文森<sup>1</sup>来了信，我非常高兴。相距千里，任何老朋友的情谊都格外令人感动。我会回信。请代我感谢戴维和玛丽的来信。我见到了玛丽[的]堂妹，那个叫罗莎蒙德还是罗莎琳·科勒律治<sup>2</sup>的，威廉·费希尔海军上将<sup>3</sup>的女儿，一点不像玛丽，也不喜欢她。她勤奋、快活、聪明、办事稳妥，但说实话，算不上漂亮。至于工作，非常有趣，让我全身心投入其中。我现在发觉很难在情报部和外交部<sup>4</sup>布置的工作之间求得平衡，因为两个部门都要求我完成任务，而且两个部门都怀疑我在另一个部门投入了过多时间。不过我的顶头上司对我的表现都还算满意。我终于和哈利法克斯夫妇一起吃了午饭，哈利法克斯先生非常亲切，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纪的人，与现实相距遥远，带着一丝好奇看着自己周围的陌生环境。他夫人外表温柔恬美，一副顺从模样，但实际上非常坚忍刚强。一个儿子牺牲、另一个儿子伤残<sup>5</sup>的严酷事实并没有在他们外表留下什么明显痕迹，充分表现出在公众环境中长大、献身于公众生活和责任的人特有的淡定冷静。这样反而使他在美国人当中人气大涨，受到更多爱戴。我和外交大臣坎贝尔爵士相处甚好，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母亲是莱曼家族的成员，罗

1 约翰·维尔·史蒂文森（1909—1973），1922—1928年在圣保罗学校与伯林同学，1928—1932年就读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古典学专业，英国情报部公务员。

2 罗莎蒙德（上文第450页注4）。

3 海军上将威廉·沃兹沃思·费希尔爵士（1875—1937），H.A.L.费希尔的弟弟。

4 以赛亚·伯林的《每周政治报告》为外交部所写，但严格来说，一直到1945年以前他都是英国情报部的人员，因此还要向他们汇报其他工作。

5 哈利法克斯的小儿子，理查德·弗雷德里克·伍德（1920—2002），在北非战役中失去了双腿；另一个儿子牺牲（上文第494页注1）。

莎蒙德·L.的姑妈，一位可爱、害羞、爱好音乐的旧世界职业外交家。<sup>1</sup> [哈罗德·]巴特勒先生对我也很好，我和摩根以及惠勒·B.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仍在持续。因此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心满意足。我用了很长时间恢复健康，一直到1月中旬才真正开始工作，现在一切都运转正常。收到伊达姨妈的一封信，信中没说什么，但收到信还是觉得高兴。梅耶·伯[林]拉比来这里了，前些天见了他们，说是伊萨克<sup>2</sup>如今在耶路撒冷的公共管理部工作，很开心，但希望能赚到更多钱，建立更多的“人脉”。是呵，谁不想呢。尼古拉斯<sup>3</sup>希望我特别要提一提，他和我共度的一晚和我写这封信绝非偶然。一定要常写信，不管我这里表现如何，记住背井离乡的人命运多么孤单悲凉。好羡慕莫尔·科洛思维特，他出发去莫斯科了。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麦吉奇小姐让我转达对你们及亚当斯夫妇的问候。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3年4月21日 [手稿]

华盛顿特区，英国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匆匆写上一封短信，庆祝两件事。(a)逾越节<sup>4</sup>，(b)我新买了钢笔。你们无法相信这小小的物件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不同。广告中的宣传没有半句虚假。写字成了一种诱惑，于是我就写了。是这样，今年的逾越节家宴<sup>5</sup>出现了一些严重复杂的社交问题。第一次家宴邀请我去的就有几家：(a)魏

1 伯林此处原文为：de metier。

2 伊扎克·萨姆诺夫。

3 赫伯特·尼古拉斯1月到5月期间延长访问，待在纽约的英国情报部。

4 4月19—20日。

5 指两次大型逾越节家宴庆祝活动，各家都尽可能多地邀请客人。

428 茨曼。(b) 他的事务总管, 一个叫威斯戈尔<sup>1</sup>的, 他为多萝西·汤普森、马克斯·莱因哈特<sup>2</sup>以及天知道还有谁举办了放荡吵闹的波希米亚式家宴。(c) 梅耶·伯林和女儿朱迪斯<sup>3</sup>。他从巴勒斯坦来到这里, 准备去伦敦。他会告诉你们所有有关伊扎克等人的事。顺便提一句, 明德尔先生<sup>4</sup>, 就是施内尔森拉比<sup>5</sup>的代理人, 写信来问“你父亲明德尔”的地址。我尚未回信。如果回的话, 我会请他把信寄给我, 由我来转。否则各色各样的胡言乱语会跨越大洋。拉比的头脑有时也会犯糊涂。我们家族向来有想象力丰富的传统。(d) 哈大沙组织的索拉·普尔夫人。(e) 豪斯廷。第二次家宴邀请的人差不多, 只是少了魏茨曼和豪斯廷。梅耶·伯林、普尔夫人、薇拉·魏茨曼几个人彼此间心存芥蒂。去一家就等于同时冒犯了另外两家。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华盛顿, 把他们几家都闹个天翻地覆。在这一狂热欲望的支使下, 我微服私访, 秘密朝圣了魏茨曼夫妇。他们的家宴规模不大, 气氛宁静轻柔。只有几位主人: 一位名叫克拉玛斯基的犹太富商, 来自德国汉堡(可以让弗雷德告诉你们他的情况), 以及魏茨曼夫妇。我避开薇拉, 把阿比·哈尔彭<sup>6</sup>的死讯告诉魏茨曼。我注意到, 你们没跟我说此事。是某人的姐姐写信给这里的弟弟, 才泄漏了这个消息。我深感震惊, 差不多三个小时无法工作。他在世时活得就很精彩, 但死得比活着时更出彩。可怜的乔迪亚<sup>7</sup>。两个孩子, 未免太令人难以承受了。<sup>8</sup>他是该受点苦, 但绝不应是这种结果。我得写

1 梅耶·伍尔夫·威斯戈尔(1894—1977), 波兰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905年移民美国; 曾担任图书和报刊编辑、戏剧制作人等; 1921—1938年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全国秘书; 1940—1946年任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美国署总干事; 1943年美国犹太大会组织秘书; 哈伊姆·魏茨曼在美国的私人政治代表。

2 马克斯·莱因哈特, 原名马克西米利安·哥德曼(1873—1943), 奥地利舞台制作人和导演, 在20世纪初雄霸德国(及欧洲)影剧界, 间接影响了德国和世界的电影业; 1920年与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及理查德·斯特劳斯共同创办了每年一度的萨尔茨堡艺术节。

3 朱迪斯·伯林·利伯曼(1904—1978), 教育家, 希伯来中学校长, 后任纽约舒拉米斯女校希伯来研究院院长; 与研究《塔木德经》的学者扫罗·利伯曼结婚。

4 尼桑·明德尔博士(1912—1999), 拉比、作家、翻译家和编辑, 犹太和意第绪故事传说的研究者, 与后来的犹太教仪式派领袖们关系甚密。

5 优素福·伊恰克·施内尔森(上文第430页注4)。

6 伍尔夫·哈尔彭, 芭芭拉·斯特雷奇的丈夫, 在皇家空军志愿后备队服役期间于3月10日牺牲。

7 指伍尔夫·哈尔彭的父亲乔治·哈尔彭(上文第110页注2)。

8 关于哈尔彭女儿伊卡·奥尔登之死, 见上文第223页注3。

封信给芭芭拉，猜想她最近开始的新信仰此时此刻会对她大有帮助，因为我知道她一直都在以自己那种狂热的方式喜欢他。我也一样。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时间与我不相距咫尺，记忆全都与他交织在一起。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可就是离不开他，就像人们对自己表兄弟的那种感觉，天经地义，觉得理所当然。我想还应该写封信给耶路撒冷。魏茨曼博士当时非常坚强，五秒钟内便默默接受了儿子的死讯。魏茨曼夫人就不行了，到现在仍然十分虚弱，唯一让她振作的办法是提起西弗太太，她立刻就会暴跳如雷，数落个不停。

说起我的同辈人，弗雷迪·艾耶尔（和他的孩子们）此刻应该已经回到英国了，另外两个朋友瑞蒙德·冯·霍夫曼斯塔尔<sup>1</sup>和盖伊·德·罗斯柴尔德<sup>2</sup>想必也已抵达。罗斯柴尔德多半不会记得给你们打电话，但艾耶尔应该会。要是他忘了的话，寄一封短信到基督教堂学院给他。尼古拉斯也很快会回去，可以向你们证实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第二次逾越节家宴由M.威斯戈尔先生主办，十分奇特怪异。参加者有：巴黎拉扎兹银行的安德鲁·梅耶<sup>3</sup>；盖伊·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sup>4</sup>；马克斯·莱因哈特和他的太太海伦·蒂米希<sup>5</sup>（我记得1935年时她坐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大主教<sup>6</sup>的右边——真是巨大的变化）；一位支持新政、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sup>7</sup>的银行家（他在立陶宛出生，但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对我说他的真名叫塞卡斯，

---

1 瑞蒙德·冯·霍夫曼斯塔尔（1906—1974），奥地利诗人和戏剧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之子，1943年任《时代》周刊驻伦敦记者。

2 他于3月份乘船来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运动，途中在大西洋中部遇水雷翻船，幸免一死。

3 安德鲁·贝诺特·马修·梅耶（1898—1979），法国银行家，1940年前一直是巴黎拉扎兹银行的合伙人，当时在纽约分行，后来将该分行建设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投资银行之一；他个人被誉为独立振兴战后美国经济的功臣。

4 阿力克斯·荷明·珍妮特·罗斯柴尔德，婚前名为斯奇·德·科隆娜（1911—1982），参见下文第838页。

5 海伦·蒂米希（1864—1974），奥地利女演员，莱因哈特的第二任妻子。

6 西吉斯蒙德·魏茨（1864—1941），以关心社会问题和公开反对纳粹而著名。

7 亚历山大·萨克斯（1893—1973），喜欢长篇大论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及自封的总统顾问，与物理学家利欧·西拉德联合写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呼吁对核能进行研究和开发，并于1939年10月亲自将信呈交给罗斯福。

实际上来自葡萄牙；<sup>1</sup>他家实际上是贵族，等等，等等。你还记得加斯特<sup>2</sup>实际上是卡斯特罗家族的吗？)；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靠好莱坞吃饭的人，普通犹太人<sup>3</sup>，加上使馆一秘伯林先生。整个气氛充满东方色彩，显得离奇怪诞。莱因哈特表现得非常老朽，主人则仿佛在上演一出闹剧，他是一位波兰犹太教堂唱诗班领唱<sup>4</sup>的儿子。总之，整个活动奇妙怪诞。现在我得去拜见梅耶·伯林拉比(没必要惹他生气)，准备语调谦卑地向他以及塔  
430 玛·迪·索拉·普尔夫人好好解释。这两位都是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人物，必须和他们保持外交关系。我的工作依然充满乐趣，同事们都很亲切友善。巴特勒回英国了，我想他应该很满意我(可以说他完全没什么效率，也不知道我们大家各自在干些什么，一点不讨人喜欢，只是谁都不说罢了。但他对我很好)。艾登先生<sup>5</sup>的随行人员是一群乐天派，我和他们混得很熟，斯特兰<sup>6</sup>充满智慧，老喜欢考问我，就像一个能干的审问官。我各方面都好，准备暂时继续住在这家舒适也确实豪华的酒店里。再见，我真的很好。

爱你们的

以赛亚

近来我没见到任何老朋友，只有豪斯廷见过一次，他生意经营得很

- 
- 1 在人们心目中，西班牙或葡萄牙裔犹太人在社会地位方面往往比19世纪末和之后的东欧德裔犹太人更高一些。这种现象在英国特别突出，在美国也一样。早期来美的西班牙或葡萄牙裔犹太人常常会认为自己是美国犹太社会的“贵族”，特别是与东欧犹太人的后裔相比。东欧犹太人大量移民涌进美国和西欧，使这些国家的犹太社群在20世纪中叶迅速扩大。萨克斯所说的名字的葡萄牙拼法是Seixas(塞卡斯)，参看战后初期美国网球运动员维克托·塞卡斯。尽管他是1953年温布尔登单打冠军，但由于他的犹太出身，在获准进入纽约林山草地网球俱乐部时还是遇上重重阻力。他就像以下五行民谣所唱的：温布尔登冠军塞卡斯/表现得真是出类拔萃/以他惊人的奔跑速度/不断发球得分/看得我们一个劲地念叨：“塞卡斯好样的！”
  - 2 摩西·加斯特(1856—1939)，拉比、学者和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罗马尼亚出生，年轻时移民英国，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裔犹太人社会领袖；玛丽·林德为其儿媳。
  - 3 伯林此处原文为：stam，在意第绪语中意为“普通的”。
  - 4 伯林此处原文为：Chazan。
  - 5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艾冯郡伯爵一世(1897—1977)，保守党议员(1923—1957)；于1935—1938和1940—1945年任外交事务大臣。
  - 6 威廉·斯特兰爵士(1893—1978)，1939年任助理副国务大臣；1943年任欧洲顾问委员会英国代表(个人级别为大使)；1945—1947年任蒙哥马利(德国总司令)的政治顾问。

好,但没见到罗斯金、阿伦森和利伯曼他们。拉克对处决奥特和埃尔利赫<sup>1</sup>有什么看法?对米留可夫<sup>2</sup>的死(在艾克斯莱班)有没感到难过?他巧妙周旋在当地左右派论战之间,如鱼得水,不过那些争论纯粹是19世纪老掉牙的问题。这话可千万别跟他说。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3年5月4日

华盛顿,英国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谢谢你们的电报。

克鲁克香克来信说,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大肆渲染,说我的身体状况类似于《茶花女》或《波希米亚人》的最后几幕,害得你们不寒而栗,真是太滑稽了。我向你们保证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有半句真话。

我一直没空去纽约见我们家的假表亲梅耶·伯林<sup>3</sup>,他准备回英国,我准备在他走之前见他一面。 431

能否请你们替我买一本鲍拉先生〈(替我向他问好)〉的书<sup>4</sup>,通过外交部公文袋寄给我?简单写上“英国使馆,以赛亚·伯林,由公文袋转寄”即可。我实在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不像卡路瑟丝小姐那样,通过这个渠道寄给我所有信件。最坏也就是被外交部的某个人拆开来看,和例行抽查没什么两样。另外还希望你们替我订两份杂志,一份是《新政治家》,另一份是《泰晤士报》,同样可以通过外交公文袋寄或直接寄——给出版社打电

1 维克托·奥特(1890—1941),工程师;亨利·埃尔利赫(1882—1941),记者、律师、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德美同盟会波兰领袖。他们于1939年德国侵略时逃出波兰,但被苏维埃逮捕,于1941年12月被处死。他们被处决的消息一直到1943年才公开披露。

2 巴维尔·尼古拉维奇·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自由主义者,1917年短期担任过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之后成为1905年成立的自由立宪民主党领袖(缩略形式为“Kadets”);1918年11月离开俄罗斯前往西欧。

3 梅耶·伯林为以赛亚·伯林的叔叔伊扎克·萨姆诺夫的远亲,但与以赛亚·伯林本人没有亲戚关系。

4 《象征主义的遗产》(伦敦,1943),主要研究后象征主义诗歌。



话，他们会告知具体怎么做。

[赫伯特·]尼古拉斯会带给你们我的具体问候。

老珀西·贝克的小女儿换了新名字，给我写了封信，请我去看她。我可能会去。

爱你们

沙耶

〈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超棒，千真万确。〉

刚刚收到你们的上封来信，里面有[盖伊·]温特透露的话。这么看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是的，我得承认得的是病毒性肺炎。但不曾经历过什么危险期，也不曾复发过。具体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刚开始时，一直以为是鼻窦炎，这是因为病毒性肺炎只有靠X光才能检查出来，靠听诊器发现不了。磺胺类药没什么效果，我完全是靠自身的体力慢慢康复的。这也是我在医院住了那么久的原因。我得说所有了解实情的人都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我也一样，虽然这里面包含了对你们的某种欺骗。约翰·福斯特的看法是，即使是现在，卡路瑟丝小姐也不该把真相透露给你们，不过我们又想，在伯林夫妇如此穷追不舍的审问下，到头来任谁都会把真相和盘托出的。情报部当然知道实情，因此表现得极为绅士。由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那段时间可说是非常愉快。整整一个月躺在床上，不觉得疼痛，还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活舒适，真是无比惬意。人若是避免不了要生病，那倒是个理想的方式。我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得过同样的病。出院后的休假对我全面康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再也没复发过（温特所说的复发纯粹出于想象，要么就是有一两次我因为他太无聊而以感冒为由没去看他而让他这么想的吧）。不过我会注意经常去信汇报我的身体状况。我睡眠充足，星期天有一半时间都在床上，极为健康。

我希望知道谁是“史蒂文森”，居然说了我那么多好话。我实在想不出

会是谁。<sup>1</sup>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哦对，我一定会争取在8月份休一次假，找个凉爽的山区好去处避避暑，因为这里的8月太热了。不过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1940，1941和1942年7月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感觉还蛮舒服。

我的一位同事格雷厄姆·胡顿<sup>2</sup>可能会从牛津给你们打电话，他的姐夫埃文·德宾<sup>3</sup>在那里。他和尼古拉斯是死对头，相互威胁要把对方从船上扔下去，两人可能是同乘一条船来吧。都说会跟我联系。

爱你们

沙耶

致W.G.S. 亚当斯

新学院院长

1943年6月23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院长先生：

这么久没给您写信，希望您见谅。虽然事业充满乐趣，但从外表上看，我的总体生活十分平淡单调。如今我已成为围着使馆办公桌打转的老鼠，而且是最最枯燥乏味的那种，完全同文件卷宗和我作为其中一分子的职业公务员不可区分。至于说到整个局势，老实说，目前反孤立主义的浪潮十分高涨，就连最激烈的盟国反对者也见风使舵，多少改变了态度。这种形势不由得让人感觉，英美政治家们应该抓住时机，趁着太阳好，赶紧晒稻草。

1 可能是威廉·史蒂文森，英国安全协调处主任（下文第516页注6）。

2 （大卫·）格雷厄姆·胡顿（1904—1988），经济学家、律师、作家，1933—1938年任《经济学家》助理编辑；1939—1945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情报部；此时负责英国情报部的驻芝加哥分部。

3 埃文·弗兰克·莫特兰·德宾（1906—1948），经济学家、作家，1924—1927年就读于新学院动物学专业，1927—1929年修读PPE专业，1929年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里卡多奖学金获得者，1930—1947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高级讲师（1939年夏季学期还兼任新学院经济学讲师）；1940年任职战争内阁秘书处经济科；1942年任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私人助理；后（1945年）成为埃德蒙顿工党议员；在游泳时意外溺水身亡。

眼下的气氛比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任何时候都好[……]

您的诚挚的

433 以赛亚·伯林

致大卫·斯科特爵士<sup>1</sup>

外交部

1943年7月8日[副本]

华盛顿, 英国使馆

来信迟迟未复, 在此谨以诚惶诚恐之心, 请求您的原谅。您的信到来之时, 使馆正处于极度的喧嚣骚动之中。先是国务大臣<sup>2</sup>一行到访, 紧接着首相又在众多东道主陪同下大驾光临, 感觉使馆就像一座小城(简·奥斯汀语), 一大群飞鸟聚集此地, 扑打扑打翅膀又(根据各自的身份价值)往不同方向飞走了。即便在尊贵的客人们离开之后, 我的同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情无法平静, 百感交集, 公开和私下都表现出来。我曾经向R.坎贝尔爵士说过(他很喜欢和我讨论此类事情), 整个使馆就像一所公学: 使馆办事处好比总校区, 校长实行遥控管理(或者说坎贝尔爵士是校长, H.伯爵为遥控院长); 威廉·海特<sup>3</sup>负责高年级, 因为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语, 而且对学生们不抱幻想; 迈克尔·赖特<sup>4</sup>好比学校的老校友, 满腔热情地回到母校来担任舍监, 这位年轻的新老师踌躇满志, 勤恳高尚, 立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干出一番成就; [J.W.]拉塞尔如同一位头脑机灵的调皮学生, 在国外生活了太长时间, 喜欢用意大利语(也可能是埃及古语)讲粗话, 然后偷偷取笑舍监们, 教授们尽管心存狐疑, 无奈听不懂也拿他没辙; 不过幸好

1 大卫·约翰·蒙塔古—道格拉斯—斯科特爵士(1887—1986), 1911—1947年任职外交部, 1938—1944任副外交事务大臣助理, 1944—1947年任副行政管理大臣。

2 安东尼·艾登。

3 威廉·古迪纳夫·海特(1906—1995), 1930—1958年任外交官, 1941—1944年驻华盛顿, 后任驻俄国大使(1953—1957), 新学院院长(1958—1976)。

4 迈克尔·罗伯特·赖特(1901—1976), 外交官, 1943—1946年驻华盛顿。

有戈尔—布斯<sup>1</sup>，他不但自己已经获得高年级运动奖，还十分热心，因此完全可以依靠他急躁的强身派基督教精神，保证学校不陷入太多的沉思与遐想。但说到写作古雅的挽歌，他又比文质彬彬、慢条斯理的巴克莱<sup>2</sup>稍逊一筹。巴克莱过去常受欺负，一直到新舍监来后才予以阻止。接下来就是法语教师D.霍尔先生，常常被学生们无情地嘲笑，却的确是个极善良的好人，即使发现口袋里塞满了小白鼠，也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当然还有福斯特和布莱克·泰勒<sup>3</sup>，两人父母都在印度，成熟老练，早已超过了待在学校的年龄。他们喜欢捉弄人，眼睛滴溜溜地转，一不留神，就会在赖特先生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到赛马场（虽然一次也没被抓住，但总有一天会的，到时候就会让高年级学生舍长巴克莱将他们痛打一顿，够他们受的）。

434

其他分校区就完全不同了，没这么精彩。当然，玛格温校区<sup>4</sup>安全、稳固，日久经年，总是获得相同但数量不太多的校级奖状，竞赛成绩不差但也不好。父母十分清楚可以期望从那里得到什么。诺埃尔·霍尔校区<sup>5</sup>遍布着拿奖学金的学生们，面色苍白、了无生气。人们都以为他们天分很高，但也鱼龙混杂。学生们拼命地死记硬背，但往往念不出什么名堂。鲍斯·莱昂校区<sup>6</sup>是新建的，规模不大，普遍认为这里的学生经过精心选拔，不过谁也说不清它今后会怎样。目前尚无突出表现，但老舍监们认为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至于巴特勒校区<sup>7</sup>，着实是一个奇特之地，极不稳定，时常人心惶惶。因为说不清楚的违规行为，隔三差五，就有学生被开除出校，要么就是当着全校学生的面惨遭痛打。所有人都关注它和它的名声。该校舍对现代生

1 保罗·亨利·戈尔—布斯（1909—1984），外交官，1942—1945年驻华盛顿，后（1968—1969年）负责外交事务处。

2 罗德里克·爱德华·巴克莱（1909—1996），外交官，1941—1944年驻华盛顿。

3 H.B.布莱克·泰勒。

4 约翰·霍尔·玛格温（1893—1951），1942—1948年任大臣，驻华盛顿英国使馆经济顾问。

5 诺埃尔（·弗雷德里克）·霍尔爵士（1902—1983），1935—1938年任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940年任经济作战部联合主任，1941—1943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战争贸易发展大臣；后（1960—1973年）任布雷斯诺学院院长。

6 大卫·鲍斯—莱昂爵士阁下（1902—1961），1940—1941年任职于经济作战部，1942—1944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政治作战外交使团团长；伊丽莎白女王的兄弟。

7 英国情报处，哈罗德·巴特勒任主任。

活采取让步态度，各种新学科在这里私下传授给学生，令老舍监们大摇其头。一些人认为这个学校太容易进来，缺乏身份和派头。单从个人看，那里的学生让人觉得真的都是些好孩子，其中一些甚至相当能干，但那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使一切都变得极不舒服，因此已经有过慎重考虑，要把它的一部分搬到总校区去，就等着把念军校预科的学生大批送往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腾出些地方来。

关于应不应该给G.桑萨姆爵士<sup>1</sup>一个分校区的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现在谁都不再期待有什么答案。每次有哪个总督下来，劳先生<sup>2</sup>或艾登先生，这个问题总会被提出来，也经过认真考虑，但就是没有结果——要是巴特勒那里的学生能够安静一点，同样，要是诺埃尔·霍尔那边的学生没有被发现夹带答案在考试中作弊，或者玛格温校区能够表现得更突出些，或者鲍斯·莱昂那里能够把高质量展现出来，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老校区一直遭人批判，对手主要来自其他学校，比如列威灵<sup>3</sup>学院和菲利普斯<sup>4</sup>学院，甚至包括专为从事海上贸易的船长的子女开办的索尔特免费学校<sup>5</sup>，以及史蒂文森先生<sup>6</sup>创办的声名狼藉的函授大学。虽然它的行为举止

- 
- 1 乔治·贝利·桑萨姆爵士(1883—1965)，1940年从外交部门退休，1941—1942年任新加坡远东战争委员会成员，1942年被任命为驻华盛顿英国使馆顾问。他曾经负责过由情报部/情报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以赛亚·伯林，专门考虑如何解决英帝国要求的在美宣传问题；委员会应该也讨论了是否给桑萨姆配备专门人员的事。
  - 2 理查德·基斯顿·劳(1901—1980)，前首相安德鲁·伯纳·劳之子，保守党议员；1940—1941年任战争部财政大臣，1941—1943年任外交部议会副大臣，1943—1945年任国务大臣，后(1954年)封北爱尔兰科尔伦郡伯爵一世。
  - 3 约翰·杰斯丁·列威灵上校(1893—1957)，1945年封阿普顿列威灵伯爵一世；1929—1945任保守党议员，1942年任同业公会主席和飞机制造大臣，1942—1943年任驻华盛顿物资供应大臣，1943—1945年任食品大臣。
  - 4 可能指威廉·菲利普斯(1878—1968)，美国外交官；1936—1941任驻意大利英国大使，1942年7月—12月任驻伦敦战略情报处主任，1942年12月任总统在印度的私人代表，1943—1944年任驻伦敦艾森豪威尔参谋部政治军官(美国)。也可能暗指波士顿附近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校，美国最古老的与企业合办的寄宿学校。
  - 5 英国运输外交使团，团长为阿瑟·索尔特。
  - 6 大概是指威廉·塞缪尔·史蒂文森(1896—1989)，加拿大商人，发明家，1940年起负责后成为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机构，总部设在纽约。战争期间负责建立在西方国家的英国谍报网络，用于协调英国与美国的情报工作和进行秘密宣传；其在美国安全协调处的电报挂号地址为“勇猛无畏”。

有点过时，它的学生一年到头戴着礼帽，一直只懂得用羽管笔，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而且在技术合作处的露营活动中，与其他学校见面时举止生硬，但毕竟它为国家的生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毫无疑问会永远效忠。

于是我们就这么继续运转着，完全不受来自外部巨大影响的左右，令人叹为观止。很抱歉我这么胡说八道，但这似乎是描述我们周围环境的最快捷的办法。

[……]

天哪！喋喋不休地写了这么多，即使您耐着性子读到这里<sup>1</sup>，也一定不会原谅我。不错，我的思乡之情无以言表，多么希望英国有适合我做的工作，那么我会立刻奔回去，不论那工作多么卑下！

约翰·福斯特很快就会到您身边，今后您的耳旁肯定少不了小道消息。我的克里维<sup>2</sup>式的饶舌看来没有必要了。

你永远的

436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情报部，美国司

1943年7月19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达夫妮：

[……]

我的朋友魏茨曼目前在伦敦，因为我老在他面前对你赞不绝口，他希望能 在伦敦逗留期间见你一面。他太太有点烦人，典型的俄国流亡者类型，由于在皇家空军服役的儿子牺牲而变得更加可怜和乏味，一个令人感伤、潦倒没落的势利眼。但魏茨曼却是个伟人，一位了不起的具有意大利传统

1 此段上面删去的部分是一大段时事评论，包括艾登和丘吉尔的来访。

2 托马斯·克里维（1768—1938），英国政治家，以日记闻名，内容多为互不相关的家长里短，颇具启发意义。

的19世纪人物，值得认识，至少也要见一次面。像他那样的人难得一见（加富尔[与]甘必大<sup>1</sup>也许和他有点相像）。不过如果你实在不想见，尽管拒绝，他若想见你应该会通过我提出。从外表上看，他就像一匹高贵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骆驼，有点像列宁，声音亲切，对英国人充满热爱，这种爱，就如同霍普金斯先生<sup>2</sup>一样，在上层阶级中表现得格外强烈。

[……]

爱你

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赛亚·伯林的工作中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因此他对英国和犹太民族的双重忠诚并不经常有机会受到考验。但是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对英国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以赛亚·伯林的回忆录《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sup>3</sup>为以下信件中提到的大事提供了相关背景。

致安格斯·马尔科姆<sup>4</sup>

外交部

1943年8月2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安格斯：

有件小事我得说清楚，虽然不一定针对你。但我心里充满了恶毒的怀

1 卡米洛·本索·迪·加富尔伯爵（1810—1861），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自由主义者，在创建意大利统一王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38—1882），法国政治活动家。

2 大概是指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1890—1946），1933—1945年任总统顾问，1940年起为罗斯福随从参谋；1938—1940年任商务部长，1941年起主管借贷计划。

3 见下文第775—808页。

4 安格斯·克里斯蒂安·爱德华·马尔科姆（1908—1971），1936—1938年驻马德里，1938—1942年驻华盛顿，1942—1944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北美司，1944—1947年驻罗马。

疑，挥之不去。

前些天，美国国务院主管中东处的阿林<sup>1</sup>突然问威廉·海特是否认识一个叫伯林的人。他是拉比吗（别笑）？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他和魏茨曼来往密切吗？他解释说国务院读到了一份“文件”，里面报告了魏茨曼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威廉开始以为这不过是我的一封信被信件检查官截获，结果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a）我并没有写信，（b）据阿林后来说，并不是检查官截获了什么信件，而是一份文件，他也没看到，是由“我们的人”，大概是伦敦这边的，拿给“他那边的人”看，里面详细描述了魏茨曼在这里的政治活动。关于拉比的线索让他们找到了与我同名（幸好不是亲戚）、在巴勒斯坦和河岸路<sup>2</sup>声名狼籍的M.伯林拉比。此人是魏茨曼的死敌，是一位教权多数派。于是指示审查人员迅速开始查找，就我所知，此项调查目前有可能仍在进行。

从威廉处得知，他随后便开始为我全面洗刷罪名，说我（1）不是拉比。（2）没有写过任何有关魏茨曼的政治报告（事实是在你任上和之后，我写过好几份有关的纪要，专门呈送外交部，这点阿林不知道）。（3）不是国务院所理解的那种“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打个比方，在这方面我的倾向性不会比韦尔斯<sup>3</sup>先生更强。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承认我是一名忠实成员。（由于我坚决否认对即将出台的英美联合声明及其他一切知情，怀斯对我深感怀疑。他们认为威廉对他们的事业更具有同情心（如今魏茨曼已经离开这里，他的个人影响也随之消亡，我不确定是否情况已经改变）。我还没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撒谎的地步，但即便是隐瞒真相也令人不快。我希望联合声明尽早取消，事情赶快过去。）（4）我实际上是乔装打扮的牛津大学研究员。最后这一点显然非常关键，立即令人对我肃然起敬。这段插曲于是就这么结束了（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有点怪怪的）。

1 保罗·休米斯顿·阿林（1896—1949），外交官，1934—1942年任国务院中东事务处副主任，1942—1944年任主任；1944—1945年任中东和非洲事务部副主任。

2 位于曼哈顿。

3 萨姆纳·韦尔斯对犹太复国运动持同情态度。



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愤怒。为了说服N·安杰尔爵士<sup>1</sup>不要去参加抗议集会和犹太军队组织<sup>2</sup>，我在电话上声嘶力竭，说得口干舌燥（最终成功说服了他。而美国人却没能说服伊克斯<sup>3</sup>或其他任何人）；由于联合声明的消息自白宫走漏了风声，并且（可能）以一种被歪曲的形式出现在7月30日《泰晤士报》发自开罗的苏兹贝格<sup>4</sup>快讯中，这里由此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我如实向上汇报；我还极其热情友善地与各界阿拉伯人保持通信往来，而且总是以一种过度的、虚伪的官僚主义热情信誓旦旦，全然不顾这么做会让自己将来在天堂里无立足之地。即便如此，到头来却被扣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可怕罪名。我心里会怎么想？难道是你，有没可能是你（或你的某个同事）把我写的有关魏茨曼的（发给外交部的）、属于超级机密的纪要透露给了驻伦敦的美国人？

让我来告诉你（态度严厉地），我们这里的人（包括所有的使馆人员）无一例外地认为，所有发给你们、留在你们档案袋里的东西不出三天，（a）就会首先传到每个驻伦敦的美国特工那里，（b）然后被他们通过海底电报重新传回这里，（c）之后会被伯尔先生看到，用极其有害的方式进行解读。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做的任何解释都会让我怀疑事实正好相反，当然你尽可以努力。（这里插上一句，有一帮人的看法蛮有道理，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你们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关系如此密切，不可避免地要付出走漏消息的代价。所幸这种密切关系不是在美国国务院和这里

- 
- 1 诺曼·安杰尔爵士，原名拉夫·诺曼·安杰尔·莱恩（1872—1967），报人、作家和国际关系学讲师，1928—1931年为工党议员；和平主义者，193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43年中，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提出如果提供足够好的条件，目前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会自愿迁移至其他阿拉伯地区。
  - 2 来自巴勒斯坦的右翼伯格森组织，领导人为“彼特·伯格森”（西莱尔·库克），该组织竭力促成建立一支犹太军队，与盟军一起作战。但随着1942年欧洲犹太人即将被毁灭的说法传到美国，在几位有影响的美国犹太公众人物，其中包括伊克斯的支持下，该组织开始转向，致力于拯救欧洲犹太人。
  - 3 哈罗德·勒克莱尔·伊克斯（1874—1952），新闻记者、律师、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33—1946年任内政部长；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活跃的新政派，以强烈抨击反犹浪潮、坚决支持拯救欧洲犹太人而著名。
  - 4 赛勒斯·利欧·苏兹贝格（1912—1993），新闻记者，1940—1944年任《纽约时报》驻外通讯员，专门负责报道巴尔干地区、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情况。

的英国大使馆之间，这种代价完全值得。我相信他们看法正确。不过，不论事实如何，别让这件事小题大做。假如只是庸人自扰，那么就完全没必要把它提升到什么高度，比如，弄到巴特勒先生那里。） 439

我个人至今最好的品行证明是卡坦尼先生<sup>1</sup>给我的。他是一位偏执极端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警告他说要提防我，因为我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成员，两边出卖他们。那之后，卡坦尼先生[原文如此]的信件便如雪片般飞来。我肯定，他是在为美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同时，真正曾经受雇于英国秘密情报局。

但是，了解一下你们究竟向驻伦敦的美国人提供了多少“有关犹太人的知识”<sup>2</sup>，还是会有用的。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只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失去应有的风度。

[……]

永远忠实于您的

以赛亚·伯林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1943年8月4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达夫妮：

[……]

很高兴你见到了超级迷人的魏茨曼。我敢肯定你不会喜欢他的夫人。倒是有一点我很担心，他很可能会试图利用你来为其事业服务，即通过你与艾登先生取得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自己被如此利用。想到自己介入此类事情，扮演这个角色，我理应觉得羞愧和难过。犹太复国运动也

1 大概指弗朗西斯·A.卡坦尼，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在4月份曾经就巴勒斯坦未来问题向安东尼·艾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2 伯林此处原文为：Judenlehre。

许可敬可佩，但我恳求你不要让自己被人利用。如果他胆敢肆无忌惮地流露出这种意图——和所有伟人一样，他在这点上才华横溢——一定记住先搪塞他，然后抽身退出。

爱你

致安格斯·马尔科姆

1943年8月9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安格斯：

440 在对自己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痛悔思过之后，同时又为贵司负责人<sup>1</sup>对本人所做的每周政治报告以及忍痛删去后剩下的短小篇幅赞誉有加所感动，我觉得自己应该宣布撤回上封信中对你不无挖苦的过激之辞。那些话当然是针对当地有关你可能是造成消息“泄漏”给驻伦敦美国人的罪魁祸首的传言，但还是太过分了。在安德鲁·皮尔逊<sup>2</sup>关于犹太复国运动的上一个专栏见报后，显而易见是国务院扮演了更加差劲的角色。总之，整件事不值一提，更没必要去认真多想。将它抛之脑后吧。

随信附上一份报告，记录了一桩不同寻常的阴谋。就我所知，它与最终取消的针对巴勒斯坦的英美联合声明密切相关。我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证据，但至少展现了华盛顿犹太游说集团的基本活动规律，让人想起哈丁<sup>3</sup>和柯立芝<sup>4</sup>那时的美好时光。在我看来，犹太复国运动采取的策略，不论在短期内收效多大，长此以往<sup>5</sup>十分危险。他们一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美国国务院；而且我能想象，总统极为不快。他们迟早得为此付出代价。用

1 内维尔·巴特勒（上文第473页注2），北美司负责人。

2 安德鲁·拉塞尔·皮尔逊（1897—1969），报纸专栏记者，以写作具有轰动效应的调查报告闻名。

3 沃伦·加莫利尔·哈丁（1865—1923），1921—1923年任美国总统，以丑闻和生活糜烂腐败而闻名。

4 卡尔文·柯立芝（1872—1933），1921年任副总统；1923年哈丁去世后接任总统至1929年。

5 伯林此处原文为：à la longue。

我特有的超然客观态度（你过去总觉得这点在我身上显得离奇古怪）进行判断，我得说，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集团，虽然通过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似乎能够对当权者和舆论施加足够的压力，使这样或那样即将采取的行动转变方向，但它却并未强大到能够使该策略持续下去，继续发挥作用。他们应该知道，更好的方法是通过说服，而不是通过粗暴的政治压力，因为采用后者必然会自食其果，无异于播种龙牙挑起纠纷（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从长远看这种报应会以某种方式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国务院仇恨他们胜过仇恨共产主义分子，就像所有老牌的政治机构，国务院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耐心地跟你磨，最后说不定就反败为胜。我不是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得不到多少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想强调，假如他们停止蛊惑和过激行为（我似乎觉得，这种方法只有在事关重大民族利益的形势下才可能成功，但显然他们既不代表美国也不代表巴勒斯坦），而代之以仅仅通过有识之士与在英国和这里的政府官员进行秘密会晤，那么不仅可以更早得到想要的东西，还可以得到更多，并且也可以少给别人带来麻烦和损失。这番话我同N.戈德曼博士说过，他是我唯一经常联系，即差不多六星期见一次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显然他没有好好听进去，只把它当作大英帝国为压制事态发展使用的惯用伎俩。等到有朝一日事态爆发，不论是巴勒斯坦 441 发生起义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到时我会跟他们说当初已经告诫过他们了，虽然这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

与此同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选举已经结束。对手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下来。泼利·特格<sup>1</sup>告诉威廉·[海特]，虽然戈德斯泰因希望讨好美国政府，只把攻击目标对准英女王政府，西尔弗<sup>2</sup>却主张对英美两国都不要留情。妥协的结果是，由戈德斯泰因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西尔弗（阿巴·西莱尔拉比）则出任紧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压力组织。

1 这个至今无法确认的人物可能是以赛亚·伯林打字员的杜撰，在原件上经过更正。

2 阿巴·西莱尔·西尔弗（1893—1963），立陶宛出生的改革派拉比，杰出的犹太复国运动活动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事务紧急委员会成员（1943年秋起任联合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主要靠他犹太复国运动迅猛发展，成为压力组织；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多产作家。

魏茨曼身在此地确实具有价值。他是非分明，并且相对牵制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真正具备实力的大型武装组织。

如果美国犹太大会举行（已经有些迹象表明它召开不了——请看另一封关于韦尔斯的去信<sup>1</sup>），其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占了92%的大多数，到时又没有魏茨曼参加，真有可能干出什么蠢事。同时，我们终于为芙瑞雅·史塔克<sup>2</sup>弄到了邀请函，这也许对制衡能起到一些作用。哦，天哪！两年半置身其中，我真的对这一切感到厌倦了！

为了助兴，这里给你讲一个小笑话。自由法国目前正在评论两位将军：捣蛋高和皮包骨格里奥<sup>3</sup>，并预测乔[·斯大林]叔叔会在“将军大清洗”中把两人的头砍掉，而把大多数自己人放进去，组成欧洲解放组织。你看看，我们用的是怎样一种挖苦讥讽的语气。据唐纳德·霍尔和杰克·惠勒一班纳特说，你们也全都是这种口气。我想一定是天气太热了。

再来信。

442 你的

致安格斯·马尔科姆

外交部

1943年8月9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安格斯：

英美联合声明（显然）最终已经取消，你本人，可能还包括东亚司<sup>4</sup>的人，或许都希望了解一些相关背景，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中的鼓动

1 见下页。

2 芙瑞雅·玛德琳·史塔克（1893—1993），旅行家和阿拉伯世界作家；战时致力于为英国政府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邀请她来美是以赛亚·伯林的主意。

3 吉罗将军，见上文第497页注3；佩特罗·巴多格里奥（1871—1956），意大利军人和政治家，曾在墨索里尼7月下台后任总理。

4 该司负责“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以及与巴勒斯坦、外约旦和各阿拉伯小国家的外交关系”（《外交部名录》，1943）。

作用。当然，我不可能知道所有幕后事实，但这里所写的情况是我和威廉[·海特]两人尽可能真实可靠地再现的。整个事件说起来会有点长，因为它绝对就像一个临床病例，再真实不过地反映出如今华盛顿的行事方式。

最初几轮谈判的来龙去脉你清楚。据我们所知，这个阶段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一直到大约四星期前。犹太事务局的N.戈德曼博士7月初来找我，说他隐约听说在伦敦与中东穿梭来往的阿拉伯政治活动家们正在策划某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具体他也不知道）。我回答说对此一无所知（是实话）。之后他好像又去找了韦尔斯。韦尔斯长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打交道，据这里使馆的人说，在很多话题上似乎变得与司里的其他人都谈不大拢了，例如瑞典的难民安置问题等。韦尔斯好像是告诉他或是其他某个犹太复国运动特使，确实是考虑过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出台一个官方声明，但他，指韦尔斯，认为此事尚不成熟，便借机打断了。根据戈德曼的说法，他答应会密切关注犹太复国主义事务，便就此搁下这个话题，只是交代他的朋友们注意事态发展。之后韦尔斯就去巴尔港<sup>1</sup>开始为期一个月的休假了。

接着一段时间风平浪静，实际上几乎到联合声明定下来那天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约在那之前最多三天，再次有消息泄漏出来<sup>2</sup>，同样还是隐隐约约的。这次据我分析，有可能是美国国务院（他们负责在这里发布声明）的时事处，他们把消息泄漏给纽约的某家报纸或编辑，说有一份针对巴勒斯坦的文件即将出台。不过这点我完全不确定。总之，好像正在暗中加紧工作，让新闻界做好准备，以支持的态度对声明予以重点报道，特别是在纽约这个犹太人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从纽约某个报人那里得知，美国国务院有份声明即将出台（至此尚无人知晓英女王政府也参与其中，一直到很后来人们才知道），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游说行为。这个消息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怀斯被紧急派去面见总统，据说总统因为他是老威尔逊总统的同盟者而特别喜欢他。接着一封急件发往在

1 缅因州的沿海旅游胜地。

2 是由以赛亚·伯林本人泄漏的，晚年时他向为他写传的作家承认了此事。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17—118。

巴尔港休假的韦尔斯，通知他在其离开期间，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据我所知，韦尔斯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当人们不无道理地普遍认为，在他与霍尔先生及其所在国务院部门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能够逃开国务院的权力斗争，他是求之不得。总统几乎立刻便接见了怀斯。没有人知道确切过程。怀斯告诉他的部下说，总统让他尽管放心，不会发布什么消息，尽管回家好了，让下面的人放宽心，整个事件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总统还告诉他，已经邀请伊本·绍德<sup>1</sup>或是他儿子访问华盛顿，这是第一次向我们透露这个消息，后经国务院证实，此事已在着手进行。他还对他说了霍斯金斯的使命。<sup>2</sup>起初犹太复国主义者闻之大为欣喜，接着，由于斯蒂芬·怀斯昏了头，将他与总统的见面经过到处说给人听，见一个人一种说法，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前后矛盾，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查个水落石出。在向不同亲信随从广泛咨询意见后，他们说服了萨缪尔·罗森曼，你知道他与总统关系十分密切，让他见机行事，小心打探一下。他带回来的说法显然大为不同：总统说怀斯确实打听过的，回答是声明即将出台，是一份很好的声明，而且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有益无害。之后他好像还给罗森曼看了与所有这些问题相关的文件，嘱咐他回去消除犹太人的顾虑。罗森曼的活动均向国务院的东亚司汇报了，也即华莱士·穆雷<sup>3</sup>他们。罗森曼按照总统指示的做了，不用说，他所汇报的即将发生的事件，不仅没有消除犹太人的顾虑，反而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圈子当中起到了揭露事实真相的作用。戈德曼赶紧来找我，问能否想点办法阻止联合声明发表。一直到此时，罗森曼才透露，英女王政府与此事也有关联。在这之前，他们完全蒙在鼓里，对整个内幕一无所知。罗森曼的消息使事情真正开始闹大。之前他们只是心存疑虑，比平日警觉一点

1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绍德(1880—1953)，1932—1953年任沙特阿拉伯国王。

2 哈罗德·B.霍斯金斯上校，纺织业高级官员，在贝鲁特出生，是罗斯福中东问题顾问之一，曾身负使命被派去证实(未果)伊本·绍德是否准备和魏茨曼讨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未来问题。

3 华莱士·史密斯·穆雷(1887—1965)，外交家，1929—1942年主管美国国务院中东事务部，1942—1943年任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1944—1945年任中东及非洲事务办公室主任，1945—1946年任驻伊朗美国大使。

罢了。这应该是在声明准备正式发表的前一天。我想他告诉我的应该是事实，不过，如果罗森曼确切转述了总统态度，这应该不假，说明总统已经做出决定，不可改变了。我看不出还能做些什么。当然，骚动无济于事，只会激怒总统。在我看来，戈德曼颇为真诚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心情沉重地离开，去找华盛顿那些犹太官员们，诸如罗森曼、瓦格纳<sup>1</sup>的秘书、本·科恩、大卫·奈尔斯<sup>2</sup>等。他告诉我，所有这些人对眼前局势充满忧虑。我想，这些犹太官员们的忧虑不是来自犹太复国运动本身，而是出于一种普遍的担心，即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终不可避免会对结果发出抗议之声，随后便会掀起一场公开争论，参议员等人都会加入进来，最后势必损毁犹太人的公众形象，不论是否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将一律处于危险境地。人们会指责他们在如此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还在玩权力斗争。你一定看得很清楚，这种担心是整个事件的主要因素。假如声明按照原计划如期发布，也许一样会有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但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共和党可能会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分裂犹太人的意见，为此他们大做宣传，但其近期目标应该能够达到——消除阿拉伯人对美国正在密谋与其作对的顾虑，同时还能加强犹太中间派的力量，抵抗这里肆无忌惮的游说活动——虽然要花一定的代价。我和威廉·海特都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任何拖延都会导致阴谋产生。因此，得知声明要推迟出台，以便让战争部严格审查，必要的话再予以加强，我们都有些沮丧。这一拖延更增加了焦虑不安，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静坐示威，大肆进行煽动抗议活动，随后是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这一事件的发生，显然是由于国务院或国务院里的某个人突然临阵退缩，不敢将声明只是作为一份单纯的政治文件发表，害怕会招来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抨击，谴责他们讨好阿拉伯人等等。你一定了解，达尔朗<sup>3</sup>海军上将引起的骚动在这里仍有余波，不管他们认为自己多么公正，对手力量

---

1 罗伯特·费迪南德·瓦格纳(1877—1953)，德国出生的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927—1949年任民主党参议员，亲犹太复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新政派，尤其致力于改善劳工工作条件。

2 大卫·K.奈尔斯(1892—1952)，1942—1951年任总统行政事务助理，与霍普金斯同事，关系密切；自由主义活动家和人道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3 见上文第496—501页，特别是第497页注4。



445 多么薄弱，国务院都不想再经历一次类似的噩梦。他们在意大利问题上小心翼翼就是由于今年初管闲事而吃了苦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害怕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会被威尔基和左翼出版社利用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矛头攻击他们（赫尔先生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的批评敏感到几乎神经质的地步。只要《P.M.》<sup>1</sup>上登了什么文章，他就一定会大肆渲染，说“整个出版界都在跟我作对”），等等。于是他们写信给战争部，说需要的是军方在绝对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这样一份声明提出具体清晰的要求。由于美国G2<sup>2</sup>一直逼着战争部打击犹太复国主义的过激行为，士兵们当然乐得一路绿灯放行。我不知道修订稿的内容是什么，但根据传言，它比初稿口气强硬得多——提到了不负责任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举行暴动的可能性等，暗示这里的鼓动骚乱会危及在国外的美国士兵的生命。从策略上来看，这也许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周全之策。但看来他们过于天真了，没有把华盛顿的习惯因素考虑进去。于是两个事件几乎紧接着发生了。正如你所知，摩根陶自1941年3月份以来突然改变立场，当时你我两人还跟他论战了一番，此刻却完全变了样，不说无知，至少也是感情用事，开始对犹太复国运动持赞成态度。他一休假回来，就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们见了面，并告诉他们，他看了递交给白宫的相关文件，对其冷酷无情的语言（不清楚是一稿还是二稿）感到“十分震惊，无法以言语表达”；他会尽力阻止这一事件发生，另外还补充说，如果英女王政府急于维护巴勒斯坦安全，应该请美国政府派出更多的军队，而不是剥夺美国公民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企图压制少数公民声音的先例，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与战争部公共关系室过往甚密的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sup>3</sup>，按惯例读到了那份文件。斯沃普主张犹太人与所在社会同化，反对

---

1 以坦率直言为特点的纽约报纸（1940—1948），不效忠任何政党（最早也不登任何广告），但持反法西斯立场，支持罗斯福。

2 军事情报局（严格来说应为G-2）。

3 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1882—1958），新闻记者、作家，1934—1945年任纽约赛马委员会主席，公共关系顾问，伯纳德·巴鲁克的密友和顾问。

犹太复国运动，但他的反应似乎与罗森曼别无两样。根据斯沃普对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讲述的（法兰克福特已经彻底告别华盛顿，是事件结束以后从一个很远的城市打电话来对我说的），他提出了一个从他的立场来看颇为奇特的见解：如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真的急于摆脱束缚，阿—犹冲突随时可能爆发，那么这份文件出台便好比导火索，促使他们破釜沉舟。那样的话，犹太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指责，因为他们导致了流血事件，给盟军的作战计划造成阻碍。到时候，对他们的反感浪潮将席卷整个在美的犹太人，不管是否犹太复国主义者均不能幸免。因此，首先得把事情不动声色地悄悄压下去。他去见了巴鲁克<sup>1</sup>，他在巴鲁克身边工作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还多。巴鲁克也认为在目前这种时刻发表任何针对犹太人的言论都会助长美国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这一点目前已经呈加剧趋势。对此他和不少人都深感忧虑。之后，斯沃普（根据他自己对约翰·福斯特说的）又说服了战争部副部长帕特森<sup>2</sup>，此人对这个问题或许没有自己的看法。斯沃普让他相信，从政治上来说，战争部没有必要“傻乎乎地充当出头之鸟”，为这种尚不确定的举动承担责任——犹太人会很失望，而且肯定会引起一级政治骚动。若是国务院想找麻烦，让他们自己出面，不要把战争部扯进去。 446

同时，摩根陶似乎说服了史汀生<sup>3</sup>，巴鲁克也和老朋友科德尔·赫尔进行了深谈（随着事件进入高潮，似乎越来越难以确保中间详细过程的绝对准确性）。总之，巴鲁克和摩根陶两位先生（平日关系并不和睦）联合发起的夹击行动产生了效果。也许你已经知道，赫尔告诉大使阁下<sup>4</sup>，他一直就对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否明智充满疑虑（我相当怀疑这个说法）。如果史汀生不肯负责，他觉得从全局考虑还是就此罢手为好。经过就是这样。韦尔斯回来有几天了，正碰上事情草草收场，纵然他有心阻止也无力回天，更何

---

1 伯纳德·曼尼斯·巴鲁克（1870—1965），金融家、总统顾问，1943—1945年任战争动员委员会顾问。

2 罗伯特·波特·帕特森（1891—1952），律师、法官，1940—1945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45—1947年任部长。

3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1867—1950），律师、共和党员，1940—1945年任美战争部部长。

4 指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况如果他<sup>1</sup>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会见传言有一点点属实，那他一定是反对联合声明出台的。不过总统似乎早先曾对罗森曼说过，“如果怀斯或威尔基不喜欢这份声明，我也无能为力。这场战争必须赢，而联合声明恰恰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罗森曼受法兰克福特之命来找我，之前我俩从未见过面。他告诉我他本人以及怀斯和总统的会谈，问我能否平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之声。我向他解释，如果仅仅以我的官位，我不可能有丝毫用处，无法对这些人产生任何影响。我唯一真正能说得  
447 上话的人是魏茨曼，可惜他目前不在此地。在我看来，罗森曼是一位通情达理、头脑清醒的人，一心只想调解危机，但对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了解，因此感到十分为难。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总统平息华盛顿的混乱。我把谈话向威廉·海[特]作了汇报，他转告了国务院东亚司，那里说他们知道罗森曼在其中起作用并予以认可。

有件事我很好奇：在大使阁下离开的那天早晨，也就是整个事件终于由赫尔先生宣布落幕之时，德鲁·皮尔逊的专栏刊出了号称揭露这一事件全过程“内幕”的报道。除了一些明显的谬误外（你在8月9日收到的英国情报处调查报告做了大致的摘录<sup>1</sup>），例如扯进了赫尔利<sup>2</sup>和伯尔（请注意，对显而易见的我根本避而不谈），对怀斯在其间的作用进行了虚构性的描写等等，总体而言，报道内容基本属实，包括一些细节也确切无误。虽然大部分内容很可能由斯沃普提供，他是其定期消息来源，还有许多内容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就我所知，至少有一点他们不知道，我是说皮尔逊提到的美国有关联合声明的建议开始时遭到英国外交部冷遇这件事。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此事仅限于英国和美国官员知道。皮尔逊从哪里得知的这个消息？这里没有人见过他，就我们所知，也没有谁同其他任何人谈过此事，除了和相关的美国官员。因此，他一定是从国务院，要么就是战争部或白宫渠道得来的消息。也许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解释。我本人则倾向于认为透露消息给他的除了韦尔斯没有别人。理由如下：（1）他们俩是至交；（2）他最早是从

1 H.G.尼古拉斯编，《华盛顿快讯，1941—1945：来自英国大使馆的每周政治报告》，第235页。

2 帕特里克·杰·赫尔利（1883—1968），1942—1944年任罗斯福在许多其他国家的私人代表。

某个犹太人那里得知的，此人设法将韦尔斯拉进来，因为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保持着联系。皮尔逊关于国务院的报道中通常将韦尔斯作为光明力量的领袖，反对伯尔、华莱士·穆雷等“黑暗”势力，这些人总是作为亲法西斯的代表人物出现。这篇报道还是这一通常模式，只不过韦尔斯的名字被刻意拿掉了。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切未免安排得过于奇巧，但我根据“宁取较难的读法”、“自相矛盾的衍生或本质与其名称相反”<sup>1</sup>等原则，坚持认为，若不是有人让皮尔逊不要提韦尔斯，他一定是会出现在这篇报道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谈话中不停地提及他的名字以示炫耀。韦尔斯本人就有足够的理由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现在小道消息的专栏里。448

他与赫尔不和的种种传言早已四处传开，很不好听，令他极不舒服。因此，他可能因为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一气之下对皮尔逊说他反对联合声明，还说英国方面从一开始也是这个态度，大家都反对，只有国务院那帮居心不良、凌驾于英女王政府之上的人要这么干，等等等等，并吩咐不要在报道中提他。以上是我精心分析做出的假设，我喜欢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天生的倾向，习惯把华盛顿政治斗争视作萨尔杜式的通俗剧。<sup>2</sup>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看法：赫伯特·斯沃普（或者是战争部或白宫的什么人，但可能性不大）在流通过程中看到了文件，读到了维南特的电报，于是把此事告诉给了德鲁·皮尔逊。斯沃普也确实将一切都透露给了皮尔逊，因为皮尔逊的报道与史汀生最后拒绝帮忙不谋而合。一切皆有可能。不过整个事件几乎就像一个临床病例，真实反映出华盛顿的勾心斗角、华盛顿的压力以及华盛顿的轻率等，还反映出华盛顿的行事方式。在宣告失败的借贷白皮书事件<sup>3</sup>中也存在相同因素。对此我的态度是明智地表示反对，并且

1 伯林此处原文分别为：difficilior lectio和lucus a non lucendo，均为拉丁文。第一句为经文鉴别学用语，意为“较难解释的句子比清晰易明的句子可取”。根据这一原则，抄写错误往往表现为抄录者尝试简化或阐明难解的字句而不是相反。第二句因其中语义双关（“树林”和“光明”谐音，“树丛中”与“黑暗”谐音），无法完全翻译。大意为：树林之所以被称为光明，是因为它里面黑暗。这句话可被视为失败主义、自相矛盾的“词源”，用于形容某种事物名不副实。

2 维克托里安·萨尔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剧作包括《托斯卡》，普契尼的歌剧据之改编。

3 关于借贷计划，见上文第434页注2。为了化解美国方面的不满情绪，英国方面主动在1941年9月发布了白皮书，规定借贷物资不可用于出口。为此他们得到的唯一感谢是，美方专门成立了一

我要说，如果原先的联合声明如期发表，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有一种印象（从罗森曼那里间接获得），总统对这些来自犹太人的阻挠感到有点头疼——毕竟一旦犹太游说团体获得了胜利——根据他对罗森曼说的那些关于不管怀斯怎样、这场战争必须打赢的话，他迟早会对此事有他的说法，我猜想他对大使阁下提起过。不管摩根陶在不在，目的只是为了安抚人心，我坚信，这么做绝对有好处。

这期间，头脑简单、既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属于任何其他派别的罗森曼又来到纽约，说服怀斯不再进行成立犹太军队的宣传，作为压制联合声明出台的补偿。怀斯不无道理地指出，他对主张成立犹太军队的那些人没有控制权，但表示会见机行事。这方面的谈判的进展并不确定。

449 犹太复国主义者断然否认他们与皮尔逊的报道有任何关系，说一切过于顺利地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未必是什么好事。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说，此事没有再引起什么风波。据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是主张成立犹太军队的那些人（他们一贯的替罪羊和托词）告诉皮尔逊的。或许这个事件不值得展开深入调查，就像其他有充分根据、让国务院那帮人面孔气得发紫的报道一样。听说怀斯写了一封就事论事的信给赫尔先生，请他下次在征求他的意见之前，不要插手巴勒斯坦事务。毫不奇怪，赫尔先生尚未回信。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越来越感到惊恐。

我不知道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唯有一点，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似乎力量强大，足以取得短暂的胜利。这个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要说也真令人感到可悲，美国国务院的东亚司，你知道，过去对女王政府一直并不是太友好的，就这么一次好像是希望为我们做些什么，却又如此不光彩地以失败告终。这件事也不会令霍斯金斯的使命因此而轻松些，反倒显得完全无望了。

与此同时，美国犹太大会即将举行，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其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占了92%的大多数。戈德曼说他曾经问过华莱士·穆雷，“此时召开是否妥当”，穆雷回答说只要他们“机智周旋”，不会有反对意见。我不知

---

个委员会负责监督英方是否实现了白皮书的承诺。

道他们得靠多少机智才足以周旋得当，消除对阿拉伯人的影响，让其不会因为此事更加肯定犹太人准备建立犹太联邦，就我所知，地点计划设在约旦河两岸。根据《纽约时报》上苏兹贝格和其他记者的快讯，阿拉伯人有同样的计划，地点则选在开罗。如此一来我们有好戏看了。不管我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某些目标多么同情和支持，我还是觉得抗议和骚乱只有害处，别无其他。很显然，韦尔斯告诉戈德曼，认为犹太大会是失策之举，经过周密计划后召开将更加糟糕。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许会推迟大会。他们特别急于取悦韦尔斯，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靠的同盟者。

还有两点：

1. 赛勒斯·苏兹贝格发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快讯上谈到即将出台一份针对巴勒斯坦未来的联合声明（《纽约时报》8月20日），并且引用了舍托克的话。这个消息激化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已酝酿的情绪，导致怀斯为此致信《纽约时报》，抗议苏兹贝格“危言耸听的”文章。

2. 8月12日纽约犹太议员伊曼纽尔·塞勒<sup>1</sup>发布了一则新闻通告，大声疾呼反对罗斯福先生计划出台的声明。当然，很有可能从那天起，塞勒就已经获得了情报，从巴鲁克、摩根陶，到德鲁·皮尔逊等（或者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还将新闻稿印了一份寄给大使阁下，认为苏兹贝格的几篇文章明显是预备式的轰炸，其后是这场给犹太人带来巨大伤害的事件。

450

很抱歉这份报告如此冗长。不过它是我们掌握的唯一比较完整的事件经过，对希望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有时是怎样形成的人来说具有启发借鉴意义。你完全可以相信，天主教徒和所有其他游说活动使用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方法。不知道这件事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了解多少，似乎犹太事务局的洛克<sup>2</sup>发来的一封电报四天前就已到达这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经过一般的信件检查）。他在电报中说，从伦敦的“可靠渠道”得知，这里即将出台一份“声明”，让怀斯一定要知道。我想整个话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在

1 伊曼纽尔·塞勒（1888—1981），律师，1923—1973年任民主党议员，新政坚决的支持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2 伯尔·洛克（1887—1982），犹太复国主义劳动党领导成员，党报编辑，1938年起任犹太事务局政治处负责人。

伟人们之间得到充分讨论，目前这件事不过是小溪中的水泡，很快就会在大事件的洪流中被人遗忘。

你的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3年8月16日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爸、妈：

你们一定记得，我不知许诺了多少次，说会给你们写一封超长信。<sup>1</sup>可每次动手写时，篇幅却总是那么短小。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觉得你们理应得到一篇杰作。但是，由于杰作尚未产生，你们就暂且先读读这个吧。希望长度能够弥补质量的不足。

我想，你们主要是想了解我的总体生活状况，因为从形形色色前往英国的人那里，各种话你们听说了不少。首先，我坚定、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从未咳嗽（我注意到你们信中对此隐隐表现出担心）。肺炎有肺炎球菌和病毒性两种类型。第一种又分为大叶性肺炎和别的什么。对这第一种我完全不了解，或许它真的会留下后遗症，一辈子咳嗽都好不了。而我得的这种肺炎，很奇怪，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引发咳嗽，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例外。有点痰，令人老想讨厌地吐出来，但始终没有咳嗽。到了2月份前后就完全  
451 康复了。毫无疑问，温特先生是很可爱，但常常喜欢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我的病情从未“复发”过，从那以后我再没感到不适。

你们还担心华盛顿天气太热。气温确实在80华氏度上徘徊，但由于包裹着空气流通的热带气候外衣，并不会让人觉得有那么难受。（今天只有65度，天气很好，非常舒服。）唯一构成威胁的是空调——炎热的大太阳刚

---

1 8月初，赫伯特·尼古拉斯曾经写信给以赛亚·伯林，说：“你母亲酸溜溜地说，你可能还在不停地写，但他们宁愿收到一篇短小文章，也不要一部老也写不完的巨著。”在8月25日给尼古拉斯的信中，以赛亚·伯林报告说：“我终于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

晒着，一下便走进冰凉的卧室。幸好我的卧室没安空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最多就用一个小电风扇吹吹，因此空调的凉爽以及随之而来的威胁均与我无缘。不过我不太怕热，倒是更怕冷些。1934年的耶路撒冷比华盛顿热多了。白天我会觉得热，但晚上睡得很沉。我发现自己天热时睡的时间更长（不穿衣服，打赤膊）。因此身体很好。

原先我打算8月中旬休假，到朋友兼上司奥博雷·摩根的小农场去待上一段。那个地方在华盛顿州西北部，离这里大约3000英里，差不多是伦敦到沃洛格达<sup>1</sup>的距离。可以舒舒服服地乘火车去，到那里领略完全不同的景色，树林、山脉，以及与太平洋贸易紧密联系的巨大的工业前景。在经历了过度繁忙的社交生活之后，这正是我需要的。（一些周刊不断地向我索要生平细节，我拒绝了，觉得从长远来看没有好处。还记得《标准晚报》<sup>2</sup>吗？）我想在那里待个一星期左右，再慢悠悠地（还是乘火车）经加利福尼亚到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这些地方地势高，空气干燥，阳光灿烂，我住在舒服的酒店里，每处待上两三天，然后回到华盛顿。我仍然准备实行这一计划，和摩根夫妇一起出发，回来时与这里大使馆的一位秘书同行，他名叫约翰·拉塞尔，到时可能正好从洛杉矶回来。而且他性情愉快，办事很有效率。可是，不管是摩根夫妇还是他都因为这里的工作无法脱身，提出要9月份走，我又不喜欢一个人走（你们清楚我多么讨厌孤独），因此只好提出等到9月份。7日左右出发，10月初回来。

今年好像没什么机会回伦敦，虽然尼古拉斯写信来怂恿我何不去待上个把月。我会给他写信，告诉他只需情报部稍微施加一点压力——我不能每次都自己努力，只要他们发话，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热情去做。

我目前追求的目标是争取让人派我去莫斯科，在那里待上一两个月，以便对总体局势有“全局观”。当然如果实现的话得经过伦敦同意，我会设法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正好有几个人我认识，比如像莫

---

1 俄罗斯城市，位于莫斯科北部约300英里处。

2 见上文第478—481页。



尔·科洛思维特，再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外交部和情报部应该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但我有点怀疑他们是否肯出面，因此对这个计划不抱太大希望，只是说说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感兴趣。也许明年夏天比较合适。只能等着看了。（别担心，目前这件事尚未开始。）

说说我的生活：我不听你们的忠告，还是搬出了肖勒姆酒店，因为实际上我不太喜欢住酒店，尤其是豪华大酒店，一到晚上，就满是喝得醉醺醺的上校军官。过去我是住得很舒服，服务也很好，在我的周密安排下，一切都井井有条。但这些目前在华盛顿不大容易办到。我愿意的话，10月份可以再搬回去，又要引得大家妒忌了。目前我住的房子在乔治城，是安妮·弗里门特夫人<sup>1</sup>的房产。我来解释一下，乔治城是华盛顿最迷人的近郊地区，它的最高处就是英国大使馆。城里遍布小巧精美的粉红色房子，点缀着白色的门柱。到处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伸展开来的枝叶为炎炎夏日提供了宜人的浓荫。每逢星期天上午，教堂礼拜的钟声敲响，黑人唱诗班放声歌唱，黑人孩子们在街头尽情玩耍，典型的美国南部城市景象。这里远离华盛顿的政治纷争，牛津味十足，很令我喜欢，远远胜过富丽堂皇的城里生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应该清楚为什么我会被吸引。星期天的晚上，纵横交错的公园和黑人舒适安逸的生活节奏，使它拥有一种小城镇甚至小村庄才有的家的感觉，令人为之心动，许多白人因此而在这里建房安家。弗里门特夫人是谢拉·格兰特·达夫的侄女<sup>2</sup>（听说她有一个孩子！）<sup>3</sup>，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有点疯疯癫癫，丈夫是一位蹩脚画家，是某个贵族的子弟，住在英格兰。我在读本科时就认识她了。她常常会天真无邪地激情迸发，让许多人受不了。我对保持一点风度还是很在乎的，这类英国上流生活的回忆令人非常愉快。好了，接着往下说。她的房子有三间卧室，一个大客厅，外带

---

1 安妮（一玛丽）·胡特·弗里门特（1910—2002），婚前姓杰克逊。作家、广播员、编辑、翻译、讲师及乔治城女主人；不断改变宗教信仰，从英国国教徒变为穆斯林，1943年起又变为天主教徒；1942—1945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印度部研究助理；与澳洲科特斯泊伯爵三世之子克里斯托弗·伊夫林·弗里门特结婚。

2 安妮·弗里门特的母亲是谢拉·格兰特·达夫父亲的姐妹。

3 潘尼洛普·纽萨姆，经济学家。

一个花园。她作为母亲被疏散到这里，目前为印度事务总局工作。通常，她与孩子们住在这里。夏天孩子们都出门度假了，剩下她一人，只好把自己关到地下室里，四周脏兮兮的，和防空洞差不多。不过她在身体上很能吃苦，说她并不在乎。楼上我住，前一段还包括我的朋友爱德华·普理查德。一位取了个怪名叫基赫拉的黑人女佣负责照顾我们的起居，现在就只侍候我一人。因此，我每天在床上吃早饭，这在战争期间的肖勒姆酒店根本不可能办到。它对我意味着什么你们最清楚。普理查德深受菲利克斯的赏识，他身体肥胖，差不多有三百磅，充满活力，富于机智。他过去在华盛顿政府机关工作，尽管他块头肥硕，不久前还是被部队征去当兵，离开了。此人极其聪明搞笑，脾气又好，我和他相处特别和睦。不得已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决定要尽可能找一位像他这样善于表达、性格风趣的人，两人成为至交，把自己的命运与其紧密相连。可惜他要走了，无可奈何。弗里门特夫人与他关系相当紧张，她是一位性格放荡不羁、不受世俗陈规束缚的人，甚至有点过分到愚蠢的地步（虽然房子管理得井井有条），让他受不了。还有，她老是喜欢到我们房间来聊天，我因为认识她已经有十一年，不觉得有什么，反倒颇为喜欢，但普理查德就受不了了，一点都不掩饰他的反感。每次她在门口出现，带着有点傻气的微笑，轻声问“我能进来吗？”时，他就会大声叹气，失望地呻吟，双手盖住脸孔，做出极度厌恶和敌对的表情。真别扭。你们可以问问鲍拉博士对她的看法。我敢肯定他也一样对她深恶痛绝。我对像她这样头脑简单的小傻瓜从来就不会太过介意。但是，随着普理查德和弗里门特的关系日益剑拔弩张，我只好被迫另做安排，又找了一处没有他人干扰的房子。这所房子十分精美。同样在乔治城，位于山上，地势很高，夏天非常凉爽。房子不大（两间卧室，一间更衣室，单独隔开的餐厅和客厅，厨房和地下室），有中央空调，一侧可以遥看波托马克河，另一侧面对乔治城的公园。在华盛顿找房子谈何容易，更不要说小户型房子了。所以说真是幸运，

454 这所房子因为住在里面的一位官员<sup>1</sup>不幸去世，才一下空了出来。接下来的问题是帮佣。通过一位好心的政府工作人员帮忙，她名叫弗兰兹布劳夫人，我们找到了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的女黑人，非常能干，是当地一位皮匠的妻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据弗兰兹布劳夫人说，有宗教信仰的仆人最理想）。也就是说，她在星期天工作，而不是星期六。太好了。星期天正是需要有人照顾和关心的时候。她菜烧得很好，整天都待在屋里干活，是一位四十岁的可靠帮手，精明能干，洗衣服和炸鸡的本领特别高。我打算同老朋友盖伊·奇尔弗合租这套房子，知道吗，他已经决定不再找美国朋友，认为老朋友才是最可靠。帮我理财的法兰克福特夫妇也大为赞同，他们本来就不赞成住在弗里门特夫人那里，说与一个红头发的女才子住在一座房子里不可能太平。我准备9月1日搬过去。还需要买一些家具——地毯和书架。我还认识周围邻居，其中之一是一位著名美国法官的女儿，这位法官也是法兰克福特的好朋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我随时可以回肖勒姆去住。但我更喜欢居家的生活。由此你们又会想到婚姻问题上去。你们放心，任何只要有一点点感觉的人都知道，这个想法在这里完全没有可能。这个话题就说到此。

还能告诉你们些什么呢？我每天的日子规律有序，工作也一样。生活更像在牛津的日子，比起纽约的生活乏味宁静得多。黑人区所带来的乐趣早已消逝。这里既没有好听的音乐也没有充满趣味的交谈，一切都温柔平静地缓慢流逝着，这种节奏对人的身体和神经无疑都有巨大好处。

你们无需担心伊达的亲戚会来纠缠我。他们都在纽约，而我现在从不去那里，碰面的机会根本不存在。

很高兴你们对查尔斯有那样的评价。他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高尚之人，而他的夫人只是让人可怜——妈妈的分析真是一针见血。

---

1 8月16日给赫伯特·尼古拉斯的信中，以赛亚·伯林对此事有更为具体的描述：“我准备搬进一所房子，谋杀的痕迹还留在地板上（没有丝毫夸张）。”根据弗里门特夫人的说法，以赛亚·伯林解决华盛顿著名的找房子难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英国使馆的一名秘书被情人谋杀之后，与警察同一时间到达出事的房子。每逢举行聚会，他都要在地板上原先留有血迹的地方洒上颜色鲜艳的红色钢笔水”。安妮·弗里门特，《最佳朋友》（伦敦，1971），第294页。

紧张的社交生活节奏如今已经放慢，没有什么内容替代它。最近我见到的唯一有趣的人是一位天才作曲家，名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sup>1</sup>，前任自由立宪民主党领袖的堂兄弟，在附近一所学校教音乐。他活力充沛，很讨人喜欢，不激进也不落伍，只是一位老牌知识分子，拉什一定会很乐于见他。我和他谈音乐，谈俄罗斯，谈书，谈各种人，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无所不谈。

我准备马上给戴维和玛丽写信，聊一些他们早已知道的事情，真没什么好写的。这里生活平静无波，没有一点历史背景。正如我告诉你的，回到英国，接触到欧洲，这里的一切便会像梦境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我还是会写。告诉玛丽和戴维（分别告诉他们）我同婚前姓费希尔的罗莎蒙德·科勒律治聊了一晚上，谈到30年代初的事情时，她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她似乎不太喜欢玛丽，但更不喜欢费希尔夫人。刻薄的姑娘。）

目前我对任何话题都没什么兴趣，以工作为乐。和同事们的关系非常和睦，真没什么不满意的。谁可曾想到我从一个牛津大学的哲学教师，一个平生只对音乐有热情的人，居然会变成一个热衷于美国政治斗争，忙于对最最不起眼的日常琐事进行记录的人？这一定是因为美国政治生活在性质上与个人紧密相关。机构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和牛津如此相像，自然会吸引像我这样喜欢饶舌的人。事实上总统十分古怪，完全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经过充分观察，我得出结论：尽管总统天性愉快、慷慨，言谈举止充满家底殷实的大地主所特有的雍容和气势，但他却有以下不足：（a）极其冷漠；（b）残忍无情；（c）没有朋友；（d）正日益成为妄自尊大的人，牵着我们的丘吉尔先生跑而不是相反。就整个世界而言，这种状况产生的结果也许不坏，因为他的动机正当，符合人道精神。但说到可以信任他，或者将他视为格来斯顿<sup>2</sup>式的人物，却大错特错了。

1 尼古拉斯·纳博科夫（1903—1978），作曲家、作家、舞台总监；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兄，其父弗拉基米尔·迪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为自由立宪民主党（上文第511页注2）领袖，1922年被俄罗斯君主主义者杀害。尼古拉斯后成为“文化自由大会”组织的秘书长。

2 威廉·尤尔特·格来斯顿（1809—1898），1868—1894年四次担任自由党首相，反对土耳其对巴尔干群岛和亚美尼亚的压迫，以及爱尔兰土地持有阶级对农民的压榨；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曾试图挽救妓女，不让她们沦落街头。

他不喜欢富人，这点没错，但他也不喜欢穷人，不喜欢任何人。也许这样更好，但这并非他的一贯作风。他的夫人<sup>1</sup>在各方面都和他恰恰相反，感情用事，热情洋溢，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充满与生俱来的精明机智，这是丑陋之人往往会刻意培养的。

还能告诉你们些什么呢？阿伦森夫妇已经离开缅因州，去了北卡罗莱纳，那里有木材可砍伐。很感谢他们给我写了信，邀请我去他们村里住一段。我尚未回信，不过可能会在从西海岸休假归来的途中到他们那儿过一晚上，看看他们。我敢肯定乡村生活比起纽约绝对更适合他们。

我还打算去哈佛大学一趟，看看那里的哲学家们。不管怎么说，到了美国，却与自己学科领域的同行没有交流，实在是愚蠢的表现。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那个来自维尔纽斯或者是华沙的老朋友——好像叫戴维，就是那个三十年前认识妈妈的小个子<sup>2</sup>——他死了。这件事提醒我得写信给芭芭拉·哈尔彭。虽不知该说些什么，但必须写。

若见到沃尔特·艾[廷豪森]<sup>3</sup>，跟他说他的朋友金<sup>4</sup>与我在同一座房子里合住了几个星期。他人很好，希望转达他的问候。

至于沃尔特·贝尔<sup>5</sup>，莱昂内尔[·柯蒂斯]见过他，人是不错，就是有点乏味，我曾想过与他共同建造一座房子，现在想想，幸好没这么做。他人是很不错，也很喜欢我，但若长期相处，他的无趣会把我烦死的。

约翰·福斯特准备在9月份回英国四个月。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决定自己更喜欢待在哪里。这里非常需要他，一旦他透露出准备回国，使馆上上下下，从大使到普通职员，全都会热情万分地请他立

1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因此，也就是她丈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远亲；报纸专栏记者，人道主义事业宣传活动家；1942年10—11月任罗斯福驻伦敦的私人特使；1946年为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代表，后(1947—1951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

2 见上文第462页。

3 当时在布莱切利园密码中心工作。

4 可能指亚历山大·金(1900年生)，驻华盛顿英国科技外交使团团长，1943—1947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科技专员。

5 沃尔特·凡考特·贝尔(1909—2004)，英国外交官，分别于1935—1940和1941—1942年任驻纽约代理副领事，1942—1945年任职伦敦外交部。

刻回来。他为大使提供的个人服务尤其高效，大使很需要。天知道，大使缺了他也许会感到失落的。毫无疑问，如果有谁在国外有功于他的国家，那便是约翰——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使之效率更高，使他本人更受欢迎，也使英国在这座城市更受人们喜爱。他甚至进入了通常将任何英国人都拒之门外的恐英者的圈子。我想他会去看你们的。

约翰·惠勒一班纳特已经回去，说起你们俩时充满感情。唐纳德·霍尔也一样。他们俩性格都极其温柔，两人都回了英国，真为他们高兴。约翰只是在那里待一段时间，霍尔可能就永久不回来了。唉，我也许可以穿得更讲究些的，不过这不能怪哪一位风情女子。<sup>1</sup>我盼望回国的心情十分迫切，会在给克鲁克香克的下封信中跟他说。并不指望会有什么效果——没有哪个部会喜欢变革——只是因为布莱肯<sup>2</sup>向我问好，我想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原先的位置好了。 457

我建立速度最快的一份友谊是和那个让我得了肺炎的人，一位名叫马修斯的海军指挥官，我在爱尔兰和他同住一间卧室，结果却是致命的。他是一位好人，现在永远都觉得对不住我了，所以急于在任何场合都讨我欢心。

我真的不知道对爸爸和他的生意提什么建议。在我看来，像以往一样，俄国和加拿大将依然是木材出口大国，他的俄国关系网依然存在。一旦英俄之间的通道好走了，他不能想办法以专家身份派往俄国吗？在伦敦的俄国代表中，没有可以就这个话题和他聊几句的人吗？不过也许现在考虑这些都还为时过早。

巴伯<sup>3</sup>有没有告诉你们他和我一起吃了午餐？

真的目前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事了。我十分满足，健康，受到很好的照

1 这里口气有点言不由衷。以赛亚·伯林曾经因为风情女子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而遭到失恋的痛苦。（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111—112页）

2 布兰登·布莱肯（1901—1958），布莱肯子爵一世；保守党政治活动家和商人，丘吉尔的挚友和同盟，1940—1941年任其议会私人秘书；1941—1945年任情报大臣；1945年任海军大臣。

3 埃里克·阿瑟·巴伯（1888—1965），1913—1943年任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古典学导师和讲师；1943—1956年任教区首席神父。

顾，生活井井有条，令人惊奇地整洁和有效率。

两件日常事务。你们有没有把鲍拉夫人的书寄给我，或是（通过我们英国使馆）寄来《新政治家》呢？至于给我写信的事，为什么你们不试试寄给我封好的信，投递地址写“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以赛亚·伯林先生”，并在外面的信封上写“外交部，联络处”，在寄给我的第一封信中附上一张简短便条，说明你们认为这是寄信给在美国的我的正确部门地址。我认为如果你们这么做了，这些信过四五天就会到我手中。当然，也可以一直通过尼古拉斯把信寄给我，你们愿意经常这样做也行，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信件审查员的窥视的确限制了人的写信风格，书信成为排好的一盘盘铅字，而不是谈话，更不是低声的交谈。不管怎样，我打算按这种方法寄出我给你们的所有信件。

很久都没有见到拉斯金一家或是别的亲戚，完全不像住在伦敦或是牛津。

爱你们的

沙耶

〈这真是一封沉闷的信！也许妈妈会以她锐利的眼光看出来，这封信出  
458 自平和、波澜不惊、得益颇丰的平静生活。〉

致厄休拉·尼布尔

1943年8月16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厄休拉：

我真是太不像话了，居然一直没有回复你6月3日写的信，但我几乎无法向你描述我在过去八周的生活状况，炎热，不舒适，那特别居家的状态，大量无关事务，厌倦与天气导致的筋疲力尽。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离开华盛顿了，而且在9月之前也看不到自己有离开的机会。

我怀着最大的快乐读完了莱因赫尔德[·尼布尔]写的所有文章,我想你所知的关于英格兰的所有消息要比我所知的新得多;我和贝弗里奇没有关系,我已经深陷案牍,这是一种忧郁的逃避主义,其意义可能被低估了。我没有和工人领袖或是知识分子谈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只和官员打交道,看事情开始像隔着结霜的玻璃——轮廓模糊,事件之间彼此非常相似——我意识到这是典型的官员式的全景图,已经全然不是愤世嫉俗的失败主义者的视野了。

看来,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你是永远不会到华盛顿来了?莱因赫尔德也不会吗?大约三个星期之前我试着给你打电话,被告知你已离开纽约,然后我终于放弃了。下周六或是周一我可能在那个城市,那样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请一定原谅我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

你的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459

致梅耶·夏皮罗

1943年8月16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梅耶:

我依然不在纽约,自从5月以来,或者也可能是4月,我就没有在那里一次待上超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从6后就根本没有去了。但是,也许9月我会去那里,到时我会和你联系。隔了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非常想见到你,这段时间我陷入最令人羞愧的常规性官僚工作之中,对文件和电话产生了源自懒散的爱,任其成为自己与一直心向往之的各种体验之间的阻碍,为

1 威廉·亨利·贝弗里奇(1879—1963),1946年成为图戈尔男爵一世,1919—1937年任公务员、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他毕生都对解决贫困与失业问题充满热情,因而利用一个负责社会保障体系的常务委员会开展福利国家的宏伟蓝图(《社会保险与联合服务贝弗里奇报告书》,1942年11月发布)。1943年5月至8月,贝弗里奇和他的新娘(他的前秘书、他表亲的遗孀)在美国,他们此次旅行由纽约英国情报处组织。



得到薪水而委身于此。

说到弗雷迪，我听说，在轮船失事之后（这个消息不太确定）他回到英国。他在伦敦起初显然很快乐，希望过上开心的生活，据牛津的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报告，首先，弗雷迪希望住在伦敦，每晚去夜总会。我想，由于有人捣鬼，他几乎立即被迅速送去了黄金海岸或是西非的某个地方。<sup>1</sup>而把A太太的所有丈夫<sup>2</sup>都发配到非洲西海岸，这是“理想的报应”（汉普希尔在塞拉利昂服役）。我非常为弗雷迪遗憾，因为不管怎样这都是令人愤恨的。我想他正像提线木偶一样被线拉回伦敦。

我还没有买到鲍拉博士的书，虽然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得到了，这真是令人疯狂的想法。我会设法从他那里把书弄来，然后寄给你。难道这里不能通过常规的渠道订购吗？

希望你的儿子没有忘记那位令人激动的指挥家——我正是希望自己被那样记住的。请向莉莲转达我的爱。

我想，你不会有机会来华盛顿吧？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伯林当时最亲近的助手，阿奇·麦肯兹<sup>3</sup>，后来记录了伯林给华盛顿社交  
460 界的印象：

他打破了社交礼节的一切规定——经常忘记约会时间或是地址——然而他依然是所有华盛顿女主人们最想邀请的客人之一。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交谈家，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机智但不辛辣，怀疑一切但不愤世嫉俗；善于恶作

1 艾耶尔被委派到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的阿克拉，他在那里待了九天，后来又被惩戒性召回并遭到扣押，因为他抱怨说那份工作根本不值得做。

2 即二者。

3 阿奇博尔德·罗伯特·克尔·麦肯兹（1915年出生），外交官，1943—1945年在华盛顿与伯林共事。

剧但毫无恶意；令人恼怒又使人消气，极其温和。<sup>1</sup>

下面这封信说明了邀请伯林吃晚餐存在的危险。

致玛丽亚·弗里亚斯

巴西大使馆

1943年8月26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我害怕您永远都不想再和我说话了，或是一想起我就怀着强烈的憎恨，但是我向您保证，是一种特殊的不可抗力使我昨晚不能与您共进晚餐。这次经历令人感到十分羞辱，我几乎无法让自己向您描述。相信我，在8月25日星期三晚7:45的时候，我郑重地出发了，心中满怀着对将要到来的巨大快乐的期待，我叫了一辆出租，让它把我送到第35街1239号，结果很快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您给我的地址，而且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sup>2</sup>就在那个时候，我犯下了第一个致命的失误，让送我去的出租车先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景色如画却荒无人烟的第35街，这里高悬于缓慢流动的波托马克河之上。我抓狂地想办法，给巴西大使馆打电话，没有答复，给巴西大使家打电话，没有答复，给新闻处打电话，报了你的名字，可是没能发现你存在的痕迹。然后我按照下面的顺序打电话：圭托·诺普<sup>3</sup>，没有人接。拉斯特科·佩特洛维奇<sup>4</sup>，他在家，但是只记得你住在O街的某个地方，却不能确切记起你的地址（这已经是晚上8:20了，是我唯一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他让我去问艾拉·肯特，我给她打了电话，没有人接。我又给三四个人打了电话，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没有接电话。此时已是8:35，电话亭里面的热气难以形容。最后我给约翰·拉塞尔打了电话，他认为或许能在白天乘车找到那个地方，但不知道地址，他又让我去问巴西外交官，名字我记不得了，但

1 阿奇·麦肯兹，《外交信念》（考克斯/伦敦，2002），第32页。

2 正确地址是31街1239号。

3 圭托·诺普（1912年出生），法国雕刻家。

4 拉斯特科·佩特洛维奇（1949年去世），塞尔维亚诗人。

461 是, 无论怎样, 电话本上没有他的号码, 别的地方也没有。漆黑的绝望占据了我的心, 我对自己说, 绝对没有哪个人会因为这么愚蠢和屈辱的原因而不能赴晚餐之约。然而, 我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在那晚后来的时间里我去找约翰·拉塞尔寻求安慰, 安静地对着他啜泣。

我真的无法说我对这乱七八糟的一切是多么的遗憾, 我想我是在日记本上错误地记下了你的地址, 但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可以想到却没有想到的唯一一个人是我的海军邻居, 埃德·马修斯<sup>1</sup>, 但我肯定, 他就和每个人一样, 在那个不可救药的8:30时已经出门了。天啊, 我无法说我承受着怎样的心情。请相信我, 原谅我, 往大使馆给我打个电话——我必须忍受着强烈的折磨才能打电话。现在, 如果我传达了一点点我的痛苦和负罪感, 您就不会太责备我了。

你的

致A.科恩太太<sup>2</sup>

1943年8月31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科恩太太:

早该给您写信了, 告诉您我过得多么愉快。很难表述华盛顿是怎样的——一片“被占领土”, 一切是如此紧密、紧张而密切, 每个人都在监督每个人, 所有地方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光亮。纽约是“非占领土”的起点, 你房子里的自由气氛, 真的至少对您的一位访客有解放性的作用, 而现在似乎很遥远了。华盛顿周围的光明开阔与它内部逼仄黑暗的对比真的令人印象深刻。我肯定, 如果他们在达科他的某个地方处理国际关系, 那一定会立即得到改善。我真的极其感激您提供给我的光明与食物。

随函附上我由于粗心而忘记给您的东西, 希望不会太不合适。而且, 我

1 也许是把肺炎传染给他的马修斯中校(见上文第541页)。

2 阿尔弗雷德·E.科恩的妻子(上文第407页注3)。

确实希望,当科恩先生或是您本人,或是您二位,下次到华盛顿时,不要忘了光临我已经得到的、不过要在我为我那黑肤女佣找到住处后才可以入住的那座小白房子——帮她找住处比为我自己办任何事都要困难得多,但是由于各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延伸到康涅狄格和辛辛那提的触角,到9月初这个宏伟建筑便可入住了,应对国际政治问题甚至进行哲学研究对我的资源需求都比办这些事少得多。 462

我希望你们如我见到你们时那样健康安逸,我留恋地回想起那时的情景。

你们的

又及:你能否告诉法官<sup>1</sup>,约瑟夫·张伯伦阁下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名叫贝阿特丽丝·玛丽,而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儿也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别致名字,弗洛伦丝·艾达、卡罗琳·希尔达,还有伊索尔?简直是想象力的杰出成果。我记不起来这些是否解决了问题,或者相反,使问题更严重了。艾尔曼先生<sup>2</sup>,唉,无限期地离开了。

伯林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

1943年9月4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达夫妮:

关于葛罗米柯先生<sup>3</sup>,匆匆说上几句:他是个很温和、很迟钝的人,在

1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科恩夫妇的挚友。

2 也许是菲利普·艾尔曼(1918年生),1941—1943年任法兰克福特的律师助理,当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1944—1961年继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助手。

3 安德雷·安德烈维奇·葛罗米柯(1909—1989),1939年任人民外交委员会美国处负责人,1939—1943年任职于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1943—1946年任驻美国与古巴苏联大使(他的前任,马克西姆·里特维诺夫因独立思想无法为斯大林所接受而被召回);后来成为驻英国大使(1952—1953年)和外交部长(1957—1985年);他在职业生涯中和九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苏联学过经济学(也许还有工程学),是科学院或红色教授学院<sup>1</sup>经济系的负责人,但显然他在政治上的可靠度要高于经济才能。美国国务院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他担任人民外交委员部<sup>2</sup>美国处负责人时和他们有良好的关系。他很安静,守口如瓶而且严肃。我一年前遇见他时,我想他是个典型的“新人”,热切、沉闷、忠诚、极其拘谨、很有能力,是优秀而没有什么主动性的公务员,很腼腆,谈不上有多政治化。他根本就不是当大使的材料,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没有像乌曼斯基和你的现任者古谢夫先生<sup>3</sup>那样的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sup>4</sup>工作的背景,他只是更像个严肃体面的校长,或是俄国地方学校的一个数学与几何绘图老师。他有一位略胖而邋遢的妻子<sup>5</sup>,两人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受到他的外国同事们的尊敬,把大量工作放手给他更引人注目的助手巴兹金和斐多托夫去做,斐多托夫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我记不得使馆里那个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的名字了,不过他实际上在幕后操纵一切。

你的

以赛亚·伯林

---

1 葛罗米柯在明斯克学习农业经济学;1936—1939年,他在莫斯科任科学院经济学院的高级助理研究员,在莫斯科土木工程学院任政治经济学讲师。

2 伯林此处原文为俄语词音译“Narkomindel”,1946年该机构更名为外交部。

3 费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约1905—1987),1943—1946年任驻伦敦苏联大使。

4 上文第368页注4。

5 莉迪亚·德米特里耶娃,婚前姓格林内维奇(约生于1913年),和葛罗米柯一样,她出身于明斯克附近的农民家庭,他们学生时代相识。葛罗米柯后来写到他们的恋爱经历:“我就是无法忘了她……我被她的美丽、她的淳朴和其他难以名状的神奇品质征服了。”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哈罗德·舒克曼译(伦敦,1989),第17页。

致保罗·戈尔—布斯

1943年9月4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航空(民用); 战后

参阅——伯林: GF522/165/43

密件

戈尔—布斯先生:

关于伯尔我必须说他是个人心怀叵测的聪明人, 他被自己早期的学术成就永久性地冲昏了头脑。他是个奇怪的结合体, 对极巧妙的现代行事方法具有典型的德国式激情(事实上他只有来自他父亲的一半德国血统), 例如, 崇拜沙赫特<sup>1</sup>与非正统经济学, 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不平衡预算, 等等, 因此是恼人的正统派帕斯沃尔斯基<sup>2</sup>最痛恨的对象。同时, 他仇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 以及整个19世纪的遗产, 怀念前工业文明时期, 464 与她的妻子<sup>3</sup>一样忠于中世纪, 因而他恐惧联合企业和股份企业。他是布兰代斯的学生, 憎恨所有形式的“大型”私有化, 支持一种罗马天主教式的国家控制(这在他而言取代了教会)之下的小业主模式的理想。在他看来, 大英帝国曾经代表了他所仇视的一切——工业化、帝国主义剥削、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统一的基督教欧洲的障碍, 诸如此类; 在1940年至1941年, 他相信英帝国在解体, 而且认为这是件好事, 并希望能够加速这个进程。他现在相信, 英帝国也许能够幸存下来, 依然保持强大。如今他已成为彻底的机会主义者, 希望能和它建立好关系, 因此对它的代表异乎寻常地温文有

1 耶马尔·贺拉斯·格里利·沙赫特(1877—1970), 德国银行家, 1923—1930年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并且一直到1939年期间断断续续担任此职; 1934—1937年任经济部部长; 被纳粹怀疑密谋反对希特勒, 在纽伦堡受审, 但是被无罪释放。

2 列奥·帕斯沃尔斯基(1893—1953), 生于俄国的经济学家, 1936—1938年任国务卿特别助理, 1939—1946年(为赫尔的演讲撰稿人), 1941—1942年任国务院特别研究部负责人, 敦巴顿橡树园与布雷顿森林会议顾问。

3 阿道夫·伯尔的妻子, 贝阿特丽丝·毕晓普·伯尔(1902—1993), 柯特兰·菲尔德·毕晓普的女儿, 精神病方面的社会工作者。

礼。据人们目前所知，伯尔很明智地准备和我们合作了，只要我们能够收敛一下我们的帝国主义贪欲，并且在仇视他也因此被他所仇视的美国大企业提出过分要求时向他提供支持。他非常虚荣，喜欢自己灵巧地编织出来的结构精细复杂的智力图式，很容易就陷入他所尊敬的有智力的外国人设下的恭维陷阱。他喜欢把自己看做是半个梦想者、半个后台人物、一个霍尔斯坦<sup>1</sup>，认为自己终有一日会成为一个现代塔列朗<sup>2</sup>，总是为了最高层次的善而战斗，但不可避免地遭受误解，受到无知者的攻击，等等，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对北非政策负有全部和唯一的责任。他事实上是个夸大狂，需要别人的迎合。

以赛亚·伯林

致W.J. 利宁<sup>3</sup>

旧金山，英国情报处

1943年9月22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利宁：

我准备在一两个星期天之前，给你打电话实施恐吓，并打算在下个月到旧金山。我的日程安排是，9月26日离开纽约，27日到芝加哥，28日离开芝加哥，30日到达俄勒冈的波特兰，在那里我将和奥博雷·摩根一直待到10月12日，13日乘火车到达你的城市（如果可以，一旦我知道了确切的时间，我会让你知道的）。能否辛苦你帮我订一个单人房间，住两个晚上，即10月13日与14日，找一家体面一点、去哪里都不会太远的酒店。

- 
- 1 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1837—1909），德国外交官，1878—1906年任德国外交部政治顾问，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很有影响力。
  - 2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官，以在政治剧变中的幸存能力而著名。
  - 3 W.约翰·利宁，原先在芝加哥格雷厄姆·胡顿手下工作，1942年3月旧金山英国情报处设立时被提升负责该处的工作。

我计划10月15日离开旧金山，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除了拜访你一下，和你深谈一番。我并不急于见到一系列要人，所以请一定不要为此事特别费心，不过如果有谁，你认为和他谈话会比较有益，尽管按照你的安排，我都可以。不过，我只要像一个睁大眼睛的游客那样看看海湾，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打算研究人，研究英美关系或是别的任何事。而且我真的害怕出席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晚宴，所以请把我当作一个随意的过客，不要给你自己带来麻烦。如果你能有空在其中一个晚上和我一起吃饭，我会非常欢迎。

计划到达的确切时间我会再告诉你。

你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3年9月26日 [手稿]

纽约，圣瑞吉斯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正要离开去西部：摩根夫妇在那里有座农场，他们邀请我去那里，听起来棒极了。我的健康状况极佳，乘坐美国普尔曼特等卧车旅行非常舒适。我9月30日到那儿，途经芝加哥，要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去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好莱坞逗留一天——我要拜访哈珀·马克斯<sup>1</sup>，不过不要在牛津说这件事，在战时听起来太轻佻了），然后经过亚利桑那不紧不慢地到达新奥尔良，接着就回华盛顿了（11月2日）。如果我现在不看看美国，我就永远也不会看美国了，我这次旅行是把公事与娱乐相结合。你们会从三个人那里得到我的消息，他们是：（a）对妈妈很忠心的麦吉奇小姐，（b）唐纳德·霍尔夫妇（他已经成为理查德·劳的私人秘书），（c）约翰·福斯特，他

466

1 （阿道夫·）亚瑟（“哈珀”）·马克斯（1888—1964），狂放的舞台与喜剧电影演员马克斯兄弟组中的老二；在他们的电影中哈珀的招牌形象是：演奏竖琴，追逐金发美女，到处制造混乱，从来不说话。



要回去不超过四个月，我们都希望如此，所以你们会听到足够的信息的。霍尔夫妇是非常可爱的一对，对我极好，真的喜欢我，我想，不过你们不要一直和人家谈我。我的新房子很漂亮，黑女佣极其能干，是个出色的厨子。我已经把新家描述过了，我想，是小小的、白色的、坐落在山坡上的房子（霍尔见过了），奇尔弗先生是个非常善于安慰人而且能干的“妻子”。我刚买了一些色彩艳丽而且便宜的印花棉布（外交官在离开前常常把它卖给另一个外交官）来装饰它，非常期待入住后的生活。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信了，因为国际制裁吗？

我会从西海岸再给你们写信，没什么特别要说的了。生活之河平缓地流动，3月以来我甚至一点小感冒也没有染上（脱离困境了）。黑女佣洗衣服，熨烫衣服，做卫生，炸鸡很好吃。街道看上去像阿马尔菲的某个地方。我和同事的关系继续保持良好的（我和一个叫约翰·拉塞尔的同事一起从洛杉矶回来，他的效率确保了我们的旅途的安排），我和理查德·劳会见了两个小时，和首相<sup>1</sup>握了手，他说（完全不知道他是和谁说话）：“有趣的工作——接着干——继续——干下去。”按照适用于一切的鼓励原则——为生命的力量而欢呼。他穿着他的“连衣裤”，看上去就像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的可爱老人。和这样的一个天才即便只有瞬间的接触，我也非常高兴（显然和你见到他的时候一样）。菲利克斯夫妇很好，她比以前瘦了白了，他就像一只快乐的蟋蟀一直叫啊叫，说着有意义无意义的话，活泼，有锐气，乐观。我真的很期待我的旅行，途中一定会尝试写写那种旅途书信<sup>2</sup>，不过我怀疑时间和空闲是否足够让我先在心里装满印象，然后用一两个小时把它们都写下来。你们知道，我讨厌写日记的主意，请向戴维和玛丽转达我的爱。弗雷德·R.想要我帮忙遣返凯蒂<sup>3</sup>以及他的妻儿，我看没什么希望，撤离

1 在魁北克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加拿大首相麦肯内兹·金会谈过后，丘吉尔9月的头十天在华盛顿。他的访问很受欢迎，包括在哈佛的一次成功讲演并获得荣誉学位。伯林（被派去给在白宫的丘吉尔本人送一份电报，因而得以见到丘吉尔：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25）在9月12日的快讯中写道：“丘吉尔先生在这里的出现、他对媒体的谈话、他在哈佛的演讲，以及如潮水般的大好战争捷报，令华盛顿非常振奋。”（《华盛顿快讯》，第244页）

2 伯林此处原文为：Reisebriefe。

3 弗雷德·劳的母亲（上文第391页注4）。

的母亲们排队等候，要一年半之久才上得了船。

爱你们的

沙耶

我很抱歉这样结束我的信，我在等火车，你们知道我什么事都迟到。 467  
新年快乐<sup>1</sup>，赎罪日在俄勒冈波特兰——我想知道波特兰的神圣礼拜会<sup>2</sup>将  
是什么样子。

伯林

伯林离开了华盛顿特区，从9月26日至11月2日旅行，包括在华盛顿州西北  
奥博雷·摩根的农场的休息以及对西部和南部诸州的考察。

致布兰奇·诺弗<sup>3</sup>

1943年11月22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诺弗太太：

谢谢您11月15日的来信，我恐怕并不知道戈兰兹先生所指的书究竟是  
哪一本，因为我最不喜欢动手写任何题目，只这么做过一次<sup>4</sup>，自己不太满  
意，就唯一写过的这本书来说，别人也不太满意。

我下个星期一，11月29日，也许会在纽约，通过英国情报处可以找得到  
我（环形路6—5100）。我将很高兴见到您，如果作为一个无用的潜在作者  
不是致命的障碍。

1 伯林此处原文为希伯来文。

2 伯林此处原文为希伯来文，“kehila kedosha”的缩写，即在波特兰的犹太人的聚会或是犹太会  
堂的聚会。

3 布兰奇·沃尔夫·诺弗（1894—1966），担任她丈夫阿尔弗雷德·A.诺弗的出版公司的总裁，发  
现、鼓励并出版了许多之前在美国并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

4 他指的是《卡尔·马克思》。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3年12月7日〔手稿〕

纽约, 圣瑞吉斯

亲爱的爸、妈:

468 你们抱怨我没有来信, 一个原因是我现在每隔三四个月就换秘书, 所以让她们速记我的私人信件与公函都不太容易。让人一整天为我听写报告和官方信件之后, 坐下来即使是给你们写封真正的信都很困难。这封信是在从纽约去华盛顿的火车上、在我们经过费城那段路程时写的(我现在从来都不坐飞机, 我讨厌它们, 无论怎样, 我太懒惰而做不来的要紧事又需要我去做)。我的房子是田园风格的。你们知道, 置身于异域事物的海洋中, 我喜欢使自己立足于稳定、熟悉而坚实的东西之上。格兰特·达夫小姐(现在是某位太太了<sup>1</sup>)写信说:“有必要绕得这么远而结果却如此近吗?”说的是弗里门特太太(那位宗教神秘主义者)或是奇尔弗, 答案是“有必要”。走得越远, 就越需要“聚焦点”<sup>2</sup>。那位宗教神秘主义者真的不算很糟糕, 她是个淑女, 虽然是个疯狂的淑女, 比起任何国家的理智而粗鲁的女人, 我更喜欢疯狂的英国淑女。这位宗教神秘主义者对我很忠心, 坚持不懈地关照我。现在我住在一座可爱的小白房子里(我从西部回来就搬过来了, 那时约翰·福斯特已经走了), 地处山上, 俯瞰一条河, 尽管如此, 那里却干燥温暖(有中央供热系统, 由瓦斯炉供暖)。盖伊·奇尔弗是非常可靠、忠诚而且友善的寓友, 一位严厉而能干、勤奋而清洁的黑女佣照顾我们的日常起居, 她是个清教徒式的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非犹太人<sup>3</sup>或是基督复临

1 1942—1952年, 诺埃尔·弗朗西斯·纽萨姆的太太。

2 伯林此处原文为: d' appui。

3 伯林此处原文为: субботница, 这个俄语词系误用, 在苏联时代, 其意指在休息日义务从事志愿社会公益工作的女性。

安息日会教友，这就是说，她星期五晚上停止工作（像别的一些人那样），星期天回来上班。问题是她的薪水。最初的方案是：一周15美元（她负责洗衣、熨烫、缝补等等），报酬低于这里的大多数女佣，+5美元住宿费用+1.65美元电车交通费。我们现在安排她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可是她还是要求得到原先的21美元周薪——很不合理。如果我们拒绝，她就要走，她知道女佣不好找，而且她是通过我在辛辛那提的犹太熟人才找到的（！）这让我进退两难，简直是敲诈。我们只有得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的外交支持才有可能降低她的周薪。因此需要细致的谈判。别的就很好了。我的衣服收拾得很整齐，虽然再有一套和伦敦1942年9月那件蓝色西服一样的会很好——不过我不是很急着要，我还可以穿一套相同式样的深棕法兰绒西服，不过真的不要紧。我很高兴查尔斯很好，我也从达[夫妮·]斯特雷特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了，说的都是同样的事，不过在我看来那相当疯狂。A) 我太忙了，B) 这样不好，C) 我会成为所有人理所当然的怀疑对象，使事情变得更糟。你们记得海涅关于“不幸者”这个词的溯源吗？这个词源于示路蔑·本·苏利沙代，他正好挡在平查斯的利矛与祭祀之间（《利未记》？）<sup>1</sup>，469 记得那个故事吗？嗯，那就是我的结局了。我想，这个主意算是她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收到瓦德汉姆学院院长写来的一封信，以极大的热切与怨恨描绘约瑟夫的葬礼，并报告说伯林先生参加了，举止正派有礼，也就是说没有吐痰，等等。对于这一悲伤的事件我无法假装难过。莱特福一定非常激动。惠勒·班纳特很快就来了，他会打电话。你们那边和我们这边据说都遭受了流感侵袭，不过我没有受传染，一个喷嚏都没打，一声咳嗽也没有。我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呢？你们可怜的崇拜者戴维——他名叫什么——那个小个子犹太作家，去世了。另一方面，法兰克福特夫妇，尤

1 示路蔑，苏利沙代的儿子，事实上只出现在《民数记》中（例如7: 36），虽然在这段故事中（25: 6—15）并未明显点到他的名字，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在他的诗《杰胡达·本·哈勒维》中提出了这个词源阐释，见《海因里希·海涅之希伯来的旋律》，奥斯卡·瓦尔泽尔主编（莱比锡，1911—1920），卷3，第168—170页。要了解此复杂事情的背景，见S.S.普罗尔，《海涅的犹太喜剧：海涅对犹太人以及犹太文明的描述》（牛津，1983），第587—591页，以及（仅供勇气可嘉者）罗伯特·M.科普兰与纳森·苏斯金德，《赫兹的“以斯贴”：犹太—德语方言研究》（亚拉巴马，1976），第167—174页。

其是法兰克福特先生，活得欢蹦乱跳的。大家都很想念约翰·福斯特，从技术和人际两方面均如此。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收到米利亚姆·雷恩<sup>1</sup>（兰伊）阁下的电报，责备我没有更多注意她的行为？S.戈尔德伯格在这里，非常聪明大方。我的同事奥博雷·摩根在伦敦，如果你们想见见，就由情报部等转交。

爱你们的  
沙耶

致S. N. 伯尔曼<sup>2</sup>

1943年12月16日 [副本]

[华盛顿]

亲爱的伯尔曼先生：

在离开纽约并返回的火车上我开始充满感激地给您写信，但是整个旅程遭遇了一连串灾难，我恰好弄丢了我的手稿。整个过程就像果戈理<sup>3</sup>与普鲁斯特<sup>4</sup>的小说情节的混合体，不过细节我就略去不提了，尤其是普鲁斯特的那类情况。如果上个星期六早上我赶上9：55从华盛顿出发的火车，一切也许就很顺利了。可是送我去火车站的汽车在距离联合车站没多远的时候后车轴丢了，而后它慢慢地在有点令人晕眩的车流中停了下来。我因此就上了10点的火车，如果它的行李车厢没有在费城与纽瓦克之间着火的话，本来也是可以及时把我送到纽约的，这不期之灾使得它停在了一片开阔的（而且，当然是景色壮美的）旷野之中，大约一个小时。我不断问为什么要把车停下来才能灭火，如果继续前进肯定也一样能够这么做啊，可是没人理睬

---

1 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早在1943年已与乔治·雷恩（曾姓兰伊）结婚。

2 塞缪尔·纳撒尼尔·伯尔曼（1893—1973），剧作家、散文家，他的世俗喜剧在百老汇很成功；小提琴家贾沙·海菲茨的姻兄。

3 尼科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罗斯小说家、戏剧家，他的许多小说都讲述了小公务员遭受的奇特不幸。

4 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追忆逝水年华》，描述了对不可得而且不忠的女人的无望爱情。

我。我们3:20才到纽约,我在3:35到达剧院,演出已经开始55分钟了。在售票处排着很长的队伍,人们缓慢而痛苦地购买3月、4月与5月的票,如果我的天性不同,我本会无视这一点的。结果,我温顺地排着队,轮到我的时候,两张票匆忙地塞进我的手心,表明我的伙伴<sup>1</sup>也没有来。之后,一连串更加复杂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包括大量长途电话、解释、眼泪,等等。(这部分的叙述虽然不失真实,但也可以称其为非艺术的夸张。我对真相兴趣不大,打算略去不提。)

我听了歌剧《俄克拉荷马》的后半部分,不过非常高兴。真的,即使与雷诺兹参议员<sup>2</sup>极为相似也不会破坏它分毫。也许是由于在我心中保存的对欧洲经历的记忆,在我看来,演员们与他们所扮演的现实原型在相貌体征上的相似,使这一场幻梦强烈有力,使整个演出具有人们所说的非常令人信服的特质。简而言之,你想使我受到教导的愿望很成功地实现了,我对大西部的实际记忆完全被这更加生动而且更值得牢记的声音与景象所取代。演出——一结束,我就想再听一次第二幕,无论怎样,只要有可能我会这么做的。我没有想到,自从《蝙蝠》<sup>3</sup>及其以前的演出以来,表演诱发的情绪,和观众对那个地方、对他们自身真实与历史情感的记忆之间,竟可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也许比普通美国人更深刻地因为大量想象的联系而感动——我肯定,当我回到我那与世隔绝的世界时,随着一年年光阴流逝,在我带走的、留在我心中的美国的最后画面里,它将越来越靠近画面的中心,这简短而生动的片段将萦绕在非常靠近中心的地方。因为这一切,我真的很感激你(不过你必须允许我把票钱付给你)。

471

很想知道你本人对这些是怎么想的,我想只有最迫切的需要才会把你带到华盛顿,我希望在不是太远的将来,让我在纽约见到你。

1 几乎可以肯定是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下文第598页注1)。这也许是看完了《俄克拉荷马》的演出之后的事情,伯林在他的酒店一夜无眠,饱受隔壁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与她的法国和古巴混血情人雅克·阿德勒所发出的声音的折磨。

2 罗伯特·赖斯·雷诺兹(1884—1963),1932—1945年为北卡罗莱纳州的古怪而炫耀的民主党参议员,孤立主义者,新经济政策的热情支持者。

3 伯林此处原文为“Die Fledermaus”,轻歌剧,由小约翰·斯特劳斯作曲,卡尔·哈弗纳与里夏德·格内作词,以维也纳为背景,年代背景与该剧首演的1874年那个时期相仿佛。

我的天，不过这真的是最痛苦而又最享受的一天，出于许多理由，我将永远都不会忘记。非常感谢你，真的。

你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4年1月31日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父母亲：

我必须为自己这么久没有写信而道歉，尽管我似乎在做着许多无用而且没有必要的事情，可是却没有时间给个人生活。我将试着对你们几个月以来积累的种种问题一一做答复：

1. 伯林家的战后重建，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打听<sup>1</sup>过了。对此我的看法是，像你们这样脾性的人，在乡下是不会找到一个具有活力的地方的。英国乡村的生活完全取决于(a)汽车，(b)对乡村的喜爱。由于你们二者都不具备，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除了度周末的小屋或是类似的东西之外，乡村的那种生活很快会把你们闷坏的。另外，我对汉普斯特的房子还是不喜欢，所以我要建议在靠近伦敦市中心的地方买一处小房子，比如说在圣约翰林或者甚至是肯辛顿或是骑士桥（除非你们觉得太低端）或者是坎普顿山。我不相信公寓这种东西，对私密性与独栋房子情有独钟，只要维护不是太困难——七个房间就够了，我想，我不知道如果卧室少于四间我们能否住得来。我还相信房产具有不可毁灭的价值，尤其是在战后，或者我们可以在去伦敦（还有牛津）比较方便的地方找所房子（在GWR<sup>2</sup>沿线的小镇，另外在伦敦买个套房），不过我坚信我们要有一所房子。

2. 你们也许想了解一下我在这里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房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enquête。

2 连接牛津与伦敦的大西线铁路。

子远远坐落于一條奔腾的河流之上，充滿浪漫氣息。它很小，很好打理。黑女傭精力很充沛，干净，是虔诚的教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这意味着她星期六不工作，星期天工作，还不吃猪肉）非常诚实，做一手好菜，显然对奇尔弗先生和我很忠心（我们分别是盖伊先生与伯林先生）。我们曾举行小型晚宴招待经过仔细挑选的客人（我们的饭桌顶多坐六个客人），一切都进展顺利。她每周要我们支付惊人的二十美元薪水，为此她给我们洗衣、熨烫，在房子里缝缝补补，我不能要求比这更好的生活了。在此之前我度过了饱受困扰的三个月，被偷盗和打劫——虽然最后我发现我全部的损失加起来大约只有七美元的现金，还有〔赫伯特·〕尼古拉斯好心带给我的——一对袖口链扣——雇用了那些抢劫犯的弗里门特太太现在在英格兰，我与她以及她神秘主义的联系告一段落了。

3.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呢？我见到了许多官员，还和A.克拉克·科尔爵士<sup>1</sup>度过了愉快的半个小时，他从莫斯科来看望我们，向我转达了莫尔·科洛思维特的问候。他问我何时能去莫斯科看他，我说“马上，今晚”。他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回答“没有，我准备好无条件投降了”。我不知道这些幽默轻松的话语是否有严肃的依据，但我一点也不反对去一趟莫斯科，只要不是太久，因为我认为，在莫斯科逗留之后也许会觉得它很沉闷。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喜欢俄国的新国歌<sup>2</sup>，它的确在节奏上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首都更活泼。科洛思维特还通过一位返美外交官给我捎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他自己的枯燥生活。我不大觉得他是派驻新俄国的合适人选。

4. 我的伦敦之行有几个计划正在进行中，我被告知也许是在7月份可以回去待极短的时间，因为我不可或缺，等等。我对此一点都不该抱怨，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十分好，并渴望能回去哪怕两三个星期。克雷格·麦吉奇带来了你们的消息，我想，她刚刚得到一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福

473

1 阿奇博尔德·约翰·克尔·克拉克·科尔（1882—1951），1946年成为因弗切普尔男爵一世，外交官，怪人；1938—1942年任驻中国英国大使，1942—1946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6—1948年担任驻华盛顿大使。

2 《牢不可破的联盟》（S.V.米哈尔科夫与G.G.艾耶尔—拉吉斯坦作词，A.V.亚历山大罗夫作曲）取代了《国际歌》（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作曲）。



利主管的工作邀请,在那里她将与莱曼和索尔特共事,他们是乏味而有能力的人,完全对她的脾气,可以被她用甜言蜜语哄骗。我确信,她会出现在欧洲与东方的许多地方,带着流动厨房和温暖的被褥。她愉快地邀请我在她手下工作,必须承认,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适合我的特殊天分了。如果你们能想象我,与比如说一个荷兰人、一个克罗地亚人和一个暹罗人一起,在德黑兰为波兰民族主义难民盖被子,那就是这份工作邀请在我心中激发的景象,我觉得这不太像是我做的事情。

6.<sup>1</sup> 福斯特有什么新闻?卡路瑟丝小姐呢?他是否还是下院议员?<sup>2</sup>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再回来,使这里的每个人都很难过,因为他是活力和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似乎很忧郁,有点儿痛苦,也许因为他感到战争努力并不像理所应当的那样取决于他(最后一句不是重复,首先不是就鲍拉博士说的,他给我来了一封很好的信)。你们的刷子平安寄到了,我知道送刷子来的人见到了我健壮有力的样子,会把这一点告诉你们的。查尔斯给我发来一份电报,告诉我他那边有个人要过来了,还抱怨我不写信,我不写信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受到官方环境对开放写信的束缚,我还知道,因为收信人的缘故而要写出完全没有危害的书信,还要抄送几份给无关的官员检查,这样写出来的信太虚假了,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有机会见到他,希望能替我向他转达我的解释。

7. 的确,至少在原则上,我可以拜访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了,不过鉴于她没有来访的迹象,你们可以提醒一下赫伯特,告诉他,大使怀着热情与好奇期待着她的到访。

8. 犹太问题当然将在这里严重爆发,我尽可能不牵扯其中,但没有成功,因为一切材料最终都会放到我的桌面上,我不得不上演外交歪曲的奇迹。简言之,我的生活像以往一样,平和,有规律,说很多话,听一点音乐,看几本书(谢谢你们寄来《新政治家》),一直都很盼着回家。所有人都极友善、可爱,而且有礼貌;这个国家无疑聚集了有史以来为数最多的本质仁

---

1 没有第5点。

2 1945年约翰·福斯特当选为柴郡的保守党下院议员。

慈的人，不过留在这里的想法依然是梦魇。欧洲战争一结束，当天我可能 474  
就会发狂地设法回到牛津。

9. 我不能假装难过，约瑟夫先生去见他的祖先了，而且，他兄弟（通过你们传达的）让我写某种私人纪念祈祷文的请求，几乎让我感到难为情，我想我应该直接给他写信要一本书或是别的什么。请代我不仅向戴维和玛丽和费[希尔]太太以及莱昂爵士<sup>1</sup>问好，如果你们在学院的方院里碰到史密斯，也代我向他问好，还有向莱特福问好，我想，我将和他一起住。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日益倾向于息事宁人了，而且我发现，我对于不道德现象的愤怒也越来越没那么强烈了。

真的，再没别的什么可写的了，一切都如此沉静而安宁。<sup>2</sup>

我真的希望你们都很健康，时不时有人来信说“你父亲吗，当然，好多了”，这甚至是我第一次得知你们身体状况不佳。<sup>3</sup>但是我满怀信心地认为你们身体健康。（我那天去了哈佛，非常美丽宁静，我和菲利普斯以及他的太太见了很多次，他们依然奇迹般地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男孩，她还是沉思着，充满了无法实现的渴望，过着如梦境一般的生活。）今晚我和罗伯特·布兰德、我的全灵同事与我们食品救济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吃饭，明天我将参加一个外交（波兰的！）招待会。

所以你们知道了，我的生活很充实，不过也很空虚。我偶尔会很抽象地想到结婚，我确信，如果我真的结婚，我（a）必须要坠入情网，（b）她可能拥有一切缺点——要么太老要么太年轻：一个穆斯林或是天主教徒：离婚四次，负债累累，有六个孩子，极其愚蠢，一只耳朵是聋的。我的天，也许拥有许多朋友、写长信、周末和别人一起度过、保持单身，才真是最好的。我心情非常平静满足，没有什么让我烦躁不安，如果我能在7月回家，我就别

---

1 莱昂·西蒙（1881—1965），1944年封为骑士，汉普斯特的居民，公务员、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与希伯来文专家；1935—1944年任邮政储蓄银行经理；1945—1946年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教育调查委员会成员。

2 这里以下的内容由打字改为手写。

3 见上文第431页注2。

无他求了。寄去所有的爱，我今年会见到你们的。

475 沙耶

致安格斯·马尔科姆

外交部，北美司

1944年2月1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安格斯：

谢谢你上次的来信。有一两件事我想最好立即跟你说，把其他的闲言琐事留到周末，到时我会有一点空闲，会试着培养合适的西西里情绪<sup>1</sup>，到时我将写信告诉你一大堆怪事，此时我要说的是这些：

我们的老朋友，犹太电讯社的雅各布·兰道<sup>2</sup>，最近从墨西哥回来了（我怀疑，出于他所自称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情感，他在墨西哥试图为纳胡姆·戈德曼办事，在乌曼斯基那里试探他与戈德曼就犹太问题造访俄罗斯的可能性），他今天来看我，说（1）目前在国会开会之前，这一解决方案表明美国国会认同向犹太移民开放巴勒斯坦，而且，现在看来，建立一个“民主犹太共同体”将在六周内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布鲁姆<sup>3</sup>肯定不能在外交委员会阻止这件事，因为他在纽约的政治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他确实可能推动此事。这件事得到麦克科米克<sup>4</sup>与马丁<sup>5</sup>的支持，将会在众议院并最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可以说，这是一个空洞的表示，无需美国人采取任何

---

1 也许伯林准备接受相当于黑手党式的名誉毁谤。

2 雅各布·兰道（1892—1952），记者、出版商，1914年在海牙建立犹太电讯社（当时该机构名为犹太通信局），一家收集与发布犹太人消息的机构，1919年总部迁往伦敦，1922年迁往纽约。

3 索尔·布鲁姆（1870—1949），1923—1945年任纽约以犹太人为主的南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1945—1949年任相邻地区的议员）；在伯林写这封信的时候，任外交委员会主席；1943年为讨论难民问题的百慕大会议美国代表，因为追随美国国务院的路线而没能更多敦促美国采取行动挽救欧洲犹太人而广受批评；曾是娱乐业的推进者，创造了“肚皮舞”一词。

4 也许是罗伯特·鲁特福德·麦克科米克（1880—1955），右翼《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与出版者，坚定的共和党。

5 小约瑟夫·威廉·马丁（1884—1968），共和党议员，其时为众议院少数派领袖。

实质性的行动，在一般情况下将被移送到尘封的档案中，美国犹太人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一定会宣称它是一部崭新的政治宪章，并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场合引用它。国务院显然向犹太复国主义者保证过，它将保持“中立”，而且的确，很难看出他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除了向支持他们的国会议员们询问，谁将提供肯定要用得到的刺刀，好让大量的犹太移民即使面对疯狂的阿拉伯抵抗力量也能强行涌入巴勒斯坦。这是像伯尔那样的人也许会做的事情，不过唯一能够阻止这件事的方法就是在国会引发争论，而国务院宁可怀疑这样的事，也不允许其发生，尤其是这样注定会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胜利。<sup>1</sup>后者正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彻底赢得所有的朋友站在自己一边，如他们在这里说的那样，这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的事。 476

2.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隐约为整件事而烦恼，威廉和我已经试着让他们表达某种看法，不论多么非正式，只需对我们说，这样伦敦的某个人也许会知道解决问题需要在犹太人中获得怎样的支持。犹太人虽然在机构组织方面比较薄弱，但就个人而言却很有影响力。他们也许会制造出一些奇迹，不过我怀疑这样是否有利。同时，他们似乎已经给在伦敦的R.瓦利·科恩爵士<sup>2</sup>写信了，邀请他来访和他们会谈，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也许他是害怕因为某项反垄断诉讼而被司法部投进监狱。不管怎样，伦敦那位普洛斯考尔<sup>3</sup>的主意也许不错——犹太保守党与有产者们没有与他们同类的人可以交谈，我怀疑瓦利·科恩是否是合适人选，他看起来是个虚张声势、不受欢迎的人。塞缪尔勋爵怎么样？或者，他是老糊涂吗？瑞丁勋爵呢？或者，他是否受他妻子<sup>4</sup>影响过多？还是吉米·罗斯柴尔德<sup>5</sup>？或

1 这句话中的讹误无疑在打字正本中改正了。

2 罗伯特·瓦利·科恩爵士（1877—1952），商人（在壳牌集团任职），领导在英国的犹太信徒，此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犹太会堂（自1942年起成为伦敦非常有势力的德系犹太人圣会协会）的总负责人。

3 约瑟夫·梅耶·普洛斯考尔（1877—1971），律师，1923—1930年任纽约最高法院法官，纽约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长期朋友与顾问；在担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期间（1943—1949），他转而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45年担任为成立联合国而召开的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顾问。

4 艾娃·薇奥莱特·蒙德，梅尔切特男爵一世的女儿。

5 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上文第291页注8）。

者,他是否过于执著于犹太复国主义了?如果你可以想到一个合适的大人物,而且,如果你与比我们更高明的人在原则上赞成他(这也许真的能产生严肃影响),告诉我,我会把这样的想法放进人们心中,邀请将适时发出。兰道的看法是,国会决议(我想,它会对阿拉伯人有灾难性的影响,使可怜而可爱的史塔克小姐在她的中西部荒原世界发疯)需要过六周时间在两院通过,而魏茨曼可能只会泼点冷水,如果英国政府保证战后给他一些具体实在的东西,作为当前保持温和态度的代价。我从最近的电报中得到消息,我们不打算做什么,也不打算说什么,直至战争结束,如果是这样,这个提  
477 议显然是不现实的。虽然如此,情况就是这样,不论好坏,也许这什么也不是。当然,你的判断是正确的,犹太人可能有能力在国会设阻,妨碍对委托托管权的任何改变,如果这的确需要说点什么,那就把要说的加入相关报告中。不过,如果我们打算固守,即使是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似乎也是过于缺乏想象力的政策,这样的危险不会发生,我也同意被迫选择巴勒斯坦国籍的威胁很空洞,不论它在优柔寡断者那里作为一个辩论的要点是多么有用。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2月9日星期三发生了一桩事情,虽然伯林本人不在场,此事却为他带来了一生中最高的声望。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sup>1</sup>,往往彼此矛盾,无疑以各种方式被添枝加叶了。这个故事是伯林自己讲述的:

---

1 例如,约翰·科尔维尔,《两个柏林的故事》,《时间的足印》第30章(伦敦,1984),第168—170页,以及《权力的界限:唐宁街日记,1939—1955》(伦敦,1985),第471—472页;迈克尔·弗里德兰,《欧文·伯林》(伦敦,1974),第220—221页;劳伦斯·伯格林,《当众人欢呼:欧文·伯林的一生》(伦敦,1990),第430—432页(来自弗里德兰的叙述,与之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

丘吉尔夫人<sup>1</sup>对温斯顿说：“欧文·伯林<sup>2</sup>在伦敦，他对我们很慷慨”——他给战争慈善团体捐了一大笔钱，我不知道她提到的是哪一家<sup>3</sup>——“如果你见到他，一定告诉他我们为此非常高兴。”

丘吉尔先生说：“我想请他来吃午饭。”

她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丘吉尔俱乐部见到他，”她说，“只要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非常感激他。”

“我想请他吃午饭。”他说，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

他说：“不想太多人参加，小型午宴就可以了。”

于是，他来了，非常激动；在场的有首相、丘吉尔夫人、首相女儿玛丽<sup>4</sup>、政府的组织秘书、詹姆斯·斯图尔特<sup>5</sup>、两位秘书——科尔维尔<sup>6</sup>与马丁<sup>7</sup>，我想，大概就是这些人<sup>8</sup>；他们每个人后来都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我把这些版本混合在一起，于是就大致了解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丘吉尔太太没有说很多，因为她以为我也许很难为情，或是受到冒犯了，于

- 
- 1 克莱门汀·奥格维·丘吉尔(1885—1977)，婚前姓霍兹尔，后来(1965年)成为斯宾赛—丘吉尔男爵夫人。
  - 2 1943年11月欧文·伯林把他成功的音乐剧《这是军队》带到英国，该剧在伦敦首演，然后在各地巡演，2月6日为艾森豪威尔司令的演出使他印象深刻，艾森豪威尔立即安排所有海外美军观看该剧，于是在和丘吉尔共进午餐之后的几天，欧文·伯林和他的剧团开始了危险而艰苦的巡演，一直到1945年底，为北非、意大利、埃及、新几内亚与太平洋的美国驻军演出。
  - 3 也许是红十字会俄国援助基金，克莱门汀·丘吉尔是该团体主席。
  - 4 玛丽·丘吉尔(1922年出生)，丘吉尔最小的女儿，后来(1947年)与克里斯托弗·索亚米斯(1987年成为索亚米斯勋爵)结婚。
  - 5 詹姆斯·格雷·斯图尔特(1897—1971)，后来成为芬德霍恩的斯图尔特子爵一世，1941—1945年任财政部联合政务次官与政府组织秘书。
  - 6 约翰·鲁珀特·科尔维尔(1915—1987)，1940—1941和1943—1945年担任丘吉尔的助理私人秘书；1941—1944年为皇家空军志愿者预备队飞行员。
  - 7 约翰·米勒·马丁(1904—1991)，1940—1945年担任丘吉尔的私人秘书(1945年起为首席私人秘书)；不过马丁当日的日记中并没有提及此事。
  - 8 别的叙述中提及，下列人员中的一部分或是全部都在场：陆军元帅阿兰·弗朗西斯·布鲁克(1883—1963)，后来(1946年)成为阿兰布鲁克子爵一世，1941—1946年任帝国参谋部总参谋，1942—1946年任国王防空司令部司令；布鲁克的第二任妻子贝妮塔·布兰奇，霍拉斯·佩里爵士的女儿；辛西娅·科尔维尔(1884—1968)，1923—1953年担任玛丽女王的寝室女侍，约翰·科尔维尔的母亲；(弗瑞达·伊瑟·)玛丽(“莫莉”)·蒙塔古—道格拉斯—斯科特，布克鲁奇与昆斯伯里的女公爵(1900—1993)，婚前姓拉塞尔斯；以及朱丽叶·奥利弗·亨利(1917年出生)。

是她有意降低事情的严重性，其他人却一点都不想这样。欧文·伯林坐在温斯顿·丘吉尔的旁边，他们的对话不多，彼此心灵没有发生碰撞，丘吉尔太太感到着急了，她说：“你知道，温斯顿，我们应该对伯林先生非常感激，他对我们很慷慨。”

丘吉尔先生说：“慷慨？对我们？我不明白。”

然后是一阵死寂，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她没有理由听说过我。战争在继续，她不打算争论，丘吉尔对他说：“伯林先生，你认为，你最近为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可怜的伯林显然不太理解这个人说的是什么，他踌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应该是《银色圣诞节》吧，我想。”于是温斯顿说：“你是美国人吗？”——伯林有浓重的美国口音。

伯林说：“什么？怎么？怎么？是的。”

于是温斯顿再次转向伯林先生，并说：“你认为罗斯福今年会再次当选吗？”

欧文说：“嗯，过去我本人投了他一票，今年我不太肯定。”

这时丘吉尔先生变得很郁闷，他无法理解他在和谁说话，他仍然以为这是我，显然我的快讯有很强的连贯性，而眼前此人却是个白痴。最后他说：“伯林先生，你认为欧洲战争何时会结束？”

伯林先生说：“先生，我将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当我回到我的国家，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以及我孩子的孩子，在1944年的春天，大不列颠首相问我欧洲战争何时结束。”

温斯顿对此极为不悦，他真的或多或少发脾气了，站起身——午餐结束。

可怜的欧文·伯林回到萨瓦，他和亚历山大·科尔达爵士<sup>1</sup>住一个房间，他对科尔达说：“你知道，丘吉尔先生是英格兰的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不过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丘吉尔夫人很好，我可以一直和她交谈，和他，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明白。”

---

1 亚历山大·科尔达爵士（1893—1956），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电影制作人，在战时往来于伦敦与好莱坞之间。

与此同时，约翰·科尔维尔透露，看来如此令人失望的午餐客人欧文·伯林先生，实际上是个写歌的，并非丘吉尔先生以为的那位写关于美国政界的有趣而又有洞见的调查报告的以赛亚·伯林先生。下面继续伯林的叙述：

温斯顿午餐后立即参加了内阁会议，带着极大的快乐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他请我吃午餐之时，还是反对党一员，他的话大概是这样开头的：“你们一定听说过一件非常失礼而我却很不幸犯下的错事。”<sup>1</sup>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立即引起伯林的留意，然而对它的多次提及必然使其在日后成为一桩轶事。

致约瑟夫·艾尔索普

2月11日 [副本, 1944年]<sup>2</sup>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乔：

当然我欠你一封信，而且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从华盛顿给任何人写信是多么地艰难。我的生活充满了事件，在它们发生时看起来鲜活而重要，但很快就消退挥发殆尽，只在我的脑中留下杂乱的回响，没有可以穿越堆积如山的垃圾文件的通道，全面的疲惫感与第三维空间的缺失——一堆难以名状的体验——仅仅依据这样的体验我就可能意味深长地写报告了。所以我将使自己局限于一种全面的记事，除非它突然中途停止，这对我来说总是会发生，在我说得太多的时候，突然就会出于彻底的

480

1 来自为制作《沙漠岛屿的唱片》与苏·劳利的访谈，1992年4月19日BBC广播四台播出；在播出版中删去的素材被保留还原了。亦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25—126。

2 这份信稿副本上的空缺部分尤为多，打字员无法解释伯林的口述内容，打字正稿没有找到。



尴尬而停下来。

我见到我们朋友写的一些东西，帕顿夫妇<sup>1</sup>，苏珊·玛丽告诉我你非凡的、英雄式的开拓故事，显然那是从扬曼先生<sup>2</sup>那里慢慢搜集来的。我确信他们说的全是真的，并已经坚定地传播了总体印象，虽然没有具体事实，因为身在国外，我无从知道。我发现我和惠特尼军士<sup>3</sup>，现在是中尉了，相处甚欢，他是真正的旧世界的可爱人物，我还发现奇普·波伦<sup>4</sup>关于他近期旅行的谈话充满了智慧，而且我总是发现，即使他是在表达他那毫无同情之心的看法时也是[如此]。

我非常喜欢与A.克拉克·科尔爵士的会面，看来他似乎是扮演老年角色的最好演员——在十或十五年前他一定有点威尔莫特·刘易斯<sup>5</sup>的感觉，还有着二十五岁年轻人的坚定姿态，这显然是他扮演的角色。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那位太有外交官风范的乔克·贝尔福<sup>6</sup>在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啊。那是个彻底的疯子，还有莫尔·科洛思维特和约翰·里德<sup>7</sup>，我甚至都还没有想到他们。贝尔福，古怪，可笑，他所在的外交部的人看到他穿着条纹裤，吐痰，拄着象牙把手的拐杖，戴圆顶高帽，骑自行车，活像爱德华·李尔所

- 1 威廉·塞缪尔·帕顿(1909—1952)，外交官，在驻伦敦美国大使馆任新闻专员直至1945年，1945—1952年为巴黎驻外机关事务局预备队军官，他的妻子苏珊·玛丽，婚前姓杰伊(1918年出生)，后来成为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妻子(1961—1975)，是著名的作家与社交界女主人。
- 2 小威廉·斯特灵·扬曼(1907—1994)，新经济政策律师，托马斯·G.科科兰的搭档，为克萊尔·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提供帮助。
- 3 也许是约翰·海·惠特尼(1904—1982)，商人与慈善家，后来成为驻英大使(1957—1961)，《纽约先驱论坛报》出版者。
- 4 查尔斯(“奇普”)·尤斯提斯·波伦(1904—1974)，柏林的挚友，美国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后来成为驻苏联大使(1953—1957)与驻法大使(1962—1968)。
- 5 威尔莫特·哈桑特·刘易斯(1877—1950)，记者，1920—1948年为《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驻外通讯员中的元老，华盛顿社交界名人。关于他的职业有这样的叙述：“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曾为海斯亨斯的一位老夫人写文章，她非常喜爱自己的两只猫，除非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比她的爱猫更为成功地吸引她。”克劳德·科克伯恩，《困难时刻：自传》(伦敦，1956)，第189页。
- 6 约翰·贝尔福(1894—1983)，外交官，1938—1941年为外交部美洲司负责人，1941—1943年驻里斯本英国大使馆，1943—1945年驻莫斯科(他懂俄语)大使馆，1945—1948年驻华盛顿大使馆。
- 7 约翰·莱·里德(1910年出生)，外交官，1941—1942年驻华盛顿，1942—1944年驻莫斯科，1944—1947年驻安卡拉。

描绘的人物，“宽钩一弯钩”或是“当”<sup>1</sup>，人们经常看见他往后靠着椅背，双脚架在桌上，岌岌可危，事实上他的确后仰摔倒过（他在1940年到1941年间<sup>2</sup>是外交部北美司的负责人，真没想到，这很可以说明问题，不过他比继任者内维尔·巴特勒更有魅力）。所有人心中留下的他最后的生动画面，是 481 [他]站在外交部的桌上，周围围着六七个同事，依次大声喊道“拿破仑！”（贝尔福会默默地摇头）、“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不是）、“亨利八世”（不是）、“俾斯麦”、“哥白尼”，等等等等。“你们都错了，”他说，“我是沉默的威廉。”科洛思维特先生，莫斯科使馆克拉克的一等秘书，是个长得像埃及人的唯美主义者，他的生活弥漫着1927年左右、魏玛德国感伤时刻的芬芳气息，我从在牛津的时候起就很熟悉他了，他是一个可爱、敏感、内心深处饱受纠结的人，小说家格林威·威斯科特<sup>3</sup>的朋友，他很可能在哈佛，过于挑剔，像老处女一样拘谨，烦躁，朋友很少，对于寥寥几位朋友极为忠诚，梦想着得到辉煌荣耀，他的母亲是我见过的唯一真正有着水桶肚的人。约翰·里德也许见过她，里德是一个瘦削纤弱的意大利风格的人物，只有在布加勒斯特才感到快乐，他曾经用他的车送我从华盛顿的几座大桥底下经过，没命地叫喊，不时陷入不合适的反犹情绪，直到遭受我尖锐的批评……这样的一群人如何在莫斯科与A.科尔爵士共事，一会儿在这里加一撮盐，一会儿在那里撒点儿胡椒，无法想象。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会以一些奇特的方式前进的原因了。科尔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莫斯科，我对此提议表现热情，然而，我怀疑这是因为受到了当地上司的压制所致，他们在选举年可怜巴巴地依恋着我，可怜的傻瓜们。

11月我去了哈佛，见到了你的朋友特德·斯宾塞<sup>4</sup>，我觉得他说得上是

- 1 在爱德华·李尔的胡诌诗中，“宽钩一弯钩”有一顶极为花哨的“海狸帽[……]一百零二英尺宽”，里面住得下各种动物，“当”则有一个发光的鼻子。
- 2 1938—1941年期间。
- 3 格兰威·威斯科特（1901—1987），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以小说《祖母们》（纽约，1927）而知名，该书在英国出版时更名为《家族画像》（伦敦，1927）。1920年代住在巴黎，与移居海外的美国团体厮混，包括格特鲁德·施泰因、厄内斯特·海明威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纽约，1926）中的人物罗伯特·普伦蒂斯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 4 西奥多·斯宾塞（1902—1949），学者、诗人，1940—1946年任哈佛大学英语副教授。

个沉思而且讨人喜欢的人，我发疯般地说话，结果我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他彻底压倒淹没了，但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来敦巴顿橡树园<sup>1</sup>时能够见到他。他热情地谈起你，后来我们讨论了两个小时的奥赛罗，他认识我所认识的剑桥与英格兰的每个人，我们默契而自在地畅谈。我对哈佛极其景仰，这里在我看来是唯一足够大也足够自豪、可以产生自成一体的强烈甚至霸道个性的学术机构。我想，如果我还留在美国，我只能在那儿生存下来，即使承  
482 受所有的狭隘与偏见。我很喜欢波士顿，我想我喜欢橱窗里的书要甚于喜欢世间别的一切，当然要甚于任何自然物体。

不久之前我在美国本土长途旅行，一个人，去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那里一切都疯狂旺盛地生长，树林里的浣熊，河里的鱼（令我本人大吃一惊的是，我自己抓了几只，而且那不仅仅是普通的鱼，还有鲟鱼和[ ]鲑鱼），就挨着正热火朝天地造船的凯瑟家的场院。<sup>2</sup>波特兰美术馆馆长在火车上认出我，在他印象中我是西盖蒂先生<sup>3</sup>，那位杰出的小提琴家的伴奏乐手，然而我不是，让他很痛苦——“我都明白了，”他说。显然我也许本可以成为他误以为的那个人，也许还要厉害一点，像黑格尔的信徒说的那样，真的[?]。我们整晚交谈，他告诉我波特兰生活的方方面面，富人是什么样子，在日本被打败之后一切变成了什么样子，的确如此，这里确实充满了贺拉斯·葛瑞里<sup>4</sup>的精神，我深受感染。旧金山就像那不勒斯，住满了本地人，与周围的环境相当疏离。洛杉矶很幽深很黑暗，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了。我讨厌好莱坞，人们要么是[ ]齷齪的，要么就热切地渴望成为别的什么人物，衰败的欧洲遗老以最密集的程度聚积在岩石区潮水潭。唯一令人舒服的念头是，既然所有这些都集中在这里了，他们就不能在别的地方，这么想就

1 一座建于19世纪的宅邸及花园，位于乔治城，罗伯特·伍兹·布里斯先生和夫人1940年捐赠给哈佛，此后该房产用于收藏专业性研究资料。在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这里成为来自美、英、苏、中的代表起草建立国际组织、即后来的联合国的提案的所在地。

2 实业家亨利·J·凯瑟（1882—1967）在华盛顿州的温哥华有一处大型造船厂（与俄勒冈的波特兰隔着哥伦比亚河），在战时紧急状况下的造船计划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3 约瑟夫·西盖蒂（1892—1973），匈牙利出生的小提琴家，1940年定居美国。

4 贺拉斯·葛瑞里（1811—1872），《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与主编、理想主义者、社会改革家，他一直倡导有组织地移民美国西部，1841年他建议他的读者们“把你们的脸转向大西部，在那里建立你们的家园并积累财富吧”。

感到宽慰了。在那里我找到了拉塞尔，去了大峡谷与新奥尔良。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们在洛杉矶车站经历的有趣事情，那恰好表现出了我们二人的性格，这个故事太长，信里不好写，而且需要语调的抑扬与手势的变化，这些也无法诉诸文字。

新年那天我和毕尔太太<sup>1</sup>吃午饭，我见到了使馆的迈克尔·赖特先生与夫人（你见过他们吗？如果没有那就有个话题了）；芙瑞雅·史塔克小姐，著名的阿拉伯探索者，阿拉伯事业的倡导者（我依照不相容原则与她相处甚好）；阿道夫·伯尔先生与夫人；还有N.朗沃思太太<sup>2</sup>，我无法说我有那么喜欢见到她——我把她的信念与伟大的凯瑟琳相类比，这带来了一连串大声叫嚷，为了使大家安定一点，于是就前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进行了温和一些的对话，探讨他们是否会认为怀俄明是合适的作品背景。后来[]大使走了，毕尔太太停下来叫我“以沙·伯林先生”，正要告辞的伯尔先生终于走近我，和我握手，严肃地评论道，他听说了关于我的许许多多事。在这样的场合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也许听说了更多关于他的事，显然这不奇怪，听到这话，他脸色似乎变苍白了，退到一边，低声地自言自语，抓住他妻子的手在她耳边说了什么，然后走了。我的同事们对他的新看法是，他充满魅力，很理智，对他们很仁慈，总体而言是个好官员。国务院的“重组”（恐怕，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国务院的广播）似乎从他手中拿走了经济控制权，把吉米·邓恩<sup>3</sup>放在了常任副部长的位置上。总的说来对于这

1 玛丽·翠丝·奥加·毕尔（1880—1956），外交官特拉克斯顿·毕尔的遗孀；华盛顿的女主人，她以拥有位于拉斐特广场靠近白宫的历史建筑，以及为外交团举办一年一度的晚宴而著名。

2 艾丽丝·李·罗斯福·朗沃思（1884—1980），前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尼古拉斯·朗沃思的遗孀；著名的华盛顿女主人，说话风趣，她生前一直是伯林的朋友。伯林说：“她是一流的有声望的贵妇[……]她希望被逗乐，因此喜欢聪明有趣、有活跃智力的人[……]以及那些让她体验强烈的生活荒诞感的人[……]她喜欢英雄主义、大胆无畏、权力、傲慢、毫不羞愧的野心、伟大人物；她不喜欢含混不清、奴性屈从、墨守成规[……]因而喜欢蔑视自由主义者、不现实的慈善家等，并故意与他们作对。这为她赢得了激进的反动分子的名声（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她相信精英，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一员，不喜欢民主与普通人的美国理想，除了她父亲所接受的主张之外[……]她很聪明，确实是非常机智的谈话者——故意表现出不公正，但忠于并热爱她所喜欢的，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对于她所不在乎的人，她毫无虚伪之意与安抚之心，毫无。”（1985年9月16日，致卡洛尔·菲尔森萨尔的信）

3 詹姆斯·克莱蒙特·邓恩（1890—1979），外交官，1937—1944年任政治关系顾问，1944—1946

样的事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但我相信此刻会让你很厌烦，如果你在做具体事。

共和党的地位很特殊，因为该党在我看来就像一个手里有一大笔零花钱的小男孩，他必须在一定期限之内或是在被没收之前把钱花完，于是他心情兴奋舒泰，在商店橱窗前漫无目标地闲逛，看见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他想要得到然而又不是很想得到的东西，他倍尝可望而不可得之苦，因为如果484 果他等得太久，他也许会发现他想要得到的，可是手中却不再有钱可花了。他们似乎不太想要杜威<sup>1</sup>，然而他们更不喜欢威尔基，布瑞克<sup>2</sup>或是塔夫特<sup>3</sup>也许不会获得选票。所以此时他们处于几欲癫狂的沮丧之中。

大法官人很好，非常好，我得说，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太太特别有可能注意到一切的阴暗面。布莱克法官<sup>4</sup>与墨菲法官<sup>5</sup>突然在法庭上公开攻击他，指控他以私人道德取代法律，等等。在《华盛顿邮报》上有大幅头条（最后替韦恩·科伊<sup>6</sup>弄到了职位，接替尚未退休的梅耶先生<sup>7</sup>），不过事情后来被淡忘了。当他被霍霍地磨着大刀的大个子印第安人包围时，大法官增

-----  
年任副国务卿。

- 1 托马斯·埃德蒙德·杜威（1902—1971），律师，1935—1937年任纽约防止组织犯罪的特别检察官，1937—1940年任地区检察官，1942—1954年任纽约州长；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失败；1944年与1948年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伯林形容他是“一个冷漠、狡猾、按部就班的小个子傀儡”，他评论说“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认为他有信念或是有目标”（1944年7月13日致H.G.尼古拉斯的信）。
- 2 约翰·威廉·布瑞克（1893—1986），律师，1939—1945年任俄亥俄州州长，1944年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 3 罗伯特·艾尔冯索·塔夫特（1889—1953），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总统之子，律师，1939—1953年为共和党俄亥俄州参议员。
- 4 雨果·拉斐特·布莱克（1886—1971），律师；1927—1937年为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支持新经济政策；1937—1971年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自由主义者、公民自由的保卫者，尽管早期曾是三K党成员，但更坚定地忠于宪法。
- 5 弗兰克·墨菲（1890—1949），律师，1936—1938年任密歇根州民主党州长，1939—1940年任司法部长，1940—1949年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民权，尤其是种族与宗教少数派权益的长期倡导者。
- 6（阿尔伯特·）韦恩·科伊（1903—1957），1939—1941年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1941—1943年任总统特别助理和紧急事件管理处联络官，1942—1944年任预算局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助理。
- 7 尤金·梅耶（1875—1959），银行家，1933—1946年为《华盛顿邮报》编辑与出版人，凯·格雷厄姆的父亲。《华盛顿邮报》出版人一职由他的女婿菲利普·格雷厄姆接任。

添快乐气氛的能力十分出色，我想起了E.C.本特利先生的四行打油诗“卡尔·马克思/总是被鲨鱼包围/他痛苦地想念着它们/在他全神贯注地想着资本主义的时候”。<sup>1</sup>我想，是大法官不可摧毁的天真使他如此刀枪不入，我希望自己也有类似的无视危险的能力。那天我发现自己在一次晚宴中重重地踩在了阿瑟·克洛克的一个脚趾头上，当时我没看清楚是谁，就急忙转身[说]我深感惶恐，十分抱歉。“你没有深感惶恐，十分抱歉，”他说，“你也许有点抱歉，我连这一点都有所怀疑，但说到惶恐，我敢肯定你是丝毫也没有的”，等等等等。此后，他平息了事端。因此你看，即使是身体攻击，即使是意外发生的身体攻击，显然在他那一方不经思索地就给予了让步。

485

其他你认识的人都仍在你离开时他们所待的地方。经过军队中的特殊历练之后，普里查德状况极佳，他在军中待了两三个月，就走后门以“过度肥胖”的借口（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调离了。菲利普·格雷厄姆<sup>2</sup>据信将回到华盛顿，担任某一神秘职务。英美关系再一次引起所有人的严重关切，如今确实群情激昂。我倒认定，(a)这不要紧，因为从根本上说，关于英国人，美国人所反对的是(1)他们是英国人，(2)他们存在着，而英国人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亦然，而对所有特性的反对就是理性化；(b)这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为反孤立主义的姿态即便是在布瑞克的领导下也注定会产生，这是个经济问题，因为，我在美国所做的长途旅行中，发现每个与我交谈过的人（我和农民交谈过，你一定窃笑不已）都深深地相信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会着手进行快乐而残酷无情的“割喉”式竞争，大部分的“割喉”将发生在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喉”可以割了；他们好比是巨石一块。在我看来，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对谁都不好，只能通过召开许多十字军式的会议（1939到1941年间所召开的那些）来敦促驱策，并执

1 埃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1875—1956），经典侦探小说《特伦特的最后案件》（伦敦，[1913]）的作者，克莱里休四行打油诗的首创者（参见上文第5页注5）。这一首（来自《初学者的传记》，1905）内容如下：“卡尔·马克思/完全被他的鲨鱼包围了/可怜的生物认真地想念着他/而他却在攻击资本主义。”

2 菲利普·格雷厄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空军情报学校教学，但在伯林这封信写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华盛顿的一个通过破译密码来解读信息的情报部门。

行由头脑清醒的法律文件起草者指定的非常简单而理智的方案，来避免如此局面发生。这样的事情目前看来太不可能了，基思·凯恩<sup>1</sup>与我时不时会谈及此事，互相把对方带入了令人吃惊的郁闷之中。吉姆·福雷斯特<sup>2</sup>说，未来将是一场扑克游戏，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只有非常富裕的玩家才允许加入——也许巴卡拉纸牌戏是更好的例子——这是真正的大事件，出于好意只让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例如，英国就不是）参加，而一般人则不让加入，也许有影响力的圈子已经普遍感觉到这件大事的逼近了。重装上阵的美式炫耀，以及重装上阵的苏联，快乐地买进卖出并持有未来日子的世界和平，其他人则调整自己，好适应这崭新的不必要的双子联盟，就是这样。我想奇普也感觉到这一点了。

486 至于你的敌人J.威利<sup>3</sup>，他到处说自己已经厌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令他感兴趣了，你可以想象，他认为战争将在谁与谁之间打响。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就突然向我的多位朋友痛斥我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由于我所谓的亲俄倾向。我显然是被伊蕾娜<sup>4</sup>邀请吃晚饭的，我先是被试探，接着又被翻来倒去地研究，然后移交给了培根太太<sup>5</sup>，又被他们领回去，各种各样的人检验之后，最后把我再次打包送回家。J.威利现在说我们基本上同意所有观点，与我的谈话在他看来几乎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一位]奇怪有趣的人物，连他自己的亲信都没有认真把他当一回事，他依据自己记下的有关与他交谈过的英国人的零碎笔记，或是温顺的外国人有关此类谈话的笔记而行动，每天下午5点坐在他自

1 里奇蒙德·基思·凯恩（1900—1974），律师，1940—1942年任美国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43—1945年任海军部长（当时为威廉·诺克斯，自1944年5月起为詹姆斯·弗雷斯特——见下注）特别助理。

2 詹姆斯·文森特·福雷斯特（1892—1949），1940年8月至1944年5月，美国海军部副部长，负责采办与生产，1944年5月起成为海军部长，坚定的反共者。

3 约翰·库珀·威利（1893—1967），美国外交官，1938—1940年任驻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公使；1940—1944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

4 威利的妻子，伊蕾娜·莫尼克，婚前姓巴鲁奇，据伯林说，她是波兰籍犹太伯爵夫人，主持白俄沙龙，伯林在那里遇见了国务院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5 弗吉尼亚·穆雷·培根（1890—1980），共和党议员罗伯特·劳·培根的遗孀；与布里斯太太和毕尔太太一起，是主导华盛顿社交圈的三贵妇。

己家里，就像一个被流放的波雅尔贵族，昨天被送到他的国家，等着更光明的时代到来，怀着强烈的忧郁谈论这所有好人都堕落于其中的罪恶[时代]。然而我喜欢他，甚至还有他的妻子。对于萨维奇医生<sup>1</sup>我几乎讲不了多少，他目前正在《时代先驱报》<sup>2</sup>遭受猛烈攻击，该报纸指控古非参议员<sup>3</sup>不适当地施压试图把他送到加林格医院<sup>4</sup>。西西<sup>5</sup>似乎和她的医生有争吵，现在每天在她的报纸上对他口诛笔伐，这对所有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高尚的景象。

你能否筹划着使自己去英格兰一趟，比如说在7月？那时我可能在那儿。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杰出的联盟，巩固关系，制造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布伦登[·布莱肯]整晚失眠，思考着“谁将是这次选举中的萨克威尔—韦斯特<sup>6</sup>？肯定不会是巴特勒吧？”如果你问我，很可能还是温斯顿他自己。奇普说翻译他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首先是在莫斯科，当时英语翻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赫尔先生说的一个词，于是他就被引过去救急，然后只好将诸如“卓越愚昧的深度”之类的，译成轻快的俄语，好给乔叔叔听，真是太令人崩溃了，我能明白。

这个国家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亲英情绪与亲俄情绪彼此成反比发展，如果对俄罗斯人好了，对英国人就差了，而且这种亲切度上升与下降的比率几乎完全一致。我现在已经反复验证过这一点，看来这是一个很站得住脚

1 尤金·康斯坦丁·德·萨维奇(1903—1959)，医生；生于俄罗斯，但在美国获得行医资格，并成为美国公民。

2 一家华盛顿报纸。在2月4日(第2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古非(见下注)失去了他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他从1942年起就试图迫使任命尤金·萨维奇医生，他的门生，担任一个地区公共卫生机构的[工作]职位，这被《时代先驱报》曝光了。

3 约瑟夫·芬奇·古非(1870—1959)，商人，之前被告发滥用政府资金，1935—1947年为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也支持政治赞助，认为这样在组织方面是有效率的。

4 华盛顿市立医院。

5 埃莉诺(西西)·梅德丽·帕特森(1884—1948)，主流报业王朝的成员，小说家、社交界名人，激烈的孤立主义者，曾为《华盛顿先驱报》的编辑，1939年起为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出版人。

6 莱昂内尔·萨克威尔·萨克威尔—韦斯特(1827—1908)，萨克威尔男爵二世，外交官，1881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受共和党诱骗，宣称在1888年大选中更偏向于重新选一位民主党的总统，于是很快被召回伦敦；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的祖父。



的社会学结论。

我收到托尼与非丽西蒂[·兰博德]写来的两封亲切友善的信,对他们与M.N.太太<sup>1</sup>的关系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由此你可以看到,我依然坚决保持轻浮,轻浮的素质受到大使的欢迎,可是这里其他人都不喜欢,虽然如此,这一素质把我本性中严肃的一面局限于学术题目与私生活之中了。我现在知道,庄严与面对公众的严肃态度是处理公众事务至关重要的素质,千万不要相信还有其他什么别的。

3月底伯林被召回伦敦,与情报部门和外交部会谈。他超乎常规的返英之旅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确立了以后的人生发展方向:

1944年我不得不乘坐轰炸机回英格兰。在那个时候,轰炸机没有密封增压,于是我们被告知必须吸氧,这就意味着我不能睡觉,因为入睡后可能会发生无意识地倒靠在氧气管上导致窒息的危险。没有灯光,因而也不能阅读,于是我就只能做一件最可怕的事——不得不思考,而且我不得不在这架轰炸机上思考七到八个小时,从加拿大到英格兰。

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真正想要的是,在我生命终止的时候,我能比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懂得更多;哲学是最奇妙的学科,最大程度地耗费人的智力,人类天才在其中已经展示了它最重要的方面,取得最重要的成就,然而它不适合我。我并不真的迫切地想知道这些哲学问题的答案,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有这样的渴望。我没有彻夜不眠思考哲学谜题,虽然我很喜欢思考这些问题。另外,当我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阅读关于道德与社会的文章,像我总是会

---

1 芭芭拉·莫瑟·纳尼(1965年去世),婚前姓蔡丝,乔治·约翰·查尔斯·莫瑟·纳尼(1912—1999)的美国妻子,1944年她成为兰斯道恩女侯爵八世(并改姓莫瑟·纳尼·佩蒂—菲茨莫里斯)。在伯林所指的1943年11月27日的信中,托尼·兰博德说她“在情报部工作(与达夫妮·斯特雷特关系密切而敌对)[……]我们一起吃饭,参加晚宴,她像以往一样吸引人”;非丽西蒂·兰博德的评论(也许没有这么称许)没有保存下来。她因一次射击事故而在苏格兰家中遇难,其时,这位兰斯道恩女侯爵被描述为“一位极有魅力的女性,成功的社交女主人。她一度在美国经营一家农场,她是一位高超射手,是前英国泥鸽射击比赛冠军”(《泰晤士报》,1965年2月18日,第14版)。

有所涉猎的19世纪俄国思想家们所写的——那些困扰他们的东西，那些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会使我产生智力上的兴奋，而这，我认为，是长期探索一个抽象题目所必须具备的。

我于是对这些思想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仅与现代世界，而且与人类的普遍状况，都有关联；而且，当我回到英格兰，我告诉在牛津新学院——我是那里的研究员——颇感震惊的同事们，我并不真正希望继续研究哲学，但是希望能够转而成为思想史学家。我这个想法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在英格兰这不是一个很受鼓励的科目，彼时如此，如今依然。然而，我承诺在至少两三年内将继续教授哲学，他们就允许我这么做了，因为战争结束后同时返校的学生数量会很庞大，需要有资格的教师来给他们授课。

这样，到了1950年，我不再是专业的哲学家，而是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对19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中。<sup>1</sup>

伯林在英格兰期间一直很忙碌，一边与新学院商谈，向大臣们与同事介绍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他腾出时间在一次关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会议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布兰奇·“贝菲”·达格代尔形容为“傲慢，厌世，不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说的话”。<sup>2</sup>

伯林5月中旬回到华盛顿之前，丘吉尔与两个伯林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 489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4年5月16日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经过非常快捷舒适的渡海旅行，包括六小时坐在帆布躺椅上沐浴爱尔兰

1 引自1979年2月比利时广播电台播出的就《俄国思想家》和《概念与范畴》两书与弗兰斯·伯恩德斯进行访谈的英文原始版本，其荷兰译本在《大声思考》（巴森姆，1980）中以“哲学、历史与自由”为题出版，第171—190页，见其中的第179—180页。

2 见下文第797页。

兰阳光,我已经到了,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比这更舒适更理想的了。

我把忘了交给海关官员的配给票证簿寄回了,最好把它们悄悄送回牛津粮食处。我了解你们的性格,我不接受缺乏全局眼光的建议,即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也不做,虽然那样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每个人都很友善,我的房子整洁有序,厨子脾气很好,总体而言一切都非常好。我周末去纽约,乘坐火车慢慢走,与我的朋友M.纳博科夫结伴而行,我和他共同探讨菲特<sup>1</sup>的诗歌。我在英格兰过得极为愉快,非常盼望九个月之后再次回去。

我现在必须给伍德沃德与史密斯写两封彬彬有礼的信。

爱你们的

以赛亚

〈我会请尼古拉斯帮我捎这封信,我非常健康,糟糕的事情不会发生两次。阳光下我坐在1942年染上肺炎的那个座位,真是太好了。〉

致W. S. G. 亚当斯

新学院院长

1944年5月17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院长先生:

虽然我的行程十分迅速,恐怕还是没能追上索尔特,我想,他现在与你在一起,可以做任何决定。

关于各个教授职位,旅途中又有两个名字出现在我的心中。一个是汤

---

1 阿芬纳西·阿芬纳西耶维奇·菲特(1820—1892),俄罗斯抒情诗人与翻译家。

姆·马歇尔<sup>1</sup>，现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处汤因比<sup>2</sup>手下，根据所有人的看法，他是社会学的专家，具备非常罕见的感知力、原创力与洞察力。我几乎不认识他，不过我相信，汉弗莱·萨姆纳、汤因比、霍德森<sup>3</sup>或是现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处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他的情况。他可能更适合在政治机构工作，不过，如果受到激发，他也许能成为杰出的政治与社会学理论家。我想到的另一个人——这回说的是军事史的职业，如果有缺——是我的朋友惠勒一班纳特，关于他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兴登堡<sup>4</sup>条约所做的出色工作，你无疑会了解。他目前在伦敦的政治战事执行委员会，并被列为（虽然这是秘密）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新成立的学院的院长之一，他曾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间教授。他是个很有吸引力、才华横溢的人，也许你会记得1942年夏天我带他来参加全灵学院的晚宴，当时他住在他那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妹夫西顿<sup>5</sup>那里，他是权威的军事史学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果这件事成为议题，我的确希望能考虑一下他。他非常了解美国政治，如果他在牛津，很值得和他谈谈。通过外交部的政治情报处可以找到他，就在布什大厦的七层（布鲁斯·洛克哈特<sup>6</sup>手下）。

既然我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一串串名字了，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太得寸进尺，如果我向你热情地推荐我的朋友鲍勃·胡克<sup>7</sup>，他是国务院伯尔

- 1 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1893—1981），社会学家；1939—1943年担任（设在巴利奥学院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国外研究与出版处副主任及德国处负责人，1943—1944年任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处，1944—1950年任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
- 2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历史学家，1925—1955年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主任、国际史研究教授，1939—1943年任国外研究与出版处主任，1943—1946年任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处。
- 3 亨利·文森特·霍德森（1906—1999），经济学家；1928—1935年为全灵学院研究员，1939—1941年担任情报部帝国司主任。
- 4 陆军元帅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本内肯道夫·安德·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军人、政治家；一战期间已退休的兴登堡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德军最高统帅；1925—1933年任德国总统。
- 5 特瑞弗·布拉比·西顿（1886—1972），1920—1954年担任李博士解剖学高级讲师，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与约翰·惠勒一班纳特的妹妹康斯坦丝·艾琳结婚。
- 6 罗伯特·（汉密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1887—1970），外交官、银行家、编辑、作家；1939—1940年任职外交部政治情报处，1940—1941年担任驻伦敦捷克临时政府英国代表；1941—1945年任外交部代理副国务大臣、政治战争执行委员会主任。
- 7 罗伯特·G.胡克，美国外交官、国务院伯尔的助手。

491 的个人助手，非常友善，随时都会来英格兰，可能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了，他是战后欧洲国内运输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现正在伦敦集结。他说他只能在那里待一两个星期（我想通过美国大使馆可以找得到他）。我相信他会乐于造访牛津，哪怕短短一段时间，如果那样不会过于超出你的接待能力。他是个很友善的亲英分子，来自加利福尼亚，祖籍波士顿，并在那里长大，他和伯尔以及这里的其他人都很亲近，如果在结束短期英国之行后他能够带着快乐的记忆离开，是很好的事。

估计你现在将见到特纳<sup>1</sup>了，我想，他将要成为耶鲁的历史教授，很快要从公职卸任，这是非常绝密的事情，我不禁想到你喜欢他的慷慨精神。阿奇·麦克利什已经回来了——看来，在所有人中，他与西蒙勋爵相处甚好——他还带回来了那个已经完全走样的故事，欧文·伯林先生被邀请吃午饭，因为他被错当成以赛亚·鲍曼教授<sup>2</sup>，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那个人。

我真的很抱歉，没有见到亚当斯太太。我很感激，如果你能代为转达我的遗憾和歉意。我将每天浏览《泰晤士报》，寻找关于牛津选举的新闻，这样的消息远比这里我周围的那些短暂事件更深地镌刻在我心中。

最美好的祝福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

1 拉尔夫·埃德蒙德·特纳（1893—1964），美国文化史先驱人物，经济历史学家；1936—1941年任职于社会保障委员会，1942—1944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部，1944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2 以赛亚·鲍曼（1878—1950），自然地理学家，1943—1945年担任国务卿特别顾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美国代表团（上文第570页注1）成员。关于午餐邀请见上文第565—567页。

致唐纳德·霍尔

外交部, 国务大臣办公室

1944年5月18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唐纳德:

我几乎不能相信, 在难以置信的快速旅行之后, 我在这里了。另一方面, 我的同事奇迹般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使我相信我确实在这里了。我独自在伦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而这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很奇怪也很令人抑郁。每个见到的人, 都为我离开了大约七个星期而表示了些许惊奇。他们说, 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时间流逝的标志。我唯一发现自身的改变就是突然对所有美国人产生了喜爱, 我想, 这是由于我发现, 与在华盛顿连续待一年半时相比, 重新见到他们时, 他们是如此大方友好。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了霍斯金斯上校, 他更加慈祥了, 告诉我他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试着“把我抓到手”, 并很快邀请我吃了两顿饭。与我交谈的每个美国人似乎都比我的本国同事对我好上、聪明上十四倍。也许这是虚假的温柔感觉, 是由自己很快就会永远离开他们的念头所致。不管怎样, 结果是我产生了强烈的亲美情绪, 一生中还从未有这样的感觉[……]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4年6月2日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真的异乎寻常地好。一回来就发现在爱尔兰与在这里的状况是多么不同, 这是很好的事, 就像发现如今与1942年是多么不同一样。我眼下有点忙碌, 积压的工作还有很多, 所以, 这封信如果写得太短, 还请你们原谅。

我的朋友亚历山大·亚科夫列维奇·哈尔彭也许会给你们打电话，或者亲自拜访。我不记得我是否和你们说起过他。他是个很有教养而且很高贵的老人，是1917年彼得格勒临时政府的第一书记，后来在伦敦成为律师，现在这里为我们工作。他是我与惠勒一班纳特的挚友，是个非常可爱的老派傲慢的人，你可以和他说俄语或是英语。他的妻子甚至比他人还好，一个快乐的老格鲁吉亚公主，毫不做作，脾性极佳。

我的房子继续在有序的管理之中，我们的女佣抱怨我们没有给她生日礼物，我担心她贪心不足，虽然她理所当然地依恋奇尔弗与我。我依然坚持在12月或是1月回英格兰的打算，但谁也无法肯定。每个人都依然非常好、非常专心工作。

法兰克福太太托我向你们表达问候，请向戴维·塞西尔转达我的爱，并代我向他道歉，因为我离开前不断打扰他。

爱你们的

493

以赛亚

〈随信附上我收集的很棒的照片，是去年夏天我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的著名旅行中拍下的。伯林。

睡美人<sup>1</sup>系列是在卧铺车厢拍的，其中有一张是我的旅伴，约翰·拉塞尔。

6月6日，我不会忘记我的生日与伟大事件的巧合。<sup>2</sup>）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Спящая Красавица；见图37。

2 D-Day登陆日是伯林三十五岁生日。

致美瑞雅·史塔克

1944年6月12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在你动身去英格兰之前, 我真的不会见到你了吗? 唉, 在你和以瑟·赖特<sup>1</sup>一起去你的海岛之前, 据悉那是在16日, 我不能去纽约, 虽然18日我会在纽约逗留一天。不过如果你们回来时途经纽约, 或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在真正启程之前要在纽约逗留, 请告诉我, 我会安排在相应的日子去纽约, 如果我可以这么做, 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伦敦是天堂, 而牛津是第七层的天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住了四天, 与塞西尔以及我们的朋友们(你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伯纳斯勋爵已经为沙特阿拉伯写了一首国歌, 并为他们接受, 他在钢琴上为我弹奏了曲子)谈了一两次, 我失去了任何看电报、快件、见要人等等的欲望, 的确, 虽然我害怕这么说, 实际上我开始失去对他们所处理的一切问题的兴趣。在这样的陶醉感消逝之前, 我和我的学院订下了一个约定, 我将在1月回来, 安定下来过沉思的生活(这在我看来真的比我如今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可察觉的东西。当然政治与学术生活一样不真实, 一样没有更深的爱, 没有更强烈的恨, 没有更神圣的原则)。

如果可以, 我将按照你说的带上你, 在意大利威尼斯你的房子那里好好转转, 谁知道呢。不过某一天我们可以从那里一起进入圣地, 不过我还没有急着加入。那天我跟霍斯金斯上校说, 我发现那个巨型大锅里面的配菜不对我的胃口, 我在它的边缘找到位置, 时不时被它的蒸汽烘托而攀爬上来, 徒劳无功而又不太舒服。我想充满深情地告诉你, 我在伦敦就那个话题与各种官员说的感恩话语——关于梅尔切特勋爵<sup>2</sup>如何为我提供了一个当救世主弥赛亚的工作机会(有不错的经济保证), 以及关于伦敦眼中的美国。

1 以瑟·乌苏拉·赖特, 婚前姓朗, 迈克尔的妻子。

2 亨利·蒙德, 梅尔切特男爵二世(1898—1949), 商人, 其时为犹太代理机构联合会主席。除了这份工作会把伯林带回巴勒斯坦的意思之外, “救世主”一词还有别的意思吗?



我真的希望你回信，并说16日以后的某个时间你会在纽约，我真的羡慕你们这么早就回去了，欧洲人可能比除了波士顿及其“周边”<sup>1</sup>之外的人更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个宏伟的国家，它充满活力，充满力量。

7月中旬至8月中旬，伯林休假一个月，远离华盛顿的日常事务与炎热天气。

###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4年8月9日 [手稿]

发自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我最亲爱的父母亲：

我真的很好，在华盛顿刚果巨大热浪袭来之后，我听从了你们的建议，去了山区，不要到处跟人说这件事——在英格兰的人们很正当地认为现在还不是享受的时候。不过我听了四场很棒的莫扎特音乐会，塞吉·库赛维茨基<sup>2</sup>指挥，他是一位伪贵族，看上去120%像并且就是俄罗斯的“小个子犹太人”<sup>3</sup>，周围也都是这样的俄罗斯显贵，如作曲家鲁里埃<sup>4</sup>、保罗·甘斯伯格先生、他的秘书杰许曼女士<sup>5</sup>、伦敦的弗拉基米尔·珀利亚科夫（“奥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Umgebung。

2 塞吉（婚前姓谢尔盖·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库赛维茨基（1874—1951），出生于俄国的美国指挥家；1924—1949年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团长，1940年在马萨诸塞的坦格伍德创建伯克希尔音乐中心并担任主任。

3 伯林此处原文为“жидок”，这是个贬损性的或是有亲切讽刺意味的俄文词语。

4 亚瑟·文森特·鲁里埃（1892—1966），原名阿图尔·谢尔盖维奇·鲁耶，俄罗斯作曲家与音乐理论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先锋派运动成员；在十月革命之后，任公共教育部音乐处负责人；1922年离开苏联，主要在巴黎居住，直至1941年移民美国。

5 恩里埃塔·里奥珀尔多芙娜·杰许曼，婚前姓莱昂（1885—1970），莫斯科实业家、收藏家与艺术赞助人弗拉迪米尔·欧西珀维奇·杰许曼（1867—1936）的遗孀，是画家瓦连京·谢洛夫（下文第697页注6）多幅画作中的模特。

加”)<sup>1</sup>的妹妹，她和真正的伯林是亲戚<sup>2</sup>，所以是我们的准伪亲戚，所有人都俄罗斯味道十足，我进入了这样的氛围中，说着俄语（“伯林先生，您学识渊博，是世界性人物……您的俄罗斯视角非常有意思……”）<sup>3</sup>，过得很开心。然后我去了普林斯顿（那里的哲学教授<sup>4</sup>是英国人）和哈佛，还与迷人、温柔、举手投足都很淑女<sup>5</sup>的阿力克斯·德·罗斯柴尔德在一起，她是盖伊的妻子，住在科德角式小屋里，那里很凉快，很舒服（音乐会也是如此）。我有一所小屋，有自己的黑佣，一切都宁静，极其美丽。14号那天，唉，我回到了华盛顿，不过这已经是在整整休了一个月的假之后了，所以我真的很好。欣德米特—舍恩贝格的笑话以及在爆破小组的拉什，我想都很不错。我还是打算12月到1月间回去，不过如果有困难，也许要再等一个月。R.劳含糊嘟哝了几句关于莫斯科的事，我请他和我认识的三位年轻的新政派一起吃饭，晚餐很尽兴。B.勋爵<sup>6</sup>来之前，我已经走了，这样更好，不会混淆我的忠诚情感。我期待着与韦伯斯特教授度过愉快时光，他是我们的世界组织的谈判者之一，本·科恩是美国那边的谈判者。奇尔弗9号回来了，15日起我们继续回到合租公寓。我不在的时候，我让摩根住在我那里，这样他付给我房钱。你们看见了，我真的比你们以为的更实际了，更实在了，即使我的指甲不是总那么干净。抱歉这封信很枯燥，不过我的确如此平静而满足，仿佛有海风吹遍我的全身。

### 沙耶

- 
- 1 弗拉基米尔·索罗莫诺维奇·珀利亚科夫（1910—1977），俄罗斯出生的作家，政治评论员，笔名“奥加”，《泰晤士报》的固定撰稿人。
  - 2 梅耶·伯林拉比的家族，与伯林的姨妈是姻亲（上文第511页注3）；伯林的祖父多弗·波尔·祖克曼在童年时期被他的姨父老以赛亚·伯林收养之后，改姓伯林。
  - 3 伯林此处原文为：‘Г-нь Берлинь, вы как то и эрудит и в мире бываете ... и русский вид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
  - 4 瓦尔特·特伦斯·斯塔斯（1886—1967），出身英国军人家庭；1910—1932年在锡兰当公务员，业余时间研究哲学并撰写有关著述；1935—1955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斯图尔特哲学讲席教授。
  - 5 伯林此处原文为：jeder Zoll eine Lady。
  - 6 在布兰登的命令之下，伯林在上一次回英格兰时，在比弗布鲁克家住了一周。在那次接触中，就像早先1942年的一次晚餐那样，伯林对弗布鲁克的无礼十分厌恶；后来伯林形容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恶的人”（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感谢莱特福寄来的甜豆，告诉他我爱他，也向史密斯、科，还有玛丽  
496 问好。

致赫伯特·哈特

[1944年10月初，手写稿]<sup>1</sup>

[华盛顿]

我亲爱的赫伯特：

当然你必须接受。我为什么提出在这个题目上半途而废呢？真的只是因为无法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让我研究先验哲学，除了数理类型的；而且，我对[此]并不擅长，也不太感兴趣，用三十年来着手征服形而上学的谬误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太一无所获了。但既然你相信存在非经验主义的要素——不是我们所杜撰的，而是从这个客体本身所发现的——那么你直接的智力责任就是说明真相。逻辑手段是沉闷的，然而很容易学，如果你没有像H.W.B.J.[约瑟夫]那样总是对它发火，为了使自己具备接受对手挑战的能力，你也许必须抽出不知多少个月的时间，结果只是学会它。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件事，因为我自己对此一直无所作为。然而，实证主义与过去一千五百年来的〈的〉哲学对立，这是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值得你甚至为之付出全部才智。你说你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声音来自尤因<sup>2</sup>，那只是因为他是以略微梳理过的语言重复着我们一直接受的教导。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布罗德。可是在比方说艾耶尔与奥斯汀的激烈攻击之下，你会承受不了，艾耶尔与奥斯汀将分别回到瓦德汉姆和莫德林学院，并将建立新的防线。对此，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相信我。对新学院与牛津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样强有力的对抗更有益的了。你会很喜欢当牛津教师，你会比你预想的要更喜欢研究当地战后行政管理问题，因为它们很真切，为捍卫知识等等的

1 这封信被撕去或是蚀掉了一角：在这封信中〈〉=遗漏文字的还原。

2 阿尔弗雷德·西瑞尔·尤因(1899—1973)，1931—1954年任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讲师。

立场提供真正可能的平台，而现实的政治却不能做到这样。我相信，标准与掺假之间将有一场恶战。至于你不通拉丁文或是希腊文的问题，那算什么！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当作古文来讲授，再加上约瑟夫关于我们要念成“某个贼”还是“谁是贼”<sup>1</sup>的谜题，这样的课越少越好。已经有许多哈迪、穆尔<sup>2</sup>、墨菲<sup>3</sup>、唐纳德·艾伦<sup>4</sup>、迈克尔·福斯特<sup>5</sup>、马克拉根<sup>6</sup>这样的人研究这些问题了。对你的约瑟夫，当一个史密斯是最令我满足的事（不要因为这样小小的刺痛就暴跳到半空）。我想，史密斯将会当选院长<sup>7</sup>：他和我和你等于两个导师，如果允许我减少工作量为半个导师，这样我就可以用另外的一半时间研究历史（上帝，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害怕，它几乎已经成为冷漠固执的坚持了）。我看不出可能会遭到什么反对。吸引你并使你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是：足够的智力活动的氛围，与艾耶尔、奥斯汀、汉茨，或许还有像麦克纳伯<sup>8</sup>这样的小角色？还有诺维尔·史密斯、麦金农<sup>9</sup>，除了赖尔与普莱斯以外，我想这点我可以担保。F.魏斯曼博士<sup>10</sup>会在那儿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技术教给我们。你怎么能犹豫呢？律师界唯一的意义，我本该想到的，就是名声与金钱。如果你对后者不太在意，你就一定要放弃它，因为它会自动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灵魂的死亡。至于莫里斯·B.，〈那〉也是胡说

497

1 伯林此处原文为：κλεπτής τις与κλεπτήε τις，这句话重音的变化会导致意义差别。

2 杰弗里·雷吉纳尔德·吉尔克里斯特·穆尔（1893—1979），1920—1947年任莫顿学院研究员与哲学导师，1929—1937年任大学哲学讲师；1939—1945年任职于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从事宣传工作；后来（1947—1963年）担任莫顿学院院长。

3 也许是内维尔·理查德·墨菲（1870—1971），1919—1939年任哈特福学院研究员，哲学导师，1939—1959年担任院长。

4 唐纳德·詹姆斯·艾伦（1907—1978），1931—1947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古典学导师；1940—1945年任职于外交部；后（1957—1971年）任格拉斯哥学院希腊语教授。

5 迈克尔·贝瑞斯福德·福斯特（1903—1959），1930—1948年为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哲学导师。

6 威廉·高尔德·马克拉根（1903—1972），1930—1946年任奥里尔学院哲学讲师（1931年起为研究员），1940—1946年为皇家财政部临时公务员，1946—1969年任格拉斯哥学院道德哲学教授。

7 这发生在10月11日。

8 唐纳德·麦克纳伯（上文第278页注2）。

9 唐纳德·麦金农（上文第278页注1）。

10 弗里德里希·魏斯曼（1896—1959），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成员；1937—1939年任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讲师；1942年起为新学院终身成员，1946—1948年任科学与数学哲学讲师。

八道(因为你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他如今是〈一股〉得到了满足的势力：不太糟糕：很像1900年的意大利。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道德问题，镜像在哪里〈的〉问题，物理学家在说什么，以及关〈于〉什么将总是真实的存在，并非类型理论是否把代数充分简化成了形式逻辑。还有，如果我的余生不想继续进行这样的探究，那是因为我对自己对这个题目缺乏足够的激情，即有足够重要的话要说，有足够重要的东西要坚持，要为之奋斗。而你显然有这样的激情，因为最新的经验主义者也没有说服你，所以除非你说你任由真理被忽略，否则，为什么要迟疑不决呢？唯一会使你真正不喜欢的，可能就是教师休息室里将会有的乏味与痛苦，可是你是喜欢牛津和书籍的，我对此很清楚。到我12月或1月回来时，如果这一切还没有办妥——在奇平·坎[普]顿的生活及其他——你和简仍在两地之间奔波——我会很痛苦失望。我没有拍电报<sup>1</sup>，因为说“是的当然接受”听起来会热切而傻气。关于这事就说到这里了。菲尔金<sup>2</sup>说你斯帕洛失踪了，不会吧？马上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肯定克里斯托弗支持我的意见。

爱你的

以赛亚

11月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sup>3</sup>击败托马斯·杜威和约翰·布里克，罗斯福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四个总统任期。

---

1 HLAH提出要为伯林的回复电报付钱。

2 (阿瑟·)埃利奥特·菲尔金(1892—1968)，国际公务员，阿瑟·索尔特领导下的国际联盟秘书处经济部的成员；担任日内瓦(战时在华盛顿)中央鸦片理事会常务秘书长，负责建立国际非法麻醉品交易监督机构。

3 哈里·S·杜鲁门(1884—1972)，农场主、男子服饰用品商，1935—1945年为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为负责调查战争努力的杜鲁门委员会主席，1945年1月为副总统，1945年4月至1953年担任美国总统。(他名字中间的S不是缩写，而是他的祖父安德森·西普·杜鲁门与外祖父所罗门·杨的名字的折中。)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1944年11月20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达夫妮：

我不能让竞选就这么过去而不指出我打算为自己大大记一功，因为我不仅预测了罗斯福的获胜，而且预测了共和党那边有争议的事情，对此你早在去年中就提出了怀疑。所有那些真正散播恐慌的人，尤其是那些真正的美国专家——格雷厄姆·胡〔顿〕与约翰〔·惠勒〕一班〔纳特〕——关于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著名僵局的预言现在破灭了。如果像我认为的，凯普哈特<sup>1</sup>当选，而戴维斯<sup>2</sup>失败，孤立主义者就会在参议院赢得大约32张的选票。我想政治国际主义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而这个国家在经济国际主义方面看起来很灰暗。

现在我要说我的大选之夜了，它是与大使共进晚餐开始的，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报道并获取报酬的吟游诗人，我已经与后者讲和了，他承认他高估了利普曼<sup>3</sup>对国会脾气的判断，现在允许我全速前进，痛斥我们怯懦而 499  
优柔寡断的朋友和顾问。法兰克福特，感受到了我对沃尔特的情感，给了我一张他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专栏的漂亮影印件，专栏中他提出限制美国的要求，因为美国军队永远都不能侵略欧洲大陆。很令人愉快而且舒服，我随函附上了这份影印件，让你也开心一下，你在某个关键时刻也可以拿它当作秘密武器。晚餐很古怪，因为有肯尼斯夫妇在。他很有魅力，非常聪明；而她似乎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打断了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话，后者正试图记录俄亥俄与密歇根的选举结果——我跟他讲过这两个州的重要性——而恰在那时，她说：“您认为阿奇·麦克利什的早期诗作

- 
- 1 荷马·厄尔·凯普哈特（1897—1979），1945—1963年为印第安纳州孤立主义的共和党参议员。
  - 2 詹姆斯·约翰·戴维斯（1873—1947），1921—1930年担任工党书记，威尔士出生的匹茨堡钢铁工人，1930—1945年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1944年在大选中落败。
  - 3 沃尔特·利普曼（1889—1974），政治记者、作者，1931—1962年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国内联合专栏“今天与明天”撰稿；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初期是自由主义者，后来更倾向于实用主义。

好于他的后期诗作吗？”“嘘，莉迪亚<sup>1</sup>，”肯[尼斯]男爵说。她缄口不言，看起来有所克制了，并努力培养对收音机里发出的喧闹声音的认真兴趣，收音机里突然说：“密西西比的选举报告：罗斯福，7500；杜威，66。”“这很关键，”肯尼斯夫人说，“是吗？密西西比非常关键，它是支持罗斯福的，你支持罗斯福吗？我支持他。密西西比非常关键，这是个绝对多数，我很高兴。你高兴吗？你支持罗斯福吗？”等等，等等，等等。于是不得不让她再次缄口，她看起来一脸的痛苦和茫然。最后，坐在沙发上H勋爵旁边，我坐在她的另一边，她以跟平常一样的大嗓门说道：“他很了不起，这位大使，如此有魅力，如此智慧，如此友善。他以前在这里过得糟糕，是吗？因为慕尼黑事件、绥靖政策，还有其他别的？不过他挺过来了，他们现在很爱戴他，不是吗？他有政治背景，对吧？你是否记得在1939年他比梅纳德还讨厌张伯伦，但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比他以前好多了，对吧？”我只能发出“嗯嗯”的声音，而哈利法克斯勋爵则找了个借口站起身，在房中四处走动，逗他的狗玩。然后有个电话打进来，他走过去和霍普金斯通话，霍普金斯约莫在10:45向他报告，竞选已经十拿九稳了，正如总统之前在海德公园告诉他的。“见鬼，很好，”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将立即致电温斯顿·丘吉尔，把消息告诉他。“我说‘路易丝<sup>2</sup>怎样？’”H勋爵对我们说，“他说，‘噢，她很好，她相当好。’”“他是不是有点醉了？”H夫人问。“有点，”H勋爵说，“我得说和以往一样。”“教授对此有什么话要说？”K夫人天真地问。我对被称为教授表示抗议。“我总是被称为教授，”K勋爵说。不过我答道：“从没有回报的侮辱我得不到乐趣。”

500 我拒绝同时也不想向你说任何关于大选的认真看法，大选进展很顺利，令盖洛普博士<sup>3</sup>恐慌——罗珀如果没有临阵畏缩，他就会大获成功了，他依然试图坚称他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在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密苏里等地方，总统得到的多数票确实最令人满意。有趣的是，

1 莉迪亚·凯恩斯，婚前姓洛波科娃（1892—1981），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女演员。

2 路易丝·霍普金斯，婚前姓梅西，哈里·霍普金斯的第三任妻子。

3 乔治·霍拉斯·盖洛普博士（1901—1984）与埃尔默·罗珀（1900—1971），民意调查先驱，二者预测了罗斯福的胜利，也许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是作为大使馆的业余预测者们的绰号。

瓦格纳参议员在纽约州领先于他，道格拉斯太太<sup>1</sup>（赢了戴<sup>2</sup>的那位胜者）在芝加哥领先于他，卢卡斯<sup>3</sup>也是。塔夫特也许被轻易地击败了（所谓的俄亥俄州投票作弊案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不会闹大）。凯普哈特绝对是个可怕的人，看起来是个真正的骗子，而施里科<sup>4</sup>很了不起。PAC<sup>5</sup>是新工党的开端吗？巴特勒与欧毕说是的，柯亭<sup>6</sup>说不是，我不知道。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G. B. 格伦迪

1944年11月23日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格伦迪博士：

感谢您10月21日的来信，以及您亲切的话语。我非常高兴地听说，您正在忙于你的《修昔底德》<sup>7</sup>的修订版。

我几乎没有听到关于牛津的任何消息，但很高兴得知A.H.史密斯，我一直非常喜欢并尊敬的人，被选为我们新学院的院长了。

至于我，我希望3月可以回家，回牛津，希望是永久性的。我已经为政府效力够多了，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经历，而且与那些必须上战场的同代人相比，我的战争经历无疑更有趣，对此我当然感到羞愧。圣体学院的人中，

501

1 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1900—1980），女演员、歌剧演唱家，1945—1951年任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国会议员。

2 斯蒂芬·艾尔比昂·戴（1882—1950），律师，1941—1945年任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国会议员。

3 斯科特·维克·卢卡斯（1892—1968），律师，1939—1951年任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

4 亨利·弗雷德里克·施里科（1883—1966），1941—1945和1949—1953年担任民主党印第安纳州州长。

5 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上文第454页注3），1943年7月成立以支持罗斯福的连任竞选。

6 英国大使馆官员，负责贸易协会事宜。

7 格伦迪的《修昔底德与他的时代的历史》的第1卷于1911年面世；该书的第2版（几乎没有改动）以及有点推迟出版的第2卷于1948年一起出版。



在这里我能想到的只有戴维森<sup>1</sup>，他是一名少校，在英国联席参谋代表团工作，还有邓内特<sup>2</sup>，时不时从财政部那边过来。我生活得足够舒适，没有结婚，和我的朋友盖伊·奇尔弗合租一所房子，你也许记得他是女王学院的古代史导师，在这里他是很受尊敬的英国粮食外交使团专家。

至于我的官方职务，我很满意在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的级别，并且我还是报告处的负责人，该处是情报办公室的一部分，由来自巴利奥学院与全灵学院的哈罗德·巴特勒领导（他一度是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后来担任纳菲尔德学院院长）——你一定认得他在BNC<sup>3</sup>任职的父亲。我所在的部门很快就会并入外交部，不过到那时我已经走了；目前它实质上是情报部的一个分支。这其实是一场牛津教师的战争——弗兰克斯<sup>4</sup>与莫德事实上控制着伦敦的总部，其他每个人都安排在战略位置上。总体而言，在我看来，我们的同行来运作这个机构并非坏事，这似乎已经永久性地颠覆了牛津人不切实际的恶名，没有谁极端官僚化，或者对士兵与普通公务员苛刻，虽然他们是带有不可摧毁的优越感伪装成临时政府官员的牛津教师。我谦卑地认为，如果您没有在1927年施展手段使我进入圣体学院，我现在不会身处这个位置说这些话，并在此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您诚挚的

502 以赛亚·伯林

- 
- 1 约翰·阿姆斯特朗·戴维森（1906—1966），1925—1929年在圣体学院主修古典学，1939—1945年为柴郡军团少校，1943—1945年为华盛顿英国联席参谋代表团战争顾问团军事助理秘书长。
  - 2 乔治·桑斯特·邓内特（1907—1984），1925—1929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31—1946年为英国公务员，任职于财政部，1946—1947年任职于民用航空部。
  - 3 牛津大学布雷斯诺学院。
  - 4 奥利弗·舍维尔·弗兰克斯（1905—1992），1962年成为弗兰克斯男爵；1937—1945年任格拉斯哥学院道德哲学教授；1939—1946年为供应部公务员，1945—1946年任常务次长。

致阿兰·杜德利

外交部

1944年12月5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阿兰:

[……]

至于我, 我计划3月底回家, 回到新学院, 几乎不在伦敦逗留, 因为在那里我无事可做。这里有一些含糊的议论, 关于让我留下来从事公共服务, 据说我已经形成了不可救药的興趣, 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具体进展, 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领导这个团队的迈克尔·赖特认为我适合从事外交部的某项工作, 他打算就此给D.斯科特爵士写信。这听起来很舒服很有吸引力, 但我生性是个爱待在家里的人, 而且不太确定是否有什么工作需要做(而没有事干会让我感到不安和不快), 而牛津似乎非常具体(虽然我敢说, 就像马戏团的老马, 当呼吸到公众撒来的锯末时, 我会发疯似的嘶叫, 并使我的同事烦躁, 就像新学院的已故院长, 总是一成不变地以这句话作为他的开场白: “当我在内阁的时候……”)。如果D.斯科特爵士对此无意说了什么, 我会很好奇地想知道反应如何。压根儿就没有人(至少是在情报部, 不过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有关消息。我很高兴达沃尔<sup>1</sup>最后着陆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在丹佛; 杰[拉德]·坎[贝尔]爵士对此一点也不自在, 如你想象得到的那样。我想, 哈罗德·巴特勒已经聪明地婉拒了国务大臣给他的提议<sup>2</sup>, 说这个提议不适合他的性格与年龄。布兰登[·布莱肯]据说正努力要把他变成伊顿的校长。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工作(在外交部的权杖之下进行的, 我希望, 是自1月1日起。阿奇·麦肯兹会在临近圣诞

1 弗兰克·昂雷·达沃尔(1906—1987), 1939—1945年担任情报部美国司副主任, 1945—1946年任驻丹佛英国领事(伯林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就是此次任命), 1946—1949年任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在伯林后来的回忆中, 他是一个“漫画式自由主义者”(上文第365页注1中引用过的与尼古拉斯的访谈), 达夫妮·斯特雷特觉得他如此让人无法忍受地乏味, 她在场时她甚至忍不住打哈欠或是咯咯傻笑。

2 未找到。

节时拜访你)。在白宫我有两个新的消息来源，时不时在德鲁·皮尔逊之前获得独家新闻的念头，使我交替经历着快乐与羞愧的体验。我真的必须回归文明的习惯与现实的价值观，让那些小道消息就止于流言蜚语吧。

你永远的

503 以赛亚·伯林

致纽约客商店

1944年12月7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先生们:

请你们给华盛顿特区, 范尼斯街4624号的约翰·G.立夫太太寄去一顶阔边斯泰森毡帽(7¼号, 浅灰色), 我想价格大约十美元, 我想要买的是最宽大的那一款。不胜感激。

如果你们能够告诉我准确价格, 我会乐于立即给你们寄去支票。

你们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4年12月12日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对自己过度的沉默, 我感到深深的惭愧, 不过马上就要做出弥补了。这里一切都 very 宁静, 我的家务事十分有序, 身体也很好, 我目前的计划是在3月底之前回去。

我真的很高兴史密斯当选, 因为他是个非常和蔼与优秀的人, 是我们的挚友。我收到他寄来的亲切的来信与电报, 感谢我对他的祝贺, 还有学

院其他研究员谈论学院各种事务的来信。这边我的上司有点不太乐意让我彻底离开政府服务部门，不过我不知道关于把我留在某个职位上的各种模糊计划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我对此既不鼓励也不反对，不过我拒绝四处走动并等待这样的安排，仅仅为了得到拒绝他们的快乐。巴黎大使馆那边传来一条含糊的信息，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到那里去一段时间，可是不认识法国人，也不特别喜欢他们，我认为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听起来这个提议很冷淡，没有快乐可言。

你们的朋友西蒙·利伯曼先生<sup>1</sup>写了一本很可爱的书(俄文的)，关于他与自列宁之后的早年苏联名人之间的交往，他就此询问过我的建议(关于英文翻译方面)。这本书对苏联早年木材组织有太多细节的描述，不过可能你们会对它有兴趣，我打算最近把这本书寄给你们。检查员可能会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不过我会尝试用外交公文袋装上这本书通过某位官员带给你们。 504

盖伊·德·罗斯柴尔德已经从巴黎来到这里，处理一些犹太事务，我希望从他那里听到维克托·R.的消息，维克托也在巴黎。米利亚姆据说心情很低落，我不知道她的胎儿有没有再次死产，如果确是如此，我就明白了。

至于我，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引起兴趣的消息。我很久没有去纽约了，不过上次在10月去的时候，我给拉斯金太太打了电话，他们的绯闻似乎和从前一样。我也许会去纽约过圣诞节，那样我就要好好找他们问问，了解所有人的消息，等我永久性地回家后就说给你们听。我想，你们的伯恩茅斯方案<sup>2</sup>在我听来好极了，我深信温和一点的气候对你们大有好处，至于那里与牛津的距离，我想，大约仅需要三个小时，在我远涉大洋来到这里之后，这点距离在我看来不算什么了。阿普特一家突然又疯狂地追逐我了，而莉莉

---

1 西蒙·伊萨维奇·利伯曼(1881—? 1960)，在革命前是孟什维克，是俄国富裕的木材商人，为共产党政权工作，直到1926年离开苏联；他是亚历山大·利伯曼(上文第430页注3)的父亲，在亚历山大的讣告中，他被描绘成“一位享乐主义者，奢侈生活的热爱者[……]以其一尘不染的外表而著名”：《泰晤士报》，1999年11月27日，第24版。他的书为《东西与人：在苏联的建设中》[纽约，1944]，英文译名为《建设列宁的俄罗斯》(芝加哥，1945)。

2 伯林的父母计划1月在那里度假。

安娜，那个女孩，被他们送来华盛顿看我。在我看来，她令人难以置信地沉闷、乏味，哪儿都很令人尴尬。阿普特夫人（或者阿普特斯，如他们在这里自称的那样，忠于故国）<sup>1</sup>，显然有意要把她安排给我做伴，可怜的女孩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可是这对母女之间也许很虚伪。我目前已经成功地避免了与她父母会面，尽管收到他们发来的到纽约和他们一起住的恳切邀请——他们的生意似乎进展很好，像这里所有人在经济繁荣期一样——不过你们真的不需要警告我不要和他们走得更近。我自己能把这件事处理得足够好，即使这意味着我要有意地不断冷落他们。最近的一件令人难为情的事，是阿普特太太突然寄给我一盒袜子，为此我将不得不坚持付钱；我不知道要多少钱（袜子质量很好！），她会拒绝收钱的，我们可能要度过一些可怕的光光了，这一切都是喜剧性的调剂。

505 阿伦森夫妇似乎消失在北卡罗莱纳州了，音讯全无，这样更好。我从近期来自她国家的访客那里收到了伊达的问候，他们一家似乎很好，很受周围人尊敬。

再说回阿普特们，所罗门<sup>2</sup>似乎在所有地方意外出现，阿富汗，他在恐怖的环境中报告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死讯；美国的阿普特们对以如此无情的方式把这样一条很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诉他们感到很不高兴。我是从莉莉安娜的单独来访中知道这一切的，但愿这样的事不再发生。阿太太不快地打电话来，我编了一些理由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能去纽约，真是很惬意的事，恰逢阿小姐从她的新英格兰大学回来，而再次见到她将是多么令人愉快。我的天啊，亲戚朋友们都使我们变成了怎样的反面人物啊。

我和列纳顿<sup>3</sup>吃了顿愉快的午餐，他说，如果有业务机会，他会通知你，我猜想眼下这样的机会不太多，我期待着木材业将组成卡特尔联盟。下周

---

1 一句奇怪的评论，因为在康斯坦丁·阿普特的家乡，拉脱维亚东南部的德文斯克，这个名字常见的拼法是“阿普特”。

2 所罗门·编杰列维奇·阿普特，康斯坦丁的兄弟（上文第424页注1）。

3 杰拉德·列纳顿（1896—1952），商人，1941—1946年任福伊·摩根公司董事长，家用木材制品部经理。

我将见到老迈的丹<sup>1</sup>，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很久以前的旧时代遗老，从历史角度来说他也许很有趣，就要满九十岁了，据说还很有活力。

法兰克福特夫妇很好，他们要我向你们转达他们的爱，奇尔弗先生也是。在我最后回英格兰之前，我也许会，虽然这还很不确定，乘火车南下去墨西哥，只是为了看看那片壮丽的土地。我最后见到了货真价实的苏联外交官，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了莫斯科一定要和他一起住。怪事发生了，大使馆鼓励我教化他，或许我会这么做，因为我们与他们的国家之间崭新而美丽的时代已经来临。问题是，他是犹太人吗？有一些明确的迹象，指向这个猜测，然而我不能肯定；他1906年出生在莫斯科，反方证据；他的名字是格洛莫夫<sup>2</sup>，反方证据；可是他的嗓音与举止，还有他的妻子，这些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结论。我早晚 would 知道真相的。（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如果你们这么做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会遭罪。）

哈利法克斯勋爵对我的离开得体地表示了难过，他依然对每个人说我和欧文·伯林的故事，有时候我不得不自己跟别人说这个故事，有时候他乐于这么做。他那位失去双腿的儿子人很友善。

506

我收到福克太太的来信，询问他丈夫在新学院前途如何，她认为身处华盛顿的我应该比身在牛津的她对这个问题更清楚，等等。不要对她提这件事，一定。我会以适当的模棱两可的方式回复她的盘问，而这正是我所能做到的一切了。我在道德上确信，她的丈夫，虽然人很好，也有能力，实际上将不会获得新学院的研究员席位<sup>3</sup>，不过我会试着温和地告诉她，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根本就不要对她说破此事，借口自己毫不知情。

约翰·福斯特<sup>4</sup>据说住在巴黎的一间舒适公寓里，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1 可能是费尔多·伊里奇·丹，原名费尔多·伊万诺维奇·古尔维奇（1871—1947），医生、孟什维克，1922年被驱逐出苏联，伯林或是他的打字员夸大了他的年龄。

2 阿纳托里·波里索维奇·格洛莫夫（1907年出生），真名阿纳托里·维尼亚米诺维奇·戈尔斯基，1944年9月起任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华盛顿特工（代号瓦迪姆），由于他之前在伦敦待了四年，他还曾是剑桥间谍集团的控制者。如伯林所怀疑的，他是犹太人。

3 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参见上文第380页注3。

4 此时他是一名公共服务机构的准将。

他。既然我有法国人罗斯柴尔德这个关系，我去巴黎的时候料想会过得很舒服的。

真的，这封信越写越没有什么内容了，我得停笔了。我的感情生活波澜不惊，没有什么打扰我，我说的是真的。〈（我的“朋友”<sup>1</sup>六个月前就离开美国了。）〉这和1939年那次在牛津一个样。我不能真正为去世的博尔特先生<sup>2</sup>感到太难过，我不太认识他，他为人也不是太好。我收到玛丽·费希尔的一封信，说他的妻子选择在院长公寓自杀是多么令人厌烦，那时候她才刚刚搬出去，这听起来很居心叵测，我得说。天哪，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多么无情啊。听到杰斯帕·里德利阵亡<sup>3</sup>的消息我真的很痛心，到现在还是无法给克里西达<sup>4</sup>写一封得体的慰问信。我在战争时期过得太过舒适安逸了，想到我能够很快见到你们，真好。〈抱歉这封信如此空洞，令你们愕然了，不过我真的快要回家了。

爱你们的

以赛亚

沙亚？

沙耶？

或是像有人提议的“夏尔”？

507 你们喜欢哪一个昵称？〉

---

1 帕特里西娅·西比尔·道格拉斯夫人(1918—1991)，十一世昆斯伯里女侯爵之女，因此也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奥斯卡·王尔德的“波西”)的外孙女；其时与约翰·德·本德恩伯爵结婚，后者一从意大利战俘营获释，她和女儿就离开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战时住所，回到英格兰。

2 戴维·博尔特，心脏虚弱，11月1日去世，仅三十四岁，他悲痛欲狂的妻子南希·帕特里西娅·诺拉·博尔特，二十三岁，两天后自杀。

3 1943年12月13日，意大利，当时他在国王皇家步枪部队服役，任中尉。

4 见下文第625—628页。

致罗宾·克鲁克香克

1944年12月12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罗宾:

就是这个了。<sup>1</sup>按照分毫不差的规格, 关于木材的类型, 棺盖上肃穆的装饰浮雕图案, 来订购自己的棺材, 是最惬意的事情了。我觉得像莎拉·伯恩哈特<sup>2</sup>: 再加上一个雏鹰, 也许还有个西哈诺, 然后是靠近门冬的小农场, 一束发黄的书信,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佣, 她听得懂主人口中日渐含混而喋喋不休的话语, 说起亲王本人常常亲自顺道来访的日子。

我忠诚的阿奇博尔德<sup>3</sup>将把城里所有的闲谈都告诉你, 这不像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希望他们都那么说。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安迪·罗根<sup>4</sup>

《纽约客》

1944年12月14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罗根先生:

感谢您12月11日的来信。<sup>5</sup>无论如何, 恐怕一直要到明年的某个时候

- 
- 1 也许是关于他的华盛顿工作的备忘录, 为罗宾·克鲁克香克以及任何他的继任者写的?
  - 2 莎拉·伯恩哈特, 婚前名为亨丽埃塔-罗西尼·贝尔纳德(1844—1923), 法国女演员、剧院经理。她在失去一条腿之后继续演戏, 一直到老年; 在她扮演过的众多著名角色中, 有埃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大鼻子情圣》)中的罗克珊, 以及同一作者的《雏鹰》中的赖希施泰特公爵; 她在南布列塔尼靠近门冬的地方有一处居所; 在她众多的情人中有一位是亨利, 利涅亲王, 她与他育有一子。
  - 3 阿奇·麦肯兹。
  - 4 安迪·洛根(女), 婚前名为伊莎贝尔·安·洛根(1920—2000), 记者。
  - 5 要求采访伯林: “在一些群体中, 您正在成为一个传奇(我指的不是那桩了不起的欧文·伯林



我才能去纽约,那将是我在永久性地回到英格兰之前的告别之旅。不管怎样,在贵刊,一家我最热爱与仰慕的、非凡出众的刊物上,或是任何其他公开出版物上,提到我的任何事,我都会深感痛苦,因为我对个人的公开宣传甚为恐惧(也许这不太理智),相对而言这方面我一直得以幸免,令我甚为宽慰,关于热爱与仰慕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不是随意之语,除了把自己作为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贡献出来之外,如果我还可以做什么令编辑们高兴的事,任何时候我都会乐于做。

我从您的一位华盛顿的撰稿人那里得知,您只对纽约名人有兴趣,也许这一点就自动把我排除在人选之外了;我真诚地希望,我不太愿意依从您的非常令人愉快的提议,不是出于一时的谦逊,而是建立在深刻而不可动摇的信念之上,即这是对您宝贵时间与才智的不幸浪费。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亨利·普莱斯

1944年12月18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亨利:

那天我给你发去了一封很长、我希望不至于太含混不清的电报,你关于哈特的信9日收到,因为它被寄到纽约了,这无疑是因为那是留在新学院官方手中的最后地址,不过,事实上自从1942年起,我就已经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我心存猜忌因而向有关部门隐瞒了这个事实。你说在12月中旬可能举行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

现在,来谈谈这个话题本身:我已经认识赫伯特·哈特十二年了,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一个,如你所说,有着一流才能与哲学专业能力的人。在我看来,他的主要优势是:

-----  
与丘吉尔的传奇故事),而我们这里是以对传奇刨根究底为特色的。”

(a) 他有一颗总体而言善良、坚强、优秀的心灵，有清楚阐述讲解的能力。我依然记得他是乔维特学会的主席，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一个优秀而可以信赖的库克·威尔森信徒。<sup>1</sup>自那时起他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因此非常自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确实，我对即将发生的事略知一二，因为大约一两个月前，他本人就此事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请我保密。令他饱受折磨的事实是，他将永远都不会比尤因更优秀，也不会持与尤因不同的见解，他自己意识到，这不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心态，无疑，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与说外语的才华卓绝的知识分子们，加上一位才华略低于他们但是和他说同样语言的同胞为伴，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这是令人备尝可望而不可及之苦的体验。虽然如此，即使出于这样的情况，他也不会比尤因更差，尤因有其独到之处，毕竟是不可轻视的。我感到新学院需要至少两位哲学家，其中一位，只要是在单纯的卓越思维能力与哲学“智力高度”（吉伯特·赖尔过去常常使用的说法）可及的范围之内，我们就能从他身上获得一切。我根本不太了解乌姆森<sup>2</sup>，不过想象中他应该具备这一切特点，或者终有一日会具备这一切，而且，也许一两年后会出现同样具有如此天分的人。然而，只要文学与人文学科大致保持如今的模式，另外一位应该能够扎实地讲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可能还有形而上学，甚至政治学，并且大致提供传统课程的可靠背景。这样会取得平衡，而在这二者中，具备其中一个方面所需天赋者，鲜能兼具另一方面所需的天分，虽然肯定会有例外。现在我的看法是：如果我逐渐淡出全职哲学家的身份，或是正式的哲学家身份，也许顶替我职位的人选，比如说，可以在两三年内（或者更早，如果时机成熟）成为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具备杰出修养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与学院传统相称的、既能授课又能写作的人，这一点，我向您承认，赫伯特·哈特恰好符合，既没有高于也不低于这个要求。不过我确实认为，如果

1 约翰·库克·威尔森（1849—1915），1889—1915年任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讲席教授，1901—1915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对在牛津教学中确立认识论实在论上颇具影响力。

2 詹姆斯·奥佩·乌姆森（1915年生），1934—1938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38—1939年为莫德林学院四年级半津贴学生，1939—1945年任研究员，1945—1946年任基督教堂学院讲师，1946—1955年为研究学者。

哈特愿意来，他将成为一位非常令人佩服的主科教师，而不是达到无人可及的高度或是身怀印第安人攀缘悬空绳索那样的绝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仅仅只是层次高一点的唯命是从的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我以为，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不容藐视，他比这样的人要更加出色，他会成为一位弗兰克·哈迪，而不是资历与时代背景多么优越的长着络腮胡子的亚里士多德派。我确实赞同你所暗示的意思，即使你没有明说，即一个纯正的<sup>1</sup>哲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不仅仅是一位非常聪明、对哲学有兴趣、擅长哲学并将其作为嗜好的人，不论他是多么吸引人。如果哈特愿意，首先，教授这些额外的逻辑科目，其次，不论怎样，掌握罗素“实证主义”语言，我相信他做这两件事都不会违背他自己的信念，我肯定，他会是学院在这个方向所能得到的最佳人选，如果院里愿意在战争结束与军队回来之前进行选举。

(b)当然，哈特会成为一位可敬的同事、学院导师，等等，他生来就有学监的庄严气质。我抱有怀疑的倒是，他是否会在大学里工作到退休，还有他是否会写出非常值得铭记的著述（我远没有这样的资格说如此鄙薄的话语，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我不记得他曾经说过，要写一本反对艾耶尔的书，虽然他显然对写点关于或是反对艾耶尔学说的东西很着迷。已故的霍尔姆斯法官<sup>2</sup>有一次把好律师分为“剃刀”与“称手的厨房用刀”，无疑这样的分类省略了许多其他类型——铡刀（像塞西尔·雷德克里夫<sup>3</sup>）、剑尖锐利的无刃轻剑（像约翰·斯帕洛），等等。在这样的分类下，赫伯特·哈特是一把修长的面包刀，他的所有作品将酷似尤因或是布罗德走过大街的坚实脚步，不会显现有新意、令人激动的东西，或是掺杂着令人不安的新鲜感的老东西，不论真实与否，也就是说，他的著述会有用处，成为教师中有活力的部分，而且绝对不容轻视，但没有原创性，也不受非常识的狂热的影

1 伯林此处原文为：pur sang。

2 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1841—1935），1902—1932年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美国法律系统与宪法方面的杰出专家，以犀利与机智的观点而著名；他所写的视野开阔、文笔优美的文章一直特别适于引用。

3 伯林指的应该是西瑞尔·约翰·雷德克里夫（1899—1977），1922—193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62年封为雷德克里夫子爵一世，王室法律顾问团律师；1939—1945年任职于英国情报部，1941—1945年担任主任。

响，而这在我看来是作为有影响的哲学家所必需的素质。我不是说他会成为口才出众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像达西神父<sup>1</sup>），或者仅仅是个值得敬重的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可以说，他至少和马博特<sup>2</sup>一样好，很可能还要好得多，不过他将身处牛津年轻一些的哲学家所构成的主流之外，作为一位非常可敬的人物，但既不是新潮流的领袖，也不是追随者。我的天，我好像是在为《牛津杂志》写讣告。

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正确主张（并十分赞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学院的专业声誉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假如有一位犀利而有原创性的“现代主义”同事，哈特将是可以提供指导的最佳哲学导师，但在学院内要适当地[提供]全部人文学课程。我想，有一件事很确定：如果他认为他并未与时代潮流并肩而行，而是挣扎于一潭死水中与世隔绝，那么他将会是首先坚持要离开我们的人。这些就是我给你发电报的理由，但我想，这么做并非是向您强调我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而是对您提出问题的答复，而对于您的问题，我同意正确的答案应取决于：

(1) 候选人对罗素语言的理解。我认为这不会使他发疯的，相反他会因此充分学习它。

(2) 他在认识理论与相关逻辑理论方面有个人见解吗？我认为他有。那就是说，他持库克·威尔森派的观点，不是原创的，但也不像约瑟夫派那样是毁灭性的，虽然有点老派。即便如此，这些观点却得到有力的坚守与护卫。对奥斯汀理论进行足够的接触必能使他获得必要的训练。

(3) 我不知道他在道德与形而上学方面的观点。

(4) 他会写出好书好文章吗？我对写书很怀疑，不过，如果他坚持研究这个学科，他很有可能写出大加利<sup>3</sup>那个水平的文章，而且会大大高于莱尔

---

1 马丁·西瑞尔·达西牧师(1888—1976)，耶稣会会士、哲学家、罗马天主教的主要辩护学专家(伊夫林·沃的告解神父)，1932—1945年任牛津大学坎皮恩学院院长。

2 约翰·戴维·马博特(1898—1988)，哲学家，1924—1963年任圣约翰学院研究员，1930—1963年任导师，后来(1963—1969年)担任院长。

3 伊恩·加利(1907—1948)，布莱斯·加利的兄长(不是长兄)(见上文第187页注1)；1926—

响，而这在我看来是作为有影响的哲学家所必需的素质。我不是说他会成为口才出众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像达西神父<sup>1</sup>），或者仅仅是个值得敬重的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可以说，他至少和马博特<sup>2</sup>一样好，很可能还要好得多，不过他将身处牛津年轻一些的哲学家所构成的主流之外，作为一位非常可敬的人物，但既不是新潮流的领袖，也不是追随者。我的天，我好像是在为《牛津杂志》写讣告。

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正确主张（并十分赞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学院的专业声誉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假如有一位犀利而有原创性的“现代主义”同事，哈特将是可以提供指导的最佳哲学导师，但在学院内要适当地[提供]全部人文学课程。我想，有一件事很确定：如果他认为他并未与时代潮流并肩而行，而是挣扎于一潭死水中与世隔绝，那么他将会是首先坚持要离开我们的人。这些就是我给你发电报的理由，但我想，这么做并非是向您强调我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而是对您提出问题的答复，而对于您的问题，我同意正确的答案应取决于：

(1) 候选人对罗素语言的理解。我认为这不会使他发疯的，相反他会因此充分学习它。

(2) 他在认识理论与相关逻辑理论方面有个人见解吗？我认为他有。那就是说，他持库克·威尔森派的观点，不是原创的，但也不像约瑟夫派那样是毁灭性的，虽然有点老派。即便如此，这些观点却得到有力的坚守与护卫。对奥斯汀理论进行足够的接触必能使他获得必要的训练。

(3) 我不知道他在道德与形而上学方面的观点。

(4) 他会写出好书好文章吗？我对写书很怀疑，不过，如果他坚持研究这个学科，他很有可能写出大加利<sup>3</sup>那个水平的文章，而且会大大高于莱尔

1 马丁·西瑞尔·达西牧师（1888—1976），耶稣会会士、哲学家、罗马天主教的主要辩护学专家（伊夫林·沃的告解神父），1932—1945年任牛津大学坎皮恩学院院长。

2 约翰·戴维·马博特（1898—1988），哲学家，1924—1963年任圣约翰学院研究员，1930—1963年任导师，后来（1963—1969年）担任院长。

3 伊恩·加利（1907—1948），布莱斯·加利的兄长（不是长兄）（见上文第187页注1）；1926—

永久的回归，会带回一系列全新而陌生、可重现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从我身边，从那个我们被告知其目的恰是为了使我们与盟国关系恶化的环境中直接收集而来，因为说到这些尤其令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另外，我对外交文体有了一些了解，在某一方面它是更为充分的工具，为了表达出我们对外在世界不甚全面的了解，它是如此细致谨慎，态度模糊，同时又非常精准地达到情感与意动趋向需要达到的程度；所以我在这封信中，对你提出的关于哈特能否写出值得重视的著作的问题，不止一次地禁不住想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出，令这种猜测不会成真的情况也许不会出现，虽然我不太清楚，目前是否有足够理由认为，这种情况是否实际上一定有产生的可能，当然，也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最好要想到，是否实际上采取了任何步骤，以应就所谈论的问题而言所能想到的形势发展。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没有”。

先生，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很荣幸能够成为您最谦卑与最顺从的奴仆。

以赛亚·伯林

致唐纳德·霍尔

外交部

1945年1月8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唐纳德：

[……]

我本人对您所做的努力非常感激。我不知道去外交部本身是否有可能或是否合意，但即使是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处待上一个小时，这样的想法都 513 让我忍受不了。我很了解它的成员与组织，它是自1940年以来，一个最不快乐的集体，在心高手低的〔阿诺德·〕汤〔因比〕的糟糕领导之下，成为外交部沉闷的基层，集合了一群不幸的心灰意懒者，其中当然不乏比其他优秀得多的人，然而所有人都处于绝望的道德自卑感之中，他们是一群穴居人，

在首领的号令之下颤抖,但另一方面又怀着牛津人的智力优越感,因此心中满是压抑的忿恨。我在伦敦的时候拜访过在俄罗斯处工作的朋友希尔<sup>1</sup>,那里不仅死气沉沉,而且我定然是无法给它带来活力的,因为它的领导者是以公开的、也许是它应得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它。所以我真的更愿意接受在牛津等待我的更乏味的工作,而不是在那个可怕的渊藪中腐朽。请一定不要觉得我挑剔得令人厌烦;1940年,我会做这份工作,因为当时全民总动员的气氛,也许以后我也会;可是在1945年,这是毫无意义的自轻自贱;他们也许对你说了这份工作是多么有影响的话,等等,我太清楚了,人们对外交部研究处是什么态度。如果我是像[阿兰·]达德利那样的专业人士,我想我会考虑这个提议;很幸运我不是他。所以,如果这件事被提出来,请一定跟他们说,我很感激这个提议,对此我深信不疑,可是我更希望不被当成这个职位的人选,虽然任何邀请都是对我莫大的恭维。“无生气的范畴跳起超自然的芭蕾”。<sup>2</sup>你是否真的见过我在那样的舞台上演出,和那样的团队一起?不过请不要认为我向您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是对您不抱感激之情;请不要因为我更喜欢待在我的南海小岛,和贫穷的奴隶们在甲板下一起生活,就把我想得太坏。我恳求您,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嘲弄的话语传给您很容易受惊的同事们,不过自从1940年我为它做了一点小小的工作起,我就一直都受到汤因比先生治下机构的恐怖折磨。但愿是我对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几位我最好的朋友就在外交部研究处工作”)不够公正,不过只要稍微想到他们,我还是有点要呕吐的感觉。所以,我想,你[不]会吗?真的,真的吗?你一定不要这样把我给害了。

现在形势如此,阿奇·麦肯兹这个月要去伦敦,1月或是2月回来,这样

1 1945年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外交部北方司的俄罗斯处工作。

2 在伯林所写、迄今尚未出版的研究“物质”的早期论文中,伯林写道:“布莱德利在他所做的伟大演讲的总结语中宣称:‘这也许是由于我的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一个失败,或是由于一直蒙蔽了我的双眼的肉体弱点,然而,存在与理解一样,这样的观点就像最乏味的唯物主义一样冷冰冰,如同鬼魅。’”而“感官的帷幕是蒙蔽,是欺骗,假如它隐藏了无色彩的原子运动,不可触摸的抽象概念的谱线,或者无生气的范畴跳起的超自然芭蕾。虽然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我们却无法信奉它们。我们的原则也许是对的,可它们并非现实。”引自F.H.布拉德利《逻辑原则》(伦敦,1883),第533页[第3册,第2部分,第4章,第16节]。

我就能够在3月的时候回去。如果其他事情一样，我理所当然将回到牛津， 514  
 一点也不觉得悲伤心痛（这样的感受十分真切）。罗杰·迈金斯显然是受到  
 赖特先生的怂恿，确实问过我是否反对他与外交部的某个人谈论我在图书  
 馆工作的可能性。我说我不反对，如果这与我继续留在牛津在某种程度上  
 相一致，我不反对在外交部从事半学术性的工作，如果我愿意，这样的工作  
 就可以变成任何别的形式，而且不会把我变成过于令人鄙视的唯唯诺诺  
 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有这样的工作邀请，我会认真考虑的。可是，我想，  
 如果您眼下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可能会更好。我真怕为了如此无足轻重  
 的事情还要动用私人关系，也不希望像J.W.惠[勒一]班[纳特]那样成为举  
 世关注的目标，而此时我还有很好的事情等着我回家去做，不用因为渴望  
 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公共部门工作而饱受折磨。所以如果这一切没有下文了，  
 我不会介意的。以体面的收入在牛津（那里已经正式邀我回去了）过着诚实  
 的生活，当然比绝望地挣扎在公共生活的外围要好。我相信您会同意的。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情报部

1945年1月10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最亲爱的达夫妮：

[……]

请代我热切地感谢D.C.先生<sup>1</sup>，他向我提出了慷慨邀请，令我大为振  
 奋，因为之前我接到D.霍尔低劣得多的秘密工作邀请，在外交部研究处，  
 那个学术幽灵的阴森公墓，幽灵的骨骼吱吱嘎嘎，在那儿，格莱德温[·杰

1 达夫·库珀，当时是英国驻法国大使，邀请伯林赴巴黎任新闻专员（参见上文第595页和下文第611页）。



伯]的鞭子噼啪作响,还有塞克斯顿·韦伯斯特踢来几脚(我所说的请一个字都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真的不认为自己应该沦落到那个地步。不管怎么说,我并非身无分文,也没有哭喊着要找一份工作,所以我打算相对有礼貌地婉言谢绝这份邀约,而像以往一样,只向您抱怨一番。至于在巴黎工作的提议,这很令人愉快,可是(a)我并不真懂法语,有一万个英国人法语说得和法国人一样好,(b)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宣传人员,不喜欢在任何地方当新闻专员,尤其在法国,我真的不理解这个地方,关系的运作另有上千个渠道,直接和伦敦联系的,直接和巴黎联系的,在老朋友之间,以各种方式,(c)我并不真正理解或是喜欢法国人,虽然我仰慕、尊敬并崇拜他们。这件事我只向一个人——坎贝尔爵士——咨询过意见,而他认为我不适合这个职位。

[……]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A. J. 汤因比

外交部研究处

1945年1月11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汤因比:

非常感谢您12月28日的来信,对于信中内容我已经极其慎重地考虑过了。我知道,当然,政策研究处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我还充分理解,它需要找到一位专家处理苏联方面的信息;而正是这一点使我担心自己是否是您需要的人选。我感到,真正对那个国家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甚至只依照在伦敦可以获取的相对不完全的证据,无论如何,这个人选都必须或多或少具备那个国家某方面的当代知识,而我自童年(1919年)<sup>1</sup>起就

1 他实际上是1920年离开的。

离开了那里。虽然我懂他们的语言，对俄国事务一直很有兴趣，可是我不能宣称自己可以被视为任何一类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即使是在最有限的意义上，我现在也许应该被视为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如果我能够提供有益的工作，我想应该允许我以某种职位先到那里住上几个月，然后才可以在伦敦开始工作。这一点，您或是外交部很可能会反对，另一种选择是把政治报告建立在纯书面材料的基础上，脱离任何形式的实地勘察，接受这类纯研究训练的人也许更适合您的目的。我已经向这里我的一两位上级咨询过此事，他们与我的看法相同。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在您面前展开如此含糊的陈述。我这么做原因是，我依旧茫然不知该如何回复您有趣而慷慨的提议，因此，如果您告诉我我上面的阐述在您看来是否恰当切题，我会不胜感激。我离开大使馆的主要原因，当然，与我的个人原因或工作性质无关：我确信，没有谁比我的经历更幸运，得到比我更好的待遇，得到同事们更多的信任；至于我的工作，它被证明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使我得以接触信息，并且可以见到杰出领袖或历史重要人物，总体而言，这份工作使我一窥 516 政治历史运动，对此我极其感激。我要离开，只是因为在美国住了四年，不管怎样，对有些人而言，是一个道德上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因为我感到，写过了上百份的政治报告，我一定变得有点没劲了，需要换换气候与职业。我应该很乐于立即直接回到牛津，虽然我得向您承认，战争发生了转折<sup>1</sup>，我也许还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我直至今今依然在过着非常安逸的战时生活，而我的同龄人正在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有时更糟糕的是，我经历着一种最能摧毁灵魂的沉闷乏味的生活。

我确实希望，对您选择我承担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不论它是否被证实适合于我，我已经深切表达了我的感激，因此，如果您能够允许我在收到您的回信之后，再说接受或是不接受这份邀请，我将不胜感激。自然，如果事情紧急，您认为您必须立即委任他人，如果您把我排除在人选之外，把这个职位交给另一个也许更恰当、更精通这个课题的研究者，我会非常理

---

1 纳粹德国空军与地面部队在几个地区发动了几次猛烈进攻，实际上那是他们转向防御性作战之前所采取的最后的进攻性行动。

解您的决定。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安东尼·兰博德爵士

外交部

1945年1月11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托尼：

你好吗？我从弗雷迪·艾耶尔那里零碎听到关于你的事，从罗杰·迈金517斯那里听到关于你的事的更好版本，迈金斯对你的判断力、能力等等非常称赞，我希望3月到伦敦，那时候就可以见到你和菲丽西蒂了。

同时，对马奎斯·柴尔斯<sup>1</sup>好一点，他很快会来，已经成为这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了，芭芭拉·威斯<sup>2</sup>无疑会介绍你们认识。

我有很多八卦消息要和你交流，不过打算从与我个人利益有关的事开始，如果你能原谅我，因为我发现，很奇怪，无论何时当我的命运出现危机的时候，在1940年和1942年，你总是成为最令人满意的构筑我命运进程的设计师。事情是这样的：我之前曾宣布，我再不能忍受继续待在这里了（虽然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工作很有意思，还可以无限制地接触到文件与要人；可是我现在已经写了大约150篇的政治报告，这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4月份在牛津的时候，感到牛津是多么令人愉快，并且希望直接〔回〕到那

1 马奎斯·威廉·柴尔斯（1903—1990），《圣路易斯邮报》有影响力的记者，撰写“华盛顿召唤”专栏。联邦调查局窃听爱德华·普里查德的电话记录中显示，伯林与普里查德当年晚些时候一致认为，马奎斯·柴尔德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不过是个友善的笨蛋”：1945年7月9日，联邦调查局调查普里查德的“技术性日志”，引自特雷西·坎贝尔《光荣之外：小爱德华·F.普里查德的堕落与救赎》（莱克星顿，1998），第105页注11（在第296页）。

2 芭芭拉·威斯（1907—2003），英国记者，1940—1943年，为纽约英国新闻处与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1944年7月起，为美联社作诺曼底登陆的后续报道，包括布雷斯特之围，她是首批前线女记者之一（虽然该篇报道使一位男同事受到赞扬）；当时她的衣服被盗，她致电美联社：“衣裙丢失，布雷斯特沦陷。”

里，着手准备写一部关于欧洲1815—1948年之间历史的宏篇巨著，这会让我余生都有事好忙了（大约需要写25卷）。我显然需要做这类事情，这样我才会一直往前走，而且我认为，我越早着手越好，最好在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告别战时的工作回家、把我淹没之前。另一方面，我确有负罪感，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而我却要离开，回归愉快的牛津生活。因此，4月份在伦敦的时候，我和D.霍尔热切地谈过这一切，他说他会看看，然后告诉我。结果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以及汤因比的来信，邀请我担任外交部研究处苏联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如此乏味的邀约我先是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菲丽西蒂会告诉你。政策研究处给我的印象是一间阴暗的地下室，挤满了被锁链束缚的教授，辛苦地编写着关于波斯尼亚的手册（与马克斯[·贝洛夫?]一起），这样的手册定期付印，没有什么人读它。我自己就无法通过读他们的政治报告或是专著而获得任何程度的收益或愉悦，这是因为，前者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无关痛痒、平淡无味，后者则是最糟糕的学究式研究。格莱德温·杰伯告诉我，政策研究处曾经一直是个不愉快的集体，而且，在能力不足的汤因比的领导之下<sup>1</sup>，它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依然如是，而且，据我本人的体会，我得说它是一条可怕的死胡同。所以我可能会拒绝这个邀约。我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会接受这份工作，条件是他们先让我去苏联，然后再回来，短期过后，产生性格上的不适应，而后再辞职，不过这样的想法一望而知就是欺骗。

518

与此同时，达夫·库珀邀请我去巴黎当新闻专员，这份工作本身就有难度，而且与我之所长并不相符（我已经拒绝了这份工作），而迈克尔·赖特似乎相信，我应该成为外交部的图书管理员。<sup>2</sup>后面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意得多，因为它与继续留在新学院与全灵学院并不矛盾，还可以写研究历史方面的著述，特别是由于战后图书馆接管了政策研究处的一些职能，而那

---

1 在外交部自己的记载中，对它的研究处作此评论：“汤因比的一些老同事批评他管理能力较弱，对待批评的态度过于敏感，不过无疑他工作兢兢业业，具有奉献精神。”罗伯特·A.朗迈尔与肯尼斯·C.沃克，《喧嚣世界的先驱——万国新闻解读：外交与联邦办公室研究分析处——历史》（伦敦，1995），第14页。

2 1943年到1946年间，外交部的图书馆没有常任馆长。

些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做着他们唯唯诺诺的工作，我可以往其他的工作内容中注入一点活力，为海外使馆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等等。目前为止这只是赖特头脑中的念头，虽然他说他会给大卫·斯科特写信，可是我不喜欢问他写信了没有。罗尼·坎贝尔，他很快就要回家了，他说他会了解一下这件事。我真的不想表现出我在谋求外交部的职位，因为我的初衷，是4月份以后就可以在牛津教书，这已经很令我感到快乐与满足了，而且我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回牛津。同时，如果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例如在北方司），我只打算干六个月或是稍长一点时间。D.霍尔说没有人会调离那儿，这样的想法不现实，政策研究处的工作很有影响，有很大的权力，等等，这在我听来像是哄骗人的说辞。如果你能够巧妙地帮我就此事试探一下D.斯科特与/或罗迪<sup>1</sup>，并且不要让人看出这与我和汤因比的直接联络有什么关系，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我随信附上了给汤因比的信的副本，意在不把这扇门关死，不过你最好不要已经收到那封信了，而是从我这里由我本人给你去信，告诉你我的大致心态，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我原本已给汤因比去信，跟他说要不是因为我渴望完全离开公共服务领域，我不会离开我在华盛顿这边所从事的有意思且很现实的工作，并以此为由礼貌地回绝他的邀请——

519 如果我这样的说法是真的。事实是，可以在最后退隐牛津之前，以在伦敦的某份有趣的工作（罗尼·C.说过内阁秘书处）来结束我的战时职业，然后与外交部保持某种半学术的联系，这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这样的想法我只对另外一个人说过——罗杰·迈金斯——他说等他回到伦敦，他会说说图书馆的事，并了解一下这份工作是否太乏味，如果确实如此，他建议我回绝它。不过他还要过三个月才能回去（直到乔克·贝尔福到华盛顿），所以他做不了什么。我还没有回复D.霍尔的信，短期内也不会回复，我更愿意给你写信，而不是给他写信，因为他虽然有优秀的品格，可是却有点儿笨拙，不太懂得行政集团中的规则。如你会同意的那样，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更乐于被人争取，而不想主动求人，像德里克·霍耶·米勒曾通过你的

---

1 罗德里克·巴克莱（上文第515页注2），伯林在华盛顿时的一位同事，现在在外交部人事部门大卫·斯科特的领导下。

请求努力要把我弄出纽约所采取的那种令人舒服的方式，结果就我所知，每个人都很开心。所以请一定帮我巧妙地打探一下，尽快让我知道，去汤因比那边工作是否如传闻的那样可怕，别的工作（例如去图书馆）看起来是否可行。如果我可以做图书馆或是汤因比那份工作，也许那会是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假如我还可以去俄国，然后再回来为汤因比写一段时间的备忘录，然后去图书馆。如果你还能与G.杰伯谈谈，我将不胜感激，因为我与他关系不错，对于令人抑郁的混沌状态[原文如此]他是直言不讳的——在格莱德温劈啪作响的鞭子挥动之下振作[ ]精神——就是最不愿给我仁慈的建议的人，也不希望看到我遭受那样的痛苦。

我是否要因为给你添这么多麻烦而向你道歉呢？我无法形容自己有多么渴望见到你，我肚子里装满了本埠八卦消息，而且积极介入了远在牛津的密谋，通过运用一系列庞杂手段，确保新学院选出了合适的院长。<sup>1</sup>如你所看到的，我变得狂妄了，无疑这是因为我突然可以接触到在这里的一些名人，英美两边的都有（在后者中，我的主要盟友是奇普·波伦，他现在是国务院与总统之间的联络人，认识他本身就很有意思了）。这也许不够谦逊，可是你一定知道，从像福斯特那样可以与所有人就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而跌落到可鄙的研究者的暗坑之中，有多么令人难过？我知道，已经品尝过鲜血的滋味，我会很难适应素食的，现在我只想知道自己一天需要消耗多少鲜血。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520

---

1 A.H.史密斯。

致安东尼·兰博德爵士

外交部

1945年1月24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托尼:

随信我附上了致汤因比教授的信。<sup>1</sup>如果D.霍尔想看的话, 你是否愿意把信给他看看, 要么就根本不要给他看? 因为整件事自D.霍尔开始, 我想, 他有权知道有关此事的“pp.”<sup>2</sup>。不过最好什么也不要说。我认为哈[利法克斯]勋爵正打算讨人欢喜地施加压力让我继续在他那里工作, 如果是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办, 也许在提出足够的条件后, 我会[留下来]。不管怎样, 什么都还没有发生。

我让奇普·波伦带给你一封信, 他已经和H.霍普金斯一起去英国了, 虽然他说和你很熟。你帮他做点什么是完全值得的, 因为他不仅人很好很聪明, 而且现在是个真正关键的人物, 作为国务院与白宫之间的联络官, 是极其稳健的下级官员, 不论怎样, 我觉得和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十分愉快, 获益甚多。我认为他对我们真心实意、十分友好, 有的事不太容易跟高层谈, 显然我们就可以跟他谈, 而且一定可以经他巧妙地向高层传达。所以, 除了你之外, 如果外交部或是内阁秘书处还有谁足够聪明有眼光, 那就是他了, 这样的感情投资确实非常值得。他的总体理念, 我也赞同, 即俄国人对西欧没有具体计划, 我们提出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认真考虑; 他们会心怀疑虑, 的确, 但这是双方开展讨论的基础; 然而, 如果我们等他们先开口, 或者逐步解决一切, 他们的疑虑只会随着解决方案的增加而增加, 而疑虑的积累将使我们不可能达成任何总体解决方案, 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说得太含糊了, 那就不要管我说了什么, 直接询问他的观点就好了。他还是对俄国相当敏感, 像每个身处那个位置的人一样, 尤其是与布里

---

1 也许是1945年1月11日写给汤因比的信的副本, 本拟附于同日所写致兰博德的信后一起寄出, 但可能由于错误而遗漏了。

2 “pp.”是国家服务机构使用的“先期文件”, 即与待办理的事务有关的档案与文件的速记缩写字母。

特在一起，不过他对总统提出的建立永久性联盟的“伟大设计”<sup>1</sup>很兴奋，认为这样的冒险值得一试，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他准备很开明、很大胆。我们 521  
 我们认为，在欧洲仅有共产主义左翼是值得支持的，[理查德·]劳先生也准备支持他们，只要他们不被称为NCO<sup>2</sup>，因为他不喜欢“左”，也不打算与非共产主义者结盟，尽管听过我们对非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深刻差异所做的一切解释。不管怎样，你本人一定要和C.B.好好谈谈。

我向你倾泻而去的大批信件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请告诉菲丽西蒂我爱她。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1月25日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收到你们两组来信，真是很好——一组是严肃的，因为我的沉默无言，另一组则快乐一些，因为我寄去了信。我非常理解我没有给你们写信时你们的情况，但是没有什么话可说时，我就无法写信，你们一定要原谅我长久的沉默，并且根据我发去的电报以及零散的赴英旅游者而猜测到，我真的身体棒极了。

现在我有许多事要报告：首先是严肃的事，然后是开心的事。我已经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也许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医院，找到一位医生，我认为他真的能够解决我的鼻窦毛病，他自己就饱尝了二十年鼻窦炎之苦，最后治好了自己。他的建议是，我必须到他的医院住上一星期，每天接

---

1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解决问题的计划包括各国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关键则有赖于苏联的合作，以期保证他战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2 非共产主义组织。



受治疗(无需手术),然后继续在巴尔的摩待两周,住在酒店里,每周接受三次治疗。虽然巴尔的摩距离华盛顿比瑞丁距离牛津更近,他理所当然地说如果我每次都坐火车来接受治疗,旅途劳累与风尘会抵消了治疗效果。他似乎提供了盘尼西林等药物,我对他很信任。我在巴尔的摩有一位疯狂而富裕的朋友,叫加瑞特太太<sup>1</sup>,一位前驻罗马大使的妻子,虽然在许多方面她是一位古怪的老妇人,但显然她是巴尔的摩的女王,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我在那儿住过,她对这位医生非常信任,对于看病这类事他很可靠(对美国富豪而言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好的)。所以我想,既然此事唯一涉及到的风险就是钱的问题,在2月初,比如说6日或7日去巴尔的摩,到了月底才在那里现身,然后乘火车直下墨西哥,我的朋友摩根一家现在正在那里休养,住在前大使德怀特·莫洛<sup>2</sup>位于一座叫库埃纳瓦卡的宜人城镇的宅子里,距离墨西哥城一个半小时车程,他们的休养将总共持续两三个星期,然后接近3月底回去。(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我想正处于最佳治疗时机,不能等到我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治疗。)

起初我打算在此之后立即永久性地回到英格兰,但是大使已经啪啪地挥动了手里鞭子,我因此决定,与其和他争论我是不是应该在美国工作到9月,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倒不如承诺一直工作到5月;到那时,我听说史密斯院长将会来这里(3月底),开展牛津对美国的考察之旅,我可以和他讨论回去的细节。这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狡猾而明智的计划,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决定。

同时,虽然情况是这样,可是医院,还有昂贵的医生,也许要花一点钱;所以我可能会申请把一些英镑转换成美元,你们能否往我在牛津银行

1 艾丽丝·沃德·加瑞特(1877—1952),约翰·沃克·加瑞特(1872—1942)的古怪遗孀,约翰·沃克·加瑞特1929—1933年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加瑞特夫妇是富有的收藏家、艺术赞助人,他们在巴尔的摩艾弗格林的宅邸有48个房间,有好几间图书室,还有一间私人影院。艾丽丝·加瑞特因以女主人身份款待外交官、作家、艺术家与音乐家而闻名,她宅邸中许多杰出客人留宿过的那一部分取名“天才之翼”。加瑞特夫妇没有子嗣,艾弗格林宅邸及其收藏遭遭囑赠送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 德怀特·惠特尼·莫洛(1873—1931),律师、银行家,1927—1930年是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时期成功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1930—1931年为共和党参议员,另见下文第636页注1。

的账户打入500英镑。请一定不要忘了这件事。我把我的日程再说一遍：2月6日到13日，住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13日到27日，在巴尔的摩的酒店住宿；2月27日到3月底，去库埃纳瓦卡旅行，然后回来。我们随时都等着惠勒一班纳特，也许他也会来墨西哥。

天知道我还有别的什么有关我的“严肃生活”的话题可以向你们叙述的了。我那天在大使馆晚餐时见到摩根陶先生，他是极害羞的人，如果你看他超过两分钟，他就会自动脸红，求助地看着他的妻子。我见到他，是因为他要求见我，因为菲利克斯被证实在此事上有点不太积极（后来他表示歉意），于是他，摩根陶，直接向大使请求召见我，我被告知随时“顺道去财务处拜访”。我怀疑这样泛泛的邀请是否应该真接受，不过我相信他确实是这个意思。他是阿瑟·古德哈特的叔叔或是表亲，我现在与古德哈特教授的关系极佳，他是一个傲慢的人，他上一次造访此地感到很满意，认为我是个合适的好相处的人。

523

此时你们将已经见到我的得力助手阿奇·麦肯兹了，他会告诉你们我不仅确实健康而且看起来有多好，等等。

至于麦吉奇小姐的婚事，我只能觉得滑稽。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圆熟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奥地利犹太人或半犹太人，对英国银行家很有热情，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他的热情太过，无法做到完全不关心。总之他们一起会发展成一家非常兴旺的公司：因为有如此之大的联合势力，上升的速度现在应该会加倍了。人们告诉我他们彼此疯狂地相爱，一切皆有可能，当然全灵院长已经被双方征服了。我对他们两人并非不喜欢，只是不希望他们过多进入我的生活，我感到，他们对我亦是如此。

我收到玛丽和戴维寄来的两封很亲切的信，后一封尤为详细地叙述了博尔特先生与太太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请代我向他们问好，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有多么感激，以及我会给他们写信。

至于接下来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显然我要和大使好好地讨价还价一番，当他有一个吃苦耐劳、甘愿做牛做马的手下时，他是知道的；而且，不管怎样，我为什么要离开呢？我最近收到的鲜花来自一位[阿兰·]拉塞尔斯

先生<sup>1</sup>，显然是国王的私人秘书，他对我发去的某一份电报甚为嘉许。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位，但是我怀疑自己一定表现得很保守，所以才能令这样的人感到愉快。请不要跟人说这件事，也不要打听，因为那样会让我很难为情。不过整个大使馆都以此为荣，我明白。可是我非常怀念过去的时光，决定今年早早地回去，现在我预计5月底之前还走不开。至于我的鼻窦炎，我确信，如果想让它得到治疗，最好就在这里做这件事，而不是在英格兰。在回去之前我还要订做几件衣服。

现在我们要谈些琐碎小事了（说到这些，我想布罗德茨基<sup>2</sup>也许会替我向你们捎去问候），我得把阿普特的滑稽故事讲完。收到袜子之后，袜子这事必须理解为类似于东方人的行事方式，即在真正的求婚之前，先送出一两只羊作为聘礼的做法，他们不断地从纽约给我打电话，很奇怪，我总是要么出去了，要么就在开会，或是待在住所（没人知道电话号码），染上想象中的微恙。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决定抓住牛（我）角，于是康斯坦丁·马克维奇适时地出现在华盛顿，显然是出差。不幸的是，我不能和他一起吃饭。不过他到办公室来看我，胡诌了一通“总体政治局势”，还表达了对你们二老的真心实意的深情。他真的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他的生意，我想，做得很成功，然而他还是很傲慢、虚荣，而且自负。这样漫无目的地闲聊（而我极其注意没有岔开话题）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问我是否打算终身独身。我说，这确实是我目前的打算，今后谁知道呢，当然，我可能会疯狂绝望地爱上谁，可这很抽象，不可能。我认为，他看起来对此有点郁闷，不过当时他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他坚持请我过去吃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其中任何一顿或是每一顿都可以，推迟与总统本人的会面也在所不惜（顺便说一句，他对利伯曼的书<sup>3</sup>评价不高，当然，是因为他对书中

1 阿兰·弗雷德里克·拉塞尔斯（1887—1981），1943—1952年担任乔治国王六世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唐纳德森形容他是“具有贵族的血统与气质……是旧式‘权力结构’中十分典型的人物”：《爱德华八世》（伦敦，1974），第102页。很奇怪伯林没有听说过他。

2 塞里格·布罗德茨基（1888—1954），生于乌克兰的数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1924—1948年任里兹大学数学教授，自1948年起担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主席，1939—1949年任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主席。

3 见上文第595页注1。

涉及到的那些要人关系有更亲密的了解)。最后他再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在经过长时间的欲言又止之后，他说他是一个诚实耿直的人，不知道怎么兜圈子，他问我对他女儿的感觉如何，说她对我并非不感兴趣——我假装非常吃惊（这并非全是假装的，因为他的女儿，可怜的女孩，肯定不喜欢我，因为我不能忍受她，并且，处在她那可怜的状况中，像一只羊羔被送到屠宰场，这是在你受命必须喜欢的一个人身上让人很不喜欢的特点）——并且，确实说过在她认识的所有年轻人中，我也许是“最有见识的”（这是托付终身的绝佳理由）。我尽力自制，可是心里的窃笑差一点让我失态，我一本正经地说，她很年轻，比我小很多，我想这真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提议。他卸下了当下的重负，肯定是他那无情妻子强加于他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K.表兄解释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感受，但是，当然，我会理解他只是为了他女儿和我的好，还有，他有条件为她提供合适的嫁妆……可是，当然，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希望这件事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在我们步行去公共汽车那里时，他一直要恢复这种可能性，我很友好，温和地拍着他的背，祝愿他一切都好，并且说我去纽约的时候会去看他（我无意这么做），可是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会笑（我的表妹莉莉安娜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女孩，要不是我不幸与她有如此近亲关系，我不会向我的任何朋友介绍她，使他们厌烦——这甚至不是一种被动的厌烦，而是她母亲粗鲁地指手画脚，她父亲胡言乱语，二者交织在一起，令人讨厌的持续折磨，加上对她父母的这两种特质的痛苦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面痛苦）。我宁愿与妈妈的女房东结婚。我想你们乐于听我叙述这可笑的插曲，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下个星期我也会去纽约，我一定会去拜访豪斯廷夫妇，向他提到这一点。（请不要对此担忧，我会处理这事。）

我将要调到外交部，而且会因此离开尼古拉斯的管辖——这最好不要跟他说，他们似乎都对此有点忿恨，因为人们认为外交部那里更时髦，他们无疑以为我要攀高枝了。

眼下再没有别的事好说了，但这已经足够。请告诉史密斯我爱他，很高

兴我很快会见到他。

〈给你们我所有的爱，也许再要经过两个月的离别（直到5月），但是那时，啊那时，就是幸福的团聚了。

以赛亚〉

致罗宾·克鲁克香克

1945年2月1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罗宾：

接到你发来的非常亲切而关怀的电报，询问我的健康，可以想象我的恐慌——想到我年迈的父母再次陷入沮丧恐惧的剧痛之中，《标准晚报》上最令人毛骨悚然地描述了这种可怕疾病<sup>1</sup>的细节，科学手段对它无能为力，而我却落入了它的魔爪，等等。事实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饱受令人讨厌的鼻窦炎折磨，它使我不能上床睡觉，在我的头上压下大约二百〔磅〕的重量，削弱我的体力，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行动变得懈怠，时好时坏。想到我3月就要回英国，我决定趁还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彻底治好这个毛病，经过多方询问，我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由于目前医院里人满为患，我入院的日子最后定在2月5日到26日，期间医生不会让我与外界接触。我想调整一下时间，不给阿奇造成太多不便，却发现不可能办到。实际上，由于这令人不适的、越来越令人发疯却并不危险的疾病越来越频繁地发作，我已经不得不过着可怕的蛰居生活，我无法面对这种状况永远继续下去的前景。所以才有了那封给你的电报。不过我的状况一点也不危险。请一定把这封信给尼克<sup>2</sup>看；我已经把上面的话或多或少地写在给父母的信中了，仅仅略去了需要接受一个小手术的事实（这一定会把他们吓坏的），并且专门声明，愿上帝助我，我不用动手术。所以就可敬的伯林一家

---

1 他指的是上文第479—480页所复制的那份报道。

2 H.G.尼古拉斯。

而言,那就是既定路线。

我现在得到消息,阿奇也许会按照要求的日期回来,我不清楚是在你手下还是在外交部的管辖之下——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一切,包括格兰特·麦肯兹,都是老样子。现在对后者的迫害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已经让我们最凶悍的救险者约翰·拉塞尔来对付他,可是正如H.B.巴[特勒]正确地坚持的那样,没有什么会使他离开。

大使的威慑力很有效,我要留在这里一直到5月。当他得知,在伦敦并没有一份具体工作等着我,我离开的唯一动机就一定是对这里状况的不满,战壕里的士兵,更不要说他自己,无疑也一样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不满。我真的不知道我能说什么来回应他,也许到了5月初我可以想到什么理由。我渴望回去,如果找得到足够的借口以应对像大使阁下那样的人对我毫无顾忌的道义攻击。也许那位无限聪明的新学院院长可以想出一个主意,他预计5月份会到这里。

我听到来自远方的报告,在[阿兰·]达德利—[西瑞尔·]雷德克里夫—布鲁斯·洛克哈特的战线上正进行着沉闷的战斗,而格拉伯在加入护卫队之前耐心等待着时机。我等着约翰·惠勒—班纳特告诉我们详情。

同时,我真的很遗憾不能邀请兰道,因为事关面子,我过去常常告诉他,如果他靠自己的力量过来,他会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没有。不过他本来会在巴勒斯坦前线为我们做非常有益的工作,因为他可以被廉价收买,没有原则,十分卖力,在我看来,对于英国政府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耿耿忠诚(也许过去金钱方面的安排可以解释他的忠诚)。我因而惋惜,如此有用的一件工具,由于一般规则而被搁置一旁,虽然我们肯定能赢得战争,可以在和平中发出声音,我感到,正如温斯特勋爵<sup>1</sup>给《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写的信中所说的,深深感到挫败。温斯特勋爵也告诉欧文斯先生<sup>2</sup>,芭芭

1 雷吉纳尔德·托马斯·赫伯特·弗莱彻·温斯特(1885—1961),政客(自1929年起为工党),1940—1941年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政务次官,1945—1946年担任民航大臣,由艾德礼领导。

2 (詹姆斯·)汉密尔顿·欧文斯(1888—1967),1938—1943年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1943—1956年任《太阳报》主编。

拉·沃德<sup>1</sup>，一位歇斯底里、幼稚的女孩，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写社论，压根儿就不是克罗瑟<sup>2</sup>。无论怎样，虽然他们动摇了《经济学家》的声望，还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虽然可以谅解，但它还是被认为是一家鲜明的民族主义杂志了。

我希望罗森曼法官来的时候，人们对他会礼貌一点，他的使命是假的，他本人非常令人厌烦，而且还是个庸才，可是他对善意的反应很迅速，如果触怒了他，他会很令人头疼的。

伯林鼻部手术按计划**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进行。**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2月14日 [手稿]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亲爱的父母亲：

没有比这更有福气的生活了。我没有生病，没有觉得疼痛，按计划舒适地生活（确实有点昂贵，可并不是太贵），早餐准时送到，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一切都平静，看书，听收音机，没有电话打扰（我无法形容生活中如果没有电话打扰是多么宁静），没有客人，有也非常少——麦肯兹刚离开。他很惋惜没有见到你们，但是他有点尖锐地指出，由于我如此紧急地把他召回，他不得不缩短他在英国的逗留期。没错，这样他就可以顶替我在华盛顿的工作，而我就可以来这里接受治疗了，我选择这个时候是为了——不过这也许不能如愿——去墨西哥，摩根夫妇和惠勒一班纳特目前在那里。摩根1月初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惠勒一班纳特也不太强健，他们都去了位于库

---

1 芭芭拉·玛丽·沃德（1914—1981），后来（1976年）成为杰克森男爵夫人，发展经济学家、作家，时任《经济学家》编辑。

2 杰弗里·克罗瑟（1907—1972），1938—1956年任《经济学家》编辑；后来在战时把美国的一项调查引进该杂志，此调查旨在让非美国读者了解美国时事，但在美国本土获得了广大读者。

埃纳瓦卡富有而显赫的“岳母”<sup>1</sup>的庄园那里，距离墨西哥城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她的丈夫，德怀特·莫洛曾经是那里著名的美国大使。我相信我在那里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可是如果摩根打算在3月15日前后回来，而我不能早在3月1日之前就到那儿，那么此行是否值得？我想也许值得，如果我一路上都乘坐“卧室”列车<sup>2</sup>，非常舒适。那样的变化棒极了，气候对我的鼻窦很适宜，我会试着在那儿住到3月21日（即使摩根离开，我也要惠勒一班纳特一起）。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再去墨西哥，每个人都说那里棒极了。现在我在这里接受珀尔沃特医生<sup>3</sup>（他一定是丹麦或是挪威血统）的治疗，每天要做的就是拜访他，他从我的鼻窦里取一点东西出来，往鼻子里喷喷并且摆弄各种注射剂，然后让我走，他说从拍摄的X光片看我（前额）的窦道与窦房本身<sup>4</sup>非常正常，罪恶的根源完全在左鼻孔内，我一直为它烦恼，是因为鼻内的鼻梁骨中部有一点扭曲，于是，而不是——是……并导致了左鼻孔内轻微的肿胀（斯诺曼<sup>5</sup>1932年就这么诊断了，但像以往一样，建议不要采取行动），而此处病灶可以经他的治疗去除：在疗程之后，一切就彻底根治了，我们会看到，治疗没有任何风险，显然我可以安宁地休息。至于我近期情况如何？令我吃惊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突然反对我离开，理由是我现在的工作比以前的好得多（他是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而不是从我的角度，但是让我们崇高地站在公共利益的一边吧），为什么我必须走呢？这大约是一种“稍安勿躁”<sup>6</sup>的观点。现在如果我在伦敦得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可以辩解说，二者中间，伦敦的工作更为重要，不论看起来多么不合情理，多么不诚实。但事实上我已经拒绝了汤因比与库珀的邀请了，所以只有

1 伯林此处原文为：теща，伊丽莎·里弗·莫洛，婚前姓卡特（1873—1955），曾为诗人。奥博雷·摩根先是与莫洛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伊丽莎白1934年去世，然后他又与她的妹妹康斯坦丝结婚。另外一个女儿安，与查尔斯·林伯格结婚。

2 普尔曼式卧车上的双铺包厢。

3 勒洛伊·马修·珀尔沃特（1924—1970），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耳鼻喉科副教授。

4 伯林此处原文为：an sich。

5 也许是雅各布·斯诺曼（1871？—1959），伯林家的全科医生，汉普斯特一位著名的家庭医生，割礼执行人，即接受过训练在犹太教仪式中执行割礼的犹太人（他最著名的病例就是威尔士王子查尔斯）；也许是他的儿子奥纳多，也是医生，并可根据要求施行割礼。

6 伯林此处原文为：сиди и не рыпайся，俄罗斯俚语。



新学院那条路可以走，可是他们在秋季之前又并不真的需要我，尤其是他们现在有哈特（即使没有法克，这也很犹太化<sup>1</sup>）。于是我提议（之前我是否在信中已经告诉你们这一切了？）等史密斯到美国的时候——我听说他要来？——让他与哈勋爵讨论此事如何解决。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在4月25日去旧金山<sup>2</sup>——这可能需要一点手段，不过我会努力的——我被问到是否愿意从事媒体关系之类的工作；但愿上帝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所有的纰漏都追究到新闻官员的身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什么也不说，并为他们的国家获取正面评论。这不是我的职业，所以无论如何直到5月初我都要留在这里，如你们希望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我非常希望去莫斯科待上三四个月，做点工作。我得到消息，外交部正在探询此事的可能性。

同时，我曾写信告诉你们布罗德茨基来看我了——他，以及他从圣地来的朋友们都来了，对我确切的职业与从事的工作甚为怀疑，英国人倾向于抵御我潜在的势利与贵族式傲慢，但所有人都无法拒绝面谈。我很喜欢这样。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一家很好，我也是。真的没有别的可写了。

给你们我全部的爱

沙耶

我提议通过外交部的公文袋来寄这封信，并贴上我这里附上的2½邮票。你们回信可否也照此方法办，不用附邮票，不要称呼我一等秘书，在信封上写上“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以赛亚·伯林先生”，在最上面写上“通过外交公文袋递送”，并把它寄到外交部公文袋室。看看会怎样，不过它还是会通过海上寄过来的。

以赛亚·伯林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judet。

2 4月底有一场国际会议在旧金山举行，旨在起草联合国宪章，并宣布联合国成立。

致克里西达·里德利

1945年2月14日 [手稿]

[发自]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克里西达:

自从数月前收到你的来信, 我就想给你写信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话好说, 可是我无法不说什么。而且我, 就像所有“泡泡”<sup>1</sup>的朋友们那样, 虽然一直对此有所准备, 却一直极为难过, 至今依然如此。我从没有失去过所爱的人, 甚至也没有失去过父母至亲,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的感受, 也不会伪装。可是, 在这方面我愿意做我认为你也许会希望我做的任何事情, 而我自己却不知道那应该是哪些事——写点什么——资助点什么——做点什么事, 而不至于对你而言太少。<sup>2</sup> 530

我很清楚地了解, 在我有生以来, 还没有谁更令我喜欢, 或者谁的友谊更令我重视, 或者有谁令我感到比他更了不起、更令人兴奋。还[没]有谁, 能像他那样, 如我希望地与我交谈: 他不仅理解我说的一切, 而且我们的谈话是如此妙语如珠、令人惊叹, 空气中也充满了各[种]神奇的力量, 结绳魔法开始发生效力。可是, 对此你所知更多, 也许还认为这样的谈话有时候太多了, 而别的什么又少了一点。对我, 与他的心灵交流永远不觉得足够, 我得说。当然, 我的意思并非是说, 在我看来他的主要特点仅仅是精湛的语言技巧、聪明才智、迂回曲折, 等等。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仰慕他的这些品质, 这些神奇的品质, 这种直接体验, 此前从未有别人踏足这个领域, 在柏辽兹<sup>3</sup>或是E.T.A.霍夫曼<sup>4</sup>的作品里才有。列举性格特点会有点荒唐, 但如果别人没有写过, 那么我乐意只是为了我自己, 也要写一篇回忆录, 再说

1 杰斯帕·里德利的外号, 朋友们(尤其是伦敦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

2 后来, 伯林把《刺猬与狐狸》一文题献给里德利。

3 例如, 柏辽兹在他的《幻想交响乐》中有表现因鸦片而致幻的乐章“向着绞刑架前进”, 以及“女巫集会”。

4 恩斯特·西奥多·阿玛多伊斯·霍夫曼(1778—1822), 德国政府官员、小说家、作曲家、怪诞神秘故事作家, 奥芬巴赫根据霍夫曼所写的怪诞故事中的三篇而创作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霍夫曼姓名中的第三个名字, 原为威尔姆, 他改为阿玛多伊斯, 以纪念(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还可以发表在《巴利奥报》或是别的什么报上。我的确感觉到自己几乎对他怀有狂热的崇拜，我为什么要隐瞒这样的感情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不愿意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恶劣的，而且一直如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说的一切将会显得尤其华而不实，或是俗不可耐，不论我的感受是多么真切。因此，如果能够，请一定挫伤我提笔的积极性。不过我依然希望对你说，自亚历山大·赫尔岑以来，我还没有见到另外一个人像里德利那样，是对一切充满奇思妙想与炽热不朽情感的结合体（而他非常典型地写信告诉我，他爱上了赫尔岑，希望和他生一个孩子），他的确不是像他的父亲似乎惧怕的那样，属于颓废的一派，而是属于个体与文化方面最先进、不断进步、十分积极的时期（我开始变得自大傲慢，“恶劣”起来了，我得停止这么做）。不论是在牛津，还是在律师界，不论是从某种公众服务的必要性、老式的公共精神、俄罗斯式的道德感情方面看，还是从对他本人的地位、他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的最令人痛苦的挑剔评判看，他的沮丧与挫败一点儿都不卑劣。在我看来，他的婚姻似乎使他更快乐（也更理智），在那些以前并不这么认为的人眼中亦然，他的为人也更好了（他本来就异乎寻常地友善，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他是尼金斯基<sup>1</sup>，可能跳得没有那么高，但却能跳得更远：而且，当我想到从美国回到英格兰之后的生活时，我认为他体现了美国这里如此可怕地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相识具备了浪漫的元素：热烈的追求，双方都急于取悦对方，随之而来的起伏、高潮、低谷，大量的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只有在牛津这样的地方才有的细致的知识分子情感。然后一切尘埃落定，我认为你们二人都是就我所知最令人嫉妒与艳羡的，并热切地渴望结婚的，并（说教性地）认为令人激动的美德远比令人兴奋的邪恶好。并且，我相信，他死

1 瓦茨拉夫·福米奇·尼金斯基（1888—1950），古董收藏家、俄罗斯芭蕾舞家、舞蹈编导，因能轻而易举完成高跳而闻名。伯林曾如此定义天才：“有时别人问我这个令人兴奋而又不甚精确的词，作为回答，我只能这么说：一次有人问舞蹈家尼金斯基他是如何能跳这么高的，据报道他的回答是，他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大的问题，大多数人跳到空中就立即落下了。‘你为什么不要立即下落呢？落地之前稍稍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个人印象》，第217页。

于雷区，是你所知的强烈挫折感引爆了地雷。这样的挫折感有时候触发最可怕的闪电，有时候只是引发半吞半吐的咕哝以及自我吞噬（自动的同类相食。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我曾经几乎也陷入了这样的绝境，真的，我自己）。当他处于那种状态时，他总是肯定要跳起来，经过他认为的仔细考量，最终决心跳越，从不会无所反应。危机发生时，总是有一种浪漫的、真正毫无虚假的浪漫的宿命论，拜伦主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最重要的是，这不沉重，不疲沓，不被吞没或闭上双眼。哦，亲爱的，我说的这一切是否是无头绪？我是否构建了虚伪的存在？我绝望地这么认为。然后，还有什么比对与音乐有关的一切的绝妙、纯粹、强烈的道德热情更美好、更珍贵呢？对他而言，高超的演奏是高深领悟力的顶峰，如流动的深水，细不可辨、狭窄深邃、奇妙而又优雅，直指人心，充满诗意。我不能再一直不停地说你所知的这些了，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说完我如释重负。此时，我郁闷地坐在这里，我的上司承诺我可以在去年11月回国，然后是今年1月，3月，现在我还要在这里待到5月，也许还要更晚。不过我想不会那样，因为即使我洋洋自得，心平气和，现在还是很容易激动，如果被过多地压迫，我可能会平静地发疯，所以，虽然我的工作很有吸引力，我的同事很体贴亲切（唐纳德·麦克莱恩非常非常好，我和他发生了争执，很有趣，然后我们和好了。我是愤愤不平的一方，总是如此。唉，虽然我不能真正原谅他，我还是很喜欢他），我再也不能忍受这里的生活。所以我不久就会回家，如果可以，我会给你打电话，也许你会来伦敦，或是去牛津，我也愿意给里德利太太写信，不过，你知道我没有什麼可说的，除了告诉她我一 532 生都会想念“泡泡”，不断念叨他的无与伦比，让人们发疯（我想也包括让你发疯），这样也许里德利太太会原谅我，也许你也会，亲爱的克里西达，因为我写了这些愚蠢的话语，自己也不忍卒读（虽然它们难以理解，但那并不是问题）。我只能求你谅解，我住在医院里，顶着一个巨大的鼻子（更像

---

1 唐纳德·麦克莱恩（1913—1983），克里西达·里德利的朋友，后来被发现是俄国间谍，其时是伯林在大使馆的同事。他们之间的争吵发生在一次晚宴上，麦克莱恩批评伯林与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的友谊，理由是她持有“可怕观点”（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

果戈理的鼻子<sup>1</sup>，而不是像西哈诺的)，状态很悲惨。你不会愿意来的，是吗？我指的是大使馆，因为我还有一份工作（年薪大约3000美元），我回家以后你可以顶替我。你可以和麦克莱恩一家住，你的孩子<sup>2</sup>会喜欢维生素，不过如果不喜欢，你就不要来了，我认为你会不喜欢，除非你在4月底之前告诉我有此意向。我想请你帮个忙——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不喜欢这个提议，不要犹豫不告诉我，我对自己的欲望没有什么信心——我非常想（a）要一张“泡泡”的照片，（b）一本有他用大字签名的书。<sup>3</sup>我希望自己能够庄重地向你表达：想到你，我心中是多么温暖与亲近。告诉里德利太太我爱她。

你的  
沙耶

你儿子长大以后，你会让我对你的儿子施加阴险的智力影响吗？你不会希望这样的影响过于理智、深思熟虑，对立于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与书呆子式的胡诌言论吧？

致赫伯特·哈特

陆军部

1945年2月23日

[发自]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赫伯特：

我无法给你写信，因为我只能卧床，身患令人饱受折磨而又不至于危及生命的疾病（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疾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不过我等

- 
- 1 果戈理有一个长鼻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鼻子》，内容是一个人的鼻子抛弃了这个人，独自生活。萨维安·西哈诺·德·贝热拉克（1619—1655）的长鼻子在埃德蒙·罗斯丹的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中变得不朽了。
  - 2 亚当·尼古拉斯·里德利（1942年生），经济学家、银行家。
  - 3 杰斯帕·里德利写一手与众不同的大字。

不及要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兴奋，没有别人会告诉我这件事。<sup>1</sup>当然，你会无比强烈地、在所有方面立即认同学院生活，并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著名的沟通桥梁，克罗斯曼墙头草式的沟通被证实是如此的不忠，533而我从来就没有试图自告奋勇承担这样的角色。本科生的生活就像是对你翻开的书本；你不要仅仅局限于和家境好或是长得好看的学生交往；事实上我预见到这是一个彼此迫害的领域，必将产生许多这样那样的扭曲的快乐。

至于工作，当然，我会试着把所有我一无所知或是深为痛恨的科目都移交给你；目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你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但是我特别深深地讨厌（不过这话一句都不要跟院长说）柏拉图、道德学、伦理学（甚至康德）；所以你是否愿意至少把它们放入你的研究领域之内？否则学生们就无法接受相关教育了（不要告诉考克斯我写这封信的可怕语气与内容）。我不认为去拜访如今有点老态龙钟的莫尔与罗素有什么益处，不过我会把莫里斯·科恩<sup>2</sup>的著作寄给你，他是美国的约瑟夫，一样的令人发疯的性格，只是更圆滑，更新潮。你当然可以听同事的课，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否令对方高兴值得怀疑。我会把你本系的[J.L.]奥斯汀少校找出来，迫使他和你谈谈。没有人比他更能全面唤醒内在的哲学力量，他很善辩，启发思维，令人疯狂，不过在哲学界的当代人中我最崇拜他（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做蠢事，例如去亚里士多德学会，或是考虑普里查德<sup>3</sup>。看在上帝分上，读一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至少了解一下伦理学的入门知识，否则我们就都完了。不过詹妮弗怎么办？两头跑？无法想象。我太理解她对牛津的感觉了，正如D.塞西尔曾说过，他还不知道他的未来命运，“把妻子带到牛津，就像是把妻子带到黄金海岸——一个殖民地”。

---

1 赫伯特·哈特受聘为新学院研究员，教授哲学。

2 莫里斯·拉斐尔·科恩（1880—1947），生于俄罗斯的美国逻辑学家与哲学家，1912—1938年任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3 哈罗德·亚瑟·普里查德（1871—1947），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怀特讲席教授，1928—1937年任圣体学院研究员。

—俟康复,我会给你写封头脑理智的信。

你永远的

以赛亚

534

致沃尔特·特纳

《画中不列颠》

1945年2月23日 [副本]

[巴尔的摩]

我亲爱的沃尔特:

虽然我爱你,不,不,不!如果我要为谁做这件事,我一定会为你的丛书效力,我很喜欢这套丛书,不过我的提议是,既不要写书,也不要写什么特稿,或是关于这个可怕话题的任何东西,它已经成为我公务思维的对象了,当然不可以继续侵蚀我的私人生活。也许情报部的H.G.尼古拉斯可以为你做这件事——他十分了解这个国家,更乐意写东西。可咨询的最佳人选是罗宾·克鲁克香克,情报部美国司主任,我希望你认识他,他很仁慈,没有官僚做派,而且很有见地,或者也许格兰维尔·巴克<sup>2</sup>也行——我可以将你的信转寄往他在纽约的住址,这会儿我找不到那个地址。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会做得很优雅,文学不会被忘记。

我还没有用上你热心写给施纳贝尔<sup>3</sup>的介绍信,不过我会用上的。他的

- 1 在二战期间与战后(1941—1950)柯林斯出版的丛书,涵盖了英国历史、文化、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形成英国宣传攻势的重要部分。这些书有漂亮的插图,配有由杰出撰稿人所写、长约三十页的文章,作者包括伊丽莎白·鲍恩(《英国小说家》,1942)、埃德蒙德·布兰登(《英国乡村》,1941)、戴维·塞西尔(《英国诗人》,1941)以及西尔维娅·林德(《英国儿童》,1942)。W.J.特纳(上文第399页注1)是这个系列的编辑,也是其中八册书的作者,包括《英国音乐》(1941)。也许他邀请伯林写一本关于美英关系方面的书(见1945年6月12日伯林又给特纳的信,见下文第681—682页)。
- 2 哈雷·格兰维尔—巴克(1877—1946),英国演员、制作人、导演、戏剧家与莎士比亚学者,著有《莎士比亚引言》(1927—1948);战时多数时候居住在美国;为纽约的英国情报处图书馆工作,在哈佛讲学。
- 3 阿特·施纳贝尔(1882—1951),出生于波兰的钢琴家与作曲家,为普及贝多芬先前未受到赞赏的钢琴作品做了大量工作(见上文第176页注1)。

演奏，根据在本地听众中产生的影响，是足够令人惊奇的，像以往一样气势恢弘——他的演奏极为出色。美国这里最受欢迎的作曲家是拉赫玛尼诺夫（所以他是在苏联，我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意味深长而又不怀好意的念头）。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伯林结束治疗，与摩根夫妇和约翰·惠勒—班纳特在位于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卡萨·马纳那的莫洛别墅会合。悠闲自得的两个星期、灿烂的阳光、535  
情投意合的伙伴，似乎强化了他的幽默感，后来惠勒—班纳特亲切而又恼怒地回忆道：

我们3月中旬打道回府，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第一步，我们要乘坐四天的火车，直至密苏里圣路易斯。我们在得克萨斯的拉雷多穿越边境，进入美国，在那里遭遇了移民局与联邦调查局的警戒。虽然我们的证件完全符合规定，我们还是必须回答问卷，提供生活细节。

“你在哪里出生？”一位官员问以赛亚。“在里加，”他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哪儿？”对方疑虑地盘问。以赛亚那天有点恶作剧，“那是，”他十分精确地回答，“东波罗的海的港口。”“它属于哪个国家？”伯林以一种给落后班级上常识课的口吻答道：“它属于我的祖国拉脱维亚，我1909年在那儿出生时，拉脱维亚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一起，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德国吞并，然而，无疑如你记忆的那样，这只是非常短暂的时期。在巴黎和会上，这些国家的独立得到了承认，它们保持了这种愉快的状态，直到1940年被俄罗斯再次吞并。然而，1941年它们又被德国占领了。”“那么你是德国人？”联邦调查局的人打断他的话问道。“当然不是。”伯林掷地有声地回答。

关于拉脱维亚过去、现在与未来外交地位的讨论仍在继续，直至最后询



问伯林的官员正确地提出问题：

“你是苏联公民吗？”“当然不是，”伯林傲然答道，“我是英王陛下的臣民，如果您看看我的护照，它正在您的手里，您就会了解我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在我的日记里，我注意到我们在拉雷多的停留长达十小时，我认为这样的延误很大程度上是伯林的幽默感所致。<sup>1</sup>

致大卫·斯科特爵士

1945年3月23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私人机密信函

亲爱的大卫爵士：

536 非常感谢您2月22日的来信，它很迟才送到我手里，而当时我由于接受一个小手术而暂时没有工作。我担心，由于我们似乎只在我住院的时候才有通信联系，您也许会以为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疑病症患者。我承认，在这些了不起的医疗机构里，住在雪白的病房里，享受绝妙的个人空间，远离世事，对身处这个被泛光灯照亮的国家的人而言既是种放松又是个奇迹，但不能否认，在别的时候我也热爱这个世界，而且，恐怕我还热爱血肉。不是对魔鬼的热爱——在这个干净清洁、人们性格充满阳光的国家里，看不到他存在的任何迹象。你要远至墨西哥（像我那样）才会找到他。

我为我的这些闲扯道歉。我真正想要说的是，我能向您充分保证，在回国之前，我没法做任何事，而且，我希望在给汤因比的信中，估计他给您看过我的信了，我没有渴望为他做事的意思；自然，我尽可能使去信彬彬有礼，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不管怎样，他对我的邀请都是合适慷慨的；但是在您看来，以及在私底下，可以说，在1940年，甚至在1942年与1944年，陷入不见天日的洞穴、成为饱受压抑的教授们中的一个，如此前景对我不是太

1 约翰·惠勒一班纳特，《特别关系：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美国》（伦敦，1975），第197页。

有吸引力。在这儿，与我谈过此事的每个人似乎都对研究处那种虽生犹死的氛围持有更悲观的看法；也许，我已经品尝了太多鲜血的味道——如果这么稀薄的汁液也可以被称为血液——参与过真正的政治交流，我已经不能轻松适应如此隐蔽压抑的生活了。也许我对它的看法并不公平，但在我眼中，现在正在那里工作的我最热爱的同事们，在1944年不是为避难而沉迷于远离世事的学究式研究，就是在格莱德温的简短命令之下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也许老办公楼<sup>1</sup>对所有在里面办公的人都产生了影响，或者只是我太目中无人了；但无论是国务大臣，还是我咨询过的任何一个人对这个议题都不甚称许。如果我打算脱离行政事务，我更乐意彻底远离，也就是回到牛津。另一方面，当其他人依然还在这里埋头苦干时，我却要重新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当然使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所以，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很[不]愿意太过挑剔，可根本上我主要的难题就是如何离开这里。哈伯爵得到我即将离开的消息之后，11月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反应，突然，在2月他似乎开始对此有些抱怨了。他还没有和我谈及此事，但是我从迈克尔·赖特那儿得知，他看不出我有离开的理由，并提议，如果我有焦躁不安的表示，就“用大铁锤”，这是他的原话，把我敲在工作机器上，不留一点商量余地。这听起来很恐怖。由于他和我最近都不在，和新学院院长的会面尚未进行。他的理由在我看来很简单，他无疑是把我看做一匹能够完成某种规定任务的役马，而且他看不出有何必要打乱这样的工作日程。我担心，在院长阴森森的书房里面谈时，他将严厉地看着我，质问我是否打算在这个时候离开岗位。如果我在伦敦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获得政府工作，我至少可以使这份工作显得比我目前在这里所从事的极其外围的活动更重要一千倍；可是既然没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在等着我，即使我受过牛津最虚伪的辩证逻辑的训练，也觉得坚持说我在牛津的紧迫职责比我在这里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重要，至少可以说是很难为情的。因而，为了避开面谈，避开大铁锤等等，我已经软弱地同意留在这里直至5月底，可这个问题只是被搁置到了那

537

---

<sup>1</sup> 在大圣所，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1943年夏天，外交部政策研究处作为外交部的新部门成立，搬到那里办公，并将大部分工作人员从牛津迁至伦敦。

个时候。除非我有一个合理的借口离开，我不太清楚，除了争吵之外，我如何才能离开？而我生性又不善争吵。您那边可否提供任何机会，使我有一个比较体面的理由离开这里，或是，不论怎样，可以让我在近期（我希望是非常近期地）回一趟伦敦，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为您效忠的我将不胜感激，不胜解脱。

又及：给您增添如此负担，我真的深感抱歉；除了成为汤因比手下的穴居人之外，我得到的另外一份工作邀请迂回来自达夫·库珀，但由于这份工作涉及巴黎“公共关系”，我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所以谢绝了，但这次我是怀着真诚表达的感激回绝的。我真心希望你把这当作是发自深渊<sup>1</sup>的悲鸣。如果您能为我搭建哪怕是临时性的桥梁，或者是阶梯，无论它是多么摇摇欲坠，只要可以引导我走向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回到伦敦，我将永远感激，并且会登上它，不论它是多么岌岌可危。我相信我现在正式地归属您的管理了，因而毫不犹豫地服从您的安排与您智慧的指引。

3月26日伯林参加了约翰·惠勒—班纳特在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婚礼。<sup>2</sup>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4月4日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这是一种新型短信。我非常健康，必须承认医学的疗效。“非手术的手术”的精确性，见面以后我会向你们描述的。此外，墨西哥之行很成功，见

1 伯林此处原文为：vox clamantis—de profundis，典出《圣经》的《约拿书》与《诗篇》第130章。

2 与鲁斯·哈里森·瑞舍结婚。

到D.H.劳伦斯<sup>1</sup>笔下陌生、荒凉、拘谨、充满了残忍与某种野蛮想象的国度，令我非常高兴，不过我不希望再去那儿了。莫洛太太对我很好，我要写信给她表示感谢。

我谋划着6月份回来，要么是永久性的，要么是一次旅行，我会告诉你们更多关于我墨西哥之行的见闻。史密斯没有什么表示，不过鲍拉博士寄来一封非常有意思的信，他对哈特的人选非常不高兴，也和我一样不喜欢萨姆纳在全灵学院当选。<sup>2</sup>他是一个很沉闷的人，虽然像埃尔·格列柯的肖像人物一样好看。大使显然不愿意让我走，外交部神秘地暗示希望和我讨论这个或是那问题，一切要到我回伦敦才会明朗。

请向戴维和玛丽转达我的爱。我很高兴你们去了伯恩茅斯。我期待着查尔斯这个月的到访。上一次与豪斯廷的沟通，如我信中对你们所说的那样，取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

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告诉你们了，除了我的健康状况，希望你们如我一样健康。我肯定，在夏天结束之前我会见到你们，通过某种方法。我不会去旧金山，因为这里需要有人一直写政治报告。总的说来，我很高兴这样，因为现在那边的接待条件很糟糕，三个人一个房间，而且这个场合的意义似乎不太像曾经预言的那样重大。所以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前往，我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婉言谢绝了。我相信从各方面看，安静地待在这里——尤其是如果我将夏天看望你们——比我毫无目的、精疲力竭地去那里待上六个星期要好得多。

我只能再次说，我觉得自己身体非常好，精神也很好，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担忧的。再见。

以赛亚

---

1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1920年代曾在墨西哥住过一段时间，他在1926年所写的小说《羽蛇》是对墨西哥与阿兹特克文明的生动再现。

2 接替亚当斯。

致伊丽莎白·莫洛

1945年4月4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莫洛太太:

我动手写这封信并很快意识到, 虽然手写的书信比任何印刷或是打字的书信都更友好, 更真诚, 可是手写书信也有严重缺陷, 它不可读, 或者至少是不可破译的, 因为, 如果说我的话语很令人费解, 那么我的书写比我的话语还要更难懂。所以我求助于一种更为现代、不过我还是认为不很亲切且更为呆板的方式, 来对您说我是多么深切地感激在卡萨·马纳那您那里逗留的两个星期。<sup>1</sup>我抵达您那里的时候, 疲惫不堪, 如果没有在库埃纳瓦卡度过对我而言美妙而又极为宁静的日子, 我也许依然精神萎靡。我只希望我没有耗尽他人的精力, 恐怕我的确说得太多。<sup>2</sup>不过奥博雷和约翰, 虽然也许是主要的受害者, 现在看起来似乎可以起床活动了; 我出席了在夏洛茨维尔举行的婚礼, 那是一场豪气冲天的婚礼, 将来宾卷入势不可挡的、南方式的热情好客之中; 也许那真的不错。

我回来的时候对墨西哥与墨西哥人充满了纠结的情感——他们比我预想的更黑更暴烈, 真正的中世纪野蛮与迷信, 比我在华盛顿遇见的其他如阳光般快活的拉丁裔美国人有更丰富的气质与更隐秘的内心。墨西哥的土壤显然很肥沃, 能够生长出最茂盛的植物, 可是人们脸上的表情令我害怕, 我可以尊敬他们, 崇拜他们, 可是置身于他们之中我从不觉得自在。卡萨·马纳那的生活多么明快而文明; 哦, 那读书与畅谈的快乐, 无需一直怀着负罪感, 担忧自己遗漏了那些堆积于案牍之上不忍卒读的官方报告。我真的永远对您充满感激。

---

1 他们位于库埃纳瓦卡的宅邸 (坐落在一条后来以德怀特·莫洛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旁) 包括莫洛夫妇建立的一所精美的民间艺术收藏馆, 现在那里是一家专做墨西哥特色菜的饭店。

2 约翰·惠勒一班纳特如此回忆, “我们坐在花园里, 或闲聊, 或争论, 或只是静默地待在一起 [……], 然而以赛亚一来 [……] 就没有那样的静默沉思了”, 见前引书 (上文第632页注1), 第196页。

我还在读哈耶克博士写的那本可怕的书<sup>1</sup>，我听说，他现在人在纽约，而且令他的维也纳导师冯·米瑟斯博士<sup>2</sup>心生妒意，后者只是过时人物，仅此而已，他过去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专栏中亨利·哈兹利特<sup>3</sup>的那些反动文章背后的主要影响人物。冯·哈耶克博士与冯·米瑟斯博士正为了赢得哈兹利特先生的灵魂而竞争，二人之间由此萌生了强烈的妒忌。

同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写了一篇简短而尖刻的短文，是关于哈耶克博士的书、其影响以及它如何被《读者文摘》利用，还有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文件<sup>4</sup>等等，结果却发现H.巴特勒先生把这本书连同所有对它的赞扬与钦佩一起引进英国情报处图书馆，并向这儿的每个人推荐。唉，我担心这个事实让奥博雷太快活了，可怜的巴特勒先生，在最近的全灵学院院长选举中，恐怕他为了这个职位而渴望地叹息。我们听说，甚至都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而且，他也不会去旧金山。不过，他没有A.麦克利什的麻烦，后者悲伤地问我，如果秘密协议一直在酝酿之中，那么他所宣布的直言待人的新政策会有什么结果。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一个职责是教育公众理解有些谈判是需要保密的，然而他显然感到这不是诗人与讲坛的职责，也许他是的。

再次非常感谢你，我希望在我最后回英格兰之前，我们可以见个面。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 
- 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以保守观点与对凯恩斯福利国家概念的批评而闻名，1931—1950年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后来（1974年）与贡纳尔·米达尔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伦敦与芝加哥，1944）其时刚刚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浓缩版。
  - 2 路德维希·埃德勒·冯·米瑟斯（1881—1973），奥地利—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13—1938年在维也纳任教（哈耶克当时是他的学生），二战期间他在纽约大学任教。
  - 3 亨利·斯图尔特·哈兹利特（1894—1993），作家、记者、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倡导者，受到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评论文章（1934—1946年，他为该报撰写社评）。
  - 4 《华盛顿快讯》，第534—535页。

## 致赫伯特·尼古拉斯

1945年4月4日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赫伯特：

也许药真的很管用，因为毫无疑问我觉得好多了。我企图拒绝承认这样的感觉，但是无可否认我更加享受外面的世界了，而内心世界仍像以往一样贫瘠。你寄来的所有亲切的书信都令我非常感动，尤其是罗宾那了不起的杰作，先是送给奥博雷，然后又送给了我，我要另外给他回信。我的父母，似乎也不那么歇斯底里了，不再需要我如此残忍地让你编造那些赤裸裸的谎言，使你深感良心不安。所以，一切都好了。

我不会去旧金山，因为那里已经有阿奇（依照外交部的要求），而这里需要有人不断发出政治报告，此地的混乱形势足以证明继续驻留人员专司此事的必要性。我与大使阁下进行了第二次面谈，他骑上了更加高大的道德之马，大谈荣誉、良知、责任等等。然而，我决定，如果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回去一趟，我就会回来。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我就重返牛津，一去不回了。全灵学院的机构似乎完全一团糟了，沉闷的萨姆纳的领导，智力迟钝的阿林顿，大学学院那个一点聪明不了多少的怀尔德，还有耶稣学院的非国籍化<sup>1</sup>，试图任命E.H.卡尔为俄语教授的疯狂努力，新学院布洛克先生暗淡无光的形象<sup>2</sup>，等等。我想，是时候回去了，为理性而奋斗，你认为呢？

至于我们这边，科尔达考察团一行人至今没有抵达的迹象，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即将到港的船只乘客名单上。如果他们是10号动身的，那么他们人在哪里？即使是一只充气筏子也该到了吧。

这里的勾心斗角越来越疯狂了：利特尔顿<sup>3</sup>与卢埃林两位先生说，没人

---

1 关于阿林顿、怀尔德与“耶稣学院的非国籍化”，见下文第809—810页。

2 阿兰·路易斯·查尔斯·布洛克（1914—2004），后来（1976年）成为利菲尔德的布洛克男爵，历史学家，1945—1952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学监、历史学导师。伯林后来修正了这个也许是根据不充分的直接证据所做的非典型性错误判断。

3 奥利弗·利特尔顿（1893—1972），后来（1954年）成为山多斯子爵一世；1940—1954年任保守党下院议员，1940—1941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42—1945年任生产大臣。

和他们讨论粮食问题；伯恩斯先生<sup>1</sup>甚至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突然被打发走了，只留下可靠、仁慈而又对情况一无所知的文森<sup>2</sup>。美国人先是要求得到联合国大会的三张选票，然后又说他们不想要了。<sup>3</sup>至少可以这么说，人们对苏联忧心忡忡。布思比先生<sup>4</sup>在为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sup>5</sup>而奔走游说，并宣称不管怎样已经暂时把它扼杀了。他是不是比弗<sup>6</sup>派来的职业杀手？他说：“我不会让你们这该死的大使馆把我变成殉难者与替罪羊。”谁的替罪羊？他自己的吗？他真的干了好些破坏活动。有他在的确令人兴奋，而且令人开心，无论是他的手段还是动机，他都毫不隐瞒。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挑拨离间者，我可能会很喜欢他的，尽管他既粗鄙又没教养，就因为他长得像约翰·L.刘易斯，只不过是刘易斯的可笑的变体。 542

瑞兹戴尔先生<sup>7</sup>来这里了，除了与弗迪·库恩<sup>8</sup>在一起之外，他没有承担什么特别职责，似乎是库恩邀请了他。我不能想象这样两个软弱的人的组合能够产生出什么结果。留一副大胡子的奥博雷相比要强悍些，即便在这会儿，不用说也肯定在教训瑞兹戴尔。罗杰·迈金斯的到来让这个大使馆总体士气大不一样了。冷漠无情是有极限的，而赖特先生轻易地达到了这

1 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1879—1972），有影响的律师与政治家，1931—1941年为民主党参议员，1941—1942年任最高法院助理法官，1942—1943年任经济稳定处主任，1943—1945年任战争筹备处（负责监督国内战争筹备工作的中央机构）主任，1945—1947年任国务卿。

2 弗雷德里克·莫尔·文森（1890—1953），1942—1943年任紧急上诉法院首席法官，1943—1945年任经济稳定处与战争筹备处主任；后来（1946—1953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3 2月4日至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晤，商谈最后阶段对德、日的作战方案，以及战后美、英、苏的势力范围划分。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意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大会的会员，这样就给了苏联集团三张选票（而不是苏联所要求的十六张选票）。罗斯福保留为美国再获得两张选票的权利，但他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4 罗伯特·约翰·格雷汉姆·布思比（1900—1986），后来（1958年）成为巴肯与拉特瑞海德的布思比男爵，1924—1958年为保守党下院议员。

5 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商讨战后世界金融格局安排，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批准该协议的国家达到所需数量之后，这两个机构在1946年开始运作。

6 比弗布鲁克勋爵。

7 威廉·瑞兹戴尔（1890—1957），1941—1953年任外交部新闻处负责人。

8 小费迪南德·库恩（1905—1978），1925—1940年任《纽约时报》记者，1937—1939年为驻伦敦首席通讯员，1940—1942年任财务大臣助理，1943—1945年任战争情报部英国部负责人以及海外部副主任。



个极限。

就你关于通讯的详细询问，纽约那边会给你寄剪报，而我这边会以一贯的佯装传球的手法发给你大使馆寄给外交部的普通报告副本，加上所有电报——电报极少——也许有交换。同时，尼科尔告诉我，你提供了某些商业通讯，大使馆觉得很有价值，关于这个题目一年要花费一百美元，你请我们尝试寻找其他客户，例如邮局，一起来分担费用，而财政部那边就此还没有任何答复，所以我想在那方面目前尚无可为之处。

哈耶克教授已到此地；《读者文摘》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等大肆鼓吹他的书，这一点正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巴特勒先生对它赞不绝口，把它引进英国情报处图书馆，在此我不说你也知道。关于旧金山会议，情报处图书馆一筹莫展。我认为罗宾不来是邪恶之举，并且告诉俄国人，这是对他们不派莫洛托夫过来的报复。俄国人有些糊涂了，但无疑会将此事报告莫斯科，而他们的反击会适时出现在《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sup>1</sup>上。

麦克利什先生郁郁寡欢，急于了解民众对他的坦率新政的看法。然而，总统似乎安抚了他一番，于是他就像家猫，又呜呜地转悲为喜了。如果总统去世<sup>2</sup>或是退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会由杜鲁门与斯退丁纽斯<sup>3</sup>来打理吗？我的信就以这有趣的口气结束吧，我会很快再次写信的。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

1 一份莫斯科的双周刊，1945年更名为《新时代》。

2 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周内去世。

3 小爱德华·赖利·斯退丁纽斯（1900—1949），1939—1941年任战争资源委员会主席，1941—1943年任租借管理人、总统特别助理，1943—1944年任副国务卿，1944—1945年任国务卿，1945—1946年任驻联合国美国代表。

致大卫·斯科特爵士

1945年4月4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刚刚和大使面谈了,觉得有必要将此事告诉您。他让人来把我找过去,说他听到传言,说我想离开,然后他说对此甚为遗憾,等等,说对于这个念头,我应该深入地拷问自己的良心,审视自己的责任感,并进行一次最深刻与彻底的自我反省。倘若如此扪心自问的结果显示出我还是有责任要离开,那么他就与我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是在旧金山会议之后。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疑这一次他要驱策着一匹道德的高头大马冲着我过来了,而我却不知如何应对。我在想,留在这里,一直到比如说旧金山会议结束(因为无论如何,按照合约我都得待到5月底),然后去伦敦,哪怕只是短暂逗留,根据可能在伦敦听到的主张或是提议,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并保证回到美国,结束在使馆的工作,然后在深秋时节,不论是否再回牛津,都永久性地返回英国,不再回来了。不知这对我是不是上策。我不希望自发地设计出这样一条航线作为我这方面的计划,因为我刚刚去过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住院治疗,还休了两个星期的假,显然这边希望我能连续待上一段时间,或者如果我能安抚自己的良心,就永远地离开。可是一旦我是被召回伦敦的——我现在已经正式调到大使馆了,所属的部门是外交部——那么就另当别论了,我想这边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假如您心有灵犀,也许可以安排此事,我就可以与赴旧金山开会的代表团一起返回英国,不管他们 544  
准备何时返回、如何返回,都无所谓。如果这样的要求给您的上一封来信施加了过多负担<sup>1</sup>,请多加原谅。但是如果能安排我在夏天短时间回伦敦一趟,我将不胜感激。

这边我只与罗杰·迈金斯讨论过此事,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并同意最好由伦敦发出这样的召回指令。我确实希望汤因比没有对我寄予过多希望,对于这个杰出而敏感的人,我感到良心饱受谴责。

你永远的

1 即增添太多麻烦。

致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1945年4月9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达夫妮:

天空又是蔚蓝的了, 阳光灿烂。我指的是我的个人世界, 尤其是关于你的部门与我之间饱受困扰的关系。尼克寄来一封甜蜜的信, 罗宾寄来两幅画作, 加上你自身忠贞可靠的品质, 所有这一切, 促成了这一巨大变化。我又爱上了你们大家。无独有偶, 说到罗宾, 你最好不要把我说的告诉他, 他似乎一直在慷慨地派发涂了蜜糖的蛋糕, 因为格雷厄姆·胡顿、本[·托马斯]、奥博雷, 还有天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 都收到了他悦人的颂词, 格雷厄姆已经对此展开了全面调查, 你带头带来了美好感觉的浪潮, 使一切都充满愉悦和乐趣。虽然上面的话具有反讽意味, 效果无疑不错。即使是格雷厄姆, 虽然宣称不需要这样的小恩小惠, 私底下还是大感受用的。对他而言, 心怀感激的政府颁发的小巧而讨喜的勋章依然是受欢迎的礼物, 不过我怀疑大臣是否同意。<sup>1</sup>

545 我的手术以及随后在墨西哥度过的假期都很令人满意。鼻窦的不适感已经被我鼻子里某个隐秘部位的特殊感觉所取代, 不过这样的取代是值得的。至于我的返回计划, 被你说中了。大使再一次派人把我叫去, 骑上道德的高头大马, 说我们可以在5月中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可以果断地终止工作关系回英国去; 但我更愿意使用罗宾的巧计, 在夏天请假回伦敦, 然后也许就不回来了, 或是只回来逗留一个月, 收拾行李后便永远离开。像我现在这样, 我觉得, 自己就是外交部的奴隶(对我的安排, 他们给了最神秘的暗示, 却就是不肯透露哪怕一点点具体消息。对此我并不好奇, 因为我不打算接受他们的任何提议, 不管它们有多么诱人), 我私底下给大卫·斯科特爵士写信, 请他把我召回伦敦, 至少在这个夏天的某个时候可以谈谈。

1 在1946年新年嘉奖名单上, 胡顿获得了英国新工党政府颁发的英帝国勋章。

我唯一的希望就维系于此了。如果6月之前没有任何动静,我想自己就不管怎样都要走了。倘若每月一次请求回家,他们一定会厌倦这样的消耗战。如果你可以设法让某个人正式召我回去,我就太高兴了。我显然必须留在这里,直到旧金山会议结束,否则,阿奇不在,他去了旧金山,这里就没人写政治报告了,但到5月底,一切就会结束。

布思比先生的独特身影从我的生活轨道上一闪而过。他不做好事,比弗显然是派他来此破坏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而他宣称已经得手。不能否认,我发现和他一起度过的夜晚很愉快而且令人兴奋,虽然他本人无疑是最寡廉鲜耻的无赖,总是滋生事端。他给我寄来他的演讲代理人所发布的关于他的报道,说他的文字才华可与莎士比亚或是《圣经》争辉。说句他的好话,他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人,总是毫不犹豫地亮出所有底牌。对他,大使本应采取强硬措施的,但据他自己说,特别是B先生也这么说,采取的却是既紧张又友好的态度。结果,B先生走了,认为无论自己在华盛顿或是旧金山——在旧金山他将代表《世界新闻》——泄漏多少秘密,真实存在的与凭空制造的秘密,可怕的事也不会因而在他身上发生。欧毕自然对他的邪恶活动感到惊慌,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博士<sup>1</sup>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接下来的一片巨大乌云与殖民地托管治理有关。公众普遍认为,我们反对解放殖民与托管体系,也许这种看法是对的,[奥利弗·]斯坦利上校最近的访问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这样的印象。美国人当然相信托管体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我们,虽然多次讨论过地区自治问题,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我们并不这么想。如今政府各部门之间争执激烈,各自都想扩充自己的地盘,而国务院则想实行国际化。而我们是不可能从自由主义者与侵略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中得到什么益处的,因为他们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都反对我们。此外,像以往一样,我们似乎没有自己的方针路线,只是坚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并做些补充,而这么做一点儿都不会得到

---

1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892—1948),凯恩斯派经济学家;1934—1946年在美国财政部任职,1945—1946年任部长助理,1946—194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任)美国执行干事;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对此他发誓否认。

支持。其他各部门似乎认为殖民部对此态度恶劣，或许他们的确如此。

美国的三张选票被炒得沸沸扬扬。斯退丁纽斯似乎在暗示，此事是在雅尔塔在伯恩斯先生与弗林先生<sup>1</sup>的建议下进行的；<sup>2</sup>伯恩斯不满地声辩，他在讨论此事的前一天就离开了雅尔塔，因而与此无关，等等。从没有哪一次会议像这样在对结果的极度悲观之中酝酿召开。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自治领的抗议之声，甚至不比作为英国女王政府的驯服跟班时的抗议声更响亮些。为什么就没有人在同盟国投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壮着胆站出来发出呐喊？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最近太多的好人遇难了——可怜的特温提曼<sup>3</sup>真的是个非常友善的人，他身后留下几无保障的妻儿；鲍勃·布兰德<sup>4</sup>的儿子<sup>5</sup>，我见过他，人很大方：鲍勃本人的状态糟糕透了。还有，你是否认识在雅典的戴维·华莱士<sup>6</sup>？我非常喜欢他，并让《纽约时报》的赛德维克先生<sup>6</sup>向他致以最动人的颂词，赛德维克先生已经从雅典回来，心中燃烧着亲英的热情。他热切地为利珀<sup>7</sup>辩护，认为我们没有犯错<sup>8</sup>，只有凯西犯了错<sup>9</sup>，他对凯

1 爱德华·约瑟夫·弗林（1891/2—1953），律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密友，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人称“布朗克斯老大”，1929—1939年任纽约州州务卿，1940—1942年任全美民主党主席。

2 见上文第639页注3。

3 也许是爱德华·特温提曼（约1888—1945），查塔姆群岛公民，3月27日死亡，被英联邦战时治丧委员会列入“海上空难”死亡名单。

4 （罗伯特·）詹姆斯·布兰德（1923—1945），冷溪卫队上尉，3月30日在德国阵亡。这是鲍勃·布兰德几年内再次经历的巨大悲剧，1937年他的妻子菲丽丝（南希·阿斯特的姐姐）去世。

5 1944年8月17日去世。

6 亚历山大·卡梅隆·赛德维克（1901—1996），1925年起任《纽约时报》记者；该报驻雅典的特约通讯员，他与他的雅典妻子定居在那里。

7 雷吉纳尔德（“雷克斯”）·怀尔迪格·艾伦·利珀（1888—1968），生于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外交部新闻处与政治情报处的前负责人，1940—1941年任英国特别行动处宣传部负责人；自1941年8月政治作战处成立起至1943年在执行委员会任职；1943—1944年任希腊政府驻开罗大使，1944—1946年任驻雅典大使，1946—194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

8 在德国占领期间，希腊共产党形成了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展开了反对非共产党派别的内战。德国军队1944年10月的撤离使国家联合政府从流亡地返回雅典，一起返回的还有一支英国军队分遣队。首相吉奥乔斯·帕潘德里欧（1888—1968）迅即号召共产党军队解除武装，遭到对方反对，并在11月导致了共产党国民解放军（见下页注1）与政府之间进行的第一阶段希腊内战，英国支持希腊政府；虽然战事发生地仅限于雅典，但是这次冲突十分猛烈，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亡。

9 可能是威廉·约瑟夫·凯西（1913—1987），美国律师，其时在伦敦负责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在

西颇不以为然，正到处发表反对国民解放阵线<sup>1</sup>的演说，他似乎很有把握， 547  
认为一旦通邮，此地的希腊餐馆老板就会知道他们在希腊的亲友境遇如何，这样我们的股票就会反弹。也许吧。赛德维克先生因为那些记者人品不好，而且行事方式不当，对他们也是极度反感。我自然要赞同地点头，并热情地和他握手。

旧金山真的变得越发古怪了。不仅每一家政治机构、每一个政治压力集团、每一个欧洲政党与古怪发疯的机构都打算派遣代表团去那里，而且，仅仅靠140名英国官员、160名法国官员、280名美国官员是无法让事情改观的。另外，朗沃思太太与毕尔太太在旧金山开放了一处宅邸作为官方沙龙，在那里以各种速度交换谣言。虽然斯退丁纽斯勇敢无畏地努力支持一个正在衰退的市场，总体气氛却神经兮兮。不过，牛津的教员们来了，我必须见他们。

给你许多的爱

以赛亚·伯林

又及：还有一件事，需要借助您最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深谋远虑。关于玛丽·库克<sup>2</sup>：在与每个人建立了和平关系的基础上，现在该您的部门负责与英国情报处的调查室一起来制定一个权宜之计了。想起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已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了（哈！），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正式权力，只能以个人身份向您讲述如下情况：显然一位英国公民是不可能成为纽约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的。玛丽·库克充分意识到（或者这有所夸张），伦敦方面怀疑她与其说是英国人民的特工，不如说是美国共和党人的喉舌。然而，如果您想令她以及她手下的那帮小朋友们听话，显然她还是那个部门能力最强

-----  
欧洲占领区（包括希腊）进行的秘密行动，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凯西后来（1981—1987年）任局长。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名声并不好，部分原因是它一直未能与其他组织取得联系。

- 1 即“Ethnikon Apeleftherotikon Metopon”，希腊抵抗运动力量；五个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组成的共产主义右翼控制的游击组织国民解放军。
- 2 玛丽·门罗·库克（1907年出生），美国侨民；1941—1944年任纽约英国新闻处（调查室）初级助理，1944—1945年任纽约英国情报处调查室助理主任（1945年11月辞职）。

548 的人，因此必须做到下面两件事之一：要么解雇她，要么让她了解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她实际上是受到信任与喜爱的，否则她就会像目前这样牢骚满腹。一方面，尼克抱怨调查工作正每况愈下，对所报告的事实获取方法不正确，也许他没有说错。另一方面，据玛丽说，她意识到，寄给尼克的那些彬彬有礼的信函得到的唯一答复仅是些口气不无暴躁的电文，抱怨这件或那件事办得不好。我对双方都很同情，或许，您也是如此。显然她是已经尽力了，而科恩对此情况甚为了解，他不可能忘记尼克来此访问时说到的国际紧张局势，特别还谈到在此领域为英国情报处工作的美国人的问题。玛丽·库克显然是由于这样的经历而蒙受创伤，我建议的方式是，美国人确实继续为我们做这份工作，既然这不可避免，我们的态度最好就是，严格以他们所提供情报的质量而不是来源为评判依据。当然，每当听到来自纽约那边的指责，都会令您感到真实的怨恨与不满，但除非伦敦肯定派人过来取代玛丽，倒不如最终确认玛丽的位置，提升她为调查室负责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得到确认之后，她与您所在部门的某个人之间就会展开友好而无拘束的联络，不论这个人是您还是尼克。如果您那边可以给情报处调查室送去一些免费的奶油，说几句好话，并且，每一次严厉的批评都附带几朵玫瑰花，奇迹肯定会发生的。这只是我这个老好人的建议，而我自己现在也正被安抚着。不过我肯定您通晓局势，也许您可以和罗宾谈谈此事，或许他会主动找尼克做妥善安排。虽然我不太喜欢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但由尼克来做或许很好，我不想显得对此不加赞赏。我认为这是最棘手的一个外交案例，而不可否认，您有无限的能力。所以此事就交给您了。罗宾发自伦敦的定期报告说，在伦敦眼中调查科的工作也许是英国情报处最有价值的部分了——为了使其更有效率，电影、展览或是其他任何事都值得牺牲；这么说只是为了让奥博雷烦躁不已，因为其中暗示了对他价值体系的批评。所以，如果我是您，我要么把门关上，要么就敞开大门，即，要么解雇玛丽，派一位英国特工过来，要么就表示出对她的高度信任。您本人对此是怎么想的？理想的方案是，尼克本人愿意写一封信，极力赞扬调查室做出的哪怕是最不值得赞扬的工作努力，并同时附上有关变动的建

议。不过我知道，要伦敦这么做有多难，因此，如果需要我通过巧妙渠道，让上面了解哪些改革是人们希望得到的，同时在调查室目前框架之内又是可能实现的，我会乐于执行这样的使命。还有什么比这更合情合理、令人满意的吗？

549

各国外交人员为了起草联合国宪章而召开会议，聚集在旧金山，而伯林终于不得不失望地留在华盛顿，这时他得到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令他兴高采烈。伯林是这样回忆的：

那时，克拉克·科尔，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很古怪的一个人，[……]取道华盛顿去旧金山，他是被召去那里的——作为随行人员中的一员。我们一起吃午餐。出于某种原因他从美国人那里听说了我，所以我[被]大使哈利法克斯邀请共进午餐，与他见面。我坐在他旁边，闲聊着，相处甚欢，然后他说：“瞧，我听说你的俄语说得和俄国人一样好，事实上你就是俄国人。[……]我的使馆里没有谁能说很好的俄语。你是否愿意过来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我来看看能否办妥此事。”<sup>1</sup>

##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5月5日[手稿]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为什么不行呢？我是说为什么不要去莫斯科？A.克拉克·科尔爵士，有魅力，充满机智，很聪明，很能说动人。他的大臣，J.贝尔福先生，刚到这里顶替R.坎贝尔爵士的大臣一职，贝尔福在莫斯科待了两年，向我描述出一幅非常吸引人的图景。我去莫斯科的工作安排总共只有三四个月。按照计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划,我7月离开这里,8月初到牛津,9月初动身,在莫斯科待上9月的后半月,10月,11月,12月,1月的前半月,在1月(底)回到新学院,重回我的宁静生活。这是一个不能错失的机会吧?我渴望去那里有多久了?俄国人这么快就能办妥外交签证<sup>1</sup>吗?我在那里可以和贴心好友,即科洛思维特在一起,当然会比和陌生人在一起好得多——莫斯科之行的魅力巨大无比。我现在处于最佳健康状态(如史密斯已经告诉你们的那样),我的鼻子再也没有异物感了,目前为止我一点鼻炎的烦恼都没有,除了有一次患上了普通的感冒,两天就好了,所以我真的比不知多久以来要觉得好多了。我对华盛顿烦透了厌倦极了,如你们所知,立即停止这样来回奔波不太合适,所以取道莫斯科做最后一圈兜风再正确不过。

7月和8月见到你们时,将和你们详细叙述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时候我将回到英国,并希望这次买的是Inecto3号<sup>2</sup>。但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看到这里,你们会长长地叹口气),克拉克·科尔说没有人愿意在那儿待上三四个月,而新学院似乎真的需要我,所以只要我不在那儿待得太久,看起来这会是个好主意。也许,我还能去彼得格勒看看,或者随便什么如今在列宁格勒还可以看得到的遗迹——取道奥斯塔什科夫、安德烈亚波尔,托罗佩茨……如果此行能够享受“外交”待遇,应该不会错过这些地方。<sup>3</sup>

我见到了你们的科尔诺先生<sup>4</sup>,他友善大方、彬彬有礼。为了怀旧,明天我将同雷伯·亚非<sup>5</sup>一起吃晚饭,我将和他谈论他青年时期的俄文诗歌——

1 1945年4月23日, N.柯尼科夫致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弗兰克·罗伯茨的信中说到,应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2月20日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V.M.莫洛托夫的信中要求,驻伦敦苏联大使馆“按照指示为以赛亚·伯林先生颁发签证”。

2 Inecto公司出售的一种产品,该公司批发化妆品,尤其是染发与护发产品;自从二十四岁头发变成灰色起,玛丽·伯林就开始染发。

3 圣彼得堡在1914年更名为彼得格勒,原来的名字被认为太德国化;1924年,又更名为列宁格勒。奥斯塔什科夫、安德烈亚波尔与托罗佩茨是位于俄罗斯莫斯科西北特维尔地区的小镇,这些地方都在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沿线。在迁居彼得格勒之前,伯林一家曾在安德烈亚波尔度过短暂时光(1915—1916年)。

4 埃里克·科尔诺,原名埃里希·科尔诺(1893—1980),生于奥地利的伦敦沃尔堡的银行家(其企业最初叫“新贸易公司”,他是创始董事之一),他与伯林父母有交往,后来与伯林有来往。

5 雷伯·亚非(1876—1948),俄罗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作家、诗人,1920年移民巴勒斯坦。

柯达谢维奇<sup>1</sup>、勃洛克、布瑞乌索夫<sup>2</sup>，甚至还有一位现在纽约名叫伯刘克<sup>3</sup>的人(告诉拉什)。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我坚持不懈地结交本地的苏联一等秘书<sup>4</sup>(问题是: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吗?<sup>5</sup>他妻子一定是的。晚餐后他说“嗯,你吃饱了吗?”<sup>6</sup>还递给我一支雪茄(“你喜欢古巴人吗?”<sup>7</sup>),雪茄里面掉出一只白色小虫。“你怎么啦?呃?那么你不喜欢它了?”<sup>8</sup>),显然难度很大,与“外国人”以及像我这样也许是“有用的消息来源”的人多打交道是我得到的指令。马上<sup>9</sup>,我要上床睡觉了。那天我见到罗莎·拉斯金,她还是很亲切,渴望回去;她妈妈身体不太好;她的叔叔<sup>10</sup>说就他所知已经没有什么人留在里加了,但所有从耶路撒冷回到(旧金山)的人都说伊茨与伊达很好。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等我的箱子都打好包,通过海路托运(我 551 乘飞机)之后,盖伊·奇尔弗和我要分割财产,到时候会展开大量的经济活动——关于所有权的经济纠纷,例如半张地毯等等。我打算把床单、毯子,以及一切可洗的东西都带回家。我刚在米德兰银行兑现了150英镑的支票,支付我最近的“手术”以及赴墨西哥度假的费用。我还要兑付相同数量的现金,在离开之前买些衣服等等,因为我已经衣衫褴褛了(在伦敦爸爸的裁缝那里做的那两套西装穿回去显得太粗俗了,这里则穿什么都没人在意)。

如果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带的,立即写信告诉我,否则我就不会带了。通过外交部给我寄信,我这里的地址是(“通过外交公文袋转交”)。我非常期盼{着}回家,回到你们身边,与你们长谈。等我回去,在向外交部(现在

1 弗拉迪斯拉夫·费里茨阿诺维奇·柯达谢维奇(1886—1939),诗人、文学评论家,1922年移民柏林,1927年之后诗作较少。

2 瓦莱里·雅科夫列维奇·布瑞乌索夫(1873—1924),象征主义诗人中的领军人物,评论家、文学学者。

3 也许是戴维·戴维多维奇·伯刘克(1882—1967),未来主义诗人,1922年定居美国。

4 阿纳托里·戈尔斯基,化名格洛莫夫(见上文第597页注2)。

5 伯林此处原文为: ex nostris, 意即“犹太人”。

6 伯林此处原文为: ну наелись?

7 伯林此处原文为: вы кубинские любите?

8 伯林此处原文为: чего вы так смотрите? а? не нравится.

9 伯林此处原文为: A bientôt.

10 也许是她父亲的兄弟。

他们是我的主人了) 报到之前我会至少花一个星期时间去牛津微服私访, 然后也许取道巴黎、开罗、耶路撒冷、德黑兰、第比利斯, 最后去莫斯科! 那将太棒了!<sup>1</sup>

爱你们的  
以赛亚

致赫伯特·尼古拉斯

1945年5月8日<sup>2</sup>

华盛顿, 英国大使馆

私人信函

亲爱的赫伯特:

谢谢你寄来的两封极为有趣、令我眼界大开的信。如果我能有你信中所说的一半健康, 我就很高兴了(上帝, 约翰·惠勒一班纳特的婚礼, 那位新娘……)。可我虽然没有生病, 但身体似乎也不比过去的三十年更好或更糟。我生活中最新发生的事, 就是我肯定会在7月底或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回到英格兰, 9月份我会去莫斯科, 在那里待三至四个月, 厌世但非常值得一交的A.克拉克·科尔爵士成功地把我引诱过去了(他的手段简单而又不可抗拒, 途经华盛顿赴旧金山时, 在我面前挥动签证)。1月底我就会永久性地回到牛津, 这件事对史密斯而言是板上钉钉了, 他也很高兴。我也许会把普里查德带回来, 让他做一个变态的新学院法律导师, 但还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极为高兴, 显而易见的事发生了, 而埃克塞特学院终于侥幸击中目标了<sup>3</sup>(柯格西尔<sup>4</sup>告诉我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摇摆不定这么久; 我想埃克塞特的高级教师休息室将蓬荜生辉; 我不知道校决策机构是否有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chudno budet.

2 欧洲胜利日。

3 他们给予了赫伯特·尼古拉斯研究员职位。

4 内维尔·亨利·肯达尔·埃尔默·柯格西尔(1899—1980), 1925—1957年任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与英国文学导师。

如此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应该留给三巨头的（基督教堂学院、巴利奥学院、新学院）。你认为莫德林学院是法国吗？<sup>1</sup>

至于旧金山会议，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小道消息可以跟你说。确实，我希望被派到那儿去，因为在华盛顿听到的消息比你们在伦敦听到的多不了多少。但是对我的上司们来说似乎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在这儿了。因此，如你所建议的那样，我要把注意力放在杜鲁门身上。我的上一份快讯作为简报，被认为口气太过激烈了，所以我随信把它寄给了你。总而言之，那些非法寄送的报告<sup>2</sup>基本停止了，因为这种安排已经被发现，而且有人已在私底下对我个人做出一种无声而有力的表态。然而，我最好时不时还得继续这么做，也就是在特别有趣的事情没有传达到位时（这样的特殊报告将作为一封致O.萨金特爵士<sup>3</sup>的信发出）。由于走漏了一些关于斯退丁纽斯的消息（对此他大发雷霆，严厉追究那个行动方案的确切日期，这个日期只能来自（a）伦敦，（b）我的简报草稿中未包括的部分），我认为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最好不要坚持立场，但我不会让你仅限于知道官方情报资料。关于白宫的真相是，虽然杜鲁门确实很真诚、可敬（“我知道他很可敬，”伊克斯先生在罗斯福先生去世的那天<sup>4</sup>晚上也这么说，“可是就想不出什么别的修饰词吗？”），而且是带有中西部地方习气的自由主义者，是美国退伍军人中最好的一类，出人意料地讲求实用，活泼，干脆，能够与艾登和利特尔顿这样的人好好相处，但是，整个事件如此微妙，就像荷兰室内画一样，所有这些美德都不足以应对这次大危机，这是真正的危机，之前从未出现过，单靠一般规则无法解决。杜鲁门的偏好，只适用于那些体面而又不会令人害怕的从事单调乏味工作的应声虫。他也许会赶走爱德华〔·斯退丁纽斯〕，

---

1 借用了雅尔塔会议的典故，法国没有受邀出席此次会议。据2月11日致外交部的快讯，“戴高乐宣布，直至法国有机会平等地参与讨论，雅尔塔会议的任何决定才对法国具有约束力，他还要求法国对莱茵河起始点区域拥有支配权，这些话被某些团体人士认为很讨厌、很不合理”（《华盛顿快讯》，第513页）。

2 未经审查的伯林官方政治报告，以隐蔽方式寄往伦敦。

3 欧尔姆·加顿·萨金特（1884—1962），1926年任外交部顾问，1939年任外交部代理副国务大臣，绰号“莫利”。

4 4月12日。

因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一定需要依靠某个人，但关于伯恩斯已经有一些谣  
 553 传了。“你会当总统吗，还是他？”所以那会是像哈奇参议员<sup>1</sup>或是巴克利参  
 议员<sup>2</sup>，或是某个关系好而好的程度又极为有限的密友。那不会是像柯立  
 芝这样的人，因为杜鲁门真诚地希望帮助小人物而且讨厌财团，他不喜欢  
 内尔森·洛克菲勒<sup>3</sup>（后者具备其祖父全部的残酷无情与其父的圆通，我们  
 可怜、疯狂的哈多<sup>4</sup>完全心甘情愿地受他摆布）。但这样的状态将保持在很  
 低的水平，而且没有多大意思。我给你和达夫妮写信说过是什么使他和惠  
 勒关系密切，看起来不再如此了；惠勒与克洛克在公开场合对他很有礼貌，  
 私底下形容他只是个“平庸乏味的政治家”。“也许我本该在妓院里弹钢  
 琴，而不是当美国总统”，他亲切地对我的一个朋友如此说，不过《新共和  
 国》<sup>5</sup>的欧文·布兰特<sup>6</sup>（不要和《圣路易斯邮报》的皮特·布兰特<sup>7</sup>弄混了），  
 一位更老式的迪里亚德<sup>8</sup>，带着拉弗雷特<sup>9</sup>而不是诺里斯<sup>10</sup>的记忆，对他很欣  
 赏，认为他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但比新经济政策派更讲道理。你可以做出  
 你的判断。

我很快会再次给你写信，不期待你的回复了，期待着8月份在牛津与你

- 
- 1 卡尔·艾特伍德·哈奇（1889—1963），1933—1949年任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
  - 2 阿尔本·威廉·巴克利（1877—1956），1927—1948年任肯塔基州参议员，1937—1947年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1948—1952年任副总统；著名演说家。
  - 3 内尔森·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1908—1979），标准石油的创立者老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慈善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1940—1944年任美洲事务协调人，后来（1974—1977年）任杰拉尔德·福特公司副总裁。
  - 4 罗伯特·亨利·哈多（1895—1963），1942年任职于外交部，担任顾问；1944年任职于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 5 自由主义杂志，维拉德与多萝西·斯特雷特1914年创办；见上文第375页注3。
  - 6 欧文·牛顿·布兰特（1885—1976），报纸编辑与作者，1945年任《芝加哥太阳报》驻外特约通讯员。
  - 7 雷蒙德·皮特·布兰特（1896—1974），1934—1961年任《圣路易斯邮报》华盛顿分社社长。
  - 8 欧文·迪里亚德（1904—2002），《圣路易斯邮报》的主要社论撰写者，专攻公民自由与基本法。
  - 9 可能是老罗伯特·马里翁·拉弗雷特（1855—1925），进步改革斗士，1906—1925年任威斯康辛州参议员，在国内问题方面终生都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者，反对托管制与腐败，是争取税制改革与工人权利的运动家；他的儿子小罗伯特·马里翁·拉弗雷特（1895—1953），孤立主义者与热忱的新政派，1925—1947年继任其父的参议员一职，看来这里提到的拉弗雷特指的不是他。
  - 10 乔治·威廉·诺里斯（1861—1944），1913—1943年任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之父”，联邦电力项目与农场救援措施的倡导者。

进行大讨论的真切感受。

你永远的

[由人代签]

又及：谣传中前参议员施韦伦巴赫法官<sup>1</sup>的任命很典型，几年前施在华盛顿州的牛奶场或是养鱼场或是别的什么方面陷入了某些麻烦，他亲工 554  
会，反孤立主义，一个很好的西北部激进派，但本人不太诚实，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他与杜鲁门一起是后座议员，坚定、乏味而妥帖地为进步立法投票，对当地机器相当忠诚，对“法兰克福特们与图格维尔<sup>2</sup>们”抱有怀疑。

[附件]

### 总统

虽然对新统治集团的总体质量与前景做出长期估计还为时尚早，但其轮廓正趋明朗可辨。对于总统，各方勉强认可其公开言论与执政动作是诚实、坚定和迅速的，并将忠实地继续推行其前任所提出的坚定的总体路线。而且，他和国会（还有媒体）的关系显然比罗斯福先生更好，尤其是在罗斯福先生的上两个任期。他还显示了支持可能会遭受公众任意攻击的个人与机构的倾向，态度清晰而坦率，而罗斯福先生往往没能表现出这一点，罗斯福更喜欢让各个机构利用毫无外援的资源为自己的前沿部门辩护，而白宫只给予较少的公开支持。这样一来他对其诋毁者的公开叱责吸引了按惯例本是由饱受责骂的普莱斯行政部门（不管怎么说都是效率最低的美联邦机构）来承受的攻诘；他让谣言不攻自破，这个谣言就是顽固的麦克凯勒参议员<sup>3</sup>（杜鲁门非常巧妙地把她迎进内阁）领导的“南方极端保守分

1 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1894—1948），1935—1941年任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1940—1945年任联邦法官，1945—1948年任劳工部长。

2 雷克斯福特·盖伊·图格维尔（1891—1979），经济学家，罗斯福“顾问班子”成员，1938—1940年任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6年任波多黎各总督。

3 肯尼斯·道格斯（“汤姆”）·麦克凯勒（1869—1957），1917—1953年任右翼民主党参议员。

子”通过拒绝批准著名的戴维·利连撒尔主席<sup>1</sup>担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将最终成功消灭或严重削弱管理局。在麦克凯勒参议员与田纳西州的斯图尔特参议员<sup>2</sup>造访杜鲁门表达抗议之后，他迅速地宣布了对得到公  
555 正崇敬的利连撒尔的重新任命，而该提名会比罗斯福时期更容易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人们还期待，对杜鲁门身为参议员时十分感兴趣的其他国内机构，他能够表现得同样坚定。尽管他与国会之间有着温情脉脉的关系，他已经流露出宁愿被人利用的态度，对把农业工人排除于军队之外的企图，毅然行使其否决权。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驳斥了仓促草率的和平谣言，不经意间就赢得了公众与媒体的欢心。

这幅图景不那么乐观的一面，就是华盛顿总体执政水平也许会不可避免地下降。由新总统挑选组成的私人班底在名声上无可指摘，可是却有点迟钝、带有地方习气。他的首席行政助理麦金姆<sup>3</sup>（一位老“战友”，上一场战争中在杜鲁门所在的美国炮兵部队129团的炮兵连服役），一个耿直而平凡的密苏里保险商，在杜鲁门参加副总统竞选期间或多或少充当了他的保镖。他的私人助理马修·康奈利<sup>4</sup>（见2769号政治报告<sup>5</sup>），本人毫无个性，但无疑是足够称职的秘书；杜鲁门的军事助手沃恩<sup>6</sup>，也是他炮兵连的

1 戴维·利连撒尔（1899—1981），律师、模范公务员，1933—1946年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1946—1950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2 阿瑟·托马斯（“汤姆”）·斯图尔特（1892—1972），律师（1925年有在一起著名的诉讼案，田纳西州的一位小学教师因为教授进化理论而被审判，他是这起诉讼的公诉人），1939—1949年任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

3 爱德华·丹尼尔·麦金姆（1895—1969），奥马哈保险经理，一战中与杜鲁门是战友，此后是他的亲密朋友，1944年陪伴杜鲁门参加副总统竞选，但是担任他自称的“首席行政助理”一职时间仅仅两个月。

4 马修·J.康奈利（1907—1976），1945—1953年任杜鲁门的约会秘书，他还是杜鲁门的牌友；据《华盛顿快讯》第547页的描述，他是“一个温和的罗马天主教徒，来自马萨诸塞，明显具有中庸风格”；后来（1956年）因共谋欺诈政府而被判有罪。

5 4月21日的快讯，《华盛顿快讯》第544—549页。伯林所引的编号与政治报告并无专门关联，该号码是从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的编号。

6 哈利·霍金斯·沃恩将军（1893—1981），杜鲁门的老友，1945—1953年任杜鲁门的军事助手，后来因行为不当而受到批评，包括因接受送给政府官员的冰箱而遭到质疑。此事发生之后，钢琴家与幽默家维克托·波吉曾经在他的音乐会上宣布：“我的下一首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深冻协奏曲》，哈利·S.贝多芬的作品。[停顿]你们会注意到节拍——沃恩二，沃恩二。”罗伯特·H.法瑞尔《哈利·S.杜鲁门：一生》（哥伦比亚/伦敦，1994），第361页。

战友(这一干人马被《时代周刊》嘲讽为“密友政府”)。民主党的老大哈尼根<sup>1</sup>,如今升任邮政部长这一传统职位(该职位自1932年起固定由罗马天主教徒、爱尔兰裔、民主党主席担任),哈尼根替埃德温·鲍雷<sup>2</sup>——圆滑的石油巨子、民主党的理财家——弄到了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的职务;剩下的两项重要任命都给了密苏里人——施奈德<sup>3</sup>担任联邦贷款行政官,罗斯<sup>4</sup>担任新闻秘书长。这些新禄蠹,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可敬而有声望的庸才。杜鲁门先生任命的班底似乎不外乎像施奈德这样的人,不会令人兴奋,但是倒也诚实,自由主义者们挑不出其中有什么毛病,或是像鲍雷那样的民主党资助人,行为纯正,虽无可耻之举,却已遭遇了大量严厉批评。杜鲁门从密苏里政界寻找人选“取代”米利根<sup>5</sup>——他旧时资助人彭德加斯特<sup>6</sup>的起诉者,他还有可能任命他的密苏里老友与竞争对手、孤立主义者钱普·克拉克<sup>7</sup>担任报酬颇丰的联邦职务,人们对此兴趣平平。

556

然而,比总体而言虽然微小<sup>8</sup>且不能振奋人心、却无可指责的前述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外交事务的应对方面,现在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无需到利普曼开展密集的反斯退丁纽斯运动的程度,人们就会意识到并且迟早会相信新总统需要一位拥有足够经验与权威,对国会、对公众也对总统自己有影响力的国务卿。霍普金斯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他正在华盛顿家中休

- 1 罗伯特·埃梅特·哈尼根(1903—1949),1944—1949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为把杜鲁门列入候选名单出了很大的力;1945—1947年任邮政管理局局长。
- 2 埃德温·文德尔·鲍雷(1903—1981),加利福尼亚石油大王,1944—1945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1945—1947年任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
- 3 约翰·韦斯利·施奈德(1895—1985),银行家,保守派,1945年任联邦贷款管理局负责人,1945—1946年任战争动员与恢复局局长,1946—1953年任财政部长。
- 4 查尔斯·格里菲斯·罗斯(1885—1950),杜鲁门的同学;1918—1934年任《圣路易斯邮报》驻华盛顿首席特约通讯员,1934—1945年担任编辑;1945—1950年担任杜鲁门的新闻秘书与机要顾问。
- 5 莫里斯·莫顿·米利根(1884—1959),1934—1940年任密苏里西部地区联邦地区检察官,1939年成功起诉托马斯·彭德加斯特腐败案,1940年在美国参议员竞选中被杜鲁门击败。
- 6 托马斯·约瑟夫·彭德加斯特(约1870—1945),密苏里州堪萨斯民主党领袖,也许是他那一代民主党人中最有权力的领袖人物;1911年起积极从政,1932—1938年在该州居统治地位;1934年支持杜鲁门竞选参议员;1934年因逃税入狱。
- 7 乔尔·班纳特·(“钱普”·)克拉克(1890—1954),1933—1945年任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1944年在竞选提名连任中落败。
- 8 伯林此处原文为:kleinmalerei。



养，而伯恩斯依然是这个职位最受喜爱的人选。虽然相比斯退丁纽斯，伯恩斯在国会与国民中更有影响力，而且有担任参议员并去过雅尔塔的经历，可是在外交事务上他却算不上有深广的直接经验。所以，虽然新总统的人品显然很正直，而且对国际事务的总体看法很合理，还受到像参议员哈奇与巴克利这样真诚的国际事务专家的良好影响，可是随之而来会有一段时期，说不上真的放任自流或是漠然，但无论怎样都缺乏已故总统那样的巨大决心与充沛精力。如果史汀生先生年轻十岁，他也许是这个职位的合适  
557 人选。实际上，我们可能将经历错失的机会与疏忽的行为，与其说这是由于对罗斯福政策的刻意更改，不如说这是因为政治天分与在外交领域热情坚持的目标——承诺对国际事务产生显著影响——曾相互结合，现在这种结合已不再有了。这个国家当然还是充满了支持世界合作的情绪。而现在主要弱点不在于公众舆论，甚至也不在参议院，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行政当局，虽然有很好的态度，但缺乏足够足够的人与见解，来应对时代的苛刻要求。同时，不论未来如何，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杜鲁门先生处理日常问题的路线。目前为止，他的方式是坚定、果敢而且迅速的。

致莫尔·科洛思维特

1945年5月12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莫尔：

我是在匆忙之中给你写信，因为希望这封信能跟着你的大使公文包裹一起走。我要说的只是，我怀着强烈的迫切心情期待着9月初到莫斯科（或者，根据A.克拉克·科尔爵士的意见8月底到，只要看看两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就采用哪一个，而且，我去得越早越好）。如你所知，我已经像《三姐妹》中主人公那样一直在唱着“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sup>1</sup>，天知道我这

1 在契诃夫1904年首次发表的小说《三姐妹》中，普罗佐罗夫姐妹奥尔加、玛莎和伊琳娜，以及她们的兄弟安德烈，渴望逃离俄罗斯外省市镇的沉闷生活，重返莫斯科——他们童年时

样唱了多久，我也许夸大了莫斯科之行令人兴奋的程度。我抵达时，将充分装备飞机上允许我携带的、维持文明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希望如此）。杀虫剂、制鞋用的皮革、海豹皮帽，还有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但如果除了博尔顿先生跟我说的那些常规物品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东西特别需要我带去的，一定要写信告诉我。我预计7月底离开此地。我和新学院谈判过，和他们讨价还价，让他们允许我无论如何要在莫斯科待到1月中旬，这个要求似乎十拿九稳了。你要做好准备，一旦我在8月31日左右突然自某地消失<sup>1</sup>，你得想方设法搬家。

有件事你会感兴趣，大约在四周前的一次广播中，恶名昭著的德鲁·皮尔森先生说，波兰政府委员会的谈判破裂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A.克拉克·科尔爵士患病无法工作，谈判因而由著名的反苏外交官P.M.科洛思维特负责，他于是不遗余力地往这项工程里掺沙子。波伦与我想给你发一封祝贺电报，因为皮尔森先生给人戴上的刑枷是对在这个国家所能找寻得到的美德的最高赞美。最后我们觉得还是不要给你发电报了，不过你还是名垂青史了，你的档案也许受到了特别认真的调查。 558

我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因为染上了一种古怪的流感而几度卧床，不过A.克拉克·科尔爵士告诉我，这在莫斯科是不允许的，你们那里运转得更加严格，根本就不会考虑肉体的虚弱。我的父母无疑是从你那里获知我调动的消息的，于是打电报问我“莫斯科之旅是否非常必要”，这是在英格兰与美国多处张贴的海报上的一句话<sup>2</sup>。在他们看来，苏联无疑是伤寒症与砰男孩<sup>3</sup>的混合物（依你那位埃尔德里奇先生的看法，那是多么美妙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这一切极为期待。

给你许多的爱，如果需要带什么东西，一定告诉我。在离开之前我会

的家园。

1 伯林此处原文为：spurlos。

2 “你的旅行真有必要吗？”

3 热门音乐剧《砰男孩在这儿》，1916年在伦敦阿尔罕布拉剧院上演，次年上演《砰男孩在那儿》，1918年上演《砰男孩在百老汇》。

设法看望你的家人。

你的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1945年5月14日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克里斯托弗：

唉，众神的黄昏竞赛与抽奖分别在胜利日前三天与美联日<sup>1</sup>前两天举行。我适时做了补充，但是认为不值得把文件寄回，因为现在我发现每一项记录都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没有根据的（除了赫斯<sup>2</sup>，他是明显的目标）。有两种选择，一是表明对任何未来发展完全没有预测能力（由于我不论如何都将离开这个机构，所以对我没有过多伤害），二是肆无忌惮的欺骗，就连你都会怀疑我是否具有这种欺骗能力，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我决定什么也不做。如果你愿意我为你在这儿花上一枚美丽的六便士，务必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发誓会带回一件价值相当的物品。我不知道迈克尔·赖特是不是处理了我提供给他的一份报告；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人们决定不把这份报告转交给在旧金山的大使。

同时，由于被指（正如我们总在政府文件中所说）缺乏变革思想或意图，你的部门正遭受这里的许多谴责，并由于我们在托管权问题上遭遇的麻烦而蒙受对此不满的英国官员的严厉责备。尽管那样，我还是继续阐明我对充满青春活力的CO好战分子与外交部倦意屈从的未老先衰者之间所做的不受欢迎的比较，而这依然会激发令人快意的强烈反应。我在加紧活动，期望在7月就能彻底离开这一切。8月你是否在英格兰？诚心希望并相信你会在那里。我将在牛津逗留一个月，然后离开三四个月，去你知道的那个

---

1 1945年5月7日得名美联日，当日美联社在胜利日正式宣告和平之前的一天泄露了欧洲战争的结束（《华盛顿快讯》第558，562页）。

2 见下文第810页。

地方（如果你不知道是哪，就去问新学院院长。也请你一定问问他，我申请做一年法学导师的事怎样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听说你的兄弟戴维<sup>1</sup>在这儿，但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什么职位。的确，我以为他会过来见我，却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打电话过来，说他是“罗素海军中尉”<sup>2</sup>。几分钟后，一个矮个子走进来，微笑着，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经我一再要求，他出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兹介绍我的儿子，法律界知名人士安伯利勋爵。虽然他是我的儿子，我认为他很讨人喜欢。罗素。”而你的兄弟从来就没有露过面，如果他还是不出现，我会向大学学院的新院长提出正式抗议（对于那所学院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感到震惊）。巴利奥学院似乎继续沿着传说中的加大拉大陡坡往下滚，而且速度比以往更快了。这位院长看来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我不指望你比我更喜欢全灵学院[对萨姆纳]举行的选举，那都是面子在起作用，毫无疑问，我当然更偏向汉考克<sup>3</sup>，但奇怪的是，聚集在这里的全是全灵学院的官僚们——哈利法克斯、布兰德也这么认为，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一直喋喋不休，必须马上停口了。

你为什么不在我永远离开之前，来此地一趟呢？从你那里过来的官员们越多越好，与美国人谈论殖民地教育一定是很好的理由，鉴于他们将专门为此派遣代表团奔赴英联邦及帝国。只要你吩咐一声，我会作为最后的下意识之举，把它作为神圣遗产留给M.赖特，务必在今年结束之前让你到达这边。显然我必须停笔了。

你永远的

沙耶

560

新学院档案

- 
- 1 (安东尼·)戴维·马切尔·考克斯(1913—1994)，中世纪史学家；1937—1939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9—1980年任大学学院研究员与讲师；狂热的登山家，战争期间的多数时候都在加拿大、黎巴嫩与威尔士担任军队山区作战教员。
  - 2 约翰·康拉德·罗素(1921—1987)，后来(1970年)成为罗素伯爵四世，伯特兰·罗素之子；精神分裂症患者，二十八九岁之后病情日益严重。
  - 3 (威廉·)基思·汉考克(1898—1988)，历史学家，全灵学院首位澳大利亚研究员(1924—1930)，1944—1949年任全灵学院奇契利经济史讲席教授。

致兰伯特男爵夫人<sup>1</sup>

1945年5月28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 [汉西? ]:

非常感谢您令我享受了充实而丰富的超级周末。我几乎不记得, 在此之前自己是否也曾亲眼见到这么多各色各样的人同时出现, 带给我如此丰富而生动的印象, 留下大量令人兴奋而又来不及消化吸收的素材, 我得在华盛顿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日, 在记忆里对它一一整理归档。我只是希望我这个客人不至于太令人讨厌, 没有令你们精疲力竭——沃克夫妇<sup>2</sup>在我看来无精打采的, 他们星期四与我一起吃的晚饭, 我们都平静地早早上床睡觉了, 心中充满着感激的回忆。

下次我在纽约的时候, 即下星期二, 如果可以, 我将给您打电话再次感谢您。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又及: 我想我落下了我的新院长慷慨题赠给我的一首苏联新国歌<sup>3</sup>。如  
561 果可以, 我在纽约时会要回它, 它显然有很高的情感价值。

---

1 乔安娜·冯·瑞宁豪斯·兰伯特男爵夫人(朋友称她为“汉西”)(1899—1960), 出生于奥地利。第二任丈夫亨利·兰伯特男爵(1887—1933)的遗孀。男爵拥有兰伯特商业银行, 他们住在银行楼上, 面朝位于玛尼克斯大道24号的布鲁塞尔皇宫。在战争前夕男爵夫人和她三个年幼的孩子逃到美国, 大多时候租住在纽约的一间公寓, 也许就是伯林度周末的地方。她还在弗吉尼亚买下了一处农场(在那里人们叫她“珍妮”), 作为投资, 并将其现代化了; 从华盛顿来的朋友有时去那里拜访她。战后她回到布鲁塞尔。

2 约翰·沃克(1906—1995), 1939—1956年任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总馆长, 后来(1956—1969年)任董事, 他的妻子是玛格丽特(·格温德伦·玛丽)夫人(1905—1987), 婚前姓德鲁蒙德, 十六世珀斯伯爵之女。

3 见上文第559页注2。

又又及：马金斯基真的是里海地区可汗的儿子吗？<sup>1</sup>我觉得那可太帅了。

又又及：阿里吉<sup>2</sup>从多德卡尼斯<sup>3</sup>给我发电报。我应该回复吗？我没有回复。

致R.文内尔

1945年5月28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亲爱文内尔先生：

在两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在电话中谈过话，当时我因为您寄来的特制鞋样而向您致谢，您非常友善地告诉我，我在最后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可以再次向您申请，可以再要一个同样的鞋样。因为您的善意，我现在是一双崭新鞋子的快乐所有人，不过我担心，由于我要去的地方是寒冷的莫斯科，人们告诉我去那里要自己带上制鞋所需的皮革，更不要说鞋子了，仅靠一双新鞋几乎不能帮助我度过那里可怕的酷寒天气，而在无鞋可买的伦敦我也没有希望能够对此做出什么补救。一直都没有远见的我，在美国的整整四年只买了一双鞋，所以我的情况比较严峻。因此，如果您能够再给我寄来两份鞋样，我会十分感激——我已经如我所承诺的，在祈祷时想起您。我保证我

1 “马金斯基”是南阿塞拜疆巴库可汗统治家族的姓氏，巴库（现位于伊朗西北）是南阿塞拜疆的首府，距离里海250英里。也许伯林所指的是亚历山大·马金斯基可汗（亲王）（1902—1988），或是他的弟弟吉里尔·马金斯基可汗（1910—1991）。他们的父亲帕夏（保罗）·马金斯基可汗（1862—1934）在1920年前后移民法国，直至1922年巴库可汗统治被废止之前，严格意义上说他可能还是可汗。

2 阿里吉·迪普拉科斯科斯（1912—2002），1945年12月与约翰·拉塞尔结婚（上文第372页注2）；她曾与保罗·路易·维勒司令（1893—1993）结婚，维勒是法国战斗英雄、实业家、慈善事业与艺术品的资助人。

3 位于爱琴海、土耳其西海岸外的群岛，包括罗兹、科斯与卡帕索斯；1912年之前属于奥斯曼帝国，之后归属意大利，后来（1943—1945年）由德国人掌管；伯林写这封信的三周前，多德卡尼斯群岛已经被移交英国军队控制，直至1947年该群岛被割让给希腊。

将加倍感激您的慷慨赠予。

随函附上我那本3号配给证的最后残留部分。

您诚挚的

562 以赛亚·伯林

致克里斯托弗·希尔

1945年5月29日 [副本]

华盛顿特区, 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克里斯托弗:

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然而只有一部分能够压缩进这封信中。所以我会试图好好梳理一下要说的话, 好让这封信出人意料地简短。

(1) 我将正式拜访你, 和沃纳先生<sup>1</sup>与杰弗里·威尔森<sup>2</sup>以及你本人谈论我意料之外的苏联之行, 此行是A.克拉克·科尔爵士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的, 并在事后得到了我热烈的赞同。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莫斯科, 到了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将是什么身份、什么待遇, 等等。不过我期待等我见到你时, 你的部门会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和俄国相比, 这里的形势非常好, 从旧金山发去的电报中你不大会发现这一点, 因为我的同事一直勤奋地往电文里充实细节, 而你的一位同事则一直在给电文削骨去肉, 因而你从官方渠道获知的信息相对而言不会太多。对这个话题如果你有好奇心, 等我到了, 我会努力把这里, 尤其是国务院与白宫, 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在纽约, “舆论制造圈”的情状好比面对进攻性特别强的追求者而畏缩的少女, 也就是一种既想逃离又想拒绝也想屈服的混杂心情, 结果就像是精神分裂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我正忙着开展一项深入细致的运动, 向我所熟悉的一些人证明, 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愿望只能导

---

1 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克·沃纳(1895—1957), 外交官, 时任外交部北方司主任, 负责苏联。

2 杰弗里·马斯特曼·威尔森(1910年生), 在北方司供职, 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同事, 为克里斯托弗·沃纳工作。

致两种结果中的一种：(a) 美国打败俄国；(b) 俄国打败美国。对于后者，他们自己就能够明白那是他们不愿看见的，但是我发现要向他们证明前者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却不那么容易。虽然如此，每天我还是能够稳定地取得一点进步。在杜克罗先生攻击了白劳德之后<sup>1</sup>，共产党的媒体中流露出惊慌，不过我想你对此很了解。

(2) 我们这里现在来了各类密使，如多兹与调查斯拉夫语言教学情况的高尔顿小姐<sup>2</sup>等等。牛津选择的考诺瓦罗夫<sup>3</sup>在我看来似乎有点令人郁闷。我个人与他并不相识，但一直认为他主要是对俄罗斯社会历史与经济有平庸而二流的兴趣，除非必须，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并无兴趣，也许我这么看是错的。他显然比悲惨的斯特鲁维<sup>4</sup>好，但那也不是说他就好很多。然而木已成舟，占据我头脑的念头是，如果要在英格兰做一点俄罗斯研究，一些出色的人才必须得到理解与接受，使他们成为欧洲大陆的朝圣中心。这样的人迄今为止我只发现一位——罗曼·雅各布森<sup>5</sup>。你也许还记得他那个相貌愚蠢的弟弟<sup>6</sup>，在皇家国际事务所查塔姆中心和贝尔纳·佩尔斯爵士<sup>7</sup>的家

1 雅克·杜克罗 (1896—1975)，法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撰文批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拉塞尔·白劳德 (1891—1973) 的“修正主义”。白劳德后来被开除出党，之后美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2 多萝西·高尔顿 (1901—1992)，1928—1932年任贝尔纳·佩尔斯的秘书 (见下注7)，1932—1961年任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所行政秘书；1945年访问美国与加拿大，在那里做关于斯拉夫语研究的报告。

3 谢尔盖·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考诺瓦罗夫 (1899—1982)，出生于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1929—1945年任伯明翰大学俄语教授，1931—1940年任伯明翰俄罗斯经济状况研究机构的刊物《备忘录》的编辑，1930—1945年任牛津大学斯拉夫语研究讲师，1945—1967年任俄罗斯语教授。

4 格雷伯·佩特洛维奇·斯特鲁维 (1898—1985)，出生于俄罗斯的文学史家、翻译家、评论家与诗人，1932—1943年任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所俄罗斯文学讲师，1943—1946年任高级讲师。

5 罗曼·欧西珀维奇·雅各布森 (1896—1982)，俄罗斯裔美国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史家；1920离开俄国，1933—1939年在捷克教书，1939—1941年在斯堪的纳维亚；1941年定居美国；1942—1946年在纽约任法国—比利时流亡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

6 谢尔盖·欧西珀维奇·雅可布森 (他没有像他哥哥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英语化的“雅各布森”) (1901—1979)，生于俄罗斯，俄国革命之后迁居德国，然后 (1933年) 去英格兰，在那里成为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所图书馆员及荣誉讲师；战争初期他为英国情报部翻译俄语广播；1941—1971年任国会图书馆斯拉夫历史及语言的专家。

7 贝尔纳·佩尔斯爵士 (1867—1949)，理查德·佩尔斯的父亲；杰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1919—



里见过的。他这个弟弟也在这里，在国会图书馆工作，虽然不是很有才华，但至少具备专业能力，比老朽的白色卫兵强，虽然那些白色卫兵应该监管国会图书馆庞大的俄罗斯藏书。然而目前这批在俄罗斯本土之外最大的收藏品却没有收入目录，其中最好的部分还放在没有打开的正在腐烂的板条箱里，这种状况令人吃惊。那些在一位温驯而忧郁的牧师辅助下的白色卫兵们，其实就是一群法西斯野兽，假如真有这样的种群存在。不过，还是说回罗曼·雅各布森，据所知的那些有才能者的看法，他是俄罗斯本土之外最伟大的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专家，高尔顿小姐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观点。我对专业斯拉夫研究一无所知，不过无疑他是最出色的人物，显而易见是一心一意的学者，能够把兴趣注入对北萨哈林<sup>2</sup>某个两百来人的部族的抒情诗传统（虽只靠口头相传但充满民族特征）的讨论中。在我看来他对18至19世纪的普通文学甚为精熟，而且1918年之前显然与每个莫斯科人都关系良好，我知道，他是在那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他曾经是住在布拉格的流亡者，还娶了一位捷克妻子。我认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并不糟糕。我想，也许伯明翰大学会给他提供教授之职，或者，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荒唐——考诺瓦罗夫也许要聘他担任自己的语言学助理，因为他对自己所任教职所要求的俄语方面的知识背景一无所知。我们的状况将会是这样，一个雇佣文人理论上领导着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不过，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解决。我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你，以备你去牛津并见到任何与此有关者时需要——汉弗莱、萨姆纳或是随便哪个人。所有英国大学似乎目前都反对任用难民、流亡者等等。我能看出来，如果他们是打上了政治标签的人，可能会遭到反

---

1936年任伦敦大学俄罗斯历史、语言与文学教授，1922—1939年任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所主任；历久不衰的经典著作《俄罗斯历史》（伦敦，1926年）的作者；大多数时间住在俄罗斯，1931年出版《我的俄罗斯回忆录》；1939—1940年任国外研究与出版处（上文第401页注2）苏联部负责人。

- 1 国会图书馆丰富的俄罗斯藏书的核心部分，是1906年从西伯利亚伏特加酒制造商根纳季·瓦希里耶维奇·尤丁（1840—1912）手中购买的8万本藏书，而后在1930年代从苏联政府手中购买的书籍又极大地丰富了馆藏。伯林写这封信的时候，人们对于这部分藏书的发展记录所保持的缄默引人注目。它的保管人包括在1918—1920年俄罗斯内战中为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多种族部队中的幸存者，常被称为白色卫兵。
- 2 俄罗斯最东端的省份，包括库页岛与千岛群岛。

对,不过既然研究这个课题的英国学者极为缺乏,而且美国人那边又没有很好的人选(西蒙斯先生<sup>1</sup>是最好的,B.佩尔斯爵士对他极为信赖,但其实他不是很有价值,相信我),所以那样的反对长久不了。不论雅各布森去哪里,他必将吸引其他才智出众的人来辅助他,如果开办暑期学校之类,以及大张旗鼓地开展俄国研究,他很轻易就能成为他们中最有可能得奖的小狗。所以如果可以,你一定要为他做一些宣传。我几乎不认识他,但是这个独特人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要让多兹和他吃午饭,高尔顿小姐已经是他的狂热皈依者了。我相信,目前需要做的,就是阻止英国大学选用本埠平庸之徒;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摆脱困境。我也无法夸大那些牛津选举人的愚蠢,他们直接给苏联候选人写信,而不是通过相关渠道。不过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3)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让我苦恼,他告诉我他从你的院长那里收到 565 一封信,说他不是巴利奥学院需要的类型,我原以为他正是巴利奥学院所需要的。不过,你了解你的院长,不需要我冲着你咆哮唾骂他。我听说对汉普希尔的主要反对理由是,(a)他是个记者,(b)不善“交际”。我不知道牛津还有没有别的研究员职位,但汉普希尔说他想去外交部或是类似地方看看。等我回到英格兰,我会和D.斯科特爵士谈他的事,他是很好的人,可以对他说真话。否则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在我看来,牛津最大的遗憾就是让汉普希尔走了,全灵学院似乎明显急着要打发他走。如果你有机会,也许可以向萨姆纳提一提他,看看萨姆纳是如何想的。等到了伦敦我可能还会因为这个问题而麻烦你。

(4) 我相信,我没有抓住机会顶替布里格迪埃·斯凯夫<sup>2</sup>在汤因比教授部门的职位,你不会认为我古怪的。我不知道该如何仔细措辞,而不致冒

1 厄内斯特·约瑟夫·西蒙斯(1903—1972),俄罗斯专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1936—1939年在哈佛大学、1941—1946年在康奈尔大学、1946—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出版作品包括受到高度重视的传记《列夫·托尔斯泰》(波士顿,1945—1946)。伯林后来把“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俄国思想家》一书再次收入)给了西蒙斯主编的书《俄国与苏联思想的延续与变化》(剑桥,马萨诸塞,1955)。

2 布里格迪埃·埃里克·欧曼尼·斯凯夫(1884—1956),1934—1937年任驻莫斯科使馆武官,1941—1944年任职于外交部研究处苏联室。

犯汤因比，然而还是清楚地表明，我宁愿失业或是挨饿，也不想置身于我在1944年所发现的、包围着你们所有人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告诉我，需要我“在东欧前线进行调停与起草文件的工作”。在我这边，这听起来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伦敦那边是怎么看的。我刚刚读完一篇专栏文章，得知乌库里基将军<sup>1</sup>是个非常大胆的人，遭到我们与俄罗斯人不光彩的对待（文章是一个不错的左翼新政派写的），与该文一起的还有一篇苏兹贝格先生写的漂亮文章，告诉我卢布林<sup>2</sup>背后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索尔·阿姆斯特丹，亦以阿姆斯特丹斯基与索尔斯基等名字而为人所知。他在1917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1919年是共产主义者，生于拉德克<sup>3</sup>的村庄，也许一生下来就被抛弃了，自1941年起他开始在波兰活动。和通常情况一样，人们描述他是一个小个子，不引人注目，头发灰白，诸如此类。这样的老队伍成员越来越少了，他们中没有人写回忆录。你是否认为，我可以问问，在莫斯科的时候能否见他？我们两个的名字放在一起很合适，而且我们可以快乐地怀念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的年代。我必须停笔了。

你永远的

566 以赛亚·伯林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1945年6月6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斯图尔特：

你不会期待我没完没了地说我对院长的所作所为何有看法。不过我不

- 
- 1 里奥珀德·乌库里基少将（1898—1946？），波兰本国部队领导人，苏联政权在1945年提出与之会谈、随后又逮捕的波兰十六位领导人之一。6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名无实的公审之后，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乌库里基的刑期是十年，但是他在1946年死亡，也许是被处决了。
  - 2 当地在1944年建立了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临时政府，与伦教的波兰政府对抗。
  - 3 卡尔·伯恩加多维奇·拉德克（1885—约1939），原姓索伯尔松，波兰籍犹太人，革命者，出生于奥地利波兰（现在是乌克兰的里维夫）的伦姆伯格（是一座城市，不是村庄），1937年被捕，判处十年监禁。

认为巴利奥学院的举动必定影响到你在牛津的未来。我的思绪习惯性地转到了新学院，明年我本人将继续在那里工作，已经向他们承诺，无论如何，在转入别的研究领域之前都会教一两年的哲学，但是我不认为你会愿意接受全灵学院提出的类似[伊恩·]鲍恩那样的条件<sup>1</sup>，因为那样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也不够有尊严。当然，如果他们在全灵学院给你提供一个适当的研究员位置，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也许要对新学院做点什么。关于这一点你只能从萨姆纳那边了解了，我以为，如果那就是条件，我想你应该向他挑战，毫不犹豫。

至于去政府部门当公务员，D.斯科特爵士是提供所有这类任命的来源，在他手下还有艾弗·马莱特<sup>2</sup>与一些职位更低的小人物，我认识其中几个。这方面我可以起一点作用，我想。我已经向阿什顿·格瓦特金<sup>3</sup>提起此事，他并不直接负责，但是他与领导核心有一定关系，他说到了斯科特和马莱特。我很了解斯科特（我相信，他现在是副大臣或是类似职位的人了），我与他保持着相当友好的通信，他希望我接受一份工作，而我也许是过于激烈地拒绝了他。7月份我会在伦敦，到时候，如果你吩咐，我就和他谈谈，我也会和劳谈谈，如果你希望我这么做，他对这样的事通常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但是有他的帮助也许对事情会有辅助作用。

我认为哈罗德·尼科尔森一点忙都帮不上——我也许错了——不过我相信，你我对他的看法正是所有人对他的看法，即，不论怎样，他的话都没有什么内在影响力。我一点都不认识艾登，和他说过两次话，不过我想现在认识他了，几个月前我从情报部那艘正在沉没的船上调到了那个部门，于是认识了几位所谓的高级官员。所以，如果真的需要，那就让我做点事情。为此我还会在牛津四处忙碌地活动一番，既然我想你可以直到大约9月才拿定主意，那时候我将再度离开，这一回我是去莫斯科，虽然此行应该略为保密。

567

1 伊恩·鲍恩当时是布雷诺斯学院的讲师，但也许可以接触全灵学院的人。

2 威廉·艾弗·马莱特（1900—1988），外交部顾问；1945年任外交部人事处负责人，分管他的工作的次长就是大卫·斯科特爵士。

3 弗兰克·特里劳尼·亚瑟·阿什顿·格瓦特金（1889—1976），1944年任职外交部，皇家使团的高级督察，官阶相当于大臣；以约翰·帕里斯的笔名创作冒险小说。

我对别的政府部门一无所知。我也觉得达夫·库珀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在这边和罗杰·迈金斯谈过，他询问了你的婚姻状况，我让他放心，他说他会给马莱特与巴克利先生（我们的同龄人）写信，巴克利来自剑桥，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斯文、温和而且精明。迈金斯打算告诉他们，他们在全灵学院的经历都很出色——贝克特<sup>1</sup>、赖利、奥尼尔还有他自己就是例证——仅凭列举这些名字，他就急于得出好的结论。然而，想要进入那个部门工作，他们就会比较留意你所期望的结婚对象的背景、政治品质等等，你会觉得这样的刨根问底令人不适，并因此感到恼怒。我还会给新学院的史密斯写信。我想你该和赖尔谈谈，或者如果你更喜欢让我来做这件事，不急的话，那就等我回来。我本该认为，作为讲席教授，他和普莱斯应该能够直截了当地向基督教堂学院或是奥里尔学院说清楚（别人告诉我马克拉根不会回来了，但我不知道此事真实性如何，不过接下来还有罗斯顶缺）。

如果你的政治信念真的变得立场分明了，而且充满热情，外交部那里可能会让你很疯狂很沮丧，除了外交部——那里的好处和坏处一样多，财政部也是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地方，而且真的有趣。那里比较显眼的人似乎是（a）迈纳斯<sup>2</sup>，他一定能够做点什么，尤其是在莫里斯的胁迫之下，（b）E.布里吉斯<sup>3</sup>，那里的新领导，出于坚定不移的党内团结精神，他一定会办这件事的，（c）丹尼斯·瑞克特<sup>4</sup>，虽然他不是其中成员，但我肯定他能够通过一点私人关系帮你说话，最后还有（d）爱德华·普莱费尔<sup>5</sup>，我认识他，盖伊·奇尔弗也认识他，他是年轻人中最有能力、最可信的。还有凯恩斯勋爵，我和他不太熟，不能与他耍诡计，但通过罗伊或者斯帕洛或是别的什么人去找他，他应该不是不可接触的。这些人比哈罗德都更有影响力，尤其

1（威廉·）埃里克·贝克特（1896—1966），律师，1921—1928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25—1953年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2 罗杰·迈纳斯在1940年被任命为财政部临时主管。

3 爱德华·布里吉斯（1892—1969），1920—1927及1954—1968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19—1938年任职于财政部，1938—1946年任内阁秘书长，1945—1956年任财政部常务秘书长。

4 丹尼斯·赫伯特·弗莱彻·瑞克特（1907—1997），1929—1949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43—1945年任奥利弗·利特尔顿（生产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1945年任约翰·安德森（财政大臣）的私人助理。

5 爱德华·怀尔德·普莱费尔（1909—1999），1934—1946年任职于财政部。

是凯恩斯，他喜欢聪明的年轻人，而外交部就不能说像他一样了。

我觉得有趣，看见[克里斯托弗·]希尔现在在北方司，和杰弗里·威尔森<sup>1</sup>共同负责“苏联与波罗的海各国”，杰弗里·威尔森曾经是克里普斯的秘书。他们必将创造出一座与周围环境色彩大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岛屿。<sup>2</sup>

至于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强烈盼望能返回牛津，我的思乡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了。丘吉尔先生说，假设做感到不适的事可能比做觉得宜人的事更正确，那么我们对自己职责的了解就比对自己的兴趣与行为的了解更加清晰。我一直任由我这儿的上司，A.克拉克·科尔爵士和外交部把我往这边拉、那边拉，唯一的条件是在1946年初永远地回到牛津。现在有一个计划要派我去莫斯科，然后回华盛顿，最后回牛津。我已经表示很不愿再回到美国（撰写“精雕细琢的”快讯，它一直指导着英国政策的走向，并在此后多年成为伍德沃德<sup>3</sup>的研究对象），不过还是让他们为此打架吧，而不是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流血。我渴望着无论怎样在8月的时候会见到你。

你永远的

致阿利克·史密斯

新学院院长

1945年6月6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院长：

我写此信只是为了让您先了解事情的背景，如果外交部研究此事，他

---

1 威尔森以前曾受委派到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克里普斯手下工作。  
 2 希尔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直至1957年），威尔森在1930年曾任牛津大学劳动俱乐部主席，所以虽说在外交部他的政治观点不像希尔的那样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但他也会比他的同事更左派一点。（关于希尔在战时从事的事业，有许多猜测，而他本人对此从未公开评论过，例如，他是否是特别行动处成员，在他死后，有种说法说他是苏联的“鼯鼠”。）  
 3 E.L.伍德沃德1939年被召回外交部，研究英国外交政策史。

们可能会与您联系。在您离开美国之时，一切似乎都妥善安排了。我们的新大臣，乔克·贝尔福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就开始因为要把我留下而焦虑不安了，认为我不可缺少的旧时错觉使他苦恼不已，而他手下一些头脑更为简单的同事们则已经因此而惶惶不安了，相信我，这样的看法无论怎样都是没有充分的依据的。经过多次往来交涉，给旧金山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报，等等等等，他们决定致电伦敦，提议批准我去莫斯科，像最初计划的那样，而那边还是要求莫斯科之行后我还得要回到这里，即在12月（就是说，9月我从伦敦去莫斯科，10，11和12月的前半月待在那里），然后回到这里一直待到1946年1月，“履行特殊职责”。伦敦—莫斯科、莫斯科—伦敦、从伦敦再回到华盛顿的确切日期还是有点灵活性的，但总体安排则将在1946年4月全部结束，我提出，否则，我不妨永远离开牛津，并要求获得养老金。对于这个计划我没有表示出任何热情，于是被适时教导了一番，说我把我自己，或者往最好的方面说，把学院与大学的利益，置于我身为男人与公民的明确责任之前了——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英国大使馆，而我却要在英、美、苏关系的关键时刻离开这艘航船，而我又身怀独一无二的资质，等等等等。我一再询问他们，在我回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究竟打算让我做什么，结果是（a）我将免于行使每日起草文件等例行职责，并将担任“总顾问”，处理一些被认为届时将很严重迫切的问题，（b）由于行使该职责的必要性也许将无限期延续，并且到了1946年4月1日还不会终止，有一份特殊的工作还得我做，即撰写拉斯基所谓的“精雕细琢”的快讯，阐述在过去的五六年中美国在对英、苏关系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让事实还原其本来面目，从而，当伦敦的急躁官员们面对美国政策的突然转向或是愚钝之举而有着火危险时，我的快讯可以起到纠偏作用。这样的快讯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所有官员们会一直提及并引用的，通过追踪美国政策的历程，它将使官员们保持冷静，并且，希望快讯中相互矛盾的零星片语不会令他们不满。我不能否认，写这样的文件是有必要的，而且不论由谁来写，这个人都应该在美国而不是在伦敦，因为明智的做法就是与美国杰出人士，官方与非官方的，就所写文件包含的问题进行非常不正式的私人化的交谈，既然作者已经刚巧和

这样的人有私密的关系，这样，也许一个在美国待了三四年的人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写出所需的五六十页的文章，而不是完成研究这个题目无疑需要的三册书的篇幅。说这些的时候我零散地发了一些牢骚，我成了新大臣（老资格的新学院人，他安慰我）的囚犯，而我的牢骚遭到漠视，他们滔滔不绝地诉求着，想让我好受一点。

假如外交部或学院觉得这不是特别好，我将解除职责，根据安排在2月份平静地返回。当面对不同职责之间的冲突时（请罗斯与普里查德原谅愚见）<sup>1</sup>，我只能把决定权交给更高的权威，并遵守巨人们之间交战的结果。我想只是让您了解这就是预期的情况，情况——当然不是上面提到的关于快讯的那部分——并未全部上报给外交部，因而，请您最好对此保守秘密。至于上面提到的关于快讯的那一部分为什么没有告诉外交部，我不太清楚，除非是让伦敦了解情况的必要性，在这边看起来也许要比在伦敦更为明显，而他们只是还不愿因此冒着受到伦敦尖刻反驳的风险。这个计划看起来没有害处。

我收到瓦德汉姆学院院长有趣的来信，抱怨如果另一个（爱德华·普里查德来了，“他将（a）不懂英国法，又（b）是个美国人”。对此我倒并不在意，我想您也是如此，如果您能说一两句话，说您还是想要他来，我会很高兴的。

我还收到可怜的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的多封来信，他是一位值得景仰的哲学家，由于他对是否在新学院兼职教书等事的想法，巴利奥学院拒绝了他。关于这一点，我又一次想到，是没有什么空缺职位给我们了，可还是那句话，一旦有空缺，希望您能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最后是关于兰伯特男爵<sup>2</sup>的，他是不拿奖学金的自费生候选人，我最近写信告诉过您他的事。请原谅

1 罗斯与普里查德都讨论过不言自明的职责间的冲突是否真实，并提出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但把顺从政治权威当做是摆脱这类冲突的途径，他们对此是否反对，并不特别清楚。

2 莱昂·让·古斯塔夫·塞缪尔·兰伯特男爵（1928—1987），已故亨利·兰伯特男爵与乔安娜·兰伯特男爵夫人（上文第660页注1）之子，1946年春季—夏季学期在新学院（经伯林提议）就读，没有取得学位（但在1949年他得到日内瓦大学政治与经济科学学位证书；之后，先是成为兰伯特银行合伙人，而后又成为该银行行长）。



我就像一位高级导师般对待您——只要最潦草的便条就足够了。愿您的身体极其强健，愿A.科尔达爵士<sup>1</sup>身体也好，并源源不断地提供丰富的供应。

您永远的

〈请对此高度保密，最好阅后销毁，理论上私人是不允许获知这些消息的；但是您必须了解事情的进展，否则我的计划看起来就太神秘了。〉

致莫里斯·鲍拉

1945年6月7日〔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莫里斯：

谢谢你的来信，它带给我极大的享受。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四周一片单调急促的跑步声中，听到真正的人声，我会有怎样的感动。你已经见到盖伊了，因此已经听说了所有本地谣言，不过我还是会试图探究你的同事哈特<sup>2</sup>（相对于我的同事哈特）的新抱负将引领他走向何处。两个哈特应该尽快聚在一起，看看谁能淘汰谁——他们有某些共同的品质。

这件事你会有兴趣听的，你的朋友芬利<sup>3</sup>被任命为哈佛的全职讲席教授。我的朋友奎因教授<sup>4</sup>，曾在维也纳遇见弗雷迪，很喜欢他，奎因几乎与芬利一样出色，他可以一口气谈上八个小时的哲学，令听者如沐春风，获益良多。他在海军部供职，我们在夜晚谈论逻辑实证主义。你一定看到了——不过也许你没有看到，我还是随信附上了——埃德蒙·威尔逊<sup>5</sup>关于英格兰的

1 无法解释伯林此处为何提及科尔达。

2 威廉·欧格登·哈特（1903—1977），律师，1926—1946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与导师；1944—1946年任驻华盛顿英国商业运输外交使团团团长。

3 小约翰·休斯顿·芬利（1904—1995），美国古典学者，1942—1976年在哈佛任教，1942—1974年任艾略特讲席教授；很有影响并广受欢迎的教师与导师。

4 威拉德·范·奥尔曼·奎因（1908—2000），美国一流哲学家与逻辑学家；1936—1942和1945—1978年在哈佛任教；1942—1945年在华盛顿担任海军情报官员。

5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一流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社会评论家，为《新共和国》与《纽约客》撰写文章，著述涉及广泛领域。伯林提到他发表在1945年6月2日的《纽约客》第

绝妙文章，开头语气甜蜜，接着便像以往一样突然变得尖酸了。

你写的关于沃尔特·惠特曼<sup>1</sup>与怀特·梅尔维尔<sup>2</sup>的文章我读来觉得很真诚——唉，但即使是在某些方面聪明如威尔森先生的人，也显然没有粲然的才智迸发。当得知英格兰有人能够引用葡萄牙诗歌，纽约的葡萄牙人兴奋非常，他们立即确认了与威尔森对话者的身份，即新大臣乔克·贝尔福。事实证明，打消这样的错觉，我是颇起作用的。贝尔福是个有魅力的人，相当疯狂（虽然不是本质上的疯狂），他的俄语说得很不错，在莫斯科见过帕斯捷尔纳克<sup>3</sup>，他已经创作完诗篇的最后一卷，很吸引人（对此下面我还有更多评论），他是首位来到此地的充满文学热情的文明人，无论是对俄罗斯、德国，还是法国的文学，等等，帕斯捷尔纳克的民族性中有某种重要而迄今无人仿效过的异族个性，贝尔福把这仿效得惟妙惟肖。 572

我从未听说过楚科夫斯基<sup>4</sup>，不过对另外一个人，马沙克<sup>5</sup>，倒是很熟悉，他是天才的儿童诗作者，虽然不像楚科夫斯基那么好；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雷蒙德·]莫蒂默先生评论他们的作品是“迷人的小装饰”。

我的计划有点吓人。我本已确认去年11月回牛津，在高压之下我留到了3月，接着是更大的压力，然后我留到了5月。后来克拉克·科尔——一个富

42—57页上的文章《自由记者：写在战争结束时的伦敦随笔》，该文“经修订并扩充后”以“写在战争结束时的伦敦随笔”为题收入威尔逊的《没有贝德克的欧洲：速写，在意大利、希腊与英国的废墟之间》（纽约，1947）一书中。

- 1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以诗集《草叶集》（1855年首度出版，在其后多次再版中由惠特曼一再修订补充）闻名；他摒弃文学与社会惯例，以自由诗体与口语写作，常常以迄今仍被认为不适合诗歌的主题（例如生理之爱）创作诗歌。
- 2 乔治·约翰·怀特—梅尔维尔（1821—1878），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以对运动，尤其是猎狐活动的描写而闻名；作为自愿者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在土耳其非正规骑兵中担任上校；死于一次狩猎意外。
- 3 鲍里斯·莱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著有《日瓦戈医生》（1957）。曾学习音乐（也作曲）与哲学，后来转向诗歌写作，1914年出版首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自1930年代中期他一直遭受官方攻击，并停止发表诗歌，转而从事翻译。在死后恢复了部分名誉，但《日瓦戈医生》直到1989年才在苏联出版。
- 4 考尔尼·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尼科雷·瓦西里耶维奇·考尔尼楚科夫的笔名）（1882—1969），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自1918年起任彼得格勒/列宁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英美文学部主任；1939年起在佩里德尔基诺作家聚居区居住。
- 5 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马沙克（1887—1964），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1924年起担任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儿童部主任。

有魅力的人，总想在他的职员中搞点恶作剧，和俄国人关系也很好——向我提供了签证，那是以很棒的条件从莫洛托夫<sup>1</sup>手中得到的；于是我受到苏联人的邀请，参加他们庆祝“全面胜利”的活动，手续已经办妥。我将在7月底先回到牛津（我想，伯林一家现在已经离开了），9月去“苏莲”（有意而为的戏谑之误笔——译者注），至多在那里逗留两到三个月。然后他们计划让我回到美国，写一份鸿篇巨制的快讯，内容涵盖一切，并在各项问题上永远指导外交部的前进方向，不过我想我可以让这个计划泡汤。总的说来，我正在强烈恳求他们把我放了，可是他们中与我友善者认为我不可或缺，而其余的人中又有一半认为我极聪明，这种不可或缺感源于对专业人士进行的智力活动的异常恐惧。为了逃避16个波兰人的命运<sup>2</sup>，我打算依附强大的阿什顿·格瓦特金，他可能会去那些地方旅行，我做他的口译员。

573 至于普里查德，我还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法律不是一个科目，而他十分了解美国法，而且，毕竟古德哈特去剑桥时不认识别人。他比以前瘦多了，不再那么像戴维森<sup>3</sup>，虽然他现在和莫洛托夫出奇地相像，尤其是当他戴上菲利克斯的夹鼻眼镜的时候。如果他将成为来自肯塔基的参议员，并且在一点也不遥远的未来在亟需之时把我们大家从当地法西斯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那么他必定在还没有往后退之前就先撤回欧洲了。他会在牛津交到朋友，也会树立敌人，他不会久留，但会往我那间可怕的教师休息室注入所需的血液。诚然，他会是一个美国人，但毕竟普莱斯与普拉斯克特<sup>4</sup>也一样，对此没有人在意。他一定会给那群讨厌家伙<sup>5</sup>捣乱的，那里会欢迎这样的帮手，不论来自何方。他是个很快活而且神经质的人物，总是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有责任鼓励他去牛津。他不会和C.K.艾伦<sup>6</sup>或者柯

1 莫洛托夫1945年4月3日的来信与相关文件一起收入外交部181/1000号档案。

2 上文第666页注1。

3 也许是J.A.戴维森（上文第592页注1）。

4 普莱斯只是半个美国人，他的母亲是美籍。哈利·海姆利·普拉斯克特（1893—1980），1932—1960年任新学院天文学萨维里安讲席教授、研究员，1936年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航空制造部进行航空试验；他实际上是加拿大人。

5 副本中原文为“sxxxts”，也许是“shits”：这是鲍拉最喜欢的标志性轻蔑用语。

6 卡勒顿·坎普·艾伦（1887—1966），澳大利亚人，1929—1931年任牛津法理学讲席教授，1931—1952年任罗氏慈善基金理事会牛津秘书长与罗氏慈善基金监管人。

蒂斯或者萨姆纳相处好的，莱福特也应付不了他，罗伊可以告诉你他的英勇事迹。

我听说罗伊现在是议会候选人，他肯定必须作为我们大学的候选人与叛徒索尔特竞争吗<sup>1</sup>？索尔特的行动在这里不是很受赞同，因为人们认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能够说明他在内阁待过，而且人们大多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那难以形容的妻子伊瑟。<sup>2</sup>

阿赫玛托娃<sup>3</sup>住在列宁格勒，很难联系上，因为她是旧时代的幸存者，虽然不能确切地说是法西斯野兽的幸存者。

574

你写的关于但丁与卡蒙斯的新书<sup>4</sup>这里还买不到，当然，菲利克斯对此书很了解。葡萄牙大使德·比安奇先生<sup>5</sup>、他的妻子斯基德尔斯基太太，还有他的新闻专员小P.P.邦·德·苏萨·珀恩斯对此事都很兴奋。他的朋友亚历山大·伯克<sup>6</sup>，你会记得他是已故的圣人特罗特的朋友，他出现在华盛顿，是《芝加哥商业杂志》的特约通讯员，发表了一些极不恰当的有害情绪，诸如毁灭德国，以及对德国市民的惨无人道的轰炸等，他的母亲在集中营待过一些时候，但这个事实不足以弥补他所流露出的情绪。请注意我所说的

1 在7月5日的普选中，阿瑟·索尔特再度当选为牛津大学选区的下院议员，他自1937年起担任这个职位，直至1950年牛津大学的议员席位被撤销。他实际上并不在内阁，但1945年5月至7月期间他有丘吉尔的临时代理政府的内阁头衔，即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也许这里所说的背叛指的是他与托利党交好。

2 1940年，年近六十岁时，索尔特与伊瑟·玛瑟·布拉德（1969年去世）结婚，伊瑟婚前姓巴格，是索尔特的前同事亚瑟·布拉德的遗孀。索尔特太太生于美国，拥有游历世界的非凡经历，在华盛顿有一所房子，与美国政府的许多要人相熟。

3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1889—1966），杰出的俄罗斯诗人，国民偶像，因顽强地经历了斯大林迫害并创作出苏联时代最美的诗歌而受到尊敬。俄国革命之前她是一位阿克梅派诗人，1922年在她的诗集《主的1921年》出版后，她被归类为“资产阶级”而遭到谴责。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她作为诗人而被正式流放，但她活了下来并出版了她最伟大的作品，组诗《安魂曲》（写于1935—1940年），该组诗是为她与其他人所经历的大清洗的苦难而写的个人自白。据伯林在《个人印象》一书中所述，在访问苏联期间，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相遇对二人而言都有深刻意义，而（奇怪的是）伯林写此书提及这段经历时的口吻，仿佛他不知道阿赫玛托娃依然在世。

4 《从维吉尔到弥尔顿》（伦敦，1945），但但丁不是书中所涉主题。路易斯·瓦兹·德·卡蒙斯（约1524—1580），葡萄牙诗人，他所写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歌颂了葡萄牙的历史。

5 若昂·A·德·比安奇博士，时任驻美国葡萄牙大使。

6 （罗伯特·）亚历山大·赫伯特·伯克，1934—1937年在圣体学院学习。

话，新的好德国人也许比相应时期那些老的坏德国人糟糕得多。

达夫·库珀真的表现得就像一个勇敢的好人，他显然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大使。看起来有点可惜的是，他的大臣，那个你不喜欢的人，会在他的午餐会上露面的——至少那是我的猜测——只要能够让首相不得不向将军<sup>1</sup>道歉。

玛丽安和菲利克斯的关系略有改善，星期天午餐会时她对他不再那么粗鲁了。她很抱歉，她告诉了你我是社交名人，并同意，她将收敛一些她的恶意。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肯定是这里最端庄大方的面孔。

詹姆斯·蒲柏·汉尼西<sup>2</sup>很喜欢美国，特别是南方，还有伯兰特<sup>3</sup>的儿子（我有一封伯兰特的来信，这样介绍他，“法律界知名人士安伯利勋爵。虽然他是我的儿子，我认为他很讨人喜欢”），是这儿军队中比较古怪的成员之一。饶有趣味的麦克道格尔<sup>4</sup>几乎要令普拉诺埃<sup>5</sup>失去他的飞机了，结果在某些营区很不受信任。

575 你是否认识威廉·克拉克<sup>6</sup>，之前在奥里尔学院的那位？他声称认识你，他在争取基督教堂学院的奖学金，是个有能力的人，不过品性不是太好。他强烈要求我接受芝加哥大学的一份工作，而我不想接受，对他我不能说什么敌意的话。他称呼院长为劳先生<sup>7</sup>，而不是劳牧师，因此感到不安，不过我已经安慰过他了。

你对海伊特<sup>8</sup>的宽厚我深感痛惜，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制造麻烦，而

1 戴高乐。

2 （理查德·）詹姆斯·亚瑟·蒲柏—汉尼西（1916—1974），英国作家，以传记作品而闻名；战时在英国情报机构工作；1943—1945年被委派到华盛顿工作。

3 伯兰特·罗素，相关故事参见上文第659页。

4 未确认。“饶有趣味”是新学院数学家哈代首创用来形容迷人的年轻男子的。

5 莫里斯·普拉诺埃（1897—1974），古典学者，1936—1956年任布雷斯诺学院副院长；他从未结婚。

6 威廉·唐纳森·克拉克（1916—1985），记者、公务员、作家，1935—1938年就读于奥里尔学院历史专业，1938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讲师，1941—1945年供职于芝加哥英国情报处，1945—1946年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后来（1950—1955年）任《观察家》的外交通讯员。

7 约翰·劳牧师（1899—1960），1939—1959年任基督教堂学院院长。

8 吉尔伯特·亚瑟·海伊特（1906—1978），英国古典学者（1951年加入美国国籍），1932—1938年任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与导师，1938—195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希腊语与拉丁语教授；1941—

且相信我，他决非朋友，在对老朋友的忠诚度上他仅次于克罗斯曼。他的妻子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她所有的缺点加起来，也不如他危险。

现在我们要说说汉茨（汉普希尔）的严重情况。当然〔巴利奥学院的〕院长会那么做，而且他正是学院没落的缘由，要布里格男孩<sup>1</sup>还是不要布里格男孩。我已经给史密斯写信说了汉茨的事，但是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想全灵学院并不是那么在乎要根据那些条件把他留下来，而且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的身份就和鲍恩类似，而他本人是很不喜欢那样的。他已经到了这个人生时期，必须成为全职研究员，从事一项工作，博得同事的信任，而不是身处不稳定的位置。可是我在给史密斯的信中没有这么说，而是热情地推荐他。另一方面，只要我在那儿，而哈特继续在那个职位上，就没有第三位研究员的位置。像卡特林<sup>2</sup>，我是怎么说奥里尔学院的？我听说马克拉根不回去了。我想罗斯是障碍。基督教堂学院怎么样？女王学院呢，像以往一样继续吗？如果女王学院不要汉茨，那么让史密斯接纳他就几乎不可能了。所要做的是防止他走上麦基弗<sup>3</sup>那条可怕的下坡路，而且，不管怎样，一旦又有职位空缺，史密斯还是会对麦金农忠心耿耿。如果麦金农跟着梅格斯进了巴利奥学院，恐怕汉茨将不会考虑基布尔学院的空缺。他告诉我他想去外交部，还想结婚。反对理由是（a）他超龄了，不能参加外交部考试，（b）他说他所持的政治观点很不适合外交部，（c）那个女人。<sup>4</sup>外交部排斥有通奸经历的人，不过他们也许可能接纳这样的人，只要他们确定对方不会在这个方面继续惹麻烦。我能否保证这一点呢？是的，我会保证的，可是

576

---

1943年为驻美国与加拿大的使团成员，1943—1946年加入英军；与小说家海伦·麦金尼斯（1907—1985）结婚。

- 1 埃德加·特里弗（“比尔”）·威廉斯（1912—1995），1931—1934年就读于莫顿学院历史专业，1934—1935年任哈姆斯沃思高级学者，1937—1939年任初级研究员；1939—1945年在部队服役（成为蒙哥马利的首席情报官，准将级军衔）；1945—1980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1947—1952年任政治与历史导师。
- 2 乔治·爱德华·戈登·卡特林（1896—1979），政治理论家、记者，1924—1935年任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作家维拉·布里坦的丈夫，政治家谢利·威廉斯的父亲。
- 3 亚瑟·米尔尼·麦基弗（1905年生），1924—1928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两门学科获优异成绩，获约翰·洛克奖〔上文第23页注4〕），在多个学院任教但是没有全职职位。
- 4 勒内·艾耶尔。

这么做我的良心是否安宁？不安宁。这就是一个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履行责任的例子，罗斯以及那些情操高尚的剑桥同事们对此例会感兴趣。我于是让迈金斯给外交部写信，推荐汉茨，即使他们不接受他，对他或他们也没有伤害，我自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至回来，到时候我会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实际上汉茨的真正位置在莫德林学院，这要等到威尔顿<sup>1</sup>最后在那里出现，并且奥斯汀把他当做自己的同事。然而，如果有什么是我在这儿所能做的，我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很乐意效劳。我已经给汉茨写了信，告诉他外交部的情况，我都找了什么人。他问哈罗德·尼科尔森或是达夫·库珀是否可以帮忙，但这两人在正统派眼里很糟糕，只能帮倒忙。像赖尔就有影响得多，虽然西尔维斯特[·盖茨]也许会和劳先生谈谈，亨利·摩斯<sup>2</sup>会和格莱德温谈谈。

我的日程表上的下一项是俄语教职。虽然毫无疑问，考诺瓦罗夫是个很不错的好人，你对汉茨的看法对他也适用，他对俄语及俄罗斯文学所知甚少。他的研究领域是一些不重要的俄罗斯人所持的温和的社会与经济观点（历史上并无知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或是哲学家）。然而，事已成定局，我们必须重新建构。如果有谁在牛津认真地做一点俄罗斯研究，那真的会是很好的一件事，如果考诺瓦罗夫能谦虚得当，并准备聘请比他更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研究还是做得起来的。萨姆纳的方针是必须聘请英国血统的人，在我看来这显然很荒唐，因为在哪儿都找不到符合这样条件的胜任人选——康奈尔大学的西蒙斯不过是平庸的旅伴，至于英国本土，不论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方面，事实已经不言自明了。不过，我在纽约发现了一位罗曼·雅各布森，他那位愚笨的弟弟有段时间曾在B.佩尔斯爵士的部门工作，显然人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雅各布森是在世的最好的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专家，他的俄文译著《伊戈尔远征记》<sup>3</sup>的确是一流的。显然他是最

1 托马斯·杜沃·威尔顿（1896—1958），自1923年起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与哲学导师。

2 见下文第810页。

3 伯林此处原文为：*Slovo o polku Igoreve*，中世纪俄罗斯史诗，有多个译本，如《伊戈尔远征记》，等等。

出色的语文学家，而且他还认识1917年的所有未来主义者，对科勒尼科夫<sup>1</sup>的评价尤其高。他显然是某种天才，几乎不像弗兰克尔。伦敦的几所大学似乎有意邀请弗纳茨基教授<sup>2</sup>担任俄国史教授，他非常胜任这个职位，雅各布森认为与他联合就能满足他在英格兰从事研究的一切所需，我强烈地相信，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吸引海外的学术群星来拜谒他的神殿，并自动地缔造出文化与光明的中心。相信在伯明翰大学有个空缺，曼彻斯特大学也有。聘用外来移民不好的老论断很荒谬——他起初在布拉格，后来，由于是犹太人，他和捷克农民出身的妻子一起逃到瑞典、挪威等地，然后又到了哥伦比亚。他与苏联的关系不坏，而且他也不是法西斯野兽。我试图使多兹对他产生兴趣，多兹在这里对远东语言进行某种伪考察，但是多兹肯定地对他说，纯研究将来在牛津不会得到赞同，那里只是鼓励有利于社会的研究课题，而这让雅各布森很是沮丧。库页岛的一个小部落现在只剩2500人，没有书面文字，但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爱的形象，当（以俄语）引用该部落的抒情诗时，确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他抱怨说，国会图书馆里有关他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都放在柳条箱里面，那些老朽的白色卫兵连箱子上结的蛛网都不打扫，麦克利什先生想让这些白色卫兵退休，但是没有成功，而他们的首要性格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仇视所有文献资料，他的这些抱怨很正确。也许雅各布森将在伯明翰得到安抚，那里还有亲切的巴赫金<sup>3</sup>，但是如果考诺瓦罗夫可以花费归他个人支配、用于聘请助手的奢侈的1200镑中的一部分（可能是800镑），来雇雅各布森，再花300镑请一位来自女王学院的莱明<sup>4</sup>研究员，然后再花100镑用于专业开销，也许可以出一点成果，而我们将是真正的受益人。所以你一定要深思此事，否则考诺瓦罗夫可能会雇

1 维克多·弗拉基米洛维奇（“维里米尔”）·科勒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与语言理论家，俄国革命之前立体未来派的领袖。

2 乔治（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维奇·弗纳茨基（1885—1973），生于俄罗斯的历史学家，1927年移民美国，1927—1946年任耶鲁大学教授级合作研究者，1946—1956年任俄国史教授；以他的《俄国史》（纽黑文，1929）而闻名。

3 结果雅各布森从未在英格兰担任任何学术职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4—1950）当时在伯明翰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俄语语音学。

4 伯林此处原文为“Laming”，读作“Lamming”。



用一些比他还要平庸的人，整件事就玩完了，那你就得给《泰晤士报》写更多的信，讨论丹提斯<sup>1</sup>的事。萨姆纳，我想他现在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所有这些事了，他只认识另一位愚蠢的（谢尔盖·）雅可布森，或是把他错认为其兄了，所以绝不会允许他把他硬拖进来转移注意力。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认为可以在牛津办一个时间较长的暑期学校或是类似的形式，不一定非参加不可，但是如果愿意就可以参加，周围还有各种斯塔克小姐之类的人，在欧洲斯拉夫光芒的笼罩之下，我认为（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是很令人感到享受的，尤其是俄国人会派遣某个人来宣讲新生活，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那么做的。

我已经见过了你的朋友普罗科什先生<sup>2</sup>，看上去像一个非常友善大方的奥地利人；他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无聊的伪作；然而，他还是比凯斯特勒<sup>3</sup>好，虽然我们这里有人认为后者是当代最伟大的。我还见到了亨利·詹姆斯<sup>4</sup>，他的性格很友善，但是不怎么有个性，对于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他说不出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他崇拜首相和斯缪茨将军<sup>5</sup>，但很遗憾斯缪茨对户外管道过度沉迷。<sup>6</sup>乔治·鲁布利先生<sup>7</sup>也来了，他是已故的费希尔院长的翻版，我说的他一个字都没有听懂，但是从始至终都保持安静。詹姆斯先生说他听说过关于你的许多事，一直想结识你，并向你致以最热情的问

1 乔治·查尔斯·丹提斯男爵（1812—1895），俄罗斯骑兵队军官，1837年1月27日在被指与普希金的妻子有私情之后，与诗人普希金决斗，决斗中普希金受到致命伤，两天后去世。

2 弗雷德里克·普罗科什（1908—1989），美国小说家与诗人，他的作品中的异域主题与背景取材于他游历世界各地的经历。

3 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哲学家；1930年代柏林有影响的共产主义记者，西班牙内战中被佛朗哥军队监禁，1940又被法国政府短暂监禁过。后来迁居英格兰；他的代表作为《中午的黑暗》（伦敦，1940），小说表明了他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而与共产主义决裂。

4 亨利·詹姆斯（1879—1947），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之子，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侄儿。

5 扬·克里斯蒂安·斯缪茨（1870—1950），南非军人与政治家；1933—1939年任南非联合政府司法部长，1939—1948年任首相；他广受尊敬，战时主要在伦敦，对政府决策很有影响力；1941年成为英军名誉陆军元帅；他是唯一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和平条约的人，积极参与促成联合国的成立。

6 也许指的是斯缪茨广为人知的强悍体魄。

7 乔治·鲁布利（1868—1957），律师，伍德洛·威尔逊及罗斯福的顾问，罗斯福1938年任命他担任政府间难民安置委员会主席。

候，他很有教养，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美国人。

真有趣，克里斯托弗·希尔现在在外交部的苏联司。我确实无法与欧尔姆·萨金特爵士的看法一致。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沃尔特·特纳

《画中不列颠》

1945年6月12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沃尔特：

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人了。恐怕，指望我尽职是无益的，不论这个 579  
 职责多么神圣，因为今年夏天我不会在伦敦逗留很久。我要到明年才休息，  
 我肯定那样对你来说太迟了，而且无论怎样我都是最不适合这个任务的人，  
 虽然你与克鲁克香克为了这个任务不怀好意地恭维了我，在有关事实的  
 事务方面，我是不可救药的半吊子，只适合做闲谈专栏。我所指的是威廉·  
 廉·D.克拉克，他是情报部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助理，专业的历史学家，  
 现正在争取牛津的研究员职位，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芝加哥大学已经聘请  
 他在某个时间写一部关于英美关系的完整历史。他的脑子里已经有全部大  
 纲了，他擅长清晰理智、适当活泼、简练精辟的风格，并且，他喜欢做这件  
 事。目前他在这儿（华盛顿），通过“华盛顿特区西北五区，纽约大道1336  
 号，英国情报处”这个地址，就可以联系得到他。我想他真的是你想要的合  
 适人选，会向你提供足量稿件。

同时，我刚听完海菲兹与霍罗维茨的独奏音乐会回来，和维吉尔·汤普  
 森<sup>1</sup>一起吃午饭。其中最令人满意的是汤普森，他是罕有的几个对音乐有话

---

1 维吉尔·汤普森（1896—1989），美国作曲家、指挥家与音乐评论家（1940—1954年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稿）。

可以说，而且又能充满感情，说得既有气度又有新意，并说出真谛的人之一。海菲兹的独奏真可怕：他对巴赫与贝多芬都很厌倦，只有当前者有一定难度时他才兴奋起来，这时候他就会有点活跃，向自己与你展现他的能力。至于霍罗维茨，他很轰动，他是帕格尼尼的最后一个仍然在世的传人，他的伟大价值就是作为真正的乐器演奏名家体现出来的一贯价值。他带给听众的体验完全不是真正关乎音乐或是艺术的，他就像是一位杂技演员或是赛车手那样，使听众目眩神迷。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再给他一万元绿钞（我想是这么个词儿），他会演奏得更快，更清晰，就像一台动力强劲的发动机。所以，他对待美妙音乐的方式是种亵渎，而且非常空洞，而李斯特与普罗科菲耶夫则是令人震撼、精彩绝伦的。

我希望8月的时候回去，到时候可以见到你。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580 6月中旬，终于，在会期的最后两周，伯林被召至旧金山，协助奇普·波伦审查《联合国宪章》的俄文版。阿奇·麦肯兹由始至终都在那里，担任被伯林拒绝的新闻官的角色，他清楚记得当时会议气氛积极乐观，这与华盛顿和伦敦对苏联意图的深深预感形成对比：

当时的乐观情绪相当惊人。我认为是与会代表相聚产生的混合情绪，他们有成百上千人，来自众多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那里依然停电，实行食物配给；然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旧金山，享受着美国人的慷慨款待与加利福尼亚的阳光，眼前是战争明显已接近结束的事实，这一切产生出了巨大的快乐。

[……]

所以这是一次非凡的会议，也许我们太乐观了。我们并没有面对全部的事实，因为就是在那时——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波兰危机<sup>1</sup>爆发，还有东欧的

---

1 关于波兰的未来政府（见上文第666页注2）。在长期谈判之后，卢布林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建立了国民统一政府，美国与英国撤销了对伦敦流亡政府的承认。

其他问题。丘吉尔给杜鲁门写了那封信，我们在旧金山对此并不知道，但那封信说，“我担心铁幕已在欧洲徐徐降下。”<sup>1</sup>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6月26日〔手稿〕

旧金山，  
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在这里极为舒适地度过了十天，做一份我的出身使我有特殊资格承担的工作。这里的情形充满了幽默，以后我会向你们描述——我不会为任何事而错过它的。现在我取道纽约回华盛顿，6月29日会到那儿。我计划在7月25日到30日前后离开美国，我愿意坐船，那样更好，更安静、更悠闲，还可以携带行李。我很高兴你们喜欢纳博科夫，他是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类型<sup>2</sup>，因为幸存下来而值得享受一切。我一定会带上(a)全部的毯子、床单等，(b)父亲的护颈与衬衫，(c)母亲的美容用品、康〔斯坦丁〕581希望我作为礼物带给她的袜子，以及其他入也许会希望我捎去的任何别的东西。关于我的下一步旅行安排，我们有空的时候再谈论，不过你们猜得很对，我的心另有所想，而以目前的情况（这在那个国家至关重要，十分典型——完美典范：根据他们在这儿的行为我看出来），这件事放到以后未必可行，我的健康状况很好。因为我很快就会见到你们了，所以现在就不多说了。我想你们会发现我已经变得明智，无论是在私底下还是众人面前时，所以没有理由对我有什么不满。也许在这儿见过我的比利会见到你们，告诉你们我有多好。鲍恩—温特当时的信息是错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将其当作标准。我没有请我朋友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他们只是有选择

1 与威廉·鲍威尔的访谈，1985年5月31日（联合国档案，口述历史部分）。在5月12日致杜鲁门的电报中，丘吉尔说，“一道铁幕在他们的前线降下，我们不知道铁幕背后发生了什么”（参见下文第731页注1）。

2 在俄语中，“聪明的”一词指“知识阶层成员”。

地告诉你们，我只是请他们与你们联系。

爱你们的

沙耶

伯林计划返回英格兰的时间和方式被另一个有趣的提议所推翻。这一次事情的结局不太令人满意，他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在从旧金山返回的途中，波伦先生与哈利法克斯搭乘同一架飞机。他告诉哈利法克斯，我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美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以及其他许多事的人，在波茨坦会议<sup>1</sup>上我作为联络人会起到无价的作用。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时，哈利法克斯说：“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我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然后我突然收到外交部的调令，说我将在波茨坦担任艾登的口译？这是我唯一可以去波茨坦的方法，我愉快地接受了。随后我染上了极其可怕的流感，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我想：“坏了，我真的能去吗？我想我去不了，真的。”医生来看我，然后哈利法克斯来到我的床前并说：“瞧，你一定要去，如果你不去，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永远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你去，当英国大使馆的密探。”

582 我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我收拾行装，带上大量抗生素，被送上飞机飞回伦敦；美国司的头头<sup>2</sup>，以及一个叫大卫·斯科特的人，和我面谈[……]交待这个交待那个，告诉我要去哪里；我将回到外交部，次日会给我备齐所需的某些文件。

于是第二天我去了。回想起来我当时住在里兹酒店；我第二天去了，大卫·斯科特，一位非常亲切的人说：“很抱歉，恐怕你去不了波茨坦了。”<sup>3</sup>

1 该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波茨坦（靠近柏林）举行，杜鲁门、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议中被艾德礼代替，后者是新首相）讨论了施加给德国的和平条件。

2 菲利普·梅因沃林·布罗米德（1893—1977），1945年担任自1941年起命名为“北美司”的部门的负责人。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威廉·海特回忆伯林的失望：

我将作为代表团秘书参加波茨坦会议，以赛亚本来也应该去，一天以赛亚出现在门口[……]拳头在空中挥舞，艾登不让他加入波茨坦代表团，理由是“我不能让以赛亚在那里到处闲聊”。<sup>1</sup>

由于失望，伯林甚至打算取消他的莫斯科之行：

我给克拉克·科尔写信说：“外交部不想让我去波茨坦，也许我根本就不可信任，最好我也别去莫斯科了。”科尔回信说：“别傻了，飞机9月4日起飞。”<sup>2</sup>

所以当波茨坦会议召开时，伯林留在伦敦，与尚未痊愈的流感作斗争，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看望了住在汉普斯特家中的伯林。7月26日，伯林住在帕特里西娅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庆祝工党在之前三周举行的大选中宣告获胜<sup>3</sup>。不久，原子弹投掷在广岛与长崎，日本战败紧随其后。

在动身去莫斯科前，伯林意外地被召至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平层大宅中，后者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每周为《标准晚报》撰写政论文章。令比弗布鲁克勋爵大为意外而且不快的是伯林立即拒绝了他，理由是“我确实不是一个好记者，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很不好做，我想它并不适合我”。<sup>4</sup>

583

---

1 1994年4月28日访谈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3 大选直到在海外服役的军队的投票计数之后才知道结果。

4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致亨利·卢斯<sup>1</sup>

时代公司

1945年8月12日 [电报]

新学院

鉴于我在以后数月所从事职业的性质，恳求您在出版物中不提及我的名字，直至我12月返回华盛顿，我将不胜感激。可否视此为您对我纯粹的私人关照？致以最热切的问候。

以赛亚·伯林

时代公司档案

卢斯8月13日回电：“乐于执行您的提议，不过该报道在上周的刊物中已刊出。十分令人愉悦。你是否依然希望隐去姓名。致以全部问候哈利·卢斯。”这份十分令人愉悦的报道如下：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曾发表看法，认为华盛顿不是一座城市：“它更像大选时期一座巨大的临时总部……华盛顿就像是一个临时宿营地。”

在华盛顿这片临时宿营地住了三年之后，衣衫凌乱、水桶身材、口才极佳的以赛亚·伯林在上周离开了英国大使馆的同事，返回伦敦。作为使馆的一等秘书之一，他在某段时期为英国官方提供信息，促使其了解当今美国，他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黑皮肤、黑头发的伯林，主要工作是整理他在无止境的晚宴与鸡尾酒会上收集而来的信息，撰写关于美国形势的每周报告。女主人与宾客们被他所做的对世界及伟人的牛津风格的评论所吸引；报告撰写者伯林则被他所知道的一切所吸引。他闪耀着机智光芒的叙述成为英国决策人“必读”的文字。温斯

---

<sup>1</sup> 亨利·罗宾逊·卢斯（1898—1967），坚定的共和党人，自1923年起任《时代》周刊（以及其他杂志）的出版人，并担任主编直至1964年。

顿·丘吉尔曾款待欧文·伯林午餐，却不知道此人非彼人，并非那位在那些发自华盛顿的引人入胜的报告下面签上名字的“以赛亚·伯林”。

伯林是里加木材商人的儿子，年幼时移民至英国，大部分成年时间都在牛津或是靠近牛津的地方度过，能说英语、德语、法语，是研究卡尔·马克思、希腊哲学、俄罗斯文学与音乐、美国国会与政治的权威。他是大使馆中为数不多的预见到英国工党选举胜利的人之一。<sup>1</sup>

584

585

---

1 《时代》周刊，1945年8月13日；©1945 时代公司，经允许再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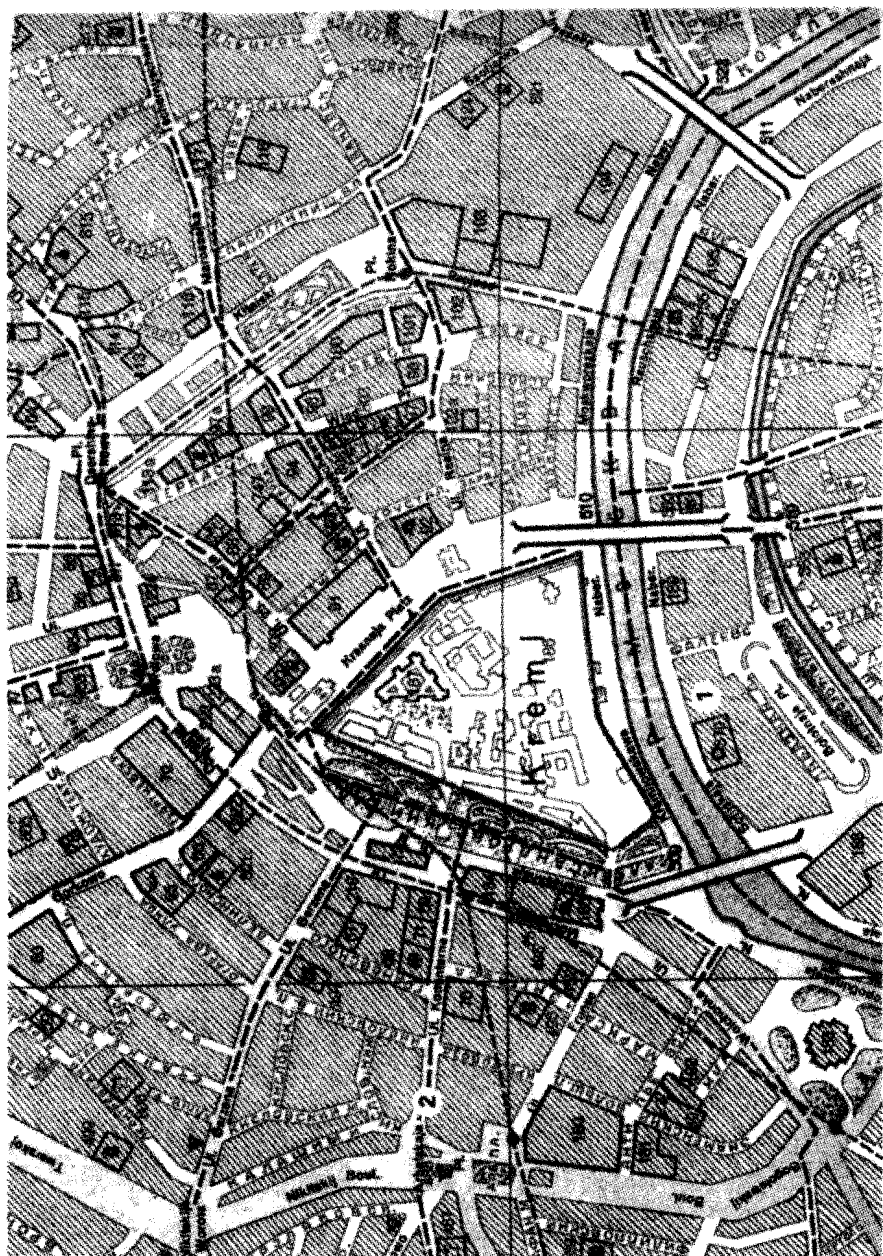




## 莫斯科

你在停战后不久抵家，期待被派往波茨坦。然而艾登先生干预了此事，你被排除在代表团之外。你很失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然后去莫斯科待了四个月——我想，那是你过得很开心的一段时间。你在许多方面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了。你有机会见到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一切都很新鲜，很不一样。你对俄罗斯事务、他们的文学与文化活动的了解因而清晰明了，我想这次访问、你在那儿得到的书籍、你产生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你专注于旧时代俄罗斯思想与文学的原因，并最终使你于1949年在哈佛做了有关这些主题的讲座。

——门德尔·伯林，《家庭回忆录》



莫斯科市中心：图中可见英国大使馆(1)，克里姆林宫与共产国际大道(2)

9月初伯林动身去苏联，他首先飞抵柏林：

你无法在街上行走，因为铺路石损毁了。德国人就像受了惊吓的老鼠一样四处跑动，看上去卑微而惊恐；我们入住的酒店里，服务生在每个人面前颤抖，送东西来时也瑟瑟发抖。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恐惧的人。在那里我遇见了现在的安南勋爵<sup>1</sup>、我的老朋友戈伦韦·里斯，还有其他英国情报部的人，因为有一处为英国人服务的自助食堂，我们都在那儿吃饭[……]这是疯狂的奇观，德国人惊恐失措，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四处乱跑——人们背上背着东西，衣衫不整，扛着包裹。<sup>2</sup>

然后出发去莫斯科，这是伯林自1920年离开后首次访问莫斯科，离开时伯林十一岁，莫斯科对他而言很新鲜。从实物受损程度看，莫斯科似乎不像柏林或伦敦那样在战时遭受了那么多苦难。

它没有被轰炸过，我没有看见受损的建筑。街道很脏，在某种程度上，居民衣衫褴褛。商店里没有商品；唯一令人有兴趣的商店是二手书店，你可以在那里淘到宝贝，尤其是由于在战争中死了许多人，于是他们的藏书就进了这些书店。布尔什维克在迅速发展，尤其是要做给外国人看，不过不管怎么说，剧院仍在营业，而且座无虚席[……]

到了1945年一切都已恢复[……]被恢复了[……]从苏联军队开始在海外作战开始[……]我想如果你读那时人们写的回忆录，你也会发现这一点。从任何方面看你都不会有一座被毁城市的印象，不像伦敦。我觉得它从来没有

---

1 诺埃尔·吉洛伊·安南(1916—2000)，1965年成为安南男爵；1940—1944年任职于战时内阁会议处与军事情报部；1944—1946年任职于战争部法国与德国处；1945—1946年担任英国指挥委员会政治部总参谋部一等军官；1944—1956年任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员；后来(1956—1966年)任院长。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此题注中的其他引文亦出于此。

被轰炸过，没有经历过严重的轰炸，奴隶式的劳动使它快速恢复。

斯大林对俄罗斯社会的伤害要大得多。即使是在大使馆的公寓里与科洛思维特和埃迪·汤姆金斯<sup>1</sup>在一起，也让伯林体验到偏执与多疑，这些是当时苏联生活的特性，因为本地职员是为人民内务委员会工作的，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有人跟踪：

第三天我想了解一下我父亲的亲戚住在哪里。[……]于是就去公用电话亭，在那里支付两个卢布就可以得到地址。没有电话簿，都被毁掉了[……]。你报上名字，付给他们卢布，他们在文件中查找，然后告诉你。于是我说，“伯林教授”，他研究膳食学，“列奥·鲍里索维奇·伯林教授”。<sup>2</sup>但是他们没有立即给我他的地址，[我必须]等两个小时后再去。显然我被某个不怀好意的人跟踪，这显然使我不能只受到普通的接待。然而两个小时后我还是心不在焉地再去那里，他们把地址给了我[……]我回到住处，口袋里放着一张写有他们的名字与地址的小登记卡。第二天我得了感冒，两天都没有起床，等我起来时，一切东西都在，除了那张小纸片，它不见了。

伯林寄回家的信没怎么提到这些压力，显然既是因为担心信件被拦截，也是因为将让父母担心的事尽量略去不提是他的一贯做法。而他们也忽视了一些重要事件，例如伯林在他到达莫斯科后不久，首次拜访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住在佩里德尔基诺作家聚居区。

---

1 爱德华·埃米尔·汤姆金斯（1915年生），自1944年起担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2 列奥·伯林，在和平时期是莫斯科大学的膳食学教授，门德尔的兄弟。他和家人与其他兄弟（也许是列奥的双胞胎兄弟萨姆尔）及其家人共住一间公寓。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四13日 [1945年9月同, 手稿]

[莫斯科,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这封信写得极其匆忙, 因为寄信的包裹今晚送走, 他们告诉我, 下一次要等到八天以后。我在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桌布胡同(附近是现在叫做尤里查—沃洛夫斯卡沃的地方)<sup>1</sup>, 莫尔的公寓里, 住得很舒服。吃的食物比我近两三年来吃的都好, 生活简单而宁静。看见的景象, 听见的声音(即使是闻到的气味), 都充满怀旧气息, 令人感动。不知道我是否会停留得如预计的那样久, 不过如今我过得很愉快。

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现在非常小心, 举止谨慎得体。告诉拉什我还没有找到机会, 也不大可能找到机会, 在凌晨3点时外出散步。关于我的莫斯科印象就留到我们见面以后再说吧。

爱你们的

沙耶

590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四9月19日 [1945年, 手稿]

莫斯科,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上个星期给你们写信了。没有进展, 除了以下这些:

(1) 我在这里吃得比在美国或是英国好多了, 食物烹饪美味, 外交官的待遇很好。

---

1 莫斯科中心的阿巴茨卡亚区, 那里的咖啡店与露天展览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沃洛夫斯卡沃”是俄国革命之前的名称“沃洛夫斯卡哥”的演绎; 当时那条街叫尤里查·沃洛夫斯卡哥。

(2) 在“穆查特”<sup>1</sup>上演的《费奥多尔》<sup>2</sup>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很壮观,《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值得看的戏剧与歌剧为数众多。

(3) 我没有失去看望列奥的希望,我想我知道怎么办。

(4) 每个人都很亲切、友善,我被一切吸引了,尤其是在街道与剧院中的交谈。我忘了还有这样的感情与表达的存在。详情回头再说。我真的身体很好,每天睡到上午11点(我听见女佣弗洛西娅说:“是的,他睡得很熟,很熟。我一定不可以叫醒他,如果有谁在11点之前叫醒他,他会大发雷霆。一点都不像个英国人,是吗?”)<sup>3</sup>还有,想象一下吧,每天都洗热水澡。

爱你们的

沙耶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手稿] 9月25日

莫斯科,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说的。格瓦特金出发去华沙与柏林了,我希望,他回来时会给你们打电话。我明天会试试给你们挂电话。我仍然处于兴致勃勃的阶段,一切都值得看。我依然打算待到11月,然后也许会从水路回家,即走列宁格勒—斯德哥尔摩—英格兰的路线,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瑞典。好计划,是吗? 你们有没有给我写信? 如果有,我还没有收到。如果  
591 你们通过外交部寄信,那么通过北方司(布莱姆罗或是潘弗雷)<sup>4</sup>确认我的

1 “穆查特”(Mkhat)是“莫斯科艺术剧院”(Moskovsky Khudozhestvennyy Teatr)的字母缩写。

2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创作的剧本,1868年出版。

3 伯林此处原文为:“да он спит крепко—крепко будить его совсем мне невозможно—очень сердит бывает ежели его до одиннадцати будят Совсем не Англичанин?”

4 托马斯·布莱姆罗(1915—1995),6月从莫斯科大使馆被调往伦敦外交部北方司(负责苏联与波罗的海各国),他的同事包括战时在军队中服役、刚刚进入外交部的约翰·劳伦斯·潘弗雷(1916年生)。

名字是否在“外交公文袋”上会比较有效果。否则信件可能会在外交部丢失。爸爸什么时候去德国<sup>1</sup>？去了没有？如果去了，如果我知道怎么找到他，我可以很容易就从这儿给他打电话。这儿的食物等还是很可口，蘑菇汤和皮罗吉<sup>2</sup>尤其好。等我回去，有很多事可以告诉你们。

爱你们的

沙耶

我真的非常健康，比在美国或是英格兰时都好得多，这一定是受了青年人与早早用餐的影响。

致玛丽·伯林

星期五28日 [1945年9月，手稿]

莫斯科，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妈妈：

信写得很匆忙。我把照片忘在家里了，不过下一次会放进公文袋里寄去。另外，我还是没有收到您的信，所以我的结论是您也许没有写对地址，或是外交部把它们弄丢了。我的看法是您照下面这么写，不过莫尔会具体告诉您。

送莫斯科外交公文袋

以赛亚·伯林先生

外交部等

列奥是陆军中校(军医)。不过什么也别谈，等我回去，不要告诉爸爸。

---

1 门德尔·伯林9月到11月在靠近德国明登的巴特恩豪森，他的身份是英国政府成立的了解开发德国森林资源以供英国所需的委员会的成员。

2 小馅饼，通常很开胃。



他在德国的地址是什么？我非常好，不过打算把一切都留到回去，然后再说啊说啊。生活非常有趣，我很喜欢在电话里跟您说话。我什么也不需要，莫尔会告诉您。但愿我能想到说什么，很多的爱，给每一个人都送上爱。

592 沙耶

致玛丽·伯林

1945年10月11日〔手稿〕

莫斯科，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妈妈：

我真的非常好。我寄了一张照片，原本是因为外交用途而拍的，不过那是在我抵达这里的第二天，今天我看上去的确健壮有力，一天的感冒或别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得。食物、天气等极为适合我，所以我也许直到11月底才回去，因为我显然必须等到大使回来，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他（或是莫尔）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收到你的两封信和爸爸的两封信，最后一封发自巴特恩豪森。我试图往那儿给他发电报，但这个做法不可行。我实际上每天晚上都去剧院看戏或是听歌剧，晚上11点在家里喝热罗宋汤，11：30上床睡觉。一切都如此令人兴奋和惬意，我心中充满了各种印象和观感，喷薄欲出了。请把我随信寄去的附件<sup>1</sup>先放在一边，注意不要动它，等我回去，我会跟你解释这是谁的，是什么事。

我希望得到许可在11月的某个时候去列宁格勒，据说那里更容易买到书，在我看来，这儿的外国人在我到达现场之前已经把东西一扫而光了。我的同事对我非常友好，与我同住的人，爱德华·汤姆金斯尤其迷人，待人周到。每天早上我和女佣都有喜剧的对话。一切都很棒，令人高兴。哦，对于我生命中这充实的几个星期，等我回去时，有多少话要说啊。像以往一样星期三之前我会试着打电话，如果那时候没有，那就星期三之后。请告诉牛

1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头几章的手稿。

津人我爱他们，尤其是院长。

爱你的  
沙耶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45年10月24日〔手稿〕

莫斯科，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父母亲：

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的。我真的很健康，天气也是好，在我看来，棒极了。我需要向你们描述那嘎吱作响的积雪、那教堂的穹顶、那冰凉空气、农夫、皮帽、街上行人的俄语口音，远处红军列队行进时的歌声吗？—— 593  
一切几乎就像是俗套的列宾<sup>1</sup>笔下的《冬季莫斯科》<sup>2</sup>的深情图示，或是类似的（你们知道俄罗斯人喜欢的画面：“蹒跚而行的女人”<sup>3</sup>或是“冰雪爷爷”<sup>4</sup>，一个蹒跚而行的妇人或是脸颊通红的农夫）。我太喜欢了。11月9日我去了列宁格勒。据说那里的科学家比莫斯科的更优秀，尤其是在医学界，他们的头把交椅由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占据，他四十九岁，兄弟俩和《哈吉·穆拉特》的作者<sup>5</sup>同姓，都很亲切。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都是列宾、谢洛夫的作品，瓦斯涅佐夫<sup>6</sup>的作品也充满了伤感的回忆，但是作为艺术<sup>7</sup>，这真的太可怕了。有一位夫人被谢洛夫

1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著名画家及院士，代表作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873）、《伊凡雷帝杀子》（1885）。

2 伯林此处原文为：Zimnyaya Moskva。

3 伯林此处原文为：spotyknoolas'，此为口语用法，严格用法的俄文词应该是spotknulas'。

4 伯林此处原文为：dyed Moroz，即《圣诞老人》。

5 《哈吉·穆拉特》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伯林在这里使用非常笨拙的暗语，指的是他的叔叔列奥·伯林，萨姆尔的双胞胎兄弟。

6 瓦连京·亚历克桑德洛维奇·谢洛夫（1865—1911），俄国革命之前很受敬仰的社会肖像画家；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瓦斯涅佐夫（1848—1926），画家，以描绘历史题材的油画而著名（深受俄罗斯民间传说影响），例如《伊戈尔王子与迫罗辅基人的决战之后》。

7 伯林此处原文为：kunst。

画了七次——一位赫施曼太太，我记得去年在波士顿看过，是库赛维茨基的女友。<sup>1</sup>一切都很奇怪。当然取道瑞典的路线是走陆路的，不是坐飞机，然后我想去哥德堡或者哥本哈根，从那里转海路，但是我还要再看看。奇尔弗打电话来问房子怎么办，他11月走。我说我不想一个人住，他最好把我的东西装到箱子里存放好，等我回华盛顿停留六个星期时，我会住酒店。我享受着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分钟，比任何一个我遇见的人都更喜欢这里。很高兴你们身体都很好。我会想办法再打电话。

爱你们的

沙耶

虽然伯林在家信中没有提及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情况，弗兰克·罗伯茨给外交部的报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例如，罗伯茨记叙了伯林10月30日出席了一次俄国人举行的晚餐会，参加者主要包括职业作家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战时未复员的军官的妻子，餐会上普遍的看法是“英格兰的工党胜利使得它与苏联的关系糟糕多了，比丘吉尔能允许的程度更糟。一个孟什维克的政府总是讨594 厌的”。<sup>2</sup>另外一份这样的报告概括了11月7日伯林与一位苏联官员的对话。他们的讨论再次激起俄罗斯人对丘吉尔的崇拜。这位官员评论道。

1941年时丘吉尔先生比德国人聪明得多，他“在希特勒背后捅了一刀”。据说，普遍的看法是，丘吉尔先生向赫斯表达的意见是，一旦希特勒进攻俄罗斯，英国会“停下来休息”；[……]然而丘吉尔先生成功地使希特勒与苏联纠缠在了一起，于是打破承诺，并表现出了非凡的天才，而俄罗斯人是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伯林恰当地解释了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当时的气氛恰恰就像是一位英国官员告诉中西部的美国商人，澳大利亚不是殖民地。这些俄罗斯人抬起眉毛，有礼貌地不再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餐会上于是继续讨论利用旁门左道

1 伯林此处原文为：аміе。

2 10月30日致克里斯托弗·沃纳的信，外交部371/47858，N15507/18/38。

（“布拉特”）<sup>1</sup>弄到剧院入场券以及别的。在这方面他们向伯林提供了很多方便。<sup>2</sup>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六11月10日 [1945年]

莫斯科, 英国大使馆

我的亲人们:

写信只是要告诉你们, 9号我去不了列宁格勒, 因为火车被预定了, 要在政府招待会(唉, 我没有接到邀请, 礼服<sup>3</sup>白准备了)之后把克林姆林宫的客人送走, 所以我13号才去, 也就是星期一, 很期待。这里有最好的医生, 在莫斯科, 不是在列宁格勒。不论怎样, 我非常健康, 见到了我一直都想见到的, 而且所见比所愿更多, 我打算接受妈妈的建议, 不匆匆忙忙, 因为我不可能很快再来这里。一切都令人新奇。我只能等回去以后再说了。我买了库普林的缺了半本的《亚玛》<sup>4</sup>, 1912年涅瓦版(马克思)<sup>5</sup>, 所以战时与战后的内容没有包括进去, 但这部分内容不多。这需要450卢布=9英镑。托尔斯泰很难弄, 因为纪念版有96卷, 现只出了30卷。我会试着把它们集全。最早的版本售价极高(我们的在利奥马<sup>6</sup>那里)。如果有什么你们特别想要的, 快点通过外交部的公文袋寄信来(经过审查程序的信件要七个星期才能到达)告诉我, 我会尽力的。我的计划是买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勃洛克,

1 利用回扣与走后门的方法获得没有权位者不能买到的奢侈品, 这在苏联时期及以后都很盛行。

2 1945年11月10日致克里斯托弗·沃纳的信, 外交部371/47925, N16432/627/38。

3 伯林此处原文为: Neville's frac。

4 阿历克桑德·伊万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 俄罗斯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 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亚玛》(《火坑》), 一部耗时数年(1908—1915)写成的关于妓女的小说, 追求轰动效果, 这解释了伯林为什么只得到小说的一部分。库普林的创造力在他1919年移民巴黎之后消减了, 1937年他返回俄罗斯。

5 《涅瓦》周刊, A. F. 马克思于1870—1918年于圣彼得堡出版, 以出版俄罗斯作家全集作为业务补充。

6 门德尔的另一位在世的兄弟, 所罗门·伯林。

也许还有一个好版本的屠格涅夫。但是你们喜欢什么？妈妈说到画册，这里只有谢洛夫、列宾等人的画集，价格很贵，因为俄罗斯人真的喜欢他们。他们在伦敦更便宜，相信我。这里不昂贵的只有沃特加，还有一点鱼子酱，我打算买了带回去。食物与生活方面在我看来很合意。给你们我全部的爱。我真的很快快乐。科尔先生回来了，他对我极好。莫尔很快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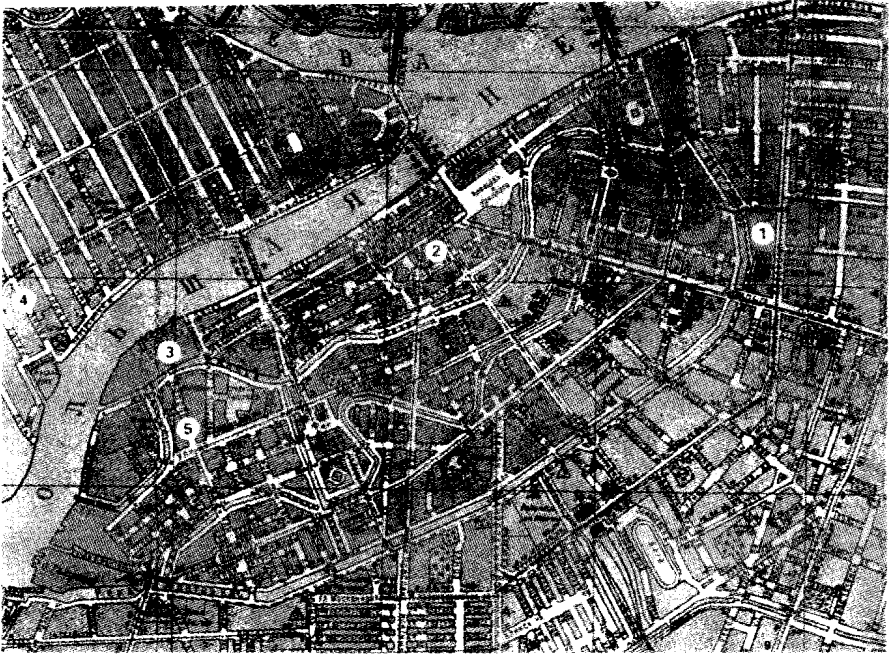
## 列宁格勒

我被冰封在恐惧中很久了，  
最好请奏一支巴赫的恰空舞曲，  
乐曲之后将走进一个男人，  
他不会成为我深爱的丈夫  
但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我与他  
将惊扰二十世纪  
我误以为  
他是神秘的赠与，  
是最痛苦的命运。  
他将来到喷泉屋我这里  
品饮新年的美酒  
在这个有雾的夜晚他将姗姗来迟。  
他将记得主显节的前夜，  
窗前的枫树，婚礼的蜡烛  
诗篇在世间飞逝……  
但这不是第一朵丁香花  
不是戒指，不是甜蜜的祈求——  
他带来的是死亡。

——安娜·阿赫玛托娃<sup>1</sup>

---

1 她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第三与最后”的题献辞，写于1956年1月5日（主显节前夜），距离她与伯林上一次相遇十周年。《安娜·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第547页，朱迪斯·海姆舍米埃翻译，罗伯塔·里德编辑，第2版（波士顿，马萨诸塞/爱丁堡，1994）。



列宁格勒市中心, 图中可见丰坦卡运河边的喷泉屋(1)、阿斯托里亚酒店(2)、莫伊卡运河(3), 以及伯林一家于1916至1920年间在彼得格勒居住过的两条街道: 瓦西里耶夫斯基岛22路(4)、马克林大道(旧称安格列斯基大街)(5)

关于伯林苏联之行的后半部分，似乎没有信件保留下来。这段空白一部分由他本人向外交部叙述的11月13日至20日对列宁格勒的历史性寻访填补，当时距德军结束列宁格勒围困不足两年<sup>1</sup>。下面是他的旅伴、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布伦达·特里普<sup>2</sup>在这次考察中所写的日记，它为伯林生动的备忘录<sup>3</sup>提供了背景。

1945年11月12日，星期一

整天时间都在想我们是否将去列宁格勒。最后，4:15行程定了下来。火车5点出发。以赛亚·伯林在大都会酒店<sup>4</sup>把我找来。[我正]戴着帕纳斯太太<sup>5</sup>的皮帽，穿着自己的厚重大衣。天很冷，但是火车车厢里温暖而舒适。我们先是聊了好一阵，然后吃晚饭，合乎情理地早早入睡了。伯林睡上铺，我睡下铺。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他穿着睡袍，手里的杂志从床边落下，就像睡在婴儿车里的孩子。

- 
- 1 德国人封锁了列宁格勒，人们通常称它为“900日之围”，事实上封锁持续了872天，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德国对俄国的侵略，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在1941年6月已经开始，三个月不到，纳粹的军队就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切断了它与苏联其他地区的联系，并且在北方芬兰军队的协助下，完全包围了城市。经受了持续的地面及空中轰炸、日益绝望的匮乏、一切基本设施的瘫痪，以及异乎寻常的严寒（1941—1942），列宁格勒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决心。在这次战役中有多少人死亡，各方数字不一，伯林引用的数字远低于实际数字；真正的数字接近100万，而战前人口是300万。大多数人死于饥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严寒、伤寒的流行以及其他疾病，还有的直接死于德军轰炸。如果没有结冰的拉多加湖上的“冰路”，使得有限的物资得以运入城中，并撤离了一些病人及老幼，这次灾难原本会更严重；到了夏季，供给通过驳船运过拉多加湖。1943年红军打破了部分封锁，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直到1944年1月德军才从外围被彻底驱退，列宁格勒得以解放。1945年这座城市因在被围时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而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的最高国家奖章。
  - 2 布伦达·穆里埃尔·霍华德·特里普（1906—2004），英国文化委员会驻苏联代表（负责安排就非军事科学文献与苏联科学院的交流），由于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能在苏联行使职能，他曾是外交部的文化专员，持有外交官身份。
  - 3 见下文第706—717页。
  - 4 布尔什维克剧院对面的酒店，距离克里姆林宫五分钟路程，在1940年代该酒店是英国大使馆新闻处成员的住地。
  - 5 波兰籍犹太人生化学家雅各布·帕纳斯（1884—1949）的妻子。在1941年纳粹占领利沃夫后（随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德国人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屠杀），苏联给许多杰出的波兰人提供了安全通道，因此帕纳斯夫妇当时在莫斯科。帕纳斯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但后来被捕，死于狱中。



1945年11月13日，星期二：列宁格勒

599 上午10点到达列宁格勒。身着虎皮的本地导游来接我们，并且引我们上了车，驶向阿斯托利亚酒店。<sup>1</sup>我们的两间房相邻，在二楼，很舒服，就是太冷。没有热水。喝过咖啡后，我们出门寻访，沿着莫伊卡通河去找以赛亚的出生地<sup>2</sup>。空气清冷但阳光很好。列宁格勒看上去美极了。

11月14日，星期三[及之后几天]

第二天天气更好。白色的冰霜衬托着灿烂阳光，大块大块的坚冰堆积在涅瓦河边，河中央是清澈的水流。新上了油漆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后来下了雪，雪融化后天气将辉煌的景色一扫而光，但这座城市还是一样美丽，一样高贵，一样雄伟庄严，只是显得有点冷酷无情，没有丝毫仁慈和怜悯。

晚上我们去剧院看戏，第一天看的是芭蕾舞剧《睡美人》，又看了几场电影，随后两人分手，我独自到丰坦卡河边的剧院看《李尔王》，然后去看望安娜·阿赫玛托娃，或者呆在住处，早早上床睡觉。后来伦道夫·丘吉尔<sup>3</sup>过来，两人在隐士庐博物馆<sup>4</sup>度过了一个糟糕透顶的上午，冻得半死。后来他又和我们一道观看了芭蕾舞《加雅涅》<sup>5</sup>，表现得相当讨人喜欢。接下来几天我们都睡到很

1 大革命前后列宁格勒最上档次的酒店之一，据说希特勒曾计划德国打下列宁格勒后在此举行庆功会。

2 这是误解：以赛亚·伯林出生在里加，但1916—1920年生活在彼得格勒（即列宁格勒），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待了两年，然后又到安格列斯基河畔，它的北端支流与莫伊卡通河相接，汇入涅瓦河。

3 伦道夫·弗雷德里克·爱德华·斯宾塞·丘吉尔（1911—1968），作家、新闻记者，保守党政治活动家，战争时期情报官员，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独子。温斯顿·丘吉尔在7月份的英国大选中失利下台。

4 国家隐士庐（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由叶卡捷琳娜大帝建于1764年，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以西欧油画藏品著称。这些艺术品收藏在涅瓦河堤岸上相互连接的建筑群里，其中以冬宫最为著名，还有小隐士庐、旧隐士庐和新隐士庐等。“隐士庐”一词意为“远离尘世、身心放松的地方”，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自然风景园的创建中十分盛行。1941年德国人入侵后，隐士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紧急将上百万件珍贵藏品打包转移，剩下的藏在地下室和地窖里。大部分藏品幸免于难。

5 见下文第708页注2。

晚起床，白天就去买点书，沿着寒冷、冰冻、积雪开始消融的街道艰难跋涉。这里的电车太差了，比莫斯科的还要糟糕。

[……]

我和以赛亚有过几次愉快交谈，不过大部分时间他的谈话内容都过于博学高深，我只能保持沉默。他发现我乏味无知，我却蛮喜欢他。他过于智慧了，很难与他有任何真正的交流。他对事物的理解过于依赖理智，而不是情感。他与其他人，至少与女性的关系十分微妙，停留在精神层面，富有刺激性。他本人没有太多热情，从来没有触摸过某个人，或挽过某个人的胳膊，或者看上去从容自在，态度友好。他让我感到敬畏，觉得自卑，觉得自己不行，这主要是因为他不会仅仅因为我的缘故而有兴趣来见我。有一次我们谈到不幸人的幸福 [……] 我认为他实际上非常害羞，正因如此，才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加以掩盖。到后来，我们之间的交谈达到了颇为融洽的程度，但我认为进一步会面不存在任何基础，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谈话。

600

11月21日，星期三

上午11点回到莫斯科，拎着四个大箱子，以及大约九包书。幸亏使馆派车来接我们。

一直到三十五年后，以赛亚·伯林才把记忆中与俄罗斯作家们的会面经过记录下来。<sup>1</sup>不过当时他写过两份正式报告。<sup>2</sup>任期结束后，他编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专门汇报俄罗斯文化界的总体情况。<sup>3</sup>他还根据在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列宁格勒的亲眼所见，写了一篇充满个人色彩的报告。他对11月15日至16日（大概日期）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有意轻描淡写，甚至做了些微篡

1 见《个人印象》中的“1945和1956年两次会见俄罗斯作家”一节。

2 来自弗兰克·罗伯茨的一封信（1942年11月25日致C F A.沃纳，外交部文件，371/47925，N16819/627/38）概述了以赛亚·伯林的另一份报告，有关他与列宁格勒“一颗苏联冉冉升起的新星”之间的谈话。这位作家宣称，“天性善良的俄罗斯人，觉得很难对他们罪有应得的敌人产生仇恨 [……] 对年轻英俊、一头金发、躺在雪地里死去的德国士兵充满钦佩之情”。

3 《斯大林政权下的俄罗斯艺术》，《纽约书评》，2000年10月19日，第54—63页（有删节）；后在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全文收入。

改。但几星期后他赋予这次会面的意义以及这次会面的结果出现在致驻莫斯科英国代理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的感谢信<sup>1</sup>以及后来的报告中。发自列宁格勒的报告如下<sup>2</sup>。

火车离开了莫斯科，准点抵达列宁格勒。车厢座位周围，我们并未见到任何明显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人。去列宁格勒的路上没有供应食物；回来时提供了三明治<sup>3</sup>，价格和往常一样高得惊人。倒是来回路上警卫茶壶里的茶水源源不断，让我们喝了个够。大家相互之间彬彬有礼，很守规矩。没有喝得醉醺醺的苏维埃军官前来搭讪。

列宁格勒市中心几乎完全看不出遭到破坏的痕迹，众人关注的公共建筑的恢复和修缮工作已基本完成；一座座建筑在清冽的寒风中傲然挺立，  
601 显得壮丽辉煌。公共塑像和纪念碑又重新耸立在人们面前，隐士庐博物馆已经开放（除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展室之外），听说正在布置德国展室，很快就要对外开放，显然大部分藏品是从德累斯顿和柏林运来的油画。有人对德累斯顿的油画全部被莫斯科扣留表示忌妒，但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街上的人流外表上比莫斯科人更寒酸、更潦倒、更瘦弱。毫无疑问，这主要是近三年的封锁和围困带来的后遗症，它充塞着人们的记忆，大家谈之色变。也有可能是因为列宁格勒这里见不到几个农民，举目望去，尽是些疲惫潦倒、无精打采的旧时代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人让人产生这个印象。他们身上破旧的衣衫在刺骨的风雪中飘动着，比起穿在外表粗犷、生活条件优越一些的莫斯科市民身上，显得更加褴褛凄惨。这里的街道比莫斯科更加空旷清静，涅夫斯基（主干道）除外，它有时会像莫斯科的猎人之路大街一样热闹非凡。无轨电车密密麻麻，水泄不通，这一点在苏维埃共和国随处可见。至于有轨电车，外表十分可笑，好似一只残疾的巨大黄蜂慢慢爬行，身上挤满藤壶似的人类，其中一些被上下车的人流挤得几乎要倒下去，

1 见下文第726页。

2 该文原件收于档案馆，外交部文件371/56724，N375/24/38。这一经过粗略编辑的版本最先刊登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01年3月23日，第13—15页，标题为“访列宁格勒纪实”。

3 柏林此处原文为：belegte Broetchen。

一边高声诅咒，骂骂咧咧，一边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脚跟，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挤倒。因此，有轨电车简直就是令人恐怖的死亡陷阱，我个人深有体会。即便在凌晨4:30和清晨7:30，车上也是座无虚席。

据说多数乘车人都是从列宁格勒附近地区每天进城来的，还有就是因为住房问题。虽说不像莫斯科那么尖锐，却也十分严重。不过再怎么讲，这里的房子，至少是我采访的那些作家的住房比他们莫斯科的同行的住所要气派得多，也空荡得多。气派是因为总体而言，列宁格勒属于建设得比较好的城市，不像莫斯科那么小家子气；空荡则是因为听人说很多家具——其中一些非常古老华丽，在封锁期间都被当作燃料烧掉了，要想早日替换也不太可能。至今在列宁格勒，燃料明显还是非常短缺，就连阿斯托利亚酒店也存在供暖不足的问题，至于隐士庐之类的公共博物馆和美术馆就更不用提了。特里普小姐发现，在一个科研所的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供应暖气，现有的一点热气来自两个小房间里临时凑合的小炉子，是图书馆员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生的火。根据特里普小姐的所见所闻，这里的个人如果想得到生炉子用的木头，必须用面包配额交换，或是用其他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比起莫斯科，这里的物价低得多（尽管传言恰恰相反），从信托商店<sup>1</sup> 602 出售的地毯和大钢琴，以及二手书籍（大约是莫斯科价格的三分之一），到瓦西列夫斯基岛市场里的胡萝卜和葵花籽都是如此。

至于列宁格勒周边地区，听说沙皇村（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多数导游称它为“普希金镇”）和彼得宫都还是一片废墟，加特契纳也仍是一座空城。通往巴甫洛夫斯克的道路遭受了极大破坏，看来去那里很难。至少我个人前往那里的提议很不现实：“火车几乎不行，路途又远”，虽说与沙皇村相距仅有几英里。女诗人薇拉·英培尔<sup>2</sup>后来说，巴甫洛夫斯克的皇宫目前正在抓紧修复，新年前会完工。至于我提出的参观奥拉宁巴姆的建议就更少人附和了，我只好作罢。

-----

1 专门为党内显贵和官员出售进口商品的高级商店。

2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英培尔（1890—1972），苏联诗人、短篇小说作家、新闻记者，列宁格勒围城战役的幸存者，1945年因叙事诗《普尔科沃子午线》（1942—1946）获斯大林奖章。

尽管国际旅行社的女导游对演出质量颇有微辞，我还是到马林斯基剧院观看了《伊凡·苏萨宁》。<sup>1</sup>剧院内部已经恢复了传统的蓝色和金黄色调。演员的歌唱和表演都十分蹩脚，比莫斯科大剧院的更糟。乐队还将曲目称为“为沙皇献身”，坐在我身旁的红军官员对此好一番讽刺挖苦。但是，列宁格勒的芭蕾舞表演却十分精彩。我同特里普小姐一起去看了《睡美人》，还有与特里普小姐和伦道夫·丘吉尔一起去看了《加雅涅》<sup>2</sup>，《加雅涅》由亚美尼亚著名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创作，两部剧都远远好过一般的莫斯科演出，尤其是《加雅涅》，虽然内容只是非常普通的正统“苏联集体农场年青人”的道德剧，却因为穿插了高加索和里海的民族舞蹈而变得充满生机。舞蹈家们个个精神饱满，舞技非凡。这与俄罗斯现如今舞台上十分常见、就连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也不能幸免的死气沉沉的华丽景象和固定机械的熟练舞步恰成鲜明对比。也难怪现在列宁格勒会将这点专门提出来，认为自己的艺术活动成就辉煌。

列宁格勒弥漫着一种自尊心受伤的情绪。这座冷俊堂皇的城市曾经是古老的国都，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如今却被莫斯科的机会主义暴发户们视为过时落伍，只能用毫不客气却底气不足的不屑态度予以回应。比起莫斯科，这里的人看上去生活更加贫穷，更加缺少关怀。作家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活都不太富裕，外表和整个语气比起他们的莫斯科同行显得沉重得多，也更儒雅、消沉得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政治上而言，这里的生活似乎要轻松得多。<sup>3</sup>至少我能肯定，在列宁格勒没有人跟踪我，与苏维埃市民的

1 《伊凡·苏萨宁》是原先的剧名，后来该歌剧作曲家格林卡将其更名为《为沙皇献身》，以纪念沙皇尼古拉一世，他曾参加了1836年该剧在圣彼得堡的首次排演；大革命之后，该剧恢复了原名。马林斯基剧院（又名基洛夫剧院）是上演歌剧和芭蕾舞剧的著名场所，以沙皇皇后马利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名字命名，于1860年建成开放，上演过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剧院内部为蓝色和金黄色，在围城战役中遭到破坏，伯林来访前得以修复。

2 《加雅涅》是一出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舞剧。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常常被讽刺为“小伙子遇见拖拉机手”的类型；伯林的记述没有提及这一主题，旨在从通常严酷平淡的苏联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田园和浪漫色彩的一面。该芭蕾舞剧于1945年首演，剧情发生在亚美尼亚的集体农庄。

3 因为列宁格勒市政府的相对自治权，为此斯大林在1949—1950年“列宁格勒事件”中采取了清洗政策。

交流沟通也不像在莫斯科那么艰难。在允许我与作家们见面交谈的三个漫长的夜晚里，偶尔也有两人之间的面对面私下交谈，其中有位最最胆小的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必须小心翼翼不与外国人接触，要特别谨慎，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必要，比如在列宁格勒。我能与这些作家见面，主要是通过涅夫斯基作家书店经理的帮助，此人成熟老练，值得在这里提上几句。<sup>1</sup>

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克林个子不高，身材瘦小，是一位个性快活、略微秃顶的红头发犹太人。他喜欢说话，精明机灵，和蔼可亲，极其热情。此人也许是苏维埃共和国里消息最为灵通、拥有读者最多、最有魄力的图书发行商。虽然像其他国有书店的经理一样，他并没有从图书销售中获得法定的佣金，用他的说法是，完全靠国家给的工资生活，但他推销图书的兴趣和热情至少和西方国家的任何书商一样迫切。身为列宁格勒两家影响最大的书店的经理，他是城里图书价格的官方独裁者，定价多少由他说了算。他还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内从别的书店把书调来，因此能够比我所知道的别家书商更好地服务顾客。19世纪的一些著名书商往往既是出版商，又是发行商，同时还是文学艺术的赞助人，受到这些前辈的影响，他的内心一直隐隐怀着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文学志向——他自己的书店就建在著名的斯米尔金<sup>2</sup>书店的旧址上，还把书店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为作家们和受欢迎的来访者聚会的场所。我和特里普小姐荣幸地被邀请经常光临这间书屋。在这里，我不仅能够舒适的环境下选购书籍，这在莫斯科绝对享受不到，而且还结识了好几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像左琴科<sup>3</sup>、阿赫玛托娃、

604

- 
- 基本上可以确定拉克林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的克格勃）特工。
  - 亚历山大·菲利波维奇·斯米尔金（1795—1857），列宁格勒出版商兼书商，以出版物水准高、为人忠厚慷慨、精力充沛而闻名，为俄罗斯商业图书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米哈伊尔·左琴科（1895—1958），苏联著名讽刺作家，以1920年代发表的幽默短篇著名。因为拒绝遵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规范而冒犯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人士。当时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是：所有的艺术表达都必须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体现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描写社会主义在创造美好生活方面取得的各项成就。1946年，他与安娜·阿赫玛托娃一道成为苏共对文学界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的对象。在受人排斥和贫困潦倒的境遇中凄惨过世。

奥尔洛夫<sup>1</sup>、杜丁<sup>2</sup>等。每次我去那里，房间里总有三四个人在，艺术家、学者或作家佯装在书架上找书，但很少见他们拿书离开，与其说他们是来买书，倒不如说他们在寒冷的冬日到这间温暖的书屋来会见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在这个小小的沙龙里，谈话轻松自由，话题涉及文学、学术甚至政治。也是通过一个在这里认识的人，我得以登门拜访一位文学界名流<sup>3</sup>，在她家，还见到了列宁格勒知识界的其他人士。拉克林本人也积极参与这些交谈，不过显然他的顾客们并没有把他当作知识界同行来看待，而是将他视为一个特别能干的文学总管（他确实是这样一个角色），完全值得大家去巴结讨好。他的作用就好比列宁格勒的费加罗，机敏智慧，无所不能，从购买剧院入场券、安排讲座、举办每月一次的文学晚餐，到通报情况、传播小道消息，全方位地提供各种无微不至的服务。这些都给生活增加了情趣，使之变得惬意和容易忍受。

拉克林曾经以感激愉快的口气提起，他在莫斯科时经常受到劳伦斯先生和瑞韦先生<sup>4</sup>的盛情款待，看起来他很愿意同英国使馆人员继续保持这种联系。他还不无自豪地谈起，1942年以来向英国和美国官员和新闻记者成功地推销了多少本书。对此话题他确实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社交敏感，在洋洋得意的同时，也痛恨地提起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说此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对他进行了贬毁，他认为这么做极其无礼，缺乏公正。他说计划在莫斯科开一家有五个图书室的书店，其中一间专门提供给外国艺术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到书店来，每个图书室都走走看看，或许会遇见一些杰出的莫斯科人，彼此间志趣相投。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促进外国人和莫斯科居民交往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的确，对莫斯科与外国人的隔离程度缺乏认识的状况，在与我交谈的大多数列宁格勒作家

1 弗拉基米尔·尼科拉耶维奇·奥尔洛夫（1908—1996），文学批评家，是亚历山大·勃洛克诗歌专家，编辑了其选集。

2 米哈伊尔·亚历克桑德罗维奇·杜丁（1916年生），士兵诗人、战时新闻记者、战后从未引起争议的艺术家、苏联斯大林主义者，他所写的循规蹈矩的说教诗歌使他在作家协会平步青云。

3 安娜·阿赫玛托娃。

4 约翰·瓦尔德马·劳伦斯（1907—1999），新闻专员，俄文版《英国盟友报》编辑；乔治·瑞韦（1907—1976），俄语翻译。

中也同样存在。

伦道夫·丘吉尔提出希望去看看“苏联人家里面的情况”，这个愿望在莫斯科没有实现，所以我就去请求拉克林先生——他正好感冒躺在床上，问他是否介意让丘吉尔先生采访一下，谈谈被困期间的经历，他很感兴趣。拉克林似乎很赞同这个建议，于是我和丘吉尔先生在11月16日下午3点左右前去拜访他。拉克林躺在床上，但谈起自己和封锁期间的经历时，眉飞色舞，话语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对丘吉尔先生问的所有问题，都显得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之后，他太太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伏特加酒，还有鱼和鸡肉。他住的公寓远离涅夫斯基大街，有三间屋子，房子不大而且光线很差，但装修得还蛮舒适，大致像伦敦市中心克拉肯韦尔或伊斯灵顿公寓的样子，只不过房间里空荡得多，就放了些俄罗斯常见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笨重的德国家具，没有任何小古玩之类的装饰性摆设。拉克林谈到列宁格勒被封锁期间，百姓仅靠125克面包的最高定额度日，没有任何其他食品；谈到当时因为很多家庭有人死亡和被疏散，他收购了大量书籍，但来买书的顾客往往因为吃不饱，没有力气扛走大部头的著作，只能挑选一些薄书，要么就是小说或史书中掉落的章节，沿着冰冻的道路，分散着提回去。他还谈到当时埋葬死人如何困难等一些恐怖细节，并且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木工糨糊的味道，因为当时他曾经用冷水把它稀释后当汤喝。

尽管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是，民众一致认为列宁格勒的救星是波普可夫<sup>1</sup>，而不是日丹诺夫<sup>2</sup>，拉克林向我们证实，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比起其他人来，日丹诺夫在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他说，要不是日丹诺夫派出的护送队帮助民众穿过冰冻的拉多加湖，他拉克林老母亲的性命肯定 606

1 彼特·S.波普可夫作为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列宁格勒市长），负责保证拉多加湖两岸的供给线畅通，组织食物配给并负责作家们的疏散工作。斯大林早就因列宁格勒市政府掌握的权力感到受到威胁，同时嫉妒波普可夫被视为当地英雄的地位，后在“列宁格勒事件”中将其清算，一起遭到清洗的还有列宁格勒战时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

2 安德烈·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政府及共产党官员，1934年任列宁格勒共产党书记，在德国围困期间，作为该市政治首脑，有力并富有成效地承担了抵抗封锁的任务；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后领导了战后针对苏联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的清洗运动。在此次运动中，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清洗出了苏联作家协会。



早就没了，可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那段时期，老人和孩子成百上千地死去，人们个个都向我们证实，单是死于饥饿的人就大约有20万到30万。<sup>1</sup>在光顾拉克林书店的顾客当中，有几位是他引以为豪的，像莫洛托夫、贝利亚<sup>2</sup>（苏联秘密警察的头目）、最高主教阿列克谢<sup>3</sup>，以及列宁格勒的拉比。这位拉比说他本人就经常参加列宁格勒中央犹太会堂举行的各种仪式。通常那里人都很多，那年还从乌克兰的敖德萨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唱诗班“领唱者”。拉比还说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被邀请到英国，去看看“真正”的书店是如何经营的。最后，他送了一本有关列宁格勒的书给丘吉尔先生本人，又送了一本1912年出版、纪念拿破仑1812年撤退的书给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因为他儿子之前说过，丘吉尔是拿破仑相关纪念品的狂热收藏者。

拉克林有关围困时期的令人痛心的讲述得到了其他人的有力证实。批评家奥尔洛夫告诉我，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几乎无一幸存下来。他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享受到了专门发给知识分子的特别定量供应，比如他和拉克林，他们在配给方案中被称为“二级作家”（“一级”和“一流”作家相对比较富裕）。真正靠专用飞机越过德国封锁线疏散到莫斯科，后来又送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仅有短篇小说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斯大林直接下的命令。两人起初都不愿离开，但最终还是向权势低了头。据他们和奥尔洛夫说，大多数朋友都在围困时期去世了，因为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市民，缺少了性命攸关的食物和燃料，几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其中一人甚至说，在他个人看来，列宁格勒现在就是一个墓地。有人告诉特里普小姐，经历过封锁的人常常会因为营养不良发生间歇性眩晕，整体健康状况大幅下降，除非增加营养，否则在接下去几年里死亡率肯定会上升，但增加营养看来完全没有可能。

所有与我交谈的作家都渴望得到英国原版书籍，说通过沃克斯<sup>4</sup>特别

---

1 这个数字偏低，见上文第703页注1。

2 见下文第810页。

3 列宁格勒市主教阿列克谢，原名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施曼斯基（1877—1970），1945年2月当选为主教。斯大林于1943年正式重新设立了俄罗斯正教会。

4 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俄文缩写。

难买到，因为这个机构效率低下，办事障碍重重。他们还暗示了弄到书的种种办法。我们详尽地讨论了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四个作家中我与三位进行了深谈，谈到了普利斯特利先生最近的俄罗斯之行及他在作家俱乐部的演讲。<sup>1</sup>他们坚持说，普利斯特利先生称不上是一位作家，尽管他有娴熟高超的写作技巧。他们觉得难以相信他在英国真的会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继承了文学巨匠狄更斯的衣钵，虽然他自己说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们觉得他本人倒是很亲切友善，可是很奇怪，在为莫斯科《文学报》撰写的文章中，谈到英国文学的现状时，他怎么会把他同时代的人全都指摘了个遍，赞扬的极少，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即这些人的后期作品无一例外都在倒退，而开始时有些还表现出很有希望的势头。其中一位最后甚至直截了当地质问，英王陛下的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普利斯特利先生作为代表英国的文学大使，作为剧作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他的成就都没有那么重要（他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广为人知）。我力图解释普利斯特利先生的俄罗斯之行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安排的，而不是英王陛下的政府的决定，但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人们均对此表示怀疑。在莫斯科，普利斯特利先生对英国社会秩序的抨击似乎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反倒是和以上极其类似的评论时有耳闻，尤其是在知名作家中间。

607

关于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以及我与列宁格勒作家们的通信往来问题，我和他们之间有过一两次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告诉我，没听说有什么四十

1 10月中旬，普利斯特利结束对俄罗斯的六星期访问。此前一个月伯林曾经在莫斯科参加了“纪念《英国盟友报》创刊三周年晚宴”，罗伯特·斯特恩在1947年12月8日的《巴勒斯坦邮报》第4版上写道，“这是一份由英国使馆新闻处创办的俄文版周报”，“宴会在共产国际大街上仿摩尔式加巴洛克式的大楼里宽敞的白色与金色沙龙内举行。这座大楼离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不远，是分配给英国使馆新闻处的，我当时在那里任职。J.B.普利斯特利当时正作为苏联政府邀请的客人在俄罗斯巡回演讲，是当晚唯一发言者。壁画和飞檐上多毛的森林之神和裸体的仙女（九英尺高）饥肠辘辘地俯视着下面六道菜的大餐，同时还有伏特加和香槟。在场有许多俄罗斯名流，像这样经过官方认可，同意苏联居民接受外国人款待的场合十分少有。在我这桌，有索菲娅·托尔斯泰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以赛亚·伯林，牛津大学全灵学院和新学院的研究员，当时任职于英国使馆；还有普罗科菲耶夫夫人，那个著名作曲家的太太[……]。”这一活动应该是在如今名为“友谊宾馆”的大厅里举行，斯特恩的描写有些许夸张（不过之后那间大厅便经过整修）。至少仙女们（如今）都穿上了衣服。

608 岁以下特别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对文学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十分刻苦勤奋。目前的“路线”是关注苏联的边远地区，诸如西伯利亚或塔吉克斯坦。让年轻人尽早接受教育，提高公民意识，是抚育即将出现、更加优秀的新一代有才华作家的必要之举。虽然这么做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效，但至少目前整个宣传导向是鼓励作家们进行相关创作，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假冒的古体抒情诗、伪民谣、伪史诗、公文体诗词等。这些粗制滥造之作把那些原始纯朴或带有中古之风的民族本来独有的东西和原创性都排挤掉了。尽管如此，他们自豪地向我宣称，真是万幸，列宁格勒的文学刊物并没有被这个梦魇纠缠，不像莫斯科的文学周报，里面充斥着上述内容，不过他们破例地特别青睐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那里面不乏真正的天才作品。就他们自身而言，不论“在莫斯科”流行什么样的时尚，走什么样的路线，他们都不会为拥有普希金和勃洛克、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sup>1</sup>的文学传统感到羞愧，也不会拿他们去交换任何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的诗歌宝藏。

他们谈到按照战前所了解的“欧洲”标准教育孩子的种种困难。不过听他们说，尽管困难重重，比起莫斯科还是要好多了，因为这里在国立学校以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里的孩子也因此受到更多文明气氛的熏陶，不至于变成标准化的技术专家——包括在文学领域，否则他们必将面临这种危险。这里人经常谈论“人道主义价值”，以及与“美国风气”和“蒙昧野蛮”等当今公认的主要危险相对的大众文化。的确，从我个人与一位刚从柏林回来、父亲多年前遭到清洗的年轻苏联红军战士<sup>2</sup>的几次会面经历来看，我敢说他至少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博学多才，思想独立，甚至有点过于讲究，几乎到了知识分子式的怪癖地步。牛津和剑桥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些类似的高智商知识分子，备受同学敬仰。不过我想他这种情况是个例外，或许列宁格勒相比苏联的其他地方确实有所不同。

---

1 爱弥尔·凡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诗人。

2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1912—1992），阿赫玛托娃之子，与前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所生。

种种迹象表明，刚才说到的年轻人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原著（虽然他一直待在苏联）。我相信这是事实，同时也不可能仅从一个惊人案例便推而广之，妄下结论。

我小心翼翼地与新结识的作家们接触，尽量遵守他们必须遵守的政治分寸，避免卷入麻烦。他们说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区别依然划分得十分清楚。在党的主要好处是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物质条件，因为国家出版公司和文学期刊通常都会向可以信赖的党员大量约稿，不利之处则在必须尽职尽责，绞尽脑汁完成大量毫无生气的政府宣传文字，而且经常得写，要求的篇幅又长得吓人（人们说这些话时，语气轻缓，闪烁其辞，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清楚，不会有错）。当我问起他们对诸如作家协会<sup>1</sup>主席、诗人吉洪诺夫<sup>2</sup>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何看法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老板”，不好随便议论。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对苏联作家作品的实际质量，很少人抱有真正的幻想。这方面的口头评价相当开诚布公，但难以见诸出版文字。因此，打个比方，每个人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是位天才诗人，而西蒙诺夫<sup>3</sup>则是一位巧言善辩的新闻记者，仅此而已。

我了解到，这里作家外出的可能性相当有限。比如，没有作家联盟主席或者党委书记的正式邀请，作家们不可自行前往莫斯科。当然有时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获得，但这么做既丢面子，同时也困难重重，根本无法经常为之。作家们迫切地想了解外国作家的情况，特别是理查德·奥尔丁顿<sup>4</sup>和约

---

1 1932年，苏共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当时所有的文学团体，成立了统一的作家联盟。目的在于强制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教条。不属于该联盟的作家几乎没有可能发表自己的作品。相反，许多平庸的雇佣文人因为成了作家联盟的官员而事业发达，并享受到随之而来的种种福利待遇，例如乡间别墅、假期、配备司机的轿车，以及前面提到的出售外国商品的专卖店的购物证（上文第707页注1）。

2 尼古拉·塞蒙诺维奇·吉洪诺夫（1896—1979），早期苏维埃时期革命浪漫主义民谣作家。他的诗歌创作逐渐被作家联盟文学官员的职责挤到次要地位。他曾因宣传工作出色以及表现狭隘爱国主义的战争诗歌获得三枚斯大林奖章。

3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1915—1979），苏联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擅长写爱情诗和爱国散文；二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写作出版了战争期间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日日夜夜》（1944），以及大量没有特色的说教式宣传戏剧；后（1946—1954年）主编刊物《新世界》并成为作家联盟的领袖人物。

4 理查德·奥尔丁顿（1892—1962），原姓爱德华·高德弗里，英国作家，包括埃兹拉·庞德在内

翰·多斯·帕索斯。<sup>1</sup>严肃英语作家中，海明威是读者面最广的一位，而在英国作家中，则要数克罗宁博士<sup>2</sup>，尽管品位高雅之士着实认为他的确是比一般人优秀得多，却是个多少带点商业气味的作家。对英语文学的认可明显  
610 取决于被接受的翻译作品，还有小部分取决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允许为普通读者提供哪些外语作品。其结果有时便显得十分怪异荒唐。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的名字（在普利斯特利的文章中提到）没有人知道，但梅逊<sup>3</sup>、格林伍德<sup>4</sup>和奥尔德里奇<sup>5</sup>却无人不晓。外国图书要从莫斯科获得，但即便在那里也很难买到。如果能想到什么办法提供英语国家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他们将感激不尽。安娜·阿赫玛托娃尤其感到高兴，因为《都柏林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她诗文的文章，而且一篇有关其作品的博士论文已被博洛尼亚大学接受通过。两位作者都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

列宁格勒作家中声名显赫的那些均享有豪华住所，居住在舍列梅捷夫<sup>6</sup>家族古老的喷泉屋内。这是一座荷兰风格的建筑，位于丰坦卡河畔，普

的意象派诗人团体成员之一；他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经历的影响，这一点在其诗歌集《战争意象》和小说处女作《英雄之死》（伦敦，1929）中有充分反映。多部著作被译为俄语。

- 1 约翰（·罗德里格）·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写作了多部有影响的实验小说，抨击美国社会的虚伪和物欲横流。其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为《曼哈顿中转站》（纽约，伦敦，1925）及《美国》三部曲（伦敦，1930—1936）。
- 2 A.J.克罗宁的社会现实主义，代表作《群星俯瞰》（1935）在俄国广受欢迎。
- 3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伍德雷·梅逊（1865—1948），英国小说家，当过短时间的演员，自由党议员，战时情报特工人员；他擅长写探险小说和侦探小说，探险小说的代表作为《四根羽毛》（伦敦，1902），后被亚历山大·科达拍成电影；其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哈纳德探长家喻户晓。
- 4 沃尔特·格林伍德（1903—1974），英国工人小说作家，十三岁辍学；失业期间写作了《施舍的爱》（伦敦，1933），故事讲述了大萧条时期英格兰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生活，该小说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并一直被视为其代表作。
- 5 詹姆斯·哈罗德·爱德华·奥尔德里奇（1918年生），马克思主义小说家，新闻记者，澳大利亚籍，自1938年起主要居住在伦敦。二战期间任战地记者，期间出版战地小说《光荣的战斗》（波士顿，1942）以及《海鹰》（伦敦，1944）；其作品译本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后（1972年）被授予列宁奖章。
- 6 舍列梅捷夫家族，著名的艺术赞助商，沙皇俄国时代最富有也最具影响的贵族家庭。其在丰坦卡运河边（因此而得名）的豪华住宅初建于1712年，后来经过多次重建，1740年代在原址上盖了一座更为富丽堂皇的住宅，1918年连同屋内一切陈设全部捐献给了苏维埃国家。阿赫玛托娃住在（1926—1956）大楼一侧的一套公寓里（如今成为纪念她生活工作的展览馆），因为当时她是艺术史家兼评论家尼古拉·蒲宁（她的第三任丈夫）的妻子（后离婚），他也住在那儿。一些苏联作家联盟的成员住在里特伊尼路（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斜对面舍列梅捷夫家族拥有的其他住宅里，并不像伯林以为的那样，都住在喷泉屋大楼里。

希金经常光顾此地——实际上，他最著名的肖像就是在这座大宅的晨室里完成的。这座18世纪末建筑的前门是精美的铁栅栏，一个个大门环绕一座很大的四方院子，院子里树木茂密。沿着门内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就是一间间建造精美的住房，屋顶很高，光线充足。但是食物和燃料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在那里见到的作家并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享受，他们的生活的确还需要为柴米油盐操心。我不无伤感地心想，他们希望列宁格勒早日发展成为与外界沟通的海港，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外国人士或许也会因此到这座城市来，使他们能够与世界接触。对与外界隔离这 611 点，他们似乎特别有感受。他们告诉我说，我本人在此进行的访问，虽然是通过一位书店的熟人安排的，颇为公开，却是自1917年以来第一次有外国人来访，毫不夸张，而且我有一种印象，最好不要把此事四处张扬。和我交谈的作家们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俄文版的《英国盟友报》，那里面所有提到俄罗斯文学成就的内容，诸如书评等等，都得到他们的极端青睐。

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丝毫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却能明显感觉出来，就连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心里也存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之类的人了。列宁格勒一直将自己视为睁眼看西方的知识与艺术生活的家园，从某种程度来说至今依然如此。不论是文学刊物的作家，还是剧院里的演员，或者是我去买书的那七八家书店的职员们，包括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旅客，比起生活安逸、却显得有点粗野和少教养的莫斯科同胞，这些人似乎在礼貌和受教育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这种感觉正确，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所撒下的任何种子，都会比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地生根发芽。至于说一些考虑是否实际，比如是否有可能在列宁格勒建立一个英国领事馆？这不用说是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里和外界的交往肯定会像目前表现出来的一样相对比较容易和随意。目前流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恰是因为这里没有外国机构和国家的常驻代表，从而使监控进入阿斯托利亚酒店旋转门的住客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那个门一次只能容一人出入，可谓插翅难逃（很奇怪，感觉倒蛮舒服）。当局也因此可以少操一些心。



# 华盛顿

(再访)

从未有哪个城市如此毫无来由地这般看重自己。<sup>1</sup>

我现在知道，庄严与面对公众的严肃态度是处理公众事务至关重要的素质，千万不要相信还有其他什么别的。<sup>2</sup>

---

1 以赛亚·伯林论华盛顿，致勒内·詹宁的信，1943年3月30日（本书信集未收入）。

2 以赛亚·伯林，致约瑟夫·艾尔索普，1944年2月11日：见上文第576页。



5th April, 1946.

Dear Sirs: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supply me with 16 resistance coils (2 coils for each appliance listed below) needed for adapting U.S. electrical appliances to British A.C. or D.C. currents of 230 volts. The wattage for each article is:

1 Hot plate	680 watts
1 Iron	1000 "
2 Heating pads	50 "
1 Electric clock	2 "
1 Toaster & coffee-pot	650 "
1 Electric razor	25 "
1 Toaster	550 "

If you will let me know how much this comes to I shall be glad to send you a check by return post.

Yours sincerely,

Isaiah Berlin

Freed Transformer Company,  
72, Spring Street,  
New York City, N.Y.

现存的伯林回英国前写的最后一封信

(右页为此信译文——译者注)

1946年4月5日

亲爱的先生：

麻烦您为我提供16个电阻线圈（下列电器每样两个线圈），我需要它们来改造美国电器，使之能够适应英国230伏的交流电和直流电。每样电器的瓦数为：

一个加热板	660瓦
一个熨斗	1000瓦
两块电热垫	50瓦
一个电子钟	2瓦
一台烤面包机和一只咖啡壶	650瓦
一把电子剃须刀	25瓦
一台烤面包机	550瓦

请告诉我这些一共需要多少费用，我会根据回函费用清单，欣然奉上支票。不胜感激。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纽约市  
斯普林街72号  
复力得变压器公司

以赛亚·伯林1月初终于离开苏联。临行前，他再次来到列宁格勒，与安娜·阿赫玛托娃见面告别，然后取道芬兰和瑞典（他在那里听说自己在新年荣誉证书上被授予不列颠帝国高级勋章）回国。接着很快又到巴黎逗留，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和她的丈夫生活在那里。之后伯林在英国逗留。2月初，在“可恶地错过了信件”<sup>1</sup>之后，他回到华盛顿。

## 致大卫·阿斯特<sup>2</sup>

1946年2月18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就我们在电话中谈到的为《观察家》提供驻美记者问题，我认真进行了思考，并与罗宾·克鲁克香克进行了交谈，现将建议陈述如下：

有三个人选可以考虑，各人条件大相径庭，但依我的观点都完全符合我们的录用标准。首先是年轻一代时事评论员中最最出色的一位，即小约瑟夫·W·艾尔索普，目前他正在美国从事新闻写作。在我看来，他是美国最为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只有李普曼可与之并驾齐驱，这一点无可争议，他的许多同辈（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也都抱相同看法。你应该知道，他过去一直与一个叫金特纳<sup>3</sup>的人合作，为《先驱论坛报》每周出三个专栏。消息来源全都特别可靠，因为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堂兄弟，与华盛顿领导层的大多数成员保持着朋友关系，至少也是可以轻松往来的社交关系。他目前与自己的兄弟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up>4</sup>一起出这个专栏。由于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喜

1 指1946年3月4日玛丽·伯林的来信。

2 (弗朗西斯·)大卫·(朗荷恩·)阿斯特阁下(1912—2001)，阿斯特子爵二世及其妻南希之子；1940—1945年服务于皇家海军陆战队；1946—1948年任《观察家》驻外编辑，后(1948—1975年)任编辑。

3 罗伯特·埃德蒙斯·金特纳(1909—1980)，新闻记者、电视经理人、财经报道员；1933—1937年任职《纽约先驱论坛报》，1937—1941年任专栏作家，与约瑟夫·艾尔索普共同撰写经报业辛迪加出售给多家报纸的华盛顿政治专栏“首都阅兵式”；自1944年开始在广播业大获成功。

4 斯图尔特·乔汉纳·奥利弗·艾尔索普(1914—1974)，政治新闻记者，1946—1958年与其兄约瑟夫一道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经报业辛迪加出售给多家报纸的“就事论事”专栏；相比之下，斯图尔特的思想更为自由。

欢款待各界人士，而且出手慷慨大方，是一位众口皆碑的好主人，加上他的才智和文学天赋似乎并未因为战时服役经历而变得迟钝，他当时在驻中国重庆的陈纳德将军<sup>1</sup>身边扮演着类似政治副官的角色，因此，他的专栏在我看来仍然和过去一样具有高度责任感，主持得相当出色。我相信，他一定会愿意每星期为我们提供一篇稿子。而且，因为他消息灵通，加上极有教养，这篇稿子的质量必将在任何其他报刊普通记者的水准之上。如果发挥好，至少可以与处于最佳状态的威尔莫特·刘易斯不相上下。唯一的欠缺是他不会如你所愿完全归属于你，因为他的专栏已经被全美大约四十家报纸转载；其次，我肯定他不希望替代目前这位记者<sup>2</sup>，他的专栏就发表在此人所在的报纸上，而且依我推测，他不会愿意铤而走险，破坏与此人目前的良好关系。这件事我当然尚未跟他提起，实际上跟这里的任何其他人都不曾说过。但既然你特别注重文风、实质内容和信息来源，我相信艾尔索普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人选。

假如你更乐意找一位英国人，而且是完全属于《观察家》麾下的通讯记者，还有两个人选可以考虑。第一位是威廉·克拉克，目前在我们使馆工作。他是牛津的学弟，我们毕业以后进来的，好像是在奥里尔学院，之后到芝加哥当访问学者。你可以去看看他佚名发表在《新政治家》上的一些文章，那些有关萨姆纳·韦尔斯<sup>3</sup>和李普曼（《美国的战争目的》）<sup>4</sup>的书评，我认为都是上佳之作。在这里所有找得到的英国人当中，他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文笔娴熟犀利，是美国事务的权威评论员。我看他已经决定不当牛津的讲师，虽然过去有段时间这曾是他期待从事的职业（他是历史学家），而是转向去当《大英百科全书》的欧洲史编辑，该项目由马歇尔·菲尔德百货

1 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约1890—1958），1937—1941年任蒋介石发展中国空军的顾问，1941—1942年创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抗日援华航空大队“飞虎队”。约瑟夫·艾尔索普于1943—1944年在中国任陈纳德的部下。

2 所指不明。

3 世界数据中心，《萨姆纳·韦尔斯的世界》，评萨姆纳·韦尔斯的《决策之时》（纽约和伦敦，1944），《新政治家与国家》1944年11月18日，第340—341页；不能说完全佚名，注有姓名首字母（在文章结尾处）

4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的战争目的》（伦敦，1944）的书评似乎不是发表在《新政治家》上，在其他报刊我也未发现克拉克写的该书书评。

公司<sup>1</sup>和芝加哥大学以某种方式共同管理。他过去在芝加哥英国情报处格雷厄姆·胡顿手下任副职。罗宾·克鲁克香克可能也认识他。但我的确是毫不犹豫地推荐他作为一流记者的人选，他博学多才、精细准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名副其实，远远胜过目前在这里工作的那批英国通讯记者。此事我也尚未和他提起。如果你想与他联系，可直接通过使馆或我。我会很乐意帮忙。

我还可以向你推荐我从前的学生，帕特里克·诺维尔—史密斯。他从新学院毕业后，1937年又去了哈佛当访问学者，对美国有广泛了解，做事十分得力。他已从部队服役回来，目前牛津正在考虑他申请的几个哲学研究员职位。我想，他会很愿意回到美国，这个国家显然对他具有吸引力。他过去虽不曾涉足新闻业，但我认为他属于那类能力出众的英国公学的学生，会尽其所能努力学习工作，不可能低于某个水准。我无法确切说明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报道，但至少可以保证，他的报道将言之有据、目光敏锐、严肃认真、文笔优美。你可以在伦敦对他进行面试，他就住在他父亲家里（我想，最早的诺文—史密斯家族<sup>2</sup>与国际联盟联合会应该有关系，牛津电话簿里能找到他家地址）。

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是一流人才，各有所长。其中，唯有乔·艾尔索普已经享有牢不可破的声誉。的确，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些英国日报不转载艾尔索普的专栏作为有关美国的评论——不论是普通读者大众还是英国内阁成员，读这个就足够了，没什么必要再读其他东西。他在不同场合先后与大多数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人员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外交部的托尼·兰博德或是霍耶·米勒可以告诉你有关他个人的全部情况。

我能想到的都写在这里了。希望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信息。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

1 该百货连锁店以其创立者、绸缎尼龙纺织品大亨马歇尔·菲尔德（1804—1906）名字命名。他最早的店在芝加哥，建于1885—1887年，当时在世界上规模最大。

2 诺文（·查尔斯）·史密斯（1871—1961），1909—1927年任谢伯恩学校的校长，1939—1946年任世界公民教育协会委员会主席。

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6年2月19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使馆

感谢你热情洋溢的来信。<sup>1</sup>本来我是可以更早回信的, 不过您的来信在我离开苏联一两天后才到达莫斯科。对自己在那个了不起的国家度过的四个月时间, 我丝毫不感到后悔。每一个日子都有非同寻常的独到之处, 在火车上和公车内的交谈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别处都不可能听到的。

617

我不会在这块丰饶之地停留太久, 4月1日我会重新穿上讲袍, 正好是愚人节。

再一次感谢你恭敬有礼的来信, 以及你对我的所有好意。

致弗兰克·罗伯茨

1946年2月20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使馆

亲爱的弗兰克:

应该向你表示感谢的事有很多, 但首先要提的还是最急迫的。衷心感谢你寄来我关于俄罗斯作家的杂乱无章的讲话稿<sup>2</sup>, 在我看来, 变成冷冰冰的铅字后, 比起在莫斯科, 如今, 这篇丛林一样的东西显得更加隐晦莫测了。

要说的急事是, 你在附信中说寄来了两份, 但乔克[·贝尔福]收到一份是寄给他本人的, 我这封信里也只有一份。是这样吗? 由于这份文件的性质, 你一定非常清楚为什么我如此急切地向你核实。如果只寄来一份,

1 信中日期为1月3日, 祝贺伯林获得不列颠帝国高级勋章。信的开头写道: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当坏消息纷至沓来之时, 我知道, 至少可以从外交部寄来的某个发自华盛顿的每周快讯中获得乐趣和有用信息。”

2 见上文第705页注3, 以及下文第738页伯林对哈里曼说的话。该备忘录曾被印刷下发。

也足够了，要是他们这里想要更多，可以就地复制，可一旦有一份真的丢失了……对X, Y, Z命运的种种可怕猜测就会接踵而来！

说到这里，就不免要对某些从苏联访问归来的人表现出的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感到伤心。抵达伦敦后，我发现《新闻纪事》在一个有关我的闲话栏目上，说我有一位近亲，此人是“苏联高层的专职医生”<sup>1</sup>，尽管此话极不准确，但它所说的已足以伤害到我可怜的亲戚。<sup>2</sup>因为这篇报道肯定会被苏联使馆秘密送往莫斯科，任何收到的官员都会被迫采取某种行动，这一点你比我更加清楚，仅仅就为了逃脱玩忽职守的罪名。噢天，真不知道这位记者是怎么获得这个线索的，我和他素昧平生，从未见过他或对他有所耳闻。明显是从外交部的什么人那里探听来的。真让人郁闷。

接下来说点开心事。你为我们做的事数不胜数，真是万分感谢。我很清楚，一批特使带着并不成熟的使命前来造访，会给井然有序的政府机构造成多么大的麻烦；而使馆若是不失礼貌地随意招待一下又是多么轻而易举，而你们却如此周到悉心。特别是对你陪我在莫斯科度过的愉快日子，我从心底里表示感激。希望我能想些什么方法，以某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再次热情邀请你和赛拉<sup>3</sup>来牛津游玩，自4月1日（愚人节？）开始，我会重新回到那里。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别的办法。不过若有什么我可以在这里替你办的，请一定告诉我，我会对自己有机会为你效劳而感到万分欣喜。

我的旅途平静无波，唯有一点收获，通过与那位列宁格勒的女诗人不断磨嘴皮子，她终于答应为我写一首关于夜半交谈的新诗<sup>4</sup>，我想，这就是我身上发生的最最令人兴奋的事了。没什么其他大事。一直到了芬兰边界，我和一位美国人一起过境[……]，他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临时职员。检

1 1月3日《新闻纪事》大事记中一篇有关赛亚·伯林获得不列颠帝国高级勋章的文章，《丘吉尔先生和拉格泰姆乐王》（第3页），伊恩·麦凯声称，“他的近亲是莫斯科苏共的卫生官员”。

2 列奥·伯林1952年被捕，罪名是他属于一个英国间谍组织，其中大概也包括伯林和门德尔。他遭到逼问和严刑拷打，一直到他“招供”。斯大林死后被释放，但不久即因为在街上看见曾经审问拷打过他的人而心脏病突发死亡。

3 弗兰克·罗伯茨的夫人塞莱斯特·莱拉·比阿特丽丝·罗伯茨，婚前姓帕莎（1906—1990）。

4 该诗为组诗《五点》的第二首。

查我们证件的是一位派头十足的强悍女士，当地海关官员的负责人。她在检查我的护照时，表现出充分的官方礼节：目光视而不见，但嘴里说希望与我简短正式地谈一下。我站起身，向她鞠了一躬，她也严肃地回鞠了一躬，然后两人同时坐下。她开口道，外国官员离开苏联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走之前须将自己所有的印刷品先通过一遍检查，这是苏联的规定。没有这么说的话，过边境时就需要仔细搜查。一些在外国官员看来并无大碍的材料，按照苏联法律，海关人员必须没收，那么就有可能需要交出来。有时候，外国官员对此无法理解，便会发生激烈争吵，如此一来，就会在两国代表之间挑起不必要的争端，尤其若他们代表的是伟大而友好的英苏两国，就更令人感到遗憾。为了避免此类令人不快的摩擦发生，有必要让英国官员在离开苏联之前，先请莫斯科的审查官对物品进行检查。她知道，让他们把所有书和文章拿到相关苏联机关极为不便——对此她毫不怀疑，因此在此郑重建议，假如我们，即英国大使馆，同意邀请苏联审查官到辖区来检查，并将那些准备带出去的印刷品当场打包，贴上封条，苏联政府不会反对这样的便利安排。苏联审查官可以每两周上门一次，也可按照我们的需求更经常一些（就像理发师，我想。或许这个工作可以分派给理发师来干，但他们的顶头上司绝对得是一家）。不管怎样，我还是运用我最最华丽的官方语言，感谢她这番交流沟通，并允诺一定会尽快把她说的转达给使馆。她说我是她很长时间以来在这列火车上有幸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原文如此），很高兴能与我这样一个过去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的话题友好交换意见。她希望我的转达能够使情况改观，消除目前不断加深的误解（我猜想不久前布拉德<sup>1</sup>或者贝纳姆或者是其他人一定与她起过冲突），使两国梦寐以求的和谐友好不受任何干扰。整个场景十分令人感动，而且相当有趣，对我的美国旅伴是如此，对同在车箱里的两位俄国少校和列队守候在车箱外的三位海关官员也不例外。我们握手后她转身离开，三位海关官员即

619

1 里德（·威廉）·布拉德爵士（1885—1976），英国外交官，1946年任驻德黑兰大使，之前为驻莫斯科（1930）和列宁格勒（1931—1934）领事。布拉德在这段时期的日记后由儿子和儿媳出版，书名为《斯大林的俄国内部：里德·布拉德日记，1930—1934》，主编：朱利安和玛格丽特·布拉德（查尔伯里，2000）。



开始仔细搜查我美国同伴的行李，边边角角全不放过。他们拿出照相机(后来又放回去)，又拿出除了莫斯科报纸之外的其他所有俄国报纸，比如《塔什干真理报》等，这是他带去给加利福尼亚胡佛图书馆<sup>1</sup>的。他们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有规定，除了“中央机关报”，任何其他报纸都禁止带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同伴通过我的翻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但终归枉然。接着，我先前那位朋友，负责整列火车的强悍女士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模样就是在说，“你看，这就是不遵守规定的后果”。她用流利的英语，口气冰冷地向我的美国同伴指出，在法律上他是站不住脚的。随后充满戏剧色彩地指着我说，就因为我带的东西合乎规范，处境就和他完全不同。此举造成了[ ]英美两国的不和，不过她刚一走，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不快便烟消云散了。不管怎么说，他人不错，是一位转而信奉自由主义的前法西斯分子，在列宁格勒我借了一些钱给他后，到斯德哥尔摩他也借给了我一些，因此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晴空万里的良好关系。那位女士所说的在使馆辖区预先进行审查的话有一定道理，反正我现在是把这个意见正式转达给你了。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了，不过斯德哥尔摩真是不堪入目，无奇不有，而巴黎(得到允许后我去了那里<sup>2</sup>)则像一个墓地——清洁、美丽、空旷、寂静，让人觉得有一种可怕的压抑感。[……]

回到美国，我发现与7月份离开时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大幅飙升的杜鲁门股票，现在跌得很低。没有了罗斯福总统过去常常遭受的沸腾民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怕的冰冷无情，一种因为幻想破灭而对核心政治及白宫那位茫然不知所措的可怜人采取的玩世不恭、随意接受的态度。有人认为伯恩斯过分妥协，但除了同事“影子”<sup>3</sup>，使馆里谁都不认为

1 赫伯特·胡佛(1874—1964)为美国前总统，他于192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建立了胡佛大学图书馆和档案室，旨在收集和存放有关二战时期冲突和政治运动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报纸等时效性强、缺乏永久性的资料；他希望通过建立战争档案推动和平进程。

2 去看望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

3 应该是使馆某个成员的外号，借用一个长期播放的美国广播剧《影子》。该剧塑造了一位神出鬼没的英雄，利用自己的隐身术捍卫法律和社会秩序。

他是反英分子，虽然贝文<sup>1</sup>显然令他极不痛快。哈利法克斯勋爵对此类事见解相当敏锐，说在伯恩斯面前，人们会感到事物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在他周围游动，什么都不明确，但只要你待他像一位友善的参议员，假定他不太清楚其部门在做些什么，假装亲切地与他坦诚交谈，他很快就会软化，达成和解；假如你要求他达到标准，他就会坚持己见。

美国国务院似乎处于士气十分低落的状态，主要原因是缺乏联系和相互接触，一方面是在伯恩斯、[本·]科恩和艾奇逊<sup>2</sup>之间，另一方面是在部门专家之间。杜勃鲁<sup>3</sup>对土耳其、波斯等国<sup>4</sup>的局势忧心忡忡，但又觉得不好把自己的担心直接捅到上面。比尔·布力特问我土耳其人是否认为英国人应该站在他们一边。我回答说不清楚英女王政府怎么考虑，但就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应该如此。<sup>5</sup>听了我的话他也以个人立场向我保证，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会支持我们。布力特如今已不是政府官员，也没有多少人信任他，但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今天看来甚至比两周前更加真实。

斯大林的讲话<sup>6</sup>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所有风向标式的人物，如李普

- 
- 1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工党政治活动家，1921—1940年任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总干事，1940—1945年任劳工大臣，1945—1951年任外交大臣。
  - 2 狄恩·古登汉姆·艾奇逊(1893—1971)，律师，1919—1921年任大法官路易·布兰代斯的秘书，193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7年任副国务卿。
  - 3 埃尔布里吉·杜勃鲁(1903—1997)，美国外交官，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代表，1944—1946年负责美国国务院东欧部。
  - 4 土耳其和波斯(伊朗)被西方大国视为抵制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屏障。1946年间，苏联在该地区的野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和关注。有关土耳其的关键问题是苏联要求修改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根据此公约，土耳其对具有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两个主要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享有管辖权。苏联要求修改为两国共同管辖。而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则在西方引起了进一步恐慌。自1941年起，苏联就和英国一起联合占领了伊朗，基于以下共识：战争结束六个月内撤出伊朗。这一问题在1月份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被摆上桌面，苏联军队最终在5月份撤离，但前提条件是，伊朗给予苏联特别优惠的石油特许权。
  - 5 在写这封信的当天，英国议会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其间，贝文表达了与苏联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愿望，与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专门提到修改《蒙特勒公约》一事)，不希望土耳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 6 2月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斯大林发表了一个震惊西方大国的讲话，讲话申明要坚定捍卫苏联制度，坚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其中包括以下主张：“纵观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平坦，相反，充满了危机与战争灾难。”针对这篇讲话，美国国务院请乔治·凯南提交当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即为著名的“长篇电报”(见下页注4)。这份报告为双方此后近乎偏执的相互猜疑定下了基调，成为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重要特点。

曼、斯温、夏伊勒<sup>1</sup>等，尽管之前都在讲调解斡旋，并老是触犯我们，说我们放纵帝国主义，现在则转变态度，要么像李普曼那样，提出要采取坚定立场与苏联面对面较量，例如，通过获得地中海东岸的领土，防止俄国向的黎波里进发等手段，整个口气十分强硬；要么至少也是持批评态度，谴责苏联又一次使他们的希望破灭，说不定最后不可避免地需要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捍卫西方世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好现象，乔叔叔近来口无遮拦的发言似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虽然目前他们还是急于避免表现出“支持大英帝国”的态度，仅仅是步我们后尘，但一旦靠他们自己看清局势，即在土耳其或中国发生的一切，正在使他们的切身利益遭受威胁，他们必定会以极其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我想，我们的企图太明显了，不大可能对622 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乔·戴维斯<sup>2</sup>甚至写信给英国国王陛下，希望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能围着桌子坐下来好好谈谈，消除根本分歧，本着互让的原则，解决各自的起码安全需求。

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置身事外，把它全部扔给伯恩斯和参议员们。范登堡<sup>3</sup>参议员告诉一位我认识的美国陆军准将说，他认为德国的军政府十分荒谬，应该撤军，但这里的国务院和战争部都不同意这一[观点]。国务院专家们，比如奇普和他所有的朋友，均和乔治·凯南<sup>4</sup>以及所有你在莫斯科认识的人都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在这点上我们大家不存在根本分

1 威廉·劳伦斯·夏伊勒(1904—1993)，作家、新闻记者、广播员，《芝加哥论坛报》、环球新闻服务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驻外记者，以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发自柏林的报道以及后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纽约和伦敦，1960)闻名。

2 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1876—1958)，律师兼外交家，1936—1938年任驻苏联大使，对苏表现出天真的同情心；1938—1939年任驻比利时大使及驻卢森堡公使；1942—1946年任美国总统战时救济管理局主席。

3 亚瑟·亨德里克·范登堡(1884—1951)，律师、报纸编辑、出版家，1928—1951年任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曾经为孤立主义领袖人物，1945年转变立场，支持创立联合国。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1946年参加联合国大会。

4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1904—2005)，苏联问题专家、政治分析家、外交家，时任美驻莫斯科代办，以提出针对苏联扩张的遏制政策而著名。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国务院的伯恩斯发了一份八千字的电报，即所谓的“长篇电报”，提出在目前苏联对西方采取的政策之下，不可能会有“永久的和平共存”。这封电报后来成为冷战时期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公开发表在《美国外交关系：1946》卷6：《东欧与苏联》(华盛顿特区，1969)，第696—709页；以上引言出自第697页。

歧。只要贝文或某个人能够在个人关系上稍微相互亲近一些——就像温斯顿和伯恩斯这个周末在佛罗里达所表现的那样<sup>1</sup>，那么，很多不必要的猜疑和摩擦都可以消除。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中东地区的局势和巴尔干地区正在不可避免地形成铁托<sup>2</sup>—米哈伊洛维奇的模式：[ ]农民、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道德败坏的土地拥有者、士兵和牧师将共同形成一股不满浪潮，开始时只是处于“原始”状态，随后就被一小撮果断坚定、铁面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所掌控。绝大多数人属于中间派，必须在两者之间择一，要么拥护名声扫地的过气右派，要么追随冷酷无情的左派极端主义分子，但基本上都是倒向左派，因为显而易见，右倾没有可能。而我们则和以往一样夹在当中，忙着给亲切友善、有时甚至表现得高尚正派的人士或者是八字脚的自由主义中心撑腰，苏联则在一旁从中牟利。我知道，英国外交部已经制订了计划，给予中东地区少许[援助?]，可是财政部却说我们没有钱，现有的资金必须满足其他需求，包括英王国、英殖民地国家、英国与老客户国家的往来贸易，以及支付负债等等。那样的话，历史给予我们的区区几年时间（这么说是因为中东地区目前尚未像巴尔干地区那样分崩离析，俄国人也还没有向它提供什么物质福利），就会在对英国“友邦”例行公事般的支持中耗费殆

623

- 1 丘吉尔1945年大选失败后，自1月份起便一直住在美国。之前的周末他与詹姆斯·伯恩斯以及伯纳德·巴鲁克一起在佛罗里达州度过，讨论的内容之一为丘吉尔的讲话，他受杜鲁门总统邀请，准备于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讲。这一次讲话成为丘吉尔政治生涯中最著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演讲。在讲话中，他再次使用了（见上文第683页注1）“铁幕”，该词后来成为对冷战的经典隐喻，称它已经降落至整个欧洲。提出“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般的联合”是面对共产主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民主的唯一途径：见前引书（上文第397页注6），卷7，第7290和7289页。尽管这一演讲在那些迫切希望与斯大林保持战时同盟关系的人士（美国国内和国外都有）当中招来了反对意见，而且他们对丘吉尔“手足般的联合”之说中隐含的帝国主义色彩也表示怀疑，它仍被认为就像凯南的“长篇电报”一样，明确表示了对苏联动机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 2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原名约瑟普·布罗兹。共产主义运动政治活动家，生于克罗地亚。历任南斯拉夫总理（1945—1953）和南斯拉夫总统（1953—1980）；在轴心国侵略占领南斯拉夫（1941年）之后，领导共产党人反对纳粹统治，但同时也反对（在最初的合作不顺利之后）南斯拉夫武装部队切特尼克。该部队为保皇党地下游击队，主要由塞尔维亚人组成，领导人为陆军军官德拉戈柳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1893—1946）。盟军起初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在获知切特尼克与轴心国力量联手后，转为支持更强有力的抵抗力领袖铁托。1946年米哈伊洛维奇被共产党人活捉，并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尽，而它们是注定要在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下消亡的。

我不能继续写了，再写下去就像在为这个显而易见的话题布道传教或者写备忘录了，不过我的确觉得，除非能够利用美国资源在中东地区宣传新政，为他们提供一个又好又快地发展的途径，使之胜过联合王国目前所能提供给它的任何东西，否则他们一定能够看穿我们的立场。不管怎么说，保持距离的做法——在土耳其或波斯的“非[ ]”——不可能长时期无限地抵制他们的推动力量，而目前我们似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想法。或许A.C.科[尔]爵士<sup>1</sup>有办法激发这里人们的想象力，想出一些好点子来。

我已向迈克尔[·赖特?]以及乔克和罗杰·迈金斯转达你的问候，他们也向你问好，特别是外交部的罗杰。他们全都充满热情地谈到你，我感觉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伦敦需要你，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机器全面崩溃。

希望你们的新任大使<sup>2</sup>能够小心谨慎地熟悉情况，对所见所闻信以为真。有你和乔治·波尔索弗<sup>3</sup>在那里，相信没有哪个大使可以偏离明显的事实太远，如果可以这么形容事实的话——在俄国，事实确实很明显。

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里显得是那么的遥远和不真实。美国人成天忧心忡忡，不断担心战争什么时候会再次降临。在我4月回牛津与大学同事们重聚之前，请一定给我一封有趣的快信。我还是非常非常想知道那里对加拿大逮捕那些间谍<sup>4</sup>反应如何，使馆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再一次感谢你的多方关照，感谢你居然还记得我希望于夏天回去这事，代我向赛拉问好。希望接下来几天能够给莫尔跟爱德华[·汤姆金斯]分别写封信。

1 他刚从驻莫斯科英国使馆调到驻华盛顿使馆任大使，接替哈利法克斯。

2 莫里斯·德拉蒙德·皮特森爵士(1889—1952)，原为驻土耳其英国大使，1月份到莫斯科接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

3 乔治·亨利·波尔索弗(1910—1990)，1943—1947年任驻莫斯科英国使馆一秘。

4 2月15日，加拿大当局逮捕了几位苏联间谍的嫌疑人，后来又逮捕了一些人，总共39名嫌疑犯，其中18人被判有罪，包括一位加拿大议员和英国核科学家阿兰·纳恩·梅。随后在1945年9月发生了驻渥太华苏联使馆密码员兼特工人员伊戈尔·高曾科的叛逃事件。高曾科出逃时携带的文件表明，在加拿大有一个大苏联间谍网。这个发现震惊了西方各国政府，之前他们对莫斯科间谍机构究竟有多大规模一无所知。

致安格斯·马尔科姆

1946年2月20日 [副本]

华盛顿, 英国使馆

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我对意大利仍旧充满激情澎湃的回忆。对这个国家, 我感觉自己像德国人一样怀着复杂的感情, 既有思乡渴望<sup>1</sup>, 又有少年般的热忱。的确, 尽管那里的居民不可信赖, 我还是坚信自己能够生活得非常快乐, 远远胜过在法国之类的地方, 我崇拜那里的一切, 却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让我喜欢。

不过, 总体而言, 我一下子吸收了太多东西, 有点目不暇接, 处于迷乱恍惚的状态。先是华盛顿, 然后是伦敦, 后来又到了柏林, 然后是莫斯科、斯德哥尔摩, 再到巴黎, 然后又回到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听起来沉闷无趣, 却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要看到其精华之处,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a) 住下来; (b) 通晓俄语, 以了解大街上和公交车里的居民都在谈论些什么。唉, 我无法摆脱似是而非的类比, 不过在我眼中, 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 好比惠灵顿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 也不是一间劳教所, 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 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不过别的一切都恰如学校。这个学校划分为不同的部分, 各部分之间未经特别许可, 不能有太多交往; 学生们饥寒交迫, 但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此已司空见惯。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 但早已将其视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以学校的显赫实力和威望为荣, 列宁就好比阿诺德博士<sup>2</sup>, 对学校教育提出新理念(好似拉格比公学)。

625

报刊恰如校刊, 说到底, 终归不会去议论校长或老师们, 更别提抨击

1 此处柏林原文为: sehnsucht。

2 托马斯·阿诺德博士(1795—1842), 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 1815—1819年任牛津奥里尔学院研究员; 1828—1842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 开始一系列创新; 1841—1842年兼任牛津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阿诺德改变了拉格比公学的地位: 他的改革措施为各地纷纷效法, 他对英国圣公会自由派的信奉影响了数代英国公学的风气。

了。内容仅限于报道打赢的赛事、学校发生的重要事件、野外协会最近组织的快乐出游活动等等，偶尔也会来一些温文尔雅的“自我批评”，如上星期的《鸽之翼》唱得不够好，虽然男低音不算太差，还是得采取措施改进男高音部分，在苏联报刊上，的确能够偶尔看到一些负面新闻，例如整整三车厢的复员军人被扔在敖德萨和罗斯托夫之间没人理睬，竟然被活活冻死，决不能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马克思主义就好比一所宗教学校。晨祷只有在最最恶劣的天气才允许暂时中断。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它或许并不具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可能也不喜欢这个仪式，不过一旦突然取消，他们会有失落感，觉得失去了威望，感到空虚，思想跟不上其他学校。一切都受到禁止，能够得到特批，出去逍遥一两个晚上，那是大家梦寐以求并羡慕不已的。

政治斗争不折不扣就像校园中的性话题——除非是用最保守的语言，否则绝对禁谈。但每个人又都在暗中偷偷谈论。一旦被逮个正着，不仅会遭到惩罚，而且巴不得遭到惩罚。正是惩罚的威胁使类似的禁果变得格外刺激诱人。

学生们并非狂热地坚信学校的教条，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想当然地照单全收，默默遵从。对循规蹈矩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确实可以忍受，但对古怪敏感的人却是地狱，最惨的时候甚至会被学校开除。由于这种结果只发生在性质极端恶劣的犯罪事件中，人们历来对此缄口不谈，连提起都觉得可怕，只有一些胆大包天的男生敢私下悄悄谈论。

诸如此类。按照这个模式，可以利用任何其他熟悉的比喻不断类比下去。关于他们的〔〕和承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之处。至于那个无休止的问题“他们究竟要走到哪里才会停止？”，恰当的回答是“在他们被别人阻止的地方”。目前他们的飞机正粗野莽撞地俯冲下来，只要前面有一处严重障碍，他们就会戛然而止，无可奈何地停下。

他们对大英帝国的态度在我看来就像对待风湿病，对德国战争则像  
626 斑疹伤寒——高烧，死亡恐惧感，行将灭亡的危机，然后缓慢恢复，一切都那么充满戏剧性，那么恐怖可怕，这期间，其他的病痛会被暂时忘记。而

英国，则好比日久经年的慢性疾病：每天到了下午，左膝盖和左小腿就会疲劳、酸痛，没有痛苦到要卧床休息。这个病也许难以治愈，让人烦心不已，却不太会导致真正严重的危机，除非并发症爆发。

我无意把给你的信写成一篇政治报告，虽然这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强迫性的习惯，要想摆脱还不太容易。不管怎么说，我在这儿的时间仅剩几个星期，做完扫尾工作，4月1日愚人节，就要重新回到学术圈子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政治问题，范登堡参议员也不曾是什么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最后一次重回牛津，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喜悦心情，它还是那么令我神往，没有国会，没有犹太复国运动，没有公文，不需要谨小慎微地对待几乎一切事情。而以上这些让人必须将自己防护起来，但愿不会这样。我4月份回去，那时，或是那段时间你正好休假，会回国吧。一定来牛津，我保证会让你从现在可怕纷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生活中，面对粗俗齷齪和胆大妄为之徒的突击战术，体面高尚和谨慎细致的好人只会屡屡败北。

这里的局势确实已经沦落到哈丁<sup>1</sup>政权时的境况。这一点即使是已经对此有所预测的人也很难相信果真会发生，不过我不能再喋喋不休地谈国事了。我是见到了巴黎，但感觉是笼罩在不祥的气息当中，没有生气，空旷清冷；柏林则是一片苍白虚弱的景象。乔·艾尔索普让我们大家都来悲切哀悼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选择相对安乐死的牛津。

请尽快来看我。

致苏珊·玛丽·帕顿

1946年2月26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亲爱的苏珊·玛丽：

在巴黎没见到你，让我感到万分遗憾。由于他们语气肯定地告诉我，

1 见上文第522页注3。



比尔也不在那里——他们说了你们俩一起离开的确切日期和模样，也有可能全部是杜撰——反正我在三十六个多小时的逗留中没有见到他。无法形容我对此感到多么难过和沮丧。我想不出还有谁会被一些十分奇特又可笑的事逗得那样乐不可支，它们让我不无开心地出尽洋相。而且，巴黎似乎让我感到害怕——那么寒冷，异常地干净空旷，比我看到任何城市都更加美丽，胜过列宁格勒，说不上这意味着什么，但过于空旷，死气沉沉，就像一具美丽精致的尸体。这个比喻十分丑恶又毫无新意，但我想不出别的比喻。

多么希望能够向你述说英国使馆非同一般的状况，或许等到我3月底或4月初永久返回英国——如我所愿回到牛津，你会经过英国，或者我再有机会重访巴黎，那时我就可以好好跟你说说令我无比开心的伦敦之旅。那次旅行经由法国迪耶普和美国纽黑文，同行的有黛安娜·库珀夫人。在英国沿海的火车卧车上吃早午餐<sup>1</sup>的时刻令人难忘（不过别跟她说这个）。

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觉自己就像美国作家欧文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尔，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需要乔每天来一遍遍地重复灭亡，灭亡，灭亡——就像皮考克小说中<sup>2</sup>的那位年老绅士，他老是从花园的窗户进来，嘴里说“魔鬼气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然后再飘忽出去。7月份还受到万人拥戴的总统，如今似乎成了一个不足道的可怜虫；一切仿佛都落败到一种伪常态，没有了疯狂的1920年代的锐气，极端缺乏责任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气沉沉、麻木不仁的清醒状态，靠这样那样怀旧的回忆打发日子（如在伊夫林·沃的上一部小说<sup>3</sup>中所表现的。我觉得这本书开头非常精彩，结尾却粗俗不堪）。相信沃尔特·李普曼很快就会追随克

1 列车员要她出示车票，不知她没有还是找不到，便带着几分傲慢如实相告，希望放她一马。两人起了争吵，但到最后，他实在说不过她，只好认输。

2 《噩梦修道院》（1818），作者托马斯·拉夫·皮考克（1785—1866）。年老绅士指的是“糟透了”先生，一位“相信千年至福的摩尼教信徒”。他一有机会就念叨《圣经》“启示录”第12章里的告诫：“地与海的居民有祸了，因为魔鬼气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伯林讲述的类似片断在全书中不断出现，例如在第5章：“他们的谈话因为‘糟透了’先生重新出现而被打断，他一身是泥，站在门前，嘴里喃喃道‘魔鬼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随后便消失了。”

3 《旧地重游》（伦敦，1945）。

莱尔·卢斯<sup>1</sup>，加入罗马教会，我甚至能看到阿瑟·克洛克最后的忏悔，我一定不愿意成为那个接受他进入任何信仰中心的牧师。

[……]因此，你可以了解目前的氛围多么令我失望沮丧。要不是为了我亲爱的主人波伦夫妇<sup>2</sup>，我一定会把这种郁闷和不满的情绪散播到英王陛下旅居海外的子民当中。

628

请给我写信，3月底之前就寄这里；之后寄牛津大学新学院。非常希望见到你们俩。

###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6年3月5日 [副本]

[华盛顿]

亲爱的爸、妈：

很抱歉，一直没给你们写信<sup>3</sup>，不过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到了之后我得开政治课，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目前空白。

我希望能够乘“玛丽女王”号客轮于4月7日从纽约出发，按照这个时间到牛津有些迟了，但还不算太晚。很难买到衬衫，白色的就更难，但我会尽力。其他物品都已经办妥，请尽管放心，一切都在精心掌控之下。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避开了阿普特堂兄，也许会在临走前给他打个电话，仅此而已。

对了，有一个我们的准亲戚神情古怪地向我打听，他名叫西蒙，说我有位祖母名叫瑞夫卡，我一口否认了这个说法。<sup>4</sup>除此之外，就再没什么有

1 克莱尔·布思·卢斯（1903—1987），编辑、剧作家、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外交家，是出版商亨利·卢斯的妻子，1943—1947年任共和党党员，后（1953—1956年）任驻意大利美国大使。1946年成为罗马天主教徒。

2 奇普·波伦于1935年与埃维斯·霍华德·泰耶尔（1912—1981）结婚。

3 在一封与此信交错的信中（日期为3月4日），玛丽·伯林埋怨他从离开英国后一封信都没给家里写过（因此也不知道他即将回国），并扬言“不准再写你那些闲聊杂谈，先好好给我们写封信吧”。

4 此举过于草率。这位准亲戚很可能是西蒙·金斯伯格，以赛亚·伯林的姨婆瑞夫卡·弗拉德金第二次婚姻生的儿子，因此为伊扎克·萨德同母异父的弟弟。

趣的事可以向你们禀告了。

目前我和波伦夫妇一起住，生活在安宁和满足之中。

爱你们

致阿维里尔·哈里曼<sup>1</sup>

1946年3月26日 [副本]

华盛顿，英国使馆

可恶的奇普，谨慎到这种地步，居然将你新任命的消息瞒着我，不漏半点口风，让我完全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到了消息几乎要公布时才知道。

629 许多享有特权的观察家，诸如新闻记者们，早已捷足先登，获取了这一价值连城、鼓舞人心的消息。不用说也清楚，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好事，对英美两国多么幸运——而且，千真万确，对莫斯科也是，尽管我怀疑他们是否会跟我们一样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此事。原谅我这么说，我敢肯定，你自己也一定知道，在所有可能做美国代表的人中，既对当前重大问题拥有理解力，同时又对那些可能对俄国和英国，当然更包括美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和人物具有洞察力的，可以说你是唯一一位。希望你能够长期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对方方面面都有益处，皆大欢喜。听到这个消息，这里个个兴高采烈，没有一点反对之声。

又及：随信附上一篇有关俄罗斯文学等的报告，文字冗长，写得也不好，是弗兰克·罗伯茨要我转交给你的。我怀疑那里面是否有任何具有新意或吸引人的内容，这里只有乔克·贝尔福读过，在外交部我怀疑有谁会愿意去读。之所以列为机密文件是因为这样一份东西一旦被“他们”知道，就可能对里面提到的信息提供者产生众所周知的后果。麻烦你到时通过外交部

---

1 威廉·阿维里尔·哈里曼（1891—1986），商人、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与新政和民主党关系密切，1941—1943年任驻伦敦租借计划协调员，1943—1946年任驻苏联美国大使，1946年4—10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美国商务部长。

公文包寄回给我，地址是牛津大学新学院。在那里幽深的一隅，我会带着怀旧却毫不后悔的思绪，回想起这个我认为不可能再被召回的世界。

真心希望为你这份举足轻重的任务送去最美好的祝福。对它的重要性，你比许多委派这个任务给你的人都更加清楚。

两周后，以赛亚·伯林回到牛津，开始了自己的战后工作。



# 论自由

人们自称自由，却处处受缚，这一点在目前这个世纪，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sup>1</sup>

## 一

“自由”和“束缚”这两个词，绝不是从物质世界中转而运用到美学和伦理学领域的一对隐喻，恰恰相反，“奴役”与“自由”这两个词，始终存在于伦理学和美学当中，存在于神学和艺术当中，是我们形成对事物看法的本质要素。在任何一个人类活动领域，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对立，就像一道巨大的裂痕将长期积累下来的整个人类经验一分为二，形成不可调和的两极。掌握自由的这一特点至关重要。

要理解这一对立的普遍性，需要有宽广、清晰的客观洞察力，摆脱了所有纯粹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效忠之心。因此，直到希腊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地位，西方国家才发现了普遍意义上自由的真正本质。禁欲的斯多葛派是最早提出并宣传这一对孪生原理的欧洲人，从那时起，它们就一直是形成所有西方自由观念的基础。这些原理是宙斯从东方的闪米特人那里带来的，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却一直将它们据为己有，声称是他们的东西。这些原理断言：上帝或者是宇宙有意识地倾向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国度，人类的最高自由体现为与这一目的自我认同：个人目的与宇宙目

---

1 该命题为1928年圣保罗学校特鲁罗奖作文大赛的题目。以赛亚·伯林的参赛作文，“蒙许可”对现已丢失的原稿“有所删节”后，刊登在校刊上：“特鲁罗奖作文大赛（1928）”，《辩论家》，第10期（1928年11月），第3页，以及第11期（1929年6月），第22页（另一个版本将这句话作为标题）。写这篇文章时，以赛亚·伯林十八岁。

的认同度越高，就离至善的理想越近，也就越自由。因为他解放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观点属于道德家的立场，与政治家或经济学家的宇宙论格格不入。这样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差别，道德奴隶和经济奴隶的差别。在进行进一步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弄清这个问题。

道德家认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以仆主关系站在一起，也仍然可以说拥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而经济学家，其研究领域完全在于所谓的“环境”，  
631 不可能认为一个服侍别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的投射与扩展（例如，他的家人或城市或国家，或是笼统而言的人类）的人，拥有任何意义上的自由。

现代经济世界与古代的差别不是程度或种类上的，况且在缺乏共同点的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进行比较几乎没有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说工厂使那些如果没有工厂本来可以自由的人成了奴隶，因为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工厂。从这点上设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比较自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封建农奴制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复存在，那么，我们的时代似乎更为自由。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比较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优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得出的是虚假的结论，因为封建制度和工厂制度缺乏任何真实有效的可比性。然而，在伦理学领域从未发生过任何革命运动，能够像工业革命那样对整个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真与善，正义与勇气，从根本上来说，对今天的桑塔亚纳教授与对莎士比亚和苏格拉底，是相同的概念。在此我们斗胆宣称，自由，这个毫无疑问在道德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要害，在从古至今思想家们的脑海中，所呈现的形象大致相同：当柏拉图说到“真正自由的人方为君子”<sup>1</sup>时，他所说的“真正自由”并非指他那个时代的民主派，而是解放了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对这种“真正自由”，塞万提斯予以赞美颂扬，卢梭进行鼓吹宣传，马志尼则力图通过无数的文章、传单和演讲提出。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之上可以进行数据比较，虽然生活方式已经改变，生活本身的素材，以及对其价值的理解，在新旧世界

1 此处伯林原文为希腊文：ὄντως ἐλευθερός τε καὶ 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在柏拉图著作或别处均找不到此话出处。

都异乎寻常地相似。

## 二

人类文化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都是以各社会阶层人士巨大的热情迸发为开端的。这是一种带着瓦茨—邓顿称之为“奇观再现”的心情，对身边发现的自然物质所拥有的热情。或许用“重新发现一致”这个名称更为准确。这些人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全新世界，而是综合了各部分的整体，以及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因此，这些伟大的时代之子的作品，从来没有一部仅对某一种孤立的品质大书特书。不论是美还是自由或是神圣之力，都从未被吹捧夸大到失调的地步，凌驾 632 于其他同类品质之上。这么做就违背了造物的宇宙观与和谐观。没有人比列奥纳多·达芬奇或伊拉斯谟更自由，但他们从不曾对自由有过多的溢美之辞，这是因为一旦把自由置于万物之上，对它展开孜孜不倦的追求，便将失去自由。

历史似乎表明：每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时代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里，人们沉浸于对伟大的遗产进行细致入微的审视、区分、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却由于对无数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微观事物给予了太多关注，而忽视了整体和宏观宇宙。于是便因为在一株株单独的树木中所感受的高雅情趣，而忽略了整片树林。虽然世界不会因此在组成部分上有所改变，却失去了那个使它们成为有机整体、给予它们共同生命和目的的东西。学者们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精致，精致得毫无价值，因为一旦各种成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事实被人遗忘，它们的真实本质就无法被人理解。最典型的是过去那个时代（18世纪）的人们，他们自认为在自由和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却不知他们越是对生活细节观察得细致入微，就越是被这些琐事牢牢束缚。他们不再把生活视为可以加以塑造的材料，而是被生活所支配、所塑造。如此便会产生反作用。不管卢梭曾经犯了多么大的错，他凭借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整个人类经验的权威，提出：“归根结底，谬



误和奴役同出一辙；唯有回归自然，才能发现自由与真理。”<sup>1</sup>

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否在遭受19世纪亚历山大诗行的余殃，如果真是如此，它所受的束缚又有哪些症状和特点，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 三

奢华、安逸、快乐、愉悦、新的自由、新的发现、赞扬、奉承，一旦忘记了旅途的目标，忘记了辛劳的目的，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所享受的这一切，将全部失去意义。

——爱默生<sup>2</sup>

历史并不走直线，而是沿折线前进。这些折线长度各不相同，实质也不尽一样。不过，假如我们对这些折线相交的点进行审视，往往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实实在在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试着透过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到它下面垂直的那些层面，便可窥探到18世纪，以及3世纪的罗马社会，还可以窥探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文化。这种比较不应过于严苛，但这些时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以下这点上极其相似，即奴役精神和习俗的普世存在。

习俗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奴役，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类恐惧缺乏秩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出自本能的法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就好比和暴政相距甚远一样。在这方面，习俗往往是内心自由的捍卫者。在外部设立一道宽容平等的纪律，是为了让内心享有完全的反叛空间。只要人们清楚，遵从习俗只是一种礼仪，一种大众礼节，这种遵从就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据我们判断，这在16世纪的欧洲，在希腊的雅典文化复兴时期，在巴勒斯坦基督教诞生前后的两个世纪里都是如此。也就是说，

1 很显然这是一个推论而不是直接引言。卢梭关于奴役的完整讨论见《社会契约论》，卷1，第4章。

2 实际上出自R·埃利斯·罗伯茨，《生活作为原料》（伦敦，1928）[小册子，收入珀西·迪尔默编辑的丛书《肯定：现代世界中的上帝》]，第17页。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只是无意识地遵从习俗，并未多加注意。叛逆者如乔达诺·布鲁诺、欧里庇得斯、圣保罗等，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道德基础，却明显地遵守了当时的习俗。例如，欧里庇得斯加强了雅典戏剧的高度程式化；圣保罗则一生守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叛逆行为发生的时代，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说自由的时代；人们不惧怕在脸上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理想，不管这个理想多么浩大和包罗万象。只有当这种宏伟理想从他们脸上消失、学识和道德视野变窄、内心丧失了自由时，具体的习俗才会失去和谐，变为一种惯性；而且，由于失去了与社会内在活动的所有和谐，习俗变得毫无意义，停滞不前，不再是捍卫自由的栅栏，而是突出了个人权威。于是，这个工具开始被视为宝贝。之后，叛逆者们高声反对它。因为至此，习俗乃是为人类的奴役张目，就像从前为人类自由张目一样。这种反对习俗专制的呼声，无疑是一种文化病态的体现；它意味着人类不仅与自己失去和谐，与周围环境也不再和谐。他们顺从这些环境，却理解不了在他们自身之间、他们与环境之间以及与共同最终目标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关系，顺从只是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死亡。而缺少了最终目的，他们的存在从本质上就变得十分短暂，被生活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怜巴巴地盲目顺从，就为了能够苟且多活一日。为获得物质存在而进行的挣扎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欲望与旨趣，于是，人类便如同动物一样，生存的欲望成了主要动机。而这正是奴隶根深蒂固的特点。

18世纪遭受了这一退化，但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要经受一个更加致命的倒退。洛克和牛顿提出的理论在斯宾塞和赫胥黎那里得到了深化和发展；好歹在自然神论中，18世纪还保留了全体共同目的的影子。而现代理性主义的体系连这点影子都清除掉了。我们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热衷于将有目的的、自由的协调摒弃于这个世界之外，不留丝毫痕迹；同时还热衷于打破所有可能存在的幻想，让人们除了纯粹的具体物质，在任何方面都否认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而认定它是一部机器。心理学家们强化了这种奴役的告白。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另一方面是伯格森（他在其他方面很少表示赞同），两人都坚持认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无意识的影

响决定，而这种影响是在无意识或下意识状态中吸收的印象所产生的结果。人类通常很难或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潜意识，因此，除了被外部环境支配，似乎还存在某种内部机制，为人们暗暗服从。而生物学家们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强调不可抗拒的遗传因素，则使这种机制更加专制暴虐。奴隶又被捆上了一道枷锁。

这一机械宇宙观表达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胆大、最无情的自我蔑视。因此毫不令人惊讶，没有人会探究它的前提以及从中得出的理性结论；因为勇气不是一种奴性品质，而进行这种冷酷无情、不仅仅是病态的内省，需要具备有悖常态的高度勇气。因此，当人们面对暴虐的宇宙景象时，它远比敌意更为可怕，更难以觉察，许多受它奴役的人们会选择以厌倦的态度将它彻底忘记，就像奴隶必然会做的那样，只要能闭上眼睛，沉浸在所谓的精神陶醉状态中干自己的活，便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或者是，由于完全摆脱了对外部世界的意识，他们心目中设想出了更加和谐的存在，或者说，哪怕不和谐，至少也是可以感知，并赋予了有机生命的存在。第一种人开创了神智学神秘主义的浪潮，目前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第二种人则主要通过艺术表达自己，他们继承了浪漫主义作家的传统（因为摒弃尘世而享有自由），在许多印象派、未来派、立体派和象征派艺术家的作品当中，创造了貌似自由的扭曲形象。这两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一种通过宗教，一种通过艺术，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束缚。这种在普通人性范围之外对自由的渴求是人类倒退、精神世界黯淡无光的最为可悲的证据之一。这一点并非没有改观，例如梵·高与罗丹，他们自觉地反抗周围环境中的奴役现象；但伟人们，甚至伟大的反叛者们，如果是在自由时代，不管他们怎样远远胜过平民百姓，也仍然是普通人的崇高化身；而若是在受奴役时代，这些人则显得怪异和孤立，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

我们不想暗示说，神秘主义或任何可以称作“出世”的东西，本身就是腐败的象征，就是时代的奴隶。任何时代，都有与时代精神失去和谐的人，这些人创立了自己的世界。也不是说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当中就是最不受敬仰的；德国就以其神秘大师艾克哈特为荣；浪漫主义诗人威

廉·布莱克则是英国的骄傲。导致倒退的往往是那种始料不及、以迅猛之势泛滥、从根本上反社会的现象。当许多人发现外面的世界不适于工作，而且充满压迫、虚假，了无生气（机械），我们便可得出结论，他们所处的境地正是拉丁诗人所哀叹的：“为了生存而失去生活的理由。”<sup>1</sup>本来由他们来塑造的物质，现在反过来塑造他们，征服他们。因为他们忘记了生命短暂的具体物质环境和不朽的精神价值之间的显著区别，也就忘记了定义自由人的术语，开始将他们的头衔，那些只适用于奴役概念的头衔，套用到古老的自由学说上去；于是，那些真正自由的神秘主义者对生活、对空间和时间所持有的虚幻信念，在他们手中，便被任意用来侵害精神，殊不知正是靠这种精神，外部世界才被认定为非现实存在。于是，当今的共产主义者求助于柏拉图，却不愿去领会柏拉图的真意，即柏拉图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每个成员在精神上都高度进步，无需通过物质独立来表明自己的个体性，并且能够为了公共福祉，全心全意、无怨无悔地牺牲这样的自由——自由的外壳。这才是苦修派教徒的理想，也是中世纪僧侣阶层的理想。这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精神自由的典范。现代共产主义者却恰恰相反，强调物质或经济生活的绝对和唯一重要性，强调为社会牺牲其独立，明确表示个人主义最好彻底根除，一切都必须立即加以具体化和国有化。

所谓的“两极相通”<sup>2</sup>，仅仅存在于文字当中。不论是柏拉图、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共产主义均否认具体自由，赞颂精神世界；而现代经济共产主义则将精神世界降低到完全依赖于具体自由，然后谴责个人的精神自由。在这点上共产主义与非政治形式的奴役不同。它的确是在自觉地将习俗视为珍宝而不是工具，并且睁大双眼盯着它的枷锁，将枷锁提升为理想。而其他奴役主义，正如我们所力图证明的，则竭力对枷锁视而不见。

636

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为了实现实质上的集体主义国家而工作的人，不管他们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者，还是美国实业家，抑或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特点都是平等和非人格性；他们必须反对个人自

1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卷8，第83页。此处伯林原文为：Pro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2 谚语。此处伯林原文为：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由，因为在一个机械的世界里，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产生离心力；由于人们无法打碎身上的枷锁，只能对之顶礼膜拜。另一边则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守住个人精神自我的人，即便它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作为任何人类政治组织的公民的权利，并且执意对自己的真实处境视而不见。通过不断对自己说自己实际上是自由之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相信身上的锁链即便不是完全不复存在，也不过是附带之物，无关紧要。只要不采取任何行动，不追求任何重要理想，保持静止不动，这些枷锁就会逐渐松弛，直至完全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因此，让我们静坐不动，使自己慢慢昏睡，或许可以梦见自由而感到快乐。这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两者都身负枷锁，受其束缚。“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是奴役与放纵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sup>1</sup>奴役，是人或环境从外部强加的暴政形成的结果；而放纵，则是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强加的暴政的屈从。两者都否认内在或外在永恒标准的存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争斗，压制了在它们之间的更大一部分文明世界。而在它们的冲突中，是否会诞生新的统一和自由，在我们的时代，是否会发生人类精神新的复兴，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分裂破坏的力量总是消亡缓慢。至于说最终的结果则毫无疑问，否则诗歌或宗教中的真理将不复存在。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认为人类所积累的内在经验只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并使它在世界上的整个存在变得毫无价值。

---

1 似乎又是一个推论。出自《政治学》，5—9，1310a25—36。

## 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

以赛亚·伯林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sup>1</sup>以附录形式集中整理在此，而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放在正文中。原因已在前文第40页说明。

致杰弗里·费伯

1932年1月4日 [手稿]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费伯先生：

首先我必须向您致歉，拖了这么久才给您回信。您的秘书大约两周前给我寄来了《资本主义的终结》<sup>2</sup>一书，并转告说您希望我读一下，对其是否值得译为英文版谈谈自己的看法。此书引起了极大兴趣，经过仔细阅读，很高兴能有机会就其说几句话。不过我得承认两点不足，这两点不足必将有损我发表的任何意见的价值：一是我的德语不够精通，可能体会不到所有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别；再就是我对社会学的了解肤浅。这两点必须请您予以考虑，对我做出的任何结论狠狠打个折扣。承认了这些，我才能问心

---

1 我有意将以赛亚·伯林的报告处理为学术著作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作详尽的注解，因为相比给书信加注释，这么做更容易被指为笨拙。

2 此处伯林用的是原书名“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该书作者为（费迪南·）弗里德里希·齐麦曼（1898—1967），1931年以笔名“费迪南·弗里德”在德国耶拿出版。此书后被费伯出版社拒绝，没有译成英文出版。伯林的报告得到了21先令的稿费。弗里德为德国专门报道经济事务的新闻记者和作家，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与《行为》杂志关系密切，这是当时一份阐释纳粹政治的有影响的刊物。同时他还是德国党卫军成员。

无愧地开始评论。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强烈的印象是，这是一部充满活力、一本正经、但又不是太过谨慎小心的小册子。有人告诉我，费迪南·弗里德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带有知识分子性质的文人团体，他们赞同纳粹政治，轮流在《行为》这家民族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若果真如此，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它解释了为什么书里有那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尤其是在核心问题上明显自相矛盾，谁读了都会生气。一方面，在诸如个人主义的灭亡、大规模生产、集体主义等问题上，无条件地全盘接受马克思—桑巴特式的前提，从中自然演绎出以下结论，即既然集体主义终将到来，将托拉斯集体主义转化为生产资料国有制是解决公平和效率的最好办法。所有这些不外就是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没有什么独到或惊人之处。另一方面，人们又会意外地读到与此截然不同的笔调，例如，突然迸发的充满个性色彩的思乡愁绪；对所有大规模生产和有组织劳动的深恶痛绝的批评；有关中世纪浪漫主义的讨论，所用辞藻令人想到文思枯竭时的切斯特顿；还有那些对昔日时光充满伤感的怀念：例如厨房用具不是出自标准化生产的产品，而是工匠大师们用爱心手工制作而成，然后由同样充满爱心的家庭主妇买回家去。而如今这些都已不复存在。诸如此类，这些全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错，是罪魁祸首。

对切斯特顿或威廉·莫里斯的浪漫主义描写，显然人们尽可以产生共鸣，但在一本旨在对一个病态世界进行科学分析的专著里，此类装腔作势的夸夸其谈显然会降低所谈话题的价值。而在长长一段冷静、现实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后，居然会出现这种文字，更是人们始料未及。那样的铺垫可以让人对后面的内容产生各种期待，但决不会是多愁善感的文字。不过一旦这里存在真假荷马问题，一旦这本书果真出自不同写手，只是在表面上统一了一下口气——如对大型企业等的同仇敌忾，也就很好理解了。

相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缺陷，有一点倒是可圈可点，那就是，书中关于目

前德国真实经济地位的描述可谓一流水平——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不过可能我孤陋寡闻也难说。这段描述清晰、简练，虽然或许有点过于戏剧性，但在这样一部显而易见充满热情又争议极大、不够严肃又缺乏权威性的著作当中，倒算不上是什么错。偶尔引用的数字让我觉得可疑，但我同样无法证明它们有错，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的来源。如果这些数字正确，将非常具有说服力。

该书的另一个缺陷是，作者提出的论点常常极为狭隘。书中连篇累牍地追溯了各大企业后裔子孙拥有的财富，提供了大量细节和人名，这些对德国之外的读者不会产生丝毫吸引力。即便对有才智的德国人而言，这部分内容一定也显得缺乏变化，几乎就像城市闲聊栏目。如果这部书要译成英语，我建议，对这部分内容需进行特别处理。

这本书显然是写给德国人看的，而不是给整个世界看的：对资本主义灭亡的探讨仅限于德国。因此，“德国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个书名会恰当得多。 639

这本书的经济学在我看来有点简单粗糙，但如前所述，我不是非常够格的评判者。显然作者或者说作者们对某些运作，如国际信贷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对题材的复杂性及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感到畏惧，于是采用了一种以假乱真、浅入浅出的处理，既方便了作者，也方便了读者，却严重歪曲了事实。同样，作者对迷宫一样令人费解的外汇问题缺乏把握，并且认定德国无力进行赔偿，再加上缺乏理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作家们只好在中欧关税同盟<sup>1</sup>中寻找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会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关税壁垒。他们的观点是，只要与债权国断绝了所有经济关系，就可以不再依赖它们，也就可以免责拒付所有债务。否则，德国将遭受迦太基的命运。

我想，那些数字、那些涉及具体经济理论的论点，以及提出<sup>2</sup>的解决方法，在任何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面前，都将不堪一击。但是（这是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决不是反对出版该书英文版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它

1 此处伯林原文为：Zollverein。

2 此处伯林原文为：offered，年轻时伯林常常错误地双写字母；参看上文第14页注1。



的优势和重要性表现在其他不同方面。它是我读到的唯一一部充分表达了目前德国中产阶级心态的著作，在阐述普通德国知识分子的信仰方面，更强烈、更具典型性，而在希特勒主义中这些人的伤害和愤怒被放大了。作为对知识的贡献和科学预测，这本书毫无价值，不错，它文思清楚，也不乏敏锐，但缺乏独特性，在任何方面都谈不上出色。然而，作为一份心理学文献，作为大众层次上情感和信念的表达，这本书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许多情感和信念或许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即便如此，这些错误也流传极广，因而不乏“重要性”。每一位具有自我意识的德国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些错误。当今在德国看到的许多现象，也都与它们有关，例如，对自由主义的失望和蔑视，表现在如退伍士兵联盟<sup>1</sup>和天主教信仰复兴中的反理性思潮以及独裁主义的滋长，等等等等。别的书写过也翻译过，像沙赫特的书、艾因齐格对法国政策的控诉，还有温德姆·刘易斯的《希特勒》。<sup>2</sup>但所有这些书都是出自个人之手，总的来说，表达的只是个人观点。最后提到的那本《希特勒》，依我看简直愚蠢至极：什么也没阐述清楚，却被作者用作借口，特别起劲地、不着边际地大喊大叫。其他两本书很有见地，却是出自专家之手。但是，这本书与其他书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是写给大众看的，作者与受众的直觉和论点基本处在同一层次上。这使得它成为特别有趣的文献，适合社会学家、讲究实际的政治活动家以及理解力强的读者阅读。

如果这本书要在英国出版，我谨提出如下建议：（1）最好删减或修改那些过于详尽地描写家族企业的内容，其中一些即便在德国也不一定有人知道。这类带有私人色彩的信息，保留下来只会使外国读者迷惑，使他们失去阅读兴趣。（2）最好加上一篇英文序言，目的是消除可能招来的非难，否则经济学家中会有许多潜在的批评者对此书发起攻击，因为它太不堪一击了；序言应该指出此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代表性，清楚、有力地展现了

---

1 此处伯林原文为：Stahlhelm，即退伍士兵联盟。

2 耶马尔·沙赫特，《赔偿的终结：战争带来的经济后果》（伦敦，1931）；保罗·艾因齐格，《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1》（伦敦，1931）；温德姆·刘易斯，《希特勒》（伦敦，1931）。

在德国上层人士当中亲纳粹情绪的知识甚至情感基础。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千万要避免（对这点我感受强烈，但我不是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有力辩解）把这本书宣传成社会学剖析方面的杰作。它涉及面广，但缺少深度，个别地方甚至明显十分浅薄。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本书还是值得出版。从它大众化的写法，以及书中热切激昂的语气，想必会在相对具有知识的群体当中找到广泛的读者。而目前显然正是出版的绝好时机，一来因为喜欢此类书的大众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本书兴趣点短暂，不具有长久生命力。

您的秘书提到，有好几位德国批评家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老实说，我听到后很是吃惊。作为德国人称赞此书，他们的态度可以理解，好比爱国者总是迫不及待地让大家听到他们表达不满情绪。但作为评论家为此书叫好，就有点难以理解了。书中知识的不足对任何一位中等知识水平的人都可谓一目了然，除非他被感情蒙蔽了双眼。书中我能够发现的唯一一个新颖观点是（我相信，实际上并非如此）：资本主义依赖个体企业的扩张；641  
扩张则依赖发明。伟大发明的时代如今显然已经过去（最后这点不言而喻），资本主义无法再发展壮大，因此注定要灭亡。这是该书的中心论点，我希望指出，作为对世事的敏锐感悟，这个例子至少表面上看来并不正确。缺乏理解力还表现在书中对施宾格勒充满敬意的描述。他和这本书的作者，以及当今德国许多涉足文化哲学的人一样，常常只是减弱和降低了格奥尔格·齐美尔著作的价值，虽然他们都承认他所产生的影响。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他那些精彩著作直到今天，也仍然比模仿他的那些后来者的更值得译为英语。这话有点扯远了，我向您道歉。

在结束这封过于冗长的回信之前，我想扼要重述一下：首先，我必须重申自己缺少专家资格这一点，然后才提供以下意见供您参考：

倘若这本书的观念不那么褊狭，而是思想开阔；倘若它只是讨论德国问题，其他国家只是作为背景和类比；倘若不是对它过分要求；倘若宣传时突出它是唯一充分传达了隐藏在德国国家主义运动后面的愤怒之情和真正唯心主义的英语译著，唯一揭示了纳粹主义广阔的知识分子背景的著

作——这一点至少对外国读者而言，往往被其他更加抢眼的因素所掩盖，诸如仇外、反犹情结，以及广义上的暴民政治，它是纳粹党所有公开行动的共同特点——而且，这部书还表现了为什么德国国家主义者会变成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或拉普运动或任何资产阶级保守运动，那么，这本书将具有翻译价值，而且会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市场。我想这些话已足以用来推荐任何书籍。

希望这封信及时抵达，对您能有些用处。

衷心希望下学期能有机会与您在牛津再见。

您诚挚的

642 以赛亚·伯林

## 致费伯出版社

1932年1月15日〔手稿〕

未标明地点

关于鲁道夫·阿恩海姆《作为艺术的电影》的报告（柏林，恩斯特·罗沃特出版社）<sup>1</sup>

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读到了这本书的评论。<sup>2</sup>在我看来，尽管文章赞不绝口，却并未对这本书的优点予以足够充分的赞美，另一方面，对它的缺点也只字未提。而后面这点，虽然瑕不掩瑜，却客观存在，应该予以指出。

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所说，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好书。但远不止如此。它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尝试，从各种视角讨论电影，探索各种不同成分并力图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成分往往被人们分割开来对待，以致歪曲变形。它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作者显然拥有知识分子的正直感和

---

1 1932年以德语出版，1958年英文版《作为艺术的电影》由费伯出版社出版。

2 《电影艺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1年12月31日，1052期。

责任心，促使他审视所有切入点和途径，虽然这中间有些是他个人不太喜欢的；同时对人们提出的反对观点提供理由充分、数据准确的阐述和反驳，即便对最最平庸老套、无知愚蠢的批评意见也是如此。换作其他评论家，常常根本不屑解释，甚至不屑反驳。这种论述方式的深度和广度使这本书具备了作为评论著作的独特价值。

书的开头和接下来相当长一段篇幅分析了电影制作的技术设备：每一种手法的重要性不仅通过它与导演希望产生的真实效果之间的关系加以展现，同时还充分论证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解释电影美学目的中哪些因素需要这种效果、这种手法，而不是其他。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在任何有关电影的书籍中都必不可少、往往被视“为必要的恶”而无可奈何地收入，并任由其枯燥乏味到极点的技术说明文字，在这本书中变为对电影组成要素的趣味盎然的剖析，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机智、巧妙，常常充满刺激，使看过电影却对其一无所知，但极其敏感并富有理解力的读者从中受益。在这方面，这本书做得可谓无懈可击：整个阐述行云流水，轻松愉快；虽没有新鲜独特的观点，也不见惊世骇俗的言论，但整篇东西就是让人感到与众不同（至少对我是如此）。它以引人入胜的方式，一点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每一页都充满了活力与智慧，吸引人不停地读下去，绝非不由自主、信马由缰，而是极力想深入到这一有趣的探讨中间。我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它只是一位有知识的半吊子艺术家以嬉戏的态度在舞文弄墨。它压根不是克莱夫·贝尔式的：作者展示器皿的方式十分吸引人，但这些器皿即便随意摆放，仅靠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也足以令人赞赏不已。我在这里只是想表达一种愉悦之情：终于看到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希望能够发现的东西以如此智慧巧妙却又如此轻松愉快的方式丰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是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大家也都有同感。 643

我不知道有关电影评论的书籍的读者面有多广。如果面不大——我猜想应该相对较窄，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目前市场提供的相关英文书籍。我所见到的只有保罗·罗萨、勒祖恩小姐和普多夫金<sup>1</sup>的书。前两位作家的书

1 保罗·罗萨，《电影今昔：电影艺术综述》（伦敦，1930）以及/或者《赛璐璐胶片：今日电影》（伦

缺乏智慧。罗萨是一位面很窄的专业作家，文笔笨拙，就连面对他自己那个范围狭小、技术型脑袋的专家圈子都显得条理不够清晰。勒祖恩小姐写过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但它并未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来探讨，而只是一个她喜欢的电影的目录，加上一些吸引她的理由。它充其量只是一部评论文集，并未试图客观地将文章联系起来，并未在对某一现象总体本质进行分析、描述和评价的基础上，将文章作为说明该现象在不同阶段的表现的例证呈现出来。这本书结果必然平淡无奇，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普多夫金的书，内容只涉及俄罗斯影片。虽然文笔优美，充满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英文版却实在拙劣透顶，读过它的人谁也不会体会到原著的优秀。这让我想到翻译问题。这一点对《作为艺术的电影》极为重要。此书写得极好，在我看来，一定会受到读者的热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处理。德文这种语言，虽然偶尔会出现无法避免的冗长现象，还是以轻快活泼著称。它的魅力和敏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恰到好处的比喻和形容词语，这些在言语乏味的译者笔下，轻易就会被扼杀殆尽。那样的话，这部在同类著作中堪称最佳的外语书籍，便将注定命运乖蹇。它不像多数有关美学理论的德国书籍那样，将大块大块的篇幅用于沉思默想，而是充满了活力。作者没有将这个题材视为有待解剖的尸体，而是看作一个热点问题，其实质必须迅速有力地牢牢把握。没有最终答案，随着每个新模式的出现，答案也在不断改变。然而，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会被德文明显笨拙的长句弄昏头脑，将其生搬硬套进英文（德文词句具备自己特有的冗长节奏和音律，在英文中无法再现）。相反，在我看来，他会努力译出一部深受知识界和有知识的大众欢迎的成功之作。我这里要再次申明，这本书的风格问题和小说翻译一样重要。

作者以极大的决心圆满完成了自己制订的目标：当他对某个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发起抨击时，他总能说服读者，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当他讽刺时，他的讥讽一针见血，而他的机智既尖酸刻薄又风趣盎然。他对普

---

教等，1931）；C.A.勒祖恩，《电影艺术》（伦敦，1931）；V.I.普多夫金《论电影技巧》（伦敦，1929）。

通商业电影（他称这类电影为“批量生产的电影”）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检验，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制片商们所信奉的价值观的审视，在动机上都十分严肃，但表现得十分有趣搞笑。书中的整个这一部分，实际上在其他地方也一样，不断重复出现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这在一部讨论美学的著作当中不是特别令人赏心悦目，但在德国目前的状态下，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或社会而存在；况且他的许多政治旁白在我看来，都可作为他所讨论的话题的佐证，绝非无缘无故。

这本书的确十分冗长，但在这一领域，英国急需出版一本好书，而且作者的热情与活力使人很快就能读完，因此很难讲这是一个缺点。对手段如何与目的相适应的分析贯穿始终（这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对此作者功力深厚，得心应手。此外，书中充满一种内在的“客观”精神，对作者表达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系统的旁征博引加以说明。这必然会为读者大众带来不少阅读上的轻松快意。至少在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受够了水平值得怀疑的批评家们不加论证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评论文章。

只有两处不足我想说说，它们对出版这本书的好处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第一点相对不太重要，主要是它忽略了电影史上几个典型的发展时期，例如，法国现实主义影片、剪影片，等等。不过，这本书已经够厚的了，对此再吹毛求疵未免荒谬。

第二点纯属个人看法，那些比我更有资格对此发表评论的人可能不会赞同。我觉得在一本如此包罗万象、如此急于在作进一步说明和填补具体细节之前首先建立电影艺术理论基础框架的著作当中，作者应该首先阐述自己对美学以及所有艺术的总体见解，然后，在指出他个人认为电影艺术在整体框架中所处位置的基础上，才开始详尽阐述自己的具体论点。阿恩海姆先生明显摒弃了这种方法，打定主意不要任何理论假设，发现什么就记录什么。这种研究方法纯粹是心理学的，纯粹是经验式和实用的。对我而言，这似乎根本办不到：很明显，每个理论家都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不论多么含糊不清或笼统概括：“纯”心理学的途径只是幻想。倘若作者说

明自己的前提，而不是断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前提，让他自己去间接发现，这本书将会更有裨益，也会使这本书在结构上更为完美。

但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或许和这篇报告风马牛不相及。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小缺点，诸如书中在举例说明时，过于倾向使用德国案例。不过，德国电影业确实制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因此，总的来说，处理问题时比较偏向德国无可厚非。另外，全书仅有一幅插图。对此，作者的理由是，一方面相关的插图很难获得，另一方面，艺术刊物上此类插图比比皆是，对那些想看插图的人来说，总之不缺；为了插图而插图毫无意义；人们都说，我们这个时代，对图片和插图病态的狂热无处不在，泛滥成灾。对此类乌合之众的热情，作者拒绝去迎合。显而易见，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我认为他一定这么想），那些真正对电影艺术感兴趣的人，到了这个阶段，不会再需要插图；而那些没有插图就不会读此类书的人对这个题目绝不会有真正的兴趣，反正也不会去读这本书。

最后，我想重复一遍我对此书的总体印象：很适合阅读，目光敏锐，充满智慧，有启发意义。书中到处可见令人兴奋的理论观点，判断客观公正；就德国书籍而言，特别要提出的是，它完全摆脱了另有企图或贩卖作者自己的拿手理论之嫌。作者具有高度理解力，见多识广，为和他一样的非专业人士读者奉献这本书。书中完全没有生涩难懂的术语，全书风格轻快高扬，唯有敏感、娴熟、精通英语的译者能够传神。一旦满足了最后这个条件，此书一定会有极好市场，特此强烈推荐出版。

致费伯出版社

1932年11月21日 [门德尔·伯林手稿, 以赛亚·伯林添加了一些内容]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报告

《工资与劳工政策》, 作者: 休·盖茨凯尔与I.德宾<sup>1</sup>

以赛亚·伯林 撰

因为生病, 我恐怕自己读这本书时的精力不够集中。加上不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 从这点上看, 我无法确信自己能够做出什么重要判断。

我觉得这是一本极具可读性的书。语言虽不过于专业, 但也不流于通俗。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 书中介绍了一些必要的基本经济知识。用清晰易懂、令人信服的表现方式, 反驳了劳工政府或工会组织通过提高工资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政策, 也可以说反驳了任何一种渐进主义政策。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 盖茨凯尔先生从纯经济理论的立场, 回顾了各种论述资本与工资关系的理论, 以及工资与价格水平的涨落可能带来的影响——这部分论述清晰, 没有什么显著的独创性, 与其他合格的经济学教科书没什么两样。在这部分里, 实际上全书都存在这种情况, 马克思主义被过于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考虑到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众多不同解读, 我觉得作者似乎在太多方面过于想当然了。第二部分由德宾先生撰写, 他对目前有关工资、储蓄、投资和购买力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了考察, 不是从理论立场出发, 而是为了看清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从内部开始腐烂, 已经到了垂死阶段。结论是并非如此。除非采取措施将它消灭, 它不会自行消亡, 相反, 还能健健康康地活上好多年。

书的第三部分(没有具体说明由谁撰写), 作者试图证明, 只有靠来一场社会变革(虽然强调了困难性), 才能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这部分似乎论据不够充足, 整个不如前两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前两部分说理公允, 不

1 实际上为埃文·德宾(上文第513页注3); 显然此书没有出版。



偏不倚，倾向社会主义的态度明朗公开，而且完全摆脱了宣扬社会主义时事评论员的传统说教方式。

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本书很吸引我。由此推断，也会吸引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大学校园里一定有不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当前经济论著读得很少，不了解类似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多少。这部书最吸引人的一点是，作者态度鲜明地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平等以及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本身的信仰的基础上，因此，他们无意对事实歪曲锻造，以展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一定会立刻提高。相反，他们推理论证了可能事实并非如此，并讨论了这一推论可能在广大群众中不得人心，而新世界的创立需要他们的支持。仅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部著作与一般社会主义宣传读物实有天壤之别。

从出版商的角度出发，我想，必须承认它的读者群不可能很大。这本书是由社会主义者写给社会主义者看的，作者想当然地预设了社会主义的大前提，并对该前提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倘若此书的经济学无懈可击，在我眼中当然如此——重申一遍我不是专家——大学里激进的经济学教授们会买它的，并会怂恿他们的学生也买。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以及分散各地、对此问题抱有感兴趣的个体读者。影响此书广泛发行的一个不利因素是，无论是它的题材还是语言，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显然这是普通百姓不会拥有的。它不是一本极具独创性或特别有深度的书，但清晰可信、文风明快、前后一致，坚守自己的目标和信念。特别是这本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迫切希望消除所有在大众心目中误以为是社会主义理论、实则是可疑的或根本毫不相干的教条。虽然它们好像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这类掩假却破坏了真正社会主义信条的纯洁性。这一颇有经济学家托尼之风的特点，我认为，本身就是值得出版的理由。此外，就我所见，它显然还具有科学价值。

尽管这本书仅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劳工具有吸引力，我认为出版它不会亏本，虽然也许只能做到保本。批评家们一定会用尊敬的口吻评价这本书，即便它引起热烈的批评。希望我没有离题太多，我对经济学的确

所知甚少。这本书让我高兴，它的结论在我看来不管用哪种社会主义理论假设检验，似乎都站得住脚。它很可能对许多喜欢它的读者产生这样的效果：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活动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本书所能产生的极佳效果。

648

致费伯出版社

[1937年1月7日<sup>1</sup>之前，手稿]

未标明地点

关于J.O.威斯登所作《思辨哲学的变形》<sup>2</sup>的报告。

我仔细阅读过这部书的手稿，以及附在其中的几封书信，写信人是H.H.普莱斯及朗文出版社的审稿人（从内部证据看，不大可能还是普莱斯）。我很欣赏前者的观点，但对后者却不敢苟同。这本书没有什么独特见解，作者也不是哲学方面的一流学者。另外我没有发现存在这个命题（参见普莱斯）。也许我应该将书的内容概要地介绍一下。它分为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鸟瞰式地快速回顾了现代哲学史，从笛卡尔一直到19世纪的唯心主义者。第二部分讨论了源自莫尔、罗素及所谓“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分析学说。根据作者的观点，这是适用于哲学的唯一可能的方法。第三部分威斯登本人认为是他对哲学问题最主要的贡献。他在这部分提出了一个心理假设，用来解释以下问题：形而上学家们虽然不断在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假定，这确乎是事实，但显而易见，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所说的对其他形而上学家们甚至外行人都是明白易懂的。借助弗洛伊德的技术对早已离世的作者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的假设，书中只是大致描述了一下，并未作详细探讨。作者认为，如果这项技术得以完善并加以应用，我们就能准确判断，构成形而上学主要部分的胡言乱语显示出什么样的身体与精神状

1 此为用于办公室传阅的打字稿的日期。

2 1947年由开罗阿尔玛里夫出版社出版。

态：意义的幻象会出现，因为胡言乱语事实上的确能够成功地向他人间接传达有关其作者心态方面的信息。这一点很像姿势，甚至温度计读数，对那些对此类事情敏感或精于解读此类现象的人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是我的例子）。关于命题就说到此。

有一点我感觉非说不可。尽管我很赞同威斯登的观点，也很希望真理能够获得胜利，但我确实认为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点。它好过已经出版的普通的哲学书籍：作者至少没有混淆概念，表达也不隐晦生涩：649 他清楚自己心目中的哲学是什么，自己寻求的答案又是什么，但他始终未能很好地理清头绪，得出结论性的意见。如果这篇论文（目前它仅[是]一篇论文）作为申请研究员职位的论文提交，这一点必须予以非常认真的考虑。整个论文风格轻松明快，没有丝毫装腔作势。我肯定，自己从未读到过，也不大可能会读到比它更轻快活泼的哲学著作。这一点非常令人兴奋，会促使读者在轻松宜人、与新闻报道相仿但又全然不落俗套的笔调中，一页页不停地读下去。这本书即使对外行读者也不至于太过困难。但能引起他们多少兴趣我不知道。通俗哲学著作会有市场，这一点乔德的书<sup>1</sup>已经证明。但我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占领这个市场，即使改变书名也无济于事。不过，我想，这倒是它的可取之处。

关于书的第一部分，现代哲学的简史综述，虽然不乏发人深思的论点，却过于简洁、用典过多，外行读起来困难，专家读起来又觉深度不够。第二部分好得多。相对其他部分，这部分的篇幅能再大一些就更好。任何从专业角度评论这本书的人都有理由提出以下批评：作者对许多问题没有深入进去。莫尔、约翰·威斯登（作者的堂兄，作者常常引用他的成果）和维也纳学派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他们在目的上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到什么地方步的分析才属于纯形式的？提出仅与词义有关又是什么意思？等等。光回答这是分析家们的惯例似乎远远不够。

有关心理中心的部分趣味盎然。可以说它是全书最生动有趣的部分，读来不会有丝毫沉闷之感。关于直接表达事实和利用征兆来表达的区别不

1 可能指《哲学指南》（伦敦，1936）。

是新见解，即使在英国哲学界也不算新鲜，但再次强调也没什么害处。对这点，公正的评论家们会再次注意到，威斯登夸大了它的成效。断然地指出绝对唯心主义者的形而上学表现出他们遭受了性压迫等等，说说容易，但就连最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家恐怕也无法将《现象与实在》中每个“形而上学的”句子翻译为关于其作者布莱德利的有意义的句子。这似乎很可疑。

但我还是希望看到此书出版，虽然我更愿意由别人来承担推荐此书的责任。这本书的总体质量差不多可以打 $\beta\alpha^1$ 。很显然，这部作品出自一位非常年轻的作者之手，他富有才华与活力，对在他面前豁然揭示了哲学真实本质的新学说充满热情。这便是我根据现有证据，对作者所做的“心理中心”的分析。这对之前只是以高尔夫球爱好者著名的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此书绝非划时代的杰作，甚至不能说特别有独到见解。如果要出版（和普莱斯一样，我希望有出版社出版），而且作者还愿意不厌其烦地重写一遍，那么，我建议他可以大大增加第二部分的篇幅，并在第三部分为他主张的办法提供具体例证（同时在分析时明确说明在形而上学和诗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差别。他提到有一点不同，但未点明）。最后修改，甚至删去第一部分。如果做到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在此书推荐给你或其他出版公司。按照现状，我的推荐会带有相当程度的困惑与不安。不过，既然都点出来了，而且我相信瑕不掩瑜，在一定意义上，我准备推荐此书出版。希望这份材料能够保密，我将不胜感激。

以赛亚·伯林

想必是费伯请伯林增加一些推荐文字，以下是伯林的回信。

---

1 即BA，指二等与一等的混合，二等的比重更多一些。关于用希腊字母给学术成果打分的完整说明，见上文第109页注3。

致费伯出版社

[1937年4月27日<sup>1</sup>之前,手稿]

全灵学院

《哲学的变形》

关于威斯登先生的书:

在我看来,整个第一部分对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过于肤浅,而对普通读者却又过于引经据典。不错,对一个比较生僻的题材有必要包含类似于历史介绍的内容,论述二元论的章节是引言部分写得最好的,或许可以整合到一起,不再作为专题论文,而是作为其他部分和章节的界定性引言,权当一个在相当熟悉的领域必不可少的慢跑。威斯登先生说要感谢都柏林学院的那一节,作为令人兴奋的哲学新闻来读无与伦比,但在一部严肃著作里却显得过于轻佻,不值得收入。我认为,作者真正要承担的任务是,阐明“分析”究竟意味着什么,并考察如何应用。这部分不仅要扩充,651 还要改进目前说服力不够的地方,例如,它必须清楚说明什么是“分析”;说明各类分析学家们,如莫尔、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波兰学派、美国学派等(a)在具体做些什么,(b)他们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走出了多远;最后,给出分析成败的具体例证,将它们所体现的各类分析分门别类,探讨它们在取代较为传统的哲学方法方面的确切意义。

关于分析这个主题、它的本质和价值,目前在学术界讨论得很多。出版了太多肤浅甚至误导读者的读物,例如乔德及其他评论家广为流传的作品,因此,任何新的阐述都必须尽可能做到毫不含糊,彻底深入,这一点至关重要。我相信得天独厚、聆听过莫尔和维特根斯坦教诲的威斯登先生,极具资格担此重任。但他必须牢记在心,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并对以上问题给出自己清晰的回答:与其说给出的答案必须正确,不如说它们应该显得真实、完整、有效,能够解决问题。这部分如果写好了,那么

1 此信在费伯一封日期为1937年4月27日的信中提到过。

在我看来，整本书不论对专业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将收到同样的效果。

至于第三部分，如果要保留，决不能原样不变。目前，它是一个教条主义命题的扩充版本，这个命题认为，任何未能通过分析家的意义测试的内容，都实实在在没有意义，尽管它表明{其}说话人的情感状态。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它没有根据，只可能毫无必要地激怒布莱德利的读者们，起不到启迪开导他们的作用。

为了具有说服力，威斯登先生必须表明，心理中心派如何开展一项具体研究，例如，从黑格尔或后来的怀特海的著作中取出一段话，首先提出可论证的假设，假定这段无意义的话是某种心态的表达或副产品：当然，它也表达了那些认为这段话似乎深刻揭示了实在本质的人们的心态。除非在这些方面提供具体例证，否则整篇论文会让人感觉只是一部教条主义的作品，充满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它可能真实，也要有充足的论据加以支撑。假如作者不准备这么做，我认为他应该大刀阔斧地删减最后一部分，着重强调主要论点：区分形而上学与诗歌或是痛苦的呐喊或弦乐四重奏（事实上它们都是能够向他人传达“情感状态的征兆”），清楚地表明书的这部分只是一个初步建议，而不是完全成熟的理论。 652

假如这一切都做到了，作者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分析”这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的全新分析，那么，这本书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否则，它将有四面楚歌的风险：旧世界的专业哲学家，认为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处理过于轻率的分析家；缺乏相关知识指导并因此困惑不解的大众；最后，别忘了还有愤怒的牛津古典人文学科的老学究们，他们专门为评论刊物和星期日报写书评，这些人往往是消息最不灵通又最容易被激怒的。既然威斯登先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就应该促使他好好将自己武装起来，刀枪不入，让那些无能者好好瞧瞧，并将他们吓跑。

我衷心希望这本书在经过好好修改之后，能够出版并引起轰动：没有理由不这么想，如果这么做了，它从各方面看都是很出色的。正如我自始至终强调的，这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待这项任务的耐心，而不是能力，在能力方面，他显然绰绰有余。

## 华盛顿快讯

为H.G.尼古拉斯编《华盛顿快讯，1941—1945年：来自英国大使馆的每周政治报告》（伦敦，1981：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芝加哥，1981：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写的序。

这部集子由多篇快讯组成，经赫伯特·尼古拉斯教授筛选、编辑和注释后出版。在1941年到1945年二战期间，这些快讯由驻华盛顿英国大使发往伦敦英国外交部，后来被称为每周政治报告，目的是为外交大臣及外交部人员提供信息，让他们了解美国对事关英美关系的重大问题的观点和舆论的变化情况。这些报告后来流传开来，其他大臣（包括首相）以及相当数量的英国海内外官员也都能读到。我写这个序的唯一资格是，1942年春，我被临时调往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负责为每周报告撰写初稿。

读者们可能会不解，为什么要把这项特殊的工作委派给我。人们会想，特殊工作，尤其是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工作，理应由经过特殊训练的专家来完成。对这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能让这些人感到满足。我这个情况当然是英国在战争时期任命临时官员方式的一个生动例证。我做这份工作的资历不是太突出。我在牛津大学与美国同行和学生的友好相处中获得了一些印象，而且我长期不间断地热衷于阅读美国期刊，这在当时的英国或许不太多见，尤其是在学术界。我阅读的美国期刊包括《纽约客》和《时代》周刊，《时代》周刊从我1928年到牛津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读了。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对美国并没有什么专门了解。至少我从未

去过那里,也没想过去那里。加上总体来说,我对国际事务,特别是英美关系,也没有什么专门知识或了解。1940年夏,我当时还在牛津教哲学,先是尼克尔森先生(后封为哈罗德爵士),然后是情报部的政务次官,问我是否会考虑去莫斯科任英国使馆新闻专员。外交部参与此类任命的格莱德温·杰伯先生(后封为格莱德温勋爵)跟我说,鉴于我的俄语知识以及我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我在驻莫斯科英国使馆能发挥作用。我接受了。并受命经由美国和日本前往俄国首都。等到了华盛顿——那里本应是我前往莫斯科的第一站,却得到英国使馆的通知,告诉我驻苏联英国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给伦敦来了一封信,说他那里不需要我的效劳,当时那里新闻专员所能做的工作(当时是苏联—纳粹协定最黑暗的时期)已经有人在做,我去完全多余。如此一来,外交部便不要求我继续前行。当问起希望我做些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是,我的下一步计划与他们丝毫不关。我在驻华盛顿英国使馆的一些朋友尽可能婉转地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并且,我非常确定,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提议,新闻参赞斯蒂芬·柴尔斯先生才提出为我在正好人手短缺的使馆里安排一份工作。我对他的好意和信任表示了感谢,但回答说在那种情况下,我宁愿返回英国。他又问我是否同意至少待上六七个星期,负责对美联社驻英国的记者发回的报道进行分析并写出报告。那些报道似乎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法国沦陷之后,英国也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消极沮丧甚至失败主义的情绪。但这些说法并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中一些似乎正在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有害影响,而这个国家的善意和物资正是我们所急需的。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条件是结束后允许我回国。在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我阅读了大量美国报纸,在规定期限内交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极大程度上加深了使馆对我的初步印象。它产生的结果是,后来他们告诉我,英国政府就此问题向美联社高级官员提出了正式抗议。至于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

654

秋季学期开始,我回到了牛津,重新开始了新学院的教学工作。11月底,我收到英国情报部发来的一封信,通知我探亲假已经超期,要我回纽约英国情报处工作。我说我并未承担任何政府职务,只是一位认真教书



655 的大学讲师。接着又来了一封信，这期间我才明白，由于那份美联社报告写得出色，同时又有两三个我过去认识、身居高位的美国人推荐，我已经被任命到英国情报处一个新组建的办公室工作，负责提供美国报刊电台关于英国作战情况的报道。这个新部门的负责人是阿兰·达德利，两位能干的主任分别为约翰·惠勒—班纳特和奥博雷·摩根（具体见约翰·惠勒—班纳特爵士已出版的回忆录《特别关系》）。情报处以及情报部美国司的每个人似乎都听说了我的任命，唯有我本人蒙在鼓里。这是提供给我的唯一一个战争时期的政府职位，我开心地接受下来，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便以情报官员的身份在纽约工作。任务主要是把英国作战动态提供给各家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创办的报纸和其他媒体，例如工会组织、犹太人组织及一些小规模的基督教派别。情报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有关报纸、电台和其他通讯媒体报道的综述报告，反映整个美国公众舆论。这份报告被伦敦情报部撰写宣传资料的官员们视为必不可少的参考，尤其是可以用来抵制严重伤害英国的报道，对在美国从事这类工作的英国官员们也一样重要。在工作当中，我主要撰写报告，反映各团体组织对公众关心的一般问题，尤其是对英国的态度。在研究他们观点的基础上（我还会见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尽可能对这些公开和私下表现出来的态度对整个美国舆论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估。我特别关注各类工会组织及其领袖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派，一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与英国工会联盟关系紧密，它的强大对手是产业劳工组织，当时出于多种原因对英国不太友好。顺便提一句，后来我得知，正是我工作中的这个部分引起了驻华盛顿英国使馆官员们的注意，并且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再一次表示希望返回英国（因为我的大多数美国“客户”此时已经开始坚决支持英国和这场战争）时，促使他们要求将我调往华盛顿，负责政情报告。

每周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早些年是交给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使团的年轻成员完成的。他们在完成正常工作后，有空暇才从事这份工作。但是，一旦美国参战，有关部门便认识到，有必要就美国状况提供更为详尽的情报，这项工作又至少需要一两个专职人员，奉命对美国国会、政府和公

众的舆论以及整个美国、特别是华盛顿的个人和组织对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and 解读。 656

在战时的华盛顿，英国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使馆创建特别调研部门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当时组建了许多新的外交使团，分别代表财政部、供应部、粮食部、飞机制造部、政治与经济作战部、情报部和其他部门；几乎伦敦的每一个部都以各种形式，在华盛顿或纽约设有代表处。这些英国外交使团，有些与相关的美国部门建立了联络关系，独立开展工作；另一些使团的作用决定了它们与使馆关系密切，于是建立了相关的新部门，大家都明白只是临时性的。对这些新部门的建立，以及其他一些有悖传统的做法，例如，增加了一个劳工专员（R.H.陶尼教授是第一位被委以此任的人，一点也不开心），外交部均以值得称道的容忍态度默默接受，这种情形很像传统的公学接受开设“现代科目”的需求，明知不可阻挡，便只好听之任之，不作无谓的苛责。一战期间英国便开始侵入美国，但规模不大。结果是1940年代初，英国在美国首都建立了事实上的短期微型白厅，它与美国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美两国官员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这些新的战时附设机构的助手们，是伦敦各个部成功说服外交部分派到驻美英国使馆之下的，就像被放逐到一个仓促建成、摇摇欲坠的临时木板房，它尽管难看不雅，却有自己的特色：那里的气氛随意融洽，与官邸或大使手下工作人员之间死板拘谨、充满威严的氛围恰成对照。这点对每周政治报告及我所在部门的其他报告颇为轻松自如的散文风格或许产生了一定影响。

撰写这些报告的调研部门有三位成员。每周政治报告的素材一部分来自纽约那边为伦敦情报部准备的有关美国报刊的调研。此外，我们还参考驻美各主要机构提交给领事处的报告，以及英国情报处驻纽约和其他各大城市的报告。还要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经常与密切关注华盛顿局势的消息灵通人士交换信息，他们包括官员、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外交官等。再就是依靠驻美英国使馆和外交使团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获取的信息。然后，根据我们对相关个人的性格、社会交往、观点、效忠对象、方针政策、兴 657

趣、态度及个人情感，以及美国政府部门、政治社会群体与运动等方面日益增多的了解，对所有这些材料做出评价。我们的工作不是秘密，就像任何一位称职的驻外通讯记者的工作，只是这些报告有一些以密码传递，而且流传的圈子小而精罢了。一些调研报告针对外交部提出的具体要求而做，这类要求通常以特别快讯的形式给予回复，不属于每周政治报告系列，因此在这里没有收入。

我觉得，在战争时期的华盛顿，与国家安全无关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多机密，这点与伦敦完全不同。就连美国官方社会也比老式的、缺乏社会流动的国家里要松散得多，开放得多。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比例很大的非专业人士——商人、律师、社会福利工作者、大学教师及其他人等——来到华盛顿为政府工作，不只是在战争期间，或是临近战争之前的“准备期”（像英国那样），而是从1933年实行新政时便开始了。

这里的情况与英国不同，战争并未使美国的正常生活有多大改变。的确，这也是我所在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即向一切以战争为中心、一切服从战争需求的国内政府传达，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这里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大致和以往一样，这一事实，尤其是源自新政时期甚至更早的一些个人和权力集团之间相互施加压力和相互厮杀的现象，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这些都会对战争产生影响，特别是当这一点通过国会态度表现出来的时候。伦敦对这一点向来认识不足，在这方面，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截然不同。

我和同事曾与一些人谈论过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不打算对任何人隐瞒这点。那些在国务院或白宫工作、和我一起讨论普遍感兴趣话题的美国官员，并未特别交代有什么内容希望瞒着英国政府，我也不想他们这么做。我不是新闻记者，不追求什么独家新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受所谓机密的约束，常常就能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这点不用说在新闻记者和根本不用考虑安全问题的其他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此类交谈十分有益于大家交流思想，建立友谊。这种友谊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一直保持下来，成为我永恒的快乐源泉和持久的兴趣爱好。

他们确实让我了解到更多有关美国的情况，远远胜过报纸或官方文件或任何其他出版物给予我的。这些人都是战时在华盛顿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律师、银行家和大学教师，以及工会领袖、政治活动家、作家、新闻记者和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与他们的交谈乃至私人关系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窗户，那里的视野远比报纸政治栏目或对外电报、快讯提供的信息所展现的要宽阔得多。他们为我提供了（被错误地称为）“背景”知识，这是了解任何国家或社会必须拥有的。在下面这些事情上达成了某种互惠互利：美国官员偶尔会希望英国政府对美国不想正式表达的情感、态度，甚至具体政策，自己去体察和了解，以免引起反作用或反驳意见，导致两国关系在一些微妙棘手的谈判领域内复杂化。我们编的快讯可以为这类非正式沟通提供一个渠道，无需任何人对任何事表态。有时这么做的确能够在促进理解和消除误会会上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有这些私人交往，我很快了解到，华盛顿的政治比起白厅，不仅更加公开，而且更重私人关系，更不具有机构特征。美国国务院确实具备机构特性以及连贯性，工作人员说话或发表意见，不会说是代表某个官员的个人想法，而会称其为“国务院”的态度；美国财政部基本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许多重要机构却并非如此：如果你问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他做什么工作，他很可能会回答“我替伊克斯先生（或福雷斯特先生，或内尔森先生）工作”，而不是“我在联邦政府内政部（或海军部或战时生产局）工作”。在我看来，势力强大、管辖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他们”工作的各部门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各位新闻记者的关系），远比已经确立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这种认识对理解英国文官们，在某些程度上还包括英国大臣们的思维与运作方式不可或缺。有时我会纳闷，不知如今这方面情况是否有所改变，不过我已有三十多年与政府或现行政策没有任何联系，实在说不上来。

有一些美国舆论倾向，尤其是华盛顿的舆论倾向，是外交部，自然也包  
括情报部，特别感兴趣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比较频繁地收集这些快讯的原因（还包括我这个部门最初负责的常规季度报告和特别报告等）。其中的话题包括：借贷（及“反借贷”）；孤立主义和太平洋优先主义；美国扩张 659

主义的野心；英国殖民地政策，尤其是在印度和远东地区、香港和新加坡、中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等。所有这些在美国都会受到传统、尖锐、条理周密的批评。其他还有像美国石油、民航、外贸政策以及战后计划等话题。偶尔，我们必须解答一些其他客户通过外交部提出的问题，这些客户包括内阁、殖民部、后勤部、英国广播公司，等等，回答时要注意反映和英国有直接关系的美国部门与伦敦同类部门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特别要阐述和解释清楚各个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不断形成和重新形成的利益联盟；老的战前势力集团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将人们分为两派：一些人是新政拥护者，看重社会目标与政策，另一些人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紧急调配所有资源为战争服务；再有就是权力中心的相应变化、领导人们之间关系的相应变化，以及由这些过程决定、在整个各方力量的联盟中发生的相应变化。

外交部偶尔会提意见，说提供的情报远远超过它想知道的。不是指报告不简洁，而是涉及的话题过多，枝蔓过繁。这往往会引起轻微不满，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借口密码部门劳累过度，希望减轻他们负担等等。情报部则胃口大得多，希望我们提供的精神养料多多益善。一旦服从外交部的指令，写出来的报告内容少一些，丹尼斯·布洛根立刻就会叫苦连天。这位研究美国问题的老前辈当时是英国广播公司北美处的顾问，他将每周政治报告比作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他穿过美国权力斗争的迷宫。没有它，在英国根本无法对这个复杂领域做出正确认识。但是，我们的主人是外交部，不能将它的希望置之不理。因此，后来我们就减少了报告内容，有些我们认为应该或值得报告的也不再往上写了。余下来的材料有些便进了我和赫伯特·尼古拉斯（情报部美国司）的私人信件，有时可能比官方电报的内容更多几分趣味。当然，读懂它们或许需要对美国政治局势较为了解，而大多数每周政治报告的读者不一定拥有这么多相关知识。

不过，不能由此断言传阅这些电报的官员大多喜欢对电报内容横加指责，恰恰相反，我们得到许多鼓励，私下也听到许多赞扬之声。现在回想起

来(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在观察、判断和重点方面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纯粹是评价深度不够),我觉得许多赞扬话有点过奖了。

现在来说说快讯本身。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快讯,初稿由我撰写,但绝不是全部。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人在伦敦,再者偶尔我也会休上一两个星期假,有时会因为生病或被派去参加特别使团视察各英国领事馆或参加会议没去上班;遇到这些时候,快讯就由A.R.K.麦肯兹先生、阿兰·贾德森先生撰写,偶尔还包括保罗·斯各特·兰基内先生。<sup>1</sup>他们个个目光敏锐,技法娴熟。我只负责撰写快讯的初稿。这些快讯本身必须经过重重审查关卡:很自然,我得谨慎小心,任何出于疏忽透露出来的情报,只要认为有可能使重要人物的感情受到困扰,而这些人物又需要我们采取明智的态度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就必须删除或做彻底修改。因此,快讯中相对缺乏个性化的人物特写,或是有关人物职业和出身的交代,很大原因是由于外交部并不急需此类小品;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东西最好只出现在由特派情报员递送的绝密报告中,不能包含在电报里。一些情报不可避免地会泄漏出去,虽然这些快讯不包含任何真正机密的内容,使馆还是希望不要因为报告而对有关事件、态度或人物的评论传到美国当事人耳中,那样有时难免会引起愠怒。除了类似的自我审查,我写的初稿有时被改头换面。记得我都是在星期四下午把稿子送去给外交使团的团长过目。他往往会把稿子分成几部分给相关的官员审阅,看他们是否会提出有什么地方需要删除或修改,或者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外交大臣,尤其是大使(他是所有这些信息的官方来源),常常会增加或去掉某些内容。类似以下这样的句子“此条新闻经科德尔·赫尔在与我的谈话中亲口证实……”显然不会出自我的笔下。已故迈克尔·赖特爵士曾任事务部主任,他特别喜欢大刀阔斧地删减、修改,并在报告中增加内容。尽管如此,我愿为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快讯负责。在经过了这

661

---

1 据我努力回想,我离开华盛顿的时间包括:1942年6月回英国,一直到1943年1月下旬;1943年9月26日至11月2日;1944年3月18日至5月16日,及7月15日至8月4日;1945年2月9日至4月4日。1945年最后两周我在旧金山开会。1945年7月我离开华盛顿到驻莫斯科英国使馆,1946年回来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就是这部集子里所收的快讯结束之时。(伯林回忆并不完全准确:见“年表”,他的活动均有据可依。)

许多年后，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我自己或使馆的其他人究竟删去或改动了哪些内容；倒是与尼古拉斯教授尚存的来往信件偶尔会让我想起这点。

许多年之后，重新读到自己参与编写的文献，是一种特别奇特的经历。你会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自己确实没有认清某个观点或某个事态发展相对而言重要与否。这种意识如此频繁袭来而令人坐立难安，是一种十分令人压抑的体验。但它的确让人无比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件给人的感受。这部集子如果能够帮助感兴趣的读者再现当年的政治局势，在如今显得无比遥远的那些年代中，那曾经是战争期间在华盛顿为英国政府效劳的一批忠臣所熟悉的场景，那么，此书便已对帮助人们重建过去尽到了一

662 份力量。

# 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

个人往事片断

这篇文章是基于伯林1972年在耶路撒冷首次雅各布·赫佐格纪念讲座上的讲稿。

—

我经常和朋友雅各布·赫佐格讨论历史之网的错综复杂。危险无处不在：例如，在试图预见未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习惯从当今以及不远的过去过于机械地进行外推；对一些不可预料的偶然因素，特别是对个人性格和个人行为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没有予以充分考虑，而这些因素至少在短时间内，有可能颠覆完全合理的期望，也有可能摧毁表面看上去稳健牢靠、被人广为接受的假定，有时它们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一触即溃。我们，指我和雅各布·赫佐格，过去经常讨论心理构造不同的领袖们对重大事件产生的相关影响：例如，有人信念坚定，甚至狂热，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充耳不闻别人的忠告，不顾危险、无所畏惧地全力向前；有人小心谨慎，有判断力，成熟稳健，对超越普遍认可的道德边界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们富有仁慈之心，拥有实践智慧，不相信夸张的态度；这两类人完全不同，好比西蒙·巴·吉奥拉与撒该·本·约哈难。我这里准备谈的情形——我个人熟悉的有关战时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之间关系的小小一角——在我看来，说明了此类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过，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对我个人的资历做一番简单说明。



## 二

成年之后，我几乎一生都在从事学术工作。之所以说几乎而不是整个，是因为1940年夏，我得到牛津学院的准许，接受了英国情报部提供的一个战时职位。我作为“专家”被派到纽约新建立的英国情报处工作。我的“专长”（对此我之前毫无准备）包括尽力游说美国的一些“少数”团体——例如，工会组织、犹太人报刊、一些小规模的新教宗派——在出版物当中报道一些英国作战的信息，抵制其中一些团体强烈的反英情绪或孤立主义倾向。天主教、黑人以及其他群体创办的美国报刊则由其他人负责。

我的任务不是太困难，因为我的大多数“客户”当中，普遍存在反纳粹情绪，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与英国工会联盟关系密切，十分清楚自己的立场。它的主要对手产业劳工组织是由半熟练产业工人组成的庞大组织，对英国不太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存在竞争关系，与英国及其盟国缺少交往；另外也因为受到共产主义和孤立主义影响，在苏联遭到进攻之前，这些影响往往交织在一起。至于犹太人报刊，当时态度已经十分明朗，公开热情地支持英国。这场战争使大多数在美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出自东欧的犹太人，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39年颁布的英国白皮书对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横加谴责，这在美国犹太人社会中激起了广泛的失落和愤怒情绪。尽管如此，宣战的消息以及英国在1940年的英勇表现，在美国引起亲英和挺英的大浪潮。这一点，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犹太社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即便巴勒斯坦当局采取了种种禁止移民的措施，而且运送难民的船只“斯特鲁玛”号遭遇了可怕的劫难事件——就连殖民部的一些官员都为此感到耻辱，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们还是基本上停止了对英国政府的攻击，唯有建立犹太军队的宣传仍在继续。对此倡议，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同盟满腔热情地极力鼓吹，他们中既有犹太人也有宽容开明的非犹太人支持者。1941年底，这项计划基本上被英国政府否决，不仅激进分子，就连温和派对此都深感失望。伦敦给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装备不足，但谁也不会受骗上当，相信这个

话。这么做明显是出于政治原因——害怕得罪阿拉伯人，这才是症结所在。但是，现在和1914年到1917年的情况不同，美国犹太人差不多一致支持英国：说差不多是因为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犹太个人和组织唯恐自己在外人眼中像战争贩子，或害怕被人指责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目标之上。其中一些人便成为孤立主义组织的成员，这中间有一小部分颇为知名的犹太富商，他们面对其他犹太人时不免会感到尴尬，这种情形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逐渐消失。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些人数不多的犹太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对富于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来说，在道义上无关紧要，更不会成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力量，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不是全部，在苏联遭到进攻后转变了立场。 664

在这些方面给我教导的几个主要人物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令人尊敬、极有天分的意第绪语新闻记者。他名叫贾德·泰勒，帮助我熟悉意第绪语报刊。另一位我只见过两次面，是著名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D.布兰代斯，当时正处于他漫长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他用独特的道德魅力和清晰的语言，向我详细说明了美国犹太人社会的群体生态学。“不要搞错，”他说，“犹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站在我们一边[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会大量移居国外，但他们知道，要想在其他刚从欧洲移民过来、忠心耿耿的美国公民面前抬起头，自己必须在某个地方占有多数，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清楚这点。其中有些人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会认识到这点，并全力支持在巴勒斯坦的实验。遗憾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不太富有，在政治上也不像天主教会那么组织严密，因此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可能不大；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那方面大有作为，唯有尽力而为，把自己的情感、希望和恐惧都奉献给‘这个运动’[他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它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劳工运动，只是不一定会取得同样圆满的结果。”（当然，我不敢保证这里和他的原话毫无出入，因为我没记日记，不过我的确因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缘故记下了我们交谈的内容，他希望我告诉他布兰代斯都说了些什么。虽然笔记丢失，但毕竟做过记录，主要内容都

印在我的脑海里。)

布兰代斯接着又说，谈到资金和影响，这些都属于犹太人当中的富商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其中一些在他看来愚昧无知、充满偏见，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是让人会觉得他们想按照犹太人所希望的方向，撼动美国政策的大船。即便如此，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善良勇敢的人。例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本·科恩；还有亨利·摩根陶，他为人大方热心，与他酷爱虚荣、心胸狭窄的父亲完全不同；就连伯纳德·巴鲁克也可以成为逆境中的朋友。然而，布兰代斯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家们太过平庸，在政治上很无能。他们只会大声吵吵，但缺乏判断力，消耗别人的时间和耐心时却毫不吝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布兰代斯满怀深情地谈到为人正派的中下层阶级和贫苦犹太人，虽然他们对某些事并不了解，却始终心怀善意，他能感到他们对那些权贵显要们的行为持藐视态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告诉我不用去理会那帮人——他们的胆小懦弱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没必要把他们放在心上。具体名字他没提，但了解当时美国政治舞台的任何人都清楚这顶帽子适合谁戴。

在这之前或之后我从未遇到过任何别的人，像他这样拥有如此纯粹、炽热的道德感，如此富有尊严和人格魅力，如此具备坚定不移但又带有几分讥讽意味的现实感。它能穿透所有虚假不实之辞，直逼铁一般的事实，不论事实多么繁琐。大法官的一举一动似乎都超然物外，就像一位坚定不移地求真务实的人，不讲人情。不过有时候，真相也会从他的眼皮底下逃脱。我想，就是因为他，至少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我才会有那种错误认识，以为500万美国犹太人终究不会对美国政策有什么影响；犹太社会中唯一可能对美国产生影响的是杰出卓越的个人，即像他这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这或许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因为到最后这些领袖们和大众的观点不谋而合。但英国政府方面却因此犯下了一些大错，而且造成英国和美国亲阿拉伯的官员们对他们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1941年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不断变化。从那

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想必对其他人也是如此，甚至包括魏茨曼以及那些与他观点相似的人，在非正式场合，我同他们交往颇深，并自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

1942年，我被调到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从事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即报告整个美国，尤其是华盛顿政治舞台的情况。我要做的实质上就是作为政治观察家，或驻外记者承担的工作，只是有些方面不同，比如我写的稿子可能在经过使馆不同层次的官员（包括大使本人）审阅的过程中被修改或更正，然后签上大使的名字送出；另外，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些报告属于机密；再有就是我的读者仅限于伦敦和其他地方的英国政府官员。就我记忆所及，在这些报告中，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内容所占比例极小，因为它们完全处于边缘地带，不在整个美国或华盛顿舆论的中心。在使馆眼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好不过是令人难堪的盟军；最坏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麻烦。一直到1943年至1944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日益激烈之前，英国都没拿它太当回事：既不鼓励，也不防御，就连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英国政策发起猛烈抨击时，英国也无动于衷。我对这些事件当然深感兴趣。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同情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因此，当我在挚友和牛津同事莫里斯·鲍拉的回忆录中读到，在他看来，在战前的那些年里，我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是我所有政治信仰中最突出的特点，对此说法我毫不惊讶。

过去我常常和感兴趣的人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虽然不乏令人信服的推理，我恐怕自己还是没能让别人改变立场。战前我在牛津曾经教过的一个美国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里态度激进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我的努力在我的老朋友哈罗德·比利爵士那里似乎也收效甚微。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众所周知，不论是我还是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都无法让他有半点动摇。我第一次见到魏茨曼是在1938年，他对我形成自己的观点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稳健温和，以及他的政治天才，使他高居于我所认识的其他政治活动家之上。我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直到他生命结束。我始终坚持他的原则和观点，至今仍未改变。在华盛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似乎立刻便成为我眼中最有远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犹太复国主义

者。一些左派或右派的激进分子，出于仇恨或一时冲动，往往喜欢鼓吹冷酷激进的政策。同那些人我根本没法谈到一块儿。他们似乎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置于他们所支持的事业目标之上。这些激进分子把稳健温和视为胆小懦弱，稳健派也不甘示弱，认为这些人全是疯子。每个试图克服艰难险阻、促进巨大变革的运动或许都是这种情形吧。我清楚自己的立场。依我看来，激进派的政治活动是在公正仍然有望获胜之时绝望的政治斗争。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所采取的方法令人惊骇，极有可能导致狂热分子希望的结果。我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对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一位有坚定信仰的渐进主义者。正因为如此，魏茨曼的观点显然会吸引我。

我在使馆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在那里的的工作也不牵涉任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活动。我从未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或熟人谈起我的工作，公道地说，他们也从未让我说明我的工作的性质，虽然这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也没有让我提供什么机密情报。就连魏茨曼，在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也从未试图在这方面利用我。我是战争时期英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不想难为我；摩西·夏里特、大卫·本—古里恩或其他我在美国认识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也一样。他们当然会谈起巴勒斯坦和犹太复国主义，会谈起他们的希望和恐惧。虽然双方偶尔都会触及必须小心谨慎的边缘地带，但谁都不会超越界线。他们不会透露自己的秘密，也不希望我透露我的秘密。在英国或美国同事面前，我不会特意掩盖自己的观点，并常常站在魏茨曼的立场，与使馆、白宫和国务院的朋友争论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对我的观点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惊讶，说实在话，这些观点在他们看来非常自然，虽然他们往往并不赞同。他们就像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一样，对此话题不太感兴趣；而且和他一样，他们也认为这个运动可能会带来麻烦，但对英美关系没有根本影响。外交部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此时已经决定要为更有实力的阿拉伯撑腰。好在这点上，大家不必观点一致。因此，打个比方，战争期间身为艾登首席私人秘书的奥利弗·哈维（塔斯博的哈维勋爵），始终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一直是魏茨曼的私交好友。另外还有

三四位其他官员，也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抱负表示态度温和的同情与支持。至于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所有官员全都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持敌对态度。在其他美国官员中，就我所知，也没有一个是支持的；而他们中我的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根本一点支持的迹象都没有。他们只是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根本就是愚蠢的想法，是面对阿拉伯人难以动摇、无法消融的敌对态度所设想的乌托邦。而“政治”官员的态度则各有不同：萨姆纳·韦尔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朋友，艾奇逊据说持反对态度，并与老朋友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约好再也不谈这个话题，每天早晨他们俩总是结伴步行到市中心；阿道夫·伯尔像对所有事情一样，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科德尔·赫尔给人的感觉是，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外交事务几乎没什么兴趣，而且总是跟随总统的立场。至于说总统本人，不知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个人原因，显然希望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至少是让他的一些犹太人顾问和来访的犹太人看到，他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自己目标的。持这种态度的还有其他一两两位白宫官员。在这方面，国务院和白宫过去（也许现在还是如此）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同态度，至少在灵活度上不同。

英国使馆的行政官员从他们在国务院的同行和其他有工作来往的美国官员那里，获取了许多有关美国态度的情报。因此，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觉得，他们在对美国在各领域的政策做出评估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过分高估从这些官方渠道所获印象的价值。可是，任何一位政治活动家或新闻 668 记者都知道，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影响因素，个人的和局部的，来自院外活动集团和压力团体，还有公众情感的种种迹象。而我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这些因素引起国内政府的重视。在这张网当中，其中一股线——虽然不是非常重要——便是美国广大犹太人社会的态度。到了1942年，随着美国加入战争，针对英国有关巴勒斯坦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以及被犹太复国主义激发的抨击活动开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起来。英国不同意建立犹太军队，加上在巴勒斯坦的执行官们越来越严格地执行白皮书政策，都使这股情绪更加激化。我记得一次在公共场合，魏茨曼发

表了一个强烈的、典型的演讲，反对这种骚动情绪。当时，他在皇家空军服役的儿子刚刚为女王捐躯。他说，在这样一个时刻，给丘吉尔的英国抹黑有失正派；攻击英国不是一个自尊的运动应有的行为。唯有盟军，也就是英国取得胜利，才能拯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必须停止攻击英国，这是基本问题。至于说20万犹太志愿者组成犹太国家军队，他指出，完全不现实，是一个有害并充满危险的白日梦，作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1.5到2万人是目前可行的最大数目。他表示，只要他还在领导这一运动，就决不会与英国破裂。没有英国，犹太复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至于阿拉伯人，只要他们明确表明态度，他已经准备好与他们谈判。目前似乎只是犹太人在代表他们说话，要让他们自己说，这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才能够相互对话。莫因勋爵曾经指责魏茨曼，说他在伦敦的公开批评给英国政府招来了麻烦；这一指责极为荒谬；在美国对英国展开攻击很恶劣，而且效果会适得其反。可以在伦敦或耶路撒冷这么做，但就是不能在纽约。

这些直截了当的意见和观点并未在魏茨曼的听众当中收到良好反响。就像之前和之后常常发生的那样，他被指责为英国狂，软弱无力的“议会政治”，以犹太复国运动为代价，姑息讨好他的英国朋友。但是他的威望深远，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那段时间里我常常与他见面，现在仍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想法。他的立场建立在某种几乎无人可以公开置疑的认识上。首先，他认为取得这场与希特勒之战的胜利是高于一切的目标，这一点不容争辩。即使丘吉尔政府的政策有失公正或存在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  
669 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谁也没有道德权利——尤其是犹太人，帮助英国政府的敌人。依他看，等到战争结束，英国肯定还是中东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谁又不相信这一点呢。犹太复国主义的前途和犹太人定居点的未来，它能否生存，取决于英国及其善意：如果关系真的破裂，对犹太人的希望将是致命一击。这一切不是没有可能，白皮书上就说得很清楚：外交部已经扼杀了均等分治的计划，如果需要，也会扼杀犹太复国运动。但英国外交部不能决定一切，现在的首相是温斯顿·丘吉尔，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过去和现在一样发自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议会和内阁里都有

一些具备影响力的朋友，尤其是在战争内阁，那里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外交部的亲阿拉伯派或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像列奥·艾默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达夫·库珀，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奥利弗·斯坦利、斯缪茨、劳工大臣们（艾德礼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之坚决，当时尚无人知道；贝文的作用到后来才显现）。用不负责任的攻击来激怒英国人的情感，以此与在美国的英国批评者结成不光彩的联盟，这么做不仅背离道德，而且有失理智。

当时，魏茨曼很赞成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他在《外交事务》上撰写的著名文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样一个国家要想在政治上或实际运作上真正生存下来，必须与某一大国建立紧密联系：它需要这种联系保障自身最起码的安全，否则可能会被阿拉伯人及其盟军打败。别指望国会成为这一保护力量。它决不愿意为一个在传统上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地区承担责任，并且会反对任何此类建议，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做的那样。此外，魏茨曼也不希望美国代替英国充当保护国：美国政策太不稳定，太容易受内部压力影响；美国高层领导人当中反犹力量太多。那么他还能找谁？英国人可能会被迫抛弃犹太人，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犹太人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这么做无异于自杀。

在我看来，这些想法始终支配着魏茨曼的基本思路，一直到战争结束。另外还加上许多个人因素。他的确喜欢并钦佩英国人，欣赏他们勇气和稳健兼备的性格，以及国内政坛的文明儒雅之风，远远胜过喜欢其他任何民族的性格和生活。犹太人从英国人那里可以比从其他社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与英帝国建立联系，即便存在明显的弊病，即便战争年代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国与犹太人的关系也时时让人痛苦，但对犹太人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难以驾驭、顽固不化的民族来说，仍然是一个理想的结果。至于白皮书，正如丘吉尔在对它毫不容情的批判中所指出，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偏差和错误行为，一个在惊惶失措之时采取的绝望行动。它会终止的。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否则根本不可能。英国人需要犹太人的天才和技能，虽然他们似乎尚未意识到这点。但随着时间流逝，魏茨曼相信，他们会意识到这点的。至于犹太人，他们更需要英



国人。谩骂诅咒英国人，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乐在其中，殊不知这根本就是他们无力消受的奢侈，不论从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魏茨曼有意将自己视为英国的臣民，相信与英国交往会带来好处。他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自己与美国政治活动家举行任何正式会谈，都会让勋爵知悉内容。英国政府对此报以颇为勉强的赞赏态度。它知道他的目的和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但他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却完全不同，让人不能不佩服。于是，英国政治家们开始信任他，视他为心腹，与他详细讨论分治方案，并且只与他单独一人会晤。至于美国，根据魏茨曼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者理所当然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尽力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对美国施加影响，特别是采用由他创造的、十分有效的“耐心外交”方法，即游说政府和立法机构中的头面人物。游行、请愿、决议、在报刊上请各界名流联合签名进行宣传、情绪激昂的抨击性演说和痛骂——所有这些可能会让犹太人觉得开心解气，但终究感动不了华盛顿。我肯定，魏茨曼整个战争期间都抱着这种想法。这使他既不同于以阿巴·西莱尔·西尔弗拉比为代表的守旧派，也不同于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原伊尔根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同盟。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激进分子相比，他的立场也过于温和。但他不是别人，是魏茨曼，他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最伟大的犹太人代表人物，任何事都不能没有他的参与。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绝不疏远丘吉尔和英国内阁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厌其烦地游说有责任感的人士。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贝尔福宣言才得以发表。魏茨曼的经验和个人性格，他的道德与政治信念，使这成为他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他身边的合作伙伴都支持他这么做——精明能干的纳胡姆·戈德曼忠心耿耿地与他并肩作战；还有路易斯·利普斯基；梅耶·威斯戈尔为他起草了大量报告，并在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充当他的使节；就连斯蒂芬·怀斯都出于对这位伟大领袖的尊重，把天性中原有的盛气收敛了许多。

必须承认，魏茨曼的论点在我看来似乎无可辩驳。赢得战争显然是大家共同的最高目标。在同盟国中挑拨离间既愚蠢又不义。犹太人问题，不管怎么说，都与英国有关。一旦战争结束，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会出卖犹太

民族事业。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替代英国。激进分子们的策略——包括采取激烈抗议（大规模的恐怖行为尚未听说）、提一些办不到的要求，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希特勒已经在家门口，这么做无异于疯狂和自取失败。至于美国的犹太人舆论，即便在政治上组织良好，全心全意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终究不会成为华盛顿的主流。罗斯福是大多数犹太选民心中的偶像；选票在选举年的确很重要——比如在1944年，但数量并未多到能够决定美国主要政策的地步。1940年他们对波兰人或波希米亚人的情感不予理睬就是证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究竟能否像印度或爱尔兰那样，影响美国舆论，这一点尚不可确定；到那时为止——我是指1942年到1943年，英国的批评者和敌人并未利用这根棍子来揍英国人。魏茨曼显然是对的：唯有靠渐进式的政治手段<sup>1</sup>，即施特雷泽曼在为魏玛德国制订外交政策时提出的渐进主义，这才是一个比天主教皇拥有的队伍人数还少的运动的唯一希望。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人也是这种想法。他们虽然没有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但总是给予它力所能及的帮助，像摩根陶、法兰克福特、本·科恩、赫伯特·莱曼及罗森曼法官等等。正是出于这点考虑，而不是由于胆小懦弱，或者害怕所谓双重效忠的幽灵缠绕心头，他们才会有一些肆无忌惮的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过分狂热或是无视真相，或是违反惯例，做出政治上有失体面的行为使美国政府难堪之时，采取退避策略。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美国犹太官员对此深有同感。我清楚记得，在华盛顿发生臭名昭著的拉比游行示威时，他们当时的反应。被此类哗众取宠的闹剧气得发怒的，绝不只有罗斯福。

根据1942年到1944年的种种证据，即便到现在，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立场。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件，改变了这一状况，并导致魏茨曼失去势力，这个谜只能留给未知同时也是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根据这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证明，我们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假定，以及由此做出的种种推论，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魏茨曼错了，而本—古里恩对各种力量的理解更到位。

1 此处伯林原文为：Erfüllungspolitik。——译者注

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与本—古里恩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谈得那么久，那么兴致勃勃，等我们从午餐桌上起身离开时，已经过了下午5点。一直到那时，我才从出租车司机口中得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刚刚在几小时前公布。我没有留下与一些著名巴勒斯坦的犹太领袖们的交谈记录——这些人包括大卫·本—古里恩、摩西·夏里特、依里亚胡·伊拉特等，只能依赖我根本靠不住的记忆。我的感觉是，本—古里恩一样也认为与英国建立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十分有利。但他和魏茨曼在好些方面截然不同：虽然他十分钦佩丘吉尔（主要不是因为他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高度勇气，像铁托和戴高乐一样，面对巨大机遇，敢于挺身而出，迎接挑战），但他不信任君王们，也不信任丘吉尔或罗斯福或任何其他温和派领袖或政党或国家。他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能够靠自己击退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至少暂时可以。他对美国犹太人的支持充满信心。广大的犹太百姓——不是指犹太领袖，那些人在他眼中都是没有信心和缺乏个性的人——只要激起他们对独立国家的想象，就会成为勇敢、得力的盟军，胜过魏茨曼可能成功游说或蛊惑的权势强大的政客们。

本—古里恩说这些话时，语气短促、急速、富有爆发力，不时地用沉默来强调说过的话。而他停顿时的沉默甚至更为有力，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沉思般的沉默，仿佛当时支配他的那种启示式的所见超出了他的表达能力。他认为，必须在各地调动犹太人的舆论，特别是在美国，这样就足够了。假如真正到了危急关头，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就会像1940年的英国人那样，知道如何奋起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外交手腕，即魏茨曼诉诸历史和理性的耐心呼吁，已是过时武器；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听听无妨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力图和他争辩：美国犹太人，即便不是复国主义者，都赞同移民巴勒斯坦，既是出于理想的动机，也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方法。他们知道国会绝对不可能为犹太难民打开美国的大门；在他们看来，不去做这种要求不是胆小，只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可是要建立犹太国家，能够召集起多少人来支持？在整个美国犹太人口中，全心全意的复国主义者只是少数。一旦美国政府，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宣布（这么做对他们

来说轻而易举),为了犹太民族所追求的目标,而与英国或阿拉伯人或两者争吵不和,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说犹太复国运动的压力使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处于极为难堪的境地,他们一定会畏缩不前。因为他们不想被人唾骂,说他们妨碍了美国政府,特别是那位伟大总统的政策,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极其钦佩这位总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他个人忠心耿耿。本—古里恩挥挥手否定了这个说法。让魏茨曼继续讨好罗斯福和萨姆纳·韦尔斯去吧,到头来这些人,甚至包括丘吉尔、斯缪茨和艾默里等久经考验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帮助犹太人,与之患难与共。小风小浪时也许还会助一臂之力,大风大浪时就别指望了。犹太人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在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大众的力量,才可能奋起捍卫自己,到头来犹太复国运动也只有靠他们自己。我辩解道,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过高估计了在美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过分依赖于此,然后失败,它所招致的灾难将使整个犹太复国运动倒退一代人。我们就这样针锋相对,来回辩论;根据战争年代的种种证据,我的论点似乎并没有不合理之处,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但事实证明它是错了。本—古里恩相信大众力量的论点,结果证明是有理由的。但改变整个局势的转折点仍然看不见,至少对我是如此。

673

我现在了解了本—古里恩的想法。1942年通过的比尔特莫决议成为一句对犹太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口号,也是在美国犹太舆论中间开始广泛宣传犹太复国运动的第一步,并在美国犹太大会上达到高潮。魏茨曼是这一切的总设计师。虽然对比尔特莫决议有关建立犹太国家的要求有很多种解释,但真正抨击它的只是一些反犹太复国运动的小规模团体。本—古里恩将它解释为“最高纲领”,在我看来无异于乌托邦:但是整个过程证明他的强烈信念在政治上并没有错。可在当时它是那么缺乏现实感,就像犹太复国运动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在四十多年前所说的那番富有远见的话一样。

与此同时,隆美尔军团在北非的失败似乎使巴勒斯坦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到了1943年,盟军步步推进,英国不再被围困。美国犹太复国主

义者抨击英国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集会上、报纸宣传中、各种人道主义和政治团体通过的决议里，总之在各种场合，斥责和痛骂之声日益高涨，这使英国当局越来越恼；这还只是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至于历来持反犹态度的国务院近东部就更不用说了。那些人坚持认为，这么做迟早会让阿拉伯人感到不安，从而危害盟军进行的这场战争以及美国和阿拉伯的友好政策。他们甚至试图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堵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嘴巴，不让他们公开发表观点。那份声明宣称，在中东地区建立定居点的想法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在那之前，任何政治上的要求都无异于火上浇油，给已经严重不安的局势上添乱——简而言之，就是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闭上嘴巴。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在华盛顿知名犹太人士当中，赞成犹太复国运动的情绪明显高涨；不论他们对建立犹太国家有什么看法，总之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反对白皮书，希望增加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数。这一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明白是症结所在。准备围绕这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的计划，被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得知<sup>1</sup>，后来该计划遭到封杀，让一些英国和美国官员十分恼火。据传闻，是亨利·摩根陶、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伯纳德·巴鲁克所为。美国有那么多压力集团，却单单谴责犹太人，他们对此深感气愤，才从中干预，制止了这一计划。

回想起来，我曾经试图向使馆上级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犹太复国运动在结交朋友和影响华盛顿的官员们。在美国政府上层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构想表示支持，不管国务院的那帮官员会怎么想。老一辈的新政派政府官员中，一些人甚至异想天开，想到百万犹太移民，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精力和技术，想方设法，通过在巴勒斯坦改造湿地，以及将干旱贫瘠的土地变为良田等途径，有望从社会上和经济上改变整个中东地区。一些大胆周密、规模宏大的计划，包括治理约旦河、引入水栽法、开发南部内盖夫地区等等，都有助于进一步开展更大范围的水利灌溉、电气化及森林再造，同时还能开创许多新兴产业，为那个地区的所有

1 上文第525页注2。

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新生活。在个人层面上，萨姆纳·韦尔斯让每个来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同情并支持他们的政治目标。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也一样，他也许的确无足轻重，但多少反映了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美国统治阶层开明并越来越宽容的态度。魏茨曼对此也有同感。他一次次清楚表明，已经准备好与阿拉伯人谈判，只要英美外交为此铺平道路，并且明确表态，犹太人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无需讨论。他认为伊本·绍德可能会乐意帮忙（结果证明这完全是错觉），一旦阿拉伯人感觉到英国并不是坚决站在他们一边，也会愿意作一些合情合理的让步。那时，魏茨曼一定已经听说了英国内阁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讨论新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我记得他曾经问过我，白皮书有没有可能废除。当时我并没有像他那样听到任何有关重新划分的风声（他没有对我提起），于是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英国政府有什么要改变巴勒斯坦政策的迹象。那时他明显不太相信内阁的讨论，到了1943年年中，他显得非常失意，情绪低落。我感觉只要麦克迈克尔政府继续统治，他整个人就显得潦倒失意。在他看来，英国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关系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更加剑拔弩张。二十年前，他与赫伯特·塞缪尔便存在分歧，如今却叹息那时的美好时光不复再来。

关于犹太复国运动的进展，我从朋友纳胡姆·戈德曼那里得到的印象 675  
乐观得多。这段时间里我常与他见面，这位精明而有教养的朋友时不时会告诉我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和态度，我再把这些信息尽量传递给同事们。倒不是透露什么机密，只是他的见解<sup>1</sup>十分吸引我。他当时是华盛顿犹太事务局的一个代表，除了我，还经常与两三位使馆官员见面。他待人友好，感情奔放，性格善良，加上颇有魏茨曼之风的见解，使他们在他们眼中，比动辄电闪雷鸣、面目可狰的克利夫兰的西尔弗拉比可爱得多。他们个人并不认识这位拉比，但他偶尔会要求会见哈利法克斯勋爵。我本人也一样对戈德曼讲述的内容和令人振奋的语气十分着迷，记得他的说话口气的确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力。我记得自己曾经力图向同事描述一种鲜明对

1 伯林此处原文为：tours d'horizon。——译者注

比：一方面是即便最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他的合作者们，在华盛顿听到赞许鼓励之声后所表现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另一方面则是英国政府的拖延战术，这是我们所有使馆人员必须要表现、外交使团人员必须要贯彻的。这在我看来，这是基于一种继续对现实局势置若罔闻的态度。犹太复国主义者心里很清楚，即使他们从外交部或各使馆得不到多少满足，仍然有丘吉尔这位坚定的朋友；虽然他目前因为全身心专注于赢得这场战争，可能帮不上大忙，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据说，每次当一些惊愕不已的内阁大臣们责备他讲话不够慎重，不该对一些来宾——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扬·马沙利克，或斯缪茨，甚至魏茨曼本人——公开流露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时，他总是立即否认，然后以他特有的风格加上一句：“我当然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他也没有权利转述这种话，不过老实说我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这类趣闻经常传到我们耳中。因此，我们判断，罗斯福总统也一样，一定也对那位伟大的、受人尊重的老共和党政治家和《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尤金·梅耶说过，丘吉尔和过去一样不赞成白皮书，罗斯福本人也是这个态度；他希望犹太人更加信任他——他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在战后让阿拉伯人与他们言归于好。那时，魏茨曼的副官们已经听说英国内阁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讨论新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斯缪茨和艾默里以及一些劳工大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都很赞同在巴勒斯坦划分犹太自治区的想法。外交部或许会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丘吉尔不会允许经过内阁和议会通过的计划再次遭到破坏，就像均等分治方案的命运一样。我的同事们，虽然我不时会让他们注意这些事实，至少在谈话中，但他们觉得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并不太感兴趣。的确，在其他大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它或许真的好像算不了什么。我不知道对犹太复国运动深恶痛绝（总体而言）的外交部到底怎么想的。就像所有国家的外交部一样，他们似乎只关心如何平息激烈情绪，回避尴尬问题，等待内阁做出迟迟不来的决定；与此同时，小心翼翼，防止言行失检，一旦捅出漏子，则力图消除后果。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魏茨曼和夏里特与

本—古里恩就经常意见不合。有时甚至关系相当紧张。西尔弗去见哈利法克斯，却不告诉怀斯和戈德曼在他那里到底讨论了什么，他们也很不高兴（不过任何了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人都能肯定，对一个他认为无关紧要或靠不住的想法，不会做出哪怕一点点重要的表态）。夏里特常常语气刻薄地批评美国犹太人情感淡漠，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专职的官方代表，仍然没有在美国犹太人身上收到充分的效果，他们对英国或美国官员中他们的敌人策划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抱负的阴谋，似乎毫无觉察。在我看来，我的同事们根本不关注1943年到1944年间华盛顿和其他各地的政要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抱负日益加大的支持态度。政府中亲阿拉伯的小集团不可能再大行其道；韦尔斯、斯退丁纽斯、维南特（当时他是驻伦敦大使），也许（据说是这样，但没有任何真实证据）甚至包括总统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都对国务院华莱士·穆雷和其他怀有同样心态的亲阿拉伯官员们的观点和活动持不赞成态度。从具体数量来看，参议员、国会议员及其他名人并未发表或通过很多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和反对白皮书的讲话或决议，可是，即便他们只是表现出一些善意，无需其他，便往往能够阻止官员们做得太过分，因为他们害怕在国会或报刊上受到指名道姓的攻击。

伦敦也出现了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迹象。据说丘吉尔本人就曾亲自对魏茨曼说过，他不久就会“在巴勒斯坦的馅饼上挖一块大梅干”给他，而且参加会谈的艾德礼并未表示异议，虽然他的确对美国过多的犹太压力感到不满。我们还听说艾默里曾向魏茨曼确认，一个新的分治方案——甚至比原先那个均等分治提案更受犹太人欢迎——已经成熟，很快就会由内阁呈送给他，诸如此类。不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行动，特别是被海外不负责任的激进分子怂恿激发的行动——其中一部分激进分子来自巴勒斯坦——据说的确很让罗斯福总统恼火，特别是他们动员了共和党的反对力量来跟他这届政府的政策唱反调。此外，就连本来很友好的政要，如斯退丁纽斯，似乎也同意了英国军事当局的想法，认为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可能造成让阿拉伯人不安后果，这很危险。的确，西尔弗到处跟人说斯退丁纽斯叫他把马勒住些，别跑得太快，起码等到盟军对欧洲发起



进攻。但这仍然只是什么时候允许扬鞭快跑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跑的问题。这些传言，以及根据这些传言做出的推断虽然令人颇为怀疑，但即便它们是来自乐观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过分乐观的判断，也多少说明了他们在外交上的进步。然而，巴勒斯坦并不处于关注的焦点，没有必要把这些传言当真。我的工作呈现整体美国公众舆论状况，各方面都要反映。我发现，在描写华盛顿权力斗争时，有时使用一些讽刺挖苦（偶尔还可以带点不客气）的口气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描写名人政要的时候。这种风格很受大家欢迎，个别一本正经、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上司除外。尽管如此，在实质内容方面，我始终认真求实，做到尽职尽责。

### 三

从1943到1944年，魏茨曼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尖锐激烈的宣传活动越来越感到不满。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怀斯和西尔弗极尽渲染夸张的喧嚣之声日益升级，特别是西尔弗，在魏茨曼看来，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只会使在伦敦的施压和游说工作更加困难：它甚至激怒了伦敦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们，对他们的政策起不到丝毫效果。比如摩西·夏里特，就关切地注意到这些策略对美国公共舆论没有什么影响。虽然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新闻记者如埃德加·安塞尔·莫瑞尔、多萝西·汤普森等写了大量文章，另外在《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上也有批评者和反对犹太复国运动者写的反击文章，公众舆论依然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行为只是进一步加深了英国和犹太人之间的隔阂。魏茨曼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甚至可以说致命的倾向。我记得曾与西尔弗谈过这点。我问他，是否认为对英国政策的这些抨击不会适得其反？攻击过分激烈，到了激怒对手的地步，却又无法令他改变政策，这种攻击有何用处？无效的制裁能起到什么作用？他是否认为如果罗斯福在1944年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还会像目前表现出来的那么友好？我不记得西尔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想他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保持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势头。至于与英国的关系他留给别人去考虑。毫无疑问，英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直言无

害,尤其是在如此精妙和有抵抗力的有机体内。这点我同意,就像常常同意魏茨曼说的话一样。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用害怕美国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集团,他们只是一群虚弱无力的老鼠,企图在犹太复国主义大猫的脖子上挂铃。可是,如果美国政府清楚表明不准备在犹太人问题上与英国翻脸,难道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真的准备公开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政府吗?

我始终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巴勒斯坦问题与印度问题或更早一些的爱尔兰问题不同,它一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并非关键问题。一些人将此归因于犹太人社会中有影响的团体,说他们胆小懦弱,不可救药;另一些人则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是美国广泛的反犹力量;还有一些人认为,与阿拉伯在石油和其他大企业等方面保持友好关系涉及在中东地区的利害,因此也对政府和公共媒体产生了影响;再有就是归因于随之而来的恐惧,害怕一旦美国干涉世界那一地区的事务,它就可能,或者说被迫派出军队实施抵抗反阿拉伯力量的政策,这是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决不会拥护的。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在我眼中这是事实。1944年初,我开始相信,西尔弗、纽曼等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过高估计了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在这里,人们尽可以邀请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及知名开明人士签署信函和请愿书,发起决议,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等,以这种方式阻止政府部门中一些反对势力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言论,但这些活动效果有限。那时候,很少有政治方面的民意测验,但是报刊上的调查、英国领事馆和其他部门官员撰写的报告、旅游杂记、参议员们对本国民众情绪私下随意发表的见解,以及整个华盛顿各处听到的议论,似乎都在表明:1944年间的美国公众舆论,总体而言,并不太关注犹太复国运动,虽然表面情况恰恰相反。就美国人的总体反应而言,我认为,外交部没什么可担心的。犹太社会内部的舆论当然另当别论。就战争时期的局势判断,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个印象准确无误,虽然这一观点中隐含的某些内容最终证明有点误导。总之,我相信它的正确性,并四处宣传,不分时机、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论是私下还是公开,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还是后来。

1944年夏初时节我在伦敦。当时美国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抨击，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持久不息的谩骂攻击运动。英国报刊调查，或许还有一些英国通信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情况，引起伦敦政府部门的极大恼怒，其中最为在意的倒不是关心中东局势的部门，而是负责英美关系的部门。于是，思想开明、绝非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官员们在勇气感的驱使下，积极开展有关工作。如果说存在正义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所有战争中最为合理正当的：他们努力证明，盟军的胜利关乎犹太人的利益，这一点至关重要；盟军之间的不和只会损害大家的共同事业，甚至可能拖延胜利日的到来；此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指控虚假不实，对英国是很大的侮辱。在伦敦的美国人，包括官员和新闻记者，纷纷表示，只要英国人决定对美国的报刊和广播发起反攻，他们会予以支持并提供具体帮助，因为他们认为，仅仅靠自我辩护不够有力。他们不愿直接参与和美国犹太人的公开战争，但提供这些帮助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些中东地区的美国观察家发回报道，称犹太巴勒斯坦已经成为军事化的、近乎极权主义的集中营。还有一些美国新闻记者和官员，尤其是在开罗的那些，他们本来就拥护阿拉伯事业，将犹太人视为该地区的干扰因素。这些人同情英国所处的困境，必定会出面反击这种只能称为反英犹太复国主义攻击的行为。在美国犹太人当中，难道没有同情支持这一行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至少也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吗？对此我什么看法？

我理解正派、爱国的英国人的情感，其中一些人对白皮书深感羞愧，如同对慕尼黑事件一样。在他们心目中，英国正处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同样也为犹太人的生命而战的关键时刻，犹太人本来应该是最不可能诋毁英国声誉的人。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要不是英国，他们的事业将完全没有政治现实感：人们这样问我，不论他们多么仇恨白皮书，怎么能够如此口无遮拦？因为，倘若不是英国，巴勒斯坦早就落入纳粹分子的手中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解释说，就美国的公众舆论而言，他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印度、远东，或对帝国主义、英国的阶级结构、欧洲的未来发展的兴趣。依我看来，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起不到帮助

英国的作用。非犹太人的舆论不需要它；至于犹太人，只要白皮书继续生效，广大美国犹太人就会继续毫不宽容地抵制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且 680 不论他们各自对建立犹太国家有何个人看法、怎么考虑，只要涉及移民问题，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团结起来，不管报纸广播说什么都不会分开。只要巴勒斯坦政策没有改变，他们与英国之间的鸿沟便不可逾越。就连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都不会去阻挡这股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洪流，哪怕仅仅是出于害怕被人指责对自己的同胞缺乏感情或不够忠诚。在移民问题上，除自我利益保护因素以外，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充分表达了自己深切诚挚的犹太情结。对美国新闻记者的报道，一些人可能确实会担心，因为报道中提到受到严苛训练的犹太人定居点组织，还说他们正在组成秘密地下军队准备对抗英国和阿拉伯人，等等。但是，对整个白皮书政策的同仇敌忾激励了所有人。假如英国政府坚持它的立场，就别指望广大敢说敢言的美国犹太人能够平息激烈情绪。假如政府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永久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国家，要想在美国捍卫它，只能靠不断派遣特使，英国人或者阿拉伯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有影响的地区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辩护，但肯定每到一处，都会与犹太人发生争执——所有犹太人，除了顽固不化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这些人尽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只要它准备朝着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向有所改变（如在伦敦和别处不断传来的消息所透露出的），只要它希望美国在这方面予以支持，它就有任务要完成。美国一般舆论或许持中立态度，但那里不乏地位很高、极具威望的犹太政要和知名人士，特别是在华盛顿，而且对白宫和国会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新的计划确实公平，能够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低要求，这些人士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防止英国政府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公开不和。假如英国政府根本对华盛顿局势不予考虑，便出台新计划，那么，要是它又没有满足他们的正式纲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定会奋起抵制，就像抵制1936年到1937年间的均等分治方案一样。那样的话，该计划就会存在真正的危险。也就是说，虽然它最后也许会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基本要求，却可能就此陷入一种可怕的相互指责的动荡状态。犹太人一样会失去英国，不

仅如此，双方还将为此遭受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但是这项计划出台之前，如果非正式地征求过那些品德高尚的人的意见，像财政大臣亨利·摩根陶、最高法院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纽约州赫伯特·莱曼州长，还有本杰明·科恩，这些人曾经帮忙起草过原先的巴勒斯坦托管协议，以及另外一些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犹太人；如果这项计划得到他们的赞许甚至只是默认，那么犹太人的舆论，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稳健派的舆论，出于对这些经常与魏茨曼保持联系并且接受了他的立场的杰出人物的尊重，至少会从一开始对新计划予以赞许。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在白宫、国会和内阁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能够左右美国的公众舆论，他们的力量远远胜过全美国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如果这些人肯站出来，也许会达成稳健派认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到那时，被孤立的只剩下最激进和坚决不妥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将避免英国和犹太人之间产生破坏性的冲突，缓和伦敦日益加重的烦恼和愤怒情绪。因为那里正在打一场在他们看来纯粹是由谎言和诽谤构成的战役，而这场战役旨在向一个正在与犹太人的死敌决战的国家发起攻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既然英国和犹太人都注定要并肩走过巴勒斯坦（这是老魏茨曼的论点），这也能使这一错综复杂、有时令人痛苦的进程变得容易轻松一些。往这方面发展，在我看来，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极为有利。单单依靠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犹太兵团通过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让美国政府压倒英国的反对意见，从而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主权国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我记得曾经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过，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力量表面强大，实则不然。那次会议由谁主办是谁我忘了，就连具体日期恐怕也记不得了。如今能想起来的只有听众中包括贝尔福的侄女，她名叫布兰奇·达格代尔，是位传记作家，也是一位狂热的著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别人告诉我（具体是谁我也忘了），她形容我的讲话“傲慢，厌世，不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说的话”。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刻薄话令我深感吃惊。前两个形容词或许还情有可原，在谈到美国犹太复国运动过分

依赖一些靠不住的同盟时，我分析了它们的动机和本质，当时的态度可能有点蔑视，引起她的不满。可是，说我“说话口气一点也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触及了我的痛处。我的目的是想就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做一个实际的对比：一方面是整个美国的大致状况，另一方面是华盛顿和纽约的犹太社会和犹太圈子的情况。我的观点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那些久经考验的朋友们完全相同，诸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霍勒斯·卡伦、莱茵赫尔德·尼布尔和查尔斯·韦伯斯特（战时有一段时间他在纽约）等。再有，不论我说的话对错与否，里面都包含了我对犹太复国运动命运的深切关心，而不是相反。我把自己的委屈对刘易斯·纳米尔说了，他是布兰奇·达格代尔的挚友之一。他说我所讲的与他的印象不谋而合，尤其是，我好像记得，在提到华盛顿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哗众取宠的滑稽行为和他们的道德水准效果恰好其反这一点上，他说他同意我的分析，并认为令达格代尔夫人吃惊的是我过于讽刺挖苦、不带感情的超然态度。毫无疑问，纳米尔用充满个性色彩的语言总结说，四年的使馆生活确实容易使人个性丧失、感情僵化。纳米尔似乎话中有话，意味深长。他向来如此。无论如何，除了1947年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为时一周的马歇尔计划大会外，我再没有为政府工作过，而是带着轻松安宁的心情回归到个人生活。

682

我坚持认为，仅仅靠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不作任何努力，不尝试与同情犹太复国运动目标和理解犹太人所处困境的人进行谈判商议，注定要遭受失败。任何想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决议，如果其中真的包含什么锋芒，必定会遭到罗斯福总统政府的阻扰。到了1944年末，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马歇尔将军和国务卿赫尔就曾在国会否决了一项强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曾遭到激烈抵制，这都暴露了其传统策略的低效无能。在我看来，唯有回归魏茨曼，开展平静耐心的谈判，才是唯一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在这段时期，或任何其他时期，在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中发挥过任何作用。我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只是偶尔同政治活动家、行政官员和政府顾问等见面，有时会聊起巴勒斯坦问题。一些杰出人

物,例如克兰伯恩勋爵、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列奥·艾默里、梅纳德·凯恩斯、威廉·帕特希尔爵士(当时在殖民部),还有乔伊特勋爵(时任战后计划负责人),都很好奇,倘若“更改”白皮书内容(只有艾默里说过彻底废除),新的版本是否就不会遭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反对?如果这样,新政策有没有可能比旧的更糟?魏茨曼如果接受,美国的“激进分子”会不会将他轰下台?对这些问题我无法给予明确回答。我会强调魏茨曼在整个犹太世界中独特的地位,特别是在美国;并且认为,只要他能够不失尊严地同意考虑某个计划,至少可以建立起对话的基础,目前恰恰缺乏这样一个基础,在对话的过程中,他的影响力或许能占优势。他们必须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我必须声明,我是英国官员,不是犹太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们认真的,应该找别人,比如一个有足够社会地位、深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尊敬的英国犹太人,像摩根陶和法兰克福特那样的,他们既同情和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又是彻底的亲英派,他们的观点显然富有价值。就我所知,我的建议没有任何人接受。事情就这么继续着,或者说停滞不前,和以往别无两样。

683 这些交谈和想法都基于我自己的假定,其中一些比较客观,很多人都表示赞同,但其他的显然流于主观。两方面我都想说说。首先我必须设法再现当时的心态,尽量避免事后聪明的歪曲性影响。对英国发自内心的忠诚当然表现在我的态度中,毫无疑问,即使我不是政府官员也一样。此外,在所有考虑中,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始终高于一切。白皮书是一份极不公正的文件,它导致了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没有犹太人对此表示怀疑。不论是国家利益还是亲阿拉伯人的情感都不能成为单方面放弃托管权的理由。这项决定似乎等于在广大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生死攸关的时刻,熄灭了他们最后一线希望之光。我无法指望我的同事们,不管他们多么慷慨仁慈,能够完全理解犹太人面对世界在难以置信的大规模血腥屠杀面前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时那种充满绝望的痛苦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当局对贯彻白皮书限制犹太移民政策的热情简直无异于穷凶极恶,令人毛骨悚然。然而,1940年,却是英国独自挺身而出,勇敢地面对希特勒,并且

单枪匹马，靠自己挽救了我们大家的生命；她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她的战争是整个人类反击有史以来最为凶狠残暴的敌人的战争；不论她有什么缺点——她的巴勒斯坦政策的确是求一时之便而做出的不光彩行为——也绝不应该受到被激怒的美国犹太人如此无休止、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谩骂。在我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同胞们开展的这场持续不断的损贬诋毁行动特别有失公正，而且极不负责，愚昧无知，效果适得其反，很可能只会引发愤怒和发自愤怒的愚蠢行为。

之所以提到这些主观感觉，是因为我毫不怀疑它们会影响我对局势的判断；我不希望自称为冷静客观的榜样。但是，即便主观反应能够多少解释这样或那样的预测或政策，只有靠魏茨曼及其追随者所做的假设中包含的客观判断才能证明这些预测或政策的合理性。其中四点特别重要。首先，只有在法国力量被极大削弱、丧失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英国才能继续成为中东地区的统治力量。而美国，不论经济野心有多大，都不可能有力在一个远离其传统影响范围的地区取代英国的政治职责，更不要说军事职责了。苏联根本不用考虑。因此，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的未来，以及更加可行的犹太国家的未来，都与英国的未来紧密相连。对此本—古里恩和魏茨曼都一样赞同。在这点上，亚博京斯基也持相同观点。 684

其次，与英国的联系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众望所归。犹太定居点的实际安全，肯定需要保护，以提防它的阿拉伯近邻。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近邻不太可能对定居点的创立持赞成态度。而倘若是建立犹太国家（或者是联邦，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喜欢这么称呼），情况就更是如此；它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仅靠它自己，甚至加上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都无能为力。此外，魏茨曼和那些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都希望能够既往不咎，捐弃前嫌；希望英国像过去一样，继续施加文明政治的影响，帮助一个不太具备冷静判断力或政治智慧，而且未能免除激烈党派纷争的社会；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英国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有时甚至令人很不愉快，但对双方而言，他们的合作却至关重要，不论是对英帝国的利益，还是对犹太人的民族生存。不错，殖民部（包括外交部）的官员们



往往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目中无人，妄自尊大，喜欢大声嚷嚷，易怒易躁，神经质，喜欢拉帮结派，爱搞歪门邪道，举止粗鲁，忘恩负义，瞧不起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极难对付，令人讨厌透顶。反过来，犹太人则认为英国总督们傲慢自大，行为冷漠，对人势利，自命不凡，误认为英国的政策对阿拉伯人不公，对此深怀内疚。他们公开偏袒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可怜无助，是邪恶的犹太人的受害者。对犹太人，他们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发起残忍攻击的时候，托管政府总是对阿拉伯侵略者做出让步，却惩罚受害者，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点令犹太人深感痛恨。白皮书便是这一政策日积月累达到的顶点。彼此之间存在的这些成见似乎很难让人看到未来能够进行有效合作的希望。尽管如此，合作还是要继续，因为实际上别无选择；所谓饥不择食。按照魏茨曼的观点，与英国结盟的好处就在于别无选择，这使它成为犹太复国运动不可缺少的基础。我认为本—古里恩也会接受这种观点，虽然热情可能不那么高涨。

685 再次，人们认为，实际上战争期间大家都这么认为（包括斯大林），战争结束以后，丘吉尔会继续执政，进入希腊历史上伯里克利式的全盛时期。即使不是永远，至少也会有一段时间。他是犹太复国运动全天下最强大最忠实的朋友。在他的领导下，犹太人最终会获得自己的民族家园。外交部会反对，但内阁和议会将表示出公正友好的态度——比美国国会或罗斯福要可靠得多。

最后，人们认为，至少魏茨曼的追随者都这么认为，单靠忍耐的外交手腕便可产生效果，就像在过去一样。动员犹太大众，不论多么成功，只能作为谈判的辅助手段，决不能代替谈判。因为此类声势浩大的集体压力行为根本起不到影响美国的作用，更不要说英国，让他们对传统目标产生动摇。至于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不管组织得多么严密，甚至有来自开明人士在人道主义感情上的支持，靠它自己终究还是战胜不了石油利益的诱惑和其他大财团的游说集团。没有政府支持，犹太复国运动或许会继续下去并逐渐增强实力，但很难强大到能够实现最起码目标的地步。使用恐怖主义暴

力手段的可能性,据我所知,当时尚未进入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的思维。

我认为这些是魏茨曼构建其政策的主要客观前提。这些假设引起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异议,最后一条本—古里恩也不完全同意;但是,犹太复国运动的稳健派核心组织,特别是美国之外的组织,却不无道理地认为,魏茨曼的观点体现了为人广泛接受的政治现实观;因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效框架,为古老的犹太人问题提供公平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虽然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事务考虑得很多,但它毕竟在我的职务视野中只占据了很小的一个部分。偶尔会有持犹太复国主义观点的朋友问我,白皮书政策还会持续多久,对此我不抱乐观态度。反过来,英国官员也想知道(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究竟强大到何种地步,我会回答它在华盛顿政界产生的影响比国务院愿意看到或希望相信的要大。它是代表犹太人舆论的唯一正面力量,并逐渐发挥支配作用。我就用这种办法,设法应对来自两方面的询问者,令他们无比扫兴。

我的英国和美国同事很少有人对犹太事务有兴趣,在他们面前,我想,自己必须保持原来的样子:一个稳健的魏茨曼追随者,一个坚信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建立友好关系的人。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起码对他们中的狂热分子,我则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妥协派,一位一心只关注如何捍卫自己国家、使其免受敌对势力进攻的英国官员,愚蠢地认为一旦英国与犹太复国运动完全决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就会毁灭,那么,能够为犹太人提供自治权,包括即使不能享有完全主权但很可能开放移民的解决方案,也比正面冲突好。这一点也不算歪曲我的立场。我把这些话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中的朋友说了,我觉得他们并不认为我完全错误。西尔弗没有提出异议。他信仰对抗策略,认为应该迫使美国政府抵抗英国而不仅仅是白皮书,要持续不断地抵抗,直到在整个西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我认为这是自杀性的狂热行为。马察达不是胜利。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粉碎了必须与英国建立特殊关系的信念所依赖的种种设想。目光比我锐利的人们究竟对所发生一切的根本洞察有多深,我不知道。总之,历史舞台发生了戏剧性的快速转变,就我

所知，没有谁预言过，甚至也没有谁曾经预见，转眼之间，那些希望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们的想法，如魏茨曼和他的追随者，似乎就变得陈腐过时，毫不重要了。但即使到现在，时过境迁，我依然认为，虽然我们的预测被后来的事件证明是错误的，由此制定的政策却正确无误，是那些激烈批评该政策的人误会了。假如魏茨曼同意参与某个有可能导致与英国公开决裂的政策，我相信，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政府的冲突。那么，犹太复国运动在战后时期为此付出的代价将十分惨重。正是因为怀斯和戈德曼在魏茨曼鼓励下对美国政府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针，尤其是在1943年到1946年，才为杜鲁门总统的政策铺平了道路。魏茨曼也许为他对英国人的信心付出了太大的个人代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失去了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但他挽救了整个犹太复国运动。当时假如没有他和他的政策，由于情况所迫而引起不可避免的双方实力的较量，很可能对犹太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魏茨曼经历过辉煌时期，就像本—古里恩也有风光的时候；两人都不可或缺。没有魏茨曼战时的那些政策，以色列国便几乎不可能出现。他在1944年的立场，当时我就完全赞同，至今在我眼中仍然光荣正确，可敬可佩。现在我还是回过来，谈谈改变了一切的那些事件。

#### 四

1944年末，莫因勋爵在埃及遭利凯组织，即西方称作斯特恩组织的成员暗杀。他是首相的老私交，为此首相心情极其难过，甚至可以说愤怒。在687 一次对下议院的讲话中，他用严厉、恐吓的语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诉诸恐怖手段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但是，我相信，内阁委员会继续在讨论分治方案。只有首相才能最终通过一项激进的新计划。但是丘吉尔似乎因为莫因勋爵被暗杀而有意疏远、拒绝会见魏茨曼，并将注意力从整个犹太问题上转移开去。几个月后，那时已经是1945年，他态度简慢地通知魏茨曼说，战争结束前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不会出台任何声明，也不会暗示有何结果。就丘吉尔来说，整件事就这么暂时搁浅了。在我看来，这是整个局势的重要转折点。

除此之外，在雅尔塔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似乎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稍稍提了提，两人的讨论没有记录。此后不久，罗斯福会见了伊本·绍德国王，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有关巴勒斯坦，他从这次短暂的见面中获得的知识比前几年的加起来还多。据说，在会面之后，他甚至还跟斯蒂芬·怀斯说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话。看来，政治事变或许真会让这个反复无常的大人物改变想法。至少他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如此。然而，他的私人随行当中一位我很熟悉的成员却十分清楚，与阿拉伯国王的谈话已经将罗斯福急剧地转到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向。即便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得到过他的支持，从那以后也失去他了。丘吉尔退缩不前，罗斯福又满怀阿拉伯情结，犹太复国运动的前景直转而下。

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去世。几个月后的旧金山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败。犹太复国主义者本来希望能够从工党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藉此平台夯实超级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但这个希望很快便被无情地破碎了。艾德礼沉默寡言，不太说话，许多年来一直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冷酷的反对派（虽然这点到他执政之后才清楚地表现出来）。欧内斯特·贝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及态度越来越恼火；克里普斯根本谈不上是朋友；道尔顿满脑袋想着其他事情；整个工党内阁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有能力站出来勇敢抵制这些当权者。即使罗斯福还活着，面对伦敦如此激烈的情绪，恐怕也无法逼着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最多只会故伎重演，用含糊其辞的泛泛而谈逃避责任，同时巧施手腕，不让美国犹太人的情绪过于沸腾。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犹太复国主义已逐渐成为唯一一个号召力堪与罗斯福个性魅力相媲美的事业。一旦他流露出一愿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将会极大扰乱犹太人的情绪，并可能导致美国犹太社会的分裂。

688

此外，还有三个现象在我看来改变了整个事件进程。首先是那些亲眼目睹了德国和波兰死亡营的人的体验。在达豪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无法形容的恐怖印象。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数字与日俱增，使他们的犹太同胞不寒而栗；但他们还是抽出时

间，潜心思考人类良知。很难相信这些数字是真的；2000万或更多的俄国人死亡，谁知道战争中交战的双方还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极端破坏和蹂躏整个世界想象力的不是那些数字，而是亲眼看到集中营里那些已经死去和即将死去的人们，看到照片和影片中那些骷髅和瘦骨嶙峋的尸体、肚子鼓起的孩子，以及人类拥有的财富被践踏得稀烂的凄惨景象。一股夹杂着恐惧、怜悯和愤怒的巨大人类情感浪潮顿时席卷了整个地球。这种情感甚至比在抵抗运动中受到严刑拷打并惨遭杀害的烈士们引发的感动来得更深沉。对难民，对无家可归的人，尤其是对犹太人，对他们绝望地寻求一个永久家园，从而不至于被人像牲畜一般随意驱赶，或是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被充满敌意的居民赶尽杀绝的同情之心——替他们感到愤怒并对他们产生关爱热情——一时间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纳粹曾经占领过的欧洲国家居民当中，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也一样高涨。虽然它与贝文和他的官员们擦肩而过，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英国的公众舆论倾向。1945年到1946年间英国政府否决了英美委员会关于移民问题的提案，令自由主义者深感失望；贝文不加掩饰地怀疑杜鲁门总统支持该提案是出于玩世不恭的动机，这种说法令总统大为恼火。打开通向巴勒斯坦之门，挽救大屠杀的幸存者，似乎是为一个大冤案昭雪的最起码的开端。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许多非犹太人单纯出于与惨遭欺压的受害者的团结之情，怀抱同情之心，为非法犹太移民提供帮助。贝文及其顾问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终于激起人们对其政策的强烈反对。要不是他们蛮不讲理，本来不至于如此。“出埃及号”客轮事件激怒了全世界，但是把难民交还给德国的决定不过是以最为臭名昭著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一贯态度。这是导致1948年联合国决议的事件之一。外交部完全低估了战后那些年里愤怒的自由开明之士的情感力量和内涵。阿拉伯问题并未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得到单方面处理；尽管阿拉伯代表在纽约成功湖以及世界各地的首都提出抗议，但犹太人所受的冤屈，尤其是移民问题如此抢眼，与它比起来，任何其他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改变整个局势的未预见突发因素当中，死亡集中营和贝文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拙劣行为是其中的两

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巴勒斯坦本国犹太恐怖主义的兴起。自由民主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不可能产生长期持续不断的反恐行为，这点上与专制国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此类事总是发生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肯尼亚、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阿尔及利亚的缘故。犹太国家军事组织、斯特恩武装部队甚至防卫队的行动所导致的噩梦感，显然在英国放弃巴勒斯坦的决定中是一个即便不起决定作用，却也实际存在的因素。

这里我扼要重述一下。丘吉尔因为莫因勋爵遭暗杀内心产生怨恨，英国内阁的分治方案被束之高阁，一直到战争结束。丘吉尔大权旁落。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大大减少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纳粹死亡营的恐怖景象改变了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的舆论。艾德礼和贝文全面实施白皮书政策，规定任何新方案的出台都必须以阿拉伯人同意为前提，就此关上了所有面向犹太人的大门。这一举动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稳健派一夜间变为激进分子。到了1947年，我们大家：魏茨曼和西尔弗、法兰克福特和伊曼纽尔·纽曼、戈德曼和本—古里恩，以及那些左派和右派——更确切地说，每一位对犹太复国运动哪怕只有一丝丝同情的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1946年，工党政府断然否定美国同意10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提案，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工党政府政策的全面抵制。身强力大的古犹太人领袖参孙，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痛苦地将整个非力士人的神殿摧毁，压死了自己和压迫者：我记得这是魏茨曼在极度绝望之时对我说过的话。或许如孟德斯鸠所言，缺乏普遍诱因，微小的变化无法带来大的改变。但是，同样地，这些偶然发生的不起眼诱因，只要时机成熟，也可能导致局势剧变。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谁也不曾在1944年预见到欧内斯特·贝文和哈里·杜鲁门在以色列国诞生中所起的作用。要不是因为贝文的一意孤行、杜鲁门个人的善意以及他们的主要顾问在政治上做出的错误估计，整个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这甚至可以说是我讲述的整个事件的主要寓意。

大家如今都明白是杜鲁门总统拯救了犹太事业。选票在他的决定中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初他并未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态度，而且那么长时间未见他有任何表示，又到那么晚才采取行动，这些

690 都说明有关他改变看法是为了争取犹太人选票的猜测站不住脚。杜鲁门雷厉风行、迅速决断的能力，以及与那位伟大前任事事总想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的做法截然不同的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在战时负责杜鲁门委员会期间，有关原子弹、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召回麦克阿瑟将军等种种决定，杜鲁门都是只要认定正确路线，便下定决心，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认定道义在“那位老博士”（他总是这么称呼魏茨曼）这边，而不是其对手。他认为他关于犹太国家，关于内盖夫，关于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想法都有道理。这一点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整个局势发生逆转。新总统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这位老资格领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不顾自己身边幕僚们的种种反对，坚决予以支持。这是魏茨曼所做的最后一个伟大贡献，或许与他三十年前巧用计谋，为自己的人民做出的贡献一样伟大。

到了这时，我的另一个强烈疑虑——那个令达格代尔夫人大为震惊的看法——在事实面前被证明毫无根据。美国犹太人口如此壮大，如此团结，如此勇敢，是我原先怎么也想不到的。战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对整个公众舆论也许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确实让人开始关注美国犹太人。即便在美国势力很大的政治领袖们，如詹姆斯·福雷斯特、马歇尔将军、狄恩·艾奇逊及其他总统信任的顾问的反对下，也始终没有动摇。在这点上，事实证明，本—古里恩的直觉相当准确。正是靠美国犹太大众的热情以及犹太人定居点自身的严明纪律和实力，而不是靠我过去始终坚信的与英国结盟，才起了决定性作用，营造了合适的氛围，促使巴勒斯坦委员会成立，英国重新评价其战略地位并抛弃巴勒斯坦；促使联合国为此投票通过，赢得1948年之战的胜利。

可是，假如莫因勋爵没有被害，假如丘吉尔战后继续当政，假如英国提出一项新方案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至少被魏茨曼及核心成员接受，并于1945年实施，假如英联邦为新国家充当保护伞，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对获得胜利的英国发起进攻？犹太国家军事组织是否会试图发动内战，本—古里恩是否会加以阻止？这样的事态发展是否能够避免流很多血，能够防止

很多痛苦,尤其是以色列国家必须日日经受的困扰处境?反过来,或许也可以问下述这些是否可能发生:本—古里恩会不会起德瓦勒拉的作用而魏茨曼充当格里菲斯,或是起马志尼的作用而魏茨曼充当加富尔,而且只会更加成功?摩西的身后是否一定要有约书亚式继任?我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假如艾德礼接受了英美委员会1946年的建议,以色列国家能否诞生;或者如果诞生,它是否会成为英联邦的一员;即便联系纽带松散,必定还是会出现在国防、财政和外交政策上失去独立性的问题;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或是结束(比如在西非),而不引起叛乱吗?假如果真如此,阿拉伯人会不会默认英国人的这一行为,就像魏茨曼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一个民族能否靠他人施舍诞生,或者在这个具体事例中(用摩西·赫斯的话),靠他人施舍从坟墓中崛起?以色列国是否将它的生命力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英雄与烈士们的鲜血赢得了独立?到头来,结果是否圆满?

691

这些也许是无聊的思索。但这未曾实现的各种可能,却正是我和雅各布·赫佐格经常在闲暇时分长时间讨论的话题。我记得,他也一样认为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必然。只要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少一点盲目,就能更好地理解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它所经受的折磨和巨大痛苦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可以相比;它的道德要求似乎在可怕的大屠杀之夜后那个短暂的黎明才为所有国家所认可;假如情况果真如此——实际上在当时那种背景和氛围下,这种推测并没有显得太不现实——那么,事情的结果是否会对大家都更有利?但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我所讲述的1942年到1945年的希望和恐惧如今只是一份历史记忆。魏茨曼的追随者们——那些核心成员,我自己也算得上其中一个——他们的信念和政策是否真的犹如昙花一现,建立在流沙之上,这点现在要由历史学家们来评说。一位著名的英国大主教曾经说过,“事物和行动是现在的样子,结果则将是未来的样子: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希望被欺骗呢?”<sup>1</sup>魏茨曼,还有追随他的我们,是否都被欺骗了?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如本—古里恩和那些激进主义分子,他们

1 约瑟夫·巴特勒,《在罗尔斯教堂的十五篇布道词》(伦敦,1726),第7篇,第136页(第16节)。



的预言是否属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导致他们所预言的结果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倘若如此，是否这就是所有预言的本质？与其说是客观预测，倒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面对世界的积极态度，致力于大变革的献身精神？比起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这些致力于此的人们是否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了未来的景象？对这些问题，我无法提供答案。我努力做的，只是把战争期间在英国和美国政策的背景下，以及战后两年内整个局势发生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自己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持态度的印象同大家分享。

692 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是一个独特而非凡的民族，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历史与绝大多数深受追捧的著名历史因果理论相抵触。我、赫佐格和以色列教育部长扎尔曼·阿兰三人过去每次见面，总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在任教育部长的朋友去世之后，我们仍在继续探讨这些话题，并带着挚爱和敬仰之心追忆老朋友。如今，连雅各布也去和他的先父们相聚了，剩下我一人，以赞美之心<sup>1</sup>，在此颂扬和追忆我的朋友雅各布·赫佐格。

雅各布（雅可夫）·赫佐格（1927—1972），拉比、法律专家、学者、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以色列四任首相顾问。一位（爱尔兰，之后巴勒斯坦/以色列）大拉比之子，一位未来以色列总统的兄弟。在伯林的记忆当中，他有“冷静、敏锐和强有力的大脑，纯洁、热情的心灵，高尚的品格以及淳朴、安宁的道德观。所有天性敏感的人，在面对公众生活中的问题时，迟早都会引发内心

693 冲突。是这些品质给了他力量与保护”。<sup>2</sup>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zikhrono livrakha。

2 摘自《雅可夫·赫佐格：颂辞》，以上演讲稿公开发表版本的序（耶路撒冷，1972），第3—6页，在第3页；在收入米莎·卢维奇主编，《独自生活的民族：雅可夫·赫佐格演讲文集》（伦敦，1995），第14—15页，在第14页。

## 补 注

以下注释(后来增加或之前误置的信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放入,但前文相关词条均已标明与此处参照。(页码已转换为中文本相应页码。——中文编者注)

第105页 约翰·盖尔韦·\*福斯特(1904—1982), 律师兼史学家; 1924—198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1939—1943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法律顾问, 后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法律顾问; 1945—1974年任柴郡诺斯威奇保守党议员。

第189页 该唱片中的曲子(题为“音乐组曲”, 奥迪安(Odeon)公司166.015号, 10英寸每分钟78转速光盘)由法国幽默作家、严肃作曲家贝托夫(其真名为迈克尔—莫里斯·列维)(1883—1965)创作、演唱, 并由他自己钢琴伴奏。伯林将《恐惧、悲伤、在劫难逃》误记为瓦格纳所作。其他经贝托夫改编的作曲家有马斯内、德彪西, 雷纳尔多·哈恩和罗西尼。

第237页 爱德华·哈雷特·卡尔(1892—1982), 历史学家兼国际关系学者; 1916—1936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 1936—1947年任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学院国际关系威尔森讲席教授; 战时为《泰晤士报》撰写报道领导人的文章。主张英国与其他强国结盟; 进而在1930年代支持绥靖政策, 但后来转为拥护苏联。

第263页 亨利·路德维格·亨德森(1880—1963), 古典学家, 1905—1945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兼教师。1963—1964年新学院年鉴(第2—3页)上有关他的讣文值得一读。其中一句为, “作为一名古典学者, 他属于一个早已消亡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 学生的句法错误或韵律错误被视为道德败坏的体现。”

第638页 吉尔斯·阿林顿(1914—1956), 西瑞尔·阿林顿之子; 1944—1956年任大学学

院历史讲师，1945年任学监。他是40和50年代大学学院生活的中心，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夫人玛丽曾以他的名字将他们的儿子起名为吉斯。

约翰·赫伯特·塞弗恩·怀尔德（1904—1992），1933—1945年任大学学院牧师兼研究员，1945—1951年任院长，1951—1973年任达勒姆学院学监。1940年，一名精神错乱的本科生用一把借来的来福枪，从主方院他的房间里向午饭饭后走出大楼的人群扫射。那天上午这些人早餐时刚与他进行过激烈辩论。一名学生身亡，另有两名受伤。怀尔德勇敢地走上楼梯，面对行凶者。所幸那名本科生自愿投降。战争期间，作为唯一一名没有主动参战的年轻研究员（他心脏不好），怀尔德使学院得以维持下来。阿林顿与怀尔德两人在学术上都不是特别出色（如伯林所言），却在认识他们的人心目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大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这些身兼牧师职责的人。

所谓“耶稣学院的非国籍化”，伯林指1944年弗里德雷克·奥吉尔维爵士当选院长一事，他是苏格兰人，与该大学忠于威尔士的传统相背。

第658页 鲁道夫·赫斯（1894—1987），纳粹党中希特勒的副手，1941年5月空降至英格兰，自自主张企图充当说客，让英国和德国议和，以共同反对苏联。余生被关押。

第678页 大概指亨利·圣劳伦斯·贝福特·摩斯（1896—1960），新学院毕业生，撰写了《中世纪的诞生：395—814》（牛津，1935）一书。

第712页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1934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38—1953年任苏联秘密警察（NKVD）及后来各种警察组织的头目。1941年任副总理，1946年起任政治局成员，冷酷无情，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实权人物之一。斯大林去世之后，在激烈的权利斗争中失败并遭处决。

# 年表：1909—1946

塞雷娜·摩尔和詹妮弗·霍姆斯汇编

- |               |                                     |
|---------------|-------------------------------------|
| 1909年6月6日     | 出生于里加阿尔伯特街，父母为门德尔和玛丽                |
| 1915年6月（6岁）   | 为躲避德国对里加附近地区的进攻，全家迁至俄罗斯普斯科夫地区的安烈亚波尔 |
| 1916年初        | 举家移居彼得格勒                            |
| 1917年2月（7岁）   | 社会民主党革命爆发，伯林目睹了一次暴力行为，终生留下抹不去的记忆    |
| 10月（8岁）       | 布尔什维克革命                             |
| 1920年10月（11岁） | 全家搬回里加                              |
| <hr/>         |                                     |
| 1921年2月20日    | 以赛亚·伯林和玛丽抵达英国与门德尔团聚                 |
| 3月            | 进入瑟比顿阿兰德尔宅学校                        |
| 12月（12岁）      | 在瑟比顿住了几处公寓后，伯林和父母搬进肯辛顿皇宫酒店，准备自己买房   |
| 1922年1月5日     | 伯林夫妇买下伦敦西14区肯辛顿上艾迪逊花园33号            |
| 6月（13岁）       | 被圣保罗学校录取，但未通过奖学金考试                  |
| 9月            | 进入圣保罗学校                             |
| 1927年春（17岁）   | 参加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考试，未获通过                  |
| 7月（18岁）       | 参加并通过古典学高级证书考试（相当于A级），副科为英国文学       |
| 12月15日        | 获推选参加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入学考试                 |
| 1928年5月1日     | 伯林一家再次住进肯辛顿皇宫酒店，有时也回家住              |

- 7月 (19岁) 重新参加相同学科的高级证书考试，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科目中获得优秀；获圣保罗学校古典人文课程成绩毕业展奖
- 7月26日 一篇英语文章获圣保罗学校校长奖及奖章，同时获英语文学巴特沃斯奖。《泰晤士报》对此予以公告
- 695 10月1日 伯林一家迁至伦敦西北3区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 
- 10月 以奖学金获得者身份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研读古典人文学科课程（通过第一道难关即牛津大学普通文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之后，这一课程较通常的优等文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要容易些，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在语言方面较弱）
- 12月 通过普通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
- 1929年1月 开始修读古典人文学科课程
- 8月 (20岁) 在德累斯顿（听说了发生在巴勒斯坦希布伦的屠杀犹太人的事件）
- 1930年8月 (21岁) 与斯蒂芬·斯彭德、迈克尔·科雷及沃尔特·艾廷豪森同游萨尔茨堡艺术节
- 1931年7月 获古典文学课程一等学位成绩
- 8月 与斯彭德前往萨尔茨堡
- 9月 成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一事在讨论中
- 10月 开始修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在圣约翰街与斯彭德和另外两名学生合租了一所房子
- 11月 与西德尼·布登共同获得精神哲学学科约翰·洛克奖学金；获海夫奖学金。该奖学金为圣体学院设

- 立,专门授予在学士学位毕业考试中表现出色的学生
- 1932年6月 (23岁) 在荷兰,等候参加PPE课程口试;仅一年后获该课程一等学位
- 7月 与弗兰克·哈迪前往萨尔茨堡
- 10月 在新学院任职,担任哲学讲师
- 11月3日 通过选拔考试,获得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成为首位获此职位的犹太人;不久因过度兴奋患病返回家中
- 12月至  
1933年1月 与父母一道在阿马尔菲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返回牛津,继续在新学院和全灵学院分别从事教学和研究员工作
- 6月下旬至  
7月初 (24岁) 与玛丽·费希尔、玛丽·林德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一起驾车游南爱尔兰;一行人在位于科克郡的鲍恩宅邸拜访了伊丽莎白·鲍恩
- 7月 与门德尔同游乐图凯巴黎海滩;与西勒、玛丽·林德、罗伊·哈罗德、哈罗德的母亲弗朗西丝、托马斯·霍奇金和泰迪·霍奇金(后来加入)一同游览意大利(波多菲诺、加尔达湖、博尔扎诺等地)
- 8月初 先抵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再到马里昂巴德,然后到萨尔茨堡,在那里与霍奇金兄弟会合
- 8月下旬 与戈伦韦·里斯、谢拉·格兰特·达夫结伴前往鲁塞尼亚
- 9月5—10日 作为新学院男生九人读书小组的一员,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厄克特的一处乡村木屋别墅;至此结束行程返回伦敦
- 10月 在萨莫维尔学院导师的要求下,开始教“小费”雷切尔·沃克

- 11月 在H.A.L.费希尔的请求下,开始撰写有关卡尔·马克思的书
- 11月30日 受邀参加新学院院长寓所举行的晚宴,结识弗吉尼亚·伍尔夫
- 1934年3月 与汉弗莱和马德琳·豪斯在德文郡度过一周
- 6月22日 (25岁) 参加新学院纪念奠基者晚宴
- 7月 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玛丽·费希尔、玛丽·林德结伴游览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多尼戈尔郡、戈尔韦郡);在德罗伊特维奇的一家酒店短暂拜访玛丽
- 8月 与父母同往布莱顿;随后到意大利维罗纳,从那里出发,与托尼·安德鲁斯逗留萨尔茨堡(瞒着父母,事后他们才知道);到达时,大多数朋友均已离开萨尔茨堡;从那里前往威尼斯
- 9月 与约翰·福斯特结伴继续前行,经埃及前往巴勒斯坦待了一个月
- 1935年4月 与盖伊·奇尔弗同行前往巴黎看望“小费”雷切尔·沃克;几人陪玛丽·费希尔看歌剧
- 6月 (26岁) 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玛丽·费希尔和玛丽·林德结伴重游爱尔兰
- 7月 回到牛津,聚精会神写《卡尔·马克思》
- 8月 因扁桃体周脓肿,住进牛津阿克兰德医院;之后前往萨尔茨堡参加聚会,聚会成员有:玛丽·费希尔、玛丽·林德及理查德·佩尔斯;斯彭德与萨莉·格雷夫斯后加入;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准备来;期间去听了托斯卡尼尼演奏著名的贝多芬《费德里奥》;继续前行,游览奥地利蒂罗尔的阿亨湖
- 9月 在伦敦动物园遇见雷切尔·沃克,两人之间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

- 1936年3月 在法国尼斯，与玛丽和门德尔共度逾越节，期间继续写《卡尔·马克思》
- 8月5日 (27岁) 就1936年心理学研究现状，向全灵学院院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sup>1</sup>，原因是学院刚刚设立了社会人类学教授一职，正在考虑任命一位心理学家；继续废寝忘食地撰写《卡尔·马克思》
- 8月26日 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考恩·奥尼尔前往爱尔兰游玩两周，9月初鲍恩宅邸举行了周末家庭招待会，招待会上发生了许多事情；至此此行结束
- 9月8—15日 与斯彭德一起待在坎伯兰郡凯希克湖区的一个农场
- 10月11日 回到牛津，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午餐会，席间斯彭德遇见萨莫维尔学院的研究生伊内兹·珀恩（两人于12月15日结婚）
- 1937年2月下旬 患流感并发症，在疗养院住了一个月
- 4月 与父母前往直意大利，游览了梅拉诺、维琴察和威尼斯等地，首次参观了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
- 7月 (28岁) 只身下榻布莱顿的大都会酒店，写《卡尔·马克思》
- 8月 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伊丽莎白·鲍恩同游萨尔茨堡；本年度行人中多了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杰斯珀·里德利，以及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萨莉·奇尔弗、理查德和詹妮特·佩尔斯
- 9月 回家途中前往巴黎
- 1938年1月 与玛丽和门德尔前往法国里维埃拉，“以狂猛的速度”<sup>2</sup>写作《卡尔·马克思》

---

1 见上文第222页注1。

2 见上文第312页。



- 8月 (29岁) 只身下榻福克斯通大都会酒店，“四天时间里从手稿中删去了三万字”。<sup>1</sup>
- 8月/9月 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玛丽·费希尔、玛丽·林德结伴游览爱尔兰戈尔韦郡；在都柏林谢尔本酒店度过一夜，在那里，他见到“叶芝先生正在大厅一角对一位年轻女性吟诗”<sup>2</sup>，之后前往鲍恩宅邸，在那里完成了《卡尔·马克思》手稿
- 698 9月底 搬出全灵学院，进入新学院，辞去一年前考取的任期七年的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
- 10月26日 正式当选新学院研究员
- 1939年秋 (30岁) 《卡尔·马克思》在英国由桑顿·巴特沃斯出版社出版
- 1940年6月中旬 (31岁) 因为会说俄语，开始为英国外交部服务
- 6月下旬 盖伊·伯吉斯前来拜访，说外交部希望伯林成为驻莫斯科新闻专员
- 7月1日 拿到外交部特使护照，准备经由美国和日本前往莫斯科，然后回到伦敦
- 
- 7月10日 与盖伊·伯吉斯乘坐安东尼亚号客轮驶往美国
- 7月18日 在魁北克靠岸，在纽约过完周末后前往华盛顿
- 7月27日 伦敦外交部召回伯吉斯，否认在莫斯科有适合伯林的工作
- 8月 连续几周被迫无所事事地等候，与此同时想方设法获得批准前往莫斯科
- 9月 承担驻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布置的任务，撰写关

1 见上文第328页。

2 见上文第329页。

		于美联社快讯的分析报告；私底下开始酝酿他在美国可能的长期角色	
10月中旬		乘坐海上飞机，经里斯本返回英国，在当地延误了近一周时间	
11月		回到牛津，重新开始教学工作	
11月下旬		收到情报部来信，通知他已经派驻纽约工作，未见他按时报到	
1941年1月初		回纽约，先是乘飞机抵达里斯本，然后坐船	
1月		被任命为“英国新闻处下属专家” <sup>1</sup> ，到纽约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44层工作（不久后英国新闻处即合并到新成立的英国情报处）；他的工作主要是向一些特殊群体宣传英国的立场，起初是犹太人，工会组织和黑人，后来又增加到各类宗教组织	
6月下旬	(32岁)	因肺炎住院治疗	699
7月		在佛蒙特州休养康复	
8月		在华盛顿逗留三周	
11月中旬		在底特律参加工会大会，之后前往芝加哥	
1942年初		在宴会上初遇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	
春季		被任命负责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下属的政治舆论调查室，每周时间一分为二，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奔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7月	
8月初	(33岁)	回到英国休假，同时汇报工作	
8月—9月		在伦敦和牛津休假	
9月下旬		返回美国途中，在爱尔兰延误了一周时间，患病，但仍继续行程；抵达纽约的第二天住院	
10月		在纽约市立医院治疗“肺炎”（实为病毒性肺炎）；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担任一秘	

1 见上文第421页。

- 11月初 在纽约州附近卡茨基尔山脉的格罗辛格尔酒店与魏茨曼会合，短暂休养了一段时间
- 1943年1月 回到华盛顿
- 6月 (34岁) 离开肖勒姆酒店，搬进乔治城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与爱德华·普理查德合租至8月
- 9月 搬进另一套出租房，地点仍在乔治城，与盖伊·奇尔弗合租
- 9月26日至11月2日 休假：经芝加哥前往奥博雷·摩根在华盛顿州的农场，在此逗留了两周，随后经旧金山开始漫长的旅程，游览了洛杉矶、大峡谷、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与新奥尔良
- 11月 访问哈佛大学
- 1944年2月9日 欧文·伯林抵达英国，丘吉尔误以为他是伯林，在唐宁街10号的午宴上不断盘问
- 3月下旬至 再次回国，在新学院待了四天，协商将哲学科目改为思想史；另在伦敦逗留，与唐纳德·霍尔及外交部其他人员交谈
- 5月中旬
- 7月中旬至 在美国休假，住在山间，到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短暂访问，前往科德角拜访朋友阿力克斯·德·罗斯柴尔德
- 8月中旬 (35岁)
- 700 1945年初 由情报部正式调往外交部
- 1月 阿诺德·汤因比提议让他担任外交部研究处俄国室负责人，遭拒绝；达夫·库珀为他提供的驻巴黎新闻专员一职也被拒绝
- 2月初至月底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待了三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接受肺炎治疗
- 3月初至中旬 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逗留两星期，“完全休息”<sup>1</sup>；

---

1 见上文第617页。

- 3月23日回到华盛顿继续工作,商谈回英国一趟的计划
- 5月 听到消息,有望实现长期向往的莫斯科之旅,将在秋季成行,为期三至四个月
- 6月下旬 (36岁) 前往旧金山,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联合国宪章起草及颁布大会最后两周的会议
- 7月初至 无望参加波茨坦会议,提前回到英国;在伦敦和牛津两地待了几周;比弗布鲁克勋爵好意让他为《标准晚报》定期撰写专栏,遭拒绝
- 9月初 途经柏林至莫斯科,作为临时一秘借调至英国使馆
- 9月中旬 参加英国盟军晚宴,结识J.B.普利斯特利和一些俄国作家
- 9月下旬 前往莫斯科郊外的佩里德尔基诺探望帕斯捷尔纳克
- 9月底? 秘密拜访列奥·伯林及其他亲戚
- 11月13日 抵达列宁格勒
- 11月15/16日左右 初访安娜·阿赫玛托娃(分两次)
- 11月21日 回到莫斯科
- 1946年1月1日 在新年荣誉册上被授予不列颠帝国高级勋章
- 1月5日 第二次拜访安娜·阿赫玛托娃
- 1月6日 离开列宁格勒,经芬兰和斯德哥尔摩前往英国
- 1月15/16日? 途经巴黎,探望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
- 2月初 回到华盛顿
- 3月31日 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一秘任期结束
- 4月7日 乘“玛丽女王号”客轮从纽约启程,返回英国和牛津

## 重要人物生平

以下简介包括一些与伯林相关的重要人物或经常提及的人物，主要为提供信息之用，不适于放入脚注。这些增补注释涉及的人名在正文脚注及总索引中首次出现时用星号在姓氏旁加注标示，如\*伯林。此部分涉及的人物和在脚注中一样，一般仅限于本卷书信涉及的时期。

**亚当斯**，(威廉·)乔治·斯图尔特(1874—1966)，1912—1933年任牛津大学政治理论与制度格拉斯顿讲席教授。全灵学院研究员(1910—1933)、院长(1933—1945)。1908年与缪里尔·莱恩结婚。在伯林记忆中，他“人特别好[……]就像一位老农，天性善良，彬彬有礼”<sup>1</sup>；根据哈里·霍德森的说法，他“在世界观上持折中主义态度，从不把不同观点视为异己”<sup>2</sup>。

**艾尔索普**，约瑟夫·赖特(1910—1989)，康涅狄格州贵族，“年轻的波士顿高雅人士”<sup>3</sup>。罗斯福家族亲戚。1932—1937年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新闻记者，后任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1940—1941年参加海军；后转入美国志愿抗日援华航空大队(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麾下，在香港被捕。1942年8月通过俘虏交换被释放；1942年12月任访华借贷外交使团团团长，1943—1945年在空军第14军团(中国)服役，再一次成为陈纳德将军部下。之后他重操旧业，继续担任专栏作家和政治评论员。与他人共同创作了《168天》(1938)、《总统身边的人》(1939)、《美国白皮书：美国外交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等。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0。

2 <http://www.athelstane.co.uk/hvhodson/hvhbiogr/hvhbiogr.txt>, 2003年10月21日访问。

3 伯林对华盛顿同行说的话，1943年11月9日。

**奥斯汀, 约翰·兰肖 (1911—1960)**, 1933—193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1935—1952年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和哲学导师 (1952—1960年任道德哲学教授和圣体学院研究员)。《个人印象》中对其有详细描写;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访谈时, 伯林曾补充道: “除了凯恩斯, 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过去我们不太熟。[……]后来成了好朋友。他为人十分诚恳, 但也很爱面子, [……]做事严谨, 天性极为善良。我认为他令人钦佩。能够真正沉入到学问当中; 对自己永远持怀疑态度。”<sup>1</sup>

**艾耶尔, 阿尔弗雷德 (弗雷迪)·朱尔斯 (1910—1989)**, 1928—1932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古典学专业; 1932—1935年任基督教堂学院哲学讲师, 1935—1944年为研究学者; 1944—1946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 后成为伦敦大学心灵与逻辑哲学格罗特讲席教授 (1946—1959), 逻辑学威克姆讲席教授及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 (1959—1978)。1932年与 (格雷丝·伊莎贝尔·) 勒内·里斯 (1909—1980) 结婚 (1942年离婚)。伯林后来曾评价道, 艾耶尔“英文极其漂亮, 简洁利落, 没有冗言, 我认为是自密尔以来的最佳英语哲学散文风格。一生中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sup>2</sup>。写作出版《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经验知识的基础》(1940)。

**伯林, 以赛亚 [· 缅杰列维奇] (1909—1997)**, 1922—1928年就读于伦敦圣保罗学校; 1928—1931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人文学专业, 1931—1932年学习PPE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课程; 1932—1938年获全灵学院奖学金; 1932—1938年任新学院哲学讲师, 1938—1950年任研究员; 1941—1942年二战时在纽约为英国情报部效力; 1942—1946年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任职; 1945年9月—1946年1月在莫斯科英国使馆任职。写作出版《卡尔·马克思》。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4。

2 同上。

**伯林**，(玛莎·)玛丽(1880—1974)，婚前姓沃什诺克(“沃尔夫森”)，伯林母亲，是其丈夫门德尔的嫡亲表姐妹，不过根据儿子的说法，“母亲比我父亲低一个社会阶层”<sup>1</sup>。在伯林的描述里，母亲“充满幽默感，性格坚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她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情人<sup>2</sup>，却与一个乏味、正派、友善的丈夫结了婚，令她感到无比失落[……][她]是一个毫不妥协、绝不让步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性格如此，不容许丝毫反犹太主义的存在”。<sup>3</sup>虽然她飞扬跋扈的性格和过于俭省的习惯令伯林为之气恼，她去世时，伯林还是发自内心地坦言母亲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固执己见的习性常常令莫里斯感到不快，这一秉性来自我母亲(她非常喜欢莫里斯)[……]无疑，由于离乡背井、流亡在外，她对基本价值观的审视就变得格外苛刻：乔治·威登菲尔德爵士、戈伦韦和伯吉斯在她那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拉什米利耶维奇铁石心肠；索勒姆爱慕虚荣而且妒忌心强；赫伯特她觉得可怜；你(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则出色通过(弗雷迪也同样被抨击得晕头转向)：她充满活力，对自己的将来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对易卜生、汉姆生、D.H.劳伦斯、高尔基的《在底层》、威尔第、卡门等意气风发、充分表现自我的作品如痴如醉。她喜欢莫里斯，厌恶那些横竖看不惯别人的人。他们没有丝毫粗犷奔放的活力，只会装腔作势，刻薄地指责别人。[……]我的犹太人情结[……]想必承袭于她和她所在的世界以及俄国——犹太文化之根，是她的遗传：父亲身上完全找不到那些禀性。<sup>4</sup>

**伯林**，门德尔[·鲍里索维奇](1884—1953)，木材和鬃毛商人，伯林父亲。在以赛亚·伯林的记忆当中，这位“亲英狂”<sup>5</sup>的父亲“可爱、天真[……]十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

2 “不错，他爱她至死不渝；但她却并非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2。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

4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的信，1974年2月23日。

5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4。

分有趣，属于永远长不大的那种人。”<sup>1</sup>他“非常能干”但“十分胆小怕事[……]从未赚过大钱，因为做事没有心计，没有脾气，又缺乏开创精神，那些富有魄力的犹太商人并不看好他，虽然其中一些人他确实认识。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公务员。脑袋聪明，但过于胆小，做任何事都小心谨慎，危险事绝对不做。因此他总是过着小康的生活——算不上养尊处优，至少舒心自在，衣食不愁”。<sup>2</sup>不过在玛丽·班纳特的记忆中，门德尔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形象：“性格坚定，令人钦佩”，“带着一种严肃感”，她能够想象他“穿着高统套靴，四处奔走采买林木的样子”。<sup>3</sup>

**鲍恩**，伊丽莎白·多罗西亚·科尔（1899—1973），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爱尔兰科克郡鲍恩宅邸的女主人，1938年伯林在鲍恩宅邸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修订工作；1923年嫁给艾伦·查尔斯·卡梅伦（1893—1952）。伯林形容她是“了不起的谈话对象，才智过人，充满同情心，可爱有趣，容易相处[……]她信基督，有宗教信仰，喜欢男人，喜欢说笑话，支持保守党，希望人们充满阳刚之气，严肃对待生活，反对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倾向[……]她喜欢刀锋相见。”<sup>4</sup>尽管在30年代，他在信中对她的小说给予高度赞赏，后来却发现她写的书“缺乏可读性”。<sup>5</sup>主要作品有：《旅店》（1927），《最后一个九月》（1929）、《亲朋好友》（1931）、《向北方》（1932）、《猫跳》（1934）、《巴黎之屋》（1935）、《心之死》（1938）、《鲍恩宅邸》（1942）、《七个冬季》（1943）等。

**鲍拉**，（塞西尔·）莫里斯（1898—1971），1918—1922年就读于牛津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22—1938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和导师，1938—1970年任院长。后成为诗歌教授（1946—1951）和牛津大学校长（1951—1954）。鲍拉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2。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

3 根据对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采访，1994年2月1日。

4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3。

5 同上。



去世后，伯林形容他为“我们青年时代的杰出解放者”，并且回忆道：

705 我年轻时，他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在牛津广受瞩目，人人都把他挂在嘴上。父母们想到他可能给自己孩子产生坏影响就心惊胆战，虽然他一向代表积极的主旋律和正面形象。他那断断续续大声说话的独特风格[……]却是内心恐惧、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和他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非常和蔼，令人动心，古道热肠，富有献身精神。但在幼年时代，一定受到了某种创伤，因而在情感上，一生中一直都偏向偷猎者，虽然在正式场合的确站在猎场看守人一边。正是这一特性使他最终仍然成为大家的朋友与同盟——他从未真正加入华而不实的体制——多数派。他始终支持他称之为“邪恶势力”的群体，即被麻木不仁、“沉默不言的大多数”视为异端的少数派。<sup>1</sup>

在给诺埃尔·安南的信中，伯林回忆起鲍拉摇摆不定的性格时写道：

[他]能够此刻对某个人说雪莱昏聩糊涂，写的诗干巴乏味，五分钟后又去跟另一个人说（比如戴维·塞西尔），雪莱是最高贵的英语诗人。很显然，这么做对他毫发无损，不过是有嘴无心、一时的心血来潮罢了，纯属游戏：他很容易因诗歌、绘画和人物而陶醉，瞬息而逝的波峰也会让他赞不绝口，对小心翼翼算计别人则恨之入骨[……]但是**诚实**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他总是信口开河，任意扯谎，这么做的理由林林总总：或是为了占上风；或是为了给生活添色加彩；或是为了羞辱对手；或是为了帮助朋友；或是为了摆脱困境。但同时又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揭穿。<sup>2</sup>

《个人印象》中对其有详细描写。主要作品有《〈伊利亚特〉的传统与构思》（1930）、《希腊抒情诗》（1936）、《象征主义的遗产》（1943）、《索福克勒斯悲剧》（1944）、《从维吉尔到弥尔顿》（1945）、《创新实验》

1 致罗兰·伯顿—穆勒的信，1971年7月19日。

2 致诺埃尔·安南的信，1973年8月31日。

(1945)。

**塞西尔**，(爱德华·克里斯蒂安·)戴维(·加斯科涅)勋爵(1902—1986)，1924—1930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1939—1969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后成为英国文学哥德史密斯讲席教授(1948—1969)。1932年与著名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之女雷切尔·玛丽·V.麦卡锡结婚(上文第147页注2)。《个人印象》第二版中对其有详细描写。在伯林笔下，他“智慧过人，充满魅力，想象力丰富，是一位很好的谈话对象[……]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保守党”，同时又十分爱国，“强烈反对平等主义”，“十分敏感”，但“一点也不感情用事，绝不会自作多情”。<sup>1</sup>主要作品有：《困鹿》(1929)、《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933)、《维多利亚早期小说家》(1934)、《简·奥斯汀》(1935)、《墨尔本青年》(1939)、《小说家哈代》(1943)。

**奇尔弗**，盖伊·爱德华·法夸尔(1910—1982)，1932—1934年就读于默顿学院古典学专业；1934—1963年任女王学院研究员及讲师；1940—1945年任职食品部；1943—1945年任英国驻华盛顿粮食外交使团成员；与伯林同租一房；在伯林记忆中，他“道德感极强，对不知羞耻或是非不分的暧昧行为总是发自内心地义愤填膺，从道德上予以谴责”，同时他还仇恨反动势力和罗马天主教。伯林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公务员，倘若让他来写人人称道的罗马史，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威武豪侠，富有魅力[……]彬彬有礼，温柔亲切，(有)一颗文雅高尚的心灵”。<sup>2</sup>

**考克斯**，克里斯托弗·威廉·马切尔(1899—1982)，古代史学家，“活泼、有趣、敏感，极好的伙伴，出类拔萃的人物”<sup>3</sup>；1926—1970年任新学院研究员，1931年任代理院长，1934—1936年任学监；英埃苏丹教育干事；1937—1939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5。

2 致玛丽·瓦诺克的信，1982年10月14日。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年任苏丹首都喀土穆大学格登学院院长；1940—196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教育顾问。

**克里斯曼**，理查德·霍华德·斯塔福（1907—1974），1926—1930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0—1937年任研究员和导师；1938—1955年任《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助理编辑；1934—1940年任牛津市政会工党组织领袖；后成为工党政治家。1932年与艾丽卡·苏珊娜·格吕克（1906—1979，婚前姓兰兹伯格；前两任丈夫分别为提奥·西蒙和古斯塔夫·阿洛伊斯·朱利叶斯·格吕克）结婚（大约在1935年离婚）；1937年再婚，妻子为伊内兹（“伊内兹塔”/“兹塔”）·希尔达·贝克（1900—1952）（婚前姓戴维斯，前夫为约翰·兰德尔·贝克）。伯林后来回忆道：“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什么也阻拦不了他。在政治观点上，他左翼激进，持纳粹立场，这点令我反感[……]他反对资本主义——发自内心——憎恨公务员制度，对所谓的体面行为和传统价值深恶痛绝[……]他希望看到的景象是年轻人引吭高歌，粗鲁的学生手挽着手，开怀畅饮啤酒[……]点着火把，举行拥护纳粹的游行，（他有）强烈的纳粹主义倾向[……]热衷权力，仇视温和、开明、善良、和蔼。这些无一不激怒他。”<sup>1</sup>主要作品有《今日柏拉图》（1939）、《苏格拉底》（1938）、《统治与被统治者》（1939）、《我们怎样被统治着》（1939）。

**科洛思维特**，（庞森比·）莫尔（1907—1989），1926—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31—1932年任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初级研究员。1932年起在外交部任职（1932—1934年在外交部综合司任职，1934—1937年驻巴格达，1937—1943年任职外交部东亚司，1943—1946年驻莫斯科，1946—1947年驻马德里）。根据伯林的说法，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sup>2</sup>，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sup>3</sup>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对布赖恩·哈里森的采访，1992年10月19日。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费希尔**，赫伯特·艾伯特·劳伦斯（1865—1940），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916—1926年任下院议员，1916—1922年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国际联盟代表，1937年获英国功绩勋章，1925—1940年任新学院院长。在伯林记忆中，他“总体而言，对大学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完全超然物外[……]总抱着那么点冷嘲热讽的态度[……]智慧超人，高高在上。[……]对可以称为知识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东西深信不疑，不喜欢平庸”。<sup>1</sup>主要著作包括：《中世纪帝国》（1898）、《英国史：从亨利七世登基到亨利八世去世（1485—1547）》（1906）、《拿破仑的政治体系》、《欧洲的共和传统》（1911）、《历史政治研究》（1920）、《欧洲史》（1935）、《英国与欧洲》（1936）、《往日大事记》（1939）。

**费希尔**，莱迪丝（1875—1956），婚前姓伊尔伯特，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1899年嫁给H.A.L.费希尔（参见相关词条）；未婚妈妈及其子女全国委员会创始人和主席（1918—1955）；丈夫过世后，她被新学院聘请继续管理学院院长住宅<sup>2</sup>，当时许多从伦敦疏散出来的高级教员借住在此，一直到选出新的院长。著作包括：《收入与支出：经济学入门》（1922）、《公民：管理国家与地方事务之道简述》（1927）、《母亲与家庭》（1932）、《家庭主妇与市政厅：地方议会与公共事务管理委员会职责简述》（1934）、《在英国生活与工作》（1934）、《英国与欧洲史指南，从最早到现在》（1935）、《二十一年：1918—1939》[未婚妈妈及其子女全国委员会发展史]（1939）。 707

**费希尔**，玛丽·利蒂希亚·萨默维尔（1913—2005），H.A.L.与莱迪丝·费希尔（参见相关词条）之女，1931—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古典学专业（最后一年住在新学院院长住宅里）；1940—1941年任职联合广播委员会（她形容

1 对布赖恩·哈里森的采访，1988年4月25日。

2 这一说法由玛丽·班纳特提议。她在给编辑的信中说（2003年10月23日）：我认为“管理学院院长住宅”还包括了诸如排队采购蛋糕提供给本科生等杂事，占用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管理和督促女佣们。

其为“一个前方组织，将录音材料输入德国”<sup>1</sup>；1941—194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负责播放录音节目；1945—1956年任职殖民部。1955年与约翰·班纳特结婚；后成为圣希尔达女子学校校长（1965—1980）。

**福斯特**，约翰·盖尔韦（1904—1982），律师；1924—198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9—1943年任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一秘；1939—1943年任华盛顿英国使馆法律顾问，后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法律顾问；1945—1974年任保守党下院议员。伯林曾向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这样描述他：

约翰·福斯特[……]是一名(英国大使馆)法律顾问，曾经是我所在学院的研究员；他性格极其随和，出类拔萃，但也十分古怪[……]他的心灵自由奔放，缺少某些人类的特性，仁慈善良，幽默有趣，谈不上是冒险家，但充满活力，妙趣横生。不明白人们为何要写诗，不明白文字为何要如此可笑地组合在一起；他一生中从未读过一部小说，因为他不想阅读与现实不符的虚假言论，在他看来，有史书和报纸足矣，没必要去读那些东西。还有，他无法想象在没有电话的世界中生活。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一起上床的女人无以计数，在这点上，20世纪无人可与其匹敌。绝对属于乱交。我认为，他根本不懂“爱”这个词的含义。就像一只非常可爱的狗，喜欢闹着玩，恰恰就是缺乏人类灵魂。他富有感情，神经系统健全，头脑敏捷，特别善良。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加实用主义者。他信仰将人类享乐扩大到极致，信奉利己主义，但对他而言，快乐仅仅意味着肉体的欢悦。他非常乐于支持医药研究，就因为它能够减轻痛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似乎觉得，对马耳他社会改革运动斗士的研究是一种疯狂行为，没有丝毫价值。不过，既然这些人乐此不疲，他也不想加以阻止，因为快乐无罪，他们在这些可笑的方式中得到欢愉。他的至交好友都是一些在布鲁克林声名暧昧的犹太律师[……]。<sup>2</sup>

1 出处同前(上文第823页注3)。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0。

**法兰克福特**, 菲利克斯 (1882—1965), 生于维也纳, 1914—1939年任哈佛大学行政法伯恩讲席教授, 1933—1934年任牛津乔治·伊斯特曼客座教授。1939—1962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为出生在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与巴特洛米尔·万兹提的案件申诉而闻名, 尽管申诉不成功。此二人1921年被控谋杀罪和抢劫罪, 案件引起争议, 但两人还是在1927年被判处死刑。支持罗斯福总统和新政, 信仰自由主义。但法兰克福特坚持认为, 制定法律是为了立法, 而不是为了审判, 因此而在其他拥护加大法庭干预的自由主义者当中陷入孤立。著作包括: 《尼古拉·萨科与巴特洛米尔·万兹提之案》(1927)、《大法官霍姆斯先生与宪法》(1927)、《公众及其政府》(1930)、《马歇尔、坦尼和威特制定的商务条款》(1937)、《大法官霍姆斯先生与联邦最高法院》(1938), 《法律与政治: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文摘, 1913—1938》(1939),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与E.F.普理查德主编。

**法兰克福特**, 玛丽安·A. (1890—1975), 婚前姓丹曼, 长老会牧师之女。1919年嫁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参见相关词条)。合作编辑了《萨科与万兹提书信集》(1928), 并在其夫去世后编辑了他在法学专业之外的作品。法兰克福特的传记作家利弗·贝克如此形容这对夫妻: “两人性格完全不同, 却恰好互为补充。她的保守突出了他的奔放, 而他的宽容正与她的严苛相对。他喜欢法律, 而她则对文学情有独钟。”<sup>1</sup>《纽约时报》<sup>2</sup>撰文回忆道: “有时候, 她能以机智巧妙的方式, 挫败丈夫的傲气, 这一点无人不晓。”谈到丈夫作为公众演说家的不足, 她曾经这样评价: “菲利克斯的演讲仅有两个缺点: 跑题, 然后再回到正题上来。”

**格兰特·达夫**, 谢拉 (1913—2004), 1931—1934年就读于圣保罗女子学校和玛格丽特夫人学院PPE专业(在牛津大学通过朋友戈伦韦·里斯结识伯林, 见相

1 利弗·贝克,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纽约, [1969]), 第89页。

2 1975年6月11日, 第46版。

关词条)；后任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国通讯记者；1939—1941年供职于国外研究与出版处；1941—1944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机构工作。有过两次婚姻：(1) 1942—1952年，丈夫为诺埃尔·弗朗西斯·纽瑟姆，(2) 迈克尔·索科洛夫(结婚前他将名字改为索科洛夫·格兰特)，两人从1952年开始一起生活至1998年索科洛夫去世。著作包括《德国与捷克：对欧洲和平的威胁》(1937)、《欧洲与捷克人》(1938)、《德国保护国：纳粹统治下的捷克人》(1942)。

**汉普希尔**，斯图尔特·纽顿(1914—2004)，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6—1940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哲学家；1936—1939年任女王学院哲学讲师；1940—1945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5年任外交部国务大臣私人助理。后任伦敦大学学院哲学讲师(1949—1959)，伦敦大学心灵与逻辑格罗特讲席教授(1960—1963)，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1963—1970)，瓦德汉姆学院院长(1970—1984)。1961年与勒内·艾耶尔结婚。

**哈迪**，威廉·弗朗西斯(“弗兰克”)·罗斯(1902—1990)，1926—1950年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员和哲学导师，1950—1969年任院长；1938年与伊索贝尔·麦考利结婚。作品包括：《柏拉图研究》(1936)、《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1968)。伯林对他评价如下：

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导师——孜孜不倦，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教给学生——特别机敏、谦虚、目光锐利——谁也别想在他面前玩弄什么说辞，任何巧言善辩，即便不怀恶意，只要没有条理清楚地把意思表达明白，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他也决不放过。很少表扬我们；但公正善良[……]对我帮助很大。他父亲是一位古典学学者。他本人也是，有一个兄弟[科林]。上学期间他在巴利奥学院获得了无数奖项。谦虚、害羞、颇为压抑，他是苏格兰人，来自爱丁堡，一口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写了一些著作，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反应平平。精通希腊语，但这位导师极为严谨，做事非常细致缜密，一清二楚；从

不羞辱学生，只是予以更正；对你说“这不可能正确，因为你这么这么说，但哪一点能够说明呢？这点不对，你看，这么说对不对……？”整个过程轻声细语，但又斩钉截铁，不容分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这样。这一点在我身上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晰明了也因此成了我十分看重的品质，始终孜孜以求。人尽可以浅薄，尽可以没有深度，但晦涩难解加上虚假做作，句子里[扼腕]倘若同时存在这两样东西，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丑恶。过去如此，现在还是一样。<sup>1</sup>

这一说法得到J.O.厄姆森的响应，他在一篇有关哈迪从基督圣体学院院长一职退休的文章中写道：

哈迪先生在任导师期间，培养出了许多一流哲学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导师，这说明他的教学方法极为成功；但他习惯于问一些有见地的问题，而不是传授知识或者宣传自己的观点。很少有人了解他究竟持何种观点。一篇文章若是以断然的口气开头，提出某种含糊笼统的论断，在他那里总会引来一声低沉却充满痛苦的呻吟。他会让学生说明，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根据是什么，怎么来应对这样和那样的质疑。<sup>2</sup>

**哈罗德**，(亨利·)罗伊·福布斯(1900—1978)，经济学家，1924—1967年任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员。其母为小说家兼画家弗朗西丝·哈罗德，婚前姓福布斯—罗伯逊(1866—1956)。她对情感殚精竭虑的追求和忧郁心理使自己沦为受害者；1938年与威廉明妮(“比拉”)·玛格丽特·伊夫·克雷斯韦尔(1911年生)结婚。据说南希·米特福德以她为原型，塑造了《天涯追爱》和《爱在寒冬》中冷静、理性的范妮·洛根这个人物。在1929或1930年左右，伯林在基督教堂学院经他们共同的朋友莫里斯·鲍拉和约翰·斯帕洛介绍与他认识，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著有作品：《国际经济学》(1933)、《贤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J.O.厄姆森，《哈迪院长：1950—1969》，《鸫记》，第1期(米迦勒节，1969)第4页。



易循环》(1936)。

**哈特**,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1907—1992), 1926—1929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 1932—1940年任大法官法庭律师, 1940—1945年任职战争部; 1941年与詹妮弗·威廉斯(参见相关词条)结婚; 后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1952—1968)及布雷斯诺学院院长(1973—1978)。

**哈特**, 詹妮弗: 见威廉斯, 詹妮弗。

**710 霍奇金**, 托马斯·莱昂内尔(1910—1982), 1928—1932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 1933年在莫德林学院读研究生, 1932年12月26日到1933年7月24日在巴勒斯坦从事考古研究; 1934年5月至1936年夏任巴勒斯坦行政机构助理秘书; 1937—1939年任坎伯兰郡之友失业委员会教育官员; 1939—1945年任牛津大学课程委员会北斯塔福德郡教学部主任; 1945—1952年任牛津大学对外开放课程委员会秘书及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在伯林记忆中, 他“持左翼立场, 多愁善感, 本土意识很强”, “秘密共产党人, [……]彻头彻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sup>1</sup>

**豪斯**, (阿瑟·)汉弗莱(1908—1955), 1925—1930年就读于哈特福学院历史专业; 1930—1931年在雷普顿学校任教师; 1931—1932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兼英语讲师; 1931—1932年任英格兰教会执事, 后弃教还俗; 1933—1935年任埃克塞特大学学院古典学特别助理讲师; 1933年同马德琳·伊迪斯·丘奇(1903—1978)结婚; 1936年任加尔各答院长学院英语教授; 1937年任加尔各答大学英语教授; 1940年任利物浦威廉·诺布尔奖研究员。伯林形容他为“皮肤黝黑, 身材魁梧, 眉毛很低, 令人望而生畏; 说话语速缓慢, 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口来[……]天性多疑[……]我对这位朋友忠心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0。

耿耿：但是 [……] 他天性充满激情，也任其自由表现，不想加以控制。”<sup>1</sup>  
著有《狄更斯的世界》(1941)。

**哈钦森**，杰里米·尼古拉斯·圣约翰(1915年生)，律师，其母为玛丽·巴恩斯·哈钦森，姐姐是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的第一任妻子芭芭拉；1933—1936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PPE课程(在博蒙特街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本·尼科尔森同住)。1937年获哈姆斯沃斯法律奖，1939年成为高级律师；1940年与佩吉·阿什克罗夫特结婚(1966年离婚)，后进入王室法律顾问团(1961)，成为鲁林顿的哈钦森男爵(1978)。

**杰伊**，道格拉斯·帕特里克·托马斯(1907—1996)，经济学家及政治活动家；1930—193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3年与玛格丽特(“佩吉”)·克里斯蒂安·加内特结婚(1972年离婚)；1929—1940年任新闻记者(《泰晤士报》1929—1933，《经济学家》1933—1937，《每日先驱报》1937—1940)；1940—1943年任职供应部；1943—1945年任职贸易部；1945—1946年任首相私人助理；后成为工党政治活动家，巴特西的杰伊男爵(1987)。谭姆·戴利埃尔在为杰伊写讣告<sup>2</sup>之前，曾致电伯林，征求他的意见，并在讣文中引用了伯林对杰伊的描述，称他“极具个性，行为怪僻，性格倔强”。同时还引用了伯林在长期相处中观察得出的评论“道格拉斯常常显得荒谬可笑，对任何事都表现得极其狂热。一旦下定决心，什么也无法改变他的观点。他有一些固定习惯，谁也无法撼动丝毫”。后来，在致杰伊遗孀(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的一封信中<sup>3</sup>，伯林以最美好的措辞，高度赞扬了杰伊的才华、成就及性格，同时对戴利埃尔文章中的话作了解释。说他同戴利埃尔谈了“很长时间。他引用的那些话，很遗憾，确实是我说的，但是，如果脱离整个上下文，断章取义，将这些话与我对杰伊的敬意和爱戴割裂开来，那

1 1982年1月 致莫伊拉·加斯特的信。

2 《独立报》，1996年3月6日，第18版。

3 致杰伊夫人的信，1996年3月8日。

711 些话就显得吹毛求疵、过于苛刻了。他的确在某些方面有点狂热和个性张扬,但在他品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风趣与高尚,相比之下,那些只是瑕疵,微不足道”。作品有:《关于社会主义》(1937)、《谁来为战争与和平买单》(1941)。

**莱曼, 罗莎蒙德·尼娜 (1901—1990)**, 小说家, 1928年嫁给沃根·菲利普阁下(1944年离婚); 1936年9月与伯林和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同拜访伊丽莎白·鲍恩, 在鲍恩宅邸作客(期间开始与戈伦韦·里斯产生暧昧; 之后两人保持同居关系, 一直到1940年里斯结婚)。作品包括:《含糊其辞》(1927)、《华尔兹之邀》(1932), 以及《街上的天气》(1936)。

**林德, 莫伊拉 (Maire读作“Moira”; 外号“小宝贝”, “Baby Junior”)** (1912—1990), 父亲罗伯茨, 母亲西尔维娅, 两人均为作家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姐姐为西勒 (Sigle/Sheila); 整个30年代年轻人圈中的共同朋友; 先在圣保罗学校学习; 1930—1934年为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走读生, 第一年与乔奇姆夫妇同住, 玛丽·费希尔就读萨莫维尔学院后, 她住进新学院院长住宅, 代替费希尔成为家中的女儿。毕业后, 担任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特约审稿人近五十个年头; 1938年与杰克·加斯特 (生于1907) 结婚。她曾是伯林的学生 (学习古典人文学科课程), 在学期间, 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一道组织策划, 偕同伯林和玛丽·费希尔几个, 开始了一系列前往爱尔兰的暑期度假活动 (1933, 1934, 1935, 1938)。她和姐姐长相不太一样, 但都美貌异常, 而且两人均为共产党员。西勒先加入 (也更为狂热, 但不够持久)<sup>1</sup>。“小宝贝”后期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 但并未正式与之决裂, 而是致力于和平运动, 通过频繁组织果子酱制作活动, 为她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募集资金。托尼·吉福德在悼念她的讣文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她孜孜以求的品质充分体现在她给予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一切当中——慷慨、娴静以及对他人

---

1 1956年匈牙利革命遭到镇压后退党。

的爱与关心。”<sup>1</sup>

**林德**, 西勒 (Sigle/Sheila, 发音相同; 在出生证上拼写为Sighle) (1910—1976), 1929—1930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化学与生物专业, 四个学期后辍学(忙于跳舞); 莫伊拉(见相关词条)的姐姐; 在维克托·戈兰茨出版公司工作(与维克托·戈兰茨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随着二战爆发, 两人因持不同政见而关系破裂); 1939年嫁给彼得·惠勒。玛丽·班纳特形容她为“说话滔滔不绝, 风趣开朗, 为人公正”。<sup>2</sup>

**摩根**, 奥博雷·尼尔 (1904—1985), 威尔士人, 卡迪夫的大卫·摩根百货商店创始人之孙, 1939—1940年在英国情报图书馆调查室任职; 1940—1942年为英国新闻处工作(1941—1942年任英国情报处主任特别助理; 1942—1945年任英国情报处副主任和英国情报处驻纽约负责人。1932年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里夫·莫罗 (1904—1934) 结婚, 莫罗为美国驻墨西哥前大使德怀特·莫罗的长女, 后来 (1937) 又与莫罗之妹康斯坦斯·卡特·莫罗 (1913—1995) 结婚。约翰·惠勒—班纳特形容他为“无所畏惧, 积极进取, 富有想象力, 必要时能够做到果断无情”, 与此同时, “热情、忠诚, 绝对值得依赖”。并对他作出的贡献赞不绝口, 称他“讲究实干, 对炫耀浮夸的作风, 不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 一律嗤之以鼻。他无畏困难, 勇往直前, 二战爆发之际, 为在美国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英国宣传机构作出了不懈努力”。<sup>3</sup>伯林也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 称战争期间, 不论名义上由谁来管理英国驻美宣传机构, 摩根和惠勒—班纳特都是“无处不在的幕后强大力量”<sup>4</sup>。

712

**尼古拉斯**, 赫伯特·乔治 (1911—1998), 1931—1935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

- 
- 1 《卫报》, 1990年10月1日, 第37版。
  - 2 出处同前(上文第823页注3)。
  - 3 《特别关系》(上文第384页注2), 第75页。
  - 4 出处同前(上文第365页注1)。

业；1935—1937年任耶鲁大学现代历史联邦基金研究员；1938年任埃克塞特学院政治学讲师；1946—1951年任研究员。后任新学院美国历史与制度罗氏讲席教授兼研究员（1969—1978）。达夫妮·斯特雷特在给伯林的信中写道，“令人遗憾，他滑稽诙谐的散文风格常常给人一种挑剔苛刻、讥讽嘲笑的印象，而实际上他只是为了滑稽搞笑[……]他的文字及有时不无尖刻的语言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用来掩盖内心错综复杂的自卑感（尤其在与你 的关系中），以及一颗极其善良的心灵”。<sup>1</sup>

**尼科尔森**，（莱昂内尔·）本（尼迪克特）（1914—1978），艺术史学家；父母分别为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1939—1947年任国王画像副总管；战争期间在情报部队服务；自1947年起任《伯灵顿杂志》编辑。

**普莱斯**，亨利·哈勃雷（1899—1984），1924—1935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兼哲学讲师；1935—1959年成为逻辑学威克汉姆讲席教授，同时担任新学院研究员；1939—1940年任心理研究协会会长。著有：《感知》（1932），《休谟的外部世界理论》（1940）。

**普里查德**（“普里奇”），爱德（华）·弗雷特韦尔（1915—1984），哈佛大学毕业生，杰出新政律师，1943年夏曾短暂在华盛顿与伯林合租过住房；为罗斯福政府研究战时经济；因1948年在肯塔基波旁县选举舞弊而于1949年被捕入狱；后成为高等教育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里斯**，（摩根·）戈伦韦（1909—1979），新闻记者、作家；在完成第一年PPE课程后，1928—1931年到新学院改修历史学；1931—1946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后获埃斯泰茨奖学金（1951—1954），慕尼黑事件后，加入英国本土防卫义勇军，并成为驻法国和德国的参谋；1940年与玛格丽特（玛吉）·尤因·莫

---

<sup>1</sup> 致伯林的信，1945年2月27日。

里斯结婚，后任位于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大学学院负责人（1953—1957）。左翼人士，盖伊·伯吉斯的朋友，一段时期内因同情共产党而引发 713 争议；根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欣<sup>1</sup>的描述，里斯由伯吉斯介绍加入共产党，并拥有自己的代码；可同时参见詹妮·里斯为其父写的传记：《寻找无名之辈》<sup>2</sup>。在伯林的回忆中，里斯“相貌英俊，充满魅力，喜欢捣蛋却令人开心；聪明，随和，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sup>3</sup>。著有：《夏日的洪水》（1932）、《分隔他们的桥梁》（1937）。

**里德利**，贾斯帕·莫里斯·亚历山大（在伦敦的朋友们称他为“泡泡”）（1913—1943），父亲为银行家，名字也叫贾斯帕·里德利，母亲姓本肯多夫；在巴利奥学院读本科生，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的朋友；1939年与（海伦·劳拉·）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1917—1998）结婚；在意大利作战时阵亡。他和伯林的主要纽带是音乐。伯林的《刺猬与狐狸》就是题献给他以表达纪念的。见菲利普·汤因比《反目：30年代的埃斯蒙德·罗密利与贾斯帕·里德利小传》（伦敦，1954）。

**罗斯柴尔德家族**。拿破仑战争时期，住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商业银行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1743—1812）的五个儿子，使整个家族进入欧洲金融家的行列。其中三个儿子分别在国外定居，建立了罗斯柴尔德金融王朝，遍布伦敦、维也纳和巴黎等地。通过紧密的业务联系和家族成员间近亲结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本卷书信集中出现的各分支成员有：

#### 英国分支

（莱昂内尔·）瓦尔特·罗斯柴尔德（1868—1937），1915年受封罗斯柴尔德

1 《克格勃绝密档案》（伦敦，1999），第104—105页，第111—112页。

2 伦敦，1994。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3。

男爵二世，梅耶·阿姆谢尔的长孙；其弟为：

(纳撒尼尔·) **查尔斯·罗斯柴尔德 (1877—1923)**，其妻为洛丝卡·冯·沃塞姆斯坦 (1870—1940)，在彼特伯勒附近的埃斯坦·沃德生活；他们的长女为：

**米利亚姆·路易莎·罗斯柴尔德 (1908—2005)**，昆虫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1943年与乔治·亨利·雷恩结婚 (原姓兰伊) (1957年离婚)；其弟为：

(纳撒尼尔·梅耶·) **维克托·罗斯柴尔德 (1910—1990)**，1937年受封为罗斯柴尔德男爵三世；动物学家；1935—193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1939—1945年加入情报部队；1933年与芭芭拉·朱迪斯·哈钦森 (1911—1989) 结婚 (1946年离婚)，芭芭拉之母为玛丽·巴恩斯·哈钦森，姐姐为杰里米 (见相关词条) (芭芭拉后来相继与雷克斯·华纳和尼科·吉卡结婚)。

#### 奥地利分支

**尤金·丹尼尔·德·罗斯柴尔德 (1884—1976)**，士兵兼艺术鉴赏家，迈耶·阿姆谢尔的曾孙。

#### 法国分支

**盖伊·爱德华·阿尔方斯·保罗·德·罗斯柴尔德 (1909年生)**，迈耶·阿姆谢尔的曾孙；银行家；1941年离开法国赴美 (在法国沦陷之前，曾在法国军队服役，获得英勇十字勋章)；加入1943年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1937年与阿力克斯·荷明·珍妮特·斯奇·德·科隆娜结婚 (1956年离婚)。

**埃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 (1845—1954)**，迈耶·阿姆谢尔的孙子，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农业人口定居计划，其子为：

**詹姆斯 (“吉米”)·阿曼德·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 (1878—1957)**，定居英国；1929—1945艾利岛自由党下院议员；1945年任供给部联合政务

次官，在白金汉郡的瓦德斯东庄园生活；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兰博德，(霍勒斯·) 安东尼·(克劳德) 爵士 (1911—1983)**，外交官，1935—1937年任职外交部，1937—1942年驻华盛顿，1942—1944年调任常驻公使，1944年任职于盟军总部地中海司令部；1944—1947年任职外交部。1937年与菲丽西蒂·安·贝里 (1917—1984) 结婚 (1974年离婚)。对于菲丽西蒂，伯林承认，“我有点爱上她了[……]在她丈夫跟华盛顿的另一个女人远走高飞以后，我作为寄膳宿者，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常常得安慰这位被抛弃的妻子。”<sup>1</sup>

**索尔特，(詹姆斯·) 亚瑟爵士 (1881—1975)**，1934—1944年任全灵学院政治理论与制度格莱斯通讲席教授兼研究员，1937—1950年任牛津大学 (独立) 下院议员，1941—1943年任英国驻华盛顿航运外交使团团长，后受封吉林顿的索尔特男爵一世 (1953)。1940年结婚，妻子为伊索·玛瑟·布拉德，婚前姓巴格 (1883—1969)。在哈里·霍德森的回忆中，他“精通世故，做事谨慎，有条不紊 (他年龄很大才结婚。美国妻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完美秩序感，大动干戈，把他在全灵学院屋子里所有的书全都重新进行摆放，他那种听之任之、无可奈何的沮丧模样，至今我记忆犹新)。作为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他脚踏实地，办事沉稳”。<sup>2</sup>主要作品包括：《联合航运管制：一项国际管理实验》(1921)、《世界经济危机与出路》(1932)、《重振，再次努力》(1932)、《世界萧条期的政治方面》(1932)、《欧洲合众国及其他》(1933)、《现代机械化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1933)、《有序社会的框架》(1933)、《中国与萧条：三个月访华印象记》(1934)、《世界贸易及未来》(1936)、《双重政策》(1939)。

**夏皮罗，迈耶 (1904—1996)**，艺术史家，博闻广识，善于启发和鼓励学生，对罗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2。

2 出处同前 (上文第820页注2)。



马式雕塑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艺术情有独钟；出生于立陶宛，孩提时代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和考古学系任教，1928—1936年任讲师，1936—1946年任助理教授，1946—1952年任副教授；其间他还在其他学校任教，包括纽约大学（1932—1936），社会研究新学院（1936—1952）；1928年结婚，妻子为儿科医生莉莲·米尔格兰姆（大约生于1903年）。《纽约时报》曾撰文：

715            在他眼中，所有的形式，不论是学校还是各种知识体系，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就他而言，一生中都在探索和传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所面对的读者，不仅有业内行家，也包括普通知识大众。[……]纽约将他造就成一位受欢迎的人，为他炽热敏捷的智慧提供养分，使他得以用惊人的速度和深度掌握一门又一门学科，在这点上，本世纪几乎无人可比。<sup>1</sup>

史密斯，阿利克·哈尔福德（1883—1958），1906—1919年任职苏格兰事务部，1914—1944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及哲学导师，1940—1944年任执行院长，1944—1958年任院长。1954—1957年任牛津大学校长。在罗伊·哈罗德的回忆中，“他的独创性与人文精神，哲学思想与乐天态度，学者的严谨和审美品位，这些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sup>2</sup>。E.C.约克形容史密斯为“心思细腻绵柔，实践智慧特别丰富”，“对美术鉴赏充满热情，目光敏锐[……]毫无架子，像个大男孩，彬彬有礼，极为可爱”。<sup>3</sup>约翰·斯帕洛回忆道：“他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这么说是因为他喜战好斗，在战斗中他无私无畏，不知疲倦。并且有充足理由不知羞耻，不顾体面。[……]他对学院的热爱，如同他身上的其他方面一样，就事论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淡泊无私，不考虑退路。”<sup>4</sup>著有《论知识》（1942）。

1 《纽约时报》，1996年3月4日，A1，D10版。

2 刊登在《牛津杂志》上的讣文，1958年11月6日，第78页。

3 埃（里克）·（塞西尔·）约克（上文第399页注1），发表在《牛津杂志》上的讣文，1958年12月，第70页。

4 “1958年7月4日全灵学院院长约翰·斯帕洛在大学生校友聚会的发言摘要（九天后果史密斯去

斯帕洛, 约翰·汉伯里·安格斯(1906—1992), 古典学家, 律师, 多产评论家, 同性恋者; 1929—195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后任全灵学院院长(1952—1977)。1941—1950年任职陆军部(华盛顿特区, 1941年2月—12月)。引用伯林的话:

他灵活机智, 喜欢冷嘲热讽, 充满魅力。不单这些, 他还才华横溢, 出类拔萃, 在道德和肉体上勇敢无畏, 思想独立, 所有这一切在我的所见所闻中十分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是他奉献一生的地方, 在那里, 他的主要成就在于, 用他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及卓越才华, 阻止现有状态发生任何改变。他有一些交情甚笃的朋友, 不多, 但十分真诚, 彼此友情维持了整整一生。与此同时, 他也有一些势不两立的仇敌, 尤其是在全灵学院的同事当中, 那些人自然也是以牙还牙, 以怨相报。不过, 最关键的是他的性生活, 不仅占据了他生活的主要位置, 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他对生活、对人、对文学、对政治的态度[……]众所周知, 他很容易厌倦, 喜欢与活力、机智、魅力为伍, 最崇尚青春, 对价值、美德和献身学术的严谨态度厌倦不已。他的价值观十分世俗化——尊敬政治家、政客、法官和银行家胜过尊敬大学教师。他希望别人景仰他, 逗他开心。对他而言, 人际关系远比学术关系来得重要。<sup>1</sup>

著有《维吉尔的半行和反复》(牛津, 1931)、《意义与诗: 论当代诗歌中意义的位置》(1934)。

斯彭德, 斯蒂芬·哈罗德(1909—1995), 诗人, 评论家, 1927—193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学院PPE专业。1939—1941年与人合作编辑《地平线》, 1941—1944

---

世)”, 该讲话刊登于“由新学院院长和研究员指导出版的颂词集”《阿利克·哈尔福德·史密斯, 1883—1958, 学者、研究员、新学院院长及牛津大学校长》[牛津, 无日期], 第5—10页, 在第5页和第10页上。

1 致约翰·劳的信, 1989年2月27日。

年任消防员。后与人合作编辑《面对面》(1953—1967)。1936年第一次婚姻(1941年离婚),对象为阿格尼斯·(“伊内兹”·)珀恩(1913—1976);第二次婚姻在1941年,对象为娜塔莎·列文(生于1919年)。以赛亚·伯林的终生朋友。在伯林回忆中,“他性格迷人,英俊潇洒,十分友好[……]天真大方[……]我们认识时,我一年级,他二年级,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结伴去住处附近的汉普斯特西斯公园散步。[……]当时他写得一手好诗,后来几年也是。[……]他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直言不讳,极有穿透力[……]他和评论对象之间没有隔阂。[……]和我们大家一样,他也持左派观点,但不教条,也不善分析[……]泛同情化,在思想感情上对一切都表示赞同。”<sup>1</sup>著作包括:《诗二十首》(1930)、《诗选》(1933)、《毁灭性因素》(1934)、《维也纳》(1934)、《燃烧的仙人掌》(1936)、《自由主义前锋》(1937)、《法官的审判》(1938)、《献给西班牙的诗》(1939)、《静止中心》(1939)、《废墟与憧憬》(1942)、《生活与诗人》(1942)、《公民在战争中及战争后》(1945)。

**斯特雷特**, 达夫妮·玛格丽塔夫人(1913—2003), 婚前姓芬奇—哈顿, 父亲为第十四世温切尔西伯爵(凯伦·布里克森的情人丹尼斯·芬奇—哈顿的兄弟), 嫁给美国出生的英国皇家空军成员惠特尼·威拉德·斯特雷特, 因此而成为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上文第375页注2)的嫂子。与以赛亚·伯林在纽约的英国情报处共过事, 其时她在伦敦英国情报部美国司任秘书。以赛亚·伯林非常喜欢她(她也一样), 对她的能力欣赏有加; 此外, 正如她在1943年8月14日致伯林的一封信中对自己轻描淡写的形容, “我还算看得过去”。显而易见, 两人都十分珍视相互之间的通信往来。遗憾的是, 以赛亚·伯林给达夫妮·斯特雷特的大多数私人信件都没有保存下来(还好1942年11月26日的这封信<sup>2</sup>是个例外, 根据外观来看, 并未寄出); 但是, 斯特雷特给伯林写的信件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 是他私人文件中极其珍贵的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9。

2 见上文第501页。

来函——正如她在1943年7月20日的来信中所言：“给你写信，我似乎总是在用心灵跟你说话。”

**特罗特·楚·索兹，亚当·冯（1909—1944）**，在德国拿到国际法博士学位后，1931—1933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PPE专业（罗氏奖学金获得者）；1937—1939年访美（两次）和访华<sup>1</sup>；1940年加入德国外交部，利用自己的职位获取对反对派的支持；1944年因在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七月阴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暴露，被希特勒逮捕，并于1944年8月26日遭杀害。1940年与克莱丽塔·梯芬巴切尔（1917年生）结婚。伯林对冯·特罗特的看法有点含糊不清（与大卫·阿斯特、黛安娜·霍普金森及其他人不同）。他曾经在1986年写过以下赞许话语： 717

30年代初，我和亚当·冯·特罗特非常熟悉。当时他是罗氏奖学金获得者，而我是研究生，之后才去了全灵学院。我们在巴利奥学院吃午饭时初次见面，聊到后来他建议说下午一起去散散步。我们几乎立刻成了朋友。他身上有种格外迷人的魅力，内心思想和言谈举止出类拔萃，特别潇洒。他说话机智幽默，和他相处，任何时候都会给人带来无尽快乐。我完全为之倾倒。他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知识极其渊博，胜过牛津的许多朋友；在谈话中，不时会引经据典，提到席勒、黑格尔、克莱斯特、歌德——当时在学PPE课程的学生当中，这些名字并不常挂在嘴上——他在我心里引发了对这些思想家的兴趣，此后这种兴趣一直陪伴着我。奇怪的是，在我记忆中，除了偶尔一两次例外，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从未跟我谈论过当代政治。显然，他对其他朋友并非如此。1931—1933年，在我眼里，他开心快活，无忧无虑，总是精力充沛。即便希特勒得势后，他也没有跟我谈过政治。一旦我提起这个话头，他总是扯开去，把内容转到有趣的、一般化的历史探讨中。

1933年，他有一段时间返回德国，之后又回到牛津。哲学家R.G.科林伍德

---

1 伯林曾对尼古拉斯·卡尔（上文第365页注1）说，1939年特罗特曾访美，被委派到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但谁也不清楚他在那里从事些什么工作。

为他举办了欢迎派对。大家全都围着他，七嘴八舌，向他询问德国的情况。他只简单回答了一句，“我的国家已病入膏肓”，就再没说其他了（据我的记忆确实如此）。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看到欧洲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一种致命的、突如其来的历史转变，这种变故无法归入普通的范畴，它凶险邪恶，令人恐怖，但也许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根本是像我这样被笼罩在宁静舒适、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牛津世界中的普通学者所无法理解的。

那以后，我很少见到他。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在他回德国定居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这封信有点令我失望。信是回应《曼彻斯特卫报》刊登的一份驻德国记者发来的报道，作者为F.A.沃伊特。他在报道中说，德国法庭审判中明显压制犹太人。我记得，亚当否认了这点，说在他担任律师的卡塞尔法庭上，事实并非如此。我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但又不无纳闷，这里明显的暗示，即压迫犹太人的现象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严重，根本站不住脚，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发表这样一封信呢？显然是他的一位朋友把我的感受跟他说了，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口气责备，并且在接下来一次来牛津时，对我说，尽管他理解我对犹太人的感受和同情，他在信中所写的一切全是事实，有必要表达出来。不管怎么说，我们继续着朋友关系。我托他带了封信给哈佛大学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教授，他拜访了菲利克斯，并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就像给我们大家一样。那之后，我再没见到他，一直到1938年，他作为汉弗莱·萨姆纳邀请的客人，在全灵学院吃饭。当时是他唯一一次主动对我谈起政治话题。他说，除非英国和法国奋起反抗希特勒，否则战争必将爆发，希特勒会获得胜利。我问他应该怎么做，他回答：“必须围困和阻止德国。应该尽早这么做。不能让德国的扩张行为得逞。”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718

1939年他最后一次访英，也许是明智之举吧，没有与我联系。全灵学院的院长亚当斯博士告诉我说，他收到亚当的一封信，说一旦发生战争，他或许会觉得有义务在自己国家的军队中战斗；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这封信。我还听说，亚当对其他人，或许还远不止那些人说起过，他在德国的朋友们如何作出努力，希望避免这场战争。但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内容，他对我只字未提。也

许他怀疑我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认为我对他没有什么政治用处，他这么想也没有错。总之，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任何秘密。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通过直接的渠道，了解3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德国或是美国，他在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们之间关系熟稔亲近、随意友好，但谈不上密切。战争爆发之后，直到1941年，我听到的任何有关他的消息都来自约翰·惠勒—班纳特，即便如此，也为数甚少。亚当反纳粹的态度我一直很清楚，但至于他有什么具体的政治想法、行动、志向和希望，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对他所冒的风险也一无所知，最后他为之惨烈牺牲。大卫·阿斯特是他在英国最亲近的朋友，或许还有其他人，对此事会有更多了解。

一些研究者曾给我来信，询问有关亚当·冯·特罗特的生活和政治活动，我实在无法为他们提供什么具体信息，只能说，他是一个勇敢高尚的人，一个情感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一个远离卑鄙可耻行为的人。他为了捍卫心目中本国同胞的切身利益，为了全世界正派人士的切身利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沃克，雷切尔（“小费”）（1913—1992），1931—1934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PPE专业，柏林的学生和亲密朋友，1935年曾希望与柏林结婚；后来罹患精神疾病。玛丽·班纳特写道：**

小费特别聪明，活泼可爱。穿着打扮无懈可击，一直都是朋友圈里的焦点。她是骑马纵狗打猎的高手——既晓得T.S.艾略特，也知道音乐剧《杰洛克斯》——是她领着我们了解了毕加索和斯特劳斯的华尔兹，让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在当柏林学生的时候，他们俩相互触动心弦，这点谁都看得分明。起初，她很可能没有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柏林的举止和对待任何一个聪明并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性没有两样，她错以为柏林仅对她另眼相待。毫无疑问，她觉得柏林爱上了她，并且很有可能认为，仅仅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和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她家属于传统的英国上层中产阶级——阻止他继续向前。她离开牛津去巴黎读哲学的那年（在那里，她差点接受了一位哲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大学的让·卡瓦耶]的火热进攻，他后来被德国人枪杀），她

得出结论，伯林正是她想嫁的人。那一年，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精神变得越来越错乱，几年后，被迫住进精神病院，一直到去世。

小费本人在给朋友芭芭拉·斯坦克里夫的信中提到过此事，该信邮戳为1935年3月25日，伯林从这种关系中脱身的前几个月。她在信中写道：

上次在无比兴奋的情绪当中，我曾挥笔给你去了一信。如今兴奋之情已经减弱。因为直到卡瓦耶先生向我求婚，我才猛然意识到，他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不知道。他比我聪明，比我强壮，比我纯洁。我崇拜他，爱他；但他过于严苛，过于讲究精确，把我身上所有被沙耶激发出来的才气都给吓跑了，包括横扫欧洲的人文精神、唐璜、布达佩斯、艾略特、画家埃尔·格列柯等——贵族之风席卷通往蓝色多瑙河的大理石台阶。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无法割断。沙耶两星期后会同盖伊·奇尔弗过来，玛丽会伴着我们。我要挥动扫帚，旋转起来，把他们俩全都赶出去……自由自在地待着。天赋在我心中，为了让它燃烧，我愿一人独处。

华莱士，戴维·约翰（1914—1944），其父为保守党议员领袖尤安·华莱士；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9年和普鲁邓斯·梅杰结婚，在希腊被流弹射中阵亡。华莱士长期在雅典居住，曾经穿越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土耳其，遍访考古遗址拍摄照片资料；他曾作为陆军少校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处；在以观察员身份派往第十希腊分队时阵亡；人们为他树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几行字（译文）：“这里埋葬着一位英国人，戴维·华莱士少校，他与游击队的战友们一起，安睡在此[……]希腊的土地为能向这位英雄提供安身之处而感到荣耀。”

沃伯格家族。来自德国汉堡的沃伯格金融世家，因为五兄弟的成就而举世闻名。

艾比·沃伯格（1866—1929）拒绝进入金融业，后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艺术

史家。

**马克斯·沃伯格 (1867—1946)**，沃伯格家族银行领头羊，德国汉堡犹太人领袖，1938年被迫移民美国。

**保罗·沃伯格 (1868—1932)** 与**菲利克斯·沃伯格 (1871—1937)**，均为银行家，妻子均为美国人并移民美国；保罗成为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推动力量；菲利克斯为其岳父的库恩罗布公司工作，并逐渐投身于慈善基金募集工作（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慈善活动）。

**弗里茨·沃伯格 (1879—1962)** 1938年前一直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中工作，德国银行业发生清除犹太人事件后移居瑞典，在以色列去世。 720

沃伯格家族下一代有：

**爱德华·莫提玛·莫里斯·沃伯格 (1908—1992)**，菲利克斯·沃伯格的儿子，著名艺术鉴赏家。父亲去世后，继续举办慈善活动。

**英格丽·沃伯格·斯宾纳里 (1910—2000)**，弗里茨的女儿，1932年在牛津学习，遇见伯林；1936年赴美，在难民组织里积极工作，1941年嫁给维尼洛·斯宾纳里，并于战后在意大利定居。

**弗雷德里克·约翰·沃伯格 (1898—1981)**，左翼出版家，属于很早就在英国立足的沃伯格家族的一支远房亲戚（是五兄弟隔三代的堂兄弟的儿子）；1922—1935年在劳特利奇父子教育出版公司工作（1931—1935年任联合执行编辑）；1936年，与罗杰·森豪斯一起购买了马丁·塞克公司，1936—1971年任马丁·塞克和沃伯格公司董事长，出版了乔治·奥威尔的多部著作，包括《动物农场》（1945）；1933年结婚，第二任妻子为帕米拉·德·贝尤（1905—1978），是位服装设计师兼画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这样形容她，“极富风韵，热心并无拘无束”<sup>1</sup>。

**魏茨曼，哈伊姆 (1874—1952)**，化学家，政治活动家；分别于1921—1931年、1935—1946年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事务局主席；1932—1950年

1 戴维·法拉尔，《沃伯格家族》（伦敦，1975），第233页。



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事会主席；1949年成为以色列开国总统。1906年与薇拉·查兹曼（1881—1966）结婚。《个人印象》中对其有描写。据伯林回忆：

魏茨曼是一个调情高手。只要他想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就一定能够办到[……]。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才智超人，极为风趣，是典型的政治家。他是一位伟人，强大有力，说话风趣盎然。亲切友好不是他的性格——他后来和我关系密切——但欢快、有趣，不一本正经，对权术和勾心斗角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绝对谈不上和善；一旦他不需要哪个人，会一脚将他踢到臭水沟里，就像温斯顿·丘吉尔。

**惠勒一班纳特，约翰·惠勒（原文如此）（1902—1975），1939—1940年任职英国驻纽约情报图书馆；1940—1941年任英国驻纽约新闻处副主任；1941—1942年任英国驻美情报处主任特别助理；1942—1944年任英国驻美国政治战争使团纽约办事处负责人；1944年任职外交部情报处，1945年任副主任；1944—1945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英国政治顾问助理。健康状况不佳，常常因劳累而病情加重。1945年与鲁斯·哈里森·里舍结婚。他的讣文由伯林起草，登载在《泰晤士报》上。里面对他的战时服务有以下评价：**

721

他是英国情报部举足轻重的三雄之一，肩负着修理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纽约英国情报机器的任务，并与A.N.摩根和阿兰·杜德利一起在纽约建立了英国情报处，该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促使美国舆论逐渐演变，发生了质的变化。[……]1942年，他开始担任英国驻美政治战争机构代表，后又任政治情报部门副主任和欧洲顾问。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年，他任职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政治顾问部门，并于1946年被委派参加英国审判团，赴纽伦堡战犯审判庭。他坚信这些审判绝对公正，导致他与一些反纳粹的德国老朋友产生分歧。同年，他被派担任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英语主编，

并被外交部长聘任为此类出版物的总顾问。<sup>1</sup>

作品包括：《裁军僵局》（1934），《兴登堡：木头太阳神》（1936）、《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遗忘的和平，1918年3月》（1938），《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特条约与德国东欧政策》（1939）。

**威廉斯，詹妮弗·玛格丽特（1914—2005）**，1932—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历史专业，1936—1947年主修公务员课程；1941年与赫伯特（H.L.A.）·哈特结婚，是伯林一生的亲密朋友。她父亲为约翰·费切尔·威廉斯，后两个名中间没有连字符，但许多人将“费切尔”认作是他家族姓氏的一部分；因此詹妮弗有时也被称作“费切尔—威廉斯小姐”（以及类似的名称）。1934年她在H.A.L.费希尔家中与伯林初次见面认识。由于申请公务员年龄必须达到二十二岁，她在牛津大学一直待到1936年，之后才参加考试，成绩优异。1936年认识赫伯特·哈特，两人从1937年起开始同居（通常不允许已婚女性担任公务员），1941年经特许与其结婚。更多信息见其自传《别再问我》（伦敦，1998）。本卷书信集即题献给她。

722

---

<sup>1</sup> 《泰晤士报》，1975年12月10日，第19版。

# 索引

道格拉斯·马修斯 汇编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 见中文本边码)

## 通信人索引

下列姓名按字母顺序排列, 详细信息见“总索引”。

- Adams, W. G. S, 亚当斯, W. G. S., (全灵学院院长), 187, 433, 490
- Alsop, Joseph, 艾尔索普, 约瑟夫, 480
- Astor, David, 阿斯特, 大卫, 615
- Ayer, A. J., 艾耶尔, A. J., 180
- Beaverbrook, Lord, 比弗布鲁克, 勋爵, 617
- Behrman, S. N., 伯尔曼, S.N., 470
- Berlin, Marie and Mendel, 伯林, 玛丽和门德尔(一起出现), 8, 94, 96, 99, 143, 264, 265, 292, 313, 314, 315, 322, 324, 329, 331, 333, 335, 342, 345, 347, 349, 350, 352, 353, 358, 359, 363, 365, 369, 371, 373, 381, 383, 384, 385, 386, 389, 392, 406, 407, 408 (2), 409, 413, 415, 417, 426, 428, 431, 451, 466, 468, 472, 490, 493, 495, 504, 522, 528, 539, 550, 581, 590, 591 (2), 593, 595, 629
- Berlin, Marie, 伯林, 玛丽, 12, 18, 20, 27, 54, 81, 82, 85, 122, 129 (2), 140, 142, 144, 183, 253, 592, 593
- Berlin, Mendel, 伯林, 门德尔, 18, 21, 59, 268, 277, 280, 281, 282, 290, 364, 369, 399, 405
- Bonham Carter, Cressida, 伯纳姆·卡特, 克里西达(后姓里德利), 265, 266, 267, 272, 277, 281, 293, 330, 403, 530
- Bowen, Elizabeth, 鲍恩, 伊丽莎白, 52, 70, 78, 86, 116, 131, 177, 180, 190, 193, 198, 213, 215, 225, 226, 229, 238, 240, 262, 282, 286, 288
- Bowra, Maurice, 鲍拉, 莫里斯(瓦德汉姆学院院长), 572
- Chesterton, G. K., 切斯特顿, G.K., 2(复

- 印件), 5
- Cohn, Mrs A., 科恩, A., 462
- Cox, Christopher, 考克斯, 克里斯托弗, 55, 57, 60, 94, 99, 559
- Cripps, Sir Stafford, 克里普斯, 斯塔福德, 爵士, 329
- Crosthwaite, Moore, 科洛思维特, 莫尔, 558
- Cruikshank, Robin, 克鲁克香克, 罗宾, 508, 526
- Dudley, Alan, 杜德利, 阿兰, 503
- Eliot, T. S., 艾略特, T.S., 22
- Faber and Faber, 费伯出版社, 643, 647, 649, 651
- Faber, Geoffrey, 费伯, 杰弗里, 638
- Fisher, H. A. L., 费希尔, H. A. L., 228
- Fisher, Lettice, 费希尔, 莱迪丝, 131, 301
- Fisher, Mary, 费希尔, 玛丽, 69, 91, 110, 112, 128, 139, 159, 209, 219, 230, 244, 263, 270, 298, 319, 337, 379
- Frankfurter, Felix, 法兰克福特, 菲利克斯, 119, 246
- Frankfurter, Marion, 法兰克福特, 玛丽安, 169, 178, 304, 326, 341, 343
- Frankfurter, Marion and Felix, 法兰克福特, 菲利克斯与玛丽安(一起出现), 104
- Freed Transformer Company, 复力得变压器公司(复印件), 614
- Frias, Maria, 弗里亚斯, 玛丽亚, 461
- Gaster, Maire, see Lynd, Maire, 加斯特, 莫伊拉, 见林德, 莫伊拉
- Gore-Booth, Paul, 戈尔—布思, 保罗, 464
- Grant Duff, Shiela, 格兰特·达夫, 谢拉, 40, 44, 45, 47, 75, 76, 82, 84, 85, 188, 224, 231, 260, 338
- Grundy, G. B., 格伦迪, G.B., 501
- Halifax, Lord, 哈利法克斯, 勋爵, 302
- Hall, Donald, 霍尔, 唐纳德, 492, 513
- Hampshire, Stuart, 汉普希尔, 斯图尔特, 145, 207, 238, 567
- Harriman, Averell, 哈里曼, 阿维里尔, 629
- Harrod, Roy, 哈罗德, 罗伊, 56
- Hart, Herbert, 哈特, 赫伯特, 497, 533
- Henderson, Charles, 亨德森, 查尔斯, 26, 29, 32, 36
- Henderson, Isobel, 亨德森, 伊索贝尔, 60
- Hertz, Joseph, 赫兹, 约瑟夫, 197
- Hill, Christopher, 希尔, 克里斯托弗, 563
- Hilton, John, 希尔顿, 约翰, 22, 23, 38, 46, 49, 117, 136, 146, 189, 206, 218, 276, 291
- Hilton, John and Peggy, 希尔顿, 约翰与佩吉, 88
- Hodgkin, Thomas, 霍奇金, 托马斯, 64,

- 66
- House, Humphry, 豪斯, 汉弗莱, 274
- Hubback, Diana, 哈贝克·黛安娜, 63, 73, 148
- Jay, Douglas, 杰伊, 道格拉斯, 295
- Jebb, Gladwyn, 杰布, 格莱德温, 318
- Joachim, Elisabeth, 乔奇姆, 伊丽莎白, 275
- Knopf, Blanche, 诺弗, 布兰奇(阿尔弗雷德·A.诺弗太太), 468
- Lambert, Baroness, 兰伯特, 男爵夫人, 561
- Leaning, W. J., 利宁, W. J., 465
- Lehman, Herbert H., 莱曼, 赫伯特·H., 362(2)
- Lehmann, Rosamond, 莱曼, 罗莎蒙德, 203
- Lindsay, A. D., 林赛, A. D.(巴利奥学院院长), 296
- Logan, Andy, 洛根, 安迪, 508
- Luce, Henry, 鲁斯, 亨利, 584
- Lynd, Maire (later Gaster), 林德, 莫伊拉(后姓加斯特), 103, 355
- Lynd, Sigle, 林德, 西勒, 53
- Malcolm, Angus, 马尔科姆, 安格斯, 438, 440, 443, 476, 625
- Morrow, Elizabeth, 莫洛, 伊丽莎白, 540
- New Yorker Store, The, 纽约客商店, 504
- Nicholas, Herbert, 尼古拉斯, 赫伯特 419, 541, 552
- Nicolson, Ben, 尼科尔森, 本, 254
- Niebuhr, Ursula, 尼布尔, 厄休拉, 459
- Patten, Susan Mary, 佩顿, 苏珊·玛丽, 627
- Price, Henry, 普莱斯, 亨利, 509
- Rees, Goronwy, 里斯, 戈伦韦, 37
- Ridley, Cressida, see Bonham Carter, Cressida, 里德利, 克里西达, 见伯纳姆·卡特, 克里西达
- Roberts, Frank, 罗伯茨, 弗兰克, 618
- Robertson, Giles, 罗伯逊, 盖尔斯, 147, 184
- Rumbold, Sir Anthony, 兰博德, 安东尼爵士, 517, 521
- Samunov, Ida, 萨姆诺夫, 伊达, 10
- Schalit, Bella, 沙立特, 贝拉, 24
- Schapiro, Lillian Milgram, 夏皮罗, 莉莲·米尔格拉姆, 378
- Schapiro, Meyer, 夏皮罗, 迈耶, 460
- Scott, Sir David, 斯科特, 大卫, 爵士, 434, 536, 544
- Smith, Alic, 史密斯, 阿利克(新学院院长), 569
- Spender, Stephen, 斯彭德, 斯蒂芬, 42, 123, 126, 141, 151, 157, 165, 172, 204, 236, 261, 269

- Stark, Freya, 斯塔克, 弗瑞亚, 494
- Straight, Lady Daphne, 斯特雷特, 达夫妮夫人, 423, 437, 440, 463, 499, 515, 545
- Toynbee, A. J., 汤因比, A. J., 516
- Trott, Adam von, 特罗特, 亚当·冯, 62, 89
- Turner, Walter, 特纳, 沃尔特, 535, 579
- Vennell, R., 文内尔, R., 562
- Weizmann, Chaim, 魏茨曼, 哈伊姆, 354, 396
- Williams, Jenifer, 威廉斯, 詹妮弗, 113, 114, 144, 149, 164, 198, 271
- Zimmern, Alfred, 齐门, 阿尔弗雷德, 234

## 总索引

姓名前面的星号表示收入“重要人物生平”。伯林著作直接出现在标题底下, 其他人著作出现在作者名字底下。年表未收入索引。

- abdication crisis, 退位危机(1936), 218
- Abdullah ibn Husayn, 阿布杜拉·伊本·侯赛因, 约旦国王(早期为埃米尔), 107
- Aberdeen, Ishbel Maria, Countess of, 阿伯丁, 伊斯贝尔·玛丽亚, 伯爵夫人(婚前姓马奇班克斯), 9
- Abrahams, Abraham, 亚伯拉罕斯, 亚伯拉罕, 346
- Abreu, Jacques, 阿布勒, 雅克, 471 n1
- Acheson, Dean Goodenham, 艾奇逊, 狄恩·古登汉姆, 621, 668, 691
- Adams, Muriel (née Lane), 亚当斯, 缪里尔(婚前姓莱恩), 703
- \*Adams, William George Stewart, 亚当斯, 威廉·乔治·斯图尔特(全灵学院院长): 入选全灵学院研究员, 65; 辞去格莱斯顿讲席教授职位, 82 n3; 关于体面, 121; 获荣誉侍从勋章, 179; 伯林呈递备忘录, 对心理学教授一职提出建议, 186; 伯林的观点, 207, 305, 703; 萨姆纳接任全灵学院院长一职, 539 n2; 霍德森的看法, 703; 联系冯·特罗特, 719
- Addis, John Mansfield, 艾迪斯, 约翰·曼斯菲尔德, 335

- Adler, Alfred, 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 79
- Adler, Elkan Nathan, 艾德勒, 艾尔坎·纳桑, 375
- Adler, Rabbi Herman, 艾德勒, 赫尔曼·拉比, 375 n3
- Aerenthal, Aloys Leopold Johann  
Baptist, Count Lexa von, 埃伦索尔, 埃罗伊斯·里奥波尔德·约翰, 施洗者, 列克萨·冯伯爵, 317
- Aitken, William Traven, 艾特肯, 威廉·特拉文, 91
- Akhmatova, Anna Andreevna (pseud. of Anna Andreevna Gorenko), 阿赫玛托娃,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的笔名: 图40): 伯林在列宁格勒与其会面, x1, 600—601, 605, 615, 619; 生活在列宁格勒, 574, 611 n4; 遭清洗, 606 n2; 离开列宁格勒, 607; 与古米廖夫所生之子, 609 n2; 《都柏林评论》文章, 611; 组诗《五点》, 619 n2;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献辞》, 597
- Akzin, Benjamin, 阿克金, 本杰明, 332, 334
- al-Husseini, Hajj Amin, 阿尔—侯赛尼, 哈基·阿明, 耶路撒冷的穆夫提, 98, 101, 120, 249 n7
- Aldington, Richard (né Edward Godfree), 奥尔丁顿, 理查德 (原姓爱德华·高德弗里), 610
- Aldridge, James Harold Edward, 奥尔德里奇, 詹姆斯·哈罗德·爱德华, 611
- Aleksii, Patriarch, 阿列克谢, 列宁格勒  
市主教 (原名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施曼斯基), 607
-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达朗贝尔, 让·勒朗, 67 n8
- Alexander, Samuel, 亚历山大, 塞缪尔, 41 n7
- Alington, Cyril Argentine, 阿林顿, 西瑞尔·阿根廷, 694 n
- Alington, Giles, 阿林顿, 吉尔斯, 542, 694 n
-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牛津大学全灵学院 (图9): 伯林任研究员的地方, xviii, x1, 33—34, 40—42, 63; 特点, 63; 伯林入选, 64—65, 171, 213, 539, 542, 560, 567; 伯林生活的地方, 115; 提议设立心理学教授一职, 186—188; 伯林辞去研究员职务 (1938), 274; 支持绥靖政策, 289—290
- Allen, Carleton Kemp, 艾伦, 卡勒顿·坎普, 574
- Allen, Sir Hugh Percy, 艾伦, 休·珀西爵士, 298, 300, 380, 415
- Allen, Percy Stafford, 艾伦, 珀西·斯塔福德, 9, 33—34; 去世, 49
- Ailing, Paul Humiston, 阿林, 保罗·休米斯顿, 438
- \*Alsop, Joseph Wright, 艾尔索普, 约瑟夫·赖特: 伯林去弗吉尼亚拜访, 348; 与伯林的友谊, 372, 377; 参加美国海军, 375; 在中国服役, 381; 被日军俘虏后释放, 411; 为处于康复期的伯林提供住处, 414; 作为美国官员派驻英国, 417—418; 与苏珊·玛丽·佩顿结

- 婚, 480 n1; 伯林推荐其担任驻华盛顿记者, 615
- Alsop, Stewart Johannot Oliver, 艾尔索普, 斯图尔特·乔汉纳·奥利弗, 615
- Alter, Victor, 奥特, 维克托, 431
- Amalfi, 阿马尔菲, 46, 417, 467
- Amanullah, King of Afghanistan, 阿玛努拉, 阿富汗国王, 250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美国劳工联合会, 383 n5, 656, 664
-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332 n2, 477
- American Jewish Conference, 美国犹太人大会 (1943), 450, 674
- Amery, Leopold Charles Maurice Stennett, 艾默里, 利奥泼德·查尔斯·莫里斯·斯丹内特, 670, 677, 683
- Amsterdam, Saul, 阿姆斯特丹, 索尔, 566
- Anand, Mulk Raj, 阿南德, 穆尔克·拉吉, 262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218
- Anderson, Sir John, 安德森, 约翰, 爵士, 568 n4
- Andrew, Christopher, 安德鲁, 克里斯托弗, 714
- Andrewes, Alison see Blakeway, Alison 安德鲁斯, 艾丽森, 见布莱克威, 艾丽森
- Andrewes, Antony, 安德鲁斯, 安东尼, 92, 100, 161 n6, 211
- Angell, Sir Norman, 安杰尔, 诺曼, 爵士, (原名拉夫·诺曼·安杰尔·莱恩), 439
- Annan, Noel Gilroy, Baron, 安南, 诺埃尔·吉洛伊, 男爵, xlii, 589
- Annenkov, Pavel Vasil'evich, 安年科夫,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 201
- Annunzio, Gabriele d', 邓南遮, 加布里埃尔, 306
- Anrep, Anastasia, 安瑞普, 安娜斯塔西亚, 163
- Anrep, Boris Vasil'evich von, 安瑞普,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冯, 163 n2
- Anrep, Helen, 安瑞普, 海伦, 163 n2
- Antonius, George, 安东尼厄斯, 乔治, 98, 101, 120
- Apricott, Albert Alfred, 阿普利克特, 阿尔伯特·阿尔弗雷德 (伯林的笔名), 191
- Apter (s) family, 阿普特一家, 505—506
- Apter (s), Rachile, 阿普特, 拉希勒 (婚前姓别林基), 364, 505—506, 525—526
- Apter, Kadish Mendelevich (later Konstantin Markovich Apters) 阿普特, 卡迪什·缅杰列维奇 (后改名康斯坦丁·马克维奇·阿普特斯), 358—359, 364, 371, 505—506, 524—525, 582, 629
- Apter (s), Liliana, 阿普特, 莉莉安娜, 505—506, 525
- Apter, Solomon Mendelevich, 阿普特, 所罗门·缅杰列维奇, 506
- Arabs, 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 477, 669—670, 675—676, 685, 689—690, 692;



- 石油利益, 679
- Aranne, Zalman, 阿兰, 扎尔曼, 693
- Aristotelian Society: Proceedings, 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 231—232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534, 637, 710
- Armstrong, Hamilton (‘Ham’) Fish, 阿姆斯特朗, 汉密尔顿(‘汉姆’)·费希, 423
- Arnheim, Rudolf: *Film als Kunst*, 阿恩海姆, 鲁道夫:《作为艺术的电影》, 643—646
- Arnold, Thomas, 阿诺德, 托马斯, 625
- Aronson, Adir, 阿伦森, 阿迪尔, 361
- Aronson, Fanny, 阿伦森, 范妮, 332, 361
- Aronson, Samuel (‘Mulya’), 阿伦森, 塞缪尔(“穆利亚”): 移民美国, 307; 伯林在纽约谈到他, 318, 323, 332, 343, 345, 351, 353, 371, 395; 经营困难, 346, 348—349, 366; 伯林父亲没有写信给他, 349, 364; 无聊, 375; 迁至北卡罗莱纳州, 456, 505
- ‘Arts in Russia under Stalin, The’,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以赛亚·伯林), 601n3
- Ashcroft, Peggy, 阿什克罗夫特, 佩吉, 711
- Ashton-Gwatkin, Frank Trelawny Arthur (‘John Paris’), 阿什顿—格瓦特金, 弗兰克·特里劳尼·亚瑟, 567, 573, 591
- Ashton Wold, 阿什顿·沃德, 244, 714
- Asquith, Anthony, 阿斯奎斯, 安东尼, 266
- Asquith, Herbert Henry, 阿斯奎斯, 赫伯特·亨利, 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一世, 222 n4
- Astor, (Francis) David (Langhorne) 阿斯特, (弗朗西斯·)大卫(·朗荷恩), 615, 718
-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公约, 422
- Attlee, Clement Richard, 艾德礼, 克莱门特·理查德(后封艾德礼伯爵一世), 382, 582 n1, 670, 677, 688, 690—691
- Auden, Wystan Hugh, 奥登, 维斯坦·休: 移民美国, 126 n2, 306; 伯林赞扬诗歌, 127; 小组剧团, 138; 戴·刘易斯的评论, 191; 斯彭德的评论, 225; 卡里特太太评论, 237; 在纽约拜访伯林, 342; 《死亡之舞》, 138; 《皮下之狗》(与衣修午德合作), 127, 138; 《冰岛来信》(与麦克尼斯合著) 88 n2
- Austen, Jane, 奥斯汀, 简, 63 n2, 73, 80
- \*Austin, John Langshaw, 奥斯汀, 约翰·兰索: 入选全灵学院任研究员, 64—65; 与伯林交谈, 115, 116 n3; 与伯林一道举办哲学研讨会, 152 n1, 233—234; 里德利的评论, 157; 伯林准备前往哥廷根, 250; 逻辑实证主义, 497; 在牛津的地位, 498; 哈特在新学院的哲学教职, 512, 534; 汉普希尔的前途, 577; 伯林对他的回忆, 233—234, 703
- Austria, 奥地利: 纳粹威胁, 83; 在战争

期间考虑未来, 421—422

*Authorized Daily Prayer Book of the United Hebrew Congreg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Singer’s Prayer book’), 《大英帝国联合希伯来教会钦定每日祷告书》(辛格版祷告书), 392

*Authors Take Sides on the Spanish War*, 《文人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188 n6

Averbach, Hilda, 埃弗巴克, 希尔达, 129

\*Ayer, Alfred (‘Freddie’) Jules, 艾耶尔, 阿尔弗雷德(“弗雷迪”)·朱尔斯: 与卡西尔, 62; 学术生涯, 108—109; 布希奥斯给法兰克福的信, 108; 逻辑实证主义, 117, 497; 伊丽莎白·鲍恩《巴黎之屋》中的描述, 135; 女儿瓦莱丽出生, 155, 170; 评论林德曼, 166; 特点与风格, 170, 239; 法兰克福拜访牛津, 178—179; 向《新牛津展望》投稿, 180; 赞赏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192; 鲍拉从美回国, 225; 参加奥斯汀和伯林的哲学探讨, 233—234; 汉普希尔与妻子勒内的关系, 238 n, 239—240; 与伊内兹·珀恩的情事, 244; 与斯彭德关系破裂, 244; 伯林希望在美国谋职, 252; 伯林在从爱尔兰返回途中与其见面, 284; 关于太太战争期间在汉普夏避难, 294; 服役, 305, 341 n1, 387—388; 适应美国, 328; 婚姻关系, 344, 395; 战争期间访美, 387—388, 390; 加入

英国秘密情报处, 也称军情六局, 388 n1; 关于里斯太太, 388; 担任克莱丽莎·丘吉尔的导师, 405 n2; 与克拉玛斯基, 429; 战争期间回到英国, 429—430, 460; 被派往黄金海岸, 460; 牛津职位, 498; 与哈特一起, 511; 关于兰博德, 517; 伯林的评价, 704; 玛丽·伯林的反感, 704; 《语言、真理与逻辑》, 164

Ayer, Julian, 艾耶尔, 朱利安, 345

Ayer, (Grace Isabel) Renée, 艾耶尔, (格蕾斯·伊莎贝尔·)勒内(婚前姓里斯, 后改姓汉普希尔, 图33): 结婚, 62 n5, 704; 伦巴音乐让伯林想起她, 92; 居住在伦敦, 108; 和日本, 215; 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的关系, 238 n3, 294, 305, 576, 704; 婚姻关系, 239—240, 344, 395; 装修伯林在新学院的房间, 278; 战时在汉普夏避难, 294; 身居美国, 337, 341—351 返回英国, 349, 388, 390

Ayer, Valerie, 艾耶尔, 瓦莱丽, 155, 345

Ayerst, David George Ogilvy, 艾尔斯特, 大卫·乔治·奥吉尔维, 36

Bacon, Robert Law, 培根, 罗伯特·劳, 487 n1

Bacon, Virginia Murray, 培根, 弗吉尼亚·穆雷, 487

Badoglio, Marshal Pietro, 巴多格里奥, 佩特罗, 将军, 442

Baker, Harold Trevor, 贝克, 哈罗德·特里弗, 温切斯特院长, 301

- Baker, Inez (‘Inezita’ / ‘Zita’) Hilda (née Davis, later Crossman), 贝克, 伊内兹 (“伊内兹塔” / “兹塔”)·希尔塔 (婚前姓戴维斯, 后姓克罗斯曼), 233, 707
- Baker, John Randal, 贝克, 约翰·兰达尔, 233 n1, 707
- Baker, Liva, 贝克, 利沃, 709
- Bakunin, Mikhail Aleksandrovich,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42 n2, 200—202
- Baldwin, Stanley, 鲍德温, 斯坦利, 146, 173
- Balfour, Arthur James, 1st Earl, 贝尔福, 阿瑟·詹姆斯, 伯爵一世, 249 n1, 388; 巴勒斯坦宣言, 671
- Balfour, John (‘Jock’), 贝尔福, 约翰 (乔克), 481—482, 550, 569, 572, 618, 624, 630
- Balliol College, Oxford, 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 216, 565—567, 571, 576
- Balogh, Thomas (later Baron), 巴洛夫, 托马斯 (后封男爵), 339—340
- Baneth, David Hartwig, 巴内斯, 戴维·哈特维格, 97
- Bar Giora, Shimon, 巴·吉奥拉, 西蒙, 663
- Barber, Eric Arthur, 巴伯, 埃里克·阿瑟, 458
- Barclay, Roderick (‘Roddie’) Edward, 巴克莱, 罗德里克 (“罗迪”)·爱德华, 434—435, 519, 568
- Barger, Evert Hugh, 巴格, 艾弗特·休, 65
- Baring, Maurice, 巴林, 莫里斯, 112, 366
- Barker, Arthur, 巴克, 阿瑟, 83
- Barker, Ernest, 巴克, 厄内斯特, 83
- Barkley, Alben William, 巴克利, 阿尔本·威廉, 554, 557
- Barnes, Kenneth Ralph, 巴恩斯, 肯尼斯·拉尔夫, 244
- Barnett, Canon Samuel Augustus, 巴纳特, 塞缪尔·奥古斯特, 牧师, 77
- Barlett, Frederic Charles, 巴雷特, 弗雷德里克·查尔斯, 187 n2
- Bartok, Béla, 巴托克, 贝拉, 273
- Baruch, Bernard Mannes, 巴鲁克, 伯纳德·曼尼斯, 447, 450, 623 n3, 665, 674
- Bates, Herbert Ernest, 贝茨, 赫伯特·欧内斯特, 172
- Bathurst, Maurice Edward, 巴瑟斯特, 莫里斯·爱德华, 425
- Battershill, Sir William, 巴特希尔, 威廉爵士, 683
- Battle of Britain (1940), 不列颠之战 (1940), 333, 334 n1, 336 n1
- Baudelaire, Charles, 波德莱尔, 夏尔, 173, 609
- Bayou, Pamela de, 贝尤, 帕米拉·德, 见沃伯格, 帕米拉
- Bazley, Sir Thomas, 巴兹雷, 托马斯, 爵士, 127
- Bazykin, 巴兹金 (葛罗米柯的助手), 464

- Beale, Marie Chase Oge, 毕尔, 玛丽·翠丝·奥加, 483—484, 487 n2, 548
- Beaulieu-sur-Mer, 滨海博利厄, 261—263, 295
- Beaumont, Robert Leslie, 博蒙特, 罗伯特·莱斯利, 213
- Beaverbrook, William Maxwell Aitken, 比弗布鲁克, 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 伯爵一世, 91, 206, 496, 543, 546, 583
- Beazley, John Davidson, 比兹雷, 约翰·戴维森, 147 n1
- Beazley, Marie, 比兹雷, 玛丽, 147, 156, 184
- Beckett, (William) Eric, 贝克特, (威廉·)埃里克, 568
- Beecham, Audrey, 比彻姆, 奥黛丽, 220, 237, 250—251
- Beeley, Sir Harold, 比利, 哈罗德爵士, 339, 348, 582, 667
-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凡, 154, 272—273
- Beethoven Society, 贝多芬协会, 148
- Begin, Menachem, 别金, 梅纳赫姆, 121 n4
- Behrman, Samuel Nathaniel, 伯尔曼, 塞缪尔·纳撒尼尔, 470
- Belinsky, Vissarion Grigor'evich, 别林斯基, 维萨利昂·格利高耶维奇, 259
- Bell, Anne Olivier, 贝尔, 安妮·奥丽维娅, xxii, xxvi, 69 n1
- Bell, Caroline: 'Petticoat Diplomat', 贝尔, 卡罗琳: “穿裙子的外交官”, 399 n1
- Bell, Clive, 贝尔, 克莱夫, 644
- Bell, John, 贝尔, 约翰 (圣保罗学校校长), 6, 11
- Bell, Kenneth Norman, 贝尔, 肯尼思·诺曼, 66, 162 n6, 384
- Bell, Oliver Sydney, 贝尔, 奥利弗·西德尼, 162
- Bell, Quentin Claudian Stephen, 贝尔, 昆丁·克劳迪安·斯蒂芬, 69
- Bell, Walter Fancourt, 贝尔, 沃尔特·凡考特, 457
- Belloc, (Joseph) Hilaire Pierre, 贝洛克, (约瑟夫·)希莱尔·皮埃尔, 145
- Belville, Rupert, 贝尔维尔, 鲁珀特, 223 n1
- Beloff, Max (later Baron), 贝洛夫, 马克斯 (后为男爵), 141, 199, 213 n2, 265, 518
- Bemelmans, Ludwig, 贝蒙尔曼斯, 路德维希, 412
- Ben Zakkai, Yochanan, 本·撒该, 约哈南, 663
- Ben-Gurion, David, 本—古里恩, 大卫, 21, 666—667, 672—674, 677, 685—687, 690—691
- Benckendorff family, 本肯多夫家族, 366
- Benckendorff, Count Alexander Konstantinovich, 本肯多夫,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 366 n5
- Bendern, Count John de, 本德恩, 约翰·德, 伯爵, 507 n3

- Bendern, Lady Patricia Sybil de, 本德恩, 帕特里西娅·西比尔·德, 夫人(婚前姓道格拉斯, 图35), 457 n5, 471 n1, 507, 583, 615, 621 n1
- Benedict XV, Pope, 本尼迪克特十五世, 教皇, 168 n3
- Benenson, Fira see Ilinska, Countess Fira, 贝纳森, 菲拉, 见伊林斯卡, 菲拉, 伯爵夫人
- Benenson, Grigory, 贝纳森, 格里高利, 360 n5
- Beneš, Edvard, 贝奈斯, 爱德华, 421—422
- Bennett, Mary, 班纳特, 玛丽, 见玛丽·费希尔
- Bennett, John, 班纳特, 约翰, 708
- Benson, Rex Lindsay, 本森, 雷克斯·林赛, 393
-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 297
- Benthamism, 边沁主义, 145
- Bentley, Edmund Clerihew, 本特利, 埃德蒙·克莱里休, 5 n, 485
- Bentwich, Norman de Mattos, 本威茨, 诺曼·德·玛托斯, 247, 383
- Berg, Alban, 贝尔格, 阿尔班, 273; *Wozzeck*, 《沃采克》, 82
- Bergner, Elisabeth, 伯格纳, 伊丽莎白(保罗·吉纳太太), 313—314, 316
- Bergson, Henri, 伯格森, 亨利, 77, 635
- Bergson, Peter, 伯格森, 彼得(西莱尔·库克的化名), 439 n2
- Beriya, Lavrenty Pavlovich, 贝利亚,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 607, 694 n
-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 乔治, 克洛因主教, 77
- Berkeley, George Fitz-Hardinge, 贝克莱, 乔治·菲茨—哈丁吉, 263
- Berle, Adolf Augustus, Jr, 伯尔, 小阿道夫·奥古斯塔斯, 420—421, 422, 425 n4, 439, 448, 464, 477, 484, 491, 668
- Berle, Dr Beatrice (née Bishop), 伯尔, 贝阿特丽丝, 博士(婚前姓毕晓普; 小阿道夫·奥古斯塔斯·伯尔的妻子), 465, 484
- Berlin, 伯林: 以赛亚·伯林来访(1945), 589, 627
- Berlin family, 伯林一家, 496
- Berlin, Aline, 伯林, 艾琳, 见斯特劳斯, 艾琳
- Berlin, Beinus, 伯林, 贝纳斯, 254
- Berlin, Irving (né Israel Baline), 伯林, 欧文(原姓伊斯雷尔·巴林), 42, 397, 478—480, 489, 492, 506, 508 n5, 585
- \*BERLIN, ISAIAH, 伯林, 以赛亚: 图8, 13, 16, 21 及以下提到的各幅图; 教育与学术生涯(图4, 7), xviii, xxxix—xl, 5, 11, 19—20, 25; 写信, xxi—xxii; 谈话, xxxvii—xxxviii, xlv, 461; 生活和性格, xxxvii—xlv; 荣誉, xxxix, xlii; 婚姻, xli; 作品与思想, xli—xlv; 拼写, 12 n2, 640 n2; 闲聊, 15; 财务账目, 18—19; 语言, 21 n4; 听音乐会和看戏, 26, 82—3, 86, 100, 118, 122—123, 131, 133, 140, 205, 237, 263, 266, 272, 292, 294,

495, 580, 603; 职业前景, 28, 33—34; 学习政治学, 36; 为出版社撰写报告, 37, 638—653; PPE课程学位, 38; 任新学院讲师, 38—39, 41, 61—62; 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40—42, 63; 与欧文·伯林混淆, 42, 397, 478—480, 506; 阅读俄国书籍, 42—43; 在爱尔兰(图20, 29), 50—54, 86—88, 176, 191—121; 承认有“盗窃癖”, 74; 访巴勒斯坦, 93—102, 105—106, 109—110; 否认订婚, 95; 牛津生活, 115; 突染扁桃体周脓肿, 130—131, 169; 写音乐评论, 140, 143—144, 191 n5, 236; 扭伤脚趾头, 141; 孩提照(图17), 147 n5; 与J.L.奥斯汀共同举办哲学研讨会, 152 n1, 233—234; 笔名, 191; 初次乘飞机, 217, 222—223; 在疗养院住数月, 228—229; 对牛津PPE专业的看法, 234—236; 上演演讲技巧课, 241 n1; 普鲁丹斯·佩尔哈姆为他写的打油诗, 244 n7; 在萨尔茨堡的装束(图19), 256; 网球式对话, 257; 在法国里维埃拉, 261—261; 从全灵学院转新学院任研究员, 274, 288; 反对慕尼黑协议, 289—290; 担任研究员, 290—291; 要求为战争效力, 302—304; 战时访苏计划, 312, 318—319, 324, 326—327, 329, 331, 333—335, 338, 355—356, 452—345, 458, 473, 482, 530, 655; 获驻华盛顿官方职位, 332—333; 为英国驻美情报图书馆工作, 340—341, 348—351; 战争期间经葡萄牙返回英国,

352—355; 受命到英国驻纽约情报处任职, 354, 356; 回到美国(1941年1月), 357—360; 在美国的外貌与穿着, 367; 在纽约住院, 373, 387; 伯纳斯小说《远离疯狂战争》中的描写, 388; 看戏, 391, 471, 600; 负责英国使馆驻华盛顿政治新闻调查室(图36), 399—400; 向伦敦发送有关美国舆论倾向的报告, 399—402; 在英国休假(1942年8月), 403; 患肺炎在纽约住院, 404—414, 416, 432; 演讲, 406; 康复, 415—417; 华盛顿社交生活, 460—461; 在美国旅行, 465—468, 483, 494; 被召回伦敦(1944年3月), 488—489; 对思想史产生兴趣, 489; 在美国度假(1944年7—8月, 图37), 495; 被邀到外交部任职, 513—520, 526, 537, 544—545; 拒绝赴巴黎任职, 515—516, 519; 治疗肺炎, 522, 526, 528—529, 539; 访问墨西哥, 535—537, 539—540, 545; 克拉克·科尔邀请去莫斯科大使馆(图38), 550—552, 558—559, 563, 569—570, 573, 583; 离开华盛顿(1945年夏天), 552, 581; 战后在新学院任职, 567; 被派往旧金山会议, 580—581; 被取消赴波茨坦会议的资格, 582—583; 感染流感, 583; 《时代》杂志关于他的文章, 584—585; 访问莫斯科(1945), 587, 589; 访问列宁格勒, 592—595, 597, 599—612, 615; 在阿赫玛托娃诗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题献辞中, 597; 布伦达·特里普

- 对伯林的评价, 600—601; 关于俄罗斯的官方报告, 601; 被授予不列颠帝国高级勋章, 615, 617 n2; 回到华盛顿(1946), 615, 621; 回到牛津(1946年4月), 630
- Berlin, Isaiah, 伯林, 以赛亚, 爵士, 496 n1
- Berlin, Lev (Leo) Borisovich, 伯林, 列夫(列奥)·鲍里索维奇(门德尔的兄弟), 590, 591—592, 618 n3
- Berlin, Marie, 伯林, 玛丽, 见(玛莎·)玛丽·伯林
- Berlin, Meir (Bar-Ilan), 伯林, 梅耶(巴以兰), 97, 101 n5, 102, 428—430, 432, 438, 496 n1
- \*Berlin, Mendel (Borisovich), 伯林, 门德尔(·鲍里索维奇)(伯林父亲; 图2): 《家族回忆录》, xxv, 587; 事业, xxxix, 352 n1, 393; 访里加, 8; 探望伯林, 27—28; 祝贺伯林获得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 41—42; 在阿马尔菲, 46; 在法国与伯林共度假期, 54; 没有妻子的消息心急如焚, 85; 在莫斯科, 136; 关于慕尼黑协定, 290; 伯林去往美国, 357; 胆囊问题, 364 n5; 战争时期住在伯林新学院宿舍, 364 n5; 为伯林支付生活费, 365; 关于伯林在纽约患肺炎问题, 404—408, 413, 417—481; 伯林建议购房, 472—473; 计划在伯恩茅斯度假, 505; 在战后的德国, 592—593; 性格, 704—705
- \*Berlin, (Mussa) Marie, 伯林, (玛莎·)玛丽(婚前姓沃什诺克; 伯林母亲; 图1, 2): 口授传记文件, xxv; 性格, xxxix, 704; 访里加, 8, 254; 犹太复国主义, 9 n2, 93; 在德国, 54; 伯林向其汇报, 81—83, 473; 住在布莱顿, 85 n1, 91; 伯林在德罗伊特维奇探访, 90; 健康状况, 129, 136; 出国, 240; 与奥斯卡·菲利普的友谊, 316 n6, 为伯林出发去美国而担忧, 321; 战争时期的住处, 364 n5; 伯林在纽约患肺炎, 408—409, 413, 417—418; 伯林建议购房, 472; 计划在伯恩茅斯度假, 505, 539; 染发, 551n1; 对伯林不写信表示不满, 629 n1
- Berlin, Samuel Borisovich, 伯林, 塞缪尔·鲍里索维奇(门德尔的兄弟), 590 n1, 594 n5,
- Berlin, Shaye, 伯林, 沙耶, 254
- Berlin, Solomon ('Lyoma') Borisovich, 伯林, 所罗门('利奥马')·鲍里索维奇(门德尔的兄弟), 596
- Berlioz, (Louis) Hector, 柏辽兹, (路易·)赫克托, 154, 531; 《安魂弥撒曲》, 156
- Berners, Gerald Hugh Tyrwhitt-Wilson, 伯纳斯, 杰拉德·休·特威特—威尔森, 十四世男爵, 150, 153, 304—305, 392, 494; 《远离疯狂的战争》, 388
- Bernhardt, Sarah (née Henriette-Rosine Bernard), 伯恩哈特, 莎拉(婚前名为亨利埃塔—罗西尼·贝尔纳德), 165, 508
- Bernstein, Sidney Lewis, 伯恩斯坦, 西德尼·刘易斯, 407, 408, 410, 418

- Betjeman, John, 贝杰曼, 约翰, 251
- Bètove, 贝托夫, 694 n
- Beveridge, William Henry, 1st Baron, 贝弗里奇, 威廉·亨利, 男爵一世, 459
- Bevin, Ernest, 贝文, 欧内斯特, 621, 623, 670, 688—690
- Bianchi, JoãoA. de, 比安奇, 若昂·德, 575
- Bick, Myer Oscar, 28, 比克, 梅耶·奥斯卡, 54—5, 317 n1, 418
- Bielenberg, Christabel, 别兰伯格, 克里斯特贝尔, 91 n2
- Biéville, Anne de, 比埃维耶, 安·德, 伯爵, 150, 153, 258
- Biltmore Resolution, 比特莫决议(1942), 674
- Bing Boys, The, 秤男孩, 559
- Binnie, Alfred Maurice, 宾尼, 阿尔弗雷德·德·莫里斯, 381
- Birkenhead, Frederick Winston Furneaux Smith, 2nd Earl, and Sheila, Countess of, 伯肯海德, 弗里德里克·温斯顿·福诺·史密斯, 伯爵二世, 和希拉(婚前姓伯里), 女伯爵, 160 n1, 179
- Bishop, Herbert Francis (‘Adrian’), 毕肖普, 赫伯特·弗朗西斯(“阿德瑞安”), 216, 238
-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 亲王, 201
- Black, Hugo LaFayette, 布莱克, 雨果·拉斐特, 485
- Blackwell, Basil, 布莱克韦尔, 巴希尔, 177 n1
- Blackwell, Benjamin Henry, 布莱克韦尔, 本杰明·亨利, 116 n1
- Blaikie, Derek Edward Walter, 布莱基, 德瑞克·爱德华·沃特(原姓凯恩): 与伯林一起度假, 55—56; 马克思主义, 174; 在牛津, 186; 在音乐会上遇见伯林, 237
- Blake, Nicholas, 布莱克, 尼古拉斯, 见戴·刘易斯, 塞西尔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175, 636
- Blake-Tyler, H. B., 布莱克—泰勒, H. B., 434
- Blakeway, Alan Albert Antisdell, 布莱克威, 阿兰·艾伯特·安提斯代尔, 50, 111, 140 n3, 161—162, 206, 210—211
- Blakeway, Alison, 布莱克威, 艾丽森(婚前姓霍普; 后姓安德鲁斯), 50 n2, 161—162, 210—211, 221
- Blanc, Jean-Joseph Charles-Louis, 布朗, 让—约瑟夫·夏尔—路易, 201
- Blech, Leo, 布勒希, 莱奥, 49
- Bliss, Arthur Edward Drummond, 布里斯, 阿瑟·爱德华·德拉蒙德, 226
- Bliss, Mildred Barnes, 布里斯, 米尔德里·巴恩斯, 487 n2
- Blixen, Karen, 布里克森, 凯伦, 717
- Blok,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勃洛克,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 76, 127, 551, 609
- Bloomsbury group,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 153, 194
- Blum, Lion, 布鲁姆, 莱昂, 264, 290
- Blum, Sol, 布鲁姆, 索尔, 476



- Blumberg, William, 布卢姆伯格, 威廉, 183
- Blunden, Edmund, 布兰登, 埃德蒙德: 《英国乡村》, 535 n1
- Blunt, Alfred Walter Frank, 布伦特, 阿尔弗雷德·沃尔特·弗兰克, 布拉福德的主教, 219 n1
- Blunt, Anthony Frederick, 布伦特, 安东尼·弗雷德里克, 148, 186, 216, 260, 318 n1
- B'nei B'rith, 圣约协会, 9, 97
- Boase, Thomas ( 'Tom' ) Sherrer Ross, 博厄斯, 托马斯(“汤姆”)·谢里尔·罗斯: 宽慰佩吉·杰伊, 113; 担任詹妮弗·威廉斯的导师, 114 n4; 在牛津与伯林一起, 150—151, 226, 260; 鲍拉取笑其名, 176; 谈论奥尼尔, 192; 杰里米·哈钦森谈论博厄斯, 209; 辞职, 220; 亲切友善, 229
- Boehme, Jakob, 伯麦, 雅各布, 113
- Boenders, Frans, 伯恩德斯, 弗兰斯, 489 n1
- Bogdano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波格达诺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 119 n1
- Bohlen, Avis Howard, 波伦, 埃维斯·霍华德(婚前姓泰耶尔), 628 n5, 629
- Bohlen, Charles ( 'Chip' ) Eustis, 波伦, 查尔斯(“奇普”)·尤斯提斯, 481, 486, 488, 520—522, 559, 581—582, 623, 628—629
- Boisson, Pierre François, 布瓦松, 皮埃尔·弗朗索瓦, 420
- Böker, (Robert) Alexander Herbert, 伯克, (罗伯特·)亚历山大·赫伯特, 575
- Bolsover, George Henry, 波尔索弗, 乔治·亨利, 624
- Bonham Carter, Charlotte, Lady, 伯纳姆·卡特, 夏洛特, 夫人, 269
- Bonham Carter, (Helen Laura) Cressida, 伯纳姆·卡特, (海伦·劳拉·)克里西达(后姓里德利; 图27), 256—257, 265, 403 n2, 507, 530, 714
- Bonham Carter, Sir Edgar, 伯纳姆·卡特, 埃德加, 爵士, 269 n2
- Bonham Carter, Sir Maurice and Lady Violet, 伯纳姆·卡特, 莫里斯爵士和维奥拉夫人(婚前姓阿斯奎斯), 256 n1, 330 n3
- Bonnier de la Chapelle, Fernand, 邦尼尔·德拉·夏贝尔, 费尔南德, 420 n3
- Boothby, Robert John Graham (later Baron), 布思比, 罗伯特·约翰·格雷厄姆(后为男爵), 542, 546
- Borge, Victor, 波吉, 维克托, 556 n4
- Boston, Mass., 波士顿, 马萨诸塞, 483, 495
- Boult, Adrian, 博尔特, 阿德里安, 83 n1
- Boult, David Robert, 博尔特, 戴维·罗伯特, 299, 507, 524
- Boult, Nancy Patricia Norah, 博尔特, 南希·帕特里西亚·诺拉, 507, 524
- Bournemouth, 伯恩茅斯, 505, 539
- Bousios, Basil Nicholas Hellenagoras, 布希奥斯, 巴西尔·尼古拉斯·海伦纳葛

- 拉斯, 108
- Bovard, Oliver Kirby, 波瓦特, 奥利弗·科比, 383
- Bowen, Anne Marcelia Cole, 鲍恩, 安·马尔切利亚·科尔, 284
- \*Bowen, Elizabeth Dorothea Cole, 鲍恩, 伊丽莎白·多罗西亚·科尔(即艾伦·卡梅伦夫人): 伯林访鲍恩宅邸, 51—53, 191, 278, 280; 弗吉尼亚·伍尔夫来信谈起伯林, 69; 伯林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见面; 70—71; 关于美国, 79; 在牛津, 82, 90, 108, 204; 结识戈伦韦·里斯, 93; 思想独立, 153; 伯林表示欣赏, 170, 705; 与戈伦韦·里斯的关系, 182, 192, 196, 215, 712; 伯林引用其表达, 199 n5; 描述瑞基茨, 205; 品位低俗, 213; 计划赴日旅行, 215; 关于伊内兹·珀恩, 221; 伯林邀请其来牛津, 226; 夸大其辞的倾向, 239; 在萨尔茨堡, 245; 写《夜与日》的评论文章, 251; 称赞伯林的斗篷, 256; 汉弗莱·豪斯寄小册子, 262; 在海斯的童年, 281 n2; 造访新学院, 289; 战时, 304; 《猫跳和其他故事》, 87—88; 《心之死》, 193 n1, 288—289; 英国小说家, 535 n1; 《巴黎之屋》, 132 n1, 133, 135, 139, 170, 191, 289; 《向北方》, 284, 286 n1, 288
- Bowen, Erica, 鲍恩, 艾丽卡(婚前姓贝利), 45 n1, 387, 390
- Bowen, (Ivor) Ian, 鲍恩, (艾弗·)伊恩, 45, 77, 126, 192, 358, 387, 390, 567, 576, 582
- Bowen's Court, Co. Cork, 科克郡的鲍恩宅邸, 51, 192, 196, 240, 280, 284—285, 287, 705, 712
- Bowes-Lyon, Sir David, 鲍斯—莱昂, 大卫, 爵士, 435—436
- Bowman, Isaiah, 鲍曼, 以赛亚, 492
- \*Bowra, (Cecil) Maurice, \*鲍拉, (塞西尔·)莫里斯: 谈及伯林的影响, xlii; 从维罗纳给伯林来信, 47; 给在荷兰的伯林来信, 47; 不喜欢简·奥斯汀, 80; 与戈伦韦·里斯一起, 83; 说福斯特很烦人, 104; 布希奥斯给法兰克福的信, 108; 弗兰克尔称赞, 109; 牛津茶会, 111; 在柏林, 113; 与伯林在全灵学院, 115, 127; 举止, 116; 离开牛津, 129, 211, 225; 自我评价, 132; 与伯林闲聊, 135; 讨厌彼得·赛, 140; 拜访剑桥, 141; 恨康诺利, 142, 190; 关于特纳的信的批注, 144; 关于伯林不喜欢迁居, 152; 心灵的独立, 153; 任命希腊语瑞吉尔斯讲席教授一事未果, 154, 169—170, 173, 177—178; 在布莱克威的聚会上, 161—162; 在戴·刘易斯的小说中被描绘, 167; 对林德曼的看法, 167; 调整请客计划, 169; 对本科生的态度, 174; 开博厄斯的玩笑, 176; 伯林控其肆无忌惮, 181, 190; 在哈佛, 182, 218, 220, 229, 253, 328; 和戈伦韦·里斯与伊丽莎白·鲍恩的关系, 182; 和戈伦韦·里斯的关系, 190; 谈论奥尼尔, 192; 评论人物, 196; 伯林致信伊丽莎白·鲍

- 恩, 198; 谈论马丁·库珀, 205; 关于布莱克威之死, 206; 从美国返回, 225; 与伯林的关系, 233; 奥黛丽·比彻姆, 237, 250—251; 伯林对他的依恋之情, 240; 伯林给他写信, 244, 371; 伯林提议去哥廷根, 250; 婚姻前景, 250—251; 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向北方》中的描述, 286 n1, 288 n; 任瓦德汉姆学院院长, 286, 293—294; 开玩笑, 287, 304; 伯林对其看法, 289; 费希尔的葬礼悼文, 300; 伯纳斯与其同住, 305; 谈论阵亡, 306—307; 政治倾向, 338; 反对伯林前往纽约, 356; 伯林离开美国, 371, 383; 捷克文学, 380; 对法兰克福特的批评文章, 382, 388; 伯林订书(《象征主义的遗产》), 432, 458, 460; 谈论安妮·弗里门特, 454; 给在美国的伯林写信, 470, 539; 推辞, 498; 不赞成哈特获选研究员职位, 539; 关于伯林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 667; 得到玛丽·伯林的喜爱, 704; 伯林对他的回忆, 705—706; 朋友, 710; 《从维吉尔到弥尔顿》, 575; 《希腊抒情诗歌》, 154; 《象征主义的遗产》, 432 n2, 458 n2, 460
- Bracken, Brendan**, 布莱肯, 布兰登(后封子爵一世), 423 n8, 457, 487, 496 n5, 503
- Bradley, Francis Herbert**, 布莱德利, 弗朗西斯·赫伯特, 77, 514 n2, 650, 652
- Braithwaite, Richard Bevan**, 布雷思维特, 理查德·贝文, 117, 135
- Branch, Guy**, 布兰奇, 盖伊, 151, 244 n7, 257—258, 293—294
- Branch, Lady Prudence**, 布兰奇, 普鲁丹斯夫人, 见佩尔哈姆, 普鲁丹斯夫人
- Brand, (Robert) James**, 布兰德, (罗伯特·)詹姆斯, 547
- Brand, Robert Henry**, 布兰德, 罗伯特·亨利(后封男爵一世), 377, 475, 547, 560
- Brandeis, Louis Dembitz**, 布兰代斯, 路易斯·丹比兹, 360, 364, 382, 465, 665—666
- Brandt, Raymond Peter**, 布兰特, 雷蒙德·彼得, 554
- Brant, Irving Newton**, 布兰特, 欧文·牛顿, 554
- Brecht, Bertolt**,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 127
- Brentford, William Joynson-Hicks**, 布伦特福德, 威廉·乔因森—希克斯, 子爵一世, 30
- Brest-Litovsk, Treaty of (1918)**,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 317, 536
- Breton, André**, 布雷东, 安德烈, 174
- Brett, Reginald Baliol**, 布莱特, 雷吉纳德·巴利奥, 厄舍尔子爵二世, 186
-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 464 n5, 543, 546
- Bricker, John William**, 布瑞克, 约翰·威廉, 485, 486, 499
- Bridges, Edward**, 布里吉斯, 爱德华, 568

- Brighton, 布莱顿, 85 n1, 91, 240
- Brimelow, Thomas, 布莱姆罗, 托马斯, 592 n1
- Britansky soyuznik* (Soviet journal), 《英国盟友报》(苏联报刊), 605 n5, 608 n1, 612
-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BIS), 英国情报处, 209, 354, 541, 543, 655—656, 721; 调查报告, 548—549
- British Library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英国情报图书馆(纽约), 340—341, 343—344, 346, 348—351, 655, 721
- British Press Service (US), 英国新闻处(驻美), 309 n3, 356, 366, 717, 721
- Brittain, Vera, 布里坦, 维拉, 576 n4
- Broad, Charlie Dunbar, 布罗德, 查理·邓巴, 118, 157, 497, 511
- Broadmead, Philip Mainwaring, 布罗米德, 菲利普·梅因沃林, 583
- Brodersen, Lelia, 布洛德森, 蕾丽亚, xviii & n3, xxxv
- Brodetsky, Selig, 布罗德茨基, 塞里格, 524, 530
- Brogan, Denis William, 布洛根, 丹尼斯·威廉, 319, 660
- Browder, Earl Russell, 白劳德, 厄尔·拉塞尔, 563
- Brown, Alec John Charles, 布朗, 艾里克·约翰·查尔斯, 114
-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The*, 《恶魔希特勒与国会纵火案的棕皮书》, 60
- Brown Harriman (US bank), 布朗·哈里曼(美国银行), 332, 334—335, 347
- Brown, 布朗小姐(伊丽莎白·鲍恩的朋友), 51
- Brown, Norman Oliver, 布朗, 诺曼·奥利弗, 149 n4, 203
- Brown Shipley (bank), 布朗·西普雷(银行), 290
- Browne, Sir Thomas, 布朗, 托马斯, 爵士, 227
- Bruce Lockhart, Sir Robert (Hamilton), 布鲁斯·洛克哈特, 罗伯特(·汉密尔顿), 爵士, 491, 527
-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乔达诺, 634
- Bryusov, Valery Yakovlevich, 布瑞乌索夫, 瓦莱里·雅科夫列维奇, 551
- Buchan, Alistair Francis, 巴肯, 阿利斯泰尔·弗朗西斯, 217
- Buchan, John, 巴肯, 约翰(后封特威兹穆尔男爵一世), 195, 287
- Buchan, John, 巴肯, 约翰(后封特威兹穆尔男爵三世), 178 n1
- Buchan, Susan, 巴肯, 苏珊(后成为夫人), 195
- Buchan, William de l'Aigle, 巴肯, 威廉·德·莱格勒, 178, 287
- Buckler, William Hepburn and Georgina, 巴克勒, 威廉·赫本与乔治娜, 136
- Budden, Sidney, 布登, 西德尼, 22 n3
- Buehne, Sheema Z., 布恩, 西玛·Z., xviii n3
- Buhler, Lady Prudence, 布勒, 普鲁丹斯夫人, 见佩尔哈姆, 普鲁丹斯夫人

- Buhler, Robert, 布勒, 罗伯特, 244 n7
- Bullard, Arthur, 布拉德, 亚瑟, 574 n6
- Bullard, Sir Reader (William) 布拉德, 里德(·威廉), 爵士, 620
- Bullitt, William Christian, 布力特, 威廉·克里斯蒂安, 336, 521, 622
- Bullock, Alan Louis Charles, 布洛克, 阿兰·路易斯·查尔斯(后来成为男爵), 542
- Burgess, Guy Francis de Moncy, 伯吉斯, 盖伊·弗朗西斯·德·芒西: 与伯林在美国, xviii, 312—313, 315 n3, 318; 喝酒, 148; 提出与伯林同往莫斯科, 312, 318, 324, 333; 被召回英国, 322, 324, 330; 玛丽·伯林对其表示反感, 704; 与里斯的友谊, 713
- Burgh, William George de, 伯格, 威廉·乔治·德, 184
- Burlyuk, David Davidovich, 伯刘克, 戴维·戴维多维奇, 551
- Burra, Edward John, 布勒, 爱德华·约翰, 205
- Busch, Adolf, 布什, 阿道夫, 272 n2
- Busch Quartet, 布什四重奏, 272—273
- Busch, Wilhelm, 布什, 威廉: 《马科斯与莫里茨》, 266
- Busoni, Ferruccio Dante Michelangel Benvenuto, 布梭尼, 费卢奇奥·但丁·米开朗琪罗·本维努托, 140
- Butler, Harold Beresford, 巴特勒, 哈罗德·贝尔斯福德: 英国驻华盛顿情报处负责人, 309, 405, 435, 502; 伯林患病, 407, 414; 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 423—424; 与伯林的友谊, 418, 431; 伯林谈低效率和失去人心, 431, 569; 政治行动委员会, 501; 婉拒任职邀约, 503; 格兰特·麦肯兹, 527; 称赞哈耶克的书, 541, 543
- Butler, Joseph, 巴特勒, 约瑟夫, 达勒姆主教, 692 n1
- Butler, Nevile Montagu, 巴特勒, 内维尔·蒙塔古, 399, 440—441, 481
- Butler, Nicholas Murray, 巴特勒, 尼古拉斯·穆雷, 253
- Butler, Rohan d'Oli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巴特勒, 罗汉·道利尔, 《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 1783—1933》, 392
- Butterfields (Bermuda bank), 巴特菲尔德银行(百慕大银行), 325, 343, 348
- Byrnes, James Francis, 伯恩斯, 詹姆斯·弗朗西斯, 542, 547, 553, 557, 621, 623
- Byron, George Gordon, 拜伦, 乔治·戈登, 男爵六世, 155, 230
- Calder-Marshall, Arthur, 卡尔德—马歇尔, 阿瑟, 21 n5, 180; 《死点》, 227; 《空头支票》, 226
- Cambon, Jules Martin, 坎波, 朱尔斯·马丁, 335
- Cambridge, 剑桥大学: 鲍拉访学, 141; 伯林访问, 152 n1, 215—216; 谍网, 318 n2, 506 n4
- Cameron, Alan Charles, 卡梅伦, 艾伦·查尔斯, 171, 192, 204, 215 n1,

- 240, 705
- Cameron, Mrs Alan, 卡梅伦, 艾伦太太, 见伊丽莎白·鲍恩
- Camões, Luis de, 卡蒙斯, 路易斯·德, 575
- Campbell, Archibald Hunter, 坎贝尔, 阿奇博尔德·亨特, 126, 156
- Campbell, Sir Gerald, 坎贝尔, 杰拉德, 爵士, 309, 375, 382, 503
- Campbell, Sir Ronald Ian, 坎贝尔, 罗纳尔德·伊恩, 爵士, 425, 428, 434, 516, 520, 550
- Canada: Soviet spy suspects arrested in, 加拿大: 苏联间谍嫌疑人遭逮捕, 624—625
- Cane, Cyril Hubert, 凯恩, 西瑞尔·休伯特, 384
- Cantor, Georg Ferdinand Ludwig Philipp, 康托, 乔治·费迪南德·路德维希·菲利普, 80
- Capehart, Homer Earle, 凯普哈特, 荷马·厄尔, 499
- Caradon, Hugh Mackintosh Foot, 卡拉东, 休·麦金托什·伏特, 男爵, 97 n1
- Cardano, Gerolamo (Jerome Cardan), 卡丹诺, 杰洛拉莫(杰罗姆·卡丹), 167
-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297
- Carnap, Rudolf, 卡尔纳普, 鲁道夫, 160
- Carol II, 卡罗尔二世, 罗马尼亚国王, 249
- Carr, Edward Hallett, 卡尔, 爱德华·哈雷特, 542, 694 n; 《卡尔·马克思》, 200, 202; 《米哈伊尔·巴枯宁》, 265
- Carr, Herbert Wildon, 卡尔, 赫伯特·维尔顿, 512
- Carritt, Edgar Frederick, 卡里特, 埃德加·弗雷德里克, 141, 512
- Carritt, Gabriel, 卡里特, 加布里埃尔, 181
- Carritt, Winifred Margaret Frampton, 卡里特, 威妮弗雷德·玛格丽特·弗兰普顿(婚前姓埃提), 237
- Carruthers, 卡路瑟丝小姐(约翰·福斯特从前的家庭教师), 366, 370—371, 432, 474
- Casals, Pablo, 卡萨尔斯, 帕布罗, 295
- Casey, William Joseph, 凯西, 威廉·约瑟夫, 547
- Cassirer, Bruno, 卡西尔, 布鲁诺, 317 n7
- Cassirer, Else, 卡西尔, 艾尔丝, 317
- Cassirer, Ernst, 卡西尔, 恩斯特, 62, 64, 91
- Cassirer, Paul, 卡西尔, 保罗, 317 n7
- Cassirer, Toni, 卡西尔, 托尼, 62 n5, 317
- Casson, Stanley, 卡森, 斯坦利, 174
- Castle Howard, Yorkshire, 霍华德城堡, 约克郡, 170 n1
- Catlin, George Edward Gordon, 卡特林, 乔治·爱德华·戈登, 576
- Catullus, Gaius Valerius, 卡图卢斯, 盖尤斯·瓦雷里乌斯, 154
- Cavallés, Jean, 卡瓦耶, 让, 122, 720
- Cavour, Count Camillo Benso di, 加富尔, 卡米洛·本索·迪, 伯爵, 437, 691
- \*Cecil, Lord (Edward Christian) David

- (Gascoyne), 塞西尔, (爱德华·克里斯蒂安·)戴维(·加斯科涅), 勋爵: 论奥托琳·莫瑞尔, 111 n3; 思想独立, 153; 伊丽莎白·鲍恩(卡梅伦夫人)招待, 170; 与鲍拉竞争希腊语系主任一职, 177; 哈罗德引用他说的话, 225; 伯林希望与其见面, 241; 在鲍恩宅邸, 285; 品位, 286; 去瓦德汉姆学院拜访鲍拉, 293—294; 噪音, 304; 在战时的牛津, 304—305; 伯林打算从美国返回, 348; 写信给在美的伯林, 371, 384, 392, 427, 524; 伯林暂离美国, 383, 455, 475, 493, 539; 伯纳斯的小说《远离疯狂的战争》, 388; 伯林从华盛顿出差时顺道来访, 494; 哈特在新学院的导师职位, 512; 关于把妻子带到牛津; 534; 伯林的回忆, 706; 《英国诗人》, 535 n1
- Cecil, Rachel, 塞西尔, 雷切尔(戴维·塞西尔夫人; 婚前姓麦卡锡), 294, 706
- Céline, Louis-Ferdinand, 塞利纳, 路易—费迪南德(路易—费迪南德·迪斯坦图奇的笔名): 反犹太主义, 263
- Celler, Emanuel, 塞勒, 伊曼纽尔, 450
-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米格尔·德, 632
- Chamberlain, Joseph: daughters, 张伯伦, 约瑟夫: 女儿们, 463
- Chamberlain, Lawrence Henry, 张伯伦, 劳伦斯·亨利, 319
-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张伯伦, (阿瑟·)内维尔, 249, 282, 284—285, 355 n1, 500
- Chaplin, Charles (‘Charlie’) Spencer, 卓别林, 查尔斯(“查理”)·斯宾塞, 30
- Charles, 查尔斯, 威尔士王子, 529 n4
-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Auguste René, 夏多布里昂,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勒内, 子爵, 270
- Chekhov, Anton Pavlovich, 契诃夫, 安东·帕夫洛维奇, 242; 《三姐妹》, 558
- Chelmsford, Frederic John Napier Thesiger, 切姆斯福德, 弗雷德里克·约翰·内皮尔·塞西格, 子爵一世, 41
- Chennault, General Claire Lee, 陈纳德, 克莱尔·李, 将军, 481 n2, 615, 703
- Chester, (Daniel) Norman, 切斯特, (丹尼尔·)诺曼, 410
- Chesterton, Frances, 切斯特顿, 弗朗西斯, 7 n
-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切斯特顿, 吉尔伯特·基思: xvi, 2, 5, 6—8, 639; 《别为战争感到自豪》(诗歌), 8
-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182, 481 n2, 615 n5
- Chicago, 芝加哥, 385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476 n4, 622 n3
- Chichester, Jocelyn Brudenell Pelham, 奇彻斯特, 乔赛琳·布鲁登内尔·佩尔哈姆, 伯爵六世, 244 n7
- Childs, Larissa, 柴尔斯, 拉丽莎(婚前·姓丘玛科夫), 360, 381
- Childs, Marquis William, 柴尔斯, 马奎

- 斯·威廉, 518
- Childs, Stephen Lawford, 柴尔斯, 斯蒂芬·罗福德: 担任英国驻华盛顿新闻官员, 329, 377; 劝说伯林对美国驻欧洲记者的报道进行分析并撰写报告, 331, 337, 342—343, 655; 就伯林在美的长期职位进行谈判, 345—350, 377; 批准把钱转给在美的伯林, 365; 与伯林的关系, 381; 失去人气, 396, 424
- Chilver, Elizabeth (‘Sally’), 奇尔弗, 伊丽莎白 (“萨莉”), 见格雷夫斯, 伊丽莎白
- \*Chilver, Guy Edward Farquhar, 奇尔弗, 盖伊·爱德华·法夸尔 (图16): 伯林与其在佛罗伦萨见面, 111; 与阿米德·欧佩, 113; 在巴黎拜访雷切尔·沃克, 122, 720; 邀请伯林吃午餐, 140; 作为温切斯特学院派, 160; 在布莱克威举办的派对上, 162; 洋洋自得, 210; 布莱克威之死, 211; 与贝蒂·罗素, 223; 战时准备, 287; 政治倾向, 338; 从美国返回伦敦, 414; 在美国, 427; 伯林与其合住华盛顿的房子, 455, 467, 469, 473, 493, 496, 502, 552, 594; 从华盛顿转达问候, 506, 512; 与普莱费尔的友谊, 568; 伯林对其看法, 706
- Chilver, Priscilla (later Davidson), 奇尔弗, 普丽西拉 (后来姓戴维森; 图16), 113
- Chilver, Richard Clementson, 奇尔弗, 理查德·克莱蒙森 (图13, 16), 58, 60, 133 n1, 161, 163 n1, 227 n5, 239 n1, 513
- Chukovsky, Korney Ivanovich, 楚科夫斯基, 考尔尼·伊万诺维奇, 573
- Church, Madeline Edith (later House), 丘奇, 迈德琳·伊迪斯 (后姓豪斯), 80, 87, 711
- Churchill, (Anne) Clarissa, 丘吉尔, (安妮·) 克莱丽莎 (后姓伊顿; 再后来成为艾冯郡伯爵夫人), 407
- Churchill, Clementine Ogilw, 丘吉尔, 克莱门汀·奥格维 (婚前姓霍兹尔), 478, 479—480
- Churchill, Mary (later Lady Soames), 丘吉尔, 玛丽 (后来成为索亚米斯夫人), 478
- Churchill, Randolph Frederick Edward Spencer, 丘吉尔, 伦道夫·弗雷德里克·爱德华·斯宾塞, 600, 603, 606—607
-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丘吉尔, 温斯顿·列奥纳德·斯宾塞: 阅读伯林的华盛顿快讯, x1; 反布尔什维克观点, 30; 反纳粹, 158 n4; 关于不列颠之战, 337 n7; 亲犹太复国主义情绪, 355n1, 376, 670, 676, 686; 在美国受欢迎, 367, 387; 呼吁美国提供物资援助, 369; 压制伊拉克叛乱, 373 n3; 战争时期访美, 390—391, 434, 436 n5, 467; 与罗斯福的关系, 391, 456; 肺炎, 432; 伯林在华盛顿与其见面, 467; 将欧文·伯林误认为以赛亚·伯林, 478—480, 489, 508 n5,



- 584; 罗斯福1944年再度当选, 500; 参加雅尔塔大会, 542 n6; 上任, 569; 就“铁幕”问题写信给杜鲁门, 51; 出席波茨坦会议, 582 n3; 1945年大选失败, 594, 600 n1, 688, 690—691; 苏联对他的看法, 594—595; 拉克林赠书, 607; “铁幕”演说(富尔顿, 密苏里, 1946), 623 n3; 在佛罗里达州与伯恩斯见面, 623; 得到魏茨曼的支持, 669; 反对1939年有关巴勒斯坦的白皮书, 670; 创建犹太国, 671; 莫因遭暗杀, 687—688, 113; 伯林将其与魏茨曼比较, 721; 《演说全集》(罗伯特·罗兹·詹姆斯编), 336 n7
- Clair, René, 克莱尔, 雷内, 52
- Clark, Albert Curtis, 克拉克, 阿尔伯特·柯蒂斯, 31, 56—57, 64, 112 n4,
- Clark, Barbara, 克拉克, 芭芭拉, 69
- Clark, George Norman, 克拉克, 乔治·诺曼, 69, 296
- Clark, Joel Bennett (‘Champ’), 克拉克, 乔尔·班纳特(“钱普”), 557
- Clark, Kenneth Mackenzie, 克拉克, 肯尼斯·麦肯齐(后封伯爵), 177, 186, 384
- Clark, William Donaldson, 克拉克, 威廉·唐纳森, 575, 580, 616
- Clark Kerr, Sir Archibald John Kerr, 克拉克·克尔, 阿奇博尔德·约翰·克尔, 爵士(后成为英弗切普尔男爵一世): 从莫斯科访华盛顿, 473, 481—482; 邀请伯林去莫斯科, 550—552, 558—559, 563, 569, 573; 伯林提议取消莫斯科之行, 583; 回到莫斯科, 595; 在华盛顿接替哈利法克斯, 624
-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 威廉, 145
- Cockburn, Claud, 科克伯恩, 克劳德: 《困难时刻》, 481 n5
- Cocteau, Jean, 科克托, 让: 《可怕的孩子们》, 134
- Codrington, Christopher, 科德灵顿, 克里斯托弗, 163
- Coghill, Neville Henry Kendal Aylmer, 柯格西尔, 内维尔·亨利·肯达尔·埃尔默, 553
- Cohen, Arthur J. M., 科恩, 阿瑟·J.M., 112
- Cohen, Benjamin Victor, 科恩, 本雅明·维克托: 与伯林见面, 323, 368, 377; 拜访伯林父母, 372; 辞去美国政府职位, 381; 乔·艾尔索普, 419; 照片登上《时代》周刊, 427; 戈德曼请教, 445; 建立联合国的谈判, 496; 在国务院, 621; 美国犹太人, 665, 672; 协助起草巴勒斯坦托管协议, 681
- Cohen, Joseph, 科恩, 约瑟夫(“隔壁的科恩”), 313—314, 316
- Cohen, Morris Raphael, 科恩, 莫里斯·拉斐尔, 534
- Cohn, Alfred Einstein, 科恩,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345, 406, 462
- Cohn, Mrs Alfred Einstein, 科恩,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太太, 462
- Cohn, David Lewis, 科恩, 大卫·刘易斯, 425
- Coldstream, William Menzies, 科尔德斯

- 特里姆, 威廉·蒙吉斯, 293—294
- Cole, (George) Douglas Howard, 科尔, (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 x1, 67, 155
- Cole, Margaret Isabel, 科尔, 玛格丽特·伊莎贝尔, 155
- Coleridge, Richard Duke, 科勒律治, 理查德, 公爵(后封男爵四世), 380 n5
- Coleridge, Rosamund (née Fisher), 科勒律治, 罗莎蒙德(婚前姓费希尔), 380, 427, 456
- Colley, Noreen, 科雷, 诺琳, 285
- Collingwood, Robin George, 科林伍德, 罗宾·乔治, 44, 72, 117
- Collins (publishers): 柯林斯(出版社): 《画中不列颠》系列, 535 n1
- Cologne, 科隆, 35
- Colonial Office, 殖民部, 547, 560
- Colville, John Rupert, 科尔维尔, 约翰·鲁珀特, 479—480
-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 援助盟国捍卫美国委员会, 326 n2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伯林的观点, 153—154; 伯林抵制, 188; 在战后的欧洲, 522, 623—624; 求助于柏拉图, 636; 产业工会联合会, 664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斯彭德加入, 167, 229; 林德姐妹, 712; 据说里斯被吸收入党, 714
- Conant, James Bryant, 柯南特, 詹姆斯·布莱恩特, 253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CIO), 383, 385, 656, 664
- Connelly, Matthew J., 康奈利, 马修·J., 556
- Connelly, Willard, 康奈利, 维拉德, 320
- Connolly, Cyril, 康诺利, 西瑞尔, 83, 142, 169, 190, 195, 221, 226; 《岩池》, 174, 181
- Cooke, Allison, 库克, 艾里森, 407
- Cooke, Revd George Albert, 库克, 乔治·阿尔伯特, 牧师, 162 n2
- Cooke, Helen, 库克, 海伦, 162
- Cooke, Mary Munroe, 库克, 玛丽·门罗, 548—549
- Coolidge, Calvin, 柯立芝, 卡尔文, 441
- Cooper, Lady Diana, 库珀, 戴安娜, 夫人(后成为诺维奇子爵夫人), 190, 628
- Cooper, (Alfred) Duff, 库珀, (阿尔弗雷德·)达夫(后成为诺维奇子爵): 对鲍拉的态度, 190; 派柴尔斯去美国, 347; 罗纳德·特利担任其议会私人秘书, 423 n; 请伯林去巴黎工作, 515, 519, 529, 538; 伯林的微辞, 568, 577; 担任驻法国大使, 575; 亲阿拉伯情绪, 670
- Cooper, Martin du Prè, 库珀, 马丁·杜·普耶, 64, 191, 205—206
- Corelli, Arcangelo, 科莱里, 阿坎杰罗, 293
- Cornes, John Frederick ('Jerry'), 科纳斯, 约翰·弗雷德里克(“杰瑞”), 31, 35—36
-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 牛津大

- 学基督圣体学院(图6), xviii, xl, 5, 9, 17, 20, 25, 502
- Coupland, Reginald, 卡普兰德, 雷吉纳尔德, 120, 159, 163, 246—249
- Coward, Noël Pierce, 考沃德, 诺埃尔·皮尔斯, 127
- \*Cox, Christopher William Machell, 考克斯, 克里斯托弗·威廉·马切尔(图13, 15): 与伯林一起游爱尔兰(图29), 50—53, 86—88, 409;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认识, 70; 伯林对特罗特捍卫纳粹表示愤怒, 84; 不喜欢叶芝, 86—87; 谢拉·格兰特·达夫离开牛津, 89; 父亲去世, 111; 在维也纳, 131; 伯林邀请吃午餐, 140; 祝贺佩尔斯结婚, 159; 行为, 210; 伪中产阶级趣味, 213; 人品, 220; 与伯林关系, 233; 回到英格兰, 245; 政治倾向, 338; 伯林打算从美国回来, 346; 怂恿伯林在美国工作, 357; 英国特点, 379; 哈特在牛津的职位, 499, 534; 伯林的描述, 706
- Cox, (Anthony) David Machell, 考克斯, (安东尼·)戴维·马切尔, 560
- Coy, (Albert) Wayne, 科伊, (阿尔伯特·)韦恩, 485
- Cranborne, Robert Arthur James Gascoyne-Cecil, 克兰伯恩, 罗伯特·阿瑟·詹姆斯·加斯科涅—塞西尔, 子爵(后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五世), 423, 683
- Crawford, 克劳福德上校, 425
- Creasey, John, 克雷西, 约翰, 45 n1
- Creed, Richard Stephen, 克里德, 理查德·斯蒂芬, 338
- Creevey, Thomas, 克里维, 托马斯, 436
- Cripps, Sir (Richard) Stafford, 克里普斯, (理查德·)斯塔福爵士: 提议宪法改革, 83; 尼布尔提出帮伯林与其联系, 318; 斯坦哈特, 321; 伯林准备前往莫斯科, 323—324, 326, 329, 331, 334, 339, 343, 350 n2, 655; 达夫妮·斯特雷特, 423; 威尔森为其工作, 569; 巴勒斯坦问题, 683;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688
- Criterion*, 《标准》(期刊), 5 n2, 22 n1
- Critical Quarterly*, 《评论季刊》(计划中要出版的杂志), 261
- Crofton, Denis Hayes, 克罗夫顿, 丹尼斯·海斯, 36
- Croker, John Wilson, 克罗克, 约翰·威尔森, 167 n3
- Croll, 科洛尔太太(伯林的家庭教师?), 122
- Cronin, Archibald Joseph, 克罗宁, 阿奇博尔德·约瑟夫, 194, 610
-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The*, 《扭曲的人性之材》, 伯林, 72 n4
- Crossman, Erika, 克罗斯曼, 艾丽卡, 40 n3, 137, 224, 707
- \*Crossman, Richard (‘Dick’) Howard Stafford, 克罗斯曼, 理查德(“迪克”)·霍华德·斯塔福: 提名伯林任讲师, xl, 38; 在仓楼居住, 40 n3, 245 n7;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共进晚餐, 68—69; 伯林的微辞, 110, 155, 576; 在火车上引用德文, 111; 担任新学院

- 代理院长, 115; 主讲战争罪恶, 155; 评论马克思, 202; 在牛津任主考, 219; 巴克的离婚案, 233; 辞去研究员职务, 弃教从政, 233 n3, 252; 到新学院, 533; 伯林对他的评价, 707; 《今日柏拉图》, 237
- Crossman, Thomas Edward Stafford, 克罗斯曼, 托马斯·爱德华·斯塔福, 162
- \*Crosthwaite, (Ponsonby) Moore, 科洛思维特, (庞森比·)莫尔: 伯林的旅行计划, 46, 54; 外交礼服, 176; 在莫斯科, 428, 453, 473, 481—482, 550, 559, 589, 592, 595, 625; 伯林的描述, 707
- Crosthwaite, 科洛思维特太太(莫尔的母亲), 156
- Crowther, Geoffrey, 克罗瑟, 杰弗里, 528
- Cruikshank, John Augustus Cockburn, 克鲁克香克, 约翰·奥古斯塔斯·库克本, 31
- Cruikshank, Robert ('Robin') James, 克鲁克香克, 罗伯特(“罗宾”)·詹姆斯: 与兰博德认识, 422; 在美国, 425; 伯林生病, 431; 伯林希望返回英国, 457; 伯林向他说起W. J.特纳, 535; 给伯林写信, 541, 545; 访美未能成行, 543; 对达夫妮·斯特雷特夫人称赞伯林, 545; 指导英国情报处进行调查, 549; 向伯林提供职位, 580; 伯林推荐担任《观察家》驻美记者, 615—616
- Cudahy, John Clarence, 卡德锡, 约翰·克莱伦斯, 336
- Cull, Nicholas, 卡尔, 尼古拉斯, 309 n1, 503 n1
- Cullis, Winifred Clara, 卡丽斯, 威妮弗雷德·克拉拉, 380
- Curtin, 柯亨(英国驻美使馆官员), 501
- Curtis, Lionel George, 柯蒂斯, 莱昂内尔·乔治, 71, 159, 248—249, 289, 312—313, 457, 574
- Curtius, Ernst Robert, 柯蒂斯, 欧内斯特·罗伯特, 172
- Cyrano de Bergerac, Savien,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萨维安, 533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危机, 282, 285; 在战时考虑未来, 421—422
- Czinner, Paul, 吉纳, 保罗, 313 n2, 314
- D-Day, 进攻日(1944年6月6日), 494 n2
-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112
- Daily Worker*, 《每日工人报》, 229 n1
- D'Albiac, John Henry, 德尔拜克, 约翰·亨利, 361
- Dali, Gala, 达利, 加拉, 150 n3
- Dali, Salvador, 达利, 萨尔瓦多, 150 n3, 153
- Dalton, (Edward) Hugh (John Neale), 达尔顿, (爱德华·)休(·约翰·内尔), 335, 688
- Dalyell, Tam, 戴利埃尔, 谭姆, 711
- Dan, Fedor Il'ich (né Fedor Ivanovich Gurvich), 丹, 费多尔·伊里奇(原姓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古尔维奇), 506

-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基耶里, 575
- D'Anthès, Baron George Charles, 丹提斯, 乔治·查尔斯, 男爵, 578
- Darby, Samuel Leonard, 达尔比, 萨穆埃尔·列奥纳多, 185, 255
- D'Arcy, Father Martin Cyril, 达西, 马丁·西瑞尔, 神父, 511
- Darlan, Admiral 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达尔朗, 让·路易·萨维尔·弗朗索瓦, 海军上将, 420, 445
- Darvall, Frank Ongley, 达沃尔, 弗兰克·昂雷, 503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76
- Daumier, Honoré, 杜米埃, 奥诺雷, 148
- Davidson, Brian, 戴维森, 布赖恩, 113
- Davidson, Howard William, 戴维森, 霍华德·威廉, 149
- Davies, Henry Whitcliffe ( 'Bill' ), 戴维斯, 亨利·维特克里夫(“比尔”), 260
- Davies, Joseph Edward, 戴维斯, 约瑟夫·爱德华, 622
- Davis, Elmer Holmes, 戴维斯, 埃尔默·霍姆斯, 421
- Davis, James John, 戴维斯, 詹姆斯·约翰, 499
- Davison, John Armstrong, 戴维森, 约翰·阿姆斯特朗, 502, 574
- Dawe, Roger David, 道, 罗杰·戴维, xxix
- Dawson, Geoffrey, 道森, 杰弗里, 33, 158, 162, 289—290
- Day Lewis, Cecil: on Auden, 戴·刘易斯, 塞西尔: 论奥登, 191; 《磁山》, 191 n3; 《你的死亡之壳》(“尼古拉斯·布莱克”), 167
- Day, Stephen Albion, 戴, 斯蒂芬·阿尔比昂, 501
- Debater, 《辩论家》(校刊), 5 n5, 6, 631 n1
- de Beer, Esmond Samuel, 德·比尔, 伊夫·蒙德·萨缪尔, 289
- Deborin, Abram Moiseevich, 德波林, 艾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 31
- Debussy, Claude, 德彪西, 克劳德, 272—273
- Denniston, John Dewar, 丹尼斯顿, 约翰·迪沃, 154 n6, 178, 287
- Descartes, Renè, 笛卡尔, 勒内, 46, 78
- Desert Island Discs, 《沙漠岛屿的唱片》(电台节目), 480 n2
- determinism, 决定论, 117
- de Valera, Eamon, 德·瓦勒拉, 伊门, 691
- Dewey, Thomas Edmund, 杜威, 托马斯·埃德蒙德, 485, 499—500
- Dickens, Charles John Huffam, 狄更斯, 查尔斯·约翰·赫法姆, 125, 270, 338, 467, 608, 711
- Dickie, Alexander Hugh Hamon Massy, 狄基, 亚历山大·休·哈蒙·马西, 23—24
-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67, 278, 287
- Dieren, Bernard van, 迪埃伦, 贝纳德·凡, 167, 205; 《与亡者同沉》,

- 139, 205 n6
- Dilliard, Irving, 迪里亚德, 欧文, 554
- D'Indy, (Paul-Marie-Theodore-) Vincent, 丁迪, (保罗—玛丽—西奥多—)文森特, 205
- Diplarakos, Alik, 迪普拉拉科斯, 阿里吉(后改姓罗素), 562
- D'Israeli, Isaac, 迪斯累利, 艾萨克, 《文学奇事》, 285
- Dixon, Algernon Drew. 狄克逊, 阿尔杰农·德鲁, 36
- Dobrée, Bonamy, 多布雷, 伯纳米: (编辑)《从安妮到维多利亚》, 230
- Dodds, Eric Robertson, 多兹, 埃里克·罗伯特森, 154 n6, 177—178, 206, 338, 563, 565, 578
- Dodecanese, 多德卡尼斯群岛, 562
- Dollfuss, Engelbert, 陶尔斐斯, 恩格尔伯特, 83 n4, 317
- Domagk, Gerhard, 多马克, 格哈德, 410 n2
- Donaldson, Frances, 唐纳德森, 弗朗西丝, 夫人, 524 n1
- Donizetti, (Domenico) Gaetano (Maria) 多尼采蒂, (多梅尼科·)加埃塔诺(·玛丽亚): 《唐·帕斯卡莱》, 244 n7, 271; 《爱的万灵药》, 232
- Donovan, General William Joseph, 多诺万, 威廉·约瑟夫(“野牛”), 少将, 421
- Dos Passos, John (Roderigo), 多斯·帕索斯, 约翰(·罗德里哥), 610
- Dostoevsky, Fedor Mikhailovich,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243, 255, 273, 278
- Douglas, Lord Alfred (‘Bosey’), 道格拉斯, 阿尔弗雷德(“波西”), 勋爵, 176 n2, 507 n3
- Douglas, Helen Gahagan, 道格拉斯, 海伦·盖哈根, 501
- Douglas, James Alexandre Thomas, 道格拉斯, 詹姆斯·亚历山大·托马斯, 290
- Douglas, Lady Patricia, 道格拉斯, 帕特里西娅夫人, 见本德恩, 帕特里西娅夫人
- Doukhan, Moses, 杜坎, 摩西, 98, 101
- Droitwich, 德罗伊特维奇, 90 n2
- Druck, David, 德拉克, 戴维, 389—390, 394, 457, 470
- Dubinsky, David, 杜宾斯基, 达维德, 376
- Dublin, 都柏林, 277—278, 281—281
- Duclos, Jacques, 杜克罗, 雅克, 563
- Dudin, Mikhail Aleksandrovich, 杜丁, 米哈伊尔·亚历桑德罗维奇, 605
- Dudley, Alan Alves, 达德利, 阿兰·阿维斯, 351, 514, 527, 656, 722
- Duff, Shiela Grant, 达夫, 谢拉·格兰特, 见格兰特·达夫, 谢拉
- Dugdale, Blanche Elizabeth Campbell, 达格代尔, 布兰奇·伊丽莎白·坎贝尔(婚前姓贝尔福; “贝菲”), 249, 355 n1, 489, 682—683, 691
- Dumbarton Oaks, 敦巴顿橡树园, 464 n5, 482

- Dummett, Michael Anthony Eardley, 达米特, 迈克尔·安东尼·厄德里, xv, xxix
- Dunbabin, Thomas James, 丹巴宾, 托马斯·詹姆斯, 50, 211
- Dundas, Robert Hamilton, 邓得斯, 罗伯特·汉密尔顿, 210, 220, 338
- Dunedin, Andrew Graham Murray, Viscount, 达尼丁, 安德鲁·格雷厄姆·穆雷, 子爵, 50 n3
- Dunn, James Clement, 邓恩, 詹姆斯·克莱蒙特, 484
- Dunnett, George Sangster, 邓内特, 乔治·桑斯特, 502
- Durbin, Evan Frank Mottram, 德宾, 埃文·弗兰克·莫特兰, 433, 647
- Durbrow, Elbridge, 杜勃鲁, 埃尔布里吉, 621
- Eckhart, 艾克哈特大师, 636
- Economist, The*, 《经济学家》(期刊), 60, 528
- Edelbaum 艾德尔鲍姆(犹太人讲师), 365
- Eden, (Robert) Anthony, 艾登, (罗伯特·) 安东尼(后封艾冯郡伯爵一世): 与克莱丽莎·丘吉尔结婚, 405 n2; 访华盛顿, 431, 434, 436 n5; 任外交事务大臣, 434—435; 与魏茨曼, 440; 个人品质, 553; 伯林对他的粗浅了解, 567; 波茨坦会议, 582—583, 587
- Eder, (Montague) David, 艾德, (蒙塔古·) 大卫, 416 n3
- Eder, Edith, 艾德, 伊迪斯(婚前姓洛), 416
- Edmondson, (George) D'Arcy, 埃德蒙森, (乔治·) 达西, 424
- Edmondson, Mrs D'Arcy, 埃德蒙森, 达西太太, 424
- Edward VIII, King, 爱德华八世, 国王, 见温莎公爵
- Egypt, 埃及, 94, 104—105
-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 60 n2, 158 n4, 372, 430 n6
- Einzig, Paul, 艾因齐格, 保罗: 《世界经济危机, 1929—1931》, 640
-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戴维: 北非登陆, 420 n2, 422 n2, 5; 欧文·伯林的《从军歌》, 478 n3
- Eitingon family, 艾廷贡家族, 331
- Eitingon, Motty, 艾廷贡, 莫蒂, 336
- Elath, Eliahu, 伊拉特, 依里亚胡, 672
- el Gailani, Rashid Ali, 艾尔·盖拉尼, 拉希德·阿里, 见盖拉尼, 拉希德·阿里·艾尔
- Eliot, Thomas Stern, 艾略特, 托马斯·斯特恩: 伯林寄《牛津展望》给他, 22; 伯林与其见面, 85, 111; 斯彭德谈论他, 116; 有关鲍拉的事业, 135; 与小组剧团, 138; 夸张的解说者, 165; 恶意, 166; 回答问题的方式, 195—196; 相信漂白, 206; 与伊内兹·珀恩, 217, 221; 与伊丽莎白·鲍恩, 226; 汉弗莱·豪斯对其攻

- 击, 262; 在特比, 263; “拜伦(1788—1824)”, 230; 《肌肉萎缩》, 138
- Ellis, (Henry) Havelock, 埃利斯, (亨利·) 哈弗洛克, 166
- Elman, Philip, 艾尔曼, 菲利普, 463
- Elmslie, William Gray, 埃尔姆斯利, 威廉·格雷, 331, 377
-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 633
- Encyclopédie*, 法国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编撰者), 67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伯林阅读其著作, 43; 在威利希的民主军队, 200; 被丹麦间谍监视, 201; 共产国际(海牙会议, 1872), 202
- Ensor, Robert Charles Kirkwood, 恩索尔, 罗伯特·查尔斯·柯克伍德, 82
-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德西德里乌斯, 633
- Erlanger, family d', 厄兰格家族银行, 264
- Erlebach, Philipp Heinrich, 厄尔巴赫, 菲利普·海因里希, 157
- Erleigh, Lord, 厄尔雷, 勋爵, 见瑞丁, 侯爵二世
- Erlich, Henryk, 埃尔利赫, 亨利, 431
- Esher, 厄舍尔, 子爵二世, 见布莱特, 雷吉纳尔德·巴利奥
- Esteva, Admiral Jean-Pierre, 埃斯特瓦, 让·皮埃尔海军上将, 420
- Etherington-Smith, (Raymond) Gordon Antony, 艾瑟林顿—史密斯, (雷蒙德·) 戈登·安东尼, 381
- Ettinghausen, David Richard, 艾廷豪森, 戴维·理查德, 292
- Ettinghausen, Vera, 艾廷豪森, 维拉(婚前姓席弗), 183, 292
- Ettinghausen, Walter George (later Eytan), 艾廷豪森, 沃特·乔治(后姓伊坦), 9, 18, 94, 99, 101, 140, 143, 183, 292, 457
-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634
- Ewing, Alfred Cyril, 尤因, 阿尔弗雷德·西瑞尔, 497, 509—511
- Excambion, SS, “埃克斯坎宾号”客轮, 358 n2, 359
- Exeter College, Oxford, 埃克塞特学院, 牛津, 552—523
- Exodus, “出埃及号”客轮(移民船只), 689
- Faber and Faber (publishers), 费伯(出版社), 174; 伯林的报告, 638—653
- Faber, Geoffrey Cust, 费伯, 杰弗里·卡斯特, 37, 187, 214
- Fairbanks, Douglas Elton Thomas Ulman, 费尔班克斯, 道格拉斯·埃尔顿·托马斯·厄尔曼, 30
- Fairbanks, Douglas, Jr, 费尔班克斯, 道小格拉斯, 30 n8
- Falk, (Werner) David, 福克, (沃纳·) 戴维, 322 n3, 331, 507, 529
- Falk, Mrs David, 福克, 戴维夫人, 322, 507
- Farouki, Abdul Majid Taji, 法如吉, 阿布拉·马吉德·塔吉, 102



- Farouki (Famgi), Ahmed Shukri, 法如吉 (法姆吉), 艾哈迈德·舒克雷, 102
- Farquharson, Arthur Spenser Loat ('Farkie'), 法克哈森, 亚瑟·斯宾塞·鲁特 ("法吉"), 250
- Farrar, Frederic William, 法拉尔, 弗雷德里克·威廉:《埃里克, 或一点一点》, 224 n4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38, 145—146, 188
- Federation of Women Zionists, 犹太复国主义妇女联盟, 93
- Fedotov, 斐多托夫 (葛罗米柯的助手), 464
- Feiwei, Berthold, 费韦尔, 伯索尔德, 93—94
- Feiwei, Sterna, 费韦尔, 斯特娜 (婚前姓施内尔森), 95
- Felkin, (Arthur) Elliott, 菲尔金, (阿瑟·) 埃利奥特, 498
- Felsenthal, Carol, 菲尔森萨尔, 卡洛尔, 484 n1
- Ferncroft Avenue, Hampstead, 弗恩克罗夫特大道, 汉普斯特区, 4
- Fesch, Willem de, 费什, 威廉·德, 293
- Fet, Afanasy Afanasievich, 菲特, 阿芬纳西·阿芬纳西耶维奇, 490
- Field, Marshall, 菲尔德, 马歇尔, 616
- Figures, Frank Edward, 菲格斯, 弗兰克·爱德华, 65
- Finch Hatton, Denys, 芬奇—哈顿, 丹尼斯, 717
- Finkelstein, Tatjana, 芬克尔斯坦, 塔佳娜, 317
- Finland, 芬兰, 615
- Finley, John Huston, Jr, 芬利, 小约翰·休斯顿, 572
- Fischer-Williams, Jenifer, 费歇尔—威廉斯, 詹妮弗, 见威廉斯, 詹妮弗
- \*Fisher, Herbert Albert Laurens, 费希尔, 赫伯特·艾伯特·劳伦斯 (图10): 任新学院院长, 50, 67; 请求伯林写关马克思的书, 67; 招待弗吉尼亚·伍尔夫, 68—70; 婚姻, 68 n6; 病假, 115 n3; 与伯林一起听音乐会, 123; 伯林对托斯卡尼赞不绝口, 137; 健康状况衰退, 163 n4, 171; 鲍拉竞聘希腊语系主任, 173, 177; 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 228; 怂恿克罗斯曼进入政界, 233; 评论克莱斯勒, 266; 在牛津, 284; 评论伯林的《卡尔·马克思》, 286; 逝世与葬礼, 298—301; 在内阁, 503; 伯林的评价, 707
- \*Fisher, Lettice, 费希尔, 莱迪丝: 在新学院招待弗吉尼亚·伍尔夫, 68, 70—71; 伯林的微辞, 80; 举行本科生午餐会, 139; 提出帮伯林校对书稿, 265; 丈夫去世, 301; 提议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写信, 304; 伯林计划前往莫斯科, 355; 支持未婚妈妈们, 380 n3; 写信给在美国的伯林, 392; 罗莎蒙德·科勒律治不喜欢她, 456; 伯林向其问好, 475
- \*Fisher, Mary Letitia Somerville (later Bennett), 费希尔, 玛丽·利蒂希亚·萨默维尔 (后姓班纳特; 图10,

- 16): 与伯林同游爱尔兰, 50—51, 53, 86—87;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共进晚餐, 68, 70; 认同约翰·斯帕洛, 69 n3; 谢拉·邓巴·香农唱《弗兰奇和约翰尼》这首歌, 92 n6; 在巴黎, 112, 122, 209; 在萨尔茨堡(图19), 131, 139 n6; 伯林为其赴迪皮送行, 133; 伯林邀请吃午餐, 140; 在西班牙, 159, 163; 在罗马, 230 n8; 父亲去世, 298—299; 伯林计划前往俄罗斯, 343; 伯林打算从美国返回, 346, 348; 写信给在美国的伯林, 371, 389, 427, 524; 伯林暂离美国, 383, 455, 475, 539; 罗莎蒙德·科勒律治, 456; 对南希·博尔特自杀的评论, 507; 关于门德尔·伯林, 705; 关于西勒·林德, 712; 关于雷切尔·沃克, 719—720
- Fisher, Admiral Sir William Wordsworth, 费希尔, 威廉·沃兹沃思, 爵士, 海军上将, 427
-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古斯塔夫, 182, 195, 227, 241, 243, 278, 285, 289
- Fleming, (Robert) Peter, 弗莱明, (罗伯特·)彼得, 191, 251
- Fletcher, (Sir) Angus Somerville, 弗莱彻, 安格斯·萨默维尔, 爵士, 340—341, 350
- Fleuriat, Aimé Joseph de, 弗勒里奥, 艾梅·约瑟夫·德, 152
- Florence, 佛罗伦萨, 111
- Floud, Bernard Francis Castle, 弗拉德, 贝尔纳德·弗朗西斯·卡索尔, 179
- 'Flying Tigers', 飞虎队(美国志愿抗日援华航空大队), 615, 703
- Flynn, Edward Joseph, 弗林, 爱德华·约瑟夫, 547
- Fontanny Dom, 喷泉屋(图39), 611 n4
- Ford, Edward William Spencer, 福特, 爱德华·威廉·斯宾塞, 13, 56
-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 xxxii, xli
-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美国, 1942), 425 n4
- Foreign Office Library, 外交部图书馆, 519—520
- 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artment (FORD), 外交部研究处, 513—519, 537
- Forrestal, James Vincent, 福雷斯特, 詹姆斯·文森特, 486, 691
- Forster, Edward Morgan, 福斯特, (爱德华·)摩根: 伯林读他的书, 161; 评论卡丹诺, 167; 政治不自信, 172; 失败主义, 175; 斯蒂芬·斯彭德, 190; 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195; 关于相同点, 212; 伯林希望见面, 241; 伯林对作品的看法, 242—243, 273; 在苏联无人知晓, 611; 《阿冰格收获》, 161 n1, 166, 212 n1
- \*Foster, John Galway, 福斯特, 约翰·盖尔韦: 694 n; 伯林与其结伴旅行, 89, 94—96, 99, 104—105, 109; 关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119; 住罗斯柴尔德家, 245; 与黛安娜·希尔的关系, 283; 把钱转给在百慕大的伯林, 315; 在战时的华盛顿, 318, 321—323,

- 325, 335, 339, 349, 351, 366, 370, 372, 377, 381, 405, 424—425, 457; 怀疑伯吉斯, 319; 把美国驱逐舰调往英国, 326; 在加利福尼亚度假, 331; 写信, 373; 访纽约, 375; 雷克斯·本森, 393; 到医院探望伯林, 412; 伯林患肺炎, 432; 返回访英, 436, 457, 467, 469—470; 巴勒斯坦骚乱, 447; 当选下院议员, 474; 在巴黎, 507; 伯林论其性格, 708
- Foster, Michael Beresford, 福斯特, 迈克尔·贝瑞斯福德, 498; 与卡西尔一起, 62
- Four Essays on Liberty*, 《自由四论》(伯林), xli
- Fowler, Thomas, 福勒, 托马斯: 《演绎逻辑原理》, 19 n4; 《归纳逻辑原理》, 19 n4
- Foy Morgan & Co., 佛伊·摩根公司(木材经纪公司), 42
- Fradkin, Rivka, 弗拉德金, 瑞夫卡, 629
- Fraenkel, Eduard David Mortier, 弗兰克尔, 艾德瓦德·戴维·莫蒂尔, 108—109, 112, 148, 220
- Fraenkel, Ruth, 弗兰克尔, 鲁斯, 245
- France, 法国: 投降(1940), 307; 伯林瞧不起法国在美国的代表, 339; 盟军登陆北非(1942), 420; 战争期间考虑的政治未来, 421—422; 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 553 n3
- France, Anatole, 法朗士, 安纳托尔(雅克·安纳托尔·第波尔特的笔名), 152
- Franco y Bahamonde, General Francisco, 佛朗哥—巴哈蒙德, 弗朗西斯科将军, 188
- \*Frankfurter, Felix, 法兰克福特, 菲利克斯: 伯林向其描述自己的旅行经历, 104; 伯林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105—108, 119—122; 布希奥斯的来信, 108 n2; 拜访牛津, 178—180; 谈论鲍拉在哈佛的职位, 218, 220, 229; 伯林一到美国即拜访他, 318; 建议加强英国在美的宣传力度, 321; 在美国帮助并招待伯林, 323, 333, 335, 340—341, 348, 360, 369, 377, 395, 475, 485; 任职最高法院, 326 n2; 与魏茨曼的关系, 369, 399; 在洛德尔的文章中遭到攻击, 382, 388; 伯林在纽约染肺炎, 407, 411; 派罗森曼探望伯林, 447; 索要鲍拉的《象征主义的遗产》一书, 460; 与科恩家的友谊, 463 n1; 伯林向父母讲述其情况, 467, 470, 506, 530; 对李普曼的看法, 500; 摩根陶想见伯林, 523; 鲍拉的《从维吉尔到弥尔顿》, 575; 婚姻关系, 575; 布兰代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 665; 与艾奇逊的友谊, 668; 缔造犹太国, 672, 674, 681—682, 684; 反对英国关于巴勒斯坦移民的政策, 690; 冯·特罗特拜访, 719
- \*Frankfurter, Marion A., 法兰克福特, 玛丽安·A.(婚前姓丹曼): 伯林向其描述自己的旅行经历, 104; 造访牛津, 178—179; 议论勒内·艾耶尔的婚姻难题, 252; 美国的生活, 337; 问候伯林父母, 349, 493; 与伯林在美国的

- 友情, 382, 475, 485; 议论勒内·艾耶尔, 390; 伯林在纽约患肺炎, 411; 推荐认真的女佣, 455; 外表, 467, 470; 婚姻关系, 575
- Frankie and Johnay*, 《弗兰奇和约翰尼》(歌曲), 92 n6
- Franks, Oliver Shewell, 弗兰克斯, 奥利弗·舍维尔, 502
- Franz Joseph, Emperor of Austria, 弗朗兹·约瑟夫, 奥地利皇帝, 317
- Franzblau, Mrs, 弗兰兹布劳太太, 455
- Fraser, Lady, 弗雷泽夫人, 408
- Freedom, 自由: 伯林坚持这一观念, xl—xli, xliii; 伯林的学校作文题目, 631—637
- Freiligrath, (Hermann) Ferdinand, 弗莱里格拉特, (赫曼·)费迪南德, 202
- Fremantle, Anne (-Marie) Huth (née Jackson), 弗里门特, 安妮(一玛丽)·胡特(婚前姓杰克逊), 453—455, 469, 473
- Fremantle, Christopher Evelyn, 弗里门特, 克里斯托弗·伊夫林, 453 n1
- Freshfields,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 23 n6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67, 79, 635
- Fried, Ferdinand, 弗里德, 费迪南德, 见齐麦曼, (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
- Friedmann, Georges, 弗里德曼, 乔治, 81—82
- Fry, Roger Eliot, 弗莱, 罗杰·艾略特, 148, 163 n2, 174 n4
- Fuad I, King of Egypt, 福阿德一世, 埃及国王, 94
- Fulford, Roger Thomas Baldwin, 福尔福德, 罗杰·托马斯·鲍德温, 404
- Fulton, John Scott, 富尔顿, 约翰·斯科特, 44, 137
- Gailani, Rashid Ali el, 盖拉尼, 拉希德·阿里·艾尔, 373 n3
- Gaité parisienne, La*, 《颓废的巴黎人》(奥芬巴赫的芭蕾舞剧), 279
- Gaitskell, Hugh and Evan Frank Mottram Durbin, 盖茨凯尔, 休与埃文·弗兰克·莫特兰·德宾: 《工资与劳工政策》, 647—648
- Gallie, (Walter) Bryce, 加利, (沃尔特·)布莱斯, 157
- Gallie, Ian, 加利, 伊恩, 512
- Gallup, George Horace, 盖洛普, 乔治·霍拉斯, 501
- Galton, Dorothy, 高尔顿, 多萝西, 564—565
- Gambetta, Léon Michel, 甘必大, 莱昂·米歇尔, 437
- Gandhi, Mohandas Karamchand, 甘地,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 11, 30, 341
- Gans, Eduard, 甘斯, 爱德华, 200
- Garbett, Cyril, Bishop of Winchester, 加伯特, 西瑞尔, 温切斯特主教(后担任大主教), 300 n2
- Garnett, Constance, 加内特, 康斯坦斯, 68 n2
- Garnett, David, 加内特, 戴维, 153
- Garrett, Alice Warder, 加瑞特, 艾丽

- 丝·沃德, 522
- Garrett, John Work, 加瑞特, 约翰·沃克, 522 n2
- Garvin, James Louis, 贾文, 詹姆斯·路易斯, 321, 374
- Gaster, Jack, 加斯特, 杰克, 43 n6, 355 n2, 712
- Gaster, Maire, 加斯特, 莫伊拉, 见林德, 莫伊拉
- Gaster, Moses, 加斯特, 摩西, 430
- Gaster, Theodore Herzl, 加斯特, 西奥多·赫泽, 333
- Gates, Sylvester Govett, 盖茨, 西尔维斯特·格威特, 108, 577
- Gaulle, Charles de, 戴高乐, 夏尔: 北非登陆 (1942), 419, 420—422; 关于雅尔塔会议, 553 n3; 与达夫·库珀在巴黎, 575; 本—古里恩景仰的对象, 673
- Genée, Richard, 吉内, 理查德, 471 n3
- Geneen family, 吉宁一家, 316
- Genius, 天才: 伯林的定义, 531 n4
- Gentile, Giovanni, 秦梯利, 乔万尼, 118 n6
- George V, King, 乔治五世, 国王: 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1936), 117, 122 n5
- George, Stefan, 格奥尔格, 斯特凡, 123—124, 242
- Germany, 德国: 伯林的看法, 35; 犹太人遭到迫害, 54, 83, 689—690; 向西欧进军 (1940), 304; 军事政府所在地, 623; 在齐麦曼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中, 639—642
- Ghika, Niko, 吉卡, 尼克, 714
- Gibbons, Stella, 吉布森, 斯黛拉: 《寒冷舒适的农场》, 168 n2
- Gibbs, Sir Philip, 吉布斯, 菲利普, 爵士, 168
- Gide, André, 纪德, 安德烈, 172
- Gifford, Tony, 吉福德, 托尼, 712
- Gilbert, William Schwenck, 吉尔伯特, 威廉·什温克, 127
- Gildesgame, Pierre, 吉尔德斯格姆, 皮埃尔, 363
- Gill, Eric, 吉尔, 埃里克, 244 n7
- Ginsberg, Mordecai Zalman (Shlomo), 金斯伯格, 莫尔德赛·扎尔曼 (·施罗莫), 96 n5
- Ginsburg, Simon, 金斯伯格, 西蒙, 629
- Ginzberg, Adele, 金斯伯格, 阿戴尔 (婚前姓卡岑斯坦因), 370, 383
- Ginzberg, Louis, 金斯伯格, 路易斯, 370, 383
- Giraud, General Henri-Honoré, 吉罗, 亨利—奥诺雷, 将军, 420—421, 442
- Girshman, Henrietta Leopoldovna, 杰许曼, 恩里埃塔·里奥珀尔多芙娜 (婚前姓莱昂), 495, 594
- Girshman, Vladimir Osipovich, 杰许曼, 弗拉基米尔·欧西珀维奇, 495 n6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来斯顿, 威廉·尤尔特, 456
- Glinka, Mikhail Ivanovich, 格林卡, 米哈伊·伊万诺维奇: 《伊凡·苏萨宁》(《为沙皇献身》), 603
- Glück, Gustav Alois Julius, 葛吕克, 古斯塔夫·阿罗伊斯·朱利叶斯, 707

- Gluckman, (Herman) Max, 格拉克曼, (赫尔曼·) 麦克斯, 149
- Godley family (of Rye, Westchester County), 哥得里一家 (威斯彻斯特郡雷伊镇), 345 n1
- Goebbels, (Paul) Joseph, 戈培尔, (保罗·) 约瑟夫, 138, 306
- Goering, Hermann, 戈林, 赫尔曼, 168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124, 242; 《浮士德》, 168; 《少年维特之烦恼》, 175
- Gogh, Vincent van, 梵·高, 文森特, 635
- Gogol, Nikolay Vasil'evich, 果戈理, 尼科莱·瓦西里耶维奇, 470, 533
- Goldberg, Mrs. 戈尔德伯格太太, 95
- Goldberg, S., 戈尔德伯格, S., 470
- Goldman, Rabbi Solomon, 戈德曼, 所罗门, 拉比, 332 n2
- Goldmann, Nahum, 戈德曼, 纳胡姆: 伯林为其写回忆录, 306 n7; 纽约犹太事务局代表, 336; 珀尔兹韦格, 350; 讨论巴勒斯坦未来, 441, 443—445, 450, 676—677, 687, 690; 计划访俄, 476; 支持魏茨曼, 671
- Goldstein, Rabbi Israel, 戈德斯泰因, 伊弗雷尔拉比, 394, 442
- Goldston, I., 戈德斯頓, I., 8
- Gollancz, Victor, 戈兰茨, 维克托, 38 n5, 468
- Goodhart, Arthur Lehman, 古德哈特, 阿瑟·莱曼, 169, 323 n6, 371—372, 523, 573
- Goodhart, Cecily, 古德哈特, 赛西丽, 169
- Goodhart, Howard Lehman, 古德哈特, 霍华德·莱曼, 323, 325, 330, 332, 345, 351
- Goodhart-Rendel, Harry Stuart, 古德哈特—兰德尔, 哈里·斯图尔特, 186
- Goodman, Paul, 古德曼, 保罗, 416 n1
- Goodman, Richard, 古德曼, 理查德, 21 n5
- Goodman, Richard Hackett, 古德曼, 理查德·哈克特, 165
- Goodman, Romana, 古德曼, 罗曼娜 (婚前姓曼茨克), 416
- Goodrich, Carter, 古德里奇, 卡特, 384
- Gordon, J., 戈登, J. (巴勒斯坦导游), 115
- Gore-Booth, Paul Henry, 戈尔—布斯, 保罗·亨利, 84 n1, 434
- Gorsky, Anatoly Veniaminovich, 戈尔斯基, 阿纳托里·维尼亚米诺维奇, 见格洛莫夫, 阿纳托里·波里索维奇
- Göttingen, 哥廷根: 大学百年校庆, 249
- Gouzenko, Igor, 高曾科, 伊戈尔, 625 n4
- Goya y Lucientes, Francisco, 戈雅·卢西恩特斯, 弗朗西斯科, 148
- Gozzoli, Benozzo di Lese di Sandro, 戈佐利, 贝诺佐·迪·列斯·迪·桑德洛, 147
- Graham, Katharine (“Kay”), 格雷厄姆, 凯瑟琳 (“凯”), 485 n7
- Graham, Philip Leslie, 格雷厄姆, 菲利普·莱斯利, 381, 485 n7, 486
- Graham-Harrison, Francis Laurence, 格

- 雷厄姆—哈里森, 弗朗西斯·劳伦斯, 205, 256
- Grand, Colonel Laurence, 格兰特, 劳伦斯, 上校, 335 n2
- \*Grant Duff, Shiela, 格兰特·达夫·谢拉(后姓纽瑟姆, 再后来姓索科洛夫·格兰特; 图26): 与伯林的关系, 40, 232 n4, 260; 在牛津读哲学, 43—44; 与戈伦韦·里斯的关系, 48—49, 57—60, 75, 171 n2, 224; 访萨尔茨堡, 57—59; 毕业, 89; 伯林对亚当·冯·特罗特的看法, 91; 去牛津访伯林, 126; 抵布拉格, 231; 安妮·弗里门特的表妹, 453; 女儿, 453; 婚姻, 469; 《欧洲与捷克人》, 285; 《分道扬镳》, 285 n5
- Granville-Barker, Harley, 格兰维尔—巴克, 哈雷, 535
- Graves, Elizabeth Leila Millicent ('Sally'; later Chilver), 格雷夫斯, 伊丽莎白·雷拉·米里森特(“萨莉”, 后来姓奇尔弗), 60 n1, 133, 161—162, 211, 221, 227, 239, 245, 305
- Greats, 牛津大学的古典人文学科课程, xviii
- Greece, 希腊: 战后内战, 547—548
- Greeley, Horace, 葛瑞里, 贺拉斯, 483
- Green, Thomas Hill, 格林, 托马斯·希尔, 78
- Greene, Sir Wilfred Arthur, 格林, 威尔弗雷德·阿瑟, 男爵一世, 335, 372, 388—389
- Greenwood, Walter, 格林伍德, 沃尔特, 611
- Grier, (Mary) Lynda Dorothea, 格莉尔, (玛丽·)琳达·多萝西娅, 57 n2, 250
- Griffith, Arthur, 格里菲斯, 阿瑟, 691
- Griffith, John Godfrey, 格里菲斯, 约翰·戈德弗里, 185
- Grigson, Geoffrey Edward Harvey, 格里格森, 乔弗雷·爱德华·哈维, 167
- Grimond, Jo (seph), 格里蒙德, 约(瑟夫), 185 n1
- Gromov, Anatoly Borisovich (Anatoly Veniaminovich Gorsky), 格洛莫夫, 阿纳托里·波里索维奇(阿纳托里·维尼亚米诺维奇·戈尔斯基), 506, 551 n8
- Gromyko, Andrey Andreevich, 葛罗米柯, 安德雷·安德烈维奇, 463
- Gromyko, Lidiya Dmitrievna, 葛罗米柯, 莉迪娅·德米特里耶娃(婚前姓格林维奇), 464
- Grossinger, Jennie, 格罗辛格, 詹尼, 410 n3
- Group Theatre, 小组剧团, 137
- Grubb, Kenneth, 格拉伯, 肯尼斯, 424, 527
- Grundy, George Beardoe, 格伦迪, 乔治·贝尔多, 5, 23; 《修昔底德与其时代的历史》, 501
- Guffey, Joseph Finch, 古非, 约瑟夫·芬奇, 487
- Guillaume, James, 纪尧姆, 詹姆斯: 《卡尔·马克思》, 201
- Guinness, Bryan, 吉尼斯, 布赖恩, 135

- Gumilev, Lev Nikolaevich, 古米廖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609
- Gumilev, Nikolay Stepanovich, 古米廖夫,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609 n2
- Gundolf, Friedrich, 甘道夫, 弗里德里希, 123
- Gunnis, Rupert Forbes, 噶尼斯, 鲁伯特·福布斯, 117, 136
- Gunzburg, Paul, 甘斯伯格, 保罗, 495
- Gurary, Rav Shemaryahu (‘Rashag’), 格瑞里, 拉夫·瑟玛利亚胡(“拉沙格”), 364
- Gusev, Fedor Tarasovich, 古谢夫, 费多尔·塔拉索维奇, 464
- Haag, Luiza, 海格, 路易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母亲), xix n2
- Ha’am, Ahad (Asher Hirsch Ginsberg), 哈姆, 阿哈德(·阿谢·赫施·金斯伯格), 96
- Haden-Guest, Leslie, 哈登—盖斯特, 莱斯利, 416 n3
- Hadow, Robert Henry, 哈多, 罗伯特·亨利, 554
- Haffner, Carl, 哈弗纳, 卡尔, 471 n3
- Haganah, 犹太国家防卫队, 690
- Hague, The, 海牙, 48
- Hale, Lionel Ramsay, 黑尔, 莱昂内尔·拉姆赛, 270
- Halévy, Elie, 哈雷维, 艾丽, 128 n2
- Halevy, Eliezer, 哈勒维, 伊利泽, 10—11
- Halevy, Efraim, 哈勒维, 埃弗拉姆, 10 n2
- Halifax, Dorothy Evelyn Augusta, 哈利法克斯, 多萝西·伊夫林·奥古斯塔, 伯爵夫人, 382, 427, 500
- Halifax, 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哈利法克斯, 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 伯爵一世: 华盛顿快讯, xxiv, 419; 错把希特勒当成门童, 282 n2; 伯林致信表示愿意提供服务, 302; 伯林访莫斯科, 312, 570; 担任驻华盛顿大使, 361, 382, 405; 不赞成福斯特, 381; 距离遥远, 382—383, 427; 儿子死亡及伤残, 417, 419, 427; 伯林与其共进午餐, 427; 巴勒斯坦问题, 447, 676—677; 莉迪亚·凯恩斯插话, 500; 不愿放伯林走, 506, 521, 523, 527, 529, 537, 539, 542, 544—545; 布思比, 546; 克拉克·科尔邀请伯林, 550; 全灵学院的研究员职位, 560; 伯林出席波茨坦会议, 582; 谈论伯恩斯, 621; 克拉克·科尔在华盛顿取得成功, 624 n1; 对巴勒斯坦缺乏兴趣, 668; 魏茨曼与其关系, 671
- Hall, Donald John, 霍尔, 唐纳德·约翰, 375, 434, 442, 457, 466—467, 515, 518, 520—521
- Hall, John Hathorn, 霍尔, 约翰·哈桑, 95 n4
- Hall, Laura Margaret, 霍尔, 劳拉·玛格丽特, 380
- Hall, Sir Noel Frederick, 霍尔, 诺埃尔·弗雷德里克, 爵士, 435
- Hall, Robert Lowe (later Baron Ro-



- berthall), 霍尔, 罗伯特·洛厄, 爵士 (后成为罗伯特霍尔男爵), 380 n2
- Halpern, Alexander Yakovlevich, 哈尔彭, 亚历山大·亚科夫列维奇, 363 n1, 366, 493
- Halpern, Barbara, 哈尔彭, 芭芭拉, 见斯特雷奇, 芭芭拉
- Halpern, Georg Gad, 哈尔彭, 乔治·格德, 57, 93, 188, 429
- Halpern, Salome, 哈尔彭, 沙罗美: 伯林为其作传, 363 n1, 366 n3
- Halpern, Wolf Abiram (‘Abe’), 哈尔彭, 沃尔夫·阿比兰(“阿贝”), 18, 56—57, 314, 317; 去世, 429
- \*Hampshire, Stuart Newton, 汉普希尔, 斯图尔特·纽顿: 在巴黎, 91; 给他看伯林小时候的图画, 147 n5; 成立法国人社团, 150 n3; 伯林喜欢其一本正经的样子, 181; 一等学位, 185; 与伯林一起到爱尔兰(图20), 191—192; 罗斯评论他, 198; 罗莎蒙德·莱曼, 203, 209; 受邀去见斯彭德, 205; 尝试全灵学院的研究员考试, 207 n1, 213; 哲学观点, 208; 评论伊丽莎白·鲍恩的赴日计划, 215; 伯林邀请其与伊丽莎白·鲍恩喝茶, 226; 人品与行为, 227, 230; 昵称(“瞪羚羊”, “汉茨”), 227; 参加奥斯汀—伯林的哲学讨论, 233; 与勒内·艾耶尔的关系与婚姻, 238—240, 284, 305, 344, 395; 推荐伯林读亨利·詹姆斯的书, 241; 与伊丽莎白·鲍恩的关系, 245; 伯林称赞他, 252; 称赞伯林的斗篷, 256; 在萨尔茨堡, 256—258; 与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257; 本·尼克森森, 259; 静脉曲张, 264; 伯林自爱尔兰返回时见到他, 284; 战时服役, 305, 344, 388; 在西非, 460; 牛津的职位, 498; 被巴利奥学院拒绝, 565—567, 571, 576; 伯林在事业上帮助他, 566—568, 571, 576—577; 玛丽·伯林喜欢他, 704; 与哈钦森和尼克森森合住, 711; 与里德利的友谊, 714
- Hampstead, 汉普斯特: 地图, 4
- Hancock, (William) Keith, 汉考克, (威廉·)基思, 560
- Hannegan, Robert Emmet, 哈尼根, 罗伯特·埃梅特, 556
- Hardie, Colin Graham, 哈迪, 科林·格雷厄姆, 100, 710
- \*Hardie, William Francis (‘Frank’) Ross, 哈迪, 威廉·弗朗西斯(“弗兰克”)·罗斯: 在牛津与伯林一起, 22—24; 伯林被提供《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职位, 28, 33—34; 嘲弄A. C. 克拉克, 31 n7; 伯林觉得他无趣, 38; 鼓励伯林在牛津工作, 41; 伯林的全灵学院研究员职位, 42; 轻视富尔顿, 44; P. S. 阿兰需要输血, 50; 在萨尔茨堡, 100, 258; 伯林在牛津见到他, 129; 评论盖尔斯·罗伯逊, 184; 布莱克威之死, 210; 伯林计划去哥廷根, 250; 在牛津主考, 260; 与华莱士一起, 274; 哈特, 510; 伯林对他的感激, 709—710; 乌尔姆森的评价, 710
- Harding, Warren Gamaliel, 哈丁, 沃

- 伦·加莫利尔, 441, 627
- Hardy, Godfrey Harold, 哈代, 格德弗雷·哈罗德, 157, 575 n7
- Harlech, Beatrice, Lady, 哈勒奇, 贝阿特丽丝, 夫人(贝阿特丽丝·塞西尔夫人), 177 n4
- Harlech, William George Arthur Ormsby-Gore, 哈勒奇, 威廉·乔治·阿瑟·欧姆斯比—戈尔, 男爵四世, 177, 248—249, 301, 322
- Harman, Avraham, 哈尔曼, 阿弗拉汉姆, 143
- Harriman, William Averell, 哈里曼, 威廉·阿维里尔, 618 n1, 629
- Harrod, Frances Marie Desirée, 哈罗德, 弗朗西丝·玛丽·迪赛里(婚前姓福布斯—罗伯逊, 罗伊·哈罗德的母亲), 55, 58
- \*Harrod, (Henry) Roy Forbes, 哈罗德, (亨利·)罗伊·福布斯: 在波多菲诺与伯林结伴度假, 55, 58; 在牛津, 90, 251; 布希奥斯致法兰克福特的信, 108; 与玛丽·斯都普斯通信, 110; 崇拜林德曼, 167, 175; 写作, 172; 政治观点, 174; 攻击基督教堂学院院长, 177; 出席巴希尔·穆雷的庭审, 179; 聚会, 206; 出席布莱克威的葬礼, 211; 讨论退位事件, 218; 给在美国的鲍拉写信, 225; 森豪斯的鄙视, 238; 犹豫不决, 239; 喝酒, 251, 267; 艾耶尔在英格兰的生活, 460; 汉普希尔的职业前景, 568; 成为议员, 574; 朋友, 710; A.H.史密斯, 716
- Harrod, Wilhelmine (‘Billa’), 哈罗德, 威廉明妮(“比拉”), 267, 338, 710
- \*Hart, Herbert Lionel Adolphus, 哈特,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图16): 厄克特的乡村木屋(图13), 59 n3; 与詹妮弗结婚, 113 n5; 与伊夫·基希度假, 203 n2; 佩吉·杰伊, 221; 伯林邀请看歌剧, 272; 伯林想象美国的环境, 339; 以及伯林对道德问题的看法, 497—498; 在牛津的职位, 497—498; 伯林推荐担任新学院哲学职位, 509—512; 获得新学院研究员职位, 529, 533—534, 539, 567, 576; W.O.哈特, 572; 鲍拉对其看法, 577; 玛丽·伯林同情他, 704
- Hart, Jenifer, 哈特, 詹妮弗, 见威廉斯, 詹妮弗
- Hart, William Ogden, 哈特, 威廉·欧格登, 572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82, 218, 220, 229, 253, 328, 367, 457, 482
- Harvey, Oliver, Baron, 哈维, 奥利弗, 男爵, 668
- Hatch, Carl Atwood, 哈奇, 卡尔·艾特伍德, 554, 557
- Hauser, Dr Edwin T., 豪泽, 埃德温·T., 医生, 406, 410, 418
- Haydn, (Franz) Josef, 海顿, (弗朗兹·)约瑟夫, 236
-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The Road to Serfdom*, 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奥

- 古斯特·冯:《通向奴役之路》, 540—541, 543
- Hayter, William Goodenough, 海特, 威廉·古迪纳夫, 434, 438, 442—443, 445, 448, 477, 583
- Hayward, John Davy, 海沃德, 约翰·戴维, 214, 218, 226, 230, 238
- Hazel, Alfred Ernest William, 海泽尔, 阿尔弗雷德·厄内斯特·威廉, 250
- Hazlitt, Henry Stuart, 哈兹利特, 亨利·斯图尔特, 541
- Hazlitt, William, 哈兹利特, 威廉, xix
- Headlam, Rt Revd Arthur Cayley, 海德勒姆, 阿瑟·凯雷, 格罗斯特, 主教大人, 163, 388—389
- Headlam-Morley, Agnes, 海德勒姆—莫雷, 阿格尼丝, 135, 260—261
- Heard, Henry Fitzgerald (‘Gerald’), 赫德, 亨利·菲茨杰拉德 (“杰拉德”), 172
- Heath, Archie Edward, 希斯, 阿奇·爱德华, 137
- Heathcoat Amory, (Margaret Irène) Gaenor, 希思科特·阿莫利, (玛格丽特·伊雷娜·)加诺, 330
- Heathcoat Amory, Richard Frank, 希思科特·阿莫利, 理查德·弗兰克, 330 n4
- Heaton, Constance Irene, 西顿, 康斯坦丝·艾琳(婚前姓惠勒—班纳特), 491 n4
- Heaton, Trevor Braby, 西顿, 特瑞弗·布拉比, 491
- Hedgehog and the Fox, The* (IB), 《刺猬与狐狸》, 伯林, xli, 42 n3, 531 n1, 714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43, 202, 652
- Heger, Robert, 黑格, 罗伯特, 26
- Heifetz, Jascha, 海菲茨, 贾沙, 10, 470 n3, 580
- Heilperin, Mich (a) el Angelo, 黑尔普林, 迈克尔·安吉洛, 57
- Heine, (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海涅, (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原姓哈利), 154, 202, 469
- Helvétius, Claude Adrien, 爱尔维修, 克劳德·阿德里恩, 67
-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海明威, 厄内斯特·米勒, 153, 610; 《太阳照常升起》, 482 n1
- Henderson, Charles Gordon, 亨德森, 查尔斯·戈登, 23, 49, 60&n4, 64
- Henderson, Henry Ludwig, 亨德森, 亨利·路德维格, 222, 694 n
- Henderson, Hubert Douglas, 亨德森, 休伯特·道格拉斯, 207, 219
- Henderson, (Mary) Isobel, 亨德森, (玛丽·)伊索贝尔(婚前姓蒙罗), 23 n5, 60 n4, 118 n6
- Henderson, John F., 亨德森, 约翰·F., 199, 271
- Henniker Heaton, Peter Joseph, 亨尼克·西顿, 彼得·约瑟夫, 24
- Herbert, Alan Patrick: *The Trials of*

- Topsy*, 赫伯特, 阿兰·帕特里克:《托普西的审判》, 138
- Hermes, Gertrud: *Die geistige Gestalt des Marxistischen Arbeiters und die Arbeiterbildungsfrage*, 赫尔姆斯, 格特鲁德,《马克思主义工人的知识特征和工人教育的问题》, 296 n4
- Herriot, Édouard, 赫里欧, 爱德华, 420
- Hershey, Major-General Lewis Blaine, 赫西, 刘易斯·布赖恩, 少将, 421
- Hertz, Daniel Henry, 赫兹, 丹尼尔·亨利: 身故, 197
- Hertz, Joseph Herman, 赫兹, 约瑟夫·赫尔曼(大拉比), 41, 197
- Herwegh, Georg, 赫尔威克, 格奥尔格, 200
- Herzen, Alexander Ivanovich,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xxxiv, 68, 239, 259, 261—262, 278—281, 287, 378, 531
- Herzl, Theodor, 赫茨尔, 西奥多, 674
- Herzog, Jacob, 赫佐格, 雅各布, 663, 692—693
- Hess, Moses, 赫斯, 摩西, 200, 202
- Hess, Rudolf, 赫斯, 鲁道夫, 559, 595, 694 n
- Hichens, William Lionel, 希钦斯, 威廉·莱昂内尔, 322
- Highbrows, 自视品位高者: 定义, 211—213
- Highet, Gilbert Arthur, 海伊特, 吉尔伯特·亚瑟, 576
- Hill, (John Edward) Christopher, 希尔, (约翰·爱德华·)克里斯托弗, 339, 514, 563, 569, 579
- Hill, Diana, 希尔, 黛安娜, 283 n2
- Hill, George, 希尔, 乔治, 136 n4
- Hillman, Sidney, 希尔曼, 西德尼, 376
- Hilton, John Robert, 希尔顿, 约翰·罗伯特, xxii; 与麦克尼斯的友谊, 20; 获得约翰·洛克奖学金, 22; 在塞浦路斯, 117&n1; 试用期结束, 136; 比兹雷太太迷恋他, 147; 伯林造访, 189
- Hilton, Margaret (‘Peggy’) Frances, 希尔顿, 玛格丽特(“佩吉”)·弗朗西丝(婚前姓斯蒂芬斯), 20 n4, 189, 276
- Hindenberg, Field Marshal 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 und von, 兴登堡, 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本内肯道夫·安德·冯, 陆军元帅, 491
- Hiroshima, 广岛, 583
- Hirschman, Mme, 赫施曼太太, 见杰许曼, 恩里埃塔·里奥珀尔多芙娜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刺杀未遂, 40 n2, 717; 反犹政策, 54 n1, 60 n2; 审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115; 占领莱茵兰, 158; 与张伯伦会见, 282; 绥靖政策, 289; 进攻苏联, 595; 冯·特罗特对其评论, 719
- Hobson, Dr Frederick Greig, 霍布森, 弗雷德里克·格雷戈, 博士, 140, 408
- Hodgkin, Edward (‘Teddy’) Christian, 霍奇金, 爱德华(“泰迪”)·克里斯蒂安, 55, 58, 245 n7
- \*Hodgkin, Thomas Lionel, 霍奇金, 托

- 马斯·莱昂内尔: 与伯林同游波多菲诺, 55, 58; 与莫伊拉·林德的关系, 56 n5, 58, 101; 未能通过全灵学院研究员选拔, 64; 在埃及、巴勒斯坦与外约旦, 89, 96, 98, 105, 119; 冯·特罗特, 89; 伯林的描述, 710
- Hodson, Henry (‘Harry’) Vincent**, 霍德森, 亨利(“哈利”)·文森特, 490, 703, 715
-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霍夫曼, 恩斯特·西奥多·阿玛多伊斯, 531
- Hofmannsthal, Hugo von**, 霍夫曼斯塔尔, 雨果·冯, 239, 429 n8
- Hofmannsthal, Raimund von**, 霍夫曼斯塔尔, 瑞蒙德·冯, 429
- Holbach, Paul Henri Thiry, baron d’**, 霍尔巴赫, 保尔·亨利·西瑞, 男爵, 67
- Hölderlin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荷尔德林, (约翰·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132
- Holdstein, Sophie**, 豪斯廷, 索菲, 333, 351—352, 526
- Holdstein, Walter**, 豪斯廷, 沃特, 333, 336, 349, 351—352, 364, 429, 431, 526, 539
- Holdsworth, Sir William Searle**, 霍兹沃思, 威廉·塞尔, 爵士, 90
- Holland**, 荷兰, 47—48, 79
- Hollycroft Avenue, Hampstead**,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 汉普斯特区, 253, 348; 地图, 4; 49号(1928年起伯林的家; 图5), 80
- Hollywood**, 好莱坞, 483
- Holmes, Jesse Holman**, 霍尔姆斯, 杰西·霍尔曼, 421
- Holmes, Oliver Wendell, Jr**, 霍尔姆斯, 小奥利弗·温德尔, 511
- Holstein, Friedrich von**, 霍尔斯坦, 弗里德里希·冯, 465
- Honduras**, 洪都拉斯, 306 n1
- Hooker, Robert G.**, 胡克, 罗伯特·G., 491
- Hoover, Herbert**, 胡佛, 赫伯特, 620 n2
-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胡佛研究所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 加利福尼亚, 620
- Hope, Alison**, 霍普, 艾丽森, 见布莱克威, 艾丽森
- Hopkins, Gerard Manley**, 霍普金斯, 杰拉德·曼雷, 92, 196
- Hopkins, Harry Lloyd**, 霍普金斯, 哈里·劳埃德, 437, 500, 521, 557, 677
- Hopkins, Louise**, 霍普金斯, 路易丝(婚前姓梅西), 500
- Hopkinson, David**, 霍普金森, 戴维, 63 n2
- Hore-Belisha, (Isaac) Leslie**, 霍尔—别利沙, (艾萨克·) 莱斯利, 250, 423
- Horowitz, Vladimir**, 霍洛维茨, 弗拉基米尔, 368, 580
- Horowitz, Wanda**, 霍洛维茨, 旺达(婚前姓托斯卡尼尼), 368 n6
- Hoskins, Col. Harold B.**, 霍斯金斯, 哈罗德·B., 上校, 444, 493—494
- Hourani, Albert Habib**, 胡拉尼, 阿尔伯

- 特·哈比卜, 213 n2, 292—293, 340, 348, 371, 373
- \*House, (Arthur) Humphry, 豪斯, (亚瑟·) 汉弗莱: 谈论戈伦韦·里斯的小说处女作, 38; 阅读劳伦斯的《毁灭之日》, 39; 提议伯林前往爱尔兰拜访伊丽莎白·鲍恩, 51—52; 迷恋莫伊拉·林德, 52 n1; 全灵学院研究员职位候选人, 62, 65; 在埃克塞特, 71—72; 结婚, 80; 伯林在德文郡拜访, 85; 在贝尔法斯特, 87; 印度之行, 155, 192; 性格, 181; 对里斯的看法, 182; 政治观点, 189; 在鲍恩宅邸, 288; 在军队服役, 357; 伯林对他的回忆, 711; 《我用我的小眼睛偷窥》, 262; 《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的笔记和论文》, 226
- House, Madeline, 豪斯, 马德琳, 见切奇, 马德琳
- How, Frederick Walter, 豪, 弗雷德里克·沃尔特 (图13), 59 n3
- Howard, John Eldred, 霍华德, 约翰·埃尔德雷德, 221 n3
- Howitt, Arthur, 豪伊特, 阿瑟, 9
- Hubback, Diana Mary, 哈贝克, 戴安娜·玛丽 (后姓霍普金森; 图25): 与伯林的友谊, 63, 126, 148; 生日聚会, 73—74; 伯林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愤怒, 85; 关于斯彭德没有去南斯拉夫, 123; 对特罗特的支持, 718; 《香树》, 75
- Huberman, Bronislaw, 胡伯曼, 布罗尼斯洛, 368
- Hudson, Geoffrey Francis, 哈德森, 杰弗里·弗朗西斯, 63, 290
-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 125, 165, 241
- Hull, Cordell, 赫尔, 科德尔, 421, 446—450, 488, 661, 668, 683
- Hultin, Barbara, 休尔汀, 芭芭拉, 见斯特雷奇, 芭芭拉
- Hultin, Olav, 休尔汀, 奥雷夫, 56 n6
- Hume, David, 休谟, 大卫, 49, 78, 116 n2, 224, 253
- Hurley, Patrick Jay, 赫尔利, 帕特里克·杰伊, 448
- \*Hutchinson, Jeremy Nicolas St John, 哈钦森, 杰里米·尼古拉斯·圣约翰: 在牛津与本·尼克尔森一起, 153; 学位, 185; 拜访伯林, 209; 在卡尔斯巴德与本·尼克尔森在一起, 279;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 714
- Hutchinson, Mary Barnes, 哈钦森, 玛丽·巴恩斯, 195, 260, 711, 714
- Hutton, (David) Graham, 胡顿, (大卫·) 格雷厄姆, 433, 465 n4, 499, 545, 616
- Huxley, Aldous Leonard, 赫胥黎, 奥尔德斯·伦纳德: 对理想世界的想象, 145; 失败主义, 175; 反战主义, 188, 191; 沃尔波尔称赞, 194; 与罗斯柴尔德们在一起, 215—217, 222; 伯林评论他, 216—217, 222; 《美丽新世界》, 139 n1; 《加沙的盲人》, 172—173, 191 n6; 《你能做些什么?》, 191 n4

- Huxley, Thomas Henry,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76, 634
- Huysmans, Joris Karl, 于斯曼, 乔里斯·卡尔(原姓查尔斯—玛丽—乔治), 173
- Hyde, Douglas, 海德, 道格拉斯, 283
- Hyndman, Henry Mayers, 海因德曼, 亨利·梅尔斯, 76
- Hyndman, Thomas Arthur Rowett ('Tony'), 海因德曼, 托马斯·亚瑟·洛维特(“托尼”), 76, 92, 118, 126, 128, 132, 141—142, 338
- Ibn Saud, King of Saudi Arabia, 伊本·绍德, 沙特阿拉伯国王, 675, 688
- Ickes, Harold LeClair, 伊克斯, 哈罗德·勒克莱尔, 439, 553
- Ignatieff, Michael, 伊格纳季耶夫, 迈克尔: 《伯林传》, xvi, xxv, 15
- Iliffe, John Henry, 艾立夫, 约翰·亨利, 99
- Ilinska, Countess Fira, 伊林斯卡, 菲拉, 伯爵夫人(婚前姓本南森), 411
- Ilinsky, Count Janusz, 伊林斯基, 贾努兹, 伯爵, 411
- Inber, Vera Mikhailovna, 英培尔,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 603
- “Induction and Hypothesis”, 《归纳与假设》(伯林), 231 n3
- Innes, 英尼斯(英国使馆官员), 358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543 n1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国际劳工组织, 383—384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43 n1
- Iran (Persia), 伊朗(波斯), 621, 624
- Iraq: wartime rebellion, 伊拉克: 战时暴乱, 373—374
- Ireland, 爱尔兰: 伯林游此地, 50—54, 86—88, 176, 191—192, 276—281, 283; 伯林在此染肺炎, 404, 409—410
- Irgun Zvei Leumi, 犹太国家军事组织, 690—691
- Irwin, Alice B., 欧文, 艾丽丝·B.(伯林在华盛顿的秘书之一), 366, 381, 385, 426
- Isherwood, Christopher William Bradshaw, 衣修午德, 克里斯托弗·威廉·布拉德肖: 沃尔波尔称赞, 194—195; 与海因茨·内得梅耶的关系, 237 n2; 移民美国, 306; 《皮下之狗》(与奥登合作), 127; 《狮子和影子》, 270; 《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 126
- Israel, 以色列: 建国, 687, 691—692; 另见巴勒斯坦
- Istorik, 伊斯特里克(犹太复国主义银行的总经理), 363, 368, 383
- Italy, 意大利: 伯林在那里度假, 231—232, 625
- Jabotinsky, Ze'ev/Vladimir, 亚博京斯基, 泽耶夫/弗拉基米尔, 124 n4, 332
- Jacob Herzog Memorial Lecture, 雅各布·赫佐格纪念讲座, xxv, 663

- Jaffe (Yaffé), Leib, 亚非(雅非), 雷伯, 551
- Jakobson, Roman Osipovich, 雅各布森, 罗曼·欧西珀维奇, 564—565, 577—578
- James, Henry, 詹姆斯, 亨利: 伯林读他的书, 80, 241; 斯彭德谈论亨利·詹姆斯, 116, 124—125; 麦卡锡谈论亨利·詹姆斯, 124; 欧洲神话研究, 152; 格特鲁德·施泰因谈论亨利·詹姆斯, 153; 其身上的毁灭感, 175; 沃尔波尔与他, 194—195, 206; 情感的力量, 239; 伯林对其作品的看法, 241—243, 273, 278, 320; 论欧洲的客厅, 254; 伯林反感他, 255; 引经据典的风格, 282; 《阿斯本文稿》, 231—232; 《尴尬年龄》, 134
- James, Henry, 詹姆斯, 亨利(1879—1947), 579
-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78
- Janin, René, 詹宁, 勒内, 613 n1
- Japan, 日本: 入侵满洲里, 36; 偷袭珍珠港, 386 n2; 战败(1945), 583
- \*Jay, Douglas Patrick Thomas, 杰伊, 道格拉斯·帕特里克·托马斯: 与谢拉·格兰特·达夫, 48—49, 232—233; 写关于“棕皮书”的文章, 60; 猫, 77—78; 写作, 144; 与伯林远足, 150; 与戈伦韦·里斯, 151; 伯林与其一起吃饭, 199; 评论《经济学家》的编辑人员, 199 n7; 事业, 221; 笑, 224; 预言萧条, 264; 唱歌, 271; 看望伯林, 271; 在法国里维埃拉, 295; 伯林在美国的背景中的想象, 339; 伯林对他的评价, 711—712
- Jay, Margaret (‘Peggy’), 杰伊, 玛格丽特(“佩吉”)(婚前姓加内特), 48 n4, 78, 113, 151, 221, 233, 271, 339, 711
- Jay, Mary, 杰伊, 玛丽(道格拉斯的遗孀), 711
- Jebb, (Hubert Miles) Gladwyn, 杰伯(赫伯特·迈尔斯·)格莱德温(后封为格莱德温伯爵), 312, 318, 350 n2, 515, 520, 537, 577, 618, 654
- Jenks, Mr, 詹克斯先生, 144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94—98, 138, 173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杰文斯, 威廉·斯坦利: 《逻辑学基础教程: 演绎法与归纳法》, 19 n4
- Jewish Agency, 犹太事务局, 见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 Jewish Brigade Group, 犹太军团(英国军队), 355 n1
- Jewish Chronicle*, 《犹太纪事》: 报道伯林入选全灵学院研究员, 42
- Jewish Morning Journal*, 《犹太新闻晨报》, 389
- Jewish Society (Oxford), 犹太社团(牛津), 142
- Jews, 犹太人: 纳粹迫害, 54 n, 60 n2, 83—84, 158 n4; 长期历史展望, 152; 在巴勒斯坦的地位, 246—247; 在美国, 375—376, 474, 665—666, 672; 对盟军胜利的依赖, 376; 在纽约法庭旁听的审判, 394—395; 以及第二次



- 世界大战的后果, 680; 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遇害, 689—690; 另见犹太复国主义
- Joachim, Elisabeth, 乔奇姆, 伊丽莎白, 275, 712
- Joachim, Harold Henry, 乔奇姆, 哈罗德·亨利, 117, 137, 275—276
- Joad, Cyril Edwin Mitchinson, 乔德, 西瑞尔·埃德温·米钦森, 125, 650, 652
- John of the Cross, St, 基督徒圣约翰(原名朱安·德·耶普斯·伊·阿尔瓦雷斯), 113, 273
- Johns Hopkins Hospital, Baltimore,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巴尔的摩, 522, 526, 528, 544
- Jones, David, 琼斯, 戴维, 244 n7
- Jones, Jack, 琼斯, 杰克, 388
- Joseph, Bernard, 约瑟夫, 伯纳德(后姓多夫), 361
- Joseph, Horace William Brindley, 约瑟夫, 霍勒斯·威廉·布林德利, 39, 43, 290, 300, 338, 470, 475, 497, 512
- Joseph Karl, Archduke of Austria, 约瑟夫·卡尔, 奥地利大公, 59
- Jowett Society, 乔维特学会, 150 n3
- Jowitt, William Alien, Earl, 乔伊特, 威廉·艾廉, 勋爵, 683
- Joyce, James, 乔伊斯, 詹姆斯, 609
- Judson, J. Alan, 贾德森, J.阿兰, 374, 423, 661
- Juvenal, 尤维纳利斯: 《讽刺诗集》, 636 n1
- Kafka, Franz, 卡夫卡, 弗朗茨, 125, 175, 242, 268, 272—273; 《中国长城》, 272
- Kahana, Uriel, 卡赫纳, 尤利尔, 39
- Kahn, Derek, 凯恩, 德瑞克, 见布莱基, 德瑞克
- Kaiser, Henry J., 凯瑟, 亨利·J., 483
- Kallen, Horace, 卡伦, 霍勒斯, 682
- Kane, Richmond Keith, 凯恩, 里奇蒙德·基思, 486
-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纽尔: 关于“先验”范畴, 49; 关于《扭曲的人性之材》, 72; 理想主义的, 78; 罗宾逊未读康德的书, 186; 伯林对其态度, 534
-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卡尔·马克思: 其生活与环境》(伯林): xl, xli, 296, 468 n5, 715; 另见卡尔·马克思
- Karlsbad, 卡尔斯巴德, 279
- Katkov, George (Georgy Mikhailovich), 卡特可夫, 乔治(格奥尔基·米哈依洛维奇), 340
- Katzman, Charles, 卡兹曼, 查尔斯, 147, 156, 185
- Keats, John, 济慈, 约翰, 167, 230
- Kennan, George Frost, 凯南, 乔治·弗罗斯特, 623
- Kensington: Royal Palace Hotel, 肯辛顿王宫酒店, 8
- Kent, Ala, 肯特, 艾拉, 461
- Ker, Alan, 科尔, 阿兰, 68
- Keren Hayesod, 凯伦·海伊索德, 93

- Kerensky, Aleksandr Fedorovich,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424
- Kettaneh, Francis A., 卡坦尼, 弗朗西斯·A., 440
- Keyes, Herbert Morgan Roger, 凯斯, 赫伯特·摩根·罗杰, 340
- Keynes, John Maynard, Baron,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男爵: 健康状况不佳, 251—252; 与丹尼斯顿的谈话, 287—288; 经济观点, 343; 战时在美国, 372, 377, 500; 汉普希尔的职业前景, 568—569; 巴勒斯坦问题, 683
- Keynes, Lady Lydia, 凯恩斯, 莉迪亚, 夫人(婚前姓洛波科娃), 500
- Khachaturyan, Aram Il'ich, 哈哈图良, 阿拉姆·伊利奇:《加雅涅》(芭蕾), 603
- Khlebnikov, Viktor Vladimirovich (‘Velemir’), 科勒尼科夫, 维克多·弗拉基米洛维奇(“维里米尔”), 577
- Khodasevich, Vladislav Felitsianovich, 柯达谢维奇, 弗拉迪斯拉夫·费里茨阿诺维奇, 551
- King, Alexander, 金, 亚历山大, 457
- King, (William Lyon) Mackenzie, 金, (威廉·莱昂·)麦肯兹, 467 n1
- Kingdon, Henry Paul, 金登, 亨利·保罗, 24
- Kintner, Robert Edmonds, 金特纳, 罗伯特·埃德蒙斯, 615
- Kisch, Eve (lyn) Myra, 基希, 伊夫(林)·迈拉, 110, 203
- Klemperer, Otto, 克伦佩勒, 奥托, 49
- Kluckhohn, Clyde Kay Maben, 克拉克洪, 克莱德·凯·梅本, 27, 79
- Knoop, Guitou, 诺普, 圭托, 461
- Knopf, Blanche Wolf, 诺弗, 布兰奇·沃尔夫, 468
- Knox, William, 诺克斯, 威廉, 486 n2
- Koenigstein, François Claudius (‘Ravacol’), 肯宁斯坦, 弗朗索瓦·克劳迪阿斯(“拉瓦科尔”), 261
- Koestler, Arthur, 凯斯特勒, 阿瑟, 579
- Konikov, N., 柯尼科夫, N., 550 n2
- Konovalov, Sergey Aleksandrovich, 考诺瓦罗夫, 谢尔盖·阿列克桑德洛维奇, 564—565, 577—578
- Kook, Hillel, 库克, 西莱尔, 见伯格森, 彼特
- Köpler, Heinz/Henry, 科普勒, 海因兹/亨利, 211
- Korda, Sir Alexander, 科尔达, 亚历山大, 爵士, 480, 542, 571, 611 m
- Korner, Eric, 科尔诺, 埃里克(原名埃里希·科尔诺), 551
- Kosatzky, Richard Eddler von, 科萨茨基, 理查德·艾德勒·冯, 59
- Kosatzky, Frau Richard von, 科萨茨基, 弗劳·理查德·冯, 66
- Koussevitzky, Serge, 库赛维茨基, 塞吉(原姓谢尔盖·亚列克桑德洛维奇), 495
- Kramaszky, 克拉玛斯基(犹太商人), 429
- Kraus, Arthur James Israel, 克劳斯, 亚

- 瑟·詹姆斯·以色列, 69
- Kreisler, Fritz, 克莱斯勒, 弗里茨, 148 n3, 266
- Krock, Arthur, 克洛克, 阿瑟, 327, 328, 485, 554, 628
- Kropotkin, Petr Alekseevich,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历克谢耶维奇, 218
- Kuhn, Ferdinand, Jr, 库恩, 小费迪南德, 543
- Kuprin, Aleksandr Ivanovich, 库普林, 阿历克桑德·伊万诺维奇, 595
- Labour Party, 工党: 大选获胜(1945), 583, 594; 巴勒斯坦问题, 688
- Laffan, Robert George Dalrymple, 拉方, 罗伯特·乔治·达尔林普尔, 339
- La Follette, Robert Marion, 拉弗雷特, 罗伯特·马里翁, 554
- La Follette, Robert Marion, Jr, 拉弗雷特, 小罗伯特·马里翁, 554 n9
- Laird, John, 莱尔德, 约翰, 512
- Lake District, 湖区, 193
- Lalande, André, 拉兰德, 安德烈, 112
- Lamberg, Count (Karl) Ottomar Konstantin Anton Raimund Michael, 兰伯格, (卡尔·)奥托玛尔·康士坦丁·安东·雷蒙德·迈克尔, 伯爵, 29
- Lamberg, Countess, 兰伯格, 伯爵夫人, 29, 32
- Lambert, Baron Henri, 兰伯特, 亨利男爵, 561 n1, 571 n2
- Lambert, Baroness Johanna (‘Hansi’) von Reininghaus, 兰伯特, 乔安娜(“汉西”)·冯·瑞宁豪斯男爵夫人, 561, 571 n2
- Lambert, Baron Lion Jean Gustave Samuel, 兰伯特, 莱昂·让·古斯塔夫·塞缪尔男爵, 571
- La Motte, Digby, 拉莫特, 迪格比, 7
- Lampert, Catherine 兰帕特, 凯瑟琳(婚前姓里德利), 366 n5
- Lampert, Genia, 兰帕特, 基尼尔, 366 n5
- Landau, Jacob, 兰道, 雅各布, 476—477, 527
- Lane, George, 雷恩, 乔治(原姓兰伊), 246 n1, 470 n2, 714
- Lane, Miriam, 雷恩, 米利亚姆, 见罗斯柴尔德, 米利亚姆
- Lang, Cosmo Gord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兰格, 科兹莫·戈登, 坎特伯雷大主教, 65
- Lansdowne, George John Charles Mercer Nairne Petty-Fitzmaurice, 8th Marquess of, 兰斯道恩, 乔治·约翰·查尔斯·莫瑟·纳尼·佩蒂—菲茨莫里斯, 女侯爵八世, 488 n1
- Lascelles, Sir Alan Frederick, 拉塞尔斯, 阿兰·弗雷德里克, 爵士, 524
- Laski, Harold Joseph, 拉斯基, 哈罗德·约瑟夫, 67, 179 n3, 321, 383
- Laski, Marghanita, 拉斯基, 玛甘妮塔(后姓霍华德), 221
- Laski, Neville Jonas, 拉斯基, 奈维尔·尤纳斯, 222
-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德,

- 68, 200—202
- Latham, Thomas Edwin, 拉萨姆, 托马斯·埃德温, 339
- Laughton, Charles, 劳顿, 查尔斯, 262
- Lauterpacht, Hersch, 劳特帕齐特, 赫施, 370, 393
- Lauterpacht, Rachel, 劳特帕齐特, 雷切尔(婚前姓斯坦伯格), 370, 409, 411
- Laval, Pierre, 赖伐尔, 皮埃尔, 422
- Law, Richard Kidston, 劳, 理查德·基斯顿(后封科尔伦郡伯爵一世), 435, 466, 467, 496, 522, 567, 577
- Lawley, Susan (‘Sue’), 劳利, 苏珊(“苏”), 480 n2
- Lawrence, Sir Alexander (Waldemar), 劳伦斯, 亚历山大(·瓦尔德马)爵士, 134
- Lawrence, David Herbert, 劳伦斯, 戴(维)·赫(伯特), 123, 125, 539, 704; 《毁灭之日》, 39; 《羽蛇》, 539
- Lawrence, John Waldemar, 劳伦斯, 约翰·瓦尔德马, 605
- Lawrence, Thomas Edward, 劳伦斯, 托马斯·爱德华, 125, 191
- Layton, Walter Thomas, 雷顿, 沃特·托马斯, 60
- Leaf, Mrs John G., 立夫太太, 约翰·G., 504
- Leaning, W. John, 利宁, W.约翰, 465
- Lear, Edward, 李尔, 爱德华, 481
- Leeper, Reginald (‘Rex’) Wildig Allen, 利珀, 雷吉纳尔德(“雷克斯”)·怀尔迪格·艾伦, 547
- Leeson, Spencer, 里森, 斯宾塞, 210
- Legg, Leopold George Wickham, 莱格, 里奥波德·乔治·威克姆, 298, 300, 380
- Lehman, Herbert Henry, 莱曼, 赫伯特·亨利: 与伯林会面, 362—363, 375;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 474; 犹太复国主义, 672, 681
- \*Lehmann, Rosamond Nina, 莱曼, 罗莎蒙德·尼娜: 与戈伦韦·里斯的情事, 192, 198; 伯林对其抱有好奇, 192; 沃尔波尔称赞她, 194;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她, 203, 209; 伯林邀请她吃午饭, 205, 220; 伯林改变对其看法, 210, 215; 《罗莎蒙德·莱曼影集》, 193 n1
- Leibowitz, Nechama, 雷波维茨, 内查玛, 98 n3
- Leibowitz, Yeshayahu, 雷波维茨, 耶沙亚胡, 98
- Lejeune, Caroline Alice, 勒祖恩, 卡罗琳·艾丽丝, 644
- Lenanton, Gerald, 列纳顿, 杰拉德, 506
- Lenanton, William Ray, 列纳顿, 威廉·雷, 42
- Lend-Lease agreement (US-British), 借贷协议(美—英), 361 n6, 367, 401, 449, 659—660
- Lenin, Vladimir Il’ich,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18, 119 n1, 424
- Leningrad (Petrograd; St Petersburg), 列宁格勒(彼得格勒, 圣彼得堡): 伯林童年在此度过, xxxix; 伯林访问,

- 593—595, 597, 599—612, 615; 地图, 598; 围城, 599, 606—607; 条件, 601—604; 文学状况, 605—612
-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633
- Lepper, Francis (‘Frank’) Alfred, 莱帕, 弗朗西斯(“弗兰克”)·阿尔弗雷德, 185
- ‘Lev Tolstoy’s Historical Scepticism’, 《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伯林的文章), xix
- Levin, Shmarya, 列文, 施马尔亚, 93, 96—98, 121, 129
- Levine, Revd Ephraim, 列文, 艾弗莱姆, 牧师, 142
- Levitt, Joseph E., 列维特, 约瑟夫·E., 316
- Lévy, Michel-Maurice, 列维, 迈克尔—莫里斯, 见贝托夫
- Lewis, Clarence Irving, 刘易斯, 克拉伦斯·埃尔文, 208, 252; 《心智与世界秩序》, 152 n1
- Lewis, Clive Staples, 刘易斯, 克利夫·史戴普, 68, 70
- Lewis, John Llewellyn, 刘易斯, 约翰·勒维林, 384, 543
- Lewis, Sinclair, 刘易斯, 辛克莱, 374 n2
- Lewis, Sir Willmott Harsant, 刘易斯, 威尔莫特·哈桑特, 爵士, 481
- Lewis, Wyndham, 刘易斯, 温德姆: 《希特勒》, 641
- Lieberman, Alexander, 利伯曼, 亚历山大, 364, 504 n1
- Lieberman, Simon Isaevich, 利伯曼, 西蒙·伊萨维奇, 364 n1, 504, 525
- Liebermann, Judith, 利伯曼, 朱迪斯(原姓伯林), 429
- Liebermann, Saul, 利伯曼, 扫罗, 429 n2
- Lightfoot, Revd Robert Henry, 莱福特, 罗伯特·亨利, 牧师, 130, 230, 358, 380, 470, 475, 496
- Ligne, Henri, Prince de, 利涅, 亨利, 亲王, 508 n2
- Lilienthal, David, 利连撒尔, 戴维, 555
- Lincoln, F (redman) Ashe, 林肯, 弗(雷德曼·)艾许, 316
- Lincoln, Reuben and Fanny, 林肯, 鲁本和芳妮, 316—317
- Lindbergh, Anne Spencer Morrow, 林德伯格, 安妮·史宾塞·莫洛, 336, 528 n5
- Lindbergh, Charles Augustus, 林德伯格,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 336, 528 n5
- Lindemann, Frederick Alexander, 林德曼, 弗里德里克·亚历山大(后为切维尔子爵一世), 166, 174—175
- Lindsay, Alexander Dunlop, 林赛, 亚历山大·邓洛普, 159 n1, 179, 250, 296, 298, 305, 513 n1
- Lindsay, Erica (née Storr), 林赛, 爱丽卡(原姓施托尔), 159
- Linstead, Sir Patrick, 林斯达, 帕特里克, 爵士, 380 n8
- Lion, Aline Augusta, 莱昂, 艾琳·奥古斯塔, 118
- Lippmann, Walter, 李普曼, 沃尔特,

- 499—500, 557, 615—616, 622, 628
- Lipsky, Louis, 利普斯基, 路易斯, 360, 671
- Literary Gazette*, 《文学报》(莫斯科报刊), 608
- Litvin, Natasha, 立特文, 娜塔莎(后姓斯彭德), 244 n2, 371, 717
- Litvinov, Maksim Maksimovich, 里特维诺夫,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463 n3
- Llewellyn, Col. John Jestyn, 列威灵, 约翰·杰斯丁, 上校, 436, 542
- Lloyd, George Ambrose, 1st Baron Lloyd of Dolobran, 劳埃德, 乔治·安布罗斯, 多勒布兰的劳埃德男爵一世, 345, 355
- Lloyd George, David, 劳合·乔治, 戴维, 300, 302
- Lloyd-Jones, Hugh: (ed.) *Maurice Bowra: A Celebration*, 劳埃德—琼斯, 休: (编写)《莫里斯·鲍拉庆祝文集》, xlii n1
- Locarno, Treaty of, 洛迦诺公约(1925), 158 n3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634
- Locker, Berl, 洛克, 伯尔, 451
- Locker-Lampson, Commander Oliver Stillingfleet, 洛克—兰普森, 奥利弗·斯蒂林弗利特, 指挥官, 158
- Lockhart, John Gibson, 洛克哈特, 约翰·吉布森, 167
- Logan, Andy, 洛根, 安迪(婚前姓伊莎贝尔·安·洛根), 508
-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117, 160, 164, 208 n5, 497, 510, 742—743
- London Library, The, 伦敦图书馆, 68, 392
- London Mercury*, 《伦敦水星》, 126
- Longden, Robert ('Bobby') Paton, 隆登, 罗伯特(“波比”)·佩顿, 225
- Longford, Countess of, 朗福德伯爵夫人, 见帕肯汉姆, 伊丽莎白
- Longford, 7th Earl of, 朗福德伯爵七世, 见帕肯汉姆, 弗朗西斯
- Longworth, Alice Lee Roosevelt, 朗沃思, 艾丽丝·李·罗斯福, 484, 532 n1, 548
- Longworth, Nicholas, 朗沃思, 尼古拉斯, 484 n1
- Lothian, Philip Henry Kerr, 11th Marquess of: 洛锡安, 菲利普·亨利·科尔, 十一世侯爵: 任驻美大使, 309, 318, 321, 323, 325, 335, 339; 对担任新学院院长兴趣, 322; 对伯林1940年提出去苏联的意见, 324—325; 访英, 353; 去世, 361 n5, 372
- Lourie, Arthur, 罗里, 阿瑟, 368
- Lourié, Arthur Vincent, 鲁里埃, 亚瑟·文森特(原名阿图尔·谢尔盖维奇·鲁耶), 495
- Lowe, Elias Avery, 洛厄, 伊莱亚斯·艾弗里, 372
- Lowe, Revd John, 洛厄, 约翰牧师, 576
- Lubavitch(er), 路巴维切(尔), 364 n2, 429 n3
- Lubbock, Sir John, 鲁伯克, 约翰, 爵士,

## 76—77

Lucas, Scott Wike, 卢卡斯, 斯科特·维克, 501

Luce, Clare Boothe, 卢斯, 克莱尔·布思, 628

Luce, Henry Robinson, 卢斯, 亨利·罗宾逊, 584, 628 n5

Lunacharsky, Anatoly Vasil'evich, 卢那察尔斯基, 阿纳托里·瓦西里维奇, 119 n1

Lvov, Prince Georgy Evgenievich, 利沃夫, 格奥尔基·耶夫根耶维奇, 亲王, 424

\*Lynd, Maire/Moira, 林德, 莫伊拉 (“小宝贝”); 后姓加斯特; 图16, 24): 伯林在牛津的学生, 43, 93; 与伯林在爱尔兰 (图29), 50—53, 86—87; 与伯林在波多菲诺, 55; 心情, 60;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共进晚餐, 68, 70—71, 79; 伯林不经心的“盗窃癖”, 75; 对G.M.霍普金斯有兴趣, 92; 加入共产党, 92;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父亲去世, xxi; 母亲的迷信, 111; 在萨尔茨堡 (图19), 131—132, 139 n6; 仰慕斯彭德, 133; 伯林依恋她, 133—134; 与布赖恩·吉尼斯, 134; 在海因曼出版社工作, 162; 谈论本科生, 189;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到访英格兰, 246; 政治倾向, 338; 伯林战时在美国任职, 354 n1; 与加斯特结婚, 355 n2, 430 n8; 家庭与性格, 712

Lynd, Robert, 林德, 罗伯特, 80 n2, 103, 712

\*Lynd, Sigle/Sheila, 林德, 西勒 (后姓惠勒; 图23): 婚姻, 38 n5; 在牛津, 38; 在戈兰茨工作, 38 n5, 87 n3; 外表, 45, 712; 谢拉·格兰特·达夫, 48; 与伯林在波多菲诺, 55; 与托马斯·霍奇金的关系, 56 n, 58; “小宝贝”与托马斯·霍奇金的关系, 58; 被E.鲍恩的《猫跳》所惊吓, 88; 与伯林在萨尔茨堡, 100; 谈论萨尔茨堡, 118; 谈论共产主义, 167; 伯林送她和斯彭德一起去听托斯卡尼尼音乐会, 237; 家庭, 712

Lynd, Sylvia (née Dryhurst), 林德, 西尔维亚 (婚前姓德莱赫斯特), 80, 111; 《英国儿童》, 535 n1, 712

Lys, Francis John, 利斯, 弗朗西斯·约翰, 56

Lyttelton, Oliver, 利特尔顿, 奥利弗 (后为山多斯子爵一世), 542, 553, 568 n4

Mabbott, John David, 马博特, 约翰·戴维, 511

MacArthur, General Douglas, 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将军, 691

Macartney, Carlile Aylmer, 麦卡特尼, 卡利·埃尔默, 260

Macartney, Nedella, 麦卡特尼, 内德拉 (婚前姓玛玛切夫), 260 n6

Macaulay, (Emilie) Rose, 麦考利, (艾米丽·) 罗斯, 226, 227

Macaulay, Isobel, 麦考利, 伊索贝尔 (后姓哈迪), 709

-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Baron, 麦考利, 托马斯·巴宾顿, 男爵, 145—146
- Macbeth, Dr Ronald Graeme, 麦克白, 罗纳德·格莱美, 医生, 223
- McCallum, Ronald Buchanan, 麦克卡鲁姆, 罗纳德·布坎南, 300, 338, 388
- MacCarthy, Desmond, 麦卡锡, 戴斯蒙德, 124—125, 158, 166, 306, 706
- MacColl, René, 麦科尔, 勒内, 425 n9
- McCormick, Robert Rutherford, 麦克科米克, 罗伯特·鲁特福德, 476
- MacDonald, Margaret, 麦克唐纳, 玛格丽特, 160 n5
- McDonnell, Angus, 麦克唐奈尔, 安格斯, 425
- McDougall, 麦克道格尔 (身份未确认), 575
- McGeachy, (Mary Agnes) Craig, 麦吉奇, (玛丽·阿格尼斯·)克雷格, 399, 424, 428, 466, 474, 524
- Macgregor, David Hutchinson, 麦克格雷格, 戴维·哈钦森, 227
- MacIver, Arthur Milne, 麦基弗, 亚瑟·米尔尼, 576
- Mack, (William) Henry Bradshaw, 麦克, (威廉·)亨利·布拉德肖, 422
- Mackay, Ian, 麦凯, 伊恩, 618 n2
- McKellar, Kenneth Douglas, 麦克凯勒, 肯尼斯·道格拉斯, 555
- Mackenzie, Archibald Robert Kerr, 麦肯兹, 阿奇博尔德·罗伯特·克尔, 460, 503, 508, 514, 524, 527—528, 542, 546, 581, 661
- Mackenzie, Grant, 麦肯兹, 格兰特, 424, 527
- McKim, Edward Daniel, 麦金姆, 爱德华·丹尼尔, 556
- MacKinnon, Donald MacKenzie, 麦金农, 唐纳德·麦肯兹, 233, 498, 576
- MacLagan, William Gauld, 马克拉根, 威廉·高尔德, 498, 568
- McLaren, Martin, 麦克拉伦, 马丁, 186
- Maclean, Donald, 麦克莱恩, 唐纳德, 318 n2, 532, 533
- Maclean, Fitzroy Hew Royle, 麦克莱恩, 菲茨洛伊·修·洛伊尔, 319, 325, 329, 334
- MacLeish, Archibald, 麦克利什, 阿奇博尔德, 327, 342, 492, 500, 541, 544, 578
- MacMichael, Sir Harold Alfred, 麦克迈克尔, 哈罗德·阿尔弗雷德, 爵士, 675
- McMillan, John, 麦克米兰, 约翰, 162
- MacNabb, Donald George Cecil, 麦克纳伯, 唐纳德·乔治·塞西尔, 233, 498
- MacNeice, (Frederick) Louis, 麦克尼斯,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 在牛津, 20, 88; 诗歌, 118; 妻子与卡兹曼私奔, 155—156; 移居美国, 306; 《冰岛来信》(与奥登合著), 88 n2
- McNutt, Paul Vories, 麦克纳特, 保罗·沃利斯, 421
- McTaggart, John McTaggart Ellis, 麦塔格特, 约翰·麦塔格特·埃里斯, 118



- Madge, Charles, 玛吉, 查尔斯, 217 n3
- Maenchen-Helfen, Otto, 迈恩成一赫尔冯, 奥托, 见尼古拉耶夫斯基, 鲍里斯
- Magowan, John Hall, 玛格温, 约翰·霍尔, 435—436
- Mahler, Gustav, 马勒, 古斯塔夫, 266
- Maitland, Frederic William and Florence, 梅特兰, 弗雷德里克·威廉和佛罗伦斯(婚前姓费希尔), 371 n2
- Major, Prudence, 梅杰, 普鲁丹斯(后姓华莱士), 720
- Makins, Roger Mellor, 迈金斯, 罗杰·梅勒(后封为谢菲尔德男爵一世), 384, 515, 517, 520, 543, 545, 568, 577, 624
- Makinsky, Alexander (Prince), 马金斯基, 亚历山大(亲王), 562
- Makinsky, Kyrill Khan, 马金斯基, 吉里尔, 可汗, 62
- Makinsky, Pasha (Paul) Khan, 马金斯基, 帕夏(保罗), 可汗, 562 n1
- Malcolm, Angus Christian Edward, 马尔科姆, 安格斯·克里斯蒂安·爱德华, 438
- Malcolm, Dougal Orme, 马尔科姆, 道格尔·欧尔姆, 119
- Malebranche, Nicolas, 马勒伯朗士, 尼古拉, 72
- Mallet, William Ivo, 马莱特, 威廉·艾弗, 567
-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 安德烈, 172, 175, 181, 189, 192; 《人的命运》, 182 n1; 《希望岁月》, 263
-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x1, 28, 33—36, 83, 89, 718
- Manchuria, 满洲里, 36
- Mangeot, André, 芒若, 安德烈, 270
- Mangeot, Olive, 芒若, 奥丽芙, 270 n1
- Mannin, Ethel Edith, 曼宁, 伊索尔·伊迪斯(后改姓雷诺兹), 277 n2
- Mansfield, William Murray, 1st Earl of, 曼斯菲尔德, 威廉·穆雷, 伯爵一世, 230
- Markham, Felix Maurice Hippisley, 马卡姆, 费利克斯·莫里斯·希皮斯利, 38, 65
- Markovna, Frida, 马可夫娜, 弗丽达, 54
- Marks, Michael, 马科斯, 迈克尔, 416 n2
- Marmorstein, Emil, 马摩斯坦, 埃米尔, 94—95, 348
- Marschak, Jacob, 玛沙克, 雅各布, 236, 351, 367
- Marshak, Samuil Yakovlevich, 马沙克, 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 573
-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 《工业与贸易》, 75
- Marshall, General George Catlett, 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 将军, 683, 691
- Marshall Plan Conference, 马歇尔计划大会(巴黎, 1947), 683
- Marshall, Thomas Humphrey, 马歇尔, 托马斯·汉弗莱, 490
- Martin, John Miller, 马丁, 约翰·米勒, 479
- Martin, Joseph William, Jr, 马丁, 小约

- 瑟夫·威廉, 476
- Martin, Margery, 马丁, 玛格丽(婚前姓纽豪斯, 后来姓布朗), 130
- Martin, William, 马丁, 威廉, 130
- Marx, (Adolph) Arthur (‘Harpo’), 马克思, (阿道夫·)亚瑟(“哈珀”), 466
- Marx, Karl Heinrich, 马克思, 卡尔·亨利希: 伯林为其写传, xviii, xl, xli, 51, 67, 72, 76, 137, 189, 199, 218, 239—240, 253, 261, 263—264, 270—271, 274—277, 280—283, 285, 296—297; 伯林阅读其著作并展开研究, 43, 115, 122, 129—130, 160, 199—202; 关于政治行为, 63; 爱国主义, 77; 犹太性, 129; 麻木, 134; 伯林在书中向拉什米利耶维奇致谢, 141 n1; 关于庸人和波希米亚派, 227; 伯林的观点, 297—298; 克莱里休打油诗, 485; 《德法年鉴》, 200 n8; 《资本论》, 67;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与法西斯主义, 138, 639; 伯林摒弃, 174; 伯林嘲讽, 626; 另见共产主义
- Masaryk. Jan Garrigue. 马沙利克, 扬·盖利格, 339, 676
- Masaryk, Tomáš, Garrigue, 马沙利克, 托马斯·盖利格, 56; 《社会问题》, 129—130
- Mason, Alfred Edward Woodley, 梅逊,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伍德雷, 611
- Massenet, Jules Emile Frédéric, 马斯内, 儒勒·艾米尔·弗里德里克: 《维特》, 175 n5
- Masterman, John Cecil, 玛斯特曼, 约翰·塞西尔, 338; 《命运不能伤害我》, 142 n1
- Matheson, Hilda, 马西森, 希尔达, 338 n1
- Matheson, Percy Ewing, 马西森, 珀西·尤文, 300, 302 n1
- Mathews, Leslie Henry Staverton, 马修斯, 莱斯利·亨利·斯达沃顿, 12 n1
- ‘Matter’, 《物质》(伯林未发表的论文), 514 n2
- Mat(t)hews, Commander Ed, 马修斯, 埃德, 指挥官, 458, 462
- Mattuck, Rabbi Dr Israel Isidore, 马图克, 以色列·以西多尔, 拉比, 250
- Maud, John, 莫德, 约翰, 见瑞德克里夫—莫德, 约翰
-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毛姆, 威廉·萨默赛特, 194—195
- May, Doris Hermione Croxton, 梅, 多丽丝·赫敏·克洛克斯顿, 112
-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朱塞佩, 152, 297, 632, 691
- “Meetings with Russian Writers” (IB), 《会见俄罗斯作家》(伯林), 601 n1
- Mehring, Franz, 梅林, 弗朗兹: 《卡尔·马克思》, 200—202
- Meiggs, Russell, 梅格斯, 罗素, 212, 576
- Meinertzhagen, Daniel, 梅纳茨哈根, 丹尼尔, 186
- Melchett, Henry Mond, 2nd Baron, 梅尔切特, 亨利·蒙德, 男爵二世, 495

- Mellon, Andrew William, 梅隆, 安德鲁·威廉, 365
- Mendelsohn, Erich, 门德尔松, 埃里克, 39 n2
- Menuhin, Yehudi, 梅纽因, 耶胡迪, 292
- Merano, 莫拉诺, 231
- Meredith, George, 梅瑞狄斯, 乔治, 70
- Mestrovic, Ivan, 米斯特洛维奇, 伊万, 163
- Metaxa, Countess Ruth, 马塔莎, 露丝, 伯爵夫人, 50, 53
- Mexico, 墨西哥, 523, 528—529, 535—537, 539—540, 545
- Meyer, André Benoit Mathieu, 梅耶, 安德烈·贝诺特·马修, 430
- Meyer, Eugene, 梅耶, 尤金, 485, 676
- Meyerson, Emile, 梅尔森, 埃米尔: 《身份与现实》, 47
- Michaelis, Karin, 米凯利斯, 凯琳, 135
- Middle East, 中东, 623—624, 674, 684—685; 另见巴勒斯坦
- Mihailovich, Dragoljub, 米哈伊洛维奇, 德拉戈柳布(“德拉扎”), 623
- Miliukov, Pavel Nikolaevich, 米留可夫, 巴维尔·尼古拉维奇, 431
- Mill, John Stuart, 密尔, 约翰·斯图尔特, 78, 146
- Millar, Frederick Hoyer, 米勒, 弗里德里克·霍耶, 319, 399, 520, 617
- Milligan, Maurice Morton, 米利根, 莫里斯·莫顿, 557
- Mills, Eric, 米尔斯, 埃里克, 101—102, 119
- Mindel, Nissan, 明德尔, 尼桑, 博士, 429
- Mises, Ludwig von, 米瑟斯, 路德维希·冯, 541
- Mitchison, Dick, 米奇森, 迪克, 155 n7
- Mitchison, Naomi Mary Margaret, 米奇森, 纳奥米·玛丽·玛格丽特(婚前姓哈尔丹): 《我们被警告过了》, 155
- Mitford, Nancy, 米特福德, 南希, 37 n4, 710
- Mitrokhin, Vasili, 米特罗欣, 瓦西里, 714
- Moberly, Sir Walter, 莫波里, 沃尔特, 爵士, 301
- Mocatta, Moses, 莫卡塔, 摩西, 343 n2
- Mods, 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 xviii n2
- Molotov, Vyacheslav Mikhailovich, 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的笔名), 323, 543, 550 n2, 573—574, 607
- Mond, Sir Alfred Moritz (later 1st Baron Melchett), 蒙德, 阿尔弗雷德·莫里茨, 爵士(后为梅尔切特男爵一世), 139
- Montagu, Edwin Samuel, 蒙塔古, 埃德温·塞缪尔, 222
- Montagu, (Beatrice) Venetia, 蒙塔古, (贝阿特丽丝·)弗尼夏(婚前姓斯坦利), 222
- Montagu-Douglas-Scott, Sir David John, 蒙塔古—道格拉斯—斯科特, 大

- 卫·约翰, 爵士, 434, 503, 519, 546, 566, 567, 583
-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Secondat, baron de, 孟德斯鸠, 夏尔·路易·色贡达, 男爵, 690
- Monteverdi, Claudio, 蒙特威尔第, 克劳迪奥, 231
- Montherlant, Henri de, 蒙特兰, 亨利·德, 263
- Montreux Convention, 《蒙特勒公约》(1936), 621 n6
- Moore, George, 莫尔, 乔治: 《欢迎与告别》, 280
- Moore, George Edward, 莫尔, 乔治·爱德华, 157, 204, 534, 649—650, 652
- Moore, Vera, 莫尔, 维拉, 66
- Moral Sciences Club, Cambridge, 道德科学社, 剑桥, 152 n2
- \*Morgan, Aubrey Niel, 摩根, 奥博雷·尼尔: 战时与伯林一道在美国服务, 325, 354, 423—454, 428; 与安妮·莫洛·林德伯格的关系, 336 n5; 伯林在纽约患病, 411, 418; 在华盛顿州拥有了自己的农场, 452; 伯林到农场拜访, 466, 468; 访伦敦, 470; 借住伯林在华盛顿的房子, 496; 在墨西哥, 523, 528—529, 540; 两次婚姻(与莫洛姐妹), 528 n5; 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541—542; 与瑞兹戴尔, 543; 克鲁克香克赞许, 545; 成就, 713
- Morgan, Constance Cutter, 摩根, 康斯坦斯·卡特(婚前姓莫洛), 411, 418, 428 n5, 713
- Morgan, Elisabeth Reeve, 摩根, 伊丽莎白·里弗(婚前姓莫洛), 528 n5, 712
- Morgenthau, Henry, 摩根陶, 亨利, 411, 421, 446—447, 449, 523, 665, 672, 674, 681, 683
- Morrell, Lady Ottoline Violet Anne, 莫瑞尔, 奥托琳·薇奥莱特·安, 夫人, 111
- Morris, Charles Richard, 莫里斯, 查尔斯·理查德(后为男爵), 137, 185 n1, 208
-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639
- Morrow, Dwight Whitney, 莫洛, 德怀特·惠特尼, 336 n5, 523, 530, 535, 540 n1, 712—713
- Morrow, Elizabeth Reeve, 莫洛, 伊丽莎白·里弗(婚前姓卡特), 528, 539
- Mortimer, (Charles) Raymond (Bell), 莫蒂默, (查尔斯·)雷蒙德(·贝尔), 216, 243, 573
- Mortimer, Robert and Mary 'Mollie', 莫蒂默, 罗伯特与玛丽·“莫丽”(婚前姓沃克), 162
- Moscovitz, Gabriel, 莫斯科维茨, 加布里埃尔, 96 n11
- Moscow, 莫斯科: 伯林战时访问莫斯科的计划, 312, 318—319, 324, 326—327, 329, 331, 333—335, 338, 341, 343, 355—356, 452—453, 458, 473, 482, 530, 655; 剧院与歌剧, 391; 克拉克·克尔邀请伯林去莫斯科大使馆(图38), 550—552, 558—559, 563, 569—570, 573, 586; 伯林到访

- (1945), 587, 589—595, 625; 地图, 588; 状况, 589—590; 书籍, 595; 另见苏联
- Moscow Arts Theatre (‘Mkhat’), 莫斯科艺术剧院, 591
- Mosley, Sir Oswald, 莫斯雷, 奥斯瓦尔德, 爵士, 179, 388 n4
- Moss, Henry, 摩斯, 亨利, 577, 694 n
- Mowrer, Edgar Ansel, 莫瑞尔, 埃德加·安塞尔, 374, 678
- Moyné, Walter Edward Guinness, 莫因, 沃特·爱德华·吉尼斯, 男爵一世, 669, 687—688, 690, 691
-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 26, 85, 171
- Munich agreement (1938), 慕尼黑协议 (1938), 274, 282, 289—290
- Mure, Geoffrey Reginald Gilchrist, 穆尔, 杰弗里·雷吉纳尔德·吉尔克里斯特, 497
- Murphy, Frank, 墨菲, 弗兰克, 485
- Murphy, Neville Richard, 墨菲, 内维尔·理查德, 497
- Murphy, Robert Daniel, 墨菲, 罗伯特·丹尼尔, 422
- Murray, Basil Andrew, 穆雷, 巴希尔·安德鲁, 179
- Murray, (George) Gilbert Aimé, 穆雷, (乔治·) 吉尔伯特·艾梅, 154 n6, 169, 173, 177, 179, 188 n3
- Murray, Lady Mary (Henrietta), 穆雷, 玛丽(·亨利埃塔)夫人(婚前姓霍华德), 170, 179
- Murray, Wallace Smith, 穆雷, 华莱士·史密斯, 444, 448, 450, 677
- ‘Music Chronicle’ (IB, as ‘A[lbert] A[lfred] A[pricott]’), 《音乐纪事》(伯林, 笔名为阿[尔伯特]·阿[尔弗雷德]·阿[普利克特]), 191 n5
- Mussolini, Benito Amilcare Andrea, 墨索里尼, 贝尼托·阿米尔卡尔·安德里亚, 118, 156, 442 n4
- Mussorgsky, Modest Petrovich, 穆索尔斯基, 莫捷斯特·彼得洛维奇, 154
- Mynors, Roger Aubrey Baskerville, 迈纳斯, 罗杰·奥布里·巴斯克维尔, 220, 345, 568
- Myrdal, Gunnar, 米达尔, 贡纳尔, 540 n3
- mysticism, 神秘主义, 635—636
- mythology, 神学, 152, 154
- Nabokov, Nicolas, 纳博科夫, 尼古拉斯, 455, 490, 581
- Nabokov, Vladimir Dimitrievich, 纳博科夫, 弗拉基米尔·迪米特里耶维奇, 455 n1
- Nabokov, Valadimir Vladimirovich, 纳博科夫,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455 n1
- Nagasaki, 长崎, 583
- ‘Nahum Goldmann (1895—1982): A Personal Impression’, 《纳胡姆·戈德曼 (1895—1982): 个人印象》(伯林), 336 n7
- Naiman, Anatoly Genrikhovich, 奈曼,

- 阿纳托利·根里科维奇: 伯林致他的最后一封信, xvi—xvii
- Nairne, Barbara Mercer, 纳尼, 芭芭拉·莫瑟(婚前姓蔡丝; 后为兰斯道恩女侯爵), 488
- Namier, Lewis (Bernstein), 纳米尔, 刘易斯(·伯恩斯坦), 238, 248, 682—683
- Napoleon I (Bonaparte), 拿破仑一世(波拿巴), 法国皇帝, 212
- Nazi-Soviet Pact (1939), 纳粹—苏联协定(1939), 655
- Nazis, 纳粹: 公民投票(1931), 27; 迫害犹太人, 54 n1, 83—84, 158 n4; 狩猎法规, 168; 另见德国; 希特勒, 阿道夫
- Nechaev, Sergey Gennadievich, 尼卡耶夫, 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 201
- Neddermeyer, Heinz, 内得梅耶, 海因茨, 237
- Nelson, Donald Marr, 内尔森, 唐纳德·马尔, 421
- Neumann, Emanuel, 纽曼, 伊曼纽尔, 690
- New College, Oxford, 新学院, 牛津(图11, 30): 伯林在此得到哲学讲师职位, xviii, xl, 38—39, 41, 498; 伯林离开, 43, 61—62; 提出给予伯林研究员职位, 274; 伯林粉刷房间, 288—290; 伯林接受研究员职位, 288; 院长职位, 322, 498, 501, 504, 520; 伯林计划从美国返回, 503; 伯林推荐哈特担任法学导师, 552, 560; 伯林战后在此任教, 567
- New Republic*, 《新共和国》(期刊), 554
-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期刊), 432, 458
- New Verse*, 《新诗》(杂志), 118
- New West End Synagogue, London, 新西区的犹太教会堂, 伦敦, 9
- New York, 纽约: 伯林住地, 309, 311, 318, 320, 333, 372—373, 394, 655—656; 曼哈顿地图, 310, 311; 世博会, 332; 伯林对其看法, 348; 当地犹太法庭, 394—395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纽约先驱论坛报》, 328 n5, 481 n3, 499 n4, 580 n1, 615 n4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402, 678, 709, 715—716
- New Yorker* (magazine), 《纽约客》(杂志), 110, 251, 508—509, 654
- New Zionist Organization, 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332 n3, 346 n3
- Newhouse, Hans, 纽豪斯, 汉斯, 130
- News Chronicle*, 《新闻纪事》, 618
- Newsome, Mrs Noel, 纽萨姆, 诺埃尔·弗朗西斯, 太太, 见格兰特·达夫, 谢拉
- Newsome, Noel Francis, 纽萨姆, 诺埃尔·弗朗西斯, 469 n1, 709
- Newsome, Penelope, 纽萨姆, 佩内洛普, 453 n3
- Newton, Sir Isaac, 牛顿, 艾萨克, 爵士, 634
- Nicholas I, Tsar, 尼古拉一世, 沙皇, 603

- n3
- \*Nicholas, Herbert George, 尼古拉斯, 赫伯特·乔治: 伯林关于克雷格·麦吉奇的信件, 399 n1; 伯林在美国的主要通讯渠道, 413, 458; 拜访伯林父母, 414; 与伯林通信往来, 419, 660; 在纽约, 428; 返回英国, 430, 432; 敌视德宾, 433; 关于伯林给父母的信, 451 n2; 伯林在华盛顿的住房, 454 n1; 送伯林袖扣, 473; 将伯林的信转交其父母, 490; 伯林准备调外交部, 526, 545; 伯林治疗鼻窦炎, 527; 伯林推荐其为《画中不列颠》撰稿, 535; 玛丽·库克的调查, 548—549; 埃克塞特学院的研究员职位, 552—553; 达夫妮·斯特雷特论其性格, 713; (编辑)《华盛顿快讯, 1941—1945》, xxiv, xxv, xl; 伯林的导言, 654—662
- Nicolaievsky, Boris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迈恩成一赫尔冯: 《卡尔·马克思》, 199, 201
- Nicoll, (John Ramsay) Allardyce, 尼科尔, (约翰·兰姆赛·)阿拉戴斯, 341, 543
- \*Nicolson, (Lionel) Ben (edict), 尼克尔森, (莱昂内尔·)本(尼迪克特): 与达利, 150 n3, 153; 事业, 186; 给伯林的明信片与信件, 209, 279; 伯林在萨尔茨堡穿的斗篷, 257; 伯纳姆·卡特一家, 258, 260; 猜忌, 279; 在卡尔斯巴德与杰里米·哈钦森一起, 279—280; 与汉普希尔和哈钦森同住, 711
- Nicolson, Hon. Harold George, 尼科尔森, 哈罗德·乔治, 阁下, 194, 264, 306, 312, 346, 350, 567, 579, 654, 713
-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 莱因赫尔德, 318, 329, 459, 682
- Niebuhr, Ursula, 尼布尔, 厄休拉(婚前姓凯泼—康普顿), 380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242
- Night and Day*, 《夜与日》(杂志), 251
- Nijinsky, Vatslav Fomich, 尼金斯基, 瓦茨拉夫·福米奇, 531
- Niles, David K., 奈尔斯, 大卫·K., 445
- Noguès, General Auguste Paul Charles Albert, 诺格斯, 奥古斯特·保罗·查尔斯·艾伯特, 将军, 420
- Nolbandov, Sergei, 诺本多夫, 谢尔盖, 403 n1
- Norris, George William, 诺里斯, 乔治·威廉, 554
- North Africa, 北非: 联合登陆(1942), 419
- Northrop, Filmer Stuart Cucow, and others, 诺斯洛普, 费尔默·斯图尔特·库考等: 《致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哲学论文集》, 180 n3
- Norway, 挪威: 战争中, 387
- Notestein, Wallace, 诺特斯坦, 华莱士, 151
- Noufflard, Henriette, 努弗拉德, 恩里埃特, 133
- Nowell-Smith, Patrick Horace, 诺维尔—

- 史密斯, 帕特里克·贺拉斯, 252, 498, 617
- Null, Samuel, 奈尔, 塞缪尔, 394
- Odgers, Paul Randell, 欧哲斯, 保罗·兰德尔, 185
- Odling, Thomas George, 欧德林, 托马斯·乔治(图13), 59 n3
- Offenbach, Jacques, 奥芬巴赫, 雅克: 《霍夫曼的故事》, 531 n3
- Ogilvie, Sir Frederick, 奥吉尔维, 弗里德里克, 爵士, 694 n
- Oiserman, Anna, 奥瑟曼, 安娜, 349 n1
- Oiserman, Zemach, 奥瑟曼, 扎马克, 349
- Oklahoma, 《俄克拉荷马》(舞台音乐剧), 471
- Okulicki, Major-General Leopold, 乌库里基, 里奥珀德少将, 566
- Olden, Mr & Mrs Rudolf, 奥尔登, 鲁道夫, 夫妇, 188
- O'Mahoney, Eoin (‘Pope’), 欧马洪尼, 约恩(“波普”), 285
- Oman, Sir Charles (William Chadwick), 欧曼, 查尔斯(·威廉·查得维克), 爵士, 163
- O'Neill, Con Douglas Walter, 奥尼尔, 考恩·道格拉斯·沃尔特(图20), 167—168, 181, 191—192, 279, 423, 549, 568
- Opie, Redvers, 欧毕, 雷德沃斯, 351, 501, 546
- Oppé, Armide Lyonesse Tollemache, 欧佩, 阿米德·莱昂内斯·托勒马奇, 103, 162
- Oran, 奥兰: 法国舰队在此被彻底打败, 326
- Order of Merit (OM), 功绩勋章, 228 n1
- Orgel, Calman, 奥格尔, 卡尔曼, 96 n11
- Orgel, Fay, 奥格尔, 费伊(后来姓莫斯科维茨), 96
- Orlov, Sergey Sergeevich, 奥尔洛夫,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 605, 607
- Ormsby-Gore, William, 欧姆斯比-戈尔, 威廉, 见哈勒奇, 男爵四世
-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笔名), 721
- Oumansky, Constantine Aleksandrovich, 乌曼斯基, 康斯坦丁·阿列克桑德洛维奇, 313, 476
- Owens, (James) Hamilton, 欧文斯, (詹姆斯·)汉密尔顿, 528
- Owsley, Alvin Mansfield, 欧斯里, 埃文·曼斯菲尔德, 204
- Oxford, 牛津(图6, 8, 9, 11, 16, 30): 地图, 16; 伯林被录取, 17; 学生生活与活动, 17, 20—21; 战前的政治化倾向, 36; 牛津哲学, 117—118, 152, 234, 497—498; 校庆典礼, 126; 战时, 304; 伯林返回(1946年4月), 630; 另见各个学院
- Oxford Book of Greek Verse*, 《牛津希腊诗歌集》, 154
- Oxford Magazine*, 《牛津杂志》 140, 210, 236, 302
- Oxford Mail*, 《牛津邮报》, 236 n1



- Oxford Outlook*, 《牛津展望》(期刊)  
21—22, 140, 180, 191
- Oxford Poetry*, 《牛津诗选》177
- Paeppe, César de, 帕普, 西萨·德, 201
- Page, Denys Lionel, 佩吉, 丹尼斯·莱昂内尔, 319 n3
- Page, Katharine Elizabeth, 佩吉, 凯瑟琳·伊丽莎白, 319
- Paget, Celia and Mamaine, 帕吉特, 西里亚与玛曼尼, 244 n7
- Pakenham, Elizabeth, 帕肯汉姆, 伊丽莎白(婚前姓哈曼, 后成为朗福德伯爵夫人), 237, 155, 179, 321
- Pakenham, Francis (‘Frank’) Aungier Pakenham, 帕肯汉姆, 弗朗西斯(“弗兰克”)·安吉尔·帕肯汉姆(后成为朗福德伯爵七世), 67, 108 n4, 179, 211, 321
- Pakenham, Lady Julia, 帕肯汉姆, 茱莉亚, 夫人(图16), 100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伯林访问, 93—102, 105—106, 109—110; 伯林谈论其局势, 219—222, 176; 布卢姆伯格撰文谈及, 183; 皮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1937), 246—250, 676, 681; 《观察家》上的相关文章, 290; 魏茨曼的计划, 306; 作为将来的犹太家园, 376;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声明, 441, 443—444, 448, 689, 692; 战时的动荡, 446—447, 669, 674; 美国在巴勒斯坦的移民政策, 476—478; 伯林的微辞, 494—495; 谈论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 664, 670, 674, 680, 683—686;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 664, 680; 英国战后的巴勒斯坦政策, 670, 684—685; 提出分治计划, 677; 犹太人移民受限制, 690; 犹太人在巴恐怖主义, 690; 另见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
- Palestine Jewish Colonisation Association (PICA), 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地开拓协会, 101
- Palmer, Dr, 帕尔默医生(纽约医院), 418
- Papandreou, Georgios, 帕潘德里欧, 吉奥乔斯, 547 n8
- Pares, Sir Bernard, 佩尔斯, 贝尔纳, 爵士, 564—565, 577
- Pares, Janet, 佩尔斯, 詹妮特, 见鲍维克, 詹妮特
- Pares, Richard, 佩尔斯, 理查德: 入选全灵学院, 65; 戈伦韦·里斯评价他, 83; 与伯林在全灵学院, 129; 在萨尔茨堡(图19), 131, 257; 伯林邀请他吃午餐, 140, 260; 里德利评论他, 157; 结婚, 159—160, 198, 251; 法兰克福特一家访牛津, 180; 性格, 220; 喜欢诺特斯坦, 251; 给在美国的伯林写信, 389
- Paris, 巴黎: 伯林访德·本德恩(1946), 27, 615, 621; 玛丽·费希尔在巴黎, 112, 122, 209; 巴黎公社(1871), 201; 世博会(1937), 253; 伯林希望访问巴黎, 507; 向伯林提供职位, 515—516, 519

- Parker, Henry Michael Denne, 帕克, 亨利·迈克尔·丹尼, 250
- Parnas, Jacob, 帕纳斯, 雅各布, 599 n4
- Parnas, Mrs Jacob, 帕纳斯, 雅各布, 太太, 594
-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帕内尔, 查尔斯·斯图尔特, 222, 376
- Parodi, Dominique, 帕洛蒂, 多米尼克, 128 n1
- Parodi, Jacqueline, 帕洛蒂, 杰奎琳, 128
- Pasternak, Boris Leonidovich, 帕斯捷尔纳克, 鲍里斯·莱奥尼多维奇: x1, 573, 590, 610; 《日瓦戈医生》, 593 n1
- Pasvolsky, Leo, 帕斯沃尔斯基, 列奥, 464
- Patten, Susan Mary, 帕顿, 苏珊·玛丽 (婚前姓杰伊, 后来姓艾尔索普), 480
- Patten, William Samuel, 帕顿, 威廉·塞缪尔, 481, 627
- Patterson, Eleanor (‘Cissy’) Medill, 帕特森, 埃莉诺 (“西西”)·梅德丽, 487
- Patterson, Robert Porter, 帕特森, 罗伯特·波特, 447
- Paul, St, 圣保罗, 634
- Pauley, Edwin Wendell, 鲍雷, 埃德温·文德尔, 556—557
- Pauline*, 《保罗人》(校刊), 6
- Payne, Humfry Gilbert, 佩因, 汉弗莱·吉尔伯特, 206
- Peacock, Thomas Love, 皮考克, 托马斯·拉夫: 《噩梦修道院》, 628
- Pearl Harbor, 珍珠港, 277 n3, 386
- Pearn, Marie Agnes (‘Inez’), 珀恩, 玛丽·阿格尼斯 (“伊内兹”) (斯彭德的第一任妻子, 后姓玛吉), 217, 220—221, 237, 244, 270, 717
- Pearson, Andrew (‘Drew’) Russell, 皮尔逊, 安德鲁 (“德鲁”)·拉塞尔, 441, 448—450, 503, 558—559
- Peck, Anthony (Tony) Dilwyn, 佩克, 安东尼(托尼)·迪尔文, 208
- Peel, (William) Robert Wellesley, 1st Earl, 皮尔, (威廉·)罗伯特·威尔斯利, 伯爵一世: 巴勒斯坦问题报告 (1937), 246 n3, 676, 681
- Peers, Charles, 皮尔斯, 查尔斯, 136 n4
- Pelham, Lady Prudence, 佩尔哈姆, 普鲁丹斯, 夫人 (后姓布兰奇, 再改姓布勒, 图21), 151 n1, 244
- Pelican Record*, 《鹈鹕记》(院刊), 22—23
- Pember, Francis William, 潘柏, 弗朗西斯·威廉, 157, 224
- Pembroke College, Oxford, 彭布罗克学院, 牛津, 128
- Pendergast, Thomas Joseph, 彭德加斯特, 托马斯·约瑟夫, 557
- Pentland, Henry John Sinclair, 2 nd Baron, 彭特兰德, 亨利·约翰·辛克莱, 男爵二世, 91
- Peredelkino, 佩里德尔基诺 (作家聚居区), 590
- Pergolesi, Giovanni Battista, 佩尔戈莱西, 乔万尼·巴蒂斯塔, 293; 《管家女仆》, 107—108

- Peri, Hiram, 佩里, 希拉姆, 见普弗罗姆, 海因茨
- Perkins, Frances, 帕金斯, 弗朗西丝, 421
- Perlzweig, Maurice L., 珀尔兹韦格, 莫里斯·L., 333, 335, 350
- Pernod, Jules François (Pernod Père), 佩诺, 儒勒·弗朗索瓦(佩诺·皮埃尔), 287
- Pershing, General John Joseph, 潘兴, 约翰·约瑟夫, 将军, 326
- Persia, 波斯, 见伊朗
- Persitz, Akiva, 帕思茨, 阿齐瓦, 103
- Persitz, Shoshana, 帕思茨, 肖沙纳(婚前姓兹拉托普尔斯基), 103 n2
- Personal Impressions* (IB), 《个人印象》(伯林), xxv
- Pétain, Marshal Henri-Philippe, 贝当, 亨利—菲利普, 元帅, 307, 420
- Peterson, Sir Maurice Drummond, 皮特森, 莫里斯·德拉蒙德, 爵士, 94 n2, 624
- Petrograd see, 彼得格勒, 见列宁格勒
- Petrovich, Rastko, 佩特洛维奇, 拉斯特科, 461
- Pflaum, Heinz, 普弗罗姆, 海因茨(后来改名为希拉姆·佩里), 102
- Pfrimer, Walter, 普里墨, 沃尔特, 29 n3
- Phelps, William, 菲尔普斯, 威廉, 50
- Phelps-Brown, Dorothy Evelyn Mostyn, 费尔普斯—布朗, 多萝西·伊夫林·莫斯坦, 322
- Phelps-Brown, (Ernest) Henry, 费尔普斯—布朗, (欧内斯特·)亨利, 322 n4, 338
- Philby, 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菲尔比, 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金), 318 n2
- Philby, Harry St John Bridger, 菲尔比, 哈利·圣约翰·布里杰, 247
- Philipp Bros, 菲力普兄弟公司(金属材料经纪公司), 323
- Philipp, Clarisse, 菲利普, 克拉丽丝, 4, 253
- Philipp, Oscar, 菲利普, 奥斯卡, 4, 253 n6, 316
- Philipps, Wogan, 菲利普斯, 沃根, 192 n1, 712
- Philippson, Ann Marian, 菲利普森, 安·玛丽安(婚前姓莫卡塔), 343
- Philippson, Paul Louis, 菲利普森, 保罗·路易斯, 343
- Phillimore, Godfrey Walter, 2 nd Baron, 菲力摩尔, 戈德弗雷·沃尔特, 男爵二世, 245
- Phillips, William, 菲利普斯, 威廉, 436
- Philosophy*, 《哲学》(期刊), 164
-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PPE), 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课程, 234—235
- Pidduck, Frederick Bernard, 彼达克, 弗雷德里克·伯纳德, 50
- Pilkington, (Edward Cecil) Arnold ('Pilks'), 皮尔金顿, (爱德华·塞西尔·)阿诺德(“皮尔克斯”), 103 n4, 203 n2, 233

- Pilkington, 皮尔金顿太太(阿诺德·皮尔金顿的母亲), 103
- Pilley, Miss, 皮雷小姐(打字员), 271
- Pitt-Rivers, Captain George Henry Lane, 皮特—里夫斯, 乔治·亨利·兰雷恩, 上尉, 245 n4
- Pitt-Rivers, Rosalind Venetia, 皮特—里夫斯, 罗莎林德·维尼希亚, 245
- Plamenatz, John Petrov, 普拉门塔兹, 约翰·佩特罗夫, 158, 163
- Plaskett, Edith Alice, 普拉斯科特, 伊迪斯·艾丽丝, 319
- Plaskett, Harry Hemley, 普拉斯科特, 哈利·海姆利, 319 n4, 574
- Platnauer, Maurice, 普拉诺埃, 莫里斯, 575
- Plato, 柏拉图, 145, 534, 632, 636, 710
- Playfair, Edward Wilder, 普莱费尔, 爱德华·怀尔德, 568
- Plekhanov, Georgy Valentinovich,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吉·瓦伦丁诺维奇, 67, 218
- Plomer, William, 普罗默, 威廉, 136, 193—194, 262
- Pluralism, 多元化, xlii—xliii
- Poe, Edgar Allan, 坡, 埃德加·埃伦, 74
- Poland, 波兰: 战后协议, 566, 581 n1
- Polanowska-Sygułska, Beata Maria, 波拉诺夫斯卡—西古尔斯卡, 比塔·玛丽亚, 275 n1
- Polatschek, Viktor, 波拉茨切克, 维克多, 26
- Poliakoff, Arthur, 波里雅科夫, 亚瑟, 351
-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 政治行动委员会, 隶属产业工会联合会, 501
- Pollitt, Harry, 波利特, 哈利, 229 n1
- Polvogt, Dr Leroy Matthew, 珀尔沃特, 勒洛伊·马修博士, 529
- Polyakov, Vladimir Solomonovich (‘Augur’), 珀利亚科夫, 弗拉基米尔·索罗莫诺维奇(“奥加”), 495
- Pool, Tamar de Sola, 普尔, 塔玛·德·索拉, 360, 363, 382, 429—430
- Pope-Hennessy, (Richard) James Arthur, 蒲柏—汉尼西, (理查德·)詹姆斯·亚瑟, 575
- Popkov, Petr S., 波普可夫, 彼特·S., 606
- Porpora, Nicola Antonio, 波尔波拉, 尼古拉·安东尼奥, 293
- Portofino, 波多菲诺, 54—55
- Portugal, 葡萄牙, 352—353, 358—359; 西班牙系犹太人在此, 430 n7
-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波茨坦会议(1945), 582—583, 587
- Poulenc, Francis, 普伦克, 弗朗西斯, 150 n3
- Pound, Ezra, 庞德, 埃兹拉, 155, 610 n4
- Poussin, Nicolas, 普桑, 尼古拉斯, 216
- Powell, William, 鲍威尔, 威廉, 581n2
- Powicke, (Frederick) Maurice, 鲍维克, (弗雷德里克·)莫里斯, 159 n1
- Powicke, Janet Lindsay, 鲍维克, 詹妮特·林赛(后来姓佩尔斯), 159—160, 251, 257, 260 n5

- Powicke, Susan, 鲍维克, 苏珊 (婚前姓林赛), 159 n1, 160
- Preston, Cecil Herbert Sansome, 普利斯頓, 塞西尔·赫伯特·参孙, 65
- \*Price, Henry Habberley, 普莱斯, 亨利·哈勃雷: 与卡西尔一起, 62; 致信伯林, 谈指导莫伊拉·林德, 93; 接替乔奇姆, 117; 与伯林一起爬山, 150; 温切斯特学院派, 160; 对学生的影响, 208; 对飞行的兴趣, 208 n3; 应招入伍, 454; 在牛津的职位, 498; 伯林提议担任新学院法学导师, 552, 560; 汉普希尔的事业, 568; 美国背景, 574; 关于威斯登《思辨哲学的变形》的报道, 649, 651; 《逻辑实证主义与神学》, 164
- \*Prichard, Ed (ward) Fretwell (‘Prich’), 普里查德, 爱德(华)·弗莱威尔(“普里奇”): 伯林在美国与其认识, 381; 在华盛顿与伯林合租住房, 427, 454; 离开军队, 486; 无意中听到责备柴尔斯, 518 n1; 可能会得到牛津的任命, 571
- Prichard, Harold Arthur, 普里查德, 哈罗德·亚瑟, 534, 571, 573—574
- Priestley, John Boynton, 普里斯特利, 约翰·波因顿; 168, 194, 608, 611; 《好伙伴》, 212
- Prokosch, Frederic, 普罗科什, 弗里德里克, 579
- Proletkul't,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和教育组织”), 119
- Propertius, 普洛佩提乌斯, 155
- Proskauer, Joseph Meyer, 普洛斯卡尔, 约瑟夫·梅耶, 477
-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 297
- Proust, (Valentin-Louis-Georges-Eugène-) Marcel, 普鲁斯特, (瓦伦丁—路易—乔治—尤金—)马塞尔, 80—81, 191, 212, 239, 241—243, 255, 273, 285, 470, 609
- Pudovkin, Vsevolod Illarionovich, 普多夫金, 弗谢沃罗德·伊拉里昂诺维奇, 644
- Pumphrey, (John) Laurence, 潘弗雷, (约翰·)劳伦斯, 592
- Punin, Nikolay, 蒲宁, 尼古拉, 611 n4
- ‘Pursuit of the Ideal, The’, “追求理想”(伯林的演讲), xxi
- Pushkin, Aleksandr Sergeevich,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73, 578 n3, 609; 《吉普赛人》, 114
- Puvis de Chavannes, Pierre, 普维斯·德·夏凡纳, 皮埃尔, 139
- Quennell, Peter, 奎奈尔, 彼得, 193
- Quiller-Couch, Arthur (‘Q’), 奎勒—考奇, 亚瑟: (编辑)《牛津英国诗歌选集》, 142 n2
-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奎因, 威拉德·范·奥尔曼, 572
- Rachmilevich, Solomon (‘Rach’), 拉什米利耶维奇, 所罗门(“拉什”), 141, 352, 404, 431, 455, 496, 590,

704

Radcliffe, Cyril John, 雷德克里夫, 西瑞尔·约翰, 子爵一世, 52, 511

Radcliffe-Brown, Arthur Reginald, 雷德克里夫—布朗, 阿瑟·雷吉纳尔德, 186

Radek, Karl Bergardovich, 拉德克, 卡尔·伯恩加多维奇(原姓索伯尔松), 566

Radiator, 《辐射》(校刊), 6

Raine, Kathleen, 雷恩, 凯瑟琳, 217 n3

Rakhlin, Gennady Moiseevich, 拉克林, 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 604, 605—607

Rankine, Paul Scott, 兰基内, 保罗·斯各特, 425, 661

Raskin family, 罗斯金一家, 334, 336, 349, 351, 395, 505

Raskin, Rosa, 拉斯金, 罗莎, , 551

Rau, Arthur Aron, 劳, 阿瑟·阿隆(弗雷德的长兄), 331

Rau, Frederick (‘Fred’) Solomon, 劳, 弗雷德里克(“弗雷德”)·所罗门: 在纽约与柏林同住一套酒店公寓, 322, 325, 332—333, 349, 351—352, 370, 381; 去蒙特利尔, 346, 348; 佳肴, 365; 向伯林父母汇报伯林病情, 387; 赴南非, 394; 向伯林父母问好, 407; 伯林在纽约患肺炎, 410; 战时访英, 415, 418

Rau, Hannah, 劳, 汉娜(弗雷德的妻子), 331

Rau, Käthe, 劳, 凯塞(弗雷德的母亲),

331, 467

Rauh, Joseph Louis, 劳尔, 约瑟夫·路易斯, 381

Ravachol, 拉瓦科尔, 见肯宁斯坦, 弗朗索瓦·克劳迪亚斯

Rea, (Margaret) Hermione, 里, (玛格丽特·)赫曼妮(后姓麦克科尔), 425

Read, Herbert, 里德, 赫伯特: 《为雪莱辩护》, 158, 166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678

Reading, Eva Violet, Marchioness of, 瑞丁, 艾娃·薇奥莱特(婚前姓蒙德), 侯爵夫人, 477

Reading, Rufus Daniel Isaacs, 1st Marquess of, 瑞丁, 卢夫斯·丹尼尔·伊萨克斯, 侯爵一世, 335

Reading, Rufus Isaacs, 2nd Marquess of (and Viscount Erleigh), 瑞丁, 卢夫斯·伊萨克斯, 侯爵二世(及厄莱子爵), 238, 477

Reavey, George, 瑞韦, 乔治, 605

(Redcliffe-) Maud, (Margaret) Jean Hay, (瑞德克里夫—)莫德, (玛格丽特·)琼·海(婚前姓汉密尔顿), 159, 237, 248, 322

(Redcliffe-) Maud, John Primatt Redcliffe, (瑞德克里夫—)莫德, 约翰·普利马特·瑞德克里夫, 159, 322, 502

Reed, John Leigh, 里德, 约翰·莱, 481—482

Rees, Jenny, 里斯, 詹尼, 714

\* Rees, (Morgan) Goronwy, 里斯, (摩

根·)戈伦韦:伯林为其作品受到的批评辩护,37;伯林受聘到全灵学院任研究员一职,42;从事新闻业,44;斯彭德的旅行,45;与谢拉·格兰特·达夫的关系,48—49,57—60,75;在萨尔茨堡,57—58;在全灵学院,62,103,203—204,215,263;伯林邀请去看歌剧,82—83,86;和考克斯一起,88;行为举止,89,116,171;为《泰晤士报》工作,110;与斯帕洛争论,116,162;希望认识詹妮弗·威廉斯,151;风流韵事,171;谈论安德烈·布雷东,174;为《牛津展望》写文章,180;伯林指控其抄袭,181;伯林对他的态度,182,233;与伊丽莎白·鲍恩的关系,182,192,196,215,240;为鲍拉辩护,190;与罗莎蒙德·莱曼的情事,192,198;关于奥尼尔,192;对伯林的看法,209;因伊丽莎白·鲍恩的来信与伯林不和,222;斯彭德准备到全灵学院拜访,224;反对鲍拉从美国返回,225;对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的影响,227;艾耶尔与伊内兹·斯彭德的情事,244;出现在伊丽莎白·鲍恩的《心之死》中,288 n5;加入伦敦皇家地区炮兵部队,296&n1;与玛格丽特·莫里斯结婚,357;伯林在德国柏林与之相遇(1945),589;玛丽·伯林对其反感,704;将伯林介绍给谢拉·格兰特·达夫,709;政治倾向,714;伯林对其看法,714;《分隔他们的桥梁》,233;《变故篇》,171 n2;《夏日的洪水》,37 n

Rees, Margaret (‘Margie’) Ewing, 里斯, 玛格丽特(“玛吉”)·艾温(婚前姓莫里斯;戈伦韦夫人), 357, 388, 713

Reilly, (D’Arcy) Patrick, 赖利,(达西·)帕特里克, 65, 568

Reinhardt, Helene, 莱因哈特, 海伦(婚前姓蒂米希), 430

Reinhardt, Max, 莱因哈特, 马克斯(原名马克西米利安·哥德曼), 284, 429, 430

Reith, Sir John, 雷斯, 约翰, 爵士, 423 n8

Rendel, Alexander Meadows (‘Sandy’), 兰德尔, 亚历山大·迈德斯(“桑迪”), 27, 29

Rendel, Jane, 兰德尔, 简, 232

Rennell, James Rennell Rodd, 雷内尔, 詹姆斯·雷内尔·洛德, 男爵一世, 247

Rennie, John (‘Jack’) Ogilvy, 伦尼, 约翰(“杰克”)·奥吉尔维, 425

Repin, II’ya Efimovich, 列宾,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 594—595

Restif de la Bretonne, Nicolas-Edme, 瑞斯蒂夫·德·拉·布勒托尼, 尼古拉斯—埃德姆, 166

Reynolds, Reginald, 雷诺兹, 雷吉纳尔德, 277 n2

Reynolds, Robert Rice, 雷诺兹, 罗伯特·赖斯, 471

*Rheinische Zeitung*, 《新莱茵报》, 200

Rhineland, 莱茵兰, 希特勒占领, 158

Ribbentrop, Joachim von, 里宾特洛普,

- 约阿希姆·冯, 317
- Rickett, Denis Hubert Fletcher, 瑞克特, 丹尼斯·赫伯特·弗莱彻, 568
- Ricketts, Ralph Robert, 瑞基茨, 拉尔夫·罗伯特, 205—206
- Ridley, Sir Adam Nicholas, 里德利, 亚当·尼古拉斯, 爵士, 185 n1, 533
- Ridley, Cressida, 里德利, 克里西达, 见伯纳姆·卡特, 克里西达
- Ridley, Jasper, senior, 里德利, 老杰斯帕, 403 n2, 714
- \*Ridley, Jasper Maurice Alexander, 里德利, 杰斯帕·莫里斯·亚历山大(“泡泡”, 图28): 出席格特鲁德·施泰因的讲座, 149 n4; 描绘伯林的房间, 156; 未被确认的伯林文章, 164 n4; 学位分数, 185; 罗莎蒙德·莱曼, 203; 受邀与斯彭德见面, 205; 关于语言, 208; 借伯林的斗篷, 256—257; 结婚, 256 n1, 714; 在萨尔茨堡, 256—257; 去音乐会, 295; 生活方式, 300; 伯林在华盛顿的生活, 330; 伯林从美国回来休假住在父母家里, 403; 阵亡, 507; 伯林的悼文, 530—532; 伯林把《刺猬与狐狸》题献给他, 531 n1
- Ridley, Nathalie, 里德利, 娜塔丽(婚前姓本肯多夫), 366 n5, 403 n2, 404, 533, 714
- Ridsdale, William, 瑞兹戴尔, 威廉, 543
- Riga, 里加, xxxix, 8, 191 n1, 254, 334, 351, 536; 画作(图8), 147 n5
-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 莱纳·马利亚, 123
- Rimbaud, (Jean-Nicolas-) Arthur, 兰波, (让-尼古拉斯-)阿图尔, 156, 174 n6
- Rink, George Arnold, 林克, 乔治·阿诺德, 140
- Robert, Admiral Georges, 罗伯特, 乔治, 海军上将, 420
- Roberthall, Baron, 罗伯特霍尔, 男爵, 见霍尔, 罗伯特
- Roberts, Celeste (‘Cella’) Leila Beatrix, 罗伯茨, 塞莱斯特(“赛拉”)·莱拉·比阿特丽丝(婚前姓帕莎), 619, 625
- Roberts, Frank, 罗伯茨, 弗兰克, 550 n2, 594, 601, 630
- Robertson, Sir Charles Grant, 罗伯逊, 查尔斯·格兰特, 爵士, 65
- Robertson, Giles Henry, 罗伯逊, 盖尔斯·亨利, 147, 157, 184—185, 254, 259—260; 画作(图17), 147 n5
- Robinson, Frederick James,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 186
- Robinson, (Esmé Stuart) Lennox, 罗宾逊, (艾斯梅·斯图尔特·)列诺克斯, 283
- Rockefeller, Nelson Aldrich, 洛克菲勒, 内尔森·阿尔德里奇, 554
-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洛克菲勒中心, 纽约(图31, 32), 361
- Rodbertus, Karl Johann, 罗德伯图斯, 卡尔·约翰, 68
- Rodell, Fred, 洛德尔, 弗雷德(原姓洛德海姆):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 保守派》，382 n1
- Rodin, Auguste, 罗丹, 奥古斯特, 635
- Rogers, Ben, 罗杰斯, 本: 《艾耶尔传》, 244 n1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171, 227, 635
- Rome, 罗马, 230
- Romilly, Esmond, 隆米里, 艾斯蒙德, 132 n2
- Romilly, Giles Samuel Bertram, 隆米里, 盖尔斯·萨缪尔·伯特兰姆, 132, 206
- Roosevelt, (Anna) Eleanor, 罗斯福, (安娜·) 埃莉诺, 456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 当选总统, 277, 555, 558; 叶芝不喜欢他, 277; 任命法兰克福特在最高法院的职位, 326 n2; 1940年总统大选, 333, 348; 伯林敬仰并赞扬他; 337, 370, 386—387; 丘吉尔恳求供应物资, 369 n1; 向作家与记者征求意见, 374; 犹太人支持他, 376; 不愿参战, 386; 与丘吉尔的关系与会面, 391, 456, 467 n1; 与法国在北非, 421; 不再喜欢贝奈斯, 422; 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444—445, 447—450, 668, 671—672, 673, 676, 677—678, 683, 686, 688; 伯林对其看法, 456; 再度当选(1940), 361 n5, 367; (1944), 499—501; 战后安置计划, 521; 出席雅尔塔会议; 542 n6, 688; 可能身故或是退休, 544; 逝世, 553, 688; 任命鲁布利, 579 n6; 会见伊本·绍德, 688;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支持, 709
-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484 n1
- Roper, Elmo, 罗珀, 埃尔默, 501 n1
- Rose, Herbert Jennings, 罗斯, 赫伯特·詹宁思, 154—155
- Rosebery,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罗斯伯里, 阿奇博尔德·菲力普·普里姆罗斯, 伯爵五世, 69—70
- Rosenman, Samuel Irving, 罗森曼, 萨缪尔·欧文, 424, 444—447, 449, 528, 672
- Ross, Charles Griffith, 罗斯, 查尔斯·格里菲斯, 557, 568, 571, 577
- Ross, Leonard Q., 罗斯, 莱昂纳德·Q. (利奥·卡尔文·罗斯顿的笔名), 292 n3
- Roth, Cecil, 罗斯, 塞西尔, 395
- Roth, Leon, 罗斯, 莱昂, 96, 105
- Rotha, Paul, 罗萨, 保罗, 644
-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柴尔德家族, 367
- \*Rothschild, Baronne Alix Hermine Jeannette, 罗斯柴尔德, 阿力克斯·荷明·珍妮特, 男爵夫人(婚前名为斯奇·德·科隆娜), 411 n4, 430, 496
- \*Rothschild, Barbara, Lady, 罗斯柴尔德, 芭芭拉, 夫人(婚前姓哈钦森), 215, 217, 711
- \*Rothschild, (Nathaniel) Charles, \*罗斯柴尔德, (纳撒尼尔·) 查尔斯, 244 n4
- \*Rothschild, Baron Edmond James de, 罗斯柴尔德, 埃德蒙·詹姆斯·德, 男

爵, 101

\*Rothschild, Eugène Daniel de, 罗斯柴尔德, 尤金·丹尼尔·德, 345

\*Rothschild, Guy Edouard Alphonse Paul de; 罗斯柴尔德, 盖伊·爱德华·阿尔方斯·保罗·德: 探望在纽约生病住院的伯林, 411, 413; 谈论在华盛顿的伯林, 426; 赴英国途中, 乘坐的船遇水雷, 430; 访华盛顿, 505

\*Rothschild, James (‘Jimmy’) Armand Edmond de, 罗斯柴尔德, 詹姆斯(“吉米”)·阿芒·埃德蒙·德, 245, 477

\*Rothschild, Mayer Amschel, 罗斯柴尔德, 梅耶·阿姆谢尔, 714

\*Rothschild, Miriam Louisa, 罗斯柴尔德, 米利亚姆·路易莎(后姓雷恩): 在阿什顿·沃尔德的家中, 244 n4, 246; 警告伯林提防伯吉斯, 313 n4, 318—319; 伯林在美国的工作, 346; 给在美国的伯林发电报, 382, 470; 伯林在美国请求其来信, 408

\*Rothschild, Rozsika, 罗斯柴尔德, 洛丝卡(婚前姓德·沃塞姆斯坦), 244 n4

\*Rothschild, (Nathaniel Mayer) Victor, 罗斯柴尔德, (纳撒尼尔·梅耶·)维克多, 男爵三世: 和伯林一起住, 215, 217, 222; 爱上普鲁丹斯·佩尔哈姆夫人, 244 n7; 家系, 244 n4; 继承男爵身份, 254; 在秘密情报部门工作, 313 n4; 在纽约, 419; 伯林从盖伊那里听到他的消息, 505

\*Rothschild, (Lionel) Walter, 罗斯柴尔德, (莱昂内尔·)瓦尔特, 男爵二世,

254 n4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31, 67, 137, 152, 385, 632—633

Routh, Dennis Alan, 鲁斯, 丹尼斯·阿兰, 213, 252, 263

Rowse, Alfred Leslie, 罗斯, 阿尔弗雷德·莱斯利: 政治观点, 31, 在全灵学院, 62—63, 263, 284; 饶舌, 63; 《泰晤士报》刊登其来信, 83; 沾沾自喜, 125; 引用兰波的诗句, 156; 与威廉·巴肯, 178; 认为奥尼尔“难相处”, 192; 身体欠佳, 198; 与伯林的关系, 198; 喜欢诺特斯坦, 251; 与德·比尔一起, 289; 《复仇的理查德·克伦威尔爵士》, 237

Rublec, George, 鲁布利, 乔治, 579

\*Rumbold, Sir (Horace) Anthony, 兰博德, (霍勒斯·)安东尼, 爵士, 339, 377, 381, 411, 417—418, 422, 427, 488, 617

Rumbold, Felicity Ann, Lady, 兰博德, 菲丽西蒂·安, 夫人(婚前姓贝利), 377 n2, 488, 518, 522, 715

Runciman, Walter, 1st Viscount, 伦希曼, 沃尔特, 子爵一世, 285, 330

Rupp, Frank, 卢普, 弗兰克, 148 n3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3rd Earl, 罗素, 伯特兰·亚瑟·威廉, 伯爵三世: 奥托琳·莫瑞尔的情人, 111 n3; 行为主义, 118; 在剑桥, 157; 为鲍拉所恨, 250; 在牛津做讲座, 266; 为伯林轻视, 534; 关于他的智慧, 649

Russell, Betty Parr, 罗素, 贝蒂·帕尔(

- 后姓怀特布瑞德), 77, 223
- Russell, John Conrad, 罗素, 约翰·康拉德(后为伯爵四世), 560, 575
- Russell, John Wriothsley, 拉塞尔, 约翰·莱欧瑟斯利, 283, 315 n4, 434, 452, 461—462, 467, 494, 527, 562 n2
- Ruthenia, 鲁塞尼亚, 57—59, 63
- Rylands, George (‘Dadie’), 莱兰兹, 乔治(“达迪”), 142, 216
- Ryle, Gilbert, 赖尔, 吉伯特: 与卡西尔一起, 62; 伯林无意中冒犯, 112; 与伯林吃饭, 116; 谈论盖尔斯·罗伯逊, 184; 出席布莱克威的葬礼, 211; 牛津的职位, 498; 论哲学上的“品位”, 510; 汉普希尔的职业, 568
- Sacchini, Antonio Maria Gasparo, 萨奇尼, 安东尼奥·玛利亚·加斯帕洛, 293
- Sacco, Nicola, 萨科, 尼古拉, 709
- Sacher, Gabriel David, 萨彻, 加布里尔·戴维, 264
- Sacher, Michael Moses, 萨彻, 迈克尔·摩西, 264 n3
- Sachs, Alexander, 萨克斯, 亚历山大, 430
- Sackville, Lionel Sackville Sackville-West, 2nd Baron, 萨克威尔, 莱昂内尔·萨克威尔·萨克威尔—韦斯特, 男爵二世, 488
- Sackville-West, Edward (Eddie) Charles, 萨克威尔—韦斯特, 爱德华(“艾迪”)·查尔斯(后为萨克维尔男爵五世), 163
- Sackville-West, Vita, 萨克威尔—韦斯特, 维塔(哈罗德·尼科尔森太太), 194, 488 n1, 713
- Sadeh, Yitzhak, 萨德, 伊扎克(原名伊沙克·兰德博格), 629 n2
- St Paul’s School, London, 伦敦圣保罗学校, xxxix, 5, 11
- \*Salter, Sir (James) Arthur, 索尔特, (詹姆斯·)阿瑟, 爵士: 伯林瞧不起他, 125; 法兰克福特拜访牛津, 180; 举止, 199;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答复伯林的哲学问题, 207; 贝克的离婚案, 233; 伯林提议去哥廷根, 249; 预言衰落期, 264; 在美国, 371—372, 377, 436;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 474; 在牛津, 490; 结婚, 574 n6; 再次当选代表牛津大学的下院议员, 574; 性格, 715
- Salter, Ethel Mather, Lady, 索尔特, 伊瑟·玛瑟, 夫人(婚前姓巴格; 后来姓布拉德), 574, 715
- Salzburg, 萨尔茨堡: 伯林访问, 26, 35, 55—58, 66 n3, 91—92, 100, 104, 118, 127, 131—133, 137, 139 n6, 160, 163, 169, 173, 238, 245, 246, 256—258, 284
- Samuel, Godfrey Herbert, 塞缪尔, 戈德弗雷·赫伯特, 245
- Samuel, Herbert (Louis), 1st Viscount Samuel of Mount Carmel, 塞缪尔, 赫伯特(·路易斯), 卡麦尔山的塞缪尔子爵一世, 245, 249, 477, 675
- Samunov, Ida, 萨姆诺夫, 伊达(婚前姓

- 沃什诺克; 伯林姨妈; 图3): 与家人一道来访里加, 8, 101; 与伯林一起在耶路撒冷逗留, 94, 96, 101; 给在美国的伯林写信, 428; 美国亲戚, 455; 向在美国的伯林问好, 505; 在耶路撒冷, 551
- Samunov, Rivkah, 萨姆诺夫, 里维卡(后姓哈列维), 10—11
- Samunov, Yitzhak, 萨姆诺夫, 伊扎克(伊达丈夫; 图3), 8—9, 94, 96—97, 102, 428, 432 n1, 551
-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248, 530, 541—544, 546, 550, 553, 580—581
- Sansom, Sir George Bailey, 桑萨姆, 乔治·贝利爵士, 435
- Santayana, George, 桑塔亚纳, 乔治, 632
- Sardou, Victorien, 萨尔杜, 维克托里安, 449
- Sargent, Sir Orme (‘Moley’), 萨金特, 欧尔姆(“莫利”)爵士, 553, 579
- Sassoon family, 萨松家族, 367
- Saul, Isaac, 索尔, 伊萨克, 143
- 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200
- Savitsch, Eugene Constantine de, 萨维奇, 尤金·康斯坦丁·德, 487
- Scaliger, Julius Caesar, 斯卡利杰, 裘力斯·凯撒, 167
- Schacht, Hjalmar Horace Greeley, 沙赫特, 耶马尔·贺拉斯·格里利, 464; 《赔偿的终结: 战争带来的经济后果》, 639
- Schalit, Bella, 沙立特, 贝拉, 24—25, 102 n9
- Schalit, Lionel (‘Lusia’) Leopold, 沙立特, 莱昂内尔(“路希亚”)·利奥波德, 102 n9, 103, 352 n1
- Schalit, Lipman, 沙立特, 里普曼, 24 n3, 103 n1
- Schalit, Mark/Morduch, 沙立特, 马克/默多克, 102 n9
- Schalit, Samuel (‘Mulya’), 沙立特, 塞缪尔(“穆利亚”), 102
- Schapiro, Ernest, 夏皮罗, 厄尼斯特, 378
- Schapiro, Jacob, 夏皮罗, 雅各布, 129
- Schapiro, Lillian Milgram, 夏皮罗, 莉莲·米尔格兰姆, 378, 715
- \*Schapiro, Meyer, 夏皮罗, 梅耶, 342, 378
- Schapiro, Miriam, 夏皮罗, 米利亚姆, 378
- Schauffler, Elsie T., 夏弗勒, 埃尔希·T., 222 n2
-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席勒, (约翰·克里斯托弗·) 弗里德里希·冯, 124
- Schlick, Moritz, 施立克, 莫里茨, 178
- Schnabel, Artur, 施纳贝尔, 阿特, 535
- Schneerson, Nyuta, 施内尔森, 纽塔, 95
- Schneerson, Rabbi Yosef Yitzchak, 施内尔森, 优素福·伊恰克·拉比, 364, 429
- Schocken, Salman, 肖肯, 沙尔曼, 370

- Scholem, Gershom Gerhard, 肖勒姆, 杰肖姆·杰哈德, 96, 704
- Schricker, Henry Frederick, 施里克, 亨利·弗里德里克, 501
- Schroeder, Hellmut, 施罗德, 赫尔慕特, 43
- Schubert, Franz, 舒伯特, 弗朗兹, 154
- Schuller, Erwin, 舒勒·欧文, 399 n1
- Schüller, Richard, 舒勒, 理查德, 314, 317, 399 n1, 524
- Schuller-McGeachy, Craig, 舒勒—麦吉奇, 克雷格, 见麦吉奇, 克雷格
- Schuster, George, 舒斯特, 乔治, 377 n3
- Schwellenbach, Lewis B., 施韦伦巴赫, 刘易斯·B., 554
- Scott, Charles Prestwich, 斯科特, 查尔斯·普雷斯特维奇(《曼彻斯特卫报》), 28, 33—34, 36
- Scott-James, Anne, 斯科特—詹姆斯, 安, 163
- Scriven, 斯科力文(贸易数据统计员), 358
- Sebba, Sam, 赛巴, 萨姆, 142
- Secker, Martin, 塞克, 马丁, 194, 721
- Sedgwick, Alexander Cameron, 赛德维克, 亚历山大·卡梅隆, 547—548
- Sée, Anne, 赛, 安妮, 139, 140, 162
- Séc, Peter Henri, 赛, 彼得·亨利, 140
- Seeds, Sir William, 西兹, 威廉爵士, 321
- Segal, Louis, 西格尔, 路易斯, 351
- Seixas, Victor, 塞卡斯, 维克托, 430 n7
- Senhouse, Roger Henry Pocklington, 森豪斯, 罗杰·亨利·普克林顿, 192, 204, 229, 238, 721
- Serov, Valentin Aleksandrovich, 谢洛夫, 瓦连京·亚历克桑德洛维奇, 495 n6, 594—595
- Seton-Watson, (George) Hugh Nicholas, 赛顿—华生, (乔治·)休·尼克拉斯, 329, 331
- Seton-Watson, Robert William, 赛顿—华生, 罗伯特·威廉, 301
-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632
- Shannon, Sheila Dunbar, 香农, 希拉·邓巴(后来改姓迪金森), 92
- Sharett (Shertok), Moshe, 夏里特(·舍托克), 摩西, 667, 672, 677—678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乔治, 125, 267; 《科诺·迪·巴赛托听到的1888—1889年的伦敦音乐》, 267 n3; 《芭芭拉上校》, 169 n4
- Shawe-Taylor, Desmond Christopher, 肖—泰勒, 戴斯蒙德·克里斯多夫, 205
-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珀西·比西, 158, 230
- Sheremetev family, 舍列梅捷夫家族, 611
- Ships with Wings*, 《乘风破浪》(电影), 403
- Shirer, William Lawrence, 夏伊勒, 威廉·劳伦斯, 622
- Shneerson, Mrs L., 施内尔森, L., 太太, 100
- Shove, Fredegonde, 肖夫, 弗蕾德贡德

- (婚前姓梅特兰), 371
- Shove, Gerald Frank, 肖夫, 杰拉德·弗兰克, 371
- Sicily, 西西里, 46
- Sieff, Israel Moses, 西弗, 伊斯雷尔·摩西, 368, 516 n2
- Sieff, Rebecca, 西弗, 丽贝卡(婚前姓马科斯), 351 n1, 416, 429
- Sikorski, Wladyslaw, 希科尔斯基, 乌拉迪斯拉夫, 411
- Silver, Rabbi Abba Hillel, 西尔弗, 阿巴·西莱尔拉比, 442, 671, 676—679, 687, 690
- Simmel, Georg, 齐美尔, 格奥尔格, 642
- Simmons, Ernest Joseph, 西蒙斯, 厄内斯特·约瑟夫, 565, 577
- Simon, Sir John Allsebrook, 1st Viscount, 西蒙, 约翰·奥斯布鲁克, 子爵一世, 261, 492
- Simon, Sir Leon, 西蒙, 莱昂, 爵士, 475
- Simon, Theo, 赛蒙, 提欧, 707
- Simonov, Konstantin Mikhailovich, 西蒙诺夫,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610
- Simpson, Ernest Aldrich, 辛普森, 欧内斯特·奥尔德里奇, 219 n1
- Simpson, Wallis, 辛普森, 沃利斯, 见温莎女公爵
- Sinclair, Archibald, 辛克莱, 阿奇博尔德, 670
- Singer, Simeon, 辛格, 塞蒙, 392 n2
- Sitwell family, 希特维尔一家, 195
- Skaife, Brigadier Eric Ommaney, 斯凯夫, 布里格迪埃·埃里克·欧曼尼, 566
- Skidelsky, Mrs, 斯基德尔斯太太, 575
- Skidelsky, Robert, Baron, 斯基德尔斯基, 罗伯特, 男爵, 287 n5
- Smirdin, Aleksandr Filippovich, 斯米尔金, 亚历山大·菲利波维奇, 604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160 n1
- \*Smith, Alic Halford, 史密斯, 阿利克·哈尔福德: 教美国学生, 79, 114—115; 担任新学院代院长, 298—299; 新学院院长职位, 322, 498; 政治从属关系, 338; 伯林从美国回来后拜访, 346, 353; 伯林在美国的缺席, 364, 475, 490, 526; 关于伯林战后打算的问题, 438; 当选新学院院长, 501, 504, 520, 538; 访美, 523, 527; 伯林的莫斯科之行, 552; 以及汉普希尔的工作, 568, 576; 伯林告知莫斯科的邀请, 569; 性格, 716
- Smith, John Alexander, 史密斯, 约翰·亚历山大, 117
- Smith, Maurice Judson, 史密斯, 莫里斯·贾德森, 185
- Smith, Nowen (Charles), 史密斯, 诺文(·查尔斯), 617
- Smith, Sir George Adam, 史密斯, 乔治·亚当, 爵士, 160 n1
- Smith, Sydney, 史密斯, 西德尼, 161 n1
- Smith, Sydney Goodsir, 史密斯, 西德尼·古德瑟, 160 n1
- Smoira, Moshe, 斯莫瓦拉, 摩西, 102
- Smuts, Jan Christiaan, 斯缪茨, 扬·克里斯蒂安, 579, 676

- Snowman family, 斯诺曼家族, 9
- Snowman, Dr Jacob, 斯诺曼, 雅各布, 博士, 529
- Snowman, Leonard Victor, 斯诺曼, 列奥纳多·维克多, 529 n4
- Snyder, John Wesley, 施奈德, 约翰·韦斯利, 556—557
- Soames, Christopher, 索亚米斯, 克里斯托弗(后为男爵), 478 n5
- Sobolewitz (Sobol), Boris, 索伯尔维茨(索伯尔), 鲍里斯, 347, 351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54, 167
- Socrates, 苏格拉底, 632
- Sokolov Grant, Micheal, 索科洛夫·格兰特, 迈克尔, 709
- Solomon, Flora, 所罗门, 弗劳拉(婚前姓班纳森), 360, 411
- Solomon, Harold, 所罗门, 哈罗德, 360 n5
- Somervell, General Brehon Burke, 萨默维尔, 布雷恩·伯克, 上将, 421
- Sorbier, Françoise, 索比尔, 弗朗索瓦:  
“以赛亚·伯林先生, 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访谈), 62 n1
- Sousa Pernes, P. P. Bon de, 苏萨·珀恩斯, P.P.邦·德, 575
- Soviet Union, 苏联: 国歌, 473, 561; 与美国的潜在竞争关系, 486, 542, 563; 欧洲战后计划, 521, 542 n6; 联合国宪章, 581; 对英国工党大选获胜的评论, 594; 对丘吉尔的看法, 594—595; 在伊朗, 621 n6; 战后不妥协态度, 622—624; 伯林将其比作英国公学, 625—626; 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 626—627; 另见列宁格勒, 莫斯科
-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西班牙内战(1936—1939), 188—189
- \*Sparrow, John Hanbury Angus, 斯帕洛, 约翰·汉柏里·安格斯: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共进晚餐, 68—71; 与里斯争吵, 116, 162; 语言, 139; 谈论纳奥米·米奇森, 155; 谈论马丁·库珀, 205; 收入, 221; 鲍拉从美国返回, 225; 写研究曼斯菲尔勋爵的文章, 230; 喜欢诺特斯坦, 251; 即将到来的战争, 287; 赴美军事外交使团, 377, 380, 389; 知识分子品质, 511; 朋友, 710; 关于A.H.史密斯, 716; 伯林的评价, 716; 《理智与诗歌》, 127 n5, 158, 166
-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 335 n2
- Spectator*, 《观察家》(期刊): 伯林为其撰写音乐书籍评论, 140; 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 290
- Spencer, (Charles) Bernard, 斯宾塞, (查尔斯·)伯纳德, 126, 177, 195—196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634
- Spencer, Theodore, 斯宾塞, 西奥多, 482
- Spencer-Churchill, John Strange, 斯宾塞—丘吉尔, 约翰·斯特兰奇, 405 n2
- Spender, (John) Alfred, 斯彭德, (约翰·)阿尔弗雷德, 225, 374
- Spender, (John) Humphrey, 斯彭德, (约翰·)汉弗莱, 48

- \*Spender, Stephen Harold, 斯彭德, 斯蒂芬·哈罗德(图18): 与伯林的友谊, 38; 和谢拉·格兰特·达夫, 40; 在马拉加, 42, 45; 浪漫关系, 43, 76 n2; 伯林出于无意的“盗窃癖”, 74; 推荐伯林阅读亨利·詹姆斯, 80, 241; 在牛津评论拉斐特, 92; 法兰克福特把评论寄给伯林, 110; 参加牛津茶会, 111; 与伯林一起讨论文学, 123—125; 伯林读诗, 126; 在萨尔茨堡, 132—133; 伯林邀请共进午餐, 141, 205; 希望读希腊语, 154; 写有关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156; 加入共产党, 167, 229; 浪漫主义, 171; 编辑《牛津诗选》, 177 n1; 在《新牛津展望》发表文章, 180—181; 和伊丽莎白·鲍恩, 190; 与伯林在湖区, 193—196; 拜访休·沃尔波尔, 193—195; 里斯与罗莎蒙德·莱曼的风流韵事, 198; 伯林错过了会面, 204—205; 身份感, 214; 与伊内兹·珀恩结婚, 217—218, 220—221; 里斯准备邀请他去全灵学院, 224; 关于阿尔弗雷德·斯彭德叔叔, 225; 与托尼, 230; 与伯林的关系, 233, 240, 284; 关于个人关系, 243; 与艾耶尔决裂, 244; 关于评论季刊的打算, 261; 战时, 306; 伯林建议派其到美国进行战争宣传, 321; 再婚(妻子娜塔莎·立特文), 371; 伯林对其看法, 717; 《燃烧的仙人掌》, 169; 《毁灭性元素》, 116 & n4, 124 n1; 《从自由主义前进》, 229; 《晒牧草》(小说), 181 n2; 《济慈与雪莱(1795—1821; 1792—1822)》, 230 n3; 《法官的审判》(戏剧), 155 n4, 157, 161, 165, 175, 269; 《维也纳》(诗), 118
- Spengler, Oswald, 施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 642
- Sperry, Miss, 斯佩里小姐, 63
- Spielman, Gertrude, Lady, 斯皮尔曼, 格特鲁德, 夫人(婚前姓拉斐尔), 149
- Spielman, Sir Meyer, 斯皮尔曼, 梅尔, 爵士, 149
- Spinelli, Ingrid, 斯宾纳里, 英格丽, 见沃伯格, 英格丽
- Spinelli, Veniero, 斯宾纳里, 维尼埃罗, 88 n1
- Spinoza, Benedict de (Baruch), 斯宾诺莎, 贝内迪特·德(·巴鲁克), 78
- Sprott, Walter John Herbert (‘Jack’), 斯普洛特, 沃尔特·约翰·赫尔伯特(“杰克”), 187 n2
- Squire, Sir John Coilings, 斯凯尔, 约翰·柯林斯, 爵士, 205
- St-Clair-Erskine, James (‘Hamish’) Alexander Wedderburn, 圣克莱尔—厄斯凯恩, 詹姆斯(“哈密什”)·亚历山大·魏戴本, 37
- Stace, Walter Terence, 斯塔斯, 瓦尔特·特伦斯, 496
- Stalin, Joseph Vissarionovich,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对伯林与阿赫玛托娃会面的反应, x1; 弗莱彻与伯林谈论他, 341; 清洗, 442; 出席雅尔塔会议, 542 n6, 688; 出席波茨



- 坦会议, 582 n1; 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589; 命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撤离列宁格勒, 607; 发表演讲捍卫苏联体制(1946年2月9日), 622; 期待丘吉尔战后连任, 686
- Stamitz, Johann Wenzel Anton, 斯塔米茨, 朱安·温泽尔·安东, 293
- Stancliffe, Barbara, 斯坦克里夫, 芭芭拉, 720
- Stanley, Oliver Frederick George, 斯坦利, 奥利弗·弗雷德里克·乔治, 423, 546, 670, 676
- Starhemberg, Prince Ernst Rüdiger, 施塔恩贝格, 恩斯特·吕迪格, 亲王, 29
- Stark, Freya Madeline, 史塔克, 芙瑞雅·玛德琳, 442, 477, 483, 494, 578
- 'State of Psychology in 1936, The' (IB), 《1936年的心理学现状》(伯林), 187 n1
- Stebbing, (Lizzie) Susan, 斯特宾, (丽吉·) 苏珊, 117
- Stein, Gertrude, 施泰因, 格特鲁德, 149—150, 152, 212 n1
- Stein, Lorenz von, 施泰因, 洛伦茨·冯, 68
- Steindler, 斯坦得勒, (皮尔斯纳号) 船长, 99
- Steinhardt, Laurence Adolph, 斯坦哈特, 劳伦斯·阿道夫, 321, 323
- Stendhal, 司汤达(马里—亨利·贝尔的笔名), 241
- Stephenson, John Vere, 史蒂文森, 约翰·维尔, 427
- Stephenson, William Samuel, 史蒂文森, 威廉·塞缪尔, 433, 436
- Stern, Avraham, 斯特恩, 阿弗拉汉姆, 121 n4
- Stern Gang (Lekhi organisation), 斯特恩帮(利凯组织), 121 n4, 687, 690
- Stern, Robert, 斯特恩, 罗伯特, 608 n1
- Stettinius, Edward Reilly, Jr, 斯退丁纽斯, 小爱德华·赖利, 544, 547—548, 553, 557, 675, 677—678
- Stevens, Courtenay Edward, 斯蒂文斯, 科特内·爱德华, 163
- Stewart, Arthur Thomas ('Tom'), 斯图尔特, 阿瑟·托马斯("汤姆"), 555
- Stewart, Sir (Percy) Malcolm, 斯图尔特, (珀西·) 迈尔肯, 爵士, 393
- Stimson, Henry Lewis, 史汀生, 亨利·刘易斯, 447, 449, 557
- Stocks, John Leofric, 斯多克斯, 约翰·里奥弗里克, 140
- Stoics, 斯多葛派, 631
- Stopes, Marie Charlotte Carmichael, 斯都普斯, 玛丽·夏洛特·卡迈克尔, 110
- Stopford, Edward Kennedy, 斯多福, 爱德华·肯尼迪, 59
- Stopford, Robert Jemmett, 斯多福, 罗伯特·杰米特, 330, 339
- Stoppard, Tom, 斯托帕, 汤姆: 《沉船》, xix n1
- Storrs Ronald, 斯多尔斯, 罗纳尔德, 117, 119
- Strachey, Barbara, 斯特雷奇, 芭芭拉(后姓休尔汀; 再后来姓哈尔彭), 18 n1,

- 56—57, 429, 457
- Strachey, (Giles) Lytton, 斯特雷奇, (盖尔斯·)利顿, 146, 192 n2
- \*Straight, Lady Daphne Margarita, 斯特雷特, 达夫妮·玛格丽塔, 夫人(婚前姓芬奇—哈顿; 图34): 喜欢伯林, 423; 魏茨曼与其在英国见面, 437, 440; 给华盛顿的伯林写信, 469; 在华盛顿拜访伯林, 474; 与芭芭拉·莫瑟·纳尼一起工作, 488 n1; 厌烦达沃尔, 503 n1; 克鲁克香克向其称赞伯林, 545; 伯林写信谈论对杜鲁门的看法, 554; 谈论赫伯特·尼古拉斯, 713
- Straight, Dorothy, 斯特雷特, 多萝西, 554 n6
- Straight, Michael Whitney, 斯特雷特, 迈克尔·惠特尼, 318, 717
- Straight, Whitney Willard, 斯特雷特, 惠特尼·威拉德(达夫妮·斯特雷特的丈夫), 423 n1
- Straight, Willard, 斯特雷特, 维拉德(多萝西·斯特雷特的丈夫), 554 n6
- Strang, Sir William, 斯特兰, 威廉, 爵士, 431
- Strathallan, John David Drummond, Viscount, 斯特朗萨兰, 约翰·戴维·德拉蒙德, 子爵(后成为十八世珀思伯爵), 337
- Strauss, Aline Elisabeth Yvonne, 斯特劳斯, 艾琳·伊丽莎白·伊冯娜(婚前姓德·甘茨堡; 后姓哈尔本, 再后姓伯林): 与伯林结婚, xli; 把伯林孩提时的画像送给汉普希尔, 147 n5; 伯林在跨洋航行中见到她, 358 n2; 伯林在纽约见到她, 419 n2
- Strauss, Cyril Anthony, 斯特劳斯, 西瑞尔·安东尼, 91
- Strauss, Johann, junior, 斯特劳斯, 约翰, 小: 《蝙蝠》, 471
- Strauss, Richard, 斯特劳斯, 理查德, 130, 239
- Stresemann, Gustav, 施特雷泽曼, 古斯塔夫, 314, 672
- Stroock, Solomon Marcuse, 司徒克, 所罗门·马库斯, 332 n2
- Struma, 斯特鲁玛(运送巴勒斯坦移民的船只), 664
- Struve, Gleb Petrovich, 斯特鲁维, 格雷伯·佩特洛维奇, 564
- Stuart, Sir James Gray, 斯图尔特, 詹姆斯·格雷(后为子爵一世), 479
- Sudetenland, 苏台德, 282
- Sue, Eugène, 苏, 欧仁(玛丽—约瑟夫·苏的笔名), 215
- Sulzberger, Cyrus Leo, 苏兹贝格, 赛勒斯·利欧, 439, 450, 566
- Sumner, (Benedict) Humphrey, 萨姆纳, (本尼迪克特·)汉弗莱, 161, 208, 213, 296, 490, 539, 542, 560, 565—566, 574, 578, 719
-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153, 174
- Swan, Mrs, 斯旺太太(管家?), 10—11
- Sweden, 瑞典, 591, 615, 621
-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 乔纳森, 230
- Swing, Betty Gram, 斯温, 贝蒂·格拉姆, 373 n2

- Swing, Raymond Gram, 斯温, 雷蒙·格拉姆, 373—374, 622
- Swingler, Randall Carline, 斯文格勒, 兰德尔·卡莱恩, 181
- Swingler, Stephen Thomas, 斯文格勒, 斯蒂芬·托马斯, 186
- Swinton, Major-General Sir Ernest (Dunlop), 斯文顿, 厄内斯特(·邓洛普), 陆军少将, 321
- Swope, Herbert Bayard, 斯沃普, 赫伯特·贝亚德, 446, 448—449
- Sykes, Camilla Georgiana, 赛克斯, 卡米拉·乔治安娜(婚前姓拉塞尔), 315 n4
- Sykes, Christopher Hugh, 赛克斯, 克里斯托弗·休, 315 n4; 《被困扰的忠诚》, 84 n1
- Sylvester, James Joseph, 西尔维斯特, 詹姆斯·约瑟夫, 42 n7
- Syme, Ronald, 希姆, 罗纳德, 31 n7, 338, 380
- Syria, 叙利亚, 109
- Szigeti, Joseph, 西盖蒂, 约瑟夫, 483
- Szilard, Leo, 西拉德, 利欧, 430 n6
- Taft, Robert Alphonso, 塔夫特, 罗伯特·艾尔冯索, 485
- Taft, William Howard, 塔夫特, 威廉·霍华德, 485 n3
- Taji, Ahmed Shukri, 塔吉, 艾哈迈德·舒克里, 102 n11
-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de, 塔列朗—佩里戈, 夏尔·莫里斯·德, 465
- Tat, Die*, 《行为》(期刊), 638
- Tawney, Richard Henry, 陶尼, 理查德·亨利, 321, 383, 657
- Tel Aviv, 特拉维夫, 101, 107, 139, 142
- Teller, Judd, 泰勒, 贾德, 665
- Tennant, Mark Dalcour, 坦南特, 马克·戴尔科(图13), 59 n3
- Thistlethwaite, Frank, 泰斯特尔思维特, 弗兰克: 《我们的战争, 1938—1945》, 360
- Thomas, Benjamin Crewdson, 托马斯, 本杰明·克鲁森, 404, 411, 424, 545
- Thompson, Dorothy, 汤普森, 多萝西(辛克莱·刘易斯夫人), 374, 428—429, 678
- Thompson, Virgil, 汤普森, 维吉尔, 580
- Tiefenbacher, Clarita, 梯芬巴切尔, 克莱丽塔(后姓冯·特罗特), 717
- Tighe, Dixie, 泰格, 迪克西, 406, 415
- Tikhonov, Nikolay Semenovich, 吉洪诺夫, 尼古拉·塞蒙诺维奇, 610
-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 218, 584—585, 654
- Times, The*, 《泰晤士报》, 30, 33, 83, 158, 432
- Tito, Josip Broz, 铁托, 约瑟普·布罗兹, 623, 673
- Toklas, Alice Babette, 托克拉斯, 艾丽丝·巴贝特, 150, 153
- Toller, Ernst, 托勒, 恩斯特, 165
- Tolstoy, Aleksey Nikolaevich, 托尔斯泰, 阿列克谢·尼科拉耶维奇: 《沙皇

- 费奥多尔》，591
- Tolstoy, Count Lev Nikolaevich,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伯爵: 伯林写文章评论他, xix, xli, 42, 81, 255, 272—273; 论理解, 164; 论私人关系, 243; 谈论作品, 285; 作品纪念版, 595; 《童年、少年和青年》, 45 & n2, 134, 267 n4, 273; 《哈吉·穆拉特》, 594; 《战争与和平》, 212
- Tomkins, Edward Emile, 汤姆金斯, 爱德华·埃米尔, 589, 593, 625
- Tomlinson, Colonel J. N., 汤宁森, J. N., 上校, 334—335
- Torch, Operation, 火炬行动, 419
- Toscanini, Arturo, 托斯卡尼尼, 阿图洛, 100, 104, 118, 126, 131, 133, 137, 173, 219, 236, 237, 246, 268, 292, 294
- Townsend, Mary Georgiana Townsend, 唐森德, 玛丽·乔治安娜·唐森德, 牛津市长, 179
- Toynbee, Arnold Joseph, 汤因比, 阿诺德·约瑟夫, 339 n5, 491, 514, 518—521, 529, 537—538, 545, 566
- Toynbee, Philip, 汤因比, 菲利普, 244 n2
- Transjordan, 外约旦, 98, 107
- Tree, Ronald, 特利, 罗纳德, 423
-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特瑞福里安, 乔治·麦考雷, 302
- Trevor-Roper, Hugh, 特雷弗—罗珀, 休 (后为格兰顿的达克伯爵), 388 n1
- Tripp, Brenda Muriel Howard, 特里普, 布伦达·穆里埃尔·霍华德, 599, 602—604, 607
- Trollope, Anthony, 特罗洛普, 安东尼, 243
-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莱昂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的笔名), 317
- \*Trott zu Solz., Adam von, 特罗特·楚·索茨, 亚当·冯 (图11): 与伯林的友谊, 40, 45, 63, 89—91; 与黛安娜·哈贝克的友谊, 63 n1; 否认纳粹迫害犹太人, 83—84, 89; 访全灵学院, 126; 来新学院访伯林, 292; 惠勒一班纳特为其辩护, 328, 339; 与伯克的友谊, 575; 得到伯林称赞, 718—719
-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 哈里·S.: 人品, 390—391, 553, 555; 1944年大选获胜, 499; 接替罗斯福任总统, 544, 553—558; 丘吉尔写信谈及“铁幕”, 581; 出席波茨坦会议, 582 n1; 名声, 621, 628; 与国际事务, 623; 巴勒斯坦政策, 687, 689—691
- Trust Houses (company), 特拉斯特酒店 (公司), 293
- Tsarskoe Selo, 沙皇村, 603
- Tugwell, Rexford Guy, 图格维尔, 雷克斯福特·盖伊, 555
- Turgenev, Ivan Sergeevich,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伯林读其作品, 42, 44, 80, 284; 关于福楼拜, 182; 返回俄罗斯, 284; 《前夜》, 83, 232; 《罗亭》, 42, 214

- Turkey, 土耳其, 621, 624
- Turner, George James, 特纳, 乔治·詹姆斯, 144 n2, 159, 199, 205
- Turner, Ralph Edmund, 特纳, 拉尔夫·埃德蒙德, 492
- Turner, Walter James Redfern, 特纳, 沃尔特·詹姆斯·瑞德芬, 338, 535 n1
- Twentyman, Edward, 特温提曼, 爱德华, 547
- Twig, Pearly, 特威格, 珀利, 442
-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B) 《两种自由概念》(伯林), xl—xli
- Tyndall, John, 丁达尔, 约翰, 76
- Unamuno y Jugo, Miguel de, 乌纳穆诺·伊·胡戈, 米盖尔·德, 152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起草宪章, 530 n1, 550, 581; 成立, 542 n6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伯林希望访美, 79; 对神话的需要, 152; 移民限制, 262 n1, 352 n2; 伯林到达, 309; 伯林的个人印象, 320, 323, 327—328, 363, 367—368, 379, 471—472; 英国战时宣传, 321, 326, 337; 转交驱逐舰给英国, 324, 326, 346; 战时对英国的支持, 336, 338, 340, 346, 367, 384; 伯林不快, 356, 372; 伯林谈论美国的犹太人, 375—376, 378—379, 474, 478; 参战, 386, 390, 399; 对英国的误解与不信任, 400; 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 437—451, 663—693; 反犹情绪, 447; 伯林周游美国, 465—468, 483, 494; 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 476—478; 与苏联的潜在竞争, 486, 542, 563; 对英国与苏联的态度, 488; 总统大选: (1940年), 361 n5, 367; (1944年), 499—501; 英国殖民主义政策, 546—547, 561, 622, 660; 苏联不妥协, 622; 发自美国的每周政治报告, 655—660; 犹太复国主义的反英攻击, 680; 另见华盛顿
- Uppingham School, 阿品汉姆学校, 69—70
- Upward, Edward, 阿普沃德, 爱德华, 270 n1
- Urmson, James Opie, 乌姆森, 詹姆斯·奥佩, 510, 710
- Urquhart, Francis Fortescue ('Sligger'), 厄克哈特, 弗朗西斯·福蒂斯丘(“黑人”), 57 n4, 59
- Ussishkin, Avraham Menachem Mendel, 乌西斯金, 阿弗拉汉姆·梅纳赫姆·门德尔, 95, 101, 382
- Vaillant, Auguste, 威兰特, 奥古斯特, 261
- Valéry, Ambroise-Paul-Toussaint-Jules, 瓦雷里, 安布罗斯—保罗—杜桑—儒尔), 225, 295
- Vandenberg, Arthur Hendrick, 范登堡, 亚瑟·亨德里克, 623, 627
- Vanzetti, Bartolomeo, 万兹提, 巴特洛米欧, 709
- Vasnetsov, Viktor Mikhailovich, 瓦斯涅佐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594
- Vaughan, General Harry Hawkins, 沃

- 恩, 哈利·霍金斯将军, 556
- Vaughan Williams, Ralph, 沃恩·威廉斯, 拉尔夫, 371 n2
- Venice, 威尼斯, 100, 104, 231—232, 254—255
- Venzelos, Eleutherios, 温尼泽罗斯, 艾留瑟里奥斯, 117 n3
- Verdi, 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 威尔第, 朱塞佩·弗图尼诺·弗朗切斯科, 124, 704; 《奥赛罗》, 86, n8
- Verhaeren, Émile, 凡尔哈伦, 爱弥尔, 609
- Vernadsky, George (Georgy)  
Vladimirovich, 弗纳茨基, 乔治(格奥尔吉)·弗拉基米洛维奇, 577
- Verne, Jules, 凡尔纳, 儒勒: 《从地球到月球》, 207
- Versailles, Treaty of (1919), 凡尔赛条约(1919), 158 n3
- Verschoyle, Derek Hugo, 弗斯科伊尔, 德里克·雨果, 215, 227
- Vicenza, 维琴察, 231
- Vico and Herder* (IB), 《维柯与赫尔德》(柏林), xli
- Viennese Circle, 维也纳学派, 649
- Villiers, Charles Hyde, 维利尔斯, 查尔斯·海德, 157
- Vinson, Frederick Moore, 文森, 弗里德里克·莫尔, 542
- ‘Visit to Leningrad, A’ (IB), 《访列宁格勒纪实》(柏林), 601 n5
- Viteles, Harry, 维特雷斯, 哈利, 96, 105
- Vogel, Frieda, 沃格尔, 弗里达, 359
- Voight, F. A., 沃伊特, F.A., 718
- Volhard, Ambroise, 弗拉德, 安布罗斯, 214, 230
- Volshonok, Berta, 沃什诺克, 贝塔(伯林姨妈), 8, 10, 12, 346
- Volshonok, Roodsia-Freude (‘Rosa’), 沃什诺克, 罗莎—弗洛伊德(“罗莎”), 伯林的祖母, 8, 12
- Volshonok, Victor, 沃什诺克, 维克托, 351
- Vriesland, Zadok A. Van, 福莱斯兰德, 扎多克·A.范, 102
- Wace, Barbara, 威斯, 芭芭拉, 518
- Waddesdon Manor, Buckinghamshire, 瓦德斯东庄园, 白金汉郡, 245, 715
- Wade-Gery, Henry Theodore, 韦德—格里, 亨利·西奥多, 210, 220, 286, 338, 512
- Wadham College, Oxford, 瓦德汉姆学院, 牛津, 293—294
-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理查德, 123—124, 154, 517
- Wagner, Robert Ferdinand, 瓦格纳, 罗伯特·费迪南德, 445, 501
- Waismann, Friedrich, 魏斯曼, 弗里德里希, 498
- Waitz, Sigismund, 魏茨, 西吉斯蒙德, 萨尔茨堡市大主教, 430
- Waley Cohen, Sir Robert, 瓦利·科恩, 罗伯特爵士, 477
- Walker, John, 沃克, 约翰, 561
- Walker, Lady Margaret Gwendolen

- Mary, 沃克, 玛格丽特·格温德伦·玛丽夫人(婚前姓德鲁蒙德), 561
- \*Walker, Rachel (‘Tips’), 沃克, 雷切尔(“小费”, 图16, 22): 在巴黎, 12 n1, 112 n1, 122; 与伯林的友谊以及对伯林的感情, 92, 122, 182; 伯林结束和她的关系, 133—135; 伊丽莎白·鲍恩在她的小说《心之死》中描述了她, 288 n5
- Wallace, Alfred Russel, 华莱士, 阿尔弗雷德·罗素, 76
- \*Wallace, David John, 华莱士, 戴维·约翰: 品质, 118; 西勒·林德, 118; 德·比埃维耶, 150 n3; 学位, 185; 罗莎蒙德·莱曼, 203; 受邀与斯彭德见面, 205; 在牛津主考哲学, 260; 伯林对他的喜欢之情, 273—274; 给在爱尔兰的伯林去信, 279—280; 婚礼, 294; 阵亡, 547
- Wallace, Euan, 华莱士, 茹安, 720
- Wallace, Henry Agard, 华莱士, 亨利·阿加德, 421, 423
- Wallace, Miss, 华莱士小姐, 护士, 412
- Wallenheim, Baroness Ingrid von, 威伦汉姆, 英格丽·冯, 男爵夫人, 328
- Walpole, Sir Hugh Seymour, 沃尔波尔, 休·西摩, 爵士, 193—196, 206, 230
- Walter, Bruno, 沃尔特, 布鲁诺, 118
- Walters, Marjorie, 沃尔特斯, 玛乔丽(后成为林斯达夫人), 380
- Walton, Diana Florence, 沃尔顿, 戴安娜·弗洛伦丝, 283
- Wangenheim, Luise, Baroness Götz von, 旺根海姆, 路易丝, 戈兹·冯, 男爵夫人, 328
- War and the Working Class*, 《战争与工人阶级》(期刊, 后更名《新时代》), 543
- \*Warburg family, 沃伯格家族, 323, 367
- \*Warburg, Aby, 沃伯格, 艾比, 364 n4
- \*Warburg, Edward Mortimer Morris, 沃伯格, 爱德华·莫蒂默·莫里斯, 364, 376 n4
- \*Warburg, Felix, 沃伯格, 菲利克斯, 364 n4, 376 n4
- \*Warburg, Fredric John, 沃伯格, 弗雷德里克·约翰, 174 n7, 192 n2
- \*Warburg, Fritz, 沃伯格, 弗里茨, 364 n4, 376 n4
- \*Warburg, Ingrid, 沃伯格, 英格丽(后姓斯宾纳里), 88, 90, 176, 189, 330—331, 339, 364 n4, 376 n4
- \*Warburg, Max, 沃伯格, 马克斯, 376
- \*Warburg, Pamela, 沃伯格, 帕米拉(婚前姓德·贝尤), 174, 227
- \*Warburg, Paul, 沃伯格, 保罗, 376 n4
- Ward, Barbara Mary, 沃德, 芭芭拉·玛丽(后为杰克森男爵夫人), 528
- Ward-Perkins, John Bryan, 沃德—帕金斯, 约翰·布赖恩, (图16), 92
- Warner, Christopher Frederick Ashton, 沃纳, 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克·艾什顿, 563 & n1, 594, 601 n2
- Warner, Rex, 沃纳, 雷克斯, 714
-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伯林在英国大使馆工作(图36), x1, 318—

- 19, 365—366, 502, 656—657; 伯林对其看法, 320, 613; 国家美术馆, 365 n2; 地图, 398; 伯林负责政治调查室, 399, 656—657; 华盛顿的英国人, 402; 伯林与人合住, 427, 454—455, 467, 469, 473, 493, 496, 502, 552, 594; 伯林向父母描述自己的生活, 451—458, 467, 469, 473—475; 伯林评论这里就像是大选时期的临时总部, 584; 伯林回华盛顿(1946年2月), 615, 621; 拉比游行, 672; 另见美国
-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381 n3, 399 n1, 485, 676
- Washington Times-Herald*, 《华盛顿时代先驱报》, 487
- Wassermann, Jakob, 沃瑟曼, 雅可布, 242
- Watson, John Parker, 沃森, 约翰·帕克, 27
- Watson, Sydney, 沃森, 西德尼, 338
- Watts-Dunton, (Walter) Theodore, 瓦兹—邓顿, (沃尔特·)西奥多, 632
- Wauchope, Lt. Gen. Sir Arthur Grenfell, 沃乔普, 阿瑟·格伦菲尔, 爵士, 陆军中将, 97 n3, 98
- Waugh, Evelyn, 沃, 伊夫林, 251; 《旧地重游》, 628; 《邪恶的肉体》, 56
- Webb, Mary Gladys, 韦伯, 玛丽·格莱迪斯, 168
- Webb, Sidney, 韦伯, 西德尼(帕斯菲尔德勋爵), 67 n4
- Webster, Sir Charles Kingsley, 韦伯斯特, 查尔斯·金斯利, 爵士, 383, 496, 515, 667, 682
- Wedgwood, Josiah Clement, 韦奇伍德, 乔塞亚·克莱门特, 97
- Weidenfeld, George, 威登菲尔德, 乔治, 704
- Weiller, Commandant Paul-Louis, 维勒, 保罗—路易, 司令官, 562 n2
- Weisgal, Meyer Wolf, 威斯戈尔, 梅耶·伍尔夫, 428, 430, 671
- \*Weizmann, Chaim (‘Charles’), 魏茨曼, 哈伊姆(“查尔斯”): 巴勒斯坦战前形势, 121; 卡普兰称赞他, 248; 欧姆斯比—戈尔, 249; 伯林在战时与其见面, 305—306; 伯林希望与其在英国见面, 345; 提出访美, 350; 战争期间住在多切斯特酒店, 354 n2; 与劳埃德勋爵会面, 商谈在英国军队中设立犹太兵团之事, 355 n1; 伯林在美国的工作, 356; 前往美国, 359; 与弗劳拉·所罗门的友谊, 360 n5; 与法兰克福特的关系, 369, 399; 在美国, 369, 371, 376, 406, 428—429, 667; 招待多萝西·汤普森, 374; “查尔斯”的名字众所周知, 374 n; 谈论美国犹太人对英国的热爱, 376; 儿子阵亡, 393—394, 396, 416, 669; 伯林在纽约患肺炎, 404, 407—410, 415; 与伯林在卡茨基尔山, 415—417; 访英(1943年), 437, 447, 469;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438, 447, 668, 684; 与伯林父母见面, 455; 返回美国, 539;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666, 675; 对伯林的影响,



- 667; 反对巴勒斯坦的战时动乱, 669; 支持丘吉尔和英国事业, 669, 673; 赞同建立犹太国家, 670—672, 682; 大权旁落, 672; 忍耐与外交手腕, 673, 683, 686; 与本—古里恩的分歧, 677; 提出巴勒斯坦实行分治, 677; 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在美的宣传活动, 678—679; 英国对巴勒斯坦定居点的政策, 683, 684—687; 莫因勋爵遭暗杀后, 丘吉尔拒绝见魏茨曼, 688; 联合反抗英国针对巴勒斯坦的移民政策, 690; 得到杜鲁门支持, 691; 阿拉伯人, 692; 伯林回忆他, 721
- Weizmann, Michael Oser, 魏茨曼, 迈克尔·奥萨, 394 n1, 418
- Weizmann, Vera, 魏茨曼, 薇拉(婚前姓查兹曼), 351, 355, 360 n5, 394 n1, 407, 410, 415—418, 429, 437, 455, 721
- Weldon, Thomas Dewar, 威尔顿, 托马斯·杜沃, 577
- Welles, Sumner, 韦尔斯, 萨姆纳, 421, 438, 443—444, 448, 450, 616, 673, 675, 677
- Wellesley, Arthur Valerian, 韦尔兹利, 亚瑟·瓦勒里安(后为惠灵顿公爵八世), 157
- Wells, Herbert George, 韦尔斯, 赫伯特·乔治, 125, 145, 213
- Wells, John, 威尔士, 约翰, xxxiv n2
- Wescott, Glenway, 威斯科特, 格兰威, 482
- Westrick, Gerhardt Alois, 威斯特里克, 格哈特·阿罗伊斯, 328
- Weygand, General Maxime, 魏刚, 马克希姆, 将军, 422
- Wheeler, Burton Kendall, 惠勒, 伯顿·肯多尔, 367, 554
- Wheeler, Peter, 惠勒, 彼得, 38 n5, 712
- \*Wheeler-Bennett, John Wheeler, 惠勒—班纳特, 约翰·惠勒: 关于伯林在美国的工作, 309, 325, 347, 354, 656; 关于美国的捷克人, 339; 伯林在纽约患肺炎, 406—411, 414, 418; 向伯林父母问好, 407; 伯林与其关系, 428; 关于外交官中的嘲讽情绪, 442; 回到美国, 457; 在英国, 470; 伯林打算担任军事史教授, 491; 与亚历山大·哈尔彭的友谊, 493; 关于美国1944年大选, 499; 提供外交部职位, 515; 墨西哥之行, 523, 528—529, 535—536, 540; 关于外交部的争论, 527; 健康状况不好, 528, 721; 婚姻, 538, 540, 552; 有关奥博雷·摩根, 713; 与冯·特罗特的友谊, 719; 《特别关系》, 536n1, 656
- Wheeler-Bennett, Ruth Harrison, 惠勒—班纳特, 鲁斯·哈里森(婚前姓瑞舍), 538 n2, 552, 721
- Whitbread, Col. William H., 怀特布瑞德, 威廉·H., 上校, 77 n4
- White, Harry Dexter, 怀特, 哈里·德克斯特, 546
- White, William Allen, 怀特, 威廉·艾伦, 326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怀特海, 阿尔

- 弗雷德·诺斯, 109, 180, 652
- Whitman, Walt (er), 惠特曼, 沃尔特, 572
- Whitney, John Hay, 惠特尼, 约翰·海, 481
- Whyte-Melville, George John, 怀特—梅尔维尔, 乔治·约翰, 572
- Wilberforce, Richard Orme, 韦尔伯弗斯, 理查德·欧姆(图13), 59 n3, 65
- Wild, Revd John Herbert Severn, 怀尔德, 约翰·赫伯特·塞弗恩, 牧师, 542, 694 n
- Wilde, Oscar Fingal O'Flaherty Wills, 王尔德, 奥斯卡·欧弗莱赫提·威尔斯, 176 n2
- Wiley, Irena Monique, 威利, 伊蕾娜·莫尼克(婚前姓巴鲁克), 487
- Wiley, John Cooper, 威利, 约翰·库珀, 486—487
- Williams, Edgar Trevor ('Bill'), 威廉斯, 埃德加·特里弗(“比尔”; “布里格男孩”), 576
- \*Williams, Jenifer Margaret, 威廉斯, 詹妮弗·玛格丽特(后姓哈特, 图12): 伯林邀请共进午餐, 113; 学位, 144 n2; 在布莱克威家的聚会, 162; 书评, 199 n7; 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 199; 与伊芙·柯斯奇度假, 203 n2; 为伯林介绍打字员, 271; 政治倾向, 338; 伯林对各种美国人的分类, 340; 丈夫担任新学院研究员, 534; 《别再问我: 自传》, 199 n6
- Williams, Shirley, 威廉斯, 谢利, 576 n4
- Willich, August, 威利希, 奥古斯特, 200
- Willkie, Wendell Lewis, 威尔基, 温德尔·刘易斯, 333, 345, 348, 361, 447, 485
- Wills, David, 韦尔斯, 戴维, 424
- Wilmers, Charles Kossman and Cesia, 威尔玛斯, 查尔斯·科斯曼和赛西尔, 331, 334
- Wilson, Edmund, 威尔逊, 埃德蒙, 572
- Wilson, Geoffrey Masterman, 威尔森, 杰弗里·马斯特曼, 563, 569
- Wilson, Giles, 威尔森, 盖尔斯, 694 n
- Wilson, Harold, 威尔森, 哈罗德, 694 n
- Wilson, John Cook, 威尔森, 约翰·库克, 509, 512
- Wilson, Mary, 威尔森, 玛丽, 694 n
-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 120, 579 n6
- Winant, John Gilbert, 维南特, 约翰·吉尔伯特, 368, 449, 677
- Windisch-Graetz family, 温迪施—格雷茨家族, 421
- Windsor, Edward, Duke of, 温莎, 爱德华, 公爵(曾为爱德华八世): 加冕, 194 n2; 退位, 218—219, 221; 作为尤金·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客人, 345
- Windsor, Wallis Warfield, Duchess of (earlier Simpson), 温莎, 沃利斯·华菲德, (之前的辛普森)公爵夫人, 219
- Winocour, Jack, 温诺克尔, 杰克, 424
- Winster, Reginald Thomas Herbert Fletcher, 温斯特, 雷吉纳尔德·托马斯·赫伯特·弗莱彻, 男爵一世, 527—

- 528
- Wint, (Frank) Guy Atherton, 温特, (弗兰克·)盖伊·阿瑟顿, 377, 432, 451, 582
- Winterton, (Cecilia) Monica, Countess, 温特顿, (塞西莉亚·)莫尼卡, 伯爵夫人, 72
- Wisdom, John Oulton, 威斯登, 约翰·奥尔顿: 《思辨哲学的变形》, 649—653
- Wisdom, (Arthur) John Terence Dibben, 威斯登, (亚瑟·)约翰·特伦斯·迪本(约翰·奥尔顿·威斯登的堂弟), 117, 650; 《心理与物质的问题》, 117
- Wise, Stephen Samuel, 怀斯, 斯蒂芬·塞缪尔, 360, 438, 444, 447—451, 671, 677—678, 687, 688
- 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 652
- Wolf, W., 沃尔夫, W., 265
- Wolfson College, 沃尔夫森学院, xvi, xvii, xli
- Wolfson Foundation, 沃尔夫森基金会, xli
- Women's International Zionist Organization (WIZO),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 351 n1, 416 n2
- Wood, (Francis Hugh) Peter Courtenay, 伍德, (弗朗西斯·休·)彼特·科迪内: 阵亡, 416, 419
- Wood, Richard Frederick, 伍德, 理查德·弗雷德里克, 427 n
- Wood, Sir Henry, 伍德, 亨利, 爵士, 48
- Woods, Oliver Frederick John Bradley, 伍兹, 奥利弗·弗雷德里克·约翰·布拉德利(图13), 59 n3
- Woodward, Ernest Llewellyn, 伍德沃德, 欧内斯特·卢埃林, 65, 187, 207, 212, 222, 296, 490, 569
- Woolf, Leonard, 伍尔夫, 伦纳德, 80, 261 n6
- Woolf, (Adeline) Virginia, 伍尔夫, (艾德琳·)弗吉尼亚(婚前姓斯蒂芬): 信件与日记, xxvin1; 到新学院赴宴, 68—71; 伯林称赞她, 79; 伊丽莎白·鲍恩(卡梅伦夫人)招待, 82, 170; 与伯林见面并一起吃饭, 85, 305; 在牛津茶会上; 111; 沃尔波尔谈论她, 193, 195; 感知, 229; 使用陈词滥调, 237; 伯林对作品的看法, 242; 霍格斯出版社, 261 n6; 在国外向伯林发出邀请, 332; 去世, 380; 在苏联无人知晓, 611; 《海浪》, 193; 《流年》, 231
- Woozley, Anthony Douglas, 伍兹雷, 安东尼·道格拉斯, 207, 234
- Workers' Educational Union (German Communist Association), 工人教育联盟(德国共产主义联合会), 200 n12
- 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 (Jewish Agency),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事务局), 93, 247 n1, 443, 721
- Wrangel, Baron Nikolay Egorovich, 弗兰格尔, 尼古拉·依葛洛维奇, 男爵: 《传记: 从农奴到布尔什维克》, 201

- Wright, Esther Ursula, 赖特, 以瑟·厄休拉(婚前姓朗), 483, 494
- Wright, Michael Robert, 赖特, 迈克尔·罗伯特, 434—435, 483, 503, 515, 519, 538, 543, 560, 561, 624, 661
- Würzburg, 维尔茨堡, 35
- Wylie, Shaun, 怀利, 夏恩(图13), 59 n3
- Yakobson, Sergey Osipovich, 雅可布森, 谢尔盖·欧西珀维奇(雅各布森的弟弟), 564, 578
- Yalta Conference (1945), 雅尔塔会议(1945), 542 n6, 547, 553 n3, 557, 688
- Yeats, William Butler, 叶芝, 威廉·巴特勒: 考克斯对其不以为然, 86—87; 文学特质, 124; 《科隆纳斯的俄狄浦斯》的翻译, 154; 鲍拉谈论他, 225; 伯林在都柏林无意中听到他说话, 277—281; 在凯普·马丁酒店去世, 295; 《自传》, 86; 《凯尔特的薄暮》, 86
- Yeats-Brown, Francis Charles Claypon, 叶芝—布朗, 弗朗西斯·查尔斯·克雷朋, 262
- Yehuda, Eliezer Ben, 耶胡达, 艾利泽·本, 96 n8
- Yellin, Avinoam, 耶林, 阿文诺亚姆, 96, 105
- Yellin, David, 耶林, 戴维, 96, 105
- Yorke, Eric Cecil, 约克, 艾里克·塞西尔, 338, 716
- Young, Sir George and Jessie, Lady, 扬, 乔治爵士与杰西(有时候叫海伦)夫人, 163 n4
- Youngman, William Sterling, Jr, 扬曼, 小威廉·斯特灵, 481
- Yudin, Gennady Vasil'evich, 尤丁, 根纳季·瓦希里耶维奇, 564 n7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623 n4
- Zaménhof, Ludwik Lejzer, 柴门霍夫, 路德维克·莱瑟, 8 n
- Zeitlin, Elsley, 赛林, 埃尔斯里, 316
- Zemurray, Samuel, 泽穆雷, 塞缪尔, 306
- Zhdanov, Andrey Aleksandrovich, 日丹诺夫, 安德烈·阿列克桑德洛维奇, 606
- Zimmermann, (Ferdinand) Friedrich, 齐麦曼, (费迪南·)弗里德里希: 《资本主义的终结》, 638—642
- Zimmern, Sir Alfred (Eckhard), 齐门, 阿尔弗雷德(·埃克哈特), 爵士, 234, 356
- Zinov'ev (Zinoviev), Grigory Evseevich, 季诺维耶夫, 格里高里·叶夫谢耶维奇(欧弗赛尔·格肖恩·阿洛诺夫·拉多米斯尔斯基的笔名), 229 n1
-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9, 93, 101, 107, 120, 247 n1, 355 n1, 379: 在美国, 437—451, 476—479, 663—693; 另见巴勒斯坦
- Zionist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犹太复国

- 主义联盟, 247 n1
-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332 n2, 442, 683
- ‘Zionist Politics in Wartime Washington’, “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 (伯林做的讲座), xxv
- Zionist Revisionist Movement, 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 332 n4
- Zlatopolsky, Hillel, 兹拉托普尔斯基, 西列尔, 93, 103 n2
- Zola, Émile, 左拉, 艾米尔, 241
- Zoshchenko, Mikhail Mikhailovich, 左琴科,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605, 606 n2, 607
- Zuckerman, Dov Ber, 祖克曼, 多弗·波尔 (后来姓伯林, 伯林的祖父), 496 n1
- Zweig, Stefan, 茨威格, 斯特芬, 173

雅典娜的猫头鹰在薄暮降临时才会起飞。

——G. W. F.黑格尔

## 译者附言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直至今天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他的许多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思想的著述，通过译林出版社译介，在我国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自2001年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翻译引进到中国，十年来，《伯林谈话录》、《自由及其背叛》、《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等伯林作品陆续由译林出版。《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是伯林别具一格、异彩纷呈的书信大成。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通过自己的译笔，努力为国内读者呈现一个全新的、生活中的、多角度的伯林。

以赛亚·伯林的书信，不仅揭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和睿智见解，还充分体现他乐于兼收并蓄的出众才华、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以及优美自然的洗练文笔。如同编辑亨利·哈代所言：伯林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教授。他充满智慧，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希望与恐惧有着与生俱来的非凡洞察力；他精力充沛，善于享受生活，喜欢结交各类朋友，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也情有独钟。本卷书信集，就反映了他年轻时代多姿多彩的视角和人格面貌。这些书信，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

本卷收录了伯林从十八岁到三十七岁近二十年间的书信。从就读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到进入牛津大学开始学者生涯，从二战期间被英国政府派驻华盛顿和纽约担任外交职务，到二战后前往莫斯科一偿夙愿，再到重回牛津任教，伯林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处于事业和身心的“飞扬年华”。这样一种丰富多彩、涉猎广泛的经历，加上大量的旁征博引，使得其书信极富深度和广度，给译者带来的翻译难度也显而易见。原著长达近800页，大量的注释、生平介绍和人名索引，翻译起来十分费神耗力。尤其是人名索引，浩繁细密，做起来有如身处炼狱一般。为使所有译名与文中保持一致，尽量不出差错，要不断前后查找。但有些时候，费尽心力，也可能劳而无功，因为索引标出的原书页码偶尔也会印错。改动一个字，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书翻译历经两年半，其中甘

苦，唯有自知。所幸的是，在翻译期间，主要译者陈小慰正好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有机会赴英国访学，对本书的翻译起到了莫大的帮助。在牛津大学，看到了伯林曾经工作过的新学院，对伯林和手中译的书有了更近一步的情感；而如果没有周末亲游伯林发信地址之一的凯希克湖区（Keswick），恐怕对其读音（读作ke-sick, w不发音）也不甚了然。

在书中，伯林书信的编辑曾生动地将自己比作工匠与管家的结合体：

每当思忖自己所承担的编辑任务，我总会想起两个大相径庭的比喻。……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石匠，他用一块块石头，速度缓慢地建造着某座宏伟大厦，例如大教堂。给他的石料中有切割齐整的，也有需要修琢加工的。另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管家，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藏身于绿色粗呢门之后，由于局限于家中的有限空间，他目光狭窄，但同时又因为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格外尖锐。

至于说编辑，至少是本书编辑，本质上而言是作者的副手……他不希望过分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他行使职责的目的。编辑者的目的，是建构一座精神大厦，实现设计者内心怀有的梦想……是安排一场社交聚会，充分展示主人的个性……谁会欢迎一个打断客人谈话的侍者？而倘若这个侍者企图加入谈话，那更是无法容忍，除非他的话别开生面，并且说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翻译则更像是一个涉及到三个人的对话过程。译者是同时会说两种语言的那个第三人，他帮助各说一种不同语言的两人相互沟通，达到对话的预期目的。与普通对话不同的是，它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指出，从对话学的角度看，翻译的关键不在完美，而在于成功，也即真正起到作用。在实实在在的现实语境中，在需要提供翻译的某个特定情境中起到作用，让交谈的双方（作者和受众）都感到满意。为了使译文话语有效影响受众，对话需要与倾听对象的互动，需要面向受众精心设计话语。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时刻牢记和秉承这一宗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通过有效运用译文话语，激发中国受众了解和领略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兴趣和热情。

本书由陈小慰和叶长缨合译。除征信启事、序言、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缩略语、伦敦、华盛顿（再访）、论自由、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华盛顿



快讯、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补注、年表、重要人物生平部分由陈小慰单独翻译外，其他主体部分，包括插图、家谱、牛津、纽约、华盛顿、莫斯科、列宁格勒、通信人索引、总索引等由陈小慰、叶长缨合作翻译。陈小慰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审校修订工作。

由于本书篇幅浩大、细节繁复，加上译者知识有限，虽已经过反复推敲审读，肯定还存在失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指正。

陈小慰

2011年12月于榕城

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于飞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亨利·哈代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书信作者之一，他机敏、坦诚、热情、睿智、无拘无束。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纪历史中的一些特殊时刻，并记录在其书信中。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伯林]对一切人一切事充满了洞见，他是一位顶级的闲谈者，天才式的，与他的交谈充实而富有智慧，你绝不想结束。

——迈克尔·派

上架建议：思想 传记

ISBN 978-7-5447-2596-5



9 787544 725965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http://www.ppm.cn)

定价：89.00元（上、下册）